

[英] 休·托马斯著

卡斯特罗 和古巴

上 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K837.51754

1

2=1

b7 89/17

卡斯特罗和古巴

上册

[英]休·托马斯著

斯禾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译 者 的 话

本书是《追求自由的古巴》一书的节译本。原书是一部古巴通史，着重写了古巴近二百年来的历史状况，篇幅较大。我们从中选译了第八卷第六十七章至第九卷第八十八章和第十一卷第九十八章至结论第一百一十六章，以《卡斯特罗和古巴》为书名单独出版。

作者休·托马斯，出生于1931年，是英国雷丁大学历史教授，曾写过《西班牙内战》、《苏伊士运河》等书。自1961年起，作者数度访问古巴，遍访有关人物，并根据广泛的已发表或未发表的材料，写成《追求自由的古巴》一书，于1971年由伦敦艾尔和斯波蒂斯伍德出版公司出版。

这个节译本共四十一章，综述了1952年到1970年古巴的历史状况。内容着重于卡斯特罗生平的活动，叙述了他的青少年时代生活以及后来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组织武装斗争，领导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建立临时政府的详细经过。对古巴革命政府成立后的政局及其采取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也作了具体的描述，其中并谈到了苏修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打入古巴，逐步取代美国在古巴的地位的。

本书为我们了解卡斯特罗其人及当代古巴的各种情

况，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参考材料。但必须指出，作者从资产阶级立场和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把马克思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相提并论，甚至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印边界问题，作者更歪曲事实，对我进行攻击。诸如此类的错误观点，字里行间经常有所流露，阅读时须加以严肃批判。

原书脚注很多，我们只采用一些较有参考价值的。书中还夹杂一些西班牙文，个别词汇一时无法查考，暂存疑。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承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大力协助，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特此志谢。

鉴于译者水平，一定存在不少错误和缺点，请读者批评指正。

1975年6月

卡斯特罗和古巴

〔英〕休·托马斯著

斯 禾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6.75 字数 530,000

1975年12月第1版 1975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71·66 定价: (共两册) 2.10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第 一 章	菲德尔·卡斯特罗：童年和青年时代.....	1
第 二 章	蒙卡达：理想.....	29
第 三 章	蒙卡达：战斗.....	45
第 四 章	小阳春.....	59
第 五 章	公民对话.....	86
第 六 章	卡斯特罗在墨西哥.....	104
第 七 章	“格拉玛号”和马埃斯特腊山.....	130
第 八 章	赫伯特·马修斯上山.....	150
第 九 章	攻打总统府.....	174
第 十 章	山区之战(1957年3—5月).....	188
第 十 一 章	美国参加争论.....	200
第 十 二 章	迈阿密和圣地亚哥.....	213
第 十 三 章	西恩富戈斯的海军兵变.....	229
第 十 四 章	禁运武器.....	248
第 十 五 章	4月9日的罢工.....	268
第 十 六 章	1958年5月巴蒂斯塔的“大进攻”.....	280
第 十 七 章	崩溃.....	292
第 十 八 章	巴蒂斯塔是怎样倒台的.....	314
第 十 九 章	胜利的源泉.....	336
第 二 十 章	1959年：卡斯特罗与南北美洲.....	353

第二十一章	抒情的幻想.....	379
第二十二章	最初的阴影.....	399
第二十三章	卡斯特罗在美国.....	419
第二十四章	农业改革：政治斗争和危机.....	450
第二十五章	自由主义者黯然失色.....	478
第二十六章	剑拔弩张.....	509
第二十七章	资本主义的古巴告终.....	534
第二十八章	美国准备打仗.....	574
第二十九章	社会主义的古巴：I.....	591
第三十章	社会主义的古巴：II.....	628
第三十一章	猪湾之役.....	651
第三十二章	几次危机之间.....	676
第三十三章	导弹危机：I.....	695
第三十四章	导弹危机：II.....	708
第三十五章	导弹危机：III.....	723
第三十六章	空想社会主义者.....	742
第三十七章	“一千万吨收成”及其含义.....	761
第三十八章	新人.....	773
第三十九章	监护人.....	785
第四十章	新朋友和老朋友.....	815
第四十一章	追求自由.....	829
1962年以来古巴大事记.....		847

第一章

菲德尔·卡斯特罗：童年和青年时代

1953年初夏，古美关系史专家波特尔·比拉正坐在哈瓦那的一家酒吧间里，这时候，他过去在哈瓦那大学教过的一个年轻学生走过来对他说，他正在策划攻打古巴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那个以1895年战争中一个黑人司令官名字命名的阴沉沉的建筑物。波特尔·比拉试图劝阻这个谋反者，但是，他不为所动，并且说明他有了武器、志愿人员和热情，以及这次攻打将会给现政权一个精神上的重大打击。^①

这个过去教过的学生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当时他还不满二十七岁，^②是人民党左翼的一个成员，素以精力充沛、富有口才著名。他的性格从那时起就为众所周知了，但是，很少人曾遭到过那样的诽谤，也很少人曾受到过那样的褒扬。所以对他的早期生活和经历得到一些印象是可取的。

^① 波特尔·比拉对作者提供的材料。菲德尔·卡斯特的传记已有数种。最怀善意的是赫伯特·马修斯的《卡斯特罗，一部政治传记》（伦敦，1969年），而最怀敌意的则是他的老友路易斯·孔特·阿奎罗的《菲德尔·卡斯特的两面派》（墨西哥，1960年）和新版的《菲德尔·卡斯特的精神病疗法与政治》（墨西哥，1968年）。久经期待的卡斯特罗自传迄今尚未问世。

^② 卡斯特罗生于1926年8月13日，尽管传说他实际上诞生于晚一年。

卡斯特罗的父亲，安赫尔·卡斯特罗，像许许多多古巴人的父辈一样，是在美西战争期间随同西班牙军队来自西班牙西北部的加利西亚的。他无论在体力上或性格上都是一个坚强的人，什么事都愿意干，在随着西班牙统治的结束和美国人的到来以及独立共和国的产生而出现的社会普遍瓦解之中，正适合于这种人干出一番名堂来。1904年，他在联合果品公司的铁路上工作，要不然就在安蒂利亚附近作计日工，但是尽管如此（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一贯对北美人抱有西班牙人所固有的强烈恶感，他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北美人骗取了西班牙人对古巴起义军所取得的胜利。这就是他的儿子对北方的恶魔抱有西班牙人所固有的同样恶感的一个古怪的、但无疑是真正的根源。安赫尔·卡斯特罗千方百计积蓄了一笔足够置田买地的钱，后来又靠了多少带点投机的办法顺利地扩大了田地。他似乎又因1917年的革命，靠了给联合果品公司照管产业赚到了一笔钱，并以损害公司利益的方法而增加自己的地产。他或许不总是正正派派地工作的，但无论如何也譬如说和卡特林或珀西瓦尔·法夸尔差不多。他把森林开辟成自己的田地，也许有时是在月暗星稀的夜间进行的，也许是靠了偷窃地契。他的儿子承认，安赫尔·卡斯特罗“对他的田地或收入，从来没有缴过税”。他那个只种甘蔗的所谓混合农场，座落在离海二十哩的马亚里城附近的一个叫做比兰的村庄上，村的四野依然是二十世纪未经开垦的处女地；只是由于安蒂利亚铁路以及波士顿厂和普雷斯顿厂这两个联合果品公司的大制糖厂在1901和1904年的相继建立，这个地区

才得到了开发。

安赫尔·卡斯特罗的大庄园马纳卡斯发展到了将近一万噠，并且支配着周围的地区。^① 根据他女儿胡安娜的说法，这个庄园雇用了五百名工人。虽然这个农场生产各种作物，但它的主要活动是种植甘蔗，卖给往南十哩的米兰德制糖厂。在五十年代，它的限额是甘蔗每年一万八千吨左右。

安赫尔·卡斯特罗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娶一个小学教师——古巴的小学教师大多是妇女——生了一儿一女（佩德罗·埃米略和利迪亚；前者成为革命党的政客，后者嫁给了一个军官）。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糖业大繁荣，使得很多居住在比那尔德里奥和马坦萨斯的人都迁到古巴东部砍伐掉的森林和新建立的蔗糖王国中去找工作。其中有一位名叫利纳·鲁斯·冈萨雷斯的比那尔德里奥姑娘，曾一度在安赫尔家里作厨娘，后来（在原配还在世的时候）给安赫尔·卡斯特罗生了另外五个孩子：拉蒙、菲德尔、胡安娜、埃马和劳尔。但是，看来安赫尔·卡斯特罗从来不曾安于一个妇人而没有外遇过。

人一旦著名起来，他的早期生活就往往蒙上了一层神秘之幕；而卡斯特罗的早期生活，由于他后来同自己过去的教养和父母的社交圈一刀两断，所以比通常情况还更模糊。当然，从某些方面来看，他的父母并没有一个社

① 李·洛克伍德：《卡斯特罗的古巴：古巴的菲德尔》（纽约，1967）第25页叙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在1965年5月关于他们的父亲到底有多少卡瓦耶里亚（以后简称卡）的土地的争论原委。正文中所举的数字只是一个约略的估计。

交圈：他们都是暴发户，都是各有不同的野心和贪欲，见异思迁的。父亲是一个来自西班牙的移民和白手起家的富人。母亲是一个来自烟草之乡的国内移民。他俩现在都住在奥连特省这个有钱可赚但是犷悍粗野的产糖区域。这里的寥寥几处村庄只不过是一些不成样子的简陋小屋的聚落罢了，既没有传统，也没有教堂，各式各样的土匪一直到五十年代还没有绝迹。这里支配一切的机构就是联合果品公司的两个制糖厂，连同它们的专用铁路、它们的码头和它们那看上去对土地贪得无厌的要求。

要描写一下卡斯特罗一家所过的令人兴奋的童年生活倒是不难——钓鱼、打猎，猎狗前驰后拥。家里的气氛显然是粗犷的：安赫尔沉默寡言，暴戾恣睢，埋头苦干，广有钱财，很象葛朗台老头，^①虽则在钱财方面比较慷慨些；也很象小说家西里洛·比拉韦尔德^②的父亲，此人被描写为“既没有时间也根本不想同他的儿子们谈心”；^③不讲究舒适；至于为救助附近的贫困和污秽情形，则是一毛不拔，甚至照悠久传统所应给予的一点点帮助，也不肯施舍。卡斯特的母亲素性贪财好货；因此，在1957年她的丈夫去世之后，在她去墨西哥、正值她的儿子在山区打游击战的时候，她向卡斯特罗的一批支持者抱怨说她的甘蔗田被烧掉了，并且为了除草，花了她二万六千美元。

①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1799—1850)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中女主角的父亲，以吝啬见称。——译者

② 西里洛·比拉韦尔德(1812—1894)，古巴作家，著有小说《塞西利亚·巴尔德斯》。——译者

③ 见《塞西利亚·巴尔德斯》1941年版的传记注释。

她要求他们为此作出安排，不要再碰她的庄稼（当时，她解释说，巴蒂斯塔的军队曾上她家向她要咖啡喝），但也无济于事。

拉蒙、菲德尔和劳尔先后进了拉萨尔学院，后来又进了圣地亚哥的多洛雷斯学院，最后进了哈瓦那著名的耶稣会学校贝伦学院——这正是二十年前埃迪·奇瓦斯走的那条教育途径。卡斯特罗之所以对立宪制度、官僚制度以及任何一种正式手续都缺乏兴趣，也许可以溯源到他父亲对无论财产或私人关系方面任何法律形式所抱的敌视态度。

耶稣会的教育给了卡斯特罗以深刻的印象。他在学校里以辩论家和运动员而知名，也以记忆力特别强而为人所共知。在1943—1944年，他以古巴最优秀的学校全能运动员而获奖。接下去神话又来了：“在童年和青年时代，他心目中就有很多英雄人物……列宁、希特勒、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墨索里尼……庇隆……他能背诵何塞·安东尼奥的演讲……通晓《我的奋斗》，也通晓列宁的《怎么办？》。”由于有这样一段往事，所以从卡斯特罗的演讲的内容中可以清楚看出，何塞·安东尼奥就是他的一种鼓舞力量。“我第一次听到他，是在他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向他要二十美元并祝贺他在1940年竞选胜利的时候。国务院的回信被张贴在大门上，回信中一面致谢，一面表示抱歉，不能汇寄分文。”他的一位同学评论说：“耶稣会教士把他训练成为正义的旗手。”学校里的种种传说是不容易分清皂白的。一位自称曾在拉萨尔学院教过卡斯特罗的法籍神甫让·玛丽·拉莫斯

说，卡斯特罗在课堂上虽然很用功，但是在课堂外面却是“令人不能容忍的”，身边总有一伙追随者，最后把他转到耶稣会教士那里，圣玛利亚会教士认为耶稣会教士对他更有帮助。但是，显而易见，他并不是一个坚决的叛逆者，他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不少传统教育。他的兄弟劳尔在这方面也许是一个可靠的见证人：“他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在运动方面，在学业方面。他无一日不进行斗争。他性烈如火。最有势力、最强壮的人都不放在他眼里，如果他被打败了，第二天再打。他绝不罢休。”至少可以清楚看出，当时卡斯特罗是坚强的，雄心勃勃，博览群书。所以，在他后来的革命演讲中，总是引经据典，讽喻百出。看上去，就他的家庭而论，卡斯特罗是具有叛逆性的。在1940年十三岁的时候，他试图组织蔗糖工人进行反抗他父亲的罢工；在他十八岁的时候，有过多次数争吵，卡斯特罗当面骂他父亲是“滥用靠了骗人的诺言从人民那里抢来权力的家伙”。^①即使如此，他还是一直指望并接受了他父亲的经济上的接济。他也许有几分学了他哥哥佩德罗·埃米略的样，他哥哥在1940年同他父亲决裂，并在圣地亚哥的电台上骂他父亲是个贼；也许有几分学了一个叫萨拉萨尔的西班牙人的样，萨拉萨尔是马亚里市一个受雇的家庭教师和西班牙内战的一个幸存者。佩德罗·埃米略是五十年代奥连特省革命党的一个小政客。

^① 但是，胡安娜·卡斯特罗（《生活》周刊，1964年8月28日）说，卡斯特罗从来没有关心过他们父亲农场上的农民，据说他甚至曾批评他父亲对这些农民过分宽厚。这不是很可靠的材料。

所以，卡斯特罗的早期想法和野心多半是在奥连特省，古巴这个最粗犷的地方的环境中形成的。在这个地方，往往枪杆子就是法律，在这个地方，美国影响最强大，发挥得也最为残酷无情，在这个地方，医生、教师、牙科医生以及一切社会上的专业人员，按照人口的比例，都为数极少。关于马坦萨斯或比那尔德里奥这些蔗糖和烟草的老产区，卡斯特罗所能了解的并不多（除非通过他的母亲）。对于生活在他周围的人们所处的奴隶状态的回忆也不可能占主导地位。很多西班牙的而不是道地古巴的传统，要不是通过他父亲，也许就是通过那个西班牙人萨拉萨尔或耶稣会的教士才传给他的。因此当他在监狱里坐观 1954 年大选的成败时，他说：“在这个好位子上看斗牛是多么幸运啊。”^①当然，在 1898 年以后，古巴就根本没有斗牛了。

同时，他那不寻常的家庭背景的确是不平静，不安全的。那个巴尔扎克式的父亲，象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欧洲人所难以理解的、出诸拉美小说的许多人物那样；荒凉的家庭种植园；他家为了送蔗糖而不得不同那家美国资本的中型制糖厂米兰德制糖厂保持了联系，这家制糖厂是在 1917 年大繁荣时期创办起来的，效率很高，出产率也高，^②而产量因“辖地”数目的增加而日益提高（到 1958 年收有“辖地”三百七十四处，而在 1937 年只有七十三处）。卡斯特罗的父亲不但曾为西班牙人（反对马蒂、马

① 菲德尔·卡斯特罗：《驻防军的二十六封信》（路易斯·孔特·阿圭罗编），第 32 页。

② 1937 年它的出产率是 14.54%，高于奥连特省的其他任何地方。

塞奥和戈麦斯)作战,还曾为联合果品公司工作的这种事实;耶稣会学校所珍视他的那种才思敏捷以及卡斯特罗家族的内部争执,所有这些影响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卡斯特罗现在开始表现出来的那种多变而强烈的性格。

1945年10月,卡斯特罗坐他父亲给他的汽车去哈瓦那大学。他似乎一开始就抱有不惜一切代价、一劳永逸地战胜最强大对手的愿望。大学开学不到一个星期,波特尔·比拉教授,也就是在1953年7月遇到卡斯特罗的那位教授,看到一个看门的人上来打招呼说:“一个学生都没有了,您知道吗?都看决斗去了——大学生联合会的主席受到了大学一年级学生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挑战。”决斗方式已经商定了:卡斯特罗骑着脚踏车拼命撞进一堵砖墙,借以向观众证明他拥有别人所没有的意志力。

卡斯特罗决定读法律系,但他并不比选择这个系的很多英国学生对于它的出路有更多的理解。1961年,他说,“我问自己为什么要读法律。我不知道。有人说‘一个人能说会道,就应该去作律师’,我把我所以读法律多少归因于这些人的话。因为我有同人争辩和讨论的习惯,我相信我有资格作律师。”^①但是,他这个大学生,是从来不去听课,非到考试临头决不翻开书本的,“我是多么常常庆幸,我没有被迫去读其他专业。”^②

事实上,卡斯特罗一进大学就把时间都用在政治活

① 《革命报》,1961年4月10日。

② 同上,1964年3月14日。

劲上。头两年，他被选为法律系的“班代表”——这至少有几分是因为他在中学擅长体育的缘故。在他的朋友中，阿尔弗雷多·格瓦拉和莱昂内尔·索托早已是共青团的团员了，格瓦拉在1948年就是社会科学系学生会的主席兼大学生联合会的秘书，索托是哲学和文学系学生会的主席。卡斯特罗所以在大学参加政治活动，正如他在中学活跃于体育方面一样，因为这是“他最喜爱的嗜好和着迷的事情。这是走向权势的梯阶……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稀奇或特别的地方。哈瓦那大学的政治气氛是那么紧张和普遍，以致很多人都被卷了进去。”^①这样，从1946年起，卡斯特罗就算是古巴人中的千年至福说的少数派，满口豪壮口号，一心想念过去英雄人物，一个政治上的积极的少数派。卡斯特罗作为1946年9月法律系的一个代表，支持了奇瓦斯，并在1947年1月批评了格劳的改选主张，从而第一次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出现。在这次演讲中，据说卡斯特罗谈到了那些面对着（马查多的）独裁的学生的“尖儿脑儿”。从大学生活的第二学期起，卡斯特罗也象其他大多数学生领袖一样，至少同两个左右大学政治活动并威胁国家事务的革命组织取得了联系。

所以他的大学生活已经是很不寻常了，而且是越来越不寻常。卡斯特罗自己后来相当坦率地谈到那个时期：

哈瓦那大学的政治空气已经受到国内动乱的污染。我的冲动和求胜心激励了我的斗争性。我的直爽的性格使我很快

① 弗鲁克托索·佩雷斯的评论。

同社会环境，贪污腐败的当局，腐化堕落的情形以及支配大学气氛的、为帮会所把持的制度发生了冲突，腐败政客的压力集团使帮会威胁我，以致禁止我进哈瓦那大学的校门。这是一个需要作出决定的关键时刻。这场冲突像旋风一般袭击我的个性。我孤零零地站在沙滩上，面对大海，研究形势。如果不考虑到个人的安危，人身的冒险，而返回哈瓦那大学，那无异是一种闻所未闻的大胆行动。但是不回去，又等于是对威胁让步，对强暴低头，等于放弃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我决定回去，于是往回走……手里拿着武器……当然，我自己并没有充分准备去正确理解残害祖国的深重危机的根源所在。这就造成了我的反抗是集中在逞匹夫之勇的思想上。^①

从字里行间可以清楚地看出，卡斯特罗一定是受到了威胁，也许一上来他就有违初衷地参加了特殊的帮会活动，而且在斗争中又非始料所及地占了优势。也应该记得，这些“行动团体”虽然已经堕落为帮会活动，但是甚至在1948年也还没有完全失却理想主义和政治浪漫主义。

卡斯特罗与其多少有所牵连的两个团体，一个是罗兰多·马斯费雷尔的革命社会主义运动，一个是由遇刺以前的马里亚瑙的警察头子埃米略·特罗领导的革命起义同盟。作为学生推翻马查多的特征的革命暴力，从来没有丧失过它的基本的浪漫主义魅力。这位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未来领袖，在格劳统治下的机关枪和大卡车时代里，在政治活动中尝到了血的滋味，不管他个人究竟

^① 同格洛里亚·盖坦·德巴伦西亚的谈话，《自由美洲报》（波哥大），1961年5月22—28日。

起了什么作用，显而易见的是，他对于古巴的政治制度，其虚弱性，其对于暴力的敏感性及其腐败无能等情形，却得到了不少的领会。另一方面，卡斯特罗虽然利用了所有的“行动团体”，但是，既未能当选为法律系学生会主席，也未能当选为大学生联合会主席。

在哈瓦那的学生政治活动中，选举往往是通过拳头，枪炮和绑架来解决的。人们认为有一些枪击事件是卡斯特罗干的。因此，在1946年12月，哈瓦那(第一)中学学生联合会主席、革命起义同盟的成员莱昂内尔·戈麦斯在里翁达街中弹负伤。这次袭击显然是大学生联合会的主席马诺洛·卡斯特罗策动的，因为戈麦斯曾经吹嘘说他就要进哈瓦那大学，要把哈瓦那大学的权力接过来。这时菲德尔·卡斯特罗由于渴望取得马诺洛·卡斯特罗的信任，以使他自己能实现在大学里的野心，(据另一个受伤的学生说，)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其他几个人显然要对这次枪击事件负责。

当菲德尔·卡斯特罗还是马诺洛·卡斯特罗的朋友的时候，他也在1947年夏参加了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和另一些“行动团体”所组织的对多米尼加共和国未遂的入侵。卡斯特罗担任指挥一个多米尼加流亡者小组；但是，因为他是这次远征中革命起义同盟的唯一成员，所以他处于一个微妙的地位。当这次出征宣告终止时，参预其事的人大都被捕。卡斯特罗是漏网者之一；他带了一挺阿根廷手提机关枪和一支手枪泅渡素以鲨鱼经常出没而知名的尼佩湾，安全地到达了他父亲的农场。^①

可是，到了这时，事情已经明摆着，马诺洛·卡斯特

罗对于菲德尔·卡斯特罗谋求大学的政治领导权是不会有有多大帮助了，所以他就参加了马诺洛·卡斯特的对立派革命起义同盟，这个“行动团体”直到埃米略·特罗在马里亚瑙的公开武斗中死于马诺洛·卡斯特的朋友萨拉巴里亚斯之手为止，一直是由埃米略·特罗领导的。同时，通过同继马诺洛·卡斯特罗之后任大学生联合会主席的恩里克·奥瓦雷斯的友谊的关系，菲德尔·卡斯特罗顺利地指定为大学法律事务特别委员会主席。

同年秋季，卡斯特罗(在奇瓦斯的资助下)率同一批学生向曼萨尼略作了一次轻率的远征，去把1898年塞斯佩德斯用以敲过警报的那口钟带回给哈瓦那的学生，作为一次新的起义的象征——那口钟的主人是该城1898年幸存下来的一些老兵，他们不肯把它送给哈瓦那城。1948年2月12日，为抗议侵犯大学自治权，卡斯特罗又卷入了一次在校外同警察发生的著名冲突。十天之后，在1948年2月22日，国家体育部长，不久前的大学生联合会主席，“象一张明信片一样漂亮却是一个妄想狂”的马诺洛·卡斯特罗，这位大学的真正暴君，教育部长阿莱曼和革命党其他几个领袖的至友，被人诱出电影院(他是这家电影院的合伙老板)，中弹毙命。菲德尔·卡斯特罗被指控与这个暗杀事件有关。他在飞机场被捕，经过一次审讯，他的护照被吊销了。看来也许菲德尔·卡斯特罗正如他所供述的那样，并没有参加这一暗杀行动，

① 泗渡鲨鱼出没之处一节得到了多米尼加司令胡安·博什的证实，后者曾加以劝阻(胡安·博什的备忘录)。

也没有为转移注意力而在邻街开枪，而只不过出席了革命起义同盟同意采取暗杀行动的那次会议罢了。但证据不足。革命起义同盟是一个专搞肮脏把戏的“行动团体”——每一个暗杀者都有一个动人的绰号，诸如老兄弟、亮眼睛、跛子等等——而一个卡斯特罗杀害另一个卡斯特的这个主意，一定会投合当时的头头胡斯托·弗恩特斯这个黑人帮会分子和兼职学生的心意。这不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愿意在他的演讲中谈到的一件事。（1949年胡斯托·弗恩特斯自然是因为马诺洛·卡斯特的被暗杀而遭到报复的。）

这确是迄今的政治帮会的武斗中最耸人听闻的一幕。（作为嫌疑犯的非德尔·卡斯特罗在3月间对法官说，他相信马诺洛·卡斯特罗有几个朋友打算把他干掉。）如果菲德尔·卡斯特罗曾经卷入这件事，那倒不是不符合他的为人的，衡情度理，若说马诺洛·卡斯特罗多少有点咎由自取，也不为不当。卡斯特罗后来对他这一阶段的生活作了如下分析：

毫无经验但充满青年叛逆性，〔他曾经〕同马里奥·萨拉巴里亚的势力〔作斗争〕……终于发展成为革命党运动的这种弊病，是渊源于巴蒂斯塔的充满了种种弊端和不公的〔第一个〕十一年期间所播下的怨愤和仇恨的。亲眼看到同志们被杀害的人，自然要为他们报仇雪恨，而一个不能主持正义的政府当然是可以报仇的。有些青年由于理所当然的焦虑和英雄时代的传说而心烦意乱，想在一个不可能成功的时刻进行一场尚未完成的革命，其罪不在青年。那些成为幻

想的牺牲品，作为帮会分子而丧命的青年，在今天有许多都是英雄。

在另一个场合，他评论说，“在腰悬手枪的至恶者当道时，自己就必须拿起手枪，以便为至善者进行斗争。”

不管卡斯特罗在马诺洛·卡斯特罗的凶杀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一个月之后，他就跟一件更加耸人听闻的事件——即现在通称为著名的波哥大事件——有了牵连。这一次，谣言和恐怖重又捕风捉影地靠悲剧而渲染出来。这一次，那些以看到自己为一个单线集中指挥的少数人的阴谋所威胁而自慰的人们，听由菲德尔·卡斯特罗第一次荒谬绝伦地装扮成美洲的刺客，装扮成私人企业的职业颠覆活动者而出场了。

1948年4月间，为将原来的美洲国家的泛美联盟改组成为一个更加紧密联合的组织即美洲国家组织，业经商定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召开一次泛美会议。马歇尔将军将代表美国到会，所有其他美洲国家都将派外交部长出席。

古巴和阿根廷的学生，连同拉美其他各地的少数学生，计划在这次大会期间举行一次抗议运动。包括古巴学生代表团在内的很多学生的旅费，都是由阿根廷独裁者庇隆支付的，因为庇隆急想在拉丁美洲给美国制造麻烦。庇隆还想给予英帝国主义一个打击，以迫使英国把福克兰群岛归还给他。在所邀请的古巴人中，有大学生联合会主席恩里克·奥瓦雷斯和秘书阿尔弗雷多·格瓦拉（哈瓦那大学的共产党领袖），连同代表哈瓦那大学法律系的卡斯特罗和每年都在学校注册却从来不大想读书、

也跟卡斯特罗同是革命起义同盟盟员的古巴籍美国人拉斐尔·德尔皮诺。他们的在波哥大会合是为了筹备拟于秋季举行的一个新的美洲学生组织的正式成立大会，这一组织是卡斯特罗所发生兴趣的。^①就学生的这些计划说来，整个南美的共产党人和庇隆主义者是通力合作的。

卡斯特罗和德尔皮诺在1948年3月29日到达波哥大，随身带有各式各样文件，其中包括他们顺路访问过的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党魁罗慕洛·贝坦科尔特的一封信。在下一个星期中，他们在波哥大和其他一些学生领袖进行了商谈，4月3日，泛美会议开幕，于是这两个集团——一个是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已有根基的旧世界，一个是虽无地位却雄心勃勃的学生的新世界——彼此相向摆动，而且第一次发生了冲突，虽则是轻轻地，仿佛象没有调准的钟摆一样。在移民戏院举行的公开仪式中，出席的有哥伦比亚社会名流和政府显要，数以千计攻击美国殖民主义的传单从楼座上丢下来。这些传单很多都是在哈瓦那印制的，有些是卡斯特罗和德尔皮诺丢下去的。经过审讯之后，勒令这两个学生在两天之后去警察局投案。届时他们没有照办，于是搜查了他们的旅馆房间，查获了更多的所谓共产党传单。4月6日，两人被抓到警察总局，命令他们停止“敌对行动”。

4月9日，政治家的世界和学生的世界再一次发生

^① “当他在二年级我们还同他保持友好关系的时候……我们问他为什么要担任法律系主任……他总是说快不担任了，还说他的真正抱负不仅仅在于担任大学生联合会的主席，而是要组织一个拉美学生的联合会，使其成为南美一个非常得力的政治工具。（费尔南多·弗莱雷的备忘录。）”

冲突，而且更为厉害。下午一点二十分前后，深受爱戴的、不妨称之为哥伦比亚的奇瓦斯的自由党鼓动家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在示威游行过程中被一个神经病者胡安·罗亚·谢拉所杀害。^①盖坦一直是哥伦比亚社会改革的希望所寄的伟大人物。他的演说曾经唤起哥伦比亚广大群众的猛醒，即使他按照欧洲传统不是一个纯粹民主主义者（“比选举票更可取的道路有的是哪”，这就是他的名言之一），他却是一个具有豁达胸襟的人。盖坦之死使波哥大陷于一片愤怒和恐惧之中。罗亚·谢拉被上了私刑。于是，队伍组织了起来，暴动开始了，到了傍晚，波哥大已经失去控制。商店遭到洗劫和焚烧，警察派出所被炸，枪击和战斗不一而足。警方将武器交给急想推翻政府的暴动者。共产党人企图混水摸鱼，但告失败。暴行持续了好几天，等于是一场失去控制又没有方向的大地震，与1909年巴塞罗那的悲惨的一周相似，虽则波哥大被杀害的估计达三千人之多，远超过西班牙所发生的事态。后来，正如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所做的那样，找到了替罪羊。马歇尔将军和出席泛美会议的大多数政治家一致归罪于共产党。当时正在波哥大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波利这个反共老手^②后来回忆说：“我们得到情报说，那里有一个古巴人，在我们看来，是一个不成为真正威胁

① 罗亚·谢拉是唯一的凶手这一点，在伦敦警察厅厅长诺曼·史密斯爵士的一份报告中得到承认，史密斯爵士说，罗亚的动机是由于盖坦一再拒绝接待他而引起的。

② 威廉·波利（生于1896年），古巴航空公司的创办人，商人，驻秘鲁和巴西大使；1949年接办哈瓦那电车公司，1950—1951年，创办哈瓦那的现代公共汽车公司。

的非常年轻的人。”再后来，他又说，在盖坦刚遇害后，他听到了收音机上的一个声音：“这就是古巴的非德尔·卡斯特罗。这是一次共产党搞的革命。总统已经被杀身死，哥伦比亚的一切军事设施现在都在我们手里，海军已经向我们投降，革命已经胜利。”^① 这个报告肯定有不少是全凭想象的。但是，哥伦比亚的警察头子阿尔维托·尼诺后来也声称，卡斯特罗和德尔皮诺是派来组织暴动的共产党特务，另一些人则声称卡斯特罗在这些天里杀死了三十二个人。住在克拉里奇旅馆的一位客人曾经听到卡斯特罗和德尔皮诺在吹嘘他们的胜利。据说卡斯特罗甚至曾经给哥伦比亚侦探看过一件护照，证明他的身份是“苏联派驻南美第三战线的一级特派员”。^② 另一个也许比较可靠的报告，描述了这个古巴人在4月9日“携带着大量武器”来到了他们的旅馆，“在那里勾留了好多个小时，并在电话上用英语和各式各样的人交谈。”^③ 不错，卡斯特罗确是卷入了这场暴动，但是究竟他参加战斗到怎样的程度却不得而知。如果认为卡斯特罗是这次暴动的主使者，那显然是不正确的，这不是他经常喋喋不休地教导世人的一门科目。大约就在盖坦遇害的时刻，卡斯特罗原来和他有一个约会，但他显然是想就租赁戏院开会一事征求他的意见。4月13日，卡斯特罗和拉斐尔·

①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小组委员会证词听取会记录：《共产主义通过加勒比海对美国的威胁》（华盛顿，1960—1963年）（以下简称《共产主义的威胁》），第724—725页。

② 阿尔维托·尼诺：《4月9日的经过和秘密》，第278页。

③ 伦敦警察厅的诺曼·史密斯爵士的报告，据《时代报》（波哥大），1961年4月12日的报道。

德尔皮诺由阿根廷大使馆的一位秘书护送到古巴大使馆，古巴大使吉列尔莫·贝尔特博士，这个 ABC 党的老领导人给予他们以避难权，并使他们得以搭乘一架货机飞返哈瓦那。^①

这些大事自然给卡斯特罗以深刻印象：群众、暴力、破坏、盖坦的辩才和他那富有吸引力的人格——卡斯特罗在 4 月 9 日以前见过他——都起了它们的作用。^② 他后来评论说，哥伦比亚的群众所以未能夺得政权，是“因为他们被伪善的领导人出卖了”。^③ 毫无疑问，他具有象拿破仑看到瑞士防卫军在土伊勒利宫战斗到最后一人时那样的感觉，认为只要领导得当，这些“群众”是可以获胜的。

从波哥大回来之后，卡斯特罗暂时恢复了平常的生活。他在刚满二十二岁的时候，同与他同年的米尔塔结婚，她是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大学法律系的一位朋友、革命起义同盟盟员拉斐尔·迪亚斯·巴拉特的妹妹。迪亚

① 作者没有看到他的敌手所说的任何材料，即卡斯特罗的性命是靠了俄国大使的干涉而获得保全的。还有其他一些替罪羊。例如有这样一种说法，据说罗慕洛·贝坦科尔特领导 4 月 9 日的一项反哥伦比亚的阴谋……而这项阴谋是在哈瓦那城筹划的。参看《世纪报》（波哥大，1948 年 7 月 2 日），另见《共产主义的威胁》，第 278 页。哥伦比亚的一个侦探声称，在 9 日早晨，曾经看到卡斯特罗和罗亚·谢拉在一起（《共和国报》，波哥大，1961 年 4 月 10 日）。另参看弗朗西斯科·桑迪诺·席尔瓦：《苏联在美洲的渗透和 4 月 9 日事件》（《新时代》合订本，波哥大，1949 年）。

② “我有机会听到盖坦的讲话。他的声音，他的感人至深的人品，和他所领导的朝气蓬勃的民众运动，象哥伦比亚人民的救星一样地闪闪发光。因而遭杀害……”和盖坦的女儿的会见》，《自由美洲报》，1961 年 5 月 22 日。

③ 《和盖坦的女儿的会见》，《自由美洲报》，1961 年 5 月 22 日。

斯·巴拉特家不同意这个婚约，但婚礼终于在1948年10月10日、普里奥总统就职的那一天举行了。此后直至1952年，卡斯特罗一直是奇瓦斯的人民党的党员，他是在1947年正式参加这个党的。的确，他曾经参加该党于1947年5月在哈瓦那举行的成立大会。他怀着莫大的热情追随着奇瓦斯，把他看作是未来的主人，似乎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可能具有的那一点点热情，都抛到九霄云外了；这种转变也许是他大学的两个共产党朋友，索托和阿尔弗雷多·格瓦拉远在莫斯科时所助成的。在哈瓦那大学发生了另一次骚扰，终于导致了对大学警务处的费尔南德斯·卡夫拉尔军曹的一次武装袭击^①和1949年对卡斯特罗的老对头马斯费雷尔的最后一击，并有一人毙命。^②事后，卡斯特罗也脱离了革命起义同盟这个“行动团体”。与此同时，革命起义同盟的领导人胡斯托·弗恩特斯在离开他自己和卡斯特罗每天都有广播节目的科科无线电台时遇害了。菲德尔·卡斯特罗那一天没有去电台，所以得免于难。在这段期间内，在结婚的头两年内，他努力攻读，于1950年以法学博士学位毕业于哈瓦那大学。

这时还有另一段有趣的插话。巴蒂斯塔在1948年

^① 参看《今日报》，1948年7月8日和《世界报》，1948年7月7日。费尔南德斯·卡夫拉尔是萨拉巴里亚的追随者之一，是被包括何塞·德赫苏斯·辛豪梅在内的革命起义同盟的成员击毙的，何塞·德赫苏斯·辛豪梅自称当时他正在教育部长的家里。

^② 卡斯特罗是和吉特拉斯革命行动组织及革命起义同盟的幸存的成员诸如“老兄弟”（吉列尔莫·加西亚·列斯特拉）、拉斐尔·德尔皮诺（他在波哥大时的同谋者）、何塞·德赫苏斯·辛豪梅等人一同被控告的。

大选后回到古巴，他的一位朋友莱奥波尔多·皮奥·埃利萨尔德听说卡斯特罗是一个很有前途、敢作敢为的青年，认为可以把他吸收到巴蒂斯塔新成立的统一行动党里来。根据皮奥·埃利萨尔德的说法，卡斯特罗答复说，他本人对巴蒂斯塔并无恶感，而且他的父亲也认识他，并对他有感恩怀惠之情，但是为了“子孙后代的缘故”，他不能同这位前总统发生政治上的联系。如果巴蒂斯塔是抱着武装夺取政权的目的回来的，那么他可以指望得到他的帮助。当时皮奥·埃利萨尔德却一本正经地对卡斯特罗说，巴蒂斯塔是希望通过选举重掌政权的。

这段离奇的故事是如此的丝丝入扣，以致很难使人不信：卡斯特罗显然是相信武装夺取政权而不相信竞选运动的。皮奥·埃利萨尔德告诉了巴蒂斯塔，几个月之后，卡斯特的妻兄、已经脱离了革命起义同盟而参加了巴蒂斯塔的党的拉斐尔·迪亚斯·巴拉特，说服了卡斯特罗去巴蒂斯塔的庄园库基内访问他。两个人在书房里谈论“文学和历史方面的题目，而主人竟没有给〔卡斯特罗〕开始谈论政治的机会”。^①

后来，卡斯特罗在谈到他这段时期的生活时，也许肯定忽略了下述的解释是否言之成理：

在我取得学位时，我还是一个政治上的文盲。我在大学里一

^① 皮奥·埃利萨尔德：《古巴的悲剧》；巴蒂斯塔本人对这次会晤作了一段谨慎的叙述，说他因为知道卡斯特的“帮会活动的经历”，所以避免同他谈论政治问题。（巴蒂斯塔：《复信》，第325页）巴蒂斯塔对苏亚雷斯·努涅斯（《莫大的罪过》，第12页）说，“我曾关照迪亚斯·巴拉特不要把菲德尔·卡斯特罗带到我家里来，因为他是一个刺客。”

接触中产阶级的经济学，就使我看出其中一些矛盾来，因此，我得了解一些革命的见解……后来自然〔有〕大学的政治活动。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即指他自己或者也许是指他自己和他的亲密朋友们〕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宣言》，接触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泾渭分明的阶段。自然，我们在大学中所作的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筹划的，的确确实不是。在我们离开大学时，我们，特别是我自己，已经深深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我并不要说我已经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可能我有二百万个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充其量我也只能说，如果我没有所有这些偏见，我就不会有条件对革命作出象我现在所能作出的贡献了……①

不久之后，在会见一位美国新闻记者时，卡斯特罗说，他“对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最初的一些疑问，是发生在我的学生时代……由生产过剩以及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所揭示出来的〔这些〕问题……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②卡斯特罗解释说，在这段时期，他已经把《资本论》读到了第370页，还“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一些著作。但是就《资本论》的大多数版本来说，读到第370页并不算很多，至于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使我神往心迷，并唤起了我的好奇心”则未免令人感到意外。③

① 卡斯特罗的演讲，1961年12月2日（《革命文献》，1961年，第46期，第38页）。

② 洛克伍德书，第138页。（这是在1965年。）

③ 洛克伍德书，第139页。

上述一切，确实相当详细地说明了卡斯特罗在大学时只不过受到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有限的、相当肤浅的影响。他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也许只不过是说他第一次听到了社会分成为两个敌对阶级这种理论。虽则《资本论》他只读到了第370页，可是梯也尔和饶勒斯的法国革命史以及马基雅弗利和马拉巴特的《武装政变术》，他似乎读得更多些。后来，他急想使人们认为，他早就是一个优秀的革命家了。应该指出，卡斯特罗的几个大学同学把他看作是“一个毫无原则、热中权势的人，他觉得哪一个团体对他的政治前途有帮助，就同那一个团体去共祸福”，^①就在上述1961年12月著名的自我表白的演讲发表之前不久，卡斯特罗曾解释说，“在我们毫无行政经验的情况下，我们从一部革命著作，从……马克思或……列宁所得到的知识，是不可能一样的……我们从前是为了一般兴趣，为了好奇而阅读它们的〔指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②但是，不妨再进一步说明一下：他的大学和童年经历的顶点，不管为了什么原因——为了延续学生的诛戮暴君、革命和造反的传统也好，为了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支持波哥大的激昂慷慨的群众也好，为了向他父亲挑衅或对知识系统化的追求也好——似乎已经使他走上后来所提到的“以革命为职业之路”。“我们为什么要作革命家？”他在1961年夸张其词地反问道，并答

① 引自一个法律系同学费尔南多·弗莱雷的备忘录。

② 在革命指导工作负责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革命报》，1961年11月11日，第8版。

复说，首先是为了“作为革命家”的这个职业^①和或许是为革命而革命，并非为了什么特殊的革命。

总之，此后他的生活似乎就一直全神贯注于政治了。他几乎一点都没有涉足于法律生涯。虽然他曾经在一个叫作阿斯皮亚苏—卡斯特罗—雷森德的法律事务所里工作过，但是他的客户寥寥无几，而且大多是贫苦人。只办理过一个引起了公众注意的案子：在一次为抗议公共汽车提高票价而召开的学生大会上，有一个警官（后来是巴蒂斯塔的警察头子）萨拉斯·卡尼萨雷斯殴打了一个青年工人，后来因伤致死。卡斯特罗自愿充当原告。当时他似乎手头很紧：据他后来的回忆，他的儿子常常缺少牛奶，电灯公司切断了他的电线，他找不到一套公寓，他往往不是欠杂货铺的债，就是欠肉铺的债。他渴望当国会议员，但是，他原来的历史老师，波特尔·比拉因为他同人民党的左翼有联系，不肯支持他。作为人民党的一个积极成员，他在1950年对普里奥的别墅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袭击，抢走了一些机密照片，后来刊登在《警觉报》上。在1952年竞选运动中，卡斯特罗在《警觉报》上明确地揭发了他在政治帮会中的老朋友之后，便出面替奇瓦斯的老朋友莱昂纳多·费尔南德斯·桑切斯表达了热切的愿望，后来他在《警觉报》编辑、黑白混血种的巴斯孔塞洛斯的支持下，自己被提名为哈瓦那市某区人民党的下议员候选人。后来他不完全令人信服地解释说，虽然他一直想利用议会……

^① 《革命文献》，1961年12月2日。

作为一个起点，从而使我可以开创一个革命的讲坛……我并不认为我的纲领可以通过合法的、议会的途径而得到实现……我早已认为我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一旦进入议会，我就会背弃党的纪律，提出一份纲领，而这份纲领实际上将把后来我们的蒙卡达纲领所包含的和〔革命后〕变成法律的那些措施都一并包括在内。^①

他还补充说（但这是在1965年），为了获得政权，他将需要获得一部分军队的支持。

这时，卡斯特罗的文章常常出现在《警觉报》上，该报编辑巴斯孔塞洛斯，尽管他本人过去来历不明，^②却可以说是卡斯特罗的师傅之一。1951年6月，我们听到了他对大庄园主的攻击和为“工人和古巴农民谋求公平待遇”所提出的要求；1950年11月，发表了为波多黎各独立提出的要求和“古巴学生团结起来反对美国的……暴君”的声明。在巴蒂斯塔政变前一个星期，卡斯特罗指控普里奥每月以一万八千美元分配给若干“行动团体”，其中至少有一个是他本人过去曾经参加的，但现在又加以如下的抨击：“神秘性和过去的斗争使〔这些团体〕得以利用宣传机构……青年人为假英雄主义和革命概念所诱惑

① 洛克伍德书，第140页。

② 他原是马查多的反对者，后来又被说服归附马查多，担任一名外交官，并充当政府刺探在欧洲的古巴流亡者的密探〔参看路易斯·孔特·阿圭罗：《爱德华多·奇瓦斯》（墨西哥，1955年），第343—344页〕。他同巴蒂斯塔也有过类似的关系。

……政权变质了，所有那些组织迟早都要丧失……它们的意识形态上的概念……但是恐怖和死亡的工具没有大量的财政手段是无法维持的。”卡斯特罗在昆塔斯法庭的演讲，对普里奥总统资助“行动团体”作了详细的揭发，听来抑扬顿挫，滔滔不绝，攻击得体无完肤，显然出于一位口齿极其伶俐的爱国者之口。另一方面，看来似乎他真正攻击的是科洛拉多和马斯费雷尔所领导的团体，而不是攻击革命起义同盟。

他正是以这种心情来迎接3月10日的松松旦巴之变的。那一天，他在哈瓦那大学，帮同把武器分发给学生以及同他们在一起的其他人等。几天后，他散发了一项名为“萨尔帕索”^①的宣言，这项宣言在以有力的言辞向巴蒂斯塔挑战的同时，作为卡斯特的第一次自行发表的政治声明是意义深长的。^②宣言以“是战斗的时候了，生活在牢狱里无异是忍辱偷生！”这一战斗号召作结束。宣言号召古巴人恢复1940年的宪法。^③他自己对这个训谕的反应是首先写了一封信给巴蒂斯塔，警告巴蒂斯塔要承担他的行动的可怕后果；其次是向宪法保证法庭没有提出控告，要求惩办巴蒂斯塔的违宪罪行。虽然一个人加以理睬，但是，这些行动却使卡斯特罗对于旧宪法或多或少的一点新发现的忠诚得以布露于世。

卡斯特罗现在既是一个没有顾客的律师也是一个没

① 这个字的意思是野猫爪子的扑抓。

② 参看1959年卡斯特罗在委内瑞拉的演讲；在1960年他把它称作为他的“第一次宣言”（《街道报》，1960年3月30日）。

③ 全文重新发表于卡斯特罗在马基托斯审判时的演讲中（《革命报》，1959年12月20日）。

有讲坛的政客了，虽则他的妻兄、已经成为巴蒂斯塔的支持者的迪亚斯·巴拉特，试图劝说他支持军事暴动而未获成功。^① 他已是将近三十岁了，他父亲依然不知其所以然地继续接济他，他的婚姻也不很顺遂（虽然在1949年9月有了一个儿子，菲德利托）。要想不让政治前途的机会失之交臂，那就必须有所作为。他已经有了爱好冒险的名声；有了在其他政治家看来似乎是束手无策的世界中愿意自命特具品质和个性的名声。他早已有一批人追随他左右，把他看作是领袖，正如他自从大学以来一贯拥有的情况那样，这批人对他的风头主义的一面，有的怀着蔑视，有的甚至怀着羡慕的态度。有一个黑人敬慕者曾经描述卡斯特罗的食量如何之大，认为“这个白人吃起来活象一个黑人。”^② 他（心里）总是怀有种种华而不实的想法：“那些嘴上挂着至高幸福的笑容，大踏步走向死亡的人，是接受了职责的号召。”^③ “〔人们〕并不是生来就得屈从于时代的伪善和痛苦的生活”，这句话令人想起了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的著作中一些优美的篇章。他的朗诵和他的言语都充满了“男子汉大丈夫的思想，鼓动了血气未定的人们”。^④ 在1953年1月28日纪念马蒂诞生一百周年的群众大会上，他说，卡斯特罗曾经

① 劳尔·马丁内斯·阿拉拉提供的材料。迪亚斯·巴拉特曾一度担任巴内斯的人民党青年联盟书记，但是在改变的前一年已经转到巴蒂斯塔方面去了。

② 罗伯特·默尔：《蒙卡达，菲德尔·卡斯特罗1953年7月26日的第一次战斗》（巴黎，1965年），第143页。

③ 《驻防军的二十六封信》，第18页。

④ 同上，第19页。

领导过“军队式游行队伍中一个由业经离校的学生和其他一些人组成的坚强小组”^①——或许又是一种多少取法于何塞·安东尼奥的词句。^②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53年是一个受过健全教育的华而不实的、血气方刚的民族主义者。虽说指责这样一个热心的爱国主义者为不诚实，无疑是有失于明辨，他却能够常常欺骗象劳合·乔治一类的人，尽管他所欺骗的首先是他自己。^③他觉得自己，同加西亚·巴尔塞纳、桑切斯·阿朗戈和卡里略这几个1952—1953年唯一有政治前途的团体，完全格格不入。他喜爱行动，喜爱成群结队的人，有时候似乎还把政治，甚至于暴力看作是以另一种手段进行的角逐。他虽然具有强烈的幽默感和历史感，却缺乏雅量，他虽然喜欢嘲笑他人，却难得嘲笑自己。他在自己的想象中有明显的空白点，例如他对于古巴的黑人问题，从来就没有发表过什么意见，对经济方面也只有肤浅的理解。但是，他那些亲密的追随者却早已把他看作是一位潜在的民族救星了。他的机会可能会在某种极端不同的环境下到来，而这种环境的造成又只能通过以下几个步骤：巴蒂斯塔的继续当政，实业界增加对巴蒂斯塔的支持，以及，尽管如此，巴蒂斯塔最后瓦解在

① 劳尔·卡斯特罗的文章，《基础》月刊，1961年6—7月，第10—11页。

② 姑妄听之，帕尔多·利亚达后来说，他在马埃斯特腊山卡斯特罗的营帐里发现了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全集（《自由波希米亚》月刊，1961年12月）。

③ 卡斯特罗的性格有许多方面使人想起了劳合·乔治，试与史密斯的下述评论作一比较：“同劳合·乔治先生进行真正激辩的人必须思想明确，深邃和敏捷。否则他就会顾此失彼。”

卡斯特罗的手里。西方国家，想起列宁的经验，就不会以要求于一般领袖的言行一致和诚实无欺，来期望于革命领袖们了；卡斯特罗的意志和态度既然变化无常，就简直不会是一位言行一致的人，因此就难于获得一般自由党人或保守党人的了解。显而易见，在1952年阿尔弗雷多·格瓦拉竭力要使卡斯特罗信奉共产主义以前，权力对于卡斯特罗说来是意义重大的。据说卡斯特罗曾经自得其乐地回答说，“我要是斯大林，我就会是共产党人。”^①

在巴蒂斯塔第二次当政之初，卡斯特罗的想法也许正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不必去组织一个运动，而是尽力团结一切反对巴蒂斯塔的各种不同的力量就够了。我打算只以一个小兵的身份参加这场斗争。我开始组织第一个行动团体，希望同那些准备履行反对巴蒂斯塔的基本任务的〔人民〕党的领袖共同努力……但是，如果在这些领袖中，没有一个人表明自己有这种能力，决心，认真对待目的的态度或推翻巴蒂斯塔的手段，到那时候，我终于会独自拟订出一个战略来。^②

① 私人材料。

② 洛克伍德书，第141页。

第二章

蒙卡达：理想

到了1953年中期，卡斯特罗已经是包括有少数几位妇女在内的一个青年团体的中心了，这个团体的目的是要用比一般政治家更大的力量去进行反对巴蒂斯塔的斗争。凡是具有任何形式的政治忠诚的人，都象卡斯特罗本人一样，是人民党青年运动的成员，虽则他们是居于少数的。但是，由于偶然的机，人民党青年联盟的比那尔德里奥小组被卡斯特罗争取过来了，该小组的组长何塞·苏亚雷斯把一批朋友也带进了卡斯特罗的团体，这些人都是住在他附近的阿特米萨。因此阿特米萨这个由阿朗戈于1803年建立在通往西部的公路的主要城镇，不期而然地变成了卡斯特罗的追随者的一个根据地。这些人在阿特米萨的聚会，都是在共济会支会会所举行的，因为有一个成员（印刷工人庞塞）是共济会会员：其他的人都不是。^①

在1953年追随卡斯特罗的人几乎全都是中下层阶级或工人阶级。^② 学生寥寥无几，进过大学的则只占一个

① 卡洛斯·弗朗基：《十二人传》（巴黎，1965年），第16页。还有其他一些人过去是共济会运动的活跃分子。

② 卡斯特罗对洛克伍德说，他的追随者百分之九十是“工人和农民”（第146页）。看上去他说的不错。

很少的少数。在参加攻打兵营的大约一百五十人中，大多数是工厂工人、农业工人和店员。与制糖工业直接有关的似乎只有四人，另外有学生一人。其他一些人的职业是各式各样的：有钟表匠一人、教师一人、出差汽车司机一人、医生一人、牙医一人、书店店员一人、扫烟囱工一人、木匠三人、屠宰工一人、蚝贩一人和男护士一人。失业者似乎只有一、两个人。来自哈瓦那的将近六十人，来自阿特米萨或瓜纳哈伊岛的有二十四人。来自奥连特省的为数寥寥。但是在哈瓦那人中，大约有二十五人是诞生于岛上其他地方的，如同此后许多首都公民迁移到那里一样。在知道年龄的那些人中，二十岁以下的十一人，二十岁至三十岁的五十二人，三十余岁的十七人，四十岁以上的五人。很多人都曾活跃于人民党青年联盟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支部。从相片来看，似乎最多有二十五个人可能有黑人或印第安人的血统，其中黑人的血统占大部分，但这个估计可能高于正确的数字。少数是结过婚的——或许是二十人。就所能看到的来说，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同卡斯特罗在他的大学帮会时代有过联系的，并且除开卡斯特罗之外没有一个是革命起义同盟或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员，如果不算所谓“跛子”的话。

这些人事实上大都是工业文明的随军的非武装人员，有些则具有在美国企业工作的直接经验——桑塔马里亚曾经在美国资本的古美公司所拥有的康斯坦西亚制糖厂工作，蒙塔内曾在通用汽车公司任会计，“尼科”·洛佩斯曾工作于内拉乳品厂。他们汇聚在卡斯特罗的下面，部分是事出偶然（他是一个朋友的朋友），不然就是因为

卡斯特罗显然至少具有领导帮会的才能。在阿特米萨这个团体中，有些人曾经参加过几个月的加西亚·巴尔塞纳运动。埃内斯托·蒂索尔以前曾经试图领导他自己的团体未获成功。蒙塔内和桑塔马里亚在卡斯特罗同他们合作并创办《告发者》杂志以前，曾经发行一种秘密政治新闻通讯，《新闻实报》。塔森德自从卡约·孔菲特斯时代以来就同卡斯特罗多少有点联系，至于戈麦斯兄弟这两个卡斯特罗的追随者，曾经是耶稣会学校贝伦学院的厨师，并且从那时起就一直追随他，历经卡斯特罗事业上的一切成败而没有背离过他：这两个人自从参加反对马查多的斗争以来就一直是政治上的“斗士”，当时他们是ABC党的成员。1953年卡斯特罗的运动就是由这几个团体合并而成的，各团体自行追随一个小头头，而这些小头头又奉卡斯特罗为领袖。他们除了敌视巴蒂斯塔，简直谈不上具有什么意识形态，虽则在大多数的头头之中，爱国主义和社会革命的观念，尽管不够明确，却炽如烈火。这些人中，有几位老资格的，都曾从支持革命党到支持人民党，又于希望幻灭之余，转而支持卡斯特罗，经历了一个算是典型的理智的过程。

在卡斯特罗的追随者之中，有一个可说是没有代表的团体，就是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即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相反，人民党青年联盟却有一些成员参加到卡斯特罗方面，而另一些人则走向共产党。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就是其中之一，虽则他在1953年才离开大学，简直没有参加过人民党的政治活动。他在1953年2月出席了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青年代表大会。之后，他去布加勒斯特和布拉

格，又去巴黎。他同一个俄国共产党员、两个年轻的危地马拉共产党员一起回国，在1953年6月返抵哈瓦那后，便请求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因携带共产党宣传品而被监禁几天之后）。^①但是直到1953年为止，劳尔·卡斯特罗并不是他哥哥的运动的支持者。在他参加时，他也只是出自手足之谊而不是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因为他不是一个头头，他没有把自己的这个行动报告共产党。^②费尔南多·切纳尔德这位摄影师也曾经是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一个成员，但他这时已三十四岁，是一个人民党党员。在1953年追随卡斯特罗的一个叫何塞·路易斯·洛佩斯的人，过去投过共产党的票，因而不容于雇主。唯一的古巴共产党党员就是卢西亚诺·冈萨雷斯·卡梅霍，一个来自巴亚莫的四十岁的制糖技工。1953年的其他一些菲德尔分子，就他们都泛泛地通晓共产党的课本这个意义来说，可能都具有爱好共产主义的观点，其中有桑塔马里亚的兄弟姐妹、“尼科”·洛佩斯和拉米罗·巴尔德斯，但是这些人没有一个同共产党有过正式关系。

这些人直到这时还没有一个组织名称（虽然他们一

^① 默尔书，第121页。1965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对李·洛克伍德证实这一点说：“劳尔完全是以个人身分……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洛克伍德书，第144页）。劳尔·卡斯特罗本人把他自己早期的激进主义归因于下述事实：在他假期回家时，他看到“成千上万的农民中，能够读书的只有我们家的那些人”（《革命文献》，1960年第2期，第3页）。

^② 洛克伍德和默尔书。劳尔·卡斯特罗的童年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显有不同：例如，他在多洛雷斯学院同宗教的决裂，似乎比他哥哥更感到痛苦。由于他在体格上不那么健壮过人，因此不那么成功；他对贝伦学院采取一种完全敌视的态度，所以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那里，到比兰的地产公司工作，后来进入了哈瓦那大学的法律系。

度被称为百周年纪念的青年，就是指何塞·马蒂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他们简单地自称为运动。卡斯特罗供给他们以武器，武器是由好心人买来的（人民党的领袖们拒绝予以帮助）。卡斯特罗显然只从他父亲那里得到了一百四十美元，而不是他所要求的三千美元。古巴是从来不缺少枪支的，特别是在大学里，很多靠了这个或那个原有的帮会组织赚钱的人都有各式各样的武器出售。到1952年下半年，又有了一些年轻妇女同卡斯特的团体发生联系。^①

卡斯特罗名义上仍然是一个人民党党员，但是他决定作些什么时并不去征求人民党领导的意见。事实上，他在他油印的《告发者》上，早已表示了他个人对人民党的不满了：

谁要是认为到现在为止一切都干得很不错，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责备自己了，这种人，就是宽于待己的人。紧跟着奇瓦斯逝世而来的这些毫无所获的斗争，这些很少为了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纯然出自利己主义的和个人思想所引起的轩然大波，甚至现在还象一把沉重的锤子敲击在我们良心上那般发出阵阵回声来。前往公众法庭去解释拜占廷式^②争吵的这种最忧郁的行动，乃是无纪律和不负责任的严重征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发生了3月10日“政变”。人

① 在1953年7月26日以前，似乎已经有六名——艾德·桑塔马利亚，梅尔瓦·埃尔南德斯，埃爾达·佩雷斯，纳蒂比达德（“纳蒂”）·雷维尔塔，埃莉萨·杜波依斯和一个“老西班牙革命家”何塞法。家庭出身很好的纳蒂比达德嫁给了一个走运的医生，并在一家美国石油公司工作。

② 卡斯特罗欢喜用的一个形容词（如同古巴其他的政治演讲家一样），例如，他在1965年斥责中苏决裂是拜占廷式的。

们也许希望这样一个重大事件将会根除党内的细小的私怨和毫无所获的私人王国……〔但是〕无聊的争吵又卷土重来了。愚人因痴狂而没有注意到报馆的门道太狭，无法对现政权进行全面进攻，但另一方面，对于进攻人民党本身来说，那个门道却总是太宽……虽然人民党的广大群众却比历来都更加有准备地在要求作出牺牲……

凡是抱有传统政治观念的人，都自认为是当前形势的悲观主义者。反之，凡是信任群众，相信伟大理想具有不可毁灭的力量的人，将不会受到这些领袖的优柔寡断和意气消沉的影响。因为这个真空眼看将由来自基层的更为坚强的人物所填补。这是一个革命的、而不是讲究政治的时刻。所谓政治无异是有办法的人把机会主义神圣化了……革命为下述人物打开了通往真正价值的途径——有勇气和真诚理想的人，胸怀坦率的人，高擎战旗的人。对于一个要拯救古巴的革命党说来，必须配备有来自群众的、年轻的革命领导干部。^①

类似这种激动人心的词句自然常常挂在古巴政治家的嘴上。格劳，拉雷多·布鲁，戈麦斯以至马查多或者那个年轻的巴蒂斯塔的每篇演讲，没有这些词句简直就不能称完满。政治思想并不详加缕述，至于感情，即便是由埃迪·奇瓦斯来表达，也不会有什么两样。

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卡斯特罗心里的计划是一个破釜沉舟的计划，也就是对奥连特省在圣地亚哥和巴亚莫的两个兵营发动一次袭击。这次袭击的目的主要是要夺取一个军械库，以便为其将来进行伟大事业的运动获

^① 引自劳尔·卡斯特罗的文章，〈基础〉月刊，1961年6月，第8—9页。

得武器。如果他能取胜，他希望把圣地亚哥许多来自反巴蒂斯塔的队伍中的志愿人员武装起来。圣地亚哥毕竟远离哈瓦那，兵营通常只驻有一千名士兵，如果对它加以突然袭击，有一百人就能把他们打垮。

这里还有另一个目的：这次袭击可能得到一鸣惊人的、英雄般的胜利，从而引起奥连特省各地的民众起义——“点燃国内的燎原之火，成为开路先锋”。^①这一企图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同无政府主义的建功立业的宣传思想有某种相似之处，即只要搞一次行动，即使不能导致太平盛世，至少也可以导致革命。按照传统的标准说来，卡斯特罗并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是，他的方法却同无政府主义有相似之处，正如他所希望那样，只要搞一次行动，国家就可以落入革命的掌握中。而且，卡斯特罗的运动也不自觉地用了无政府主义旗帜的黑、红两色作为它的军旗。

当然，奥连特省原是1868和1895年古巴革命的旧传统中心。卡斯特罗自然希望靠一次耸人听闻的举动为自己取得第一流革命领袖的威望。所传他为了筹划结果巴蒂斯塔的性命而曾同共产党会晤的那种说法，看上去肯定是不真实的。^②卡斯特罗同共产党的距离或许比他进大学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疏远，而且后来共产党还把

① 马丁内斯·阿拉拉的评论。

② 这一套无根据的传说披露于纳撒尼尔·韦尔：《照耀古巴的红星》（1960年），第122页，自称是以巴蒂斯塔新设的反共调查和保安队，即镇压共产党活动局的报告为依据的。但是镇压共产党活动局是直到1954年才成立的。

攻打蒙卡达兵营斥之为劳而无功。^① 诚然，这时卡斯特罗确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圈子里，即认为不读列宁的著作就是无知无识。他真正想与之讨论问题的追随者之一——阿维尔·桑塔马利亚，根据他妹妹的说法，倒是“列宁和苏联革命家们的著作的热情读者”，并且在蒙卡达时还随身带着列宁的著作；但是，这决不是说他们就是共产党员，因为桑塔马利亚也像卡斯特罗那样，是“一个马蒂的崇拜狂”。

卡斯特罗和他的朋友在 1953 年时的理论观念，可以从攻占无线电台后所读到的宣言中加以最准确的衡量：

革命方面宣布它的坚定不移的意志，就是要把古巴建立在一种福利和经济繁荣的计划上，以确保它的富饶下层土、它的地理位置、多样化农业和工业化的继续存在……革命方面宣布：它尊敬工人阶级……并……以按照组织完善和切合时宜的全国计划进行发展经济和工业为基础，建立全面和决定性的社会正义……革命方面……承认马蒂的理想，并以这种理想作为它本身的依据……并且采取青年古巴、ABC 党激进派和人民党的革命纲领作为它本身的纲领……革命方面……以先烈的名义，以祖国的神圣权利的名义宣布它绝对而虔诚地尊重 1940 年颁给人民的那部宪法……^②

① 但是胡安·阿尔梅达后来谈到卡斯特罗这一阶段的生活时说，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本列宁的著作：“一本在封面上有列宁肖像的蓝皮书”（弗朗基书，第 15 页）。

② 引自胡莱斯·杜波依斯：《菲德尔·卡斯特罗：起义者——解放者还是独裁者？》，第 34 页；全文载《波希米亚》周刊，1959 年 2 月 15 日。孔特·阿圭罗书上说，这是出于劳尔·戈麦斯·加西亚的手笔。

卡斯特罗还准备再放一次奇瓦斯临终演讲的录音。

这就是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运动的真正纲领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怎样来理解他在1961年12月所做的自我提问呢：“我在〔1953年〕7月26日相信〔马克思主义〕吗？我在7月26日是相信的。我是象在经过十年斗争后的今天这样了解马克思主义吗？当时我并不象今天这样的了解……这就有很大的差别了。我有偏见吗？有，我有偏见；有，我在7月26日的确有偏见。”^①虽然事实上在1953年他根本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哪怕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有点一知半解。也许他确实有着比他公开发表的稍微急进一点的观点，然而，上述纲领如果真正付诸实施的话，古巴的情况将会发生急剧的变化。“马蒂的理想”？“青年古巴”——吉特拉斯的旧纲领？事实上，如果这些纲领的任何一个得到正确解释的话，其结果也许不是一种共产主义革命，但是肯定会比卡德纳斯所领导的墨西哥革命更为“革命”的一种革命。大概是象马丁内斯·阿拉拉所回忆的，“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讨论”，但是这项评论只能应用在马丁内斯·阿拉拉的身上。

卡斯特罗后来解释说，事实上他有五种革命法律，如果他攻克兵营的话，原都会立即加以公布：

第一，恢复1940年的宪法，在大选以前，应由革命运动方面——大概也就是他和他的朋友——掌握除修改宪法权以外的一切立法、行政和司法权。这里自然发生了

^① 《革命文献》，1961年，第46期，第35页。

矛盾，因为1940年的宪法本来就已把这三权分开了。这项法律也意味着卡斯特罗或者会立刻夺取他那些名义上的人民党领导的权力，或者会迫使他们参加革命运动。（这大概就是1959年巴蒂斯塔最后下台时所发生的情况。）

第二，一切“不得抵押和转移的”财产应交给耕者、分耕者、占据公地者或耕地不到一百五十亩的其他人等。国家当以十年以上的地租之数付给原主。自然这会是一个真正的、虽则多少有点不失为常规的土地改革。1946年，在古巴总共十六万个农场之中，这种规模的农场有十四万个，也就是大约占农场的百分之八十。^①

第三，工人和雇员将可以分享所有糖厂和其他非农业性的“大”企业的三分之一的利润。这样一个分享利润的计划比之其他任何前辈知识分子的思想，更能符合奇瓦斯的思想。

第四，今后蔗农每年将得到大约四百五十吨甘蔗的一个最低限度的配额，并且蔗农将有权得到总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五。这是按照三十年代后期巴蒂斯塔的法律传统的一种适度的蔗糖改革法。1950年，蔗农约有五万人。

第五，一切非法取得的土地以及一切以欺诈手段取得的财产或现金，将一律予以没收。

卡斯特罗补充说，紧接着这些法律之后，还将有另一些法律，规定土地改革和教育改革，公用事业和电话的国

^① 参看1946年的《农业调查》。后来没有什么可供利用的数字。

有化，甚至规定收回过去已付给美国所拥有的公司的一些款项。还将进行住房改革。土地改革将在这样一点上反映出1940年的宪法，即将为每一项农业计划指定一个最高额的土地面积。拟采取措施，使土地“终将归还古巴人”，总之，这还是1934年以来的一个总趋势。租地耕作的小农将可自有其田。卡斯特罗说这类人不下十万之数，说明他是把一切占据公地者、分成制佃农以及分耕佃户都包括在内的。沼泽地将予填平，并将进行重新造林和建立研究中心。农业合作社将得到鼓励，以期有助于普遍使用价值昂贵的设备、冷藏和科学种田的方法。这些合作社旨在帮助个体土地所有者，而不是任何土地国有化的先声。

他所注重的教育改革，似乎就是提高教师工资。农村教师可以免费旅行，所有教师每五年将有六个月的休假，使他们所担任的学科不致落后于国内外形势。准备对教育进行“全面改革”，但是，更具体的措施也仅止于此而已。

住房改革将包括减租百分之五十。房主自用房屋免税；出租房屋加税三倍；清除贫民窟；重新发展“多户分住的建筑物”——所有这一切都是旨在创造和鼓励住户对自己的房屋或分层住宅拥有所有权。

这些不同的计划将由根除贪污和停止高价购买军火来筹措资金。还有为实行国家工业化而“动员一切呆滞资本”（估计为五亿美元）的一个计划。至于这个项目，以及公用事业和电话公司国有化的方式，都未提出具体措施。除了对那些以土地分给小农的人之外，也没有提到

赔偿问题。

这个纲领，就其本身说来，并不能说是拥护任何某一种政治哲学，虽然它显然是接近于奇瓦斯的思想的。它集中注意于卡斯特罗本人所了解的古巴社会的各方面——耕作和教育、居住和社会条件。这些计划一定是卡斯特罗本人的计划，而且看来他也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过。例如与人民党运动有联系的奎尔沃或者帕索斯这些著名的经济学家，都一个也没有商量过。分地的思想，二十年代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所喜爱的土地分配，自然会导致小块耕地的数目增加到超过经济上可取的程度。小庄园，即使是一百五十噠的庄园，经营起来也不比大庄园容易，特别是如果用来种植甘蔗的话。老实说，看来令人惊奇的倒是卡斯特罗对于蔗糖问题的那种谨慎的态度。工人分享利润；鼓励古巴人的所有权（已经在逐渐增加）；保证蔗农分享甘蔗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五（已经是正常的）；进行一百五十噠到（比如是）一千噠的再分地的运动——所有这一切，都说不上是急进的，而且靠了这些，也满足不了使古巴在国际上独立自主的要求。制糖工业的国有化，只字未提——而鉴于这项工业的不同寻常的结构和国家对它所依赖的程度，这却肯定是很有道理的一项措施。例如，英国工党准会把这项要求高踞在一项指示的清单上。另一方面，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的经济学家，对于拟议的削减地租百分之五十，房主自用房屋免税，出租房屋增税，都准会抱着怀疑态度。所有这些措施归根到底都会引起资产阶级的对抗，而决不会增加大量可予利用的房屋。

后来，卡斯特罗曾暗示说，1953年的这些建议所包含的观点并不象他当时实际上抱有的那么急进。1961年，他在一篇著名的演讲中说：

人们曾经问过我，我在蒙卡达时期的思想是否就是我今天的思想。我回答说，“当时我跟今天一样想得很多，”……谁读到我们当时所讲的一切，谁就会明白那次革命的很多基本的东西……那是慎重地补写的一件文献。它慎重地写得恰到好处地表明了一系列的基本要点，同时避免作出任何诺言，以致限制了革命范围内的活动领域……那就是说，我们必须尽力使运动尽可能具有最广泛的基础。如果我们不是慎重地写这项文献，如果它是一个比较急进的纲领（虽则肯定有很多人对纲领不免有所怀疑，而且对它不大注意），那么，这个反对巴蒂斯塔的斗争的革命运动以后就不可能取得它后来所取得的、并使胜利成为可能的那种广度了。任何一个读过这项宣言，读过当时那篇演讲的人，都会理解我们的基本思想。有一些事情，象我们当时所提出的诸如给蔗农增加（至少百分之五十五的配额）的保证……以及后来在一些蔗农会议上向我指出的，他们说这种保证做得好，还说提出增加的难道不就是你等等。我对他们说：是的，但在那个时期，我们还不能想到我们今天所能说的一切，而且我们已经把蔗农变成土地所有者，这比我们所许给他们的在蔗糖配额中增加比例一节不知要好多少。当时有些保证纯粹是由于考虑到不伤害革命运动的广度而作出的。^①

另一方面，当时和此后的卡斯特罗一些忠实支持者却认

^① 《革命文献》，1961年，第46期，第34—35页。

为“这次革命……同我们在蒙卡达所发动的革命始终是一模一样的”。^①

除了这项改革纲领，卡斯特罗和他的同志们，还按照反抗西班牙的古巴革命的传统，把自己的行动描绘成一幅英勇壮烈的画面。卡斯特罗很重视亚拉、拜雷、马蒂和马塞奥的口号；卡斯特罗可能懂得一点马克思，而把不懂得列宁的人看作是无知无识，但是他显然更懂得马蒂。象他以前其他一些人那样，他的确把自己看作是马蒂，看作是那个使反抗西班牙的各种不同派别汇合成为一个单一的运动的青年人，是那个既有盖世功勋又有豪言壮语的人，既是演说家、战士，又是暴君的卓越的敌手，又是一个处污泥而不染的创新者。卡斯特罗在攻打蒙卡达时，的确没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识形态，而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要推翻巴蒂斯塔这个暴君，并进而摧毁整个腐朽社会，摧毁以巴蒂斯塔作为象征而不是作为原因的这个已经制度化了的、“正常的”暴力的旧古巴。在攻打蒙卡达兵营前几天作成的、强调自由而不是面包或黄金的“自由赞美歌”，^② 尽管带有英国海滨式的韵律，却是道破了真谛。^③

① 艾德·桑塔马里亚，见弗朗基书，第 54 页。

② 即后来的“七·二六颂歌”。

③ 由曾经参加袭击巴亚莫的黑白混血种歌手阿古斯丁·迪亚斯·卡尔塔亚作曲（《革命报》，1963 年 7 月 26 日），值得注意的是其韵律同《我们喜欢居于大海之滨》如出一辙。

七·二六颂歌

我们朝着一个理想进军，
胜利必然属于我们！
为了和平，为了繁荣
也为了自由，我们一起斗争。

向前进，古巴人民！
古巴鼓舞我们英勇作战，
我们士兵，
我们是解放祖国的士兵。

燃烧起熊熊烈火，
要烧光那可恶的政客，是他们制造了灾难，
要烧光罪恶的暴君，
他们把古巴拖进痛苦深渊！
鲜血洒在古巴的土地上，
我们永远不把它遗忘，
我们要紧密团结一致，
不朽的英雄，活在我们心上。

古巴人民遭受了痛苦创伤，
下定决心坚如钢，
给那些苦难的人民，树立榜样，
要为了伟大的理想，

为古巴革命万古长青，
我们要决心贡献一生！

第三章

蒙卡达：战斗

卡斯特罗在哈瓦那索萨兄弟公司阿维尔·桑塔马利亚的办公室^①里所制订的计划，就是要攻打奥连特省两个兵营，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和巴亚莫兵营。他的支持者的主力军一百三十四人，将攻打圣地亚哥；二十八人去袭击巴亚莫。^②要这些人冷不防地强攻进去，占领兵营，然后将武器分发给预料会群起声援的其他志愿人员。袭击定于黎明时分开始。7月26日这个日子选得合适，因为那天恰好是圣地亚哥的狂欢节。很多士兵，包括军官在内都会在7月25日晚参加狂欢节的群众跳舞，预计他们在7月26日清晨五点半决无作战的准备。卡斯特罗已经在锡沃内附近弄到了一个农场作为据点，并在圣地亚哥当地租到了几间房间。

袭击自然是一种战争行动。卡斯特罗在人数上处于大约十对一的劣势（兵营中驻有士兵约一千人），但是卡斯特罗却把希望寄托在奇袭、混乱和自己队伍中无比旺盛的士气上面。（一个星期以前，卡斯特罗显然拜访过他的妻兄、内务部副部长拉斐尔·迪亚斯·巴拉特，以摸清

^① 在领事馆街9号。

^② 卡斯特罗说去攻巴亚莫的是二十七人（卡斯特罗，《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第25页）。巴亚莫的指挥官马丁内斯·阿拉拉则说二十八人。

楚警察当局对他的计划有没有丝毫的疑心。)卡斯特罗的武器只有三支美国陆军步枪、六支旧式温切斯特步枪、一挺旧机关枪和一大批猎枪。“我在等我的步枪，就象在等一个救世主一样，”阿尔梅达在十年后这样说，“我一看到它是0.22口径的，我浑身都凉了。”还有几支左轮枪和一定数量的弹药。已经从士兵那里买到了一些小武器，和大约一百套军装；其他的东西也已经办妥。卡斯特罗自己说这次远征用了不到二万美元，这笔钱似乎是他的追随者们事前筹募的，^①其中采购武器用了五千美元，步枪每支八十美元。

有九个人因为胆怯而临阵退却，其中包括参加这次远征的为数寥寥的大学生中的几个。在这批人中，另外几个则多少还有一点宗教信仰，在战斗前夕，还去朝拜了科布雷的慈悲圣母，虽则事出偶然。大多数人是从哈瓦那乘小轿车来的，有些则是搭火车或乘公共汽车来的。在战斗时刻到来之前，只有六个人清楚知道所要进行的事情，^②彼此相识的寥寥无几。至少有一个人(即阿尔梅达)认为他们是去参加圣地亚哥的狂欢节，作为早期武器训练取得成就的一种奖励。另一些人似乎只是听说他们要去进行一次比较紧张的实弹射击。锡沃内的农场由两位妇女

^① 默尔书，第102页。马丁内斯·阿拉拉说，这笔钱中大约有三千美元是桑塔马利亚靠了在他所服务的索萨兄弟公司一张伪造签字的支票而取得的。但是这张支票似乎在革命以后还是兑到了现款。

^② 默尔书，第143页说这些人卡斯特罗、桑塔马利亚、阿尔卡德、蒂索尔、塔森德和吉塔尔特。马丁内斯·阿拉拉也自称他什么都知道，这无疑是对的。

照管，即赫苏斯·蒙塔内和博里斯·圣科洛纳这两位战斗员的未婚妻梅尔瓦·埃尔南德斯和艾德·桑塔马利亚。卡斯特罗在他们出发前所作的鼓励士气的演说中，似乎特别着重地谈论到他们功业的“历史”意义而不大谈到社会和政治的意义。有几个参加者清楚地看到他们是会丧命的，并且据说有一位参加者穆尼奥斯医生还对卡斯特罗说，把这许多人骗进如此危险的一项勾当，无异是犯罪。

狂欢节之夜转向革命之黎明：五点半，一百一十一名男子（全都身着军士制服）和两名妇女，分乘二十六辆汽车从锡沃内开进圣地亚哥。卡斯特罗坐在第二辆汽车中。后面一辆车子坐着劳尔·卡斯特罗同十个战士，他们原来打算去接管那座俯临兵营的正义宫，可以从屋顶居高临下地为在兵营中央广场中他的哥哥提供炮火掩护。另三辆汽车中乘有卡斯特的副司令阿维尔·桑塔马利亚、两个妇女和穆尼奥斯医生等共二十二人。^①他们准备攻占附近的市民医院，以使用来医治伤员。有一辆汽车轮胎爆炸，落在后面。照卡斯特罗自己的说法，由于最不幸的错误，我们的队伍有一半——是装备较好的一半——一进城就迷了路，以致在决定性的时刻，没有在近旁帮上我们一手。但是临阵退却的大学生小组曾奉卡斯特罗之命，跟随在汽车长蛇阵之后；他们却把所搭乘的一辆克莱斯勒牌汽车超车开到车队中央，因此使得另外几辆车岔出了去蒙卡达的那条路的就是他们。

^①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第23—25页中说，“桑塔马利亚和二十一个人。”梅莱说有二十个人在医院，六个人在法院（第167页）。

第一辆车在兵营大门口停下来。六个人从车上下来，他们的头头吉塔尔特要门岗为大家让让路。这三个门岗一时被这些军士的制服蒙住了，他们“认不出〔这种制服〕，但顿即想到这是军乐队的制服”，于是以枪相向，但是这些枪，这些斯普林菲尔德式步枪立刻被夺了过来。起义者于是冲上营房楼上，把门岗推在他们的前面。在外面，坐在第二辆汽车里的卡斯特罗却出于意料地遭到两次拦阻：一次是两名携带机关枪的兵士，另一次是一名带有武器的军士。卡斯特罗开着车子冲向机关枪手，那个军士落荒而逃。但是他还能够清晰地发出警报信号。根据预定的命令，卡斯特罗的汽车一停下来，后面车子里的人就得全都跳下车子，袭击他们左边的建筑物。卡斯特罗试图把他的队伍重新集合起来，但未获成功。在兵营里的第一辆车上的人，在把宿舍里没有穿衣服的兵士弄得惊慌失措之后，发现自己被切断了，于是在击毙了若干军士和一个值日官莫拉雷斯少尉之后，撤出兵营。警报一经发出，枪炮齐发，从一楼一直发射到街上。袭击者躲在停放着的汽车后面以保护自己。任何类似事件的实际经过情况都必然会成为事后的一个争论问题。另一篇记述则说卡斯特罗把他的车子开上了人行道，猛撞在路边基石上，因而引起卫兵的注意，卫兵于是开枪射击，打伤了古斯塔沃·阿尔科斯。

攻打圣地亚哥的另外两个小组却是成功的：劳尔·卡斯特罗攻占了几乎毫无防备的正义宫，阿维尔·桑塔马利亚攻占了医院，他们自己和军队都无伤亡。但是这已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因为已经失去了突袭蒙卡达的大

好机会，而且这时袭击已经变成一场众寡悬殊的战斗，一边是一百名配备着猎枪的人，一边是由死了的值日官的兄弟莫拉雷斯少校重新集合了一千名装备优良的士兵。卡斯特罗迅即下令退却，他和他所带领的人随之退却，撇下了一些伤员，并让其他一些人作了俘虏。这类事情向来总是这样，后来便传说是一些头头首先逃跑了。劳尔·卡斯特罗和正义宫的胜利者也撤退了，但是在市民医院里那些人都不知道退却的命令，后来只好装成病人躲在医院里。在这一阶段，卡斯特罗方面似乎只有二人阵亡，^①一人重伤；^②军队方面死军官三人，士兵十六人。^③双方都有不少人受伤。战斗持续了大约一小时。

攻打巴亚莫也失败了，骑兵显然已经告急。劳尔·马丁内斯·阿拉拉这个头头迟迟没有发出撤退的命令，但是尽管如此，战斗也只持续了十五分钟。这场战役甚至比蒙卡达更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在巴亚莫的战斗员中，显然发生了某种政治性的争执和辩论，有几个人不赞成卡斯特罗当领导。^④死亡者六人。

攻打兵营的余波对于古巴的历史是有决定性影响的。有些人例如参加攻打巴亚莫的马丁内斯·阿拉拉逃到了外国使馆。在原来的一百六十名起义者中，也许有八十人是在7月26日或者下一天被俘；在头一、两天内

① 希尔多·弗莱塔斯和吉列尔莫·格兰纳多斯。

② 里戈维托·科尔乔。

③ 《前进报》，7月27日说有士兵十六人死亡。在这种情况下，最直接的报纸报道似乎是真实性最大。

④ 马丁内斯·阿拉拉提供的材料，他补充说，“我这一组的几乎全体同志都对菲德尔·卡斯特罗有反感。”这也许是事后聪明。

被俘的，大多被杀害了。象卡斯特罗那一些人则设法在森林里支持了几天，总算得免于难。但是似乎总共有六十八名俘虏被杀害了，甚至包括临阵退却的那三名青年在内(维克托·埃斯卡洛纳的“阿尔门达雷斯”小组)。在这些俘虏中，大多在枪决以前遭到枪托的殴打，有些则受到其他各种酷刑。有一些在虐待过程中丧了命。在巴亚莫，有三个俘虏被拖在行驶的吉普车后面达数哩之遥。艾德·桑塔马利亚和梅尔瓦·埃尔南德斯这两位妇女本身没有受到酷刑，但是，前者的兄弟阿维尔·桑塔马利亚和后者未婚夫显然是在刑讯中被折磨死了，艾德·桑塔马利亚的未婚夫博里斯·圣科洛纳也是这样。有三十二名俘虏幸存到提付审判，脱逃的共四十八名，有的乘公共汽车返回哈瓦那，有的逃往朋友家里。^①

这种暴行起初是又惊又气的士兵在他们的军士支持下的一种自发的反应。巴蒂斯塔的军官后来对起义者的暴行所作的指控(如在陆军医院中用小刀齧切病人)似乎是虚构的。蒙卡达兵营一些司令官(德尔里奥·查维亚诺上校和佩雷斯·乔蒙上尉)，鼻孔里还有狂欢节的甜酒和雪茄的气味，酩酊大醉，又惊又怒，在枪声停止后才到了战场，他们不但没有设法阻止暴行，还加以鼓励，事后又帮着他们掩饰。拉瓦斯蒂达上尉所领导的在蒙卡达的特别警察(专搞军事情报工作)，在镇压中也起了显著的作用。少数几个医生和官员(诸如塔马约上尉，莫拉莱斯

^① 遇害者的一张不完全的名单首先刊于《革命报》，1959年1月15日，第14版。1967年卡斯特罗(在拉丁美洲团结组织的第一次会议上)称，这次袭击是一个错误，他应该一开始就进行游击战。

少校和萨里亚中尉) 试图拯救几条人命并且也确实救了几个。但这是不容易的, 因为这样作, 他们自己也冒了受虐待的危险。

最后, 这次暴行是由政府本身签过字的, 虽则奥连特省省长佩雷斯·阿尔马格尔后来说, 巴蒂斯塔虽然签了字却不知道作了些什么。7月26日, 内阁匆匆批准了一道法令, 将典狱官对犯人性命负责的监狱条例第26条暂停实施。巴蒂斯塔自己和军官团的惊吓和愤怒, 显然不亚于士兵和他们的军官。如果起义者能够对古巴的第二大兵营发动进攻, 那谁还有安全可言呢? 政府惊慌失措, 全岛军队一律奉命处于戒备状态, 成百的人被拘留。因为据悉有几名菲德尔分子受伤, 所以任何一个受伤的人, 即便是因车祸受伤, 也有受审讯和虐待的危险。有一个臂膀敷上石膏的圣地亚哥公民, 就是为此而被捉到蒙卡达痛遭毒打。这种轻率的残忍行为使得舆论对原来的袭击是否合乎道义的疑问忘记得一干二净。

攻打蒙卡达是发生在巴蒂斯塔当政时期的一个倒运的时刻, 因为军队中的明争暗斗已发展到无法控制了。作为参谋长的塔维尼利亚越来越不得人心, 但是越来越野心勃勃, 这时正在筹划搞掉三个部长——尼古拉斯·埃尔南德斯, 拉蒙·埃尔米达和巴勃罗·卡雷拉·胡斯蒂斯, 这三个人是3月10日阴谋的文职人员方面的策划者。他已经成功地把原是埃尔南德斯本人的陆军总司令候补人、那个精明强干的加西亚·图尼翁将军调充驻智利的武官; 另一个沮丧的巴蒂斯塔分子、兰贝亚上校在塔维尼利亚的办公室里对他拔出手枪, 也被调任驻哥斯达黎加

的武官；一个绝对忠实的朋友，乌加尔德·卡里略已经得到了特别警察局局长的重要职位，塔维尼利亚的两个儿子，“文塞”和“西利托”得到了非任何功勋所能得到的提升；塔维尼利亚集团的其他一些代表人物则分别授以全岛各地乡村警卫队的指挥权。这些任命自然引起了民政和军政当局其他人员的反对，特别是那些曾经部署3月10日阴谋而没有得到任何显著好处的军官：他们中间毕竟有很多人对于国家的革新都抱有十分认真的、虽则专横的愿望，因此对于塔维尼利亚党羽的利用职权，特别对于他们在全国范围内遍设大赌窟，勒索保护费，感到难忍。有一位部长，埃内斯托·德拉费曾经为这个问题同巴蒂斯塔公开吵闹过，并向总统指出，所有六个省分的军事指挥权都把持在塔维尼利亚的亲信手里，^①还说，政府只能以舆论作为后盾，才能搞掉象警察总监萨拉斯·卡尼萨雷斯和特别警察头子乌加尔德·卡里略这类人物。

巴蒂斯塔当时至少曾同意对这些指控进行调查，并指派了费尔明·考利上校负责其事。考利证实了这些指控，这时，3月10日集团的一个成员巴雷拉上校，告诉巴蒂斯塔一件滥用职权的特别声名狼籍的事例，那就是乌加尔德·卡里略利用他在乡村警卫队中的势力，强逼一家汽车运输公司以低到荒谬程度的价格将该公司卖给他的一个朋友；乡村警卫队迫使货车停驶，施加各种留难，使公司失了顾客的信任。巴蒂斯塔刚刚同意以这些指控

^① 何塞·费尔南德斯·雷伊，达马索·索戈（索吉托），皮拉尔·加西亚，阿基利诺·格拉和阿尔维托·德里奥·查维亚诺诸上校，分掌从西到东的各省指挥权。

为由，对各级军事领导层进行一次普遍的改组，这时候，蒙卡达危机就开始了。

这次袭击甚至比1948年帮会对马里亚瑙警察局的袭击更是一件大事；任何军队都会有相当强烈的反应。但是镇压之野蛮却大出意料之外。后果是危险的。非刑拷打和残杀的事实，一方面通过街谈巷议，一方面尽管有新闻检查，后来还是通过报纸很快地为人所共知了。《波希米亚》周刊在8月2日刊登了大量尸体的照片，其中很多是在被杀害后给穿上了整洁的衣服，以期使人们认为他们是死于战斗的。^①在这之前，圣地亚哥的几位社会名流——主教（安赫尔·卡斯特罗的老朋友，佩雷斯·塞兰特斯）、哈瓦那大学校长、一位法官、一位大百货公司的老板恩里克·坎托——曾同巴蒂斯塔的秘书长莫拉莱斯·德尔卡斯蒂略有过一次会晤。这些社会名流要求制止屠杀俘虏，巴蒂斯塔不久就颁发了正式命令。佩雷斯·塞兰特斯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这项协议，但是从他亲自（偕同苏维拉茨法官和恩里克·坎托）前往料想（一点不错）是卡斯特罗躲藏在那里的大石山这一举动中，可以看出他对政府所讲的话是缺乏信心的。他原来打算亲自去寻找那些投降的人，把他们交给军队。主教先坐着汽车，后来又徒步在山腰上走了几个小时，用扩音器喊话，声明他可以保证投降者的性命。虽然未能立即获得成功，但是，他的举动终于使几个起义者投降了；不久之

^① 这些照片是德尔里奥·查维亚诺上校在攻打蒙卡达兵营事件的当天所会见的一批记者中的一个人拍摄的。

后，卡斯特罗本人和两名追随者在入睡时，被一位颇有恻隐之心的陆军中尉萨里亚所擒获。

巴蒂斯塔政府的官员们就这样倒退到马查多时代和西班牙时代了，他们的行为非但可以同那些黑暗时代最残酷的暴行相比，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毫无疑问，这多少是因为他们把卡斯特罗和他的朋友看作是威胁到他们个人安危的一种运动的卫士。他们真正的兴趣既在于为政府服务，可是，由于他们又贫苦又没有受过教育，所以他们作出的反应就极尽凶残的能事。还可以清楚看出，如果他们料到他们的上级官长会让他们对自己的行动负责的话，他们也许不会这样干。最重要的一点是，古巴的军队都具有一般古巴人那种随随便便的性格，所以无纪律反而是常态。很多军官在一切事情上的所作所为，都仿佛是他们对待私人的采邑一样。这些军官也是为一个他们寄以厚望的政权服务的。法律及其与行政的关系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以致到头来，他们难得会被加上什么罪名。实际上，有些人还得到了提升。由于想到残暴行为的先例，由于感到自身的不安全，由于似乎对由中产阶级分子所领导的起义比对无产阶级的爆炸更加憎恨，他们就毫不顾忌地以严重影响古巴今后若干年的方式作出反应了。

圣地亚哥的军区司令是当时三十八岁的马塞奥第一团团团长阿尔维托·德尔里奥·查维亚诺。他大概是受了9月军曹起义后表面上出现的希望的诱惑而在1933年11月十八岁时入伍的。1938年，他进入士官学校；在校时，他曾领导忠于巴蒂斯塔的士官生反对并抗议1941年

未遂的佩德拉萨政变。在革命党历届政府当政期间，他都在部队里，而且的确也是为此而于1952年3月10日遭到暂时的拘留。但是，因为他同塔维尼利亚将军的姻兄弟有私交，他立刻得到了释放，而且得到了提升，并被派回圣地亚哥司令部担任一个实缺。特别警察头子拉瓦斯蒂达上尉在1952年以前不过是卡马圭的一个军曹，但由于熟悉鸦片贸易而得到提升。不到三十岁的被称为“眼儿媚”的佩雷斯·乔蒙上尉，在埃尔卡内郊外枪决过许多俘虏，最近几年，靠了敲诈保护费，已经可以花十万美元在圣地亚哥附近的米拉马尔买下一幢住宅了。

这时，有一批重要的共产党员也被捕了。其中包括拉萨罗·培尼亚、布拉斯·罗加、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和其他一些当时碰巧都在圣地亚哥为布拉斯·罗加祝寿的人。这听起来总是可疑的，他们的出现自然被利用来进一步把卡斯特罗同老牌共产党联系起来。布拉斯·罗加毕竟是住在哈瓦那的，他的原籍是曼萨尼略。但他们的出现是事出偶然的。他们“对于蒙卡达计划全不知情”，而且，事实上，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都在7月25日离开了该城。后来他们还谴责了攻打蒙卡达的行动说：

我们不同意〔他们说〕在圣地亚哥和巴亚莫搞那种资产阶级阴谋集团所特有的政变方法的行动，那种攻夺两个军区司令部的冒险主义的企图。那些参加这次行动的人所表现的英雄主义，是虚假的，徒劳无功的，因为这是由错误的资产阶级思想所指导的。但是我们甚至更加不同意政府以这次起义为借口所进行的镇压……举国皆知是谁组织、鼓动和

指挥攻击兵营的，也都知道这是与共产党毫无关联的。共产党和群众的路线一直在同巴蒂斯塔暴政进行认真的斗争，并揭露阴谋政变者和冒险主义者是违背人民利益的。共产党提出必须建立反政府的群众联合阵线，来为古巴的形势找出一条民主的出路，恢复1940年宪法、民权和普选，建立一个具有民族独立、和平、民主和土地改革纲领的全国民主阵线的政府。^①

蒙卡达事件发生时，巴蒂斯塔正在巴拉德罗海滨。他一点也没有显露出关切的神情，还常常在群众面前露面，出现在电视机上，在赛艇会上颁发奖品，后来又说他知道自己是一个行刺的目标。8月2日，他来到圣地亚哥，对士兵们表示同情。宪法保证暂停。6日，颁布了一项比较严峻的公共治安法，矛头专门指向报界。结果是报纸只好不讲话了。巴蒂斯塔还改组了他的内阁，使人认为至少还颇有活力。新设的运输部落到卡斯特罗的妻兄手里。^②但是部队领导没有任何变动。巴蒂斯塔又在考虑

① 《工人日报》(纽约)，8月5日和10日。这项声明不能在哈瓦那发表。把这种态度同一些已有基础的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对游击战的态度作一比较是颇为有趣的。锡兰共产党领袖桑穆加塔桑说，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失败是因为他的方法是“浪漫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主要依靠一帮虚张声势的‘三剑客’式人物，希望能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创出不可思议的功绩来”。(《锡兰每日新闻》，1967年11月5日。)

② 新部长是：拉斐尔·迪亚斯·巴拉特(运输)；古斯塔沃·古铁雷斯(财政)；何塞·奥里维利亚(卫生)；拉斐尔·瓜斯·因克兰(交通)；圣地亚哥·雷伊(不管部)；拉迪奥·克雷马塔·巴尔德斯(谘询委员会秘书)；塞萨尔·卡马乔·戈瓦尼(社会安全委员会主席)；马里诺·洛佩斯·布兰科(负责铁路)。阿塞尼奥·冈萨雷斯留任劳动部——在反对普里奥的斗争中担任过共产党的顾问的一位律师；有人说他本人就是共产党员，例如R. J. 亚历山大就是这样说的。

他那个削弱塔维尼利亚独立王国的计划，但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这类司令官还是一仍其旧较妥。警察领导方面，尽管死钉住反对派的电话，但还是未能预测到这件大事，也没有发生什么人事变动。

10月，卡斯特罗和他的同志们受审了。原来打算要毒害卡斯特罗，或者说他有病而不让他出庭。结果他还是在9月21日和10月16日出庭了（第一场以见证人身份出庭），并且发表了一篇出色的演讲替自己辩护。他被判十五年监禁，劳尔·卡斯特罗十三年，其他一些人刑期较短。对于共产党人则不予以起诉。

蒙卡达事件对舆论的影响和它的余波是相当重大的。要不是因为镇压，攻打蒙卡达事件无疑会被看成为菲德尔·卡斯特罗一生中一桩更为荒唐的和准帮会式的事件而为人们所遗忘了。镇压和审讯使卡斯特罗就此显得有点儿象个英雄了。专业的、天主教的、自由主义的或中产阶级的舆论遭到了侵害。7月27日，圣地亚哥一位法官打电话给巴蒂斯塔的总统秘书安德烈斯·多明戈，问道：“你们是否要以所有这些暗杀行为来恢复马查多时代？”圣地亚哥的专业人员，无论是亲眼看到过或是遇到过看到所发生的一切的人们，都几乎毫无例外地背弃了巴蒂斯塔。佩雷斯·塞兰特斯主教对于教会和上层天主教徒所起的作用也是重要的。如果卡斯特罗的性命会由这位主教保全下来，那么卡斯特罗的事业似乎简直是可尊敬的。对卡斯特罗本人来说，这次袭击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招惹了迫近死亡的威胁，如此众多的伙伴由他引进他所设计的行动而死亡。一方面，使他与人民党的其他青

年领袖断绝了关系，一方面却加强了他自己的使命感。后来，似乎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他在马埃斯特腊山所遇到的第一位农民竟会是一位老妇，她显然使人想起在独立战争中帮助那些孟比人的往事来。他在这段隐匿时期的末尾，曾不太认真地考虑攀登到圣地亚哥对面的马埃斯特腊山上去。前途似乎是除了进一步行动，“继续斗争”以外，别无其他抉择了。另一方面，巴蒂斯塔的军队则士气更加低落，这不仅是因为德尔里奥·查维亚诺对俘虏的虐待引起了普遍的敌视，而且因为他欣然以这次斗争的英雄和胜利者自居。他甚至开始迫害真正的胜利者莫拉莱斯少校，把他作为人民公敌押送到哈瓦那。

第四章

小阳春

1953年10月，在对蒙卡达的幸存者进行审讯十天之后，巴蒂斯塔宣布，将在一年之后，在1954年11月1日举行大选。所有政党应于1954年2月以前登记。新闻检查立即取消，10月28日，暂停民权九十天的法令告一结束。巴蒂斯塔羞答答地拒绝说明他是否会当总统候选人：“葡萄还青着哪，”他对经常由卡斯特罗的妻兄、巴蒂斯塔运动的一个仍然年轻的领袖迪亚斯·巴拉特所召集的听众这样说。另外一群群的人则每逢巴蒂斯塔夫人公开露面，就报之以欢呼，仿佛她就是埃维塔·庇隆：“穷人的玛尔塔，人民的玛尔塔”。^① 玛尔塔·巴蒂斯塔前往华盛顿，受到艾森豪威尔夫人和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霍比的接待。由于普里奥被迫登记为一个外国政党的代理人，巴蒂斯塔的命星似乎正在逐渐高照。的确，这个政权从外表看来似乎相当牢靠，颇有自信，得到了美国的承

^① 她是巴蒂斯塔的续弦，在1945年11月结婚的；巴蒂斯塔和他的第一个妻子埃莉萨·戈迪内斯在1945年10月离婚。埃莉萨·戈迪内斯给他生了三个孩子——米尔塔·卡里达德、富尔亨西奥和埃莉萨·阿莱达。玛尔塔给他生了豪尔赫（生于1942年），罗伯托（生于1947年），卡洛斯·曼努埃尔（生于1950年），富尔亨西奥·何塞（生于1953年）。他在他的遗嘱中还承认了一个生于1935年的私生女儿费米娜·拉萨拉（参看《革命报》，1959年1月24日发表的遗嘱）。他显然是一个慈父，对待先后两房妻室的儿女都一样宽厚。

认，它的政敌或已下狱，或在流亡之中。新任大使阿瑟·加德纳又是这个政权也是巴蒂斯塔的一个强有力的和恬不知耻的朋友。加德纳，这个由新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蒙卡达事件六个月之前，1953年1月就职）任命的人，在杜鲁门任内曾于1947—1948年任财政部部长助理，并以这个身份，得到了一项消息，说格劳的教育部长阿莱曼到达迈阿密，在手提箱里装有二千万美元的古巴政府专款。也许由于这个经验，使他以特别怀疑的眼光看待革命党党员和旧秩序的政客们，而把巴蒂斯塔看成是古巴所需要的救世主。加德纳亲切而愉快地使巴蒂斯塔增加了不少自信，虽则《纽约时报》的记者菲利普斯夫人说，他对这位将军那种令人作呕的钦慕，往往使这个受宠若惊者感到忸怩不安。

与此同时，在伦敦顺利地举行了一次大型的食糖会议，使七十八个参加国负有在世界市场上保持一定数量、为期五年的义务。古巴得到了二百二十五万吨，也就是说，略低于整个自由市场（百分之四十）的一半加上它的对美销售额。但是，有几个出口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秘鲁）没有签署公约。进口国也没有象出口国必须限制他们的出口那样不得限制他们的进口。但是，古巴的份额自然比1937年分得的份额九十四万吨高出不知多少，而1954年的收获量又订定为四百七十五万吨。尽管有长期的不稳定——如果蔗糖产量不是不断上升，能够维持得了这种生活标准吗？——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政府总算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加德纳到达哈瓦那的时候，恰巧是巴蒂斯塔对共产

党采取了比他向来敢于对他的老朋友所采取的更为严厉的手段。11月10日，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它的附属机构，诸如《今日报》、《最后一点钟报》这两家报纸，民主妇女联盟和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这个青年运动都遭到禁止。但是，每周出版的《周讯》和理论性的《基础》月刊却继续出版和发售，至少前者并无困难，虽则是暗中进行的。事实上，巴蒂斯塔和他的部长们仍有意地对共产党保持一种和缓的、松弛的态度，至少对他们过去有过交往的那些人是这样。例如，拉蒙·巴斯孔塞洛斯那位新闻记者和后来的交通部长，他是十分关切黑人共产党领袖们的。任何共产党员都没有遭到多大迫害，除非在他们从墨西哥、布拉格或其他地方回来时偶尔遭到拘留和讯问。久已是共产党的幕后操纵者法维奥·格罗瓦特，在这个时期离开了古巴，借此机会使他可以在斯大林死后、莫斯科所出现的比较新鲜的气氛中一新耳目。在这些年月的大部分期间，古巴共产党员一般都处于半隐退状态，养精蓄锐，以备来日。老的总书记布拉斯·罗加在病中，日常的管理交给了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拉萨罗·培尼亚、曼努埃尔·卢萨尔多和塞维罗·阿吉雷所组成的一个五人会议掌握。^①

他们的政策摇摆于各种不同的目的之间。有些共产

^① 《马基托斯审讯的证词》，1964年。但是，一些孤立的共产党员后来却受到警察的迫害。因此有一个年轻的黑人运动员奇基·埃尔南德斯在第九警察派出所被杀害，运输工人领袖共产党员何塞·玛丽亚·佩雷斯失踪，线索全无。象巴尔德斯·比沃和莱昂内尔·索托这些学生和离校生受到了酷刑。

党员指望巴蒂斯塔自搬砖头自砸脚，从而造成尖锐的危机，他们可以从中渔利。有一些似乎有这样一种指望，认为随着斯大林的逝世，苏联同美国可能和解，从而使他们自己可以同巴蒂斯塔重新恢复往来，或许会通过巴蒂斯塔而不是反对巴蒂斯塔以使他们夺取政权。这种政策所必然造成的无所作为，早在1953—1954年就是党的年轻党员、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成员所怨恨的，特别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或他的兄弟劳尔（他本人毕竟是一个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成员，虽则当时是一个迷茫的成员）在大学同学的那些成员所怨恨的。

在另一方面，这时被押在松树岛监狱中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同人民党依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也许比在蒙卡达事件时还更密切。1953年12月12日，他在写给他的朋友、人民党青年联盟总书记、新闻记者路易斯·孔特·阿圭罗的一封信中，一开始就写道：

如果我们的革命努力能取得胜利，我们的计划是要把政权交给最热诚的人民党人。我们的胜利将会意味着是人民党的立即起而当政，起先是临时性的，然后再通过普选……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尽管我们失败了，我们的牺牲已经使奇瓦斯的理想的事业得到了加强……你跟阿格拉蒙特说，把这封信给他看，向他表示我们对最纯粹的奇瓦斯理想怀有最忠实的感情。^①

^① 《驻防军的二十六封信》（1950年），第20—21页。“我们的”意即“我的”。卡斯特罗很早就采取了后来他在演讲中常常使用的这种堂皇的第一人称复数，虽则在他受审讯时的发言中他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而不是“我们”，当时被他的朋友们愤慨地斥之为个人主义。

卡斯特罗对共产党员所起的作用是妒恨交加的：

在理应谴责滔天大罪的这个时刻，我们绝不会……用不适当的和无益的理论来谈论叛乱或者革命……路易斯，你认为我们会把你们在3月10日清晨力图鼓动马塞奥团的行动称为叛乱吗？^①

紧跟着这封信之后，根据其总路线又写了一本小册子，这是在卡斯特罗在狱中的帮助下，由路易斯·孔特·阿圭罗，梅尔瓦·埃尔南德斯（在蒙卡达事件审讯后释放出来）和卡斯特罗在哈瓦那的其他一些支持者撰写的。虽然他们是按照卡斯特罗在圣地亚哥那个自我辩护的演讲提纲写的，而且这本小册子后来还以那种形式出版，但是，感触、情绪、甚至随处可见的词句和引喻，都同1953年12月12日那封信更为相似。这本小册子显然是以那封信为依据的。1964年编印的一种版本却说，因为当时所讲的一切显然没有速写记录可供利用，所以是“点点滴滴地重新写出来”的一篇演讲。

不管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写的，这本著名的小册子是以一篇自我辩护的演讲开始的：“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律师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作为律师，他甚至于连起诉书都不能看到……作为被告，他被关闭在孤零零的牢房里已有七十六天。”^②这篇演讲是非常拘谨的，

① 《驻防军的二十六封信》，第22页。

② 圣地亚哥的帕格莱里博士不准到监狱里去探望卡斯特罗，只有过一次，那时有特别警察局一个军曹在场。

诉诸先例，回顾过去，仿佛在古巴真正有过法律和自由携手并进这种时期似的。因而我们听到了“有古巴悠久传统所承认的”一种权利，也就是说，一个被告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且：

从前，有一个共和国。它有它的宪法、法律、自由权；有总统、国会、法院。人人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和写作的完全自由。当时的政府不能使人民满意，但人民可以更换它而且过不了几天就要更换它了。……当时存在着受到尊重和尊敬的公众舆论：所有关于集体利益的问题都在自由地讨论着……人民中洋溢着热情……人们相信谁也不敢犯下危害他们的民主制度的罪行。人们期望变化、改善、前进……并且把这一切都看为近在眼前。^①

这的确是普里奥时代的一种漫无边际的浪漫主义，在这种浪漫主义的烛照下，使奇瓦斯决不会同意的巴蒂斯塔政权的那种畸形状态，突出地暴露了出来。

卡斯特罗还想把巴蒂斯塔描写成为一个不但是暴君，而且是整个古巴历史上，或者事实上就是拉丁美洲史上的极坏的独裁者。

这是凄惨可怕的现实……有一个叫做巴蒂斯塔的家伙……唆使古巴的圣地亚哥的残暴事件的人……根本就没有心肝……他在政治生涯中，连一分钟也称不上真诚、坦率、正直或高尚……在这几个世纪里，只有一个人用鲜血染污

^①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第 16 页。

了我国历史上的两个不同时代，用他的魔爪残害两代古巴人的肉体……扼住了脖子，那些魔爪是大家熟悉的：那些兽嘴，那些杀人的屠刀，那些皮靴……^①

卡斯特罗使人重新想起 1933 年国民大饭店投降后杀戮军官的情况，以及同年阿塔雷斯要塞投降后杀害布拉斯·埃尔南德斯等人的情况。^② 他说，巴蒂斯塔并不满足于“1933 年 12 月的叛变、1935 年 3 月的罪行和第一次掌权时期积累的四千万比索财产”。^③

革命的号召几乎是不存在的：

我们所说的人民是指受苦受难的广大群众，什么人都对他们许下诺言，但又都欺骗和背叛了他们；他们渴望有一个更加美好、尊严和正义的祖国；他们由于世代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愚弄而渴望正义，渴望一切方面的伟大的英明的变革……^④

演讲中谈到“七十万没有工作的古巴人”^⑤——这是淡季期间失业的约略估计数；谈到五十万农业工人居住在破烂不堪的窝棚里；^⑥ 谈到四十万产业工人和码头工人，

①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第 62 页。

② 同上，第 48 页。

③ 同上，第 49 页。

④ 同上，第 33—34 页。

⑤ 同上，第 34 页。

⑥ 可能是夸大之词，因为 1953 年《人口调查》编制者认为条件真正坏的房屋只有十一万八千幢（《人口调查》，第 212 页）。1953 年农业工人的总数是五十一万零十六人。

他们的养老金被盗用了，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是无法忍受的（也许又是一种过甚其词的说法）。与制造业（不包括制糖业）有关的工人大概有二十七万五千人。加上建筑工人（五万人）和运输工人（七万五千人）总数可能达到四十万人。并不是所有这些人的生活都是无法忍受的，也并不是他们所有的养老金都被盗用了。卡斯特罗还谈到耕地非其所有的十万个小农场主，谈到除荒地外没有一亩良田的二十万农户，谈到三万名工资很低的教师，二万名债台高筑的小商人，一万名年轻的技术人员——这些都是相当准确的估计数。他辩称，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小农场主是缴付地租和在有可能被剥夺租权的情况下生活的，有一半以上的上好耕地是属于外国人的，而在奥连特省，联合果品公司和西印度糖业公司的土地已经把北部和南海岸联成一片了。^①

卡斯特罗指出，为进口糖果而出口食糖，为进口皮鞋而出口牛皮，为进口耕犁而出口生铁的这种现象，在他看来是反常的。他力主有计划地生产钢、纸和化学品，并改进饲料与粮食的生产，以便在干酪、炼乳、酒和油脂方面与欧洲竞争，在罐头食品方面与美国竞争。旅游事业可以带来“一笔巨大的收入”。但是，卡斯特罗说，“资本家却要求工人完全听从他们摆布，国家袖手不管，于是工业化也就束之高阁。”^② 这是卡斯特罗唯一提到“资本主义”

^① 根据1957年道·琼斯的估计，在1957年刚刚超过一百万股的西印度糖业公司，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也有价值三千五百万美元的土地。（《哈瓦那邮报》，1957年5月1日。）

^②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第38页。

的地方,或者实在说,是他唯一使用马克思主义或者阶级斗争的术语的地方。

卡斯特罗也对不完善的学校教育、保健、儿童福利和农村失业发动了总攻击,同时抱怨着有钱人想要多少公道就能买到多少公道,象巴尔扎克的作品中那个著名人物泰勒弗尔一样。他说,古巴可以很宽裕地容纳三倍于现在的人口——市场上应该充满产品……家家的贮藏室都应该堆得满满的,全部人双手都可以勤劳地进行工作。他所认为不能容忍的是,“百分之三十的农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知道古巴历史”——把这两者相提并论,不免有点令人感到稀奇。

一上来就以古巴的法律和有关推翻暴君的正义性的历史论证作为依据,缕述了一系列的法律论点,继而乞灵于孟德斯鸠、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圣·托马斯、路德、梅兰克顿、卡尔文、米尔顿、洛克、卢梭和托马斯·潘恩等权威来为起义作辩护,也提到了英国、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以及1868—1898年的古巴领袖们(阿格拉蒙特、塞斯佩德斯、马塞奥、戈麦斯和马蒂)。其中始终暗示着斗争所起的作用,还引证了马塞奥的话,自由“不能乞求,而是靠利剑来争取”。^①

最后便是辞藻华丽的结论:

至于我自己,我知道监狱对我将比任何人都更残酷无情,狱中的生活充满着威胁和下流卑怯的残忍暴虐,但是我不怕,就象我不怕曾杀害我七十个兄弟的可鄙的暴君的狂怒一

①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第77页。

样。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在1953—1954年冬季，卡斯特罗就这样和他在狱外的朋友在对现政权进行辩才横溢的指控，使用了大量历史和社会的论据，这不仅是攻击了巴蒂斯塔政府，而且有着更为深远的企图，要把一枚定时地雷埋藏在当时所构成的古巴社会的整个结构下面。统计数字虽是漫不经心地搜集起来的却大体正确，而且小册子上所提出的社会要求也主要地反映出卡斯特罗对奥连特省乡间具有一定的了解。其中仍然没有提到种族歧视。老实说，读过《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之后，人们很可能不知道古巴竟然还有黑人。但是，卡斯特罗了解，巴蒂斯塔在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中间是颇得人心的。巴蒂斯塔一贯支持非洲—古巴各式各样的宗教崇拜。他自己那些黑人或黑白混血种人的追随者中，就有几个在蒙卡达事件时因追随一个反对黑人的朋友——巴蒂斯塔的白人领袖而遭到他们的黑人士兵捕手的嘲骂。有一些士兵看到竟然有“黑人革命者”而显得真正出乎意料之外。在蒙卡达遭到警察虐待的一个黑人砌砖匠阿曼多·梅斯特雷被问道：“你是一个革命者，你？你不知道黑人不能作革命者吗？黑人不是盗贼就是巴蒂斯塔的党羽，而不是革命者。”^①当萨里亚中尉和他的部下撞上在睡梦中的卡斯特罗和他的两个追随者时，他们喊道，“他们是白人！”，“白仔”，仿佛就足以证明他们是革命者，而不是农民或工人了。

^① 阿尔梅达致弗朗基函，第18页。

关于这个著名宣言还可以提到另外三点：第一，对美国没有太大的攻击——的确，卡斯特罗谈到“北方的巨人”并不象前五十年古巴大多数民族主义政治家那样激烈；第二，也不象古巴政界中他那些同伴的那种华而不实的宣言那样，这篇演讲包括有大量成套的统计材料；第三，这些统计材料从内容看来大都似乎是得之于古巴共产党总书记布拉斯·罗加所写的《社会主义的基础》这本著名的通俗读物的。

在蒙卡达事件之后，尽管卡斯特罗笔不停挥，巴蒂斯塔却月复一月地改善了自己的地位。街头巷尾的人们自言自语地说，政治帮会活动和贪污受贿情形减少了。劳资关系似乎不错，外汇的形势极佳。偶尔的一次丑闻，可以不加理会，虽则一直没有作出任何解释——例如曾经在教育部同桑切斯·阿朗戈一起工作的一位新闻记者马里奥·福尔图尼的神秘的谋杀案。总之，政治谋杀比革命党时代要少了。12月间，现政权因前总统普里奥以违反1939年美国中立法的名在佛罗里达州被捕而得到了一点刺激。他在缴纳五千美元的罚金而获释后，12月14日又同各式各样的追随者一起被传讯，强捺手印后提付审判。这些事件虽使巴蒂斯塔大为开心，却使美国和反对派的关系更加恶化了。豪尔赫·马尼亚奇给了艾森豪威尔一封公开信，谴责他干涉古巴内政。

但是，在部队中，仇视和阴谋继续不已。人们还记得，德尔里奥·查维亚诺将军曾经将莫拉莱斯少校这个蒙卡达的真正胜利者作为一个谋反者上枷带锁押回哈瓦那。但是，莫拉莱斯成功地把一封信送到巴蒂斯塔的手里，说

明了问题的真象，并且补述了德尔里奥·查维亚诺正在圣地亚哥经营一个大赌窟和进行勒索保护费的活动；他还说，兵营里几乎天天酗酒闹事，查维亚诺从走私中大获其利，并说如果调查下来，这些事件是捏造的，他甘愿当着巴蒂斯塔的面自戕。巴蒂斯塔并确实进行了调查。莫拉莱斯终于得到释放，并且充任了陆军档案局局长，不过对德尔里奥·查维亚诺未加过问；同塔维尼利亚有关的丑闻以及那些得到了优缺和与他接近的官员也都继续留任原职。

其所以然的原因是，塔维尼利亚的长子，青年中尉“西利托”，从总统的一个普通侍从武官，竟然顺利地钻营到当了总统的秘书长，把在巴蒂斯塔流亡期间就担任这个职务多年的劳尔·阿科斯塔·鲁维奥博士外调，去担任古巴驻洪都拉斯的公使。这就导致了军事领导层各式各样的变动和升迁，目的是要进一步把塔维尼利亚树立在一个有权有势的地位上。

1954年1月间，一件麻烦事情发生了：格劳·圣马丁宣布他要在11月的巴蒂斯塔总统选举中作候选人。他自然因为想同新宪法合作而受到批评，甚至受到他亲戚的批评——这种批评丝毫没有因为巴蒂斯塔的“保证”而消除，巴蒂斯塔曾保证在大选后就逐渐恢复旧宪法，开始实施有关地方政府的各条款。^①有关国会的条款将于1955年1月国会再度开会之后实施。全部宪法将于1955年2月20日新总统就职后生效。

^① 格劳有几个支持者离开了他，其中有普里米蒂沃·罗德里格斯、乌戈·阿尔瓦雷斯、埃德加多·布塔里和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马乔。

共产党人是不屑登记参加竞选的那些团体之一。他们号召他们的追随者支持格劳·圣马丁博士，并且后来解释说：

我们对群众说：既然我们必须投票，我们就要投反对专制的和反人民的巴蒂斯塔政府的票。我们公开解释说，格劳拿不出什么解决办法；我们并不是号召投他的票，而是号召投反对巴蒂斯塔的票，虽则投巴蒂斯塔反对票的唯一可能方法……就是在巴蒂斯塔的名字上画一个大叉叉。投反对票的口号〔布拉斯·罗加自尊自大地补充说〕已经在群众中有了深刻的反响。在这个口号下……所有各种倾向的群众和反对派的政党联合起来了……格劳在竞选运动中所召开的大会变成了反对那些召开大会的、反对暴君的、战斗性的群众示威运动。^①

国家就这样面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党的一个奇妙的同盟，而人民党则作壁上观。不管这是不是一个结果，登记赞成格劳的只有二十一万，赞成参加选举的人民党的唯一分裂派只有二万。据称登记赞成巴蒂斯塔的各党派将近一百七十万，^②但是，这在任何方面都不能真正反映出巴蒂斯塔的党羽的情况；在1954年中期，选民总数没有达到二百八十万。

① 布拉斯·罗加：在《人民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讲话》，第35—36页。

② 巴蒂斯塔的进步行动党：九十四万五千五百五十五人
自由党：二十七万九千五百四十二人
民主党：二十五万零一百九十人
急进党：二十一万一千零五十八人

2月间，埃迪的兄弟劳尔·奇瓦斯终于接掌了人民党的领导权，作为一个折中的领袖。卡斯特罗在狱中发出的另一封信（这次是给梅尔瓦·埃尔南德斯的）是应该放在这个背景下来加以评价的。

一刻也不能放弃宣传，因为宣传是一切斗争的灵魂〔他在2月间这样写道〕，我们的宣传必须具有自己的风格，必须适应环境。我们必须继续不断地谴责暗杀。米尔塔〔他的妻子〕将同你谈到一项文件，这项文件就其思想内容和其有力的指控〔也就是“演讲”《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来说，是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在大学大石阶上举行一次游行示威是至关重要的……古斯塔沃·阿尔科斯^①必须同大学生联合会的领袖们谈到这一点。

第二，我们必须协调我们在国内外人们之间的工作。为此要准备……去一趟墨西哥，跟劳尔·马丁内斯〔巴亚莫的领袖〕和莱斯特尔·罗德里格斯会面。^②不管我们为同其他团体协作提出任何建议，都必须十二分慎重，以免他们单纯利用我们的名义，如同帕尔多·利亚达^③一直在干着的那样……最好是只身前往……你坚持战斗到目前在狱中的青年释放出来为止……马蒂说过，懂得怎样等待，乃是成功的主要秘诀。

第三，对每一个人，要尽量以虚情假意和笑脸相迎。按照我们在审讯中的那种做法：保卫我们的观点而不伤害他人。以后我们总会有时机可以把这些蟑螂踩在脚下……接

① 当时没有被捕的蒙卡达战士之一。后来任古巴驻比利时大使，自1966年以后显然处于软禁中。

② 另一位来自圣地亚哥的蒙卡达战士，也是漏网逃出的。

③ 人民党的无线电台作家。

受各种帮助，但是，要记住，不可信任任何一个人。米尔塔已得到指示，要她全心全意地帮助你。^①

不久之后，在 1954 年 4 月 15 日，他写道：

如果我能为国家带来彻底的革命，该会何等高兴……我会把我对那一、两千人的仇恨和恶意铭刻在心，在那些人中，有的是亲戚，有一半是我的朋友，有三分之二是我的同事，有五分之四是我大学时代的老同志……你可曾注意到一个渴望生活与理想一致的人必须断绝多少无形的联系？最使我痛苦的是，想到如果世界上的一切好心人都会响应我们的号召，那么，一切骗子、寄生虫、平庸的人和自私自利者就会立刻一扫而光。^②

卡斯特罗就这样很容易地跟他的同谋者取得联系，信件往来经常不断。他也能够在监狱里广泛阅读经常传入的书籍。他读过《悲惨世界》，虽然这本小说比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相形见绌，但他认为“雨果的词句……使我想起我自己的演讲，它充满了对自由的理想信念，和对暴行的神圣愤怒……”^③

与此同时，普里奥的最积极的老助手、被认为是在流亡中的桑切斯·阿朗戈回到了哈瓦那，随即在哈瓦那的乡村俱乐部区被发现了。在警察的追捕下，他避难于乌拉圭大使馆，同他在一起的有各种追随者，其中大多是过

① 《驻防军的二十六封信》，第 37—38 页。

② 引自默尔书，第 347—348 页。

③ 同上（日期是 1954 年 3 月 1 日）。

去教育部的官员，如卡洛斯·恩里克·阿方索·巴雷拉或吉列尔莫·巴里恩托斯，以及普里奥时代的前交通部长塞尔希奥·梅希亚斯。后来他被允许出国。奥雷利亚诺的追随者的一张名单落到警察手里。简单命名为奥雷利亚诺之友社的那个组织，其规模似乎比原来想象的大，因而使警察陷于罕见的惊慌失措之中达几个月之久。巴蒂斯塔仍是继续小心翼翼地对待他的政敌，因此，在5月间，除了参加过攻打蒙卡达兵营的人，所有的流亡者都获得大赦，但同时，由于“西半球的焦虑”，巴蒂斯塔公布了一项反共的新法令，根据该项法令，任何形式的共产党活动都可以作为开除出例如民政职务、大学和工会的充分理由。但是，这似乎只是在美国企图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上校的政府时，表示与美国团结的一个象征性行动。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了一项更加严重的措施，在军政部中设置了一个与共产党进行“斗争”的特别委员会，镇压共产党活动局。这一措施主要出自美国的主张，所以美国大使阿瑟·加德纳自认为是“镇压共产党活动局的创始者”。^①巴蒂斯塔曾经答应福斯特·杜勒斯“在古巴组织一个有效的机构来对付共产党的活动”。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大约也就在这时与巴蒂斯塔作过一次长谈，并且“得到了不错的印象”。照艾伦·杜勒斯的说法，美国帮助了巴蒂斯塔组织情报机构，虽则这个机构不久就变了质，因为此后两年，打算用于镇压共产党活动局的“大部分款项，始终没有用到原来所指定的用

① 1962年与作者的一次谈话。

途上”。^①

1954年6月，卡斯特罗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终于以小册子的形式问世并在暗中流传。同月，从不见阳光的监狱里写给孔特·阿圭罗的另外两封信中，卡斯特罗进一步解释他终日读书的情况；说他唯一的伴侣就是已经神秘地死去而仍吊在监牢另一边的同监难友的尸体，但是即使如此，他仍以有点过分戏剧性反而未免失去效果的方式说，因为有一道墙把他同这些尸体隔开，所以他是看不见的；在蒙卡达被杀害的七十名俘虏的这件事情重又浮现在心头。他又想起“我们党的广大群众的可爱的和难忘的形象，一直是感人至深和激发热情的……那位伟大领袖（奇瓦斯）的精神的化身”。他一方面赞扬几位人民党的领袖，一方面谴责另一些出卖节操的人民党人，“地主、百万富翁和农民的剥削者”——他们正在一个首要责任就是社会正义的党内作些什么呢？他以越来越辛辣的口吻把革命党同巴蒂斯塔的争吵说成是昨天的强盗和今天的强盗之间的火并。“原则”的重要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如果他们保全他们的原则，大家将会保全自己。从最深厚的腐朽渣滓之中将出现处污泥而不染的、光明正大的救世主。目前，牺牲是我们唯一的责任。”他在监狱里受到了几个月非常苛刻的待遇，但是经过同监难友中一个最富有者恩里克·桑切斯·德尔蒙特的抗议之后，情况改善了，因为后者威胁说，如果不停止这种苛刻待遇，他将停止每月送给省长的贿赂。

^① 莱曼·柯克帕特里克：《真正的中央情报局》（伦敦，1968年），第157页。

卡斯特罗这时变得比以往自由的时候更加声名赫赫了。在1954年大选时，他已经是一个无形的候选人，是一个自由的化身和马蒂的再化身了。在歌唱希望之火并使之复燃和炽烈起来的那些人中，有一位黑白混血种人卡洛斯·普埃夫拉，他在“中途酒家”，在这家位于大教堂广场外面的波希米亚饭店，夜夜以挽歌式的魅力唤起了种种怀念和希望，他的歌曲逐渐闻名于整个古巴：

我的古巴的条条道路，从来没有通往应该通往的去处。

卡斯特罗发现他自己对其他团体的意见越来越多：律师协会他认为太懦弱；学生（大学生联合会）的行为很糟；人民党青年运动本部（马克斯·莱斯尼克和奥马尔·博尔赫斯领导的）曾经谴责卡斯特罗运动是破坏性的；他对于他的妻子米尔塔竟然靠了她的哥哥、内务部次长拉斐尔的情面，从情报部得到一笔年金，不禁勃然大怒（卡斯特罗的婚姻显然已在趋于破裂，他要他的妻子在她丈夫坐牢的时候，顶住她那有权有势和在政治上成功的家族的压力这一指示，无异是一种考验）。

在1954年7月26日，攻打蒙卡达一年之后，内务部长埃尔米达和巴蒂斯塔的另外两位部长加斯东·戈多伊和马里诺·洛佩斯·布兰科前往探望卡斯特罗。埃尔米达说：

卡斯特罗，我想让你知道，我并不是你个人的敌人，我只是履行作为内务部长的任务的一个官吏。你所以呆在这里，

是因为法官而不是我所下的判决。我的任务只是监督监狱的管理，以期始终不负总统的期望……巴蒂斯塔是一个很公正的人，二十年来，我从来没有看到他侮辱过任何人，甚至粗声粗气地讲话。我觉得我自己就不是这样，人们都说我有一点粗暴……少校〔对跟在旁边的一个军官说〕，要敬重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有身份的人。

卡斯特罗默默地听着，然后说：

就我来说，我从来没有把这种斗争看作是私人的争吵，而是看作一种反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斗争。〔他又说〕我已经因你们使我的诚实发生疑问的那篇宣言，而被置于攻势地位。如果一个自命为我的知己的人是现政权的高官显宦之一，而这些官吏竟然违反我的意愿，也不让我知道，而利用这种情况来攻击我的家庭和家族……

这位部长打断他的话头说：

喂，卡斯特罗，我知道犯错误的是拉斐尔，他的行为总是象一个不负责任的孩子一样。^①我以我的荣誉向你保证，我从来没有要激怒你的意思，你所提到的那种意见已经改变了，已经以不同于我所提出的方式公布了。至于你的名字，那能有什么怀疑呢？古巴没有一个人有比你更加明确的立场。不要沉不住气，我在1930年和1931年也是一个政治犯，我在乡村俱乐部多次打算行刺马查多或奥尔蒂斯。你是一个青年人，要沉着，这一切情况都将成为过去。

^① 也就是迪亚斯·巴拉特。

“很好，部长，”卡斯特罗回答说，“我接受您的解释……我承认您一向是很正确的。”^①卡斯特罗的姻兄迪亚斯·巴拉特听到这次访问，激烈批评埃尔米达，抗议同“向部队发动凶暴袭击的主谋者”作这种交谈。这封信公布后，结果是迪亚斯·巴拉特和埃尔米达都不得不辞职。

在1954年仲夏，格劳的竞选事业开始蒸蒸日上。因为这时除了革命党最忠实的普里奥一派，全都支持这个老狐狸。人们开始记起十年前他们怎样教他们的鸚鵡说格劳·圣马丁万岁，就连穷乡僻壤也不例外。人民党再次陷入困难之中。劳尔·奇瓦斯证明他自己比一般所想象的还更无能，竟阻挡不了马克斯·斯特林参加竞选。阿格拉蒙特纠缠于私人争吵，为奥雷利亚诺·桑切斯·阿朗戈“毁坏奇瓦斯死后的声名”，要求同他进行决斗。巴蒂斯塔终于不出大家所料，宣布他本人将竞选总统，而以独立战争时的老将军瓜斯·帕斯克拉的儿子瓜斯·因克兰作为他的副总统。这两个人是四个政府党（进步行动党、自由党、民主党和急进党）所“一致同意的”候选人。他以宣布将发行三亿五千万美元公债资助一项巨大的工程计划而开始他的竞选活动。形势似乎越来越象马查多时代，因为很少人怀疑这笔钱会落入政府成员的手里。

8月14日，巴蒂斯塔以现任总统的身份开始参加竞选，一如向例，由他的忠实的秘书安德烈斯·多明戈暂时接管内阁。同一天，菲德尔·卡斯特罗又从松树岛寄给路易斯·孔特·阿圭罗一封信。口气又不同了——既不

^① 《驻防军的二十六封信》，第49—57页。

同于6月的那几封信，也不同于12月和春季的那些信件。卡斯特罗对革命领导权问题显然作了不少的考虑：

我基本上认为，妨碍〔反对派〕团结一致的 最大障碍之一……就是个人主义、集团的野心……和头头太多……这种〔局面〕使我想起了马蒂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为了联合一切有价值的古巴人所作的种种努力……也许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在古巴历史中，我最为钦慕的并不是那个引以为荣的战斗时刻，而是为了斗争而把古巴人团结起来的那种宏伟的、可歌可泣的事业……我首先必须把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那些人组织起来，结成牢不可破的一束，其中包括那些在流亡的、在狱中的、没有被捕的所有战士在内，他们总共有八十多名，都是同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牺牲的日子有关的。这样一个纪律严明的核心作用十分重大，对于……组成一支干部队伍，以进行社会斗争或起义斗争，将是一支无法估计的力量。从今而后……一个伟大的社会政治运动，不论通过和平的还是革命的途径，都必须依靠进行夺权所必不可少的力量，否则就要冒被击败的危险，象人民党在大选仅仅两个月以前的情形那样。^①

这就看出卡斯特罗已是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人民党人了；他已经在把自己的行为同人民党人的行为作对比了；他将不犯人民党的错误，所以他不会是一个人民党人了。他继续写道：

一个真正的社会运动的统一，其不可或缺的条件是：意识形

^① 《驻防军的二十六封信》，第60页。

态、纪律和领导。这三者都是缺一不可的，但以领导为最重要。我不记得是不是拿破仑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战役中一个不胜任的将领比二十个胜任的将领还更关系重大。在一个运动中，如果每一个人都认为有权同任何人商量就可以发表公开声明，这个运动就组织不起来。如果一个组织，尽是一些无政府主义的人，在采取大家认为最好的途径上遇到了第一个困难就沉不住气，就连车辆都一起毁掉，对于这样一个组织也是谁都不能存任何指望的。组织和宣传工具一定要搞得强而有力，一旦有人试图制造分裂、搞派性、树立山头或起而反对运动，就可以毫不留情地加以粉碎……纲领中必须对国家所面临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作出全面的、具体的、满意的阐释，这样就可以把一个真正新的和进步的任务交给群众。我知道，即使上帝也不能一朝就创造出世界的一切奇迹，但是，从一开始群众一定会领会到奇迹的基础是存在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精力一定不可白白浪费，要改进和统一而不是创造和建立……这是一件人民党所没有碰到过的事情。^①

从另几封信中可以看出，在1954年，拿破仑、朱利叶斯·恺撒（跟西塞罗这个寡头政治的化身完全不同，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和普路塔克的《列传》都铭刻在卡斯特罗的心上。从他在这段时期的写作中所得到的压倒一切的印象，就是他要把自己同世界历史进程视为一体，他是以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词句来说明自己的地位的。

与此同时，巴蒂斯塔正在进行一场不惜工本的竞选

^① 《驻防军的二十六封信》，第60—62页。

运动,其中最为典型的事情就是这样一段逸话,说他怎样在1939年发现了一只受伤的仙鹤,怎样帮助了它,救了它的性命,后来又怎样在他到其他地方之后,那只仙鹤就死了;巴蒂斯塔说,古巴就跟这只仙鹤一样,现在他正在使它起死回生。这个比喻很能投合人心,于是仙鹤万岁的呼声到处引起他的支持者的共鸣。他积聚了各公司和私人支持者所赠给他的大宗款项,根据他自己的青年领袖苏亚雷斯·努涅斯的说法,他个人从竞选中捞到了将近一千二百万美元。共产党继续支持格劳……布拉斯·罗加后来回忆说:“圣地亚哥大会〔1954年10月24日〕是令人难忘的……党恢复了它的合法性,并且同群众成为街头的主人达二十四小时之久……面临着排山倒海而来的否决票的威胁,政府发现自己不得不改变选举章程,要求穆哈尔出面控制群众。”^①但圣地亚哥大会之所以令人难忘,主要是因为格劳露面时,群众高呼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名字。

事实上,政府始终是决心要控制选举委员会的。格劳要求与政府代表有同等代表权。遭到拒绝后,他就要求延期。这也未获允许。于是格劳退出竞选,共产党大为恼火,谴责他屈从于“美国佬帝国主义的压力”。^②巴蒂斯塔谴责格劳“阴谋不轨”,阿格拉蒙特却对他加以赞扬。巴蒂斯塔进而采取最后一招,完全剥夺了共产党员的权利。但是,实际上,大多数共产党员仍能照常进行他们的工作:塞萨尔·埃斯卡兰特就这样继续住在他妻子的

^① 罗加:《人民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讲话》,第35—36页。

^② 《驻防军的二十六封信》,第63页。

托儿所里，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和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依然自由自在。

11月1日，终于举行了大选。巴蒂斯塔在没有人竞选的情况下又当选为总统，参加投票的只有选民的半数，虽则投票在名义上是强制性的。有一些革命党人在众议院和参议院赢得了议席，因而成为立法机构的少数派——在参议院五十四席中占十八席，在众议院一百一十四席中占十六席。据悉格劳本人得到了六分之一的选票，虽则他自己声称不参加。

卡斯特罗对于这次选举没有多大反应，因为他正在同米尔塔闹离婚，又忙于看书，他对选举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一点不加评论。他的主要焦虑是他的儿子不得不同他的岳家迪亚斯·巴拉特那些人住在一起，“让他那天真的小脸蛋听任那些卑鄙的犹太去亲吻……我料想他们会知道，放弃这个孩子，对我来说，无异是要我的命……我一谈到这些问题，就控制不住自己了”。^①

新国会开会了，革命党人也出席了（其中只有两个人接受了格劳的要求，抵制出席）。^② 1955年2月，巴蒂斯塔正式就职，这件大事是以捕杀旧日著名的帮会分子、普里奥的朋友奥尔兰多·莱昂·莱穆斯（下流坯）而告结束的。新内阁产生了，虽然其中的名字并没有什么出人意料之外：萨拉德里加斯任外交部长，豪尔赫·加西亚·蒙特斯（1953—1955年谘询委员会的副手）任总理。奥雷

① 给他妹妹的信，见《驻防军的二十六封信》，第56—57页。

② 《西班牙美洲报道》，1955年2月。这两个人是何塞·米格尔·莫拉莱斯和弗朗西斯科·格劳·阿尔西纳。

略·费尔南德斯·孔切索，自从四十年代任驻美大使（1940—1944年）以来的那张熟面孔，忽然以教育部长的身份出现，在这段间隔期间，他曾任最高法院的法官。一个“新”面孔是老总统的儿子，巴蒂斯塔第一届任期内的哈瓦那市长劳尔·梅诺卡尔任商务部长。内务部由蒙卡达事件以来任不管部部长的圣地亚哥·雷伊接任，这个人为巴蒂斯塔服务，正如他过去为普里奥服务一样，是个机会主义者。国防部长兼警察以外一切武装力量的头头圣地亚哥·贝尔德哈，以前是一个梅诺卡尔派；他原来以医生为业，自1917至1925年任众议员，并于马查多时代末期在拉卡瓦尼亚消磨了好几个月。曾参加普里奥的内阁、旋即辞职、后来曾经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警觉报》的后台的拉蒙·巴斯孔塞洛斯这位新闻记者，投到巴蒂斯塔方面来任交通部长——这是一个声名有点狼籍的政客的一种奇妙的转变，他原来是在马查多时代开始他的外交官生涯的。那位忠实的临时总统安德烈斯·多明戈—莫拉莱斯·德尔卡斯蒂略回任内阁秘书长职。不管部部长包括有巴蒂斯塔的老友、开发委员会主席兼食糖管理局局长阿马德奥·洛佩斯·卡斯特罗和食糖平准局局长豪尔赫·巴罗索。^①

^① 全部名单：总理，豪尔赫·加西亚·蒙特斯；外交部长，萨拉德里加斯；教育，费尔南德斯·孔切索；劳动，苏亚雷斯·里瓦斯；财政，胡斯托·加西亚·赖内里；农业，菲德尔·巴雷托；国防，圣地亚哥·贝尔德哈·内伊拉；卫生，阿曼多·科罗；内务，圣地亚哥·雷伊；司法，卡马乔；商务，劳尔·梅诺卡尔；交通，拉蒙·瓦斯孔塞洛斯；公共工程，尼古拉斯·阿罗约；运输，马里奥·科瓦斯；不管部部长：何塞·帕尔多·希门尼斯，阿马德奥·洛佩斯·卡斯特罗，豪尔赫·巴罗索，胡利亚·埃莉萨·孔苏埃格拉，何塞·佩雷斯·冈萨雷斯；总统的秘书，安德烈斯·多明戈—莫拉莱斯·德尔卡斯蒂略。

立宪政府现在据说是恢复了。巴蒂斯塔对国会说，“我们需要大赦，我们需要和平，”虽则在恐怖主义继续不已的时候，不能有大赦。大学里依然骚动不息，炸弹在全岛各处仍时有发现，不是由卡斯特罗的朋友就是由普里奥的朋友安放的。1955年2月下旬在圣地亚哥的一次炸弹爆炸案之后，圣地亚哥前市长路易斯·卡塞罗被捕了。好象真是团结在劳尔·奇瓦斯背后的人民党人，却不如左派革命党党员那么活跃。3月间，巴蒂斯塔御用国会的几位议员孔拉多·贝克尔这个糖业工人领袖（一个革命党的机会主义分子）偕同也是糖业工会的豪尔赫·克鲁斯和孔拉多·罗德里格斯以及亚历杭德罗·希门尼斯前往迈阿密和普里奥商讨政治局势，并要求他在没有赦免一切政治犯的保证下不要回国。但是在4月间，各方面的意见都越来越赞成大赦了。

巴蒂斯塔认为自己的地位已经十分牢固，经得起这种风波了：胡斯托·卡里略的解放行动党，连同桑切斯·阿朗戈的组织这个唯一同旧政权有联系的、有实力的反对派在1954年年底分崩离析了。在签订了以储备的食糖卖给苏联的一项协定之后，古巴呈现了欣欣向荣的气氛，加上人们又觉得大选已使不稳定时期告了结束。古巴和美国的发起人正在讨论一个计划，搞一条横穿古巴的运河，以缩短古巴和巴拿马运河之间的距离——使船舶省掉“四百哩的弯路”。这项计划被马尼亚奇一类自由党人批评为可能导致美国更大的控制经济，但是经济利益似乎是非常诱人的，并且看上去这个计划将一定能带来一个良机。从基韦斯特到卡德纳斯的联络航线已经通

航，并且功效是立竿见影的。2月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中美洲亲善旅行的行程中前来给现政权祝福，4月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艾伦·杜勒斯前来把他的听诊器安放在古巴的“安全组织”中。他有点神秘地说，美国已被古巴的共产党问题严重地纠缠住了。^①巴蒂斯塔的公共工程计划已经开始，贝达多地方的私人建筑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跃进。以马尼亚奇为首的一个发展宪政的新组织成立了，成员有路易斯·博蒂福尔，鲁福·洛佩斯·弗雷斯克特，胡斯托·卡里略，帕尔多·利亚达和维森特·鲁维拉。1955年3月，卡斯特罗给了孔特·阿圭罗一封信，向民主反对派保证卡斯特罗和他的集团坚持他们的原则。即使如此，在4月中旬，巴蒂斯塔松手了，宣布大赦。全部政治犯于5月出狱。这是巴蒂斯塔在判断上所犯的最大错误。

① 艾伦·杜勒斯的证词。

第五章

公民对话

1955年5月15日，卡斯特罗和他的弟弟连同十八个追随者根据大赦法离开了松树岛。出现了不少家人重新团聚的欢乐场面，卡斯特罗也受到了人民党全国委员会的欢迎。他对《波希米亚》周刊宣称：

我没有……创立一个新政党的打算。我们不放弃我们维护（人民党）并与之合作的计划……我们认为，劳尔·奇瓦斯博士被推选为领袖是一件好事，虽则我们不能说他具有了不起的政治经验……我们大家总得在某种旗帜下团结起来……所有〔人民党人〕都必须参加这个斗争，大家都有同样进步的思想观念。如果有了思想上的一致，我们又为什么需要分裂呢？〔他又说〕这次大赦是在新闻界大张旗鼓的支持下的一次卓越的人民大动员的结果，这个大动员取得了最辉煌的胜利。

卡斯特罗向阿格拉蒙特和劳尔·奇瓦斯解释说，“古巴需要的是正派的政治家……需要进行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改革。”^①

卡斯特罗在同当时《公告》周刊的记者卡洛斯·弗朗

^① 《波希米亚》周刊，1955年5月22日。

基的一次会见中又重申他反对同人民党的任何决裂。他在监狱里的最后几个星期中，一直殚思竭虑于如何使反对派的青年代表(像孔特·阿圭罗这类人)得以在电视上发言和露面。在给孔特·阿圭罗的一封信中，他论证说，基督在就上帝和凯撒的关系上答复法利赛人时，他不得不使自己为这二者之一所不欢迎；“所以今天〔现政权〕正在试图破坏我们在人民间的威望，或把我们丢在监狱里。”^①他似乎殚思竭虑于进一步发动反对巴蒂斯塔的武装行动是否可取这一问题。他引证马蒂的话说：“任何一个促进一场可以避免的战争的人都是罪人；而不促进一场无可避免的内战的人也是罪人。”应该永远拒绝妥协，虽则真正的宪法保证能够使暴力成为不必要的。卡斯特罗早已把他的运动看作是“铜打的泰坦巨人(那就是，马塞奥)的精神上的后代”^②，在温顺柔和的人民党人中间，有什么地方可以容纳他呢？

但是，卡斯特罗同哪一方面相投契呢？甚至同他自己的组织的一些旧成员，比如在他回家的当天去看他的那位1953年攻打巴亚莫的领袖马丁内斯·阿拉拉也不相投契，卡斯特罗还批评了马丁内斯同卡洛斯·普里奥的关系；他同自从他离开大学以来已经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组织，有了他们自己的领袖的那些学生也不相投契。5月20日，大学里正式举行学生大会欢迎卡斯特罗和他的同志们的归来。由两名早已臭名昭著的警长，卡拉塔拉

① 《驻防军的第二十六封信》，第83页。

② 同上，第86页。

上校和埃斯特万·本图拉中尉率领的警察开进了大学。大学的电路被切断了，警察阻止正在著名的大石阶上举行的大会，但是大会仍然继续进行下去。即使如此，学生也并不需要卡斯特罗作为他们的领袖。他们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领袖，例如何塞·安东尼奥·埃切瓦里亚，这是一个将于秋季改选的大学生联合会的最强有力的主席候选人，他虽则也许没有广博的知识和天赋，却是一个稳健的、有魄力的和可尊敬的来自卡德纳斯的青年，被称为“小苹果”。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后来却不得不扮演了一个对他说来并不合适的行动者的角色。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和诚实的人，他的进入大学恰好是或者可以说是导致了大学的政治活动在道德态度上起了一次显著变化的时刻。5月初，他已经卷入了吉特拉斯逝世纪念会的一次骚动中。他和其他四个人曾经在马坦萨斯受伤。大学提了抗议并且停课两天。

卡斯特罗同大学中这些事件并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大学领袖也没有一个是他的追随者，虽则埃切瓦里亚和哈维尔·帕索斯都同人民党有联系。对于埃切瓦里亚，卡斯特罗后来评论说：

他和我确实是一直存在着不少的友谊、了解和同情的。他在果断、热诚和勇气方面都是表现得很突出的一个青年……〔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简直没有进过大学，因为大学生联合会有一些领袖认为历史将会重演，他们将会是，而且也只有他们是未来的一切。他们都自以为是革命的长子。①

① 1964年3月卡斯特罗在马基托斯审判时的演讲。

但是他跟圣地亚哥大学的学生领袖们相处得较好，这批人在个人情感上显然对哈瓦那那些人不抱同情，他们曾一度投靠加西亚·巴尔塞纳，后来又投靠另一、两个小团体。^①这些人，弗兰克·派斯和佩皮托·特伊（奥连特省大学生联合会的主席）曾到哈瓦那去会见卡斯特罗并同他达成了一项谅解。

但是，1955年中期哈瓦那的一般气氛同卡斯特罗是格格不入的。既然把一切都押在行动上，并且，如有必要，押在暴力上，大赦本身以及它所产生的妥协情绪自然是同他不相容的。在人民党人和中产阶级的专业的古巴人中普遍有这样一种情绪，认为同巴蒂斯塔进行谈判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真正唯一有前途的。卡斯特罗在气质上和心理上都是反对这种做法的；他也不能忘记，而且他的追随者们也不会让他忘记在蒙卡达事件后遇害的六十八名俘虏。卡斯特罗甚至同准备鼓动军事行动的一个稳健的天主教行动团体，也不能够合作，因为在任何一个联合运动中，他总想当头头。^②

卡斯特罗出狱后不到两个星期就在《波希米亚》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你扯谎，查维亚诺》，直接攻击两年前在圣地亚哥掌军权的这个上校。^③当时他以死

① 这些是解放行动和民族革命行动的组织。

② 马里奥·列雷纳的手稿，第18页，描述了以卡斯特罗为一方，以列雷纳（以前加西亚·巴尔塞纳的民族革命运动的成员）、安德烈斯·瓦尔德斯皮诺和阿马略·菲亚略（后两人是天主教行动的领导人）为另一方之间的毫无成果的谈判。所有这几个人最后都在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中同卡斯特罗进行合作，但后来流亡海外。

③ 《波希米亚》周刊，1955年5月29日。

十六人对伤一人这种过去战争中向所未有的比例进行了有效的打击。国会议员瓦尔多·佩雷斯·阿尔马格尔，1953年巴蒂斯塔的奥连特省省长，6月初，紧接着在《街道报》上揭发，说德尔里奥·查维亚诺肯定亲自下令处决了在蒙卡达逮捕的三十多名俘虏。卡斯特罗在古巴报界的新后台，《街道报》的编辑路易斯·奥尔兰多·罗德里格斯被捕下狱了（所根据的命令同对1952年以前曾经是卡斯特罗在新闻界的后台的拉蒙·巴斯孔塞洛斯部长所下的那道命令如出一辙）。但是，即便如此，查维亚诺还是调任了，虽则他也在《街道报》上作了回答。一天两天后，出现了一件新的暗杀事件：格劳和普里奥手下的前任总统府秘密警察头子豪尔赫·阿戈斯蒂尼，1952年以来一直在流亡中，因为想钻大赦的空子而回国。他遭到逮捕。他当时不是被立即枪决就是在试图逃跑时被击毙了，大概是属于第一种情况，因后来发现他中了二十一弹，这显然是根据海军情报局局长胡利奥·劳伦特的命令行事的。

大约不到几个星期工夫，卡斯特罗就决定前往墨西哥，在那里组织一个有训练、有纪律的团体，为游击队提供骨干，以图用武力——或照他当时所设想的，用某种新的惊人的打击——推翻巴蒂斯塔。哈瓦那警察或许正在准备对他进行袭击，正如渐渐为众所周知的那样；根据一种说法，已经预备了一辆弹痕累累的小轿车——准备作为发现他的尸体的所在（作为“因开枪拒捕”而被杀，象阿戈斯蒂尼被杀的情况那样）。卡斯特罗去墨西哥的决定，似乎是由他单独作出的，并没有征询过人民党领袖们的意见。他的弟弟劳尔（最近刚以捏造的纵火罪名被

控)实则已先他而去。在卡斯特罗离开哈瓦那之前,他在7月19日召集留在国内的朋友和支持者举行了一次会议,不妨把这次会议看作是后来成为一个同人民党分裂的组织,即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正式成立大会。但是,卡斯特罗暂时还不明确指出他同奇瓦斯的老牌运动的分歧(总之,分歧不是在于意识形态或政治目的方面而是在于方法和策略方面)。

卡斯特罗留在国内的朋友计有,首先是,少数几个蒙卡达的老同志,诸如艾德·桑塔马利亚,佩德罗·米雷特和莱斯特·罗德里格斯,以及如下一、两个朋友,艾德的兄弟阿尔多·桑塔马利亚和阿梅赫拉斯弟兄(他们的长兄胡安·曼努埃尔在蒙卡达袭击事件后已经去世)。但是,这些老同志还是属于少数。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卡斯特罗一些新支持者。这些人不久前还都是加西亚·巴尔塞纳教授的民族革命运动的支持者;他们正在找寻一个具有反巴蒂斯塔的革命思想的新领袖,因为他们发现不再能指望这个教授(他也是由大赦获得释放的)来达到这个目的了。这些人不但包括有圣地亚哥的学生领袖,佩皮托·特伊和弗兰克·佩斯这位浸信教徒的教师(蒙卡达的莱斯特·罗德里格斯将同他在圣地亚哥一起工作),还包括有这样一些人,如福斯蒂诺·佩雷斯——长老会教友的化学家——阿尔曼多·阿特这位曾经为加西亚·巴尔塞纳辩护的法律系学生,和一个波兰移民的儿子恩里克·奥尔图斯基,此人将是直到1959年为止古巴本土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同巴蒂斯塔进行过多年斗争)。这时,有一个新支持者

至少是卡斯特罗的旧相识，这个人就是卡洛斯·弗朗基，他曾于1947年在“卡约·孔菲特斯”远征队里参加过袭击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未遂计划。弗朗基过去是共产党员，也是《公告》周刊的记者，以前是几种反巴蒂斯塔小报的活动分子，这时组织了用复写纸抄写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革命》周刊。^①

虽然阿特和福斯蒂诺·佩雷斯是后来才成为卡斯特罗的主要助手，但是，这时，卡斯特罗最最倚重的却似乎是以特伊和派斯为首的圣地亚哥派，所以卡斯特罗指定派斯为在他本人离国期间、国内一切“行动团体”的头头。^②这主要是因为派斯在加西亚·巴尔塞纳运动的奥连特省小组和他本人的奥连特省革命行动小组的余存下来的人员中已经有了一个组织的轮廓。

在墨西哥，卡斯特罗物色到了一批古巴青年连同一些年龄较大的流亡者。中心之一设在一个美丽的古巴歌手奥尔基德亚·皮诺在佩德雷加尔—德圣安赫尔的家里，这位古巴歌手嫁给了一位著名的墨西哥工程师阿方

^① 弗朗基曾经是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成员，后来为《今日报》工作，这张报纸“在他看来似乎偏离了社会主义路线”。据说，他曾经这样对马里奥·列雷纳说（手稿，第5页），他是因为对共产党的行为和策略产生了总幻灭而脱离共产党的。

^② 留在古巴的七月二十六日委员会的成员计有阿尔多·桑塔马利亚，曼努埃尔·奎托，里卡多·冈萨雷斯，马克西莫·雷耶斯，乌尼维索·桑切斯，阿亚安·罗塞尔，圣地亚哥·列拉，埃弗拉因·阿方索，奥斯瓦尔多·罗德里格斯，艾德·桑塔马利亚，卡洛斯·弗朗基，恩里克·阿特，佩德罗·米雷特，弗兰克·派斯，比尔马·埃斯平，卡洛斯·查因，卡洛斯·伊格莱西亚斯和金廷·皮诺（名单载雷内·拉伊·里维罗：《自由与革命：蒙卡达，“格拉玛号”，马埃斯特腊山》，（1959年），第11—12页）。

索·古铁雷斯。卡斯特罗和他的朋友开始在那里准备他们的下一个行动，并更多地思考他们的一般意识形态。

1955年，墨西哥仍然在革命组织党的统治之下。总统阿道弗·鲁伊斯·科蒂内斯是一个严格的帐房，他在他的前任那位扩张主义的、不知疲倦的、野心勃勃的米格尔·阿莱曼的大手大脚之后，可以说是成功地建立了一个节约的政府。鲁伊斯·科蒂内斯保持了墨西哥在外交事务上的独立，并对法西斯主义或者象佛朗哥的西班牙那样的任何形式的法西斯主义保持了传统的敌视。同流亡的西班牙共和政府仍然保持着外交关系，在墨西哥有很多西班牙流亡者及其家属。共产党在法律保护下蒸蒸日上，虽则在选举上并没有获得胜利的希望。墨西哥城是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的政治辩论以至阴谋活动的一个天然的中心。

卡斯特罗就在这种轻松的气氛里壮大起来了。他的妻子受了她那个巴蒂斯塔派的哥哥的影响，这时已经办妥了离婚手续，所以他现在就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同革命结成良缘了。他和他的朋友早就投靠了象维克托·特拉波特那个雕刻师兼画框匠之类的西班牙共和党人。维克托·特拉波特是卡塔洛尼亚人，他的女儿嫁给了卡斯特罗一个亲密朋友，来自阿特米萨的一个学生、蒙卡达的老战士拉米罗·巴尔德斯。^① 特拉波特的雕刻室变成了七月二十六日运动集会的另一个中心。1955年8月，卡斯特罗把一份给人民党“斗士”的、名为《第一号宣言》的文

^① 后来担任古巴内务部长。

件(由奥尔基德亚的姊妹翁迪纳·皮诺经手,藏在了一本挖空了心的加尔西拉索所著的《印加人史》里面)送回哈瓦那。这个以马蒂和马塞奥的几段语录为序言、大体按照《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调子写成的文件,包括有在“我们进步的”1940年宪法的精神的范围内将要实行的一个十五点改革计划。那个由来已久的无政府主义的梦想——“农民分地”——重又作为第一点出现;公用事业国有化、群众教育和工业化都居于突出的重要地位。但是,卡斯特罗一面保证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将由“决不同过去妥协的新人”来领导,一面却坚持说他仍然是一个人民党人,并且谈到奇瓦斯的地道的原则:“我们决不在党内另立派别;我们是奇瓦斯主义的革命工具。”^①诚然,卡斯特罗的所有亲密追随者表面上似乎仍然一直是人民党人。所以在墨西哥的早期追随者中,有在卡斯特罗来到以前就一直住在那里的费尔南多·桑切斯·阿马亚;有来自哈瓦那的前蒙卡达主义者、机械工程学生兼制图家的佩德洛·米雷特;6月间曾在哈瓦那被警察殴打过的马里亚瑙的人民党前市参议员胡安·曼努埃尔·马克斯。这些早期的菲德尔分子的住处,部分是由“一位长期住在墨西哥的古巴人”按照多少带点军事形式安排的,大家都承认一个户长的领导权。每一幢房子住五到十个人。但是,早在1955年9月,巴蒂斯塔的特工头子奥尔兰多·彼德拉上校就到达了墨西哥,于是开始了一套监视和告密的

^① 《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对古巴人民的第一号宣言》,1955年8月。参看西奥多·德雷珀:《卡斯特罗主义:理论与实践》(伦敦,1965年),第10页;孔特·阿圭罗《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两面派》(墨西哥,1960年),第104—107页。

离奇的猫捕鼠把戏，这套把戏在墨西哥城及其周围持续了一年多。

在古巴国内，现政权的民主芳醇依然香气芬馥。1955年8月11日，普里奥（他也象卡斯特罗一样，获得大赦）鼓足勇气，返回家园。他抱着无限热诚，先去国民大饭店，然后回到他那著名的农庄拉查塔，他那一大批支持者、老朋友和官老爷都望眼欲穿地聚集在那里。这时出现了要同格劳改善关系的呼声。普里奥说，他今后将只通过投票箱来反对巴蒂斯塔。9月，人们发现普里奥正在制订“一项将引起全国注意的纲领”，虽则他说，他自己将不参加任何竞选。10月1日，他在哈瓦那沃德轮船公司码头对面的大广场上向大约五万人的广大听众讲话。他讲话的要点是谴责政府自1952年以来所实行的一切法令都是非法的。接着在圣克拉腊又召开了一次大会，但是，他在团结反对派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虽则他多少使政府有点惶惶不安。“对普里奥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干掉他、绑架他或者把他逐出古巴，”塔维尼利亚将军对巴蒂斯塔说，巴蒂斯塔不以为然地说，“潘乔，这种事情你不懂，你傻啦。”^①

团结反对派最有利的机会就是为此而特地组织起一个新运动，共和国之友协会。这个团体的原动力是八十三岁老人科斯梅·德拉托里恩特，一位历经独立古巴共和国历史上一切动乱的硕果仅存者；也是反西班牙战争的老战士；伍德和埃斯特拉达·帕尔马先后两个政府的硕

^① 何塞·苏亚雷斯·努涅斯：《莫大的罪过》（加拉加斯，1963年），第68页。

果仅存者；梅诺卡尔和门迪埃塔时代的外交部长；古巴驻国际联盟的代表团团长，自从1938年退休以来，一直主持《哈瓦那评论》。10月中旬，他请求会见巴蒂斯塔，试图把他说服之后，再举行大选。但是遭到巴蒂斯塔的拒绝，理由是德拉托里恩特没有资格和地位提出这种要求。德拉托里恩特决定仿照普里奥的办法召开一次群众大会，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其他反对党领袖直到那时为止竟然决定袖手旁观。^①

大会是于11月19日在海滨举行的，目的是要迫使巴蒂斯塔在1956年年内举行新选举。当时除共产党外，所有巴蒂斯塔的反对派都出席了。在阿拉梅达—德保拉和海关之间的空地上挤满了人群。讲台上以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引人注目。除年高德劭的科斯梅先生外，出席的还有新当选为大学生联合会主席的年轻的何塞·安东尼奥·埃切瓦里亚；人民党主席劳尔·奇瓦斯；卡洛斯·普里奥；格劳·圣马丁；律师协会主席米罗·卡多纳博士；电台评论员帕尔多·利亚达；阿马略·菲亚略（急进党）；何塞·安德鲁（民主党）和新成立的共和国之友协会的书记罗赫略·皮纳。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委员会没有参加，还确实劝阻过人民党人参加。这次大会标志了民主反对派历史上的一个顶点。但是，事后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巴蒂斯塔仍然稳坐在总统府里，并且和蔼可亲地对记者说，这种大会对国家很有好处。他拒绝发表在1958年以前举行选举的意见，虽则他又准备同科斯梅先

^① 参看这段时期的一篇出色的文章，载《西班牙美洲报道》，1955年11—12月号。

生会谈。^①

这种重新出现的闲散状态使得圣地亚哥和哈瓦那两地又发生了学生骚动。借口尊敬烈士对警察进行了突击。很多学生被捕，很多人受伤，有的遭到毒打，有的受了酷刑。12月10日，人民党青年联盟主席劳尔·塞万提斯在谢戈-德阿维拉被警察击毙。12月16日，哈瓦那大学校长、儿科专家克莱门特·因克兰，成功地说服了大学生联合会至少暂时停止游行示威，恢复上课。但是以埃切瓦里亚为首的学生领袖们成立了一个新组织：革命指导委员会，旨在团结反巴蒂斯塔斗争的一切有关方面——工人和学生。^②在学生进一步抗议停止之后，几乎紧跟着又有了糖业工人为经济的目的而发出的抗议。若干年来，工资协定曾经载有这样一项条款，即如果食糖的平均价格超过前一年的平均数，就得根据超过额给以津贴。在1955年，食糖价格已是达到工人们可以指望在圣诞节获得一小笔津贴的情况了。但是糖业公会却按每磅美元2.77分的人为价格，把从1956年销售的流通存货中提出的三十五万吨储备糖的份额，一并计算在内。糖业领袖们声称最终价格为五分。

① 《西班牙美洲报道》，1955年12月。丹尼尔·詹姆斯说，共产党企图破坏这次大会。他把后来成为卡斯特罗政府的关键性人物弗拉维奥·布拉沃说成是这一企图的主要人物。关于这一点没有得到其他材料。参看丹尼尔·詹姆斯：《古巴：美洲第一个苏联卫星国》（纽约，1961年），第95页。

② 大学生联合会和革命指导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在《母校》的增刊中（无日期）描述说：“大学生联合会因为它的特殊性质，是一个大学生的组织……革命指导委员会则是由大学生联合会创始、鼓动和建立起来的一个工具……使学生团体在其独特的革命工作方面成为一个有组织的骨干。”

结果,在12月中旬,古巴面临了一次开始于12月26日的五十万工人大罢工。这就使得应在1月1日开始的全部蔗糖收割有陷于瘫痪之虞。共产党人和新成立的革命指导委员会(成员情况迄今尚不得而知)以及若干穆哈尔分子支持这次罢工,至少有一名共产党的罢工者贝尔纳多·卡雷拉斯在帕洛斯被军队用枪托打死。卡斯特罗的组织一些留在古巴的成员也参加进去,为首的是在圣地亚哥参加了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拉斯维利亚斯的糖业工人领袖戴维·萨尔瓦多。^①萨尔瓦多象卡斯特罗的很多早期支持者一样,早已有过一段饱经沧桑的生涯,自1939至1946年曾先后是共产党员、革命党员和人民党员并且是奥雷利亚诺·桑切斯·阿兰戈的三A党的支持者(1952—1955年)。他目前在哈瓦那暂时成为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协调员。

12月30日,巴蒂斯塔最后作出有利于工人的决定。但是,糖业工会有几个干部试图利用这个机会从糖业工人领袖何塞·路易斯·马丁内斯手里夺取工会的领导权,并且间接从穆哈尔手里夺取领导权。在巴蒂斯塔的解决办法公布后,他们拒绝命令各自领导的工人复工,并且企图召开糖业工人全体大会来反对现有的领袖。这些反叛者立刻被解职,马丁内斯以武力接收了他们的办公室。国会中的糖业领袖孔拉多·贝克尔,孔拉多·罗德里格斯和豪尔赫·克鲁斯于是在众议院举行绝食罢工。这次罢工只是由于红衣主教阿特亚加出面干涉,才在

^① 戴维·萨尔瓦多于1923年生于谢戈一德阿维拉,古巴工会总书记(1959—1960年),自1960年起坐牢。

一百六十八小时之后结束。贝克尔并没有恢复其全国糖业工人联合会副总书记的职务，支持他的行动的广播节目也被勒令停止。

面对着这些工业纠纷，巴蒂斯塔终于同意接见科斯梅·德拉托里恩特先生。他在12月29日和1月10日先后接见了两次。在这段期间，圣地亚哥有过几次炸弹爆炸事件，大概是学生或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搞的。有六人受伤。像《海洋日报》和《消息报》这类报纸都谴责这些行动：“一个爱好和平的高贵、宽厚和英勇的民族，在任何时刻、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支持任何一个安放炸弹的不名誉的犯法者……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肃清这种无益的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而且“我们要是容许马蒂式的举动刚刚开始就告失败，那我们就无异使自己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不可饶恕的懦弱行为的同谋犯”。所谓马蒂式的举动就是科斯梅先生提出和解的建议。

巴蒂斯塔这时已是再度当政近四年了。当时，很多人都已经信任他了。他获得了不仅是那位大使而且包括很多北美人的同情。在背街小巷爆炸的几枚炸弹以及卡斯特罗在墨西哥的活动，好象是恶作剧似的冰雹，虽然可恨、费解，却都无关宏旨，而且顷刻就被遗忘了。描写古巴经济发展良好的文章，常常出现在美国报刊上：1955年的旅游事业比历来都好；美国政府的尼卡罗镍厂的三千四百万美元的扩建计划估计已有四分之一完工；1955年的汽车销售额可望比1954年提高百分之二十；1955年12月1日哈瓦那银行票据交换额比前一年的登记数字高达百分之十五；国民收入和全国产量都高出1954年百分

之七。同时，在哈瓦那，建筑业正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气象。1955年，哈瓦那省颁发的私人建筑许可证上升到三千四百份，而1952年是二千三百七十六份。贝达多区很多十九世纪的房屋正在拆毁，代之而起的摩天楼，如福克萨公寓大厦和哈瓦那一希尔顿大厦都在兴建中。哈瓦那正在逐渐改观。另一个新的建筑中心是在哈瓦那南面腹地的共和国广场，政府有些部正从老城迁移到那里。象加普里和里维拉这些更加富丽堂皇的旅馆已在设计中。赌博也别开生面，很多赌场纷纷开业。现在色情电影也可以在上海电影院看到了。《哈瓦那邮报》把古巴描写为正在力争获得“拉丁美洲的拉斯维加斯^①”的荣衔。1956年初，旧国民大饭店开设了一个赌场。厄撒·基特，莫里斯·谢瓦利埃，莉娜·霍恩和纳特·金·科尔不断出现于哈瓦那的酒吧间和夜总会中。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兴致勃勃地往来于总统府和哥伦比亚兵营之间，有时到他的旧庄园库基内去，并在诸王节分发一些玩具，如果他断定他的地位坚如磐石，他的皇冠稳稳地戴在头上，那倒是可以原谅的。“哈瓦那的前途真象神话般的，”从拉斯维加斯来到国民大饭店经营一个新赌场的赌场大王威尔伯·克拉克这样说。

巴蒂斯塔在1月10日会见科斯梅先生时，他建议今后一切谈判应由代表两方的两个小组进行：科斯梅先生同意考虑这一点，但是，正如巴蒂斯塔或许会揣测到的情形那样，科斯梅花了很多时间去征询每一个他想征询

^① 拉斯维加斯，美国内华达州一个城市，以充满玩乐、赌博场而著名。
——译者

意见的人。很多人劝告科斯梅先生说，巴蒂斯塔是在设法拖延，到头来他是不会作出任何真正的让步的，而且肯定会拒绝在1956年举行任何选举。由学生领袖埃切瓦里亚建立的、代表新反对派力量的革命指导委员会，在它的第一次宣言中，对举行一次真正对话的政治可能性表示怀疑。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以更加激烈的言词表示了同样的怀疑。但最有说服力的却是作家（前ABC党的成员）豪尔赫·马尼亚奇，他力主进行对话；终于在1956年1月底成立了一个代表各方的委员会。巴蒂斯塔方面的人选是哈瓦那市长波索，参议院议长安塞尔莫·阿列格罗和几位部长（洛佩斯·卡斯特罗，戈多伊，阿尔瓦雷斯和雷伊）。科斯梅先生的人选则是三个左派革命党人（托尼·巴罗纳，费利克斯·兰西斯，巴勃罗·巴尔武埃纳）和三个格劳派（爱德华多·苏亚雷斯·里瓦斯，安东尼奥·兰西斯和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包萨）。人民党是曼努埃尔·比斯维，佩拉约·奎尔沃和爱德华多·科罗纳博士。其他则包括民族运动委员会（《世界报》编辑路易斯·博蒂福尔，何塞·帕尔多·利亚达和恩里克·韦尔塔斯医师）以及无定形的民主党派的各种成员（林肯·罗东，卡洛斯·佩莱斯和维尔弗雷多·菲格拉斯）。

会议在3月间开始。

这次公民对话无异是古巴中产阶级民主的最后希望。但是，巴蒂斯塔清楚地觉得他自己已非常强大而无须作出任何让步。代表美国实业界态度的《哈瓦那邮报》，在纵观巴蒂斯塔第二次当政四年之后，提到帮会活动的绝迹时说，“整个说来，巴蒂斯塔政府值得称赞的不一

而足。”^①但是支持现政权的，不仅是美国方面，所有的“可尊敬的”古巴人，凡是订阅《海洋日报》的人，都谴责学生的政治斗争精神（“把一切事情搞得一团糟的就是大学”）。不能接受反对党所提出的在1956年举行选举的主张，在1958年11月以前，不能有任何举动。^②3月11日，在一次无线电广播和电视演讲中，巴蒂斯塔公开嘲笑科斯梅先生的要求是荒唐的，所以科斯梅先生在12日提出停止一切谈判。怀疑和悲观的情绪再度笼罩了政治舞台。卡斯特罗聪明地乘机从墨西哥发出一项新声明，表示从此同人民党一刀两断。这篇声明一开始就对“这个政客的背信弃义”，“这个无能者的阴谋诡计”，“这个庸人的猜疑嫉妒”，“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胆小懦弱”发出一系列的辱骂。在这一片辱骂声中，可以看出卡斯特罗在支持1940年宪法的伪装下，一直想打破正常民主政治的束缚。尽管他仍是拚命抓住埃迪·奇瓦斯这个先辈的形象。他虽然同人民党领袖们决裂了，却没有同“奇瓦斯主义的群众”决裂。他说他的运动是“卑贱者所有，卑贱者所享，卑贱者所治的革命组织……是希望工人阶级获得新生”。他说，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是对亲密的群众发出热情的邀请，毫无任何党派偏见，真诚欢迎古巴的一切革命者。

他的举动也是特别警察突然恢复酷刑和残暴行为所促成的。在2月间，有三起警察暴行的事件，第一起是人民党的一个二十三岁的学生党员埃维利达·冈萨雷斯

^① 该报社论，1956年3月19日，第4版。

^② 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被出卖了的古巴》（纽约，1962年），第35页上说，因为反对派要求政府立刻辞职，所以没有达成任何决议。

(卡斯特罗的朋友孔特·阿圭罗的秘书)事件；第二起是左派革命党青年组织的成员安东尼奥·洛佩斯·卡梅霍事件；第三起是何塞·卡瓦利奥·加西亚在拉斯维利亚斯遭到毒打的事件。所有这些人被警察局的特务施加酷刑，以逼取情报，即关于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同人民党的关系这个有趣的问题。巴蒂斯塔的警察恢复这种暴行留下了一个污点，巴蒂斯塔所作的要对滥施酷刑者予以查实的“亲口保证”也不了了之；这使人认为，他已是控制不住警察了，他们想要怎样干，就可以怎样干。

第 六 章

卡斯特罗在墨西哥

卡斯特罗在墨西哥的运动自从上年夏季在那里暂时奠定基础以来，已经有了许多起伏。其中存在着财政问题。1955年秋季，卡斯特罗前往迈阿密和纽约去寻求赞助人，但是，他的收入的唯一大来源不外是前总统普里奥，普里奥一直急想插手一切反对派的活动。9月底，卡斯特罗在尤卡坦半岛的梅里达会见了普里奥当政时的前开发银行行长胡斯托·卡里略。正如卡斯特罗一定知道的那样，卡里略这时正同一批左翼军官一起力图以政变的手段推翻巴蒂斯塔。卡斯特罗提出要求，在巴蒂斯塔失败后，如果卡里略获得成功的话，让他担任哈瓦那市长。卡里略却另外许给他“一个你可以使出你全部精力，发挥高度有效的作用，使你成为你这一代一个有益的代表人物的职务”。

在这一时期中，其他肯出钱的同情者有象罗慕洛·贝坦科尔特这类委内瑞拉流亡者和一些墨西哥人。卡斯特罗还在美国通过通常由人民党流亡者组织的大会发出呼吁，募了一些款项。他指派了胡安·曼努埃尔·马克斯作为驻迈阿密的代表，并且从迈阿密带回一位叫作米格尔·桑切斯的人作为军事教官，此人虽是古巴人，但因曾参加美国军队在朝鲜作过战，所以被称为朝鲜佬。另一

个军事教官是老古巴籍西班牙人，阿尔维托·巴约。

巴约生于古巴，父亲是一个西班牙军官，母亲是卡马圭省人，最初参加西班牙陆军，继又参加空军，内战中站在西班牙共和国一边，1936年夏季，曾经率领进攻马利奥尔卡岛的名声赫赫但未成功的远征，后来他在卡斯蒂利亚领导游击战。他是一个有着各种经验的人，他既打过内战，也曾在摩洛哥战争中作过战；他在西班牙创办了第一个民用航空学校，关于他所作的一切，他都编写成书，且不谈小说、诗篇和技术手册。巴约所以给卡斯特罗以很好的印象，也许正是由于他对世界和以往斗争具有这样大量知识的缘故。过去他是一个共济会会员和社会主义者，并曾被一个有偏见的移民局官员拒绝进入伦敦。由于这个以及在西班牙内战过程中的其他事件，他对英国在当代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经养成了一种不无道理的敌视的和偏见很深的看法。虽然他是作为一个右翼的社会主义者而开始参加西班牙战争的，最后却成为内格林的支持者之一，这部分是因为他在他最悲观的时期曾经担任了普列托的副官。后来，他在墨西哥，当了陆军航空学校的校长和西班牙民主之家的主席，他坚定不移地接受了人民阵线的路线，在前十五年中，至少曾一度把西班牙青年共产党员训练成游击战士送回西班牙去。西班牙战争使很多人相信共产党人比别人更加坚决、更加勇敢，巴约就是其中之一；^①但是，他并非单单为共

^① “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我却佩服他们，我还认为他们是值得佩服的人。”（阿尔维托·巴约：《我在马利奥尔卡岛登陆》（墨西哥，1944年））

产党训练，因为他也帮助训练了一批反对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查家族的反共战士。

1955年秋季，巴约、朝鲜佬和一个名叫何塞·史密斯的古巴人开始在墨西哥城的郊区圣菲一个射击场拉斯瓜米塔斯为卡斯特罗的人进行初步军事训练。卡斯特罗试图建立军事纪律，将房子裡的新兵置于一个司令员的指挥下。但是，后来由于这个团体中的若干人(坎迪多·冈萨雷斯，蒙塔内、马克西莫·塞拉亚)因非法持枪被捕并押进波西托监狱，饱尝墨西哥监狱中已成为常态的残酷虐待，而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墨西哥和巴蒂斯塔的警察在这个行动上或许是合作的。至少有一次想结果卡斯特罗的性命，无疑这是一个巴蒂斯塔的特务按照马格里尼亚特份子谋害梅利亚的方式干的。卡斯特罗设在洛马斯德查普尔特佩克那个颇舒适的郊区，即马德里山街的一个武器库被查抄了。在这件事发生之后，卡斯特罗决定找一个比较偏远的场所供训练之用，于是在墨西哥城外二十哩的查尔科区的圣罗莎农场上建立了一个新基地，圣罗莎农场是基于错误的估计从一个里维拉先生(潘乔·比利亚的部队的一个幸存者)那里借来的。在这里开始了甚至更加严格的生活。护照一律没收。受训人员除了特定的时间不准离开农场。性生活受到控制。寄往古巴的信件被限制在最小限度。巴约成功地说服了卡斯特罗放弃阵地战而采取游击战——这是卡斯特罗一上来就反对的一种意见。禁止同素不认识的人谈话。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人成批地离开了圣罗莎农场。在初期，开始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虽则政治教育

似乎也只是由团体中的一些著名成员，如产业记录员埃莱克特罗·佩德罗萨博士，费尔南多·桑切斯·塔马约，乌尼维索·桑切斯或安东尼奥·洛佩斯等来领导进行讨论而已。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有高深的或有条理的政治思想。在另一方面，巴约却谈了不少关于西班牙战争的故事，使青年革命者的头脑里充满了对过去的悲剧和背叛行为的壮烈回忆。

在1955年秋季，卡斯特罗对于他这支小小的部队究竟为什么而奋斗，仍然是经验主义的。例如，他似乎同当时在墨西哥的一些古巴共产党员，如华金·奥尔多基，拉萨罗·培尼亚和布拉斯·罗加谈过话。但是一次谈话并不是一次转变。攻打过蒙卡达的他那些追随者，如马里奥·达尔毛、卡利斯托·加西亚和“尼科”·洛佩斯等也一直流亡在危地马拉，其中有一些曾经在那里同革命政府一起工作到它在1953年中期被推翻为止。所以当他们的到达墨西哥时，又对美国怀着新憎恨和也许是新敌意。从最终所发生的事情这一点来看，更加重要的是在1955年后期卡斯特罗同埃内斯托·格瓦拉的会晤，格瓦拉被称为“切”·格瓦拉^①，阿根廷人，当时二十六岁，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医科毕业生。^②

格瓦拉出生于阿根廷的第二大城市罗萨里奥一个

① “切”(che)在阿根廷是“你”的通称或爱称，他似乎是从二十多岁在危地马拉时就开始被这样称呼了。

② 在1967年，卡斯特罗说他在“1955年7、8月间”会见格瓦拉的(《格拉玛报》，星期增刊，1967年10月29日)，但这也许说得较早一些。参看里卡多·罗约：《切·格瓦拉，一个朋友的传记》(巴黎，1969年)，第66页，据该书的说法会晤是在11月下旬。格瓦拉生于1927年7月14日。

资产阶级家庭。他父亲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一度在科尔多瓦附近的阿尔塔格拉西亚经营一个马黛茶园，他和他的妻子塞莉亚·德拉塞尔纳(茶园为她所有)都是左翼政治的活跃分子。他父亲因母系的关系而有爱尔兰血统，而他自己的母亲则原籍是西班牙人。他的家族虽信奉天主教，但不大上礼拜堂，不过他的姊妹都行过按手礼。格瓦拉的父亲参加过反庇隆的阴谋，也帮助过巴拉圭的革命党。因为小时候患气喘病，这个儿子迟迟没有上学，而由他的母亲和他的四个兄弟姊妹给以部分教育。这激励他去进一步学习，他起初学的是机械工程。1944年，全家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但在经济上显然已走下坡了。

作为一个机械系的学生进入大学之后，格瓦拉又改学医科。在讣闻上说他“对波德莱尔^①和体育的兴趣陶冶了他的心身”。象波德莱尔一样，他不懂音乐。他曾一度作为萨尔瓦多·皮萨尼博士的助手，皮萨尼是阿根廷的心脏专家，专门研究过敏症，格瓦拉曾同他合作写过一、两篇科学论文。在学生时代，他曾骑脚踏车和徒步在阿根廷、秘鲁和智利游历过不少地方，还到过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他似乎同阿根廷共产党没有任何联系，^②但是，他的政治兴趣似乎是由他在南美各地的见闻所唤起

① 法国颓废派诗人(1821年—1867年)。——译者

② 他青年时的一个朋友，费尔南多·巴拉尔在1946年参加了阿根廷共产主义青年团，但是巴拉尔在《格拉玛报》(每周版，1967年10月29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上说，他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没有再见过格瓦拉。巴拉尔和格瓦拉一度都爱慕过格瓦拉的表姊妹内格里塔·科尔多瓦，她的父亲是一个同路人诗人。

的。他也有几个西班牙朋友，他们的父亲都是在西班牙内战中遭到放逐或被杀害的。这些有政治觉悟的西班牙子弟在讨论拉丁美洲的政治经验时所起的作用是不能给以过高的估计的。他一度同科尔多瓦一个有钱的姑娘订婚，但在1953年3月毕业后，他又开始带了大批书籍去旅行。他最初决定在布兰科角一家委内瑞拉痲疯病医院工作，他有一个学友已经在那里打下了基础，后来又听从了一位厄瓜多尔律师里卡多·罗约的劝告，认为“危地马拉”因为有一个革命政府，“是一个值得去看一看的 地方”。中途他在秘鲁被捕了，后来在厄瓜多尔和巴拿马勾留一段时间，在那里写了一些准考古学的文章，充作去危地马拉的旅费。

在危地马拉，格瓦拉曾到一个丛林地带去担任热带病的志愿医生，但不能很快就取得资格。他住在危地马拉城，靠“在四乡出卖东西”过活。^①他遇到了安东尼奥·（尼科）·洛佩斯，后者原是卡斯特的蒙卡达支持者之一，当时在流亡中。但是不久，危地马拉政府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危地马拉的一些右翼官员的共谋而被推翻。格瓦拉避难于阿根廷大使馆，争取被送往“前线”，但告失败；不过他显然担任过防空的值勤人员，并曾试图鼓舞危地马拉人起来战斗，根据他本人的记述，他“救过伤亡人员并输送过武器”。他终于靠了阿根廷大使馆的帮助，离开危地马拉前往墨西哥。

格瓦拉由于他在危地马拉的经历而对美国这个危地

^① 录自他的第一个妻子写的讣闻，载《格拉玛报》，1967年10月29日。

马拉的最后毁灭者产生了无限的敌意。他没有去过美国，但是，从那时起，他对于任何一个只在美国住过一段时期的人，都是抱怀疑的态度的。^①

在墨西哥城，格瓦拉同他在途中碰到的另一个危地马拉的流亡者，“跛子”胡利奥·卡塞雷斯一起作过街头摄影师。或许是靠了隆巴多·托莱达诺的力量，格瓦拉在墨西哥城的医院过敏症病室里找到了一个工作：他还在大学里讲过一些课。后来，他靠了孔塞普西翁·帕拉西奥斯博士的推荐，又到心脏学研究所去工作。

在1955年后期，格瓦拉是一个革命者，但不一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马克思主义能简单地理解为生产手段的变革是政治变革的根源这样一种观点的话。在另一方面，他相信人类是可以变得十全十美的，他藐视唯利是图的动机，他认为这能够很快地予以根除。根据他在危地马拉碰到的一位叫做马里奥·达尔毛的古巴人的说法，他已经“阅读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全部著作，并且随身带着一整套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他是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②，在他的妻子伊尔达·加德亚（一个秘鲁人和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成员，他把她留在利马）看来，他

① 但是，七年后，他显然承认了“我们必须认为最接近[于]未来社会的、最似人类雏型的人，(就是)北美洲人……这是发达的经济、现代技术和富裕的产物……在今天，一个古巴人、越南人或阿尔及利亚人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方面，是不如一个美国佬的。我们的人都是经济工作的孩子。但是这个真相应该说出来吗？”[卡萨利斯，《共和国报》(加拉加斯)，1966年2月]

② 马里奥·达尔毛，《格拉玛报》，1967年10月29日。关于这些书的传说，在格瓦拉被捕时，《波希米亚》周刊，1956年7月曾登载一些故事予以证实。

似乎是一个清教徒式的、聪明而讲求实际的人，一个经历过一次革命及懂得其失败的道理的人，即革命的失败是由于政府未能摧毁军队，和由于美国从外面进行干涉的缘故。他已经深信革命有这样一种净化作用，认为（如他后来所说的）“革命能够涤净人，改造人，正如试验农场的农场主改正植物的缺陷一样”。^① 另一方面，在几年后，他已能够区分自己是一个托洛斯基分子还是一个前庇隆主义者了。虽则这是在他即将开始利用古巴共产党人的时候，但他可能是说实话的。关于他的性格，也许可以从他那暧昧的家庭中得到解释。在他的家庭里，既有极左的情绪，又有高级资产阶级的生活，这是拉丁美洲各国一种常见的现象，这种现象必定给生长于其中的人以很大的刺激；此外，这个家庭，虽则是资产阶级的，却已日趋没落，而格瓦拉的母亲又显然比父亲具有更大的影响。

1955年11月，格瓦拉会见了卡斯特罗，这两个人有一天晚上，在洛马斯德查普尔特佩克一个古巴流亡者玛丽亚·安东尼娅·冈萨雷斯·德帕洛马的家里，作了一次长谈，从那里，在破晓的几个小时中，可以看到波波加德伯特尔山。^② 格瓦拉也许把卡斯特罗看作是他在流浪中所访求的那样一位具有“伟大领袖”特点的人。1962

^①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革命战争随笔》（哈瓦那，1963年，译自法文），第124页。

^② 在1965年他写给卡斯特罗的一封信中，格瓦拉回忆到这次会晤：“这时，我想起了很多事情——想起我在玛丽亚·安东尼娅的家里会到你，你建议我来的时候，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准备工作上。”（卡斯特罗的演讲，1965年10月3日，伦敦，古巴大使馆，《新闻公报》，第97号，第13页。）会见地点是安帕兰街49号。

年，格瓦拉说他自己从一开始就象一个敢于为高贵事业冒万死之险的传奇的冒险家那样被卡斯特罗所吸引住了。他加入了卡斯特罗的部队，作为一个医生兼游击战士。他就这样在圣罗莎农场获得非常的成就，在巴约上校的学生之中，他是最聪明的一个，^① 虽则就一种正统的意义来说，他显然是一贯反对军队的。^②

或许是在这种新友谊的影响下，卡斯特罗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55年12月25日的《波希米亚》周刊上。这篇文章再一次批评了那些在古巴“一点也不”反对巴蒂斯塔的人，谴责革命党人，并声明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处污泥而不染的。“反对文文雅雅”似乎是他的战斗口号（虽则相反地这正是巴蒂斯塔和科斯梅·德拉托里恩特似乎有可能进行谈判的时机）。2月间，哈瓦那紧急法庭正式下令逮捕卡斯特罗。但是，卡斯特罗直等到公民对话彻底失败之后，才在3月19日写了脱离人民党的公开文告。他还宣布成立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作为脱离人民党的一个独立组织，正如他实际上一贯的情形那样；并谴责公民对话是有利于巴蒂斯塔的。他说，他自己的目标依然不变：“对于奇瓦斯主义的群众来说，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和人民党并无不同。”

似乎很难说卡斯特罗已经决定了一旦取得政权，他

① “格瓦拉由于他的博览群书和专心致志于学习和观察，所以超过了其他所有的人。”阿尔维托·巴约：《我对古巴革命的贡献》（哈瓦那，1960年），第76页。

② 参看1963年他在瓜亚纳卡比维斯的一个拘留营中对新闻记者卡萨利斯所说的：“不，不，不是一！二！三！四！军事纪律使我作呕。”（《共和国报》，加拉加斯，1966年2月。）

将遵循什么路线，因为夺取政权看上去还遥遥无期。在1956年，他起初只不过是很多古巴流亡者和反对党派的领袖之一，即使他比较年轻，比较有决心，比较乐观和的确在政治上比别人更加机敏。甚至在圣罗莎农场上的游击战术和军事训练，主要也是根据西班牙的经验，而不是根据中国的经验。格瓦拉后来说，他和他的朋友只是在到达马埃斯特腊山之后，才知道毛的论游击战的书，并且后来在游击战方面，他是尊巴约为“师”的。至于卡斯特罗本人，一位古巴老流亡者特雷莎·卡苏索后来在快要争吵的时候，把他说成是一个墨西哥囚犯营的犯人。

卡斯特罗声明脱离人民党的信件，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影响，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他的阴谋者都在活动中。在1956年上半年，为打倒巴蒂斯塔，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部分是来自古巴本身的，部分是来自邻近的独裁政权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在多米尼加，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这位高高在上的施主依然残暴地统治着，一如二十五年来所作所为。

古多关系从来不是很好的，至少自从1947年流产的卡约·孔菲特斯远征以来是如此。巴蒂斯塔力图使自己同他的同辈独裁者有所区别。而他们中间也的确有一道鸿沟，巴蒂斯塔显然是一个想永远受人爱戴的独裁者，是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特鲁希略却不在乎人们是否畏敬他。巴蒂斯塔与其说是一个折磨人的人，倒不如说是一个受他所不能控制的残暴之徒包围的懦弱无能的人。两国政府间关系的恶化，因1月间一个多米尼加民主党流亡者“皮皮”·埃尔南德斯在哈瓦那被谋杀而变本加

厉害了。此人当时是贝达多区正在建筑中的哈瓦那一希尔顿大厦的监工，他看来显然是被特鲁希略的特务所谋杀的，但几天之后，早先同四十年代的“行动团体”有联系的几名帮会分子被牵连进去了。其中最重要的是纳塞尔和比索索所领导的那个小组，纳塞尔曾经袭击加拿大皇家银行，比索索是一个因开枪拒捕而被击毙的抢劫犯。2月，相反的说法开始把巴蒂斯塔的参谋长和老朋友塔维尼利亚牵连进反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阴谋中，到了3月间，人民党的首脑佩拉约·奎尔沃又指控古巴的其他陆军领导人拿了特鲁希略的钱，支持阴谋反对政府的活动。3月12日，特鲁希略犯下了最大的一个罪行——绑架和终于谋杀西班牙内战时巴斯克民族主义者的领袖、后来在圣多明各和纽约担任教授的赫苏斯·加林德斯。加林德斯是在准备发表一篇攻击特鲁希略的权威性文章时，在纽约被绑架后，随即用飞机送往圣多明各的，飞机驾驶员显然是一个年轻的美国人杰拉尔德·墨菲，墨菲象卡利斯托·桑切斯之流那样，是古巴形形色色反巴蒂斯塔联盟的头头的一个朋友。^①这件可耻事件的真相，始终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古巴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之间有各式各样的照会往来，有战争的谣传，也有向美洲国家组织提出的控诉，而特别警察则一时心血来潮，试图把政府的一切众所周知的政敌，至少是右翼或帮会的那些人都一网打尽。

特别警察方面的这种神经质，因3月18日马斯费雷

^① 关于加林德斯一案，参看奥尔内斯：《加勒比人的小暴君》；关于博什，加林德斯和巴萨尔杜亚对加林德斯的贡献，参看佩德罗·德巴萨尔杜亚：《赫苏斯·德加林德斯》（？1960年）。

尔的《古巴时代》杂志上登载了一篇有关波利卡波·索莱尔所领导的阴谋活动的报道而得到进一步的鼓舞，索莱尔是革命党的帮会分子，自1952年以来一直侨居在圣多明各。被捕的人中有，前市参议员坎迪多·德拉托雷；公共汽车工人领袖伊里戈延；前革命党议员梅内拉奥·莫拉；学生领袖埃切瓦里亚以及象卡洛斯·古铁雷斯·梅诺约、丹尼尔·马丁和伊格纳西奥·冈萨雷斯这样几个西班牙流亡者。特别警察也打算捉拿象著名的外国佬那样几个政治帮会分子。3月20日，跟这些阴谋者有牵连的其他一批人也被捕了，例如那个非常愚蠢地回到古巴来的、普里奥时代担任国民彩票主持人的阿蒂加斯上校；普里奥手下的特务头子欧费米奥·费尔南德斯和前国会议员埃斯特瓦·罗拉等。

在这几次大逮捕之后，由驻华盛顿武官拉蒙·巴尔金上校所领导的一批被称为纯贞派^①的知识青年军官，决定进行一次有准备的反巴蒂斯塔的长期罢工。这些人虽然是反对巴蒂斯塔和巴蒂斯塔的军官新编制，但是资格不够深，没有在普里奥时代军队的普遍清洗中吃过苦头。这些人都是在1933年革命以后很久才入伍的，都是真正的职业军人，所以都没有从那个时代得出恨或忠的教训。在3月10日以前，纯贞派中有些人已同人民党有了密切的联系。普里奥的确怕他们，所以小心翼翼地把他们调离中央指挥部（任命巴尔金去华盛顿的，正是他），从而帮着为巴蒂斯塔开了一条更为方便的路。从那时起，

^① 这个名字（在西班牙是雪茄烟的意思，在古巴是纯洁而又纯洁的意思）是格劳给他们起的一个轻蔑之称，并且就此沿用下来。

纯贞派就一直同加西亚·巴尔塞纳和人民党保持着接触。1955年4月,巴尔金和指挥古巴坦克兵团的曼努埃尔·巴雷拉·卡斯特罗成为很多年轻军官的领袖,在这些军官中,著名的有博尔旺内特少校和何塞·奥里乌埃拉少校。阴谋者打算以人民党武装暴动的方式夺取哥伦比亚兵营的指挥权。他们不打算结果巴蒂斯塔的性命,而打算把他送上一架飞往美国的飞机。但是在1956年4月3日他们被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出卖了,这个人就是当时任拉卡瓦尼亚要塞司令的一个军官,于是,他们以及同他们只有泛泛联系的其他大批军官都被捕了。

这次政变虽未成功,却标志着巴蒂斯塔政权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另一批军官已经以坦克手为代号而组织起来了,这批人想要把古巴从甚至在巴蒂斯塔统治下的那种跛行的民主制,改成为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所盛行的那种更加暴戾的极权制。这些就是策划3月10日政变但是并没有从中捞到任何好处的那些人。在同特鲁希略的军队联系后,他们想迫使巴蒂斯塔进行一次极权主义的革命,不然就要他把权力交给他们。他们也同埃内斯特·德拉费和参议员罗兰多·马斯费雷尔取得了联系,马斯费雷尔是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前首脑,现在则是圣地亚哥一支私人军队猛虎队的头头,这支军队是为了执行他那最为想入非非的想法而进行训练的(虽则训练得很不充分)。坦克手的计划是要煽动混乱(甚至于帮助象他们所痛恨的卡斯特的这类团体),以便证明他们的政变和他们的取消宪政是有道理的。巴蒂斯塔势必要末作傀儡,要末离开。所以坦克手在1956年初期把特鲁希略的

大量武器散布于古巴，而实际上不管谁拿到什么（有些落在左派革命党人手里，有些落在卡斯特罗主义者手里），而坦克手自己却把持着坦克车。但是，纯贞派的阴谋的失败，不但暴露出古巴军官的分裂是多么严重，而且把权力交给了塔维尼利亚分子，使得巴蒂斯塔实际上在后来两年成为他们的俘虏。坦克手也许还帮助了外国佬，使他掌握到一批新武器库。但是他们显然既低估了巴蒂斯塔在士兵中的威望，也低估了这个独裁者的政治诡计。

这时，在古巴那些醉心枪炮但有爱国心和社会意识的头头的无数小团体中，有一个以野心勃勃但无关重要的革命党人雷诺尔·加西亚为中心的小组，急想对政府发动一次进攻。随后发生的情况很难分清皂白。巴蒂斯塔显然给加西亚布置了一个陷阱，以便遏制坦克手。而加西亚却听信了只要他一到马坦萨斯的戈伊库里亚兵营，士兵就会投奔到他这方面来的说法。他同大约一百人坐车到那里，但是，他和另外九个人被杀，许多人受伤。至少有一个在投降后被杀害——这是一件备遭谴责的事情。普里奥、巴罗纳和其他的革命党领袖被拘讯。宪法保证宣告暂停。巴蒂斯塔声称，整个说来，当前在野党正在为贪求权力而残杀无辜的士兵。因此他就可以向坦克手保证说，他将奉行强硬政策，同时借以表明在这样艰难的岁月中，还是同这位海军陆战队的老首长、这位仙鹤大救星同进退为是。^① 暂停宪法保证意味着新闻检查，

^① 当时和卡斯特罗一起在尤卡坦的胡斯托·卡里略报告说，卡斯特罗把这次进攻看作是机会主义的和不负责的作法（《手稿》，第27页）。参看《哈瓦那邮报》，1956年4月30日。

但是，在随后几个星期中，古巴人在报纸上听到不少关于查获军火和又未能拿获外国佬的消息。因雷诺尔·加西亚的未遂企图而备受责难的普里奥被巴蒂斯塔遣送回迈阿密，但是他被扣留了一段时期之后才获准入境——行政上的错误进一步破坏了美国同古巴在野党方面原已不佳的名声。直到6月，普里奥才得到了居留美国的许可证。

到了夏季，巴蒂斯塔同特鲁希略的神经战出现了高潮。古巴参议院已授权巴蒂斯塔得随时与多米尼加共和国断绝关系。古巴警察当局声称，普里奥同特鲁希略的联系因3月间逮捕了象革命党政治家梅内拉奥·莫拉这类人而获得了加强，于是巴蒂斯塔宣布多米尼加公使为不受欢迎的人。那个不知疲倦的特务警察埃斯特万·本图拉上尉在普里奥的农场附近又发现了一个武器库。6月间，波利卡波·索莱尔被控与此事有关。巴蒂斯塔的目的是要把他所有的政敌都同特鲁希略牵连起来，从而使他们在国际舆论方面看来，都是帮会分子和以国外为基地的帮会分子。但这是有困难的，因为他早就想把菲德尔·卡斯特罗集团同共产党牵连起来。6月下旬，又发现了一桩要行刺巴蒂斯塔的“阴谋”，这次影响到了古巴的斗牛士何塞·桑切斯，又牵涉到据说是他的后台的这些老帮会分子。在表面繁荣的底下，古巴却是许多敌对的帮派的中心，其中有带枪的歹徒，警察，卸任部长，官吏和学生，全都拼命想夺取“最高权力”，彼此既没有真正的合作，也没有什么“相互关联”。所以，在哥斯达黎加，欧费米奥·费尔南德斯的帮会显然出卖了卡斯特罗的一些支

持者，并且不让他们取得去墨西哥的签证，虽则费尔南德斯的后台普里奥当时是帮助卡斯特罗的。

卡斯特罗的朋友这时已经在圣罗莎农场训练了九个月。卡斯特罗自己同所有的政治团体都保持接触；所以在4月29日，他在危地马拉—墨西哥边境上的塔帕丘拉地方同胡斯托·卡里略会见，就纯贞派的计划交换了意见，并从他和蒙特克里斯蒂运动方面得到了五万美元。此外，卡斯特罗也从古巴航空公司总经理、巴蒂斯塔的一个同伙洛佩斯·比拉沃伊那里拿到钱——这是只在他没有得到其他的帮助时才肯接受的一项赠款。^①许多青年浪潮一般涌来参加他的队伍，其中有一批是蒙卡达的旧人，来自他们所避难的哥斯达黎加。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是知名的帮会分子，特鲁希略的亲信刀斧手里卡多·博纳切亚，后来才发现他原来是一个告密者。结果，墨西哥警察，肯定是在古巴警察协助下，发现了他们的巢穴。卡斯特罗、巴约、格瓦拉和其他二十一个人，在7月24日以准备袭击另一个国家的罪名而遭逮捕。^②一个庞大的武

① 卡里略：《手稿》，第18—19页。卡里略批评了这一点，而卡斯特罗答称，“手里没有分文”，所以不得不拿。根据卡里略的说法，卡斯特罗把他拿到的钱花了一部分给一个姑娘购买礼品。但是卡里略指出，卡斯特罗在这种事情上，常常得到原谅。

② 这些人：西罗·雷东多，乌尼维索·桑切斯，拉米罗·巴尔德斯，卡利斯托·加西亚，奥斯卡·罗德里格斯，塞尔索·马拉戈托，阿尔维托·巴约（儿子），希米·乌特塞尔，玛丽亚·安东尼娅·冈萨雷斯，阿尔梅达，罗兰多·桑塔纳，里卡多·博纳切亚·洛佩斯，阿图罗·乔蒙，雷纳尔多·贝尼特斯，路易斯·克雷斯波，托马斯·埃莱克托·佩德罗萨，阿格多·阿吉阿尔，爱德华多·罗伊格，何塞·劳尔·维加，奥拉西奥·罗德里格斯和维克托·特拉波特（一个西班牙—墨西哥画家）。（《波希米亚》周刊，1956年7月8日）胡利奥·迪亚斯，坎迪多·冈萨雷斯和阿方索·塞拉亚早已被捕（《波希米亚》周刊，1956年7月15日，第85页）。

器库也被查抄了。墨西哥警察又在古巴特别警察的默许下，显然检举卡斯特罗与墨西哥共产党有关系，说是他的口袋里发现一个苏联官员(尼古拉伊·列昂诺夫)的名片，又说他同古巴共产党的拉萨罗·培尼亚以及同隆巴多·特莱达诺一贯有所接触。这些说法是一个墨西哥籍的西班牙人路易斯·达姆发表在《波希米亚》周刊上一篇文章报道出来的。7月3日^①卡斯特罗从监狱里正式驳斥给他加上共产党员的罪名“纯然是捕风捉影”。^②他还写了一个书面答复，登载在下一星期出版的《波希米亚》周刊上。他指控说，这整个事件是出自巴蒂斯塔政权和美国大使馆的一项阴谋。他接下去说：

另一方面，巴蒂斯塔老爷本人就是1940年大选时共产党的总统候选人，他的竞选标语就贴在斧头镰刀旗的后面，他的照片就挂在布拉斯·罗加和拉萨罗·培尼亚的旁边，他的现任部长和亲密的合作者有六个就是著名的共产党员，巴蒂斯塔老爷还有什么道义上的权利来谈共产主义呢？^③

4月，卡斯特罗对胡斯托·卡里略说：“共产党永远不会

^① 这里显然有误，因为上文说卡斯特罗是在7月24日被捕的。可能被捕日期是6月24日。——译者

^② 参看《哈瓦那邮报》，1956年9月20日。

^③ 《波希米亚》周刊，1956年7月15日。德雷珀的评论一点不错，很难想像一个共产党员，不管是公开的还是隐瞒身份的，会以追忆一些共产党员同这个独裁者有老朋友关系来为自己进行辩护。（参看德雷珀书，第28页及以下。）巴蒂斯塔自己说，关于前总统卡德纳斯支持阴谋者的谣传，是荒谬的，因为他和卡德纳斯是老朋友（参看《哈瓦那邮报》，1956年9月20日）。

是多数，尽管他们的力量会在这次斗争中壮大起来，以后……你将会在政府中占重要的地位；你也会像我一样，不让他们占据支配地位。”^①

卡斯特罗继续攻击共产党，共产党也予以回击。早一些时候，一个年轻的黑人学生瓦尔特里奥·卡沃内尔因为给卡斯特罗发了一个贺电，而被开除出共产党。共产党为了要把话说清楚，补充说，“党拒绝这类冒险主义的行动，这只能把无数青年毁掉……只能是为那些人服务的，即试图使《今日报》卷入肮脏的挑衅……把它同卡斯特罗及其集团的冒险行动纠缠在一起。”^②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卡斯特罗竟然在三、两个星期内写了另一封为自己辩护的信，这一次是反驳他同特鲁希略结成同盟的说法的。

7月24日，^③墨西哥警察当局把卡斯特罗和他的朋友们释放了，条件是要他们离开墨西哥。事实上，卡斯特罗这时正急想回到古巴去恢复斗争，他已经说出了一种誓言，到了1956年年底，不是牺牲就是回去。这时最后阶段的训练正在洛马斯德查普尔特佩克的墨西哥公寓里，而不是在圣罗莎继续进行。墨西哥公寓原来是死于西班牙内战的诗人德拉托里恩特·布劳的遗孀特雷莎·卡苏索住的，这时用来储藏武器。^④8月，根据同特雷莎·卡苏

^① 卡里略：《手稿》，第18页。

^② 引自卡萨利斯(西吉特里利亚)的文章，《共和国报》(加拉加斯)，1965年2月4日。卡沃内尔后来(1967年)被卡斯特罗监禁，因为他试图在古巴组织黑人权力运动。

^③ 这里说明卡斯特罗可能是在6月24日被捕的。——译者

^④ 卡苏索：《古巴和卡斯特罗》(纽约，1961)，第105页。特雷莎·卡苏索描写了这时卡斯特罗如何向一个美丽的古巴人求婚，经对方接受了，但最后又毁约——使卡斯特罗只能再度许身于革命。特雷莎·卡苏索是在她参观监狱时初次会见卡斯特罗和他的朋友的。

索的安排，卡斯特罗泅渡格兰德河，并依照卡里略的建议，在边境附近的雷诺罗地方会见新被放逐的普里奥。普里奥同意以十万美元支持卡斯特罗，其中第一批五万美元在三、两个星期内可以送到。^①卡斯特罗的事业更加发达了，因为这时他不但有钱购买武器，还有钱贿赂墨西哥警察当局，让他们袖手旁观，虽则在提供这种活动的财源上，他是很难同巴蒂斯塔相匹敌的。9月，卡斯特罗还同学联主席兼革命指导委员会的头头埃切瓦里亚在所谓“墨西哥公约”中达成了一项合作协议，不过这时卡斯特罗显然建议同古巴共产党缔结同盟，而遭到埃切瓦里亚的坚决反对，于是，这个问题就象要把革命指导委员会本身置于卡斯特罗领导下的任何建议一样，被搁下了。^②埃切瓦里亚和卡斯特罗都否认与特鲁希略有合作。但是普里奥正在支持另一次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远征（还有欧费米奥和其他等人参加），所以卡斯特罗不得不在普里奥同他也有接触的这个时刻，先设法使他自己的运动行动起来，“免得同其他一些运动相混淆”。^③

在哈瓦那那边，公民对话似乎已经告吹。帕尔多·利

① 卡里略：《手稿》，第21页。这是9月的事。同卡斯特罗一起会见的有胡安·曼努埃尔·马克斯，蒙塔内，梅尔瓦·埃尔南德斯和拉斐尔·德尔皮诺（杜波依斯书，第134页）。另五万美元迟迟未来。

② 革命指导委员会的普里米蒂沃·利马博士提供的材料。还有“其他一些原则性的分歧”。革命指导委员会企图杀害巴蒂斯塔政权的一个重要成员，但是当这样作了的时候，卡斯特罗正式与他们脱离关系。

③ 参看萨拉斯·卡尼萨雷斯的声明，见《哈瓦那邮报》（1956年8月11日）。9月，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在墨西哥举行会议。古巴代表团包括有人民党的马里奥·列雷纳和哈瓦那大学教授、1933年一代的领袖之一的劳尔·罗亚，后者自从卡斯特罗同四十年代后期的革命起义同盟和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发生联系以来，就不愿再同他见面了。

亚达挡开了众议院议长戈多伊要求决斗的挑衅。人民党之间继续存在着向来的仇视：劳尔·奇瓦斯由于在筹备艾迪·奇瓦斯逝世纪念的作法上与埃米略·奥乔亚意见分歧，辞去了人民党的领导职务，这个运动的一切权力现在似乎都掌握在已经成为人民党总书记的路易斯·孔特·阿奎罗这位广播评论员和卡斯特罗的老朋友手里了。哈瓦那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不但忙于破坏活动和偶尔的恐怖活动，还在试图制订出一项统一的理论——这是知识分子的模棱两可态度的一个明确象征——并为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①在工会的政治活动中，孔拉多·贝克尔和孔拉多·罗德里格斯在选举中击败了穆哈尔分子，穆哈尔虽然越来越成为既定秩序的大卫道者，却仍然控制着古巴工人联合会。巴蒂斯塔似乎是高踞于坦克手之上，但塔维尼利亚一些人又高踞于巴蒂斯塔之上。他刚刚又得到了美国的一批武器供应，“以帮助古巴的民主”，作为1952年协定的一部分。在7月和8月中，先是因为考试，继而又是假期，所以学生相当安静——撇开9月10日的一个事件不谈，当时埃切瓦里亚在大学中的第二把手弗鲁克托索·罗德里格斯率领了一批学生枪手（包括埃切瓦里亚的老对头，莱昂内尔·阿隆索）冲进了电视系统二号站。但是，在10月中，圣地亚哥发生了一件不必要的暴行，当时据说是同情在野党的前警官阿塞尼奥·埃斯卡洛纳，被人殴打和受刑后，给丢进了圣地亚哥

^① 马里奥·列雷纳：《手稿》，第14页。列雷纳说，他和奥尔图斯基是这个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卡洛斯·弗朗基也偶尔出席过会议，阿曼多·阿特只出席过一次。

湾。海军情报局局长亚历杭德罗·加西尼·奥拉庸上校受到了谴责，但未遭意外。当时野蛮主义的阴霾似乎的确是越积越浓，由于这项罪行既未受到惩处，埃切瓦里亚集团的几个学生，便在胡安·佩德罗·卡尔沃·塞尔维亚和阿隆索，偕同另一个中年级学生罗兰多·库维拉的率领下发动了一次袭击。胡安·佩德罗·卡尔沃·塞尔维亚在埃切瓦里亚和阿隆索竞选时已经是出人头地的一个医科学生了。10月28日，星期日一大早，当一批警察和巴蒂斯塔的军官离开贝达多区蒙特马特雷夜总会时，遭到了这两个和其他一些人的袭击。军事情报局局长、三十六岁的布兰科·里科上校当即毙命。马尔塞洛·塔维尼利亚上校(参谋长的儿子)和他的妻子受伤。另一个军官的妻子受了轻伤。这些流血如注的、珠光宝气的妇人，惊吓之余，把休息室中的镜子当成是空敞的地方而摇摇晃晃地闯了进去。卡尔沃·塞尔维亚和库维拉则穿过赌场，从后门逃跑了。

学生所以进行这次袭击是因为要使当时正在哈瓦那开会的古美报业协会注意到古巴存在着混乱的情况。可惜，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些枪手却选中了巴蒂斯塔的警察中反对审讯时用刑的几乎是唯一的杰出人物而加以杀害。这次袭击似乎是偶然发动的，卡尔沃和库维拉急想杀掉巴蒂斯塔政府的任何重要官员，他碰巧看到了布兰科·里科。如果他不同他们打招呼，他们也许不会开枪。^①

^① 私人提供的材料。关于阿曼多·德卡德纳斯对在逃的那两个人的认证，参看《哈瓦那邮报》，1956年12月1日。他断言他们是在普里奥的侄儿费尔南多·普里奥博士的帮助下逃走的。

结果是一场残杀。警察当局自然要设法搜捕杀人犯，于是在第二天午刻，萨拉斯·卡尼萨雷斯将军和奥尔兰多·彼德拉上校带同几名警察，为了始终弄不清楚的理由，前往米拉马尔的海地大使馆。海地大使和大使馆人员正在吃午饭。大使馆里面有很多古巴人，这些古巴人是根据西班牙美洲通行的、可以接受避难人员的正常谅解而在那里避难的。这些古巴人大多已经到了几天；另一些人则是当天清晨四点钟才到的。卡尔沃·塞尔维亚和库维拉都不在那里。警察敲过门后，随即开枪；究竟是谁先开枪，不得而知。警察于是进入大使馆，破坏了避难权的原则，击毙了几名难民，捉了其他一些难民，后来也被杀害了：十人被杀。警察没有一个死亡，虽则拉斐尔·萨拉斯·卡尼萨雷斯将军受伤，并于10月31日毙命。在他死时，巴蒂斯塔和总理加西亚·蒙特斯都在床边，不必说还有他的三个兄弟，二个上校和一个中尉。被杀害的十个人中，有六个显然是参加过4月间攻打戈伊库里亚兵营的革命党人。另外有两个曾经牵连进圣地亚哥的马斯费雷尔谋杀未遂案；还有其他两个似乎是学生。据接近巴蒂斯塔方面的消息说，萨拉斯·卡尼萨雷斯之死并没有使巴蒂斯塔太悲伤，因为这使他可以捞到前警察头子那笔赌场保护费的收入了——据说每月七十三万美元。

报纸每天都刊登了关于普里奥或卡斯特罗，桑切斯·阿朗戈或圣多明各帮会分子的种种活动的故事，据说他们随时准备闹事。暴力迫在眉睫的这种令人不快的意识笼罩了全岛。就卡斯特罗的情况而言，这种不安

是确实存在的。虽然没有能取得一只卡特利纳飞船或一艘美国海军的救援艇，但是他现在已经弄到了一只五十八呎长的“格拉玛号”快艇，这艘快艇是用普里奥的钱，从一对叫埃里克森的美国夫妇手里买来的；花了一万五千元。他能够在这只船上装载近一百人，并能够把它从图斯潘驶到六十年前马蒂登陆的奥连特省。11月2日，《警觉报》发表了同卡斯特罗的一次单独会见的记载，在会见中，卡斯特罗宣布自己准备不惜一切代价进入古巴——这一事实的引人兴趣，不但是因为事实本身，而且是因为从中可以看出，卡斯特罗同他的老朋友，《警觉报》的编辑拉蒙·巴斯孔塞洛斯仍然保持一定的往来，虽则后者已经参加了巴蒂斯塔的政府。

11月中旬，就在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发动的前夕，墨西哥警察当局在特雷莎·卡苏索家里查获了一个大武器库。特雷莎·卡苏索、佩德罗·米雷特和恩尼奥·莱瓦一直在照管这批供应品，因此被捕。卡斯特罗这次显然被拉斐尔·德尔皮诺出卖了，德尔皮诺是他在波哥大的老伙伴，这时是他最亲密的伙伴之一；四十年代在谋杀马斯费雷尔的未遂事件时也有过合作。有罪也好，无罪也好，总之在这次不幸事件之前，德尔皮诺已经离开了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并且后来一直受到指责。^①事实上，巴蒂

^① 《西班牙美洲报道》，第12卷，第431页。戈登堡关于马斯费雷尔案的证词；杜波依斯书，第13页；卡苏索书，第117页。在他涉嫌之后，德尔皮诺被卡斯特罗送到维多利亚城，在那里已经有一批在福斯蒂诺·佩雷斯监督下送回的古巴人。德尔皮诺偷了一把手枪，动身去美国，他一直到1959年才率领一支反对卡斯特罗的图谋未遂的远征军从美国回去，并被判三十年徒刑。

斯塔对于在墨西哥所进行的一切，是完全知情的，并据某方面的消息说，他还拒绝了谋杀卡斯特罗并将他打算乘往古巴的那艘船烧掉的建议。

这些事件使卡斯特罗得尽快前往古巴。在古巴的组织者，那个浸信会派的教师弗兰克·派斯在两、三个星期以前已经来到墨西哥，以便配合（并顺便警告）11月底卡斯特罗计划登陆的时刻在圣地亚哥搞一次起义（梅尔瓦·埃尔南德斯也已经带了同样的讯息回到古巴）。11月21日，墨西哥人限定卡斯特罗本人三天离开墨西哥城。他和他的大多数人都这样做了，动身前往韦腊克鲁斯，有一些是没有受过任何训练而离去的，只有头头们才确知他们将要作些什么。

在他们离开之前，卡斯特罗没有来得及准备任何新宣言。他的想法无疑是同10月4日他写信给梅尔瓦·埃尔南德斯时差不多：

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不是由于仇恨任何人而组成的。它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革命运动。它的队伍欢迎一切真心想在古巴重建政治民主和树立社会正义的古巴人参加。它的领导是集体而秘密的，是由一批对过去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意志坚强的新人组成的。古巴的革命将在我们的开明的1940年宪法的精神和实践的范围内完成各项改革，既不剥夺任何人依法所有的一切，也不赔偿任何受到损害的利益……古巴革命将坚决惩罚一切为反对暴政而进行的暴力行为，并将谴责和镇压由仇恨或不纯正的情绪所激起的各种

形式的卑鄙的报复行为。^①

11月19日,卡斯特罗对《警觉报》的记者说,如果巴蒂斯塔能接受一项包括巴蒂斯塔本人辞职、在九十天内进行大选、同特鲁希略断绝外交关系和大赦政治犯等在内的七点纲领,他愿意停止任何进袭。在1956年夏末曾经会见他的一个哈瓦那知识分子,认为“我从来没有想到〔卡斯特罗〕可能采取急进的方针。相反,我倒担心他会顺着传统政治的方便斜坡滑下去”。^②11月25日,就在这种无拘无束的情绪下,“格拉玛号”开航了。卡斯特罗下了重大决心,要模仿他心目中的英雄恺撒和马蒂。在他的前面,在古巴国内,那支争取和平的唯一力量,即共和国之友协会,由于巴蒂斯塔的不妥协的态度和科斯梅·德拉托里恩特先生的卧病,依然毫无动静。将来只能使用暴力了。

正如古巴革命史上常常出现的情况那样,这种行动和短期繁荣的前景形成了对照。自从1948年以来,古巴就一直努力不仅仅是要维持、而且是要提高它在美国食糖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努力失败了。1956年,美国对它的食糖法采取了新的变革,使本国生产者能够争取到美国扩大了的需求(其本身是人口增加的产物)所创造的大

^① 引自詹姆斯书,第528页。

^② 列雷纳:《手稿》,第27页。但是列雷纳补充说,当时他亲自对卡斯特罗说,“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应该同过去的政治组织摆脱一切可能依然保持着的联系”。卡斯特罗当时说,“我们是要这样作的……但是一上来我们不能把计划全部公开出来”。

部分市场,也能够在他们中间分摊任何亏损。但是,由于要使古巴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增加十五万吨(虽然不是它的份额,它的份额已经从41.7%降至40.9%)而修改1953年公约,又由于10月苏伊士运河的危机,而使这种作法未能获致直接效果。结果是使糖价在1956—1957年冬季有了有利的提高,并使1957年市场看好。这年冬季,欧洲和俄国甜菜产量又有所降低。所以,在卡斯特罗的革命认真开始的时候,如同1895年马蒂在古巴登陆的时候那样,古巴糖业资本主义的短期前景是大有希望的。

第七章

“格拉玛号”和马埃斯特腊山

1956年11月24—25日夜， “格拉玛号”载同八十二个人离开了墨西哥的图斯潘。^①象在蒙卡达一样，大多数是白种的古巴城市人，虽则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在蒙卡达时为多。^②八十二个人中，有二十个人参加过1953年攻打蒙卡达或巴亚莫。船上有四个非古巴人——格瓦拉，阿根廷人；希诺·多内，意大利人；纪廉，墨西哥人；领港员拉蒙·梅希亚斯·德尔卡斯蒂略（“皮奇里洛”），是一个参加过未遂的卡约·孔菲特斯远征队的多米尼加人。格瓦拉的朋友，一个叫做胡利奥·卡塞雷斯的危地马拉人，因为卡斯特罗不要弄得“国籍十分驳杂”而被拒绝了。^③

最高指挥官卡斯特罗，用了少校衔。在他下面各由

① 格瓦拉说船上有“八十三个”人，无疑是印错了的缘故（参看安东尼·努涅斯·希门尼斯：《古巴地理》（哈瓦那，1961年）第574页），虽则这是一种有独无偶的错误；巴约“将军”在他所开列的“格拉玛号”上的名单中也出了有点奇怪的同样的错误；他把领港员梅希亚斯·德尔卡斯蒂略计算了两次（《我对古巴革命的贡献》，第167—169页）。“格拉玛号”上大多数人的照相刊登在1959年12月2日的《革命报》上。

② 1960年格瓦拉说“到达‘格拉玛号’的第一批人员之中没有一个……过去是工人或农民”，这是错误的（《革命文献》，第24期，1960年9月16日，第21页）。

③ 格瓦拉：《革命战争随笔》，第122页。

二十二人组成了三个小队，分别由劳尔·卡斯特罗、胡安·阿尔梅达和何塞·史密斯这三个“上尉”率领。^①格瓦拉负责卫生工作。船长是前古巴海军的奥内略·皮诺舰长，由前海军上尉罗伯托·罗克为副手。

远征队兴致勃勃地出发了，虽则有几个在墨西哥的朋友以注定要失败为理由拒绝参加。他们在船上载有两架反坦克炮、三十五支带瞄准镜的步枪、五十五支门多萨步枪、三挺汤普森轻机关枪和四十五挺手提机关枪。由于航向错误，航程用了七天的工夫，因而晕船和过分拥挤，不很舒适，但是，到了12月1日，“格拉玛号”靠近奥连特省西南角的时候，热情重又振作起来。11月30日，船上的人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了圣地亚哥反巴蒂斯塔的起义的消息，这是由弗兰克·派斯领导的、以配合“格拉玛号”的到达。^②这支队伍中没有一个人同共产党有多大关系，除开“尼科”·洛佩斯曾在墨西哥访问过象奥尔多基这样的共产党流亡者。

弗兰克·派斯，当时二十四岁，在艾德·桑塔马利亚和莱斯特·罗德里格斯这几个攻打蒙卡达的老战士的帮助下，小心翼翼而非常精明地准备了这次起义。他在

① 卡斯特的司令部是由下述诸人组成的：胡安·曼努埃尔·马克斯，福斯蒂诺·佩雷斯，安东尼奥·洛佩斯，赫苏斯·雷耶斯，坎迪多·冈萨雷斯，奥内略·皮诺，罗伯托·罗克，赫苏斯·蒙塔内，塞萨尔·戈麦斯，拉蒙·梅希亚斯·德尔卡斯蒂略和罗兰多·莫亚（桑切斯·阿马亚提供的材料，〈革命报〉，1959年1月26日）。三个小队各分为三个小组，分别由一个中尉和一个军士带领。

② 费尔南多·桑切斯·阿马亚：〈格拉玛号日记〉（哈瓦那，1959年），第35页；巴勃罗·迪亚斯在〈波希米亚〉周刊（1961年12月3日），又有不同的说法。

圣地亚哥的组织是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在古巴的机构中最杰出的一个，并且已经成功地在奥连特省附近的其他城市建立了若干秘密小组。^①他在吸收圣地亚哥的中产阶级青年参加革命事业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中包括很多女青年，有一个学机械工程的学生，圣地亚哥的巴卡迪律师的女儿比尔马·埃斯平，她从美国留学归国时，在墨西哥会见了卡斯特罗，担任了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信使。^②正如上文所述，弗兰克·派斯实际上是反对11月底在圣地亚哥或普遍在古巴举行起义的，他在把这个意见告诉卡斯特罗之前，已经在8月间哈瓦那举行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各省领导人会议上提出这个观点。但是他们尽管所能调动的人力物力都不如派斯，却比他更为蛮勇得多，因此他被驳回了。既经决定行动，派斯就采取一切预防措施，并弄到了大量武器——其中有一些是来自特鲁希略方面的，这无疑是有利于欧费米奥·费尔南德斯博士的错误，因为他把一船军用品在奥连特省卸错了地方。

但是，尽管派斯在11月初见过了卡斯特罗，为协调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一切活动的通讯和命令都非常混乱。后来听说卡斯特罗将于“11月一个月暗无光的夜间”到

① 奥连特省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组织情况：财务，玛丽亚·安东尼亚·菲格罗亚博士；宣传，格洛里亚·夸德拉斯；劳工，拉蒙·阿尔瓦雷斯；行动，弗兰克·派斯，以佩皮托·特伊作为他的副手；省联络员，莱斯特·罗德里格斯；技术人员，包迪略·加斯特利亚诺斯；示威和宣传秘书，阿图罗·杜克·德埃斯特拉达。圣地亚哥省大约有十个秘密小组，各有八或十个人（阿图罗·杜克·德埃斯特拉达的文章，《革命报》，1963年7月30日）。

② 她后来同劳尔·卡斯特罗结婚。

达,所以在11月15日,一个漆黑的夜里就有了近于动员的行动。但是到了11月27日,圣地亚哥的宣传秘书杜克·德埃斯特拉达接到了墨西哥一份电报:“你要的书已经绝版。出版社编辑部。”这就是说,起义已定在拍电后的七十二小时发动。

派斯和他的组织这时对巴蒂斯塔政权发动了极其有效的进攻。^①派斯这位一度想进军官学校的业余军人,^②在对于事实上是一系列提高士气的突击行动部署方面,表现出非凡的将才。1956年11月30日黎明,大约三百名身穿橄榄绿制服,佩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红黑臂章的青年,袭击了警察总局、海关和港务局。(他们通过袭击圣地亚哥射击俱乐部夺到一些武器,也有一些是来自三A党的。)海关被成功地点上了火,另两个单位也被攻占。^③同时,另一批菲德尔主义者猛扑博尼亚托监狱,释放了那里几名政治犯。有很多警察和士兵被击毙。接着派斯便撤出,让圣地亚哥陷于一片惊慌之中。第二天他又率同八

① 大部分是来自他的弟兄阿古斯丁·派斯对劳尔·奇瓦斯提供的材料,见奇瓦斯《手稿》。照奇瓦斯的说法,派斯曾拒绝一个叫路易斯·克莱赫的人参加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理由是他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但当他咬定自己不是的时候,他分配到了“次要的任务”。

② 根据《革命报》1959年1月17日,第16版,比尔马·埃斯平的说法。她继续写道:“他的思想始终是革命的。在马蒂的体系中,他得到了丰富的启发。他完全是马蒂式人物。”自从1月以来,他就是一个专业革命家了。

③ 各纵队分别由下述诸人领导:豪尔赫·索图斯和安东尼奥·罗加(水上警察);佩皮托·特伊和奥托·帕雷利亚达,加上四十五个人(国民警察),圣地亚哥协会(五十至一百人,由蒙卡达老战士莱斯特·罗德里格斯领导);铁路线——恩索·因方特,塔拉·迪米特罗和奥古斯丁·派斯;在蒙卡达兵营附近有埃米利亚诺·迪亚斯领导的十至二十人狙击手;以及由奥古斯丁·纳瓦雷特和塞斯佩德斯兄弟领导的其他各组。

十六个人进行突击，在港务局放火，攻占公共建筑物，使市民生活陷于停顿状态。巴蒂斯塔在这一省和其他三省暂停了宪法保证，并空运二百八十名训练精良的增援部队到圣地亚哥，由那个赞助3月10日政变计划的职业军官佩德罗·巴雷拉上校率领。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一小批人终于进退维谷，并被隔绝在一所主要的中学中，但是，这些起义者还可以从后门逃跑；在众寡绝对悬殊之下，起义者被扑灭了。事实上，在11月30日和12月1日，派斯已经控制了全城，如果有一尊迫击炮向不同方向进行射击，也许就可以使蒙卡达陷落了。同时，爱国俱乐部的古巴流亡者在纽约联合国大厦前举行了一次激昂慷慨的示威游行。在关塔那摩也有成功的突然袭击，胡利奥·卡马乔曾经从那里的美国基地买到或偷到了武器。他带同三十个人毫无困难地攻占了埃尔米塔兵营，因为那里空无一人。待到军队赶到时，他放弃了那个兵营。与此同时，洛伊特和安东尼奥·托雷斯这两位工人领袖组织了二十四小时的总罢工。

但是，圣地亚哥起义造成了菲德尔主义者三人死亡——佩皮托·特伊（派斯的副司令和奥连特省的学联前主席），奥托·帕雷利亚达（曾试图在最后一分钟参加攻打蒙卡达而未能成功的一个电话工人）和安东尼奥·阿洛马（一名职员），但是它已经使部队痛切认识到中产阶级子弟基本上是站在反对派方面的，而且他们的父母，即使不曾参加，至少也不会不维护他们的子弟。不但作父亲的，而且陌生人也掩护素不相识的革命者，并且替他们藏匿枪枝。

12月2日，“格拉玛号”到达古巴，就配合上来讲，已多少有点迟了，这时候这支海上部队的副司令、前海军上尉罗克虽然掉进海里却已被捞上来了。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格拉玛号”不是在尼克罗一个很好的码头靠岸，而且那里还有等着迎接他们的、可以立刻予以声援的朋友们，却因时间耽搁而不得不在贝利克附近的科罗拉多斯滩登陆。这个地方并不是陆地，而是荆棘丛生、小蟹密布的沼泽。他们原定在11月30日黎明时分在尼克罗登陆。这一批人将在圣地亚哥爆发起义时，攻取尼克罗后，向曼萨尼略挺进，然后将随着破坏活动的蔓延而形成一次总罢工。现在这些行动一个也不能实现了，甚至连所有的军火和武器都无法搬运上岸了。因风平浪静而停驶下来的快艇被一架战斗机从空中看见了，于是出现了一艘海军快速舰，空中又响起了机关枪声。一位“不负责任的同志”把他们带错了路。终于，三小时后，纵队才踏上坚实的土地。一个叫做安赫尔·佩雷斯的农民邀请这些起义者一起吃饭，但是，正当他们要吃的时候，听到了枪声。他们只得向腹地移动，他们在登陆后的第一天，根本没有吃什么东西。有一组暂时迷了路。他们仍然挺进。他们看到各式各样农民，其中有一些还为他们而向科布雷的慈悲圣母祈过福。

接下来的两天，12月2日和3日，这支小部队通过胡利奥·洛沃的尼克罗制糖厂附近的蔗田向马埃斯特腊山挺进。他们缺乏给养，靴子却是新的，他们百无聊赖地啃着甘蔗解渴。迷路的小组又同大队会合了；他们要去哪里，他们要去作什么？是象卡斯特罗在蒙卡达失败后

所想的那样去山区建立一个基地吗？然后呢？谁知道？在这期间，哈瓦那谣言甚炽。据说卡斯特罗已经带了四十个人登陆，受到攻击，已被击毙了。美国合众社驻哈瓦那记者弗朗西斯·麦卡锡报道说，卡斯特罗已被杀身死，后来又证实这项错误说，这是从尸体上找到的护照和文件辨明的。马里奥·列雷纳给了冒称福斯蒂诺·佩雷斯的遗孀五块美元。另一方面，巴蒂斯塔则公开否认卡斯特罗离开了墨西哥。

在哈瓦那，人们第二天从晨报中得知，山区的起义者约有“四十九至二百”之数，一千名军队正在搜索他们；但是卡斯特罗在墨西哥的两个姊妹，埃马和利迪亚，以“美洲之家”未始不会妒忌的一种信口胡说的、夸张过分的数字，声称她们的兄弟在卡马圭省有五万多人。事实上，政府的反应是这样的：在曼萨尼略地区司令卡里达德·费尔南德斯上报奥连特省司令迪亚斯·塔马约之后，后者又上报哈瓦那司令塔维尼利亚，塔维尼利亚不是派以奥连特省为基地的当地部队去抵御卡斯特罗，而是派了他的一个老朋友胡安·冈萨雷斯上尉；冈萨雷斯起初以为自己方面会受到攻击，而只限于认真防守曼萨尼略的兵营。于是，在费尔南德斯和冈萨雷斯之间出现了混乱，结果是意外地死掉了几个兵士，并任命克鲁斯·比达尔去接替冈萨雷斯。

卡斯特罗事实上是被出卖了。12月5日清晨，向导离开了他们，跑到最近的乡村警卫队岗哨去。在那一天，这支远征队谁都寸步难移。大家都躺在离马埃斯特腊山不远的一个叫作阿莱格里亚德皮奥地方的甘蔗田里。

12月5日下午快四点钟的时候，这些起义者终于在甘蔗田旁边遭到了突袭。有几架飞机在头顶盘旋，飞机的声音掩盖了部队迫近的声音。卡斯特罗手下的人以为枪是他们自己的侦察兵打的。炮火加密了。事实上，克鲁斯·比达尔所部的一支队伍已在不到一百码以外的地方。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人开枪还击。接着是一片混乱，卡斯特罗和他的总部人员一起撤退。指挥着一个小组的阿尔梅达找不到任何人传令。直到六点钟左右，还没有完全撤退。卡斯特罗试图在蔗田界址的另一面重新集合队伍，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甘蔗田不是被军队放起火来，就是被燃烧弹燃烧起来了。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人有几个投降，立刻被枪决了。另几个人受到虐待，虽则不象蒙卡达的俘虏所受的那样惨酷。死于战斗或随即被杀害的好象总共有二十四个人。有几个人被俘，但是活到后来提付审判。另一些三、五成群地逃走，奔向丛林密布的高山，有的受伤。他们显然只给对方留下一具尸体。

这批人中，有两个被俘的，马里奥·弗恩特斯和何塞·迪亚斯，他们先后给部队司令拉蒙·克鲁斯·比达尔和古巴全体人民写了一份远征的记述。马里奥·弗恩特斯甚至指控卡斯特罗，说他因为想投降而被卡斯特罗打伤了。

从阿莱格里亚德皮奥逃出来的人发现难以重新集合了。有些人也并不想重新集合；附近的一个农民，吉列尔莫·加西亚，发现有几个人“象兔子一般飞跑了”；一个（没有武器的）人哭泣说，“我为什么来呢？”（他的妻子平

平安安地在墨西哥。)①有几组暂时躲到安全的地方去；一组是格瓦拉(已受伤)所领导的，其中有黑白混血种人阿尔梅达、“西班牙战争中的(西班牙)老战士”拉米罗·巴尔德斯和拉斐尔·乔奥以及雷纳尔多·贝尼特斯；另一个包括六人的小组是由桑切斯·阿马亚领导的。②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一起的只有其他两个人，乌尼维索·桑切斯和福斯蒂诺·佩雷斯。劳尔·卡斯特罗发现他自己同埃菲赫尼奥·阿梅赫拉斯、西罗·雷东多和雷内·罗德里格斯在一起。③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同“潘乔”·冈萨雷斯和巴勃罗·乌尔塔多一起到处乱跑。最后，还有一组后来同格瓦拉会合了，其中包括卡利斯托·莫拉莱斯，卡利斯托·加西亚，卡洛斯·贝穆德斯，胡利奥·迪亚斯和路易斯·克雷斯波。另有十三个人集结在胡安·曼努埃尔·马克斯的领导下。

在这几组中，桑切斯·阿马亚和他的朋友在到达海滨之前，又渴又饿地在森林里狼狈地荡了好几天；有三个人自行投案，遭到杀害；其他四个前往尼克罗，最后到了哈瓦那。胡安·曼努埃尔·马克斯和他那一组人都投了案，其中大多被枪决。尽管森林遭到汽油弹的轰炸，那些依然逍遥法外的人既碰到大自然的敌人又碰到了克罗斯·比达尔上校。何塞·庞塞喝自己的小便。这些幸存者

① 加西亚对弗朗基说的(弗朗基书，第71页)。

② 诺尔维托·戈多伊，恩里克·卡马拉，雷内·埃因特，马里奥·查维斯，卡波特和劳尔·苏亚雷斯(桑切斯·阿马亚书，第74页及以下)。

③ 雷内·罗德格雷特，《橄榄树》周刊，1962年12月2日。阿梅赫拉斯说，他的小组的第六个人是塞萨尔·戈麦斯；他自己投案了(弗朗基书，第3页)。

在树林里拼命寻找可吃的东西，但是除开偶然碰上一颗可以嚼出点水分的寄生植物外，什么东西也找不到。他们吃草，偶尔吃到生玉米和螃蟹。格瓦拉试图用他那治哮喘的器械从岩礁里吸水，他和他那一批人差点儿去向一份正在为巴蒂斯塔的部队祝酒的人家求救。卡斯特罗孤零零地同他手下两个人在啃甘蔗，在甘蔗田里躲了好几天。他们从一个农民那里搞到了一点食物，并且带走了一些够他们吃一、两天的东西。一个农民买了一些东西送给他们，他的一个儿子吉列尔莫·加西亚还参加了他们的部队，并带领他们上马埃斯特腊山。^①他们在马西亚尔·阿维里切斯和蒙戈·佩雷斯的农场里躲了好几天，蒙戈·佩雷斯是洛博的大庄园上的卡车司机克雷森西奥·佩雷斯(加西亚的亲戚)的兄弟，他支持卡斯特罗，已经找了卡斯特罗好几天，现在和他的儿子一起把“格拉玛号”的剩余人员找拢来。这样，12月17日，劳尔·卡斯特罗一组五人才得以在埃尔梅斯·卡尔德罗的农场附近同卡斯特罗会合。^②最后，阿尔梅达一组也发现了卡斯特罗的行踪，于是在12月19日丢下了他们所保存的大部分武器，向那个地方移动。格瓦拉和他那一组经几个农民指引，到了卡斯特罗那里，其中包括一位耶稣再生论者

① 1965年，吉列尔莫·加西亚(当时是少校)对李·洛克伍德回忆说，“我是在12月12日第一次遇到菲德尔的……菲德尔说‘我们已经在马埃斯特腊山了吗?’我说，‘是的。’‘那么革命已经胜利了，’他这样说。”(洛克伍德书，第52页。)

② 弗朗基书，第37,75页。卡尔德罗当时是军队里的少校。他后来担任马埃斯特腊山区的向导。

阿赫利奥·罗萨瓦尔,卡洛斯·马斯和其他一些人。^① 残留在山区的菲德尔主义者就此汇拢了。克雷森西奥·佩雷斯是一个少有的奇人,后来居然成为成功的革命创始者之一,因为他与其说是一个急进派,不如说是一个土匪,据说曾犯杀人罪,而且是马埃斯特腊山各处八十多个私生子的父亲。

这次之所以能够重新集合拢来,主要是得力于克雷森西奥·佩雷斯,以及吉列尔莫·加西亚和曼努埃尔·法哈尔多这些和他一起工作的人,这些人在搜集步枪和其他武器方面出了不少力。卡斯特罗原来的追随者显然一共还有十五人:菲德尔和劳尔·卡斯特罗,格瓦拉,乌尼维索·桑切斯,福斯蒂诺·佩雷斯,拉米罗,巴尔德斯,埃菲赫尼奥·阿梅赫拉斯,卡米洛·雷东多,阿曼多·罗德里格斯,雷内·罗德里格斯,雷纳尔多·贝尼特斯,卡利斯托·加西亚,卡利斯托·莫拉莱斯,查奥(“西班牙战争的老战士”)和莫兰·“加列戈”。^② 卡斯特罗当时对他们讲话,“他怀着同他在哈瓦那中央公园对广大政治群众讲

^① 格瓦拉:《革命战争回忆录,1959—1967年》(巴黎,1968),第43—44页。格瓦拉一组最后还有“潘乔”·冈萨雷斯,拉米罗·巴尔德斯,阿梅达和他自己,西恩富戈斯,查奥和贝尼特斯则跟在后面。原来同格瓦拉在一起的巴勃罗·乌尔塔多因连日行军,又饥又渴,弄得精疲力尽病倒在一个农民家里。他后来自行投案了。

^② 卡洛斯·贝穆德斯和“潘乔”·冈萨雷斯似乎是在最后一分钟退出的。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参加者在写到参加这些事件的姓名时是完全一致的。可能是在12月初一度只有十二个人跟卡斯特罗一起在马埃斯特腊山,如同历来所争论的那样。这无疑暗示与基督的十二使徒之数相符,但这可能只是在阿莱格里亚德皮奥不幸事件的幸存者彼此汇拢以前的一段短暂时间的情况。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在1959年1月4日的《革命报》上发表的一篇访问记中说,在阿莱格里亚德皮奥事件之后“只剩下八个人”。阿

话同样的激情，向他们保证说，他们已在这一冒险的第一阶段中取得了胜利。他告诉他们说，他毫不怀疑地认为，胜利早晚是属于他们的……大家离开的时候，都确信他们的地位具有强大力量，相信迟早必将取得胜利……”^①

在哈瓦那，谈论他们在山区的命运的形形色色的故事，都具有一种离奇而混乱的影响。卡斯特罗是死了还是活着？有一些自由主义者，例如，哈瓦那一位有四个年轻儿子的母亲，对于合众社称卡斯特罗已死的消息，是暗

梅赫拉斯在1959年1月8日发表的另一篇访问记中说，“在登上‘格拉玛号’的八十二个人中，只剩下了不是十二个人——如同巴蒂斯塔所说——而是九个”（《革命报》，1959年1月8日）。卡斯特罗本人在1959年1月8日在哥伦比亚营的演讲中几次说到十二个人（《历史演讲》（1959年），第16页），这个数字也出现在1958年3月18日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全国指导委员会的组织通讯上。卡斯特罗在斥责迈阿密小组时也提到这个数字（参看格瓦拉的《革命战争回忆录》，第227页上的原文）。格瓦拉在1960年发表的一篇山区战役的记述中（载安东尼奥·努涅斯·希门尼斯：《古巴地理》，第575页），说在12月初有“大约十七个人重新会合起来”，但往下没有几行又说“大约十五个”。在阿莱格里亚事件以后，一直同卡斯特罗在一起的乌尼维索·桑切斯在1963年又提到十二人之数（弗朗基书，第38页）。福斯蒂诺·佩雷斯在给雷内·拉伊的一篇记述中，列举了十六人的名字：这些人是菲德尔和劳尔·卡斯特罗，格瓦拉，福斯蒂诺·佩雷斯，他自己，巴尔德斯，桑切斯，阿梅赫拉斯，阿曼多·罗德里格斯，雷内·罗德里格斯，西恩富戈斯，阿梅达，卡利斯托·加西亚，卡利斯托·莫拉莱斯，贝尼特斯和胡利奥·迪亚斯（雷内·拉伊·里维罗书，第28页）。但是在这些之外还应该加上雷东多、查奥和莫兰的名字，而劳尔·迪亚斯的名字却应该取消（参看格瓦拉：《革命战争随笔》，第23页）。但是十二这个数目对于革命的神话却具有牢固的支配力，卡洛斯·弗朗基甚至还写了一本书，题为《十二人传》。2月中旬，在赫伯特·马修斯访问的时候，或许那里有十二个“格拉玛”人达几个星期之久——因为福斯蒂诺·佩雷斯，雷内和阿曼多·罗德里格斯，卡利斯托·加西亚，卡利斯托·莫拉莱斯和贝尼特斯后来就离开了；参看本书下一章。但是到了那时候已有几个农民成为运动的组成部分了。

① 这是乌尼维索·桑切斯向（或听自）劳尔·奇瓦斯（手稿）讲的，这段记述，胜过其他一些记述。

暗高兴的：她认为，对古巴说来固然不幸，但对她和她的儿子的生命来说，或许是好事。报纸上照常充满了巴蒂斯塔派的实业家和政治家一些令人宽慰的言论，描述大好的经济前景。到处的生产水平和投资水平都很不错。然而政治信心却是薄弱的。12月8日，在卡斯特罗登陆奥连特省一个星期后，年迈的科斯梅·德拉托里恩特先生的逝世，象征性地消除了和解政策的一个强有力的台柱。

① 现政权和反对派日益疏远了。12月间，卡斯特罗依然活着的传说开始点滴地传入哈瓦那。传说日盛一日。卡斯特罗又从另一次可怕的冲突中幸存下来，不禁使人想起一种永生不灭的神话。但是到这时为止，一切情况都还不清楚。哈瓦那和圣地亚哥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成员也不知道任何确实情况，虽则他们自然有所怀疑地认为，既然军方没有把卡斯特的尸体拿出来示众，他一定是活着的——在巴蒂斯塔本人对卡斯特罗甚至已经离开墨西哥的这种想法也开始表示怀疑时，这种信心更为增强了。因此，谁不会冒险去投靠他，“同菲德尔一起在山区里”呢？

卡斯特罗和他重新集合起来的追随者，在克雷森西奥·佩雷斯继续不断的帮助下，事实上已离开阿莱格里亚德皮奥越来越远了，克雷森西奥·佩雷斯的另一个牧牛人曼努埃尔·法哈多偕同农民吉列尔莫·加西亚这时参加了卡斯特的队伍。根据一种说法，克雷森西奥·佩雷斯提供给卡斯特罗一百个人，但是卡斯特罗因为

① 在他逝世前不久，艾德·桑塔马利亚曾代表卡斯特罗去访问他，要求他以自杀来表示“一种更加爱国的姿态”（埃伦娜·梅德罗斯提供的材料）。

他们没有武器未予接受，只暂时收下了十五个人，其中大部分都暂时只做些辅助性工作或兼职助手。这支稍稍扩大的队伍夜行日宿。讨论很热烈，卡斯特罗对所谈的和所见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很大的兴趣。格瓦拉后来记载说：

饥饿，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饥饿，以前我们一个人也不知道，现在我们才开始知道了……而且有许多事情也很清楚了（就是，关于农民的情况）。我们起初对于任何人牵了一个富裕农场主的任何牲畜，都严予惩罚，可是，有一天，一下子牵来了上万头牛，我们只是简单地对农民说，“吃。”于是这些农民，多少年来才第一次，而有些则是毕生第一次吃到了牛肉。^①

所以这是革命者的一个形成期，并且他们对于已经闹了革命的这个国家，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以前卡斯特罗和他手下的人

……对马埃斯特腊山的农民一个也不认识，而且我们对于（它）的仅有的见闻……就是我们从地理书上学到的那些……（我们）也许知道考托、康特拉马埃斯特雷和亚拉（这些河流）发源于那里——但我们对于亚拉河所知道的，只是那首歌而已……（但是）一批批的起义者却立刻不期而然地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① 《革命文献》，1960年第24期（1960年9月24日），第21页。

到这时，粮食供应问题已经差不多解决了，因为克雷森西奥·佩雷斯和他的同志们认识农民，农民可以出卖或者送给他们适当数量的粮食，农民还告诉他们可到哪里去找水，可到哪里去获得野生食物。

我们在马埃斯特腊山遇到了什么呢？（卡斯特罗后来继续描写这段日子说。）我们在那里遇到了愿意参加我们队伍的第一批农民，一些非常散漫的工人。最初是失望，走散；一些农民帮助我们残余的队伍重新集合起来。这一批人帮助我们在山区彼此相聚……当时大部分农民的情况怎么样呢？第一，十分害怕军队……第二，他们简直不能理解我们这一批服装不整、食不果腹、武器很少的人，会打败一支以卡车、火车和飞机移动的军队……我们常常得移动……不让人看见……因为在一个城镇上总是……有一百个人……那里有一个巴蒂斯塔分子……于是军队就会开进来。①

值得玩味的是，这些起义者显然需要出钱（虽然所费不多）来取得一些农民的帮助。所以福斯蒂诺·佩雷斯在1956年12月26日对卡里略说，“为了吸引农民，必须对他们那里买来的任何东西，付给双倍价钱……”②

马埃斯特腊山区是全古巴最荒野的地区，内中包括有图尔基诺峰，即蓝山（海拔八千六百呎）在内的岛上最高山脉。这是一个经常激发诗人灵感的壮丽的山区。例如，曼努埃尔·纳瓦罗·卢纳，在二十五年前他的《孟比的诗》中写道：

① 《革命文献》，1960年，第24期，第21页。

② 卡里略：《手稿》，第32页。

蓝山，
和考托河哟！
无穷无尽的精神，
使我们生生不息……
名山以它的伟大的心温暖我们，
这至优至美、至极至大的雄伟的儿子……

这是古巴的最南地区，它的植物和海拔高度与其说是象古巴，倒不如说是象安的列斯群岛的其他更多山峦的岛屿，它的中央山脉马埃斯特腊山在地形学上是一脉相承的；这个山脉的确同岛上其他各地形成一个对照。这个山脉，森林密布，其植物从生长于较低较干燥山坡上的粗仙人掌到生长在较高山坡上的美丽的多雨森林中的羊齿植物，样样都有。山脉沿海岸蜿蜒而去，向海一面山坡陡峭，不时有一段奇妙的天然台地，每段相隔约六百呎以上。海岸本身作锯齿状，但没有象古巴北海岸和西南海岸外的那种海面沙洲。马埃斯特腊山长约一百哩，最宽的地方约二、三十哩。山区南面临海，西邻尼克罗一坎佩丘埃拉—曼萨尼略沿海平原，北面和东西有中央公路，虽则事实上山脉一直迤邐向北，远达考托河及其流域。在东面，山脉连绵不断，郁积而成为众所周知的埃尔科夫雷山，然后又开始下趋中央公路和圣地亚哥及其海湾。

马埃斯特拉山是一个贫瘠地区。自远古以来，这些地方就为一小撮家族所有，并且一直为人所忽视。边界模糊不清。定居在那里的人，大多是没有土地产权或者没有土地租契的占据公地者。这种朝不保夕的农户只占

古巴农民的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而且五分之二以上是在奥连特省。山区人口有一半以上根本没有受过教育。适龄儿童上学的寥寥无几。在整个区域，两相情愿结婚的数目几为合法婚姻的一倍。这个地区的农村大约有一半人口是文盲，尤其是在西部尼克罗那一端。失业数字虽高，却显然没有达到奥连特省其他各地的水平：巴亚莫为百分之四，埃尔科夫雷百分之八，希瓜尼只有百分之一四，但是（因为糖厂在这地区，从而有季节性的机会，也有种种困难）尼克罗却有百分之十六。这个地区大多数人自然是受雇于农业方面的。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泥地的茅屋；电冰箱、自来水、浴室和电灯几乎是闻所未闻的。

这个地区人口增加很快：巴亚莫区在1943和1953年之间增加百分之六十，埃尔科夫雷为百分之二十五，希瓜尼百分之三十五，尼克罗在百分之三十以上。

最靠近马埃斯特腊山的城镇都在极东端。首先是有十六万人口的圣地亚哥；其次是西班牙人在1558年发现而成为铜矿业中心，并以其著名的黑木慈悲圣母（据说是在十七世纪由两个印第安人和一个黑人在尼佩湾发现的）而著称的埃尔科夫雷。在1958年，它的人口只不过略高于二千五百人。有二万五千五百人的帕尔马索里亚诺在1860年有过一百六十个糖厂，但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只有三个了。在这些地方之间是十八世纪印第安人建立的、有七千人的希瓜尼，作为1895年起义发祥地的、有四千人的拜雷。往西五十哩的巴亚莫有二万人。巴亚莫再往西三十哩、沿海的曼萨尼略，有四万多人。尼克

罗，连同它的糖厂，^①是1571年建立的一个老城，沿岸西去就可到达“格拉玛号”登陆的地点，它有人口七千多人。介于尼克罗和曼萨尼略之间的坎佩丘埃拉有五千人。尼克罗稍北是梅迪亚卢纳，那里有雇用三千人、占地近七万噠的伊莎贝尔糖厂。马埃斯特腊山的西海岸有扩展到曼萨尼略—巴亚莫地区的大约三十哩的一片平原。沿海两岸有两个自由市，那里事实上有六个制糖厂。沿着南海岸的皮隆，也有一个糖厂^②，人口二千五百人，但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另外地方，就没有人口超过一千的任何其他地方了。马埃斯特腊山区交通情况极差。那里主要是一些永远见不到阳光的林间羊肠小径。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种族方面，黑人与白人之间似乎还算相当均衡。尼克罗名义上是白人最多的地区，说来奇怪的是，识字的最少。同时，住在这一地区北部的很多人，特别是住在希瓜尼附近的，都有印第安人的血统，或者也许完全是印第安人的血统。亚拉河流域是古巴所留存下来的印第安人人数最多的区域，但相当有趣的是，它却以最缺乏种族意识见称。

尼克罗区的糖厂都是古巴人所有的，尼克罗厂和皮隆厂都属于胡利奥·洛沃。马埃斯特腊山东部大部分地方是由大地主领地构成的，如水泥制造商兼杉木和桃花心木出口商的莱瓦内塞·巴文兄弟公司所有的塞维利亚大庄园。那里的耕作都只在沿河一带进行。咖啡是广泛

① 雇用工人四千人。

② 雇用一千六百五十人，占地一百三十六卡，另有磨碾工三百七十七人。

种植的，还有一批经济地位朝不保夕的烧炭工。山的东端有盛产蜂蜜的低坡。在这一地区的极西端，在克鲁斯角附近，有属于塞斯佩德斯老家族的地产。还有属于贝亚蒂糖业公司，属于洛沃的大型新尼克罗糖业公司，属于卡斯蒂略家族的不同成员，以及克鲁斯角公司（它控制皮隆糖厂）的大庄园。这些大庄园都是由总管经营，总管的主要任务是防止他们雇主的土地不被占据公地者侵占以致不断缩减——于是经常发生火并和有时造成死亡；总管可以烧掉占据公地者的房屋，占据公地者又反过来报之以暗杀。每一方都各有其著名的头头和一帮党羽。很多人都把马埃斯特腊山看作是囚犯的最后逃遁藪，它在很多方面确实同美国内战以前的西部蛮荒相似。

这便是多少年来作为头头的克雷森西奥·佩雷斯偕同他手下的占据公地者的子弟，在1956年12月25日开始带领卡斯特罗手下的人进去的严防坚守的最偏僻的地区。几天以前，这一行的成员之一，那个浸信会派的学生福斯蒂诺·佩雷斯偕同两个农民向导（基克·埃斯卡洛纳和拉斐尔·谢拉）离开马埃斯特腊山前往哈瓦那，要去同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城市支持者建立联系，把他们重新组织起来，并证实卡斯特罗事实上依然活着，^①同时试图确定哈瓦那和其他城市一切可以利用的武器是否已运

^① 关于福斯蒂诺·佩雷斯，见雷内·拉伊·里维罗书。福斯蒂诺·佩雷斯出身于拉斯维利亚斯一个新教的中下层家庭，曾经负责主持在哈瓦那第一长老会隔壁的一家药房，这里也是他在参加卡斯特罗方面以前、为民族革命运动储藏炸药的所在。参看另一篇有关佩雷斯的记述，见《波希米亚》周刊，1962年11月30日。

到山区去了——这是卡斯特罗一贯坚持的、但是没有迅速执行的一个指示。福斯蒂诺·佩雷斯在圣诞节到了哈瓦那。

第八章

赫伯特·马修斯上山

哈瓦那人按照传统庆祝 1956 年的圣诞节；报纸上尽是各种广告：有埃尔恩坎托那家最大的百货公司供应礼品的广告；有飞往迈阿密票价三十六美元的广告（“五十五分钟纯娱乐性的飞行，快班飞机每日五次”）。“典型古巴乡下茅舍式”的兰乔·卢纳饭店告诉它的老主顾说，最近三年，人们已在那里吃掉了三十二万四千只鸡。美国人向他们的侨民社会各式各样“主要”成员及其勤劳的妻子们（美国俱乐部、游历者俱乐部、妇女俱乐部和“卓越的书及顶针协会”的积极成员们）告别。“阿格拉蒙特制糖厂的约翰·艾伯特·费雷拉老夫妇的快活的一家将在乡下俱乐部他们的女婿和女儿克拉伦斯·邦斯特拉夫妇家里欢度圣诞节”。“古时的伟大圣诞故事”又将在赛会中重新讲给成百上千的美国人 and 古巴人听。《哈瓦那邮报》重提 1956 年的苏伊士运河和匈牙利危机，而暗指武装部队，“正希望以最少的生命损失来控制奥连特省的革命者”，并且满怀信心地声称，“即使我们被迫与共产主义的俄国兵戎相见，我们的力量归根到底将在于我们对基督的虔信。”《世界报》说，“恐怖主义和破坏行动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受到谴责，现在正值圣诞节，尤更应该受到谴责。”有一条广告这样报喜说，“请选择爱尔兰麻布作为你们古

巴愉快假日的一种耐久而可爱的纪念品。”另一条广告则以“古巴最精美的阿图埃牌啤酒的名义向诸位祝贺”。

但是圣诞节的神灵，这个富足社会的操劳过度的幽灵，实际上是很虚弱的。福斯蒂诺·佩雷斯从山上来到哈瓦那之后，从胡利奥·卡里略那里拿到了一千美元，供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在圣诞夜之用。七月二十六日运动计划在假日中进行打击，很多炸弹爆炸了，致使奥连特省的几个城市灯火全熄。巴蒂斯塔的军队也进行打击了。奥连特省北部奥尔金的驻军司令费尔明·科莱上校，象巴蒂斯塔的许多支持者一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就是ABC党的支部成员，他下令进行一系列报复。因而在奥连特省各地有二十二个人被杀，有些是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成员，有些是人民党人，有些是革命党人——所有这些都是反对党的成员。有两个被吊死，尸体挂在奥尔金城外的树上。

谣言纷纷。各大报的发行人号召大家“保全社会”，也谴责对恐怖主义的“暴力镇压”，还表示愿意进行调解。但是效果毫无。除夕是进一步使用暴力的信号。七月二十日六运动在几处公共场所安放了炸弹；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主要成员在那个规模宏大的热带夜总会小心地安放了炸弹，炸掉了一个十七岁姑娘的臂膀，炸伤了前警察局长的女儿玛尔塔·皮诺·多诺索，并造成其他的损害。圣地亚哥也有炸弹爆炸。军队至少在奥连特省又杀死三个人，在拉斯维利亚斯也杀死二个。

这时，哈维尔·帕索斯是哈瓦那七月二十六日运动

的领袖之一。他和其他一些人，1933年的革命者的子弟，如莱拉·桑切斯和劳利托·罗亚(奥雷利亚诺·桑切斯·阿朗戈和劳尔·罗亚的儿子)，以及另外几个人，如超现实主义画家曼努埃尔·科塞罗，法律系学生领袖马塞洛·费尔南德斯和路易斯·德拉奎斯塔，都是常常在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古巴分会办公室碰头的一批二十岁上下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著名成员，当时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古巴分会是由一个年龄较大、经验较丰富的政治作家马里奥·列雷纳领导的。这些人在1956年的靠拢卡斯特罗，至今仍然是七月二十六日运动集结知识分子最为重要的一次。

新年的悲惨事件似乎并没有打扰在哈瓦那欢度新年的纽约市长罗伯特·瓦格纳。“象你这样的访问，”巴蒂斯塔用英文向他保证说，“对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作出了非常之大的贡献。”瓦格纳市长在互表敬意，互讲笑话声中，一路去到巴拉德罗。这种孤立的事件也许不会有多大影响，即使在巴蒂斯塔的公共关系部长切斯特·阿图尔的说服之下，把这些事件累积起来也难以发生任何具体的影响。但是，这些事件却继续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北美官方和古巴官方是关系密切的。后者的敌人似乎也很容易成为前者的敌人。如果瓦格纳市长看上去很乐于从巴蒂斯塔总统手里接受塞斯佩德斯勋章，那末似乎瓦格纳市长也必然会赞同巴蒂斯塔总统的所作所为。在瓦格纳接受勋章时，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托马斯·威尔逊将军欣然出席。这一点由于古巴以军事奖章颁发给美国军事代表团退休团长艾萨克逊上校，而更加确凿无疑了。这

类访问不仅仅以北美人为限：1956年10月，以色列的达扬将军的女儿娅埃尔曾经以一部希伯来文的圣经同塔维尼利亚将军交换了一面纯丝的古巴国旗。

在公布美国在1956年下半年的投资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时，这种精神也同样适用；在1952年至1957年间共计有三亿五千七百万美元的私人新投资。1956年，德士古和壳牌石油公司在古巴投资了四千万美元。这类投资中有些是以古巴和美国联合资本进行的，而且象通常的情形一样，也很难分得清。有些古巴公司有美国投资人，有些美国公司有古巴股东。古巴对美国实业界仍然是一个非常具有诱惑力的场所。1957年1月，古巴经济正处于创纪录的水平上，而古巴每人的平均收入已上升到四百美元，即总数二十四亿美元——几近于拉丁美洲每人收入的最高额。由于最近按期偿付公债，国家信用很高。哈瓦那及其附近的公私建筑，散发出狂热的、但靠不住的幸福的气氛。在独裁制把它的后果掩蔽起来的时候，北美投资人没有看到政治危机已经恶化。此外，在1月间，对于卡斯特罗的部下或其他人等会在收割期间使用烧毁甘蔗这一传统武器的担心，似乎已经证明是毫无根据的了。帮会活动已趋衰退，同时美国的经纪人满意地注意到巴蒂斯塔和特鲁希略的关系已经有了改善。古巴的农业部长甚至同意参观圣多明各的一个牲畜展览会，所以现在更不必担心以那里为基地的帮会分子来进袭了。卡斯特罗的起义，即使真的还未根除的话，在华尔街看来，似乎也不会构成一种经济威胁了。美国实业界继续在哈瓦那举行会议，实业家过着奢侈的生活，妓院

和淫猥的电影甚至比匹兹堡还更惊人，而且在表面上甚至连从前的哈瓦那也望尘莫及。新旅馆的金碧辉煌是无与伦比的。古巴的部长们继续在华盛顿受到接待：1957年1月，国防部长圣地亚哥·雷伊以官方客人的身分前赴美国。他和古巴的其他部长们毫不困难地俯拾了美国政治家攻击共产主义的那套陈词滥调的破烂货，并且照例斥责卡斯特罗、普里奥以至特鲁希略和其他敌人为“共产主义的”。^①

但是古巴警察的行为却不象是已经征服了它的敌人的样子。1月2日，当全国还没有消化掉圣诞节和新年的惹人反感的新闻的时候，有四个青年——其中有一个叫威廉·索莱尔的，只有十四岁——在圣地亚哥一个空的建筑地基上被杀害了。这几个青年显然是因有参加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假日活动的嫌疑而被捕并受过酷刑的。结果，在1月4日，有一支五百个妇女的队伍，以索莱尔的母亲为首，身着丧服，缓缓地走过圣地亚哥的通衢大道，高举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不准杀害我们的儿子！”报界领袖的调解建议得到了各式人物的支持——咖啡商、扶轮社、共济会、商会、哈瓦那大学评议会等头面人物——其中大多数是一面呼吁和解，一面斥责恐怖主义。但是副总统瓜斯·因克兰在欢迎报业集团的努力时说，报业集团的领袖克里斯托瓦尔·迪亚斯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是巴蒂斯塔总统的朋友”，从而多少破坏了人们

^① 《哈瓦那邮报》，这份典型地代表古巴的美国殖民社会观点的报纸，迟至1957年2月16日还报道说，“麦卡锡虽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他也是一个美国参议员和爱国公民。”

的印象。^①

不时发生的暴力行为仍是继续不已。1957年1月间，古巴至少每星期总有一个地方发现一枚炸弹。经常捕人，而被捕者的遭遇则往往不得而知。1月13日夜间，特别警察局局长奥兰多·彼德拉上校在米拉马尔第五街上的住宅遭到一辆驶过的汽车的枪击。这时，卡斯特罗的母亲出面呼吁巴蒂斯塔，救救她儿子的性命，让他和他的朋友逃往一个大使馆。1月15日，宪法保证（在奥连特省早已暂停）在全岛停止实施。

卡斯特罗在山区重新集合起来的队伍现在又出现了，人数仍然是二十人左右。1月14日，这支队伍已经到了马格达莱纳河，他们洗涤过后，准备进攻在那条小河河口的拉普拉塔兵营。在这当口，他们显然有二十三件武器——九支带瞄准镜的步枪、五支半自动步枪、四支带保险的步枪、两挺汤普森机关枪、两挺手提式机关枪和一支16毫米口径的气枪。又有几个农民同他们有了泛泛的联系（爱德华·迪亚斯、曼努埃尔和塞尔希奥·阿库尼亚）。^②他们还有一个名叫梅尔基亚德斯·埃利亚斯的农民作为向导。在这一天中，他们遇到两个农民，都是那个向导的亲戚，为了提防起见，他们把其中一个抓起来。1月15和16两日，他们小心翼翼地监视着兵营，并且又抓

① 《哈瓦那邮报》，1957年，1月6日。克里斯托瓦尔·迪亚斯（生于1894年）是一个建筑师和《祖国报》的所有人。他也是哈瓦那电台的创建者。

② 巴蒂斯塔的司令巴雷拉上校后来公正而准确地把阿库尼亚斯同胡利奥·格雷罗和奇乔·门多萨一道说成是著名的土匪。后者是一个准土匪头头，而且为地主而同占据公地者进行斗争。

到两个人，其中一个说兵营里面有十五名兵士。另一个把当地土地持有的详细情形告诉了他们——拉维蒂家族如何拥有巨大的半封建式庄园，又如何由三个臭名昭著的暴戾总管来防范占据公地者。

不久之后，这几个特务之一，埃尔马乔庄园的总管“奇乔”·奥索里奥喝得烂醉如泥，骑着一匹骡子，在一个黑人娃子伴随下走过来了，乌尼维索·桑切斯冒充乡村警卫队喊他停下来。奥索里奥立即回答口令：“蚊子”。卡斯特罗已能够使他相信自己就是军队里的上校，正在搜索起义者。奥索里奥告诉卡斯特罗说，拉普拉塔兵营里的部队行动十分迟缓，并且提供了其他很多情报，包括有人主张一旦把卡斯特罗捉到，就立刻加以杀害等等。卡斯特罗于是布置他手下的人准备在1月16—17日进行夜袭，并将他们分为四组，分别由胡利奥·迪亚斯、卡斯特罗本人、劳尔·卡斯特罗和胡安·阿尔梅达领导。在1957年1月17日凌晨两点四十分攻击开始的时候，“奇乔”·奥索里奥这个不义的管家就在依然沉醉之中被枪决了。^①

袭击的原则是，要在黑夜里从几个方面发出密集的炮火，然后要求对方投降。因为兵营冷不提防，所以这个

^① 后来，卡斯特罗对新闻记者胡莱斯·杜波依斯谈到这次情况时说：“我们到达马埃斯特腊山时，枪决了一个大农场的工头。他曾经指控佃户为同情起义者，并通过霸占他所谴责的那些人的土地，而把他的地主的土地从十噶增加到了四百噶。”（胡莱斯·杜波依斯书，第145页）。在谴责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残忍”时，两位农场主后来把“奇乔”说成是“军队的向导”。（参看《哈瓦那邮报》，1957年6月19日。）

办法进行得很顺利。兵营旁边的几幢房屋也被格瓦拉和卢西奥·克雷斯波放了火。菲德尔分子随后猛攻这个地方，士兵全都投降。一共发射了一千五百发子弹。巴蒂斯塔方面死二人，伤五人，三人被俘。另一个极不老实的事务长奥诺里奥和几个士兵逃走了。卡斯特罗方面一个人也没有损失。他下令将兵营付诸一炬。受伤的兵士中有三个死了。菲德尔分子返回丛林时，把其他的人留交俘虏照管。

这次胜利使卡斯特罗能够为他的军需增添了一些斯普林菲尔德步枪、一挺汤普生新机关枪、几千发子弹和各式各样的子弹带、柴火、衣服、食品和刀。有一个俘虏后来参加了卡斯特的部队。卡斯特罗释放了军队所扣押的全部农民，然后向离开图尔基诺峰更近几千米的下一道河，帕尔马莫查河挺进。他们在途中看到了农民被迫离开山中的惨状。前一天，总管和乡村警卫队曾对占据公地者说，空军为肃清起义者，将在山区某个地区进行轰炸，还说如果他们爱惜自己性命，就必须离开。由于政府并不知道菲德尔分子在那个地区，而且第二天也并没有空袭，所以这显然是总管们为了私利以便赶走农民的一个企图。^①

我们所遇到的几乎每一批农民(卡斯特罗五年以后回忆说)都有一些怨言。自然，我们开始做点政治工作，想把农民争取过来……他们在平原劳动十五天，攒集起十五到二十个

^① 格瓦拉：《革命战争随笔》，第17—18页；卡斯特罗，1961年12月2日，《革命文献》，1961年，第46卷，第22页。

比索,买一点盐和油脂,然后带回到他们所住的小咖啡农场去。农业银行只给那些已经富裕起来的农民以信用贷款。当乡村警卫队走过这样一些农民的住宅时,肯定最少也会毫不客气地吃上一只肥鸡;粮食商将粮食高价卖给农民。这里没有学校。这些就是我在山区遇到的情况——(革命的)客观情况……

1月19日,报纸上登出了一段捏造的消息说“在拉普拉塔的冲突中,叛乱者死八人,军队方面死二人”。但是,3月1日,军方宣布,事实上,死于这次战斗的兵士有十二人——而“叛乱者(有)四十人”死亡,后来还有二十人被俘。也就是说,把起义者的伤亡说得比其总数加倍还要多——如果以此判断其他政府在类似的战争中所发表的消息是否正确的话,这无疑是一个有用的标准。

这时,卡斯特罗事实上正在朝着一条被称为阿罗约—德尔—因菲埃尔诺的小溪北进。由于算计到军队会追踪尾随,他准备了一次简单的伏击,但是结果几乎被格瓦拉破坏了,因为格瓦拉穿着在拉普拉塔缴获的一件巴蒂斯塔部队的制服,而遭到了西恩富戈斯的射击。最后,巴蒂斯塔有一小股部队,即桑切斯·莫斯克拉中尉所领导的一支侦察队的一部分(属于卡西利斯少校新指挥的一百人部队)出现了,他们注视着林间空地中央的两个茅舍,卡斯特罗手下的人故意不去躲在里面,因为他们想起了1953年卡斯特罗本人在袭击蒙卡达之后在一个茅舍里被擒获的往事。卡斯特罗开了第一枪,打死了一个人,另外三个巴蒂斯塔分子也被打死,有一个是被格瓦拉打

死的。后来双方都撤退了，菲德尔分子缴获了一支步枪、一支加伦枪和一条子弹带。这次有限的成功，使卡斯特罗懂得了怎样去袭击侦察队的前卫部队，因为“有前卫就有部队”。菲德尔分子后来发现，桑切斯·莫斯克拉也击毙了一个黑人农民，因为他拒绝为他们作向导。

卡斯特罗继而折返西南，到他们在攻打拉普拉塔以前的所在地去，就是那个被称为加拉加斯的丛林密布的山区。他们发现形势已经改变了，因为军队曾经开过那里，卡西利亚斯少校已把很多占据公地者赶了出去。卡斯特罗只找到一些空无人居的茅舍。这时，有一个名叫欧蒂米奥·格拉的农民重又参加进来，此人早先曾经作过向导，在攻打拉普拉塔以后，下山去探望他的母亲。事实上他曾经被军队抓去过，并且为了一万美元和一个军衔，已经同意去结果卡斯特罗的性命。他是一个著名的土匪头子，象克雷森西奥·佩雷斯那样是一个反抗总管及其走狗的占据公地者的保护者。

这时候，菲德尔分子有点沮丧：队伍中各式各样的成员都要求准许他们进城。卡斯特罗宣布，凡是不服从命令、逃跑和有失败主义情绪的，都要处以死刑。格瓦拉迄今所作的评论只是干巴巴地说，起义者缺乏“在斗争中锻炼起来的精神……思想上缺乏清醒的觉悟”。^①前一天出现在他们头顶上的一队战斗机，以机枪扫射他们附近的树林，一下子使士气都低落了。他们还不知道欧蒂米奥·格拉事实上就在一架飞机上指示进攻。在这种情

^① 格瓦拉：《革命战争随笔》，第24页。

况下，卡斯特罗在1月下旬作出了一项非常危险但实际上是带有根本性的决定，那就是派雷内·罗德里格斯去哈瓦那，对其追随者们说，他愿意会见一个外国记者，因为古巴报纸都在新闻检查的控制下，没有必要会见一个古巴记者。

空袭使得菲德尔分子意气消沉，人员纷纷离去。有一个当过土匪的农民塞尔希奥·阿库尼亚离开了这个团体，他的兄弟曼努埃尔，偕同卡利斯托·加西亚和卡利斯托·莫拉莱斯，也暂时离开了大队。幸而在同一天，2月1日，又有十个来自曼萨尼略的新追随者，在罗伯托·佩桑特的带领下，顺利地到达了卡斯特罗那里。外科器械和衣服随即从曼萨尼略带到，虽则有一个新来的人很快就被桑切斯·莫斯克拉的前哨不时发出的射击所击毙——这是自从阿莱格里亚德皮奥事件以来，卡斯特罗方面牺牲的第一个人。大队向埃尔阿希河迂回，一直在寻找他们所熟悉的地方，以便同占据公地者建立联系，并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以接受来自曼萨尼略方面的人员和供应品的支援。又有一些占据公地者参加进来，其中有一个四十五岁的文盲，胡利奥·塞依·阿科斯塔，这个人成了格瓦拉所谓的接受革命教育的第一个学生：格瓦拉教他识字母。

这一批人带来消息说，几天以前开小差的塞尔希奥·阿库尼亚已经回到家里，大吹他作为一个游击队员的种种活动，结果被出卖了。他曾遭到毒打，后来被罗塞略班长枪决，并把他的尸体悬挂示众。格瓦拉评论说，这件事教育了大队关于“团结一致的价值和个人试图逃离集

体命运的徒劳无益”。后来便对那些不可靠的和精力衰竭的人进行了一次清洗，于是“西班牙的老战士”查奥，雷纳尔多·贝尼特斯和爱德华·迪亚斯都被遣送下山，同时拉米罗·巴尔德斯和伊格纳西奥·佩雷斯，克雷森西奥的儿子(象他父亲一样是一个占据公地者的头头)也都暂时被送去养伤：查奥对事业已经失去信心，说起义者是在从事“一件非凡的蠢事”。

这时出现了一个离奇的圣经小故事。叛徒欧蒂米奥·格拉回到山区，说他从梦里得知森林马上就要遭到空袭。于是，接着便讨论做梦事实上是否能够成为这类事情的预兆。以“解释政治和文化性质”作为日常工作一部分的格瓦拉，耐心地解释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些人——文盲阿科斯塔就是其中之一——却坚信这种生理学的解释。几夜之后，格拉打算下手结果卡斯特罗的性命了。他抱怨自己没有毯子，要求卡斯特罗借一条给他(那时候夜间很冷)。卡斯特罗回答说，他们不如共用一条毯子。于是，卡斯特罗和这个带有一支0.45口径手枪的叛徒同盖一条毯子。但是卡斯特罗还有三个卫兵在一起，欧蒂米奥·格拉拨弄了一整夜手枪，却拿不定主意在什么时候开枪。

虽然他对于自己的使命踌躇不决，但他并非不是胆大妄为的；第二天，他根据他那著名的梦中先见，预言杜罗山(这时卡斯特罗离它很近)将会遭到巴蒂斯塔的飞机扫射。当这个预言成为事实时，他喜不自禁，卡斯特罗的支持者疏散了几天——农民拉夫拉多尔，阿曼多·罗德里格斯和新自曼萨尼略来的一行人之中的六个，不是牺

牲了，就是在失望之余逃跑了。一、两天后，抓到了一个农民儿童，他说，他曾经在卡西利亚斯上尉的总部里同欧蒂米奥谈过话。卡斯特罗移动了他的营帐，刚刚移动不久，就遭到了扫射，阿科斯塔被打死了。对于欧蒂米奥·格拉的怀疑越来越大，但是毫无办法，因为菲德尔分子已经分开好几天了。在2月12日重新会合时，又有一些损失，菲德尔分子仍然只有十八个人。大约在第二天，他们向平原移动，在拉蒙特里亚农场同城市中一些菲德尔分子的代表举行了一次会议——有来自哈瓦那的艾德·桑塔马利亚和阿曼多·阿特，来自圣地亚哥的弗兰克·派斯、塞莉亚·桑切斯和比尔马·埃斯平。（这次特别挑选妇女出席会议，因为据认为妇女较容易通过军队栅栏。）派斯先前曾劝说卡斯特罗出国，以便团结国外的革命力量；但是，看到了卡斯特罗的决心、信心和精力，他现在改变主意了。

会后几天，卡斯特罗的起义便在北美声名大振。卡斯特罗注意到北美报界在独立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由雷内·罗德里格斯带到哈瓦那的那个口讯，要求一个外国记者到山区来，的确是聪明的一着。时机是有利的。军队在圣诞节的执行死刑，改变了哈瓦那很多专业人士的人心向背，包括很多人民党人在内，他们越来越是准备认真地把卡斯特罗看作是真正同巴蒂斯塔斗争以维持反对派威望的一个力量。在改变了他们立场的典型人民党人中，也包括直到最近还是他们的名义党魁的劳尔·奇瓦斯在内。1月28日，奇瓦斯在圣地亚哥会见了弗兰克·派斯后，回到哈瓦那，试图按照圣地亚哥现有的形式组

织“公民抵抗运动”，重新恢复反对马查多斗争时期的ABC党秘密组织。伊格纳西奥·门多萨这位人民党领袖曾经在反马查多斗争中担任过炸弹安放者的头头，他出身于哈瓦那著名的法律和商业家庭，现在成为哈瓦那反巴蒂斯塔斗争的一个首脑人物。门多萨由于具有经纪人的身份，似乎不会受到嫌疑。公民抵抗运动被认为是由中、上层阶级不问党派的人所构成的一个独立的、非政治性的秘密组织；其实，从一开始它就是城市中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一个前沿组织，也是筹措供应品和金钱的一个工具；另一方面，在里面工作的很多人却认为，自己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实际参加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因为他们认为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太走极端。

一度是加西亚·巴尔塞纳的支持者的年轻工程师恩里克·奥尔图斯基，成为公民抵抗运动的哈瓦那的领导人；他在1955年中期已经参加到卡斯特罗方面来。劳尔·奇瓦斯发现，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就得到了一千美元，其中大多是按照协议由各认捐一美元的人通过十人小组缴付的。^①在这几个星期内开始同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合作的另一个著名人物，是古巴数一数二的经济学家、普里奥时代的国家银行行长费利佩·帕索斯。他的儿子自从1955年年底以来，一直积极参加反巴蒂斯塔的斗争，并且显然正如很多古巴人一样，这个儿子也迫使这个父亲参加了他儿子已经为此而不惜冒生命危险的那个运动。象门多萨一样，帕索斯曾经参加过反马查多的斗争，并

^① 公民抵抗运动的制度是，任何人只能知道这个组织中的十个成员；每一个小组的头头也只知道他的上级等等。

且是1933年大学生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虽然帕索斯不能自吹有大批党羽，但是，他的接受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正表明古巴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发展。

卡斯特罗邀请外国记者上山一事，帕索斯家族已经顺利地办到了。费利佩·帕索斯前去《纽约时报》馆，该报记者，那位刚强的鲁比·哈特·菲利普斯夫人，本人就是反马查多斗争的老战士，他们商定由赫伯特·马修斯从纽约赶来，试图访问卡斯特罗。马修斯是《纽约时报》的一位高级编辑，富有拉丁美洲事务的经验，曾经广泛地采访过西班牙内战的新闻。^①他虽然已五十七岁，却老当益壮。二十年前，海明威称他是“勇如穴熊”。马修斯以他的妻子为掩护，由哈维尔·帕索斯和福斯蒂诺·佩雷斯护送到曼萨尼略。帕索斯本人后来说，“我必须承认，在我看到卡斯特罗以前，我自己内心里对于卡斯特罗是否在山区，是不无怀疑的。”与此同时，巴蒂斯塔在1月12日宣布“整个古巴平静无事”，除了“其身份已完全得到证实”的共产党人所投的三、两枚炸弹以外。^②

马修斯把妻子留在佩德罗和埃纳·绍梅尔这两位曼萨尼略的小学教师兼卡斯特罗支持者的家里之后，就在2月15日动身入山，并于2月17日黎明会见了卡斯特罗。

他和帕索斯以及其他几个人乘汽车走了很多路，最

① 赫伯特·马修斯(生于1900年)，1918年参加美国军队；1922年—1966年在《纽约时报》工作。

② 《哈瓦那邮报》，1957年1月12日。

后一段路才步行。他深为感动地说：“这个人具有慑服人的个性。不难看出，他手下的人都爱戴他……这是一个受过教育的、有献身精神的狂热者，是一个有理想、有魄力又有领袖的显著品质的人……让人们觉得他现在是不可战胜的了。”这次会见，意义相当重大。第一，马修斯为北美人创造了关于卡斯特罗的传说，说他是山岳英雄，“辩才横溢”，“是一个橄榄色皮肤、圆脸庞、胡髯修整的堂堂六呎之躯的伟大人物，他身穿一套橄榄灰的便军服，背着一支他非常引以自豪的、带瞄准镜的步枪……”“能说会道，公平对待农民，他们所吃的东西，没有不付钱的”。此后三年，菲德尔·卡斯特罗成为北美 的一个英雄，这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甚至一度使他怒发冲冠的。

第二，这次会见夸大了卡斯特罗所领导的人数。卡斯特罗说，巴蒂斯塔是以“二百人为一纵队进行活动；我们则是以十至四十人为一小组活动的”，虽然“为了明显的理由，我不愿意告诉你，我们有多少小组……”“他们作过多次战斗，并使对方蒙受重大伤亡，”马修斯这样报道说；他又记述卡斯特罗的话说，“现在我们已经战斗了七十九天，而且越战越强。巴蒂斯塔的部队打得很差，士气低沉；我们的士气却再高也没有的了。”马修斯报道说，卡斯特罗手下的人有五十多支带瞄准镜的步枪，同时卡斯特罗给人以这样一个清楚的印象，即他原来“格拉玛号”的八十二个人是一个牢不可破的核心，并且自那时起已经有了大大的增加。“当青年从奥连特省各地前来的时候，（他们已）使政府陷于绝境”。事实上，劳尔·卡斯特罗

是让同一批人在马修斯的面前不断地走来走去，使人认为，卡斯特罗大部分时间是呆在“另一个营帐里”；卡斯特罗当时只有十八个追随者。^①诚然，卡斯特罗还可以算上克雷森西奥·佩雷斯、他的儿子和另外几个象曼努埃尔·阿库尼亚那样暂时不在但经常跟他在一起的农民。马修斯明确地说，在奥连特省“有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全心全意地拥护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们认为他所代表的新政”；这些是同情者，而且是一些可以武装起来的同情者。事实是卡斯特罗通过象佩雷斯这些人，越来越得到占据公地者和他们的领袖的信任，以反抗大大小小的地主们，因为这些地主认为巴蒂斯塔的军队和战争状态的存在，有助于把占据公地者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当卡西利亚斯中尉把农民逐出帕尔马莫查区域时，占据公地者方面的这种“革命态度”增强了：占据公地者的领袖们发现同山区新势力的合作已越来越有必要了（卡西利亚斯是一个恶棍；他保存了满满一盒子人耳朵让他所喜爱的客人们观赏；他嗜杀成性，有一次，他对一个客人说，等古巴战斗结束之后，他决不呆在一个和平的地方，而将动身去哥伦比亚，为佩雷斯·希门尼斯上校进行战斗）。但是，卡斯特罗以他的性格和精力对马修斯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以致马修斯向他提到“是否可以报道他将宣布在山区成立革命政府的消息”。“还不能，”他回答说，“时机还不

① 原有的“格拉玛号”成员计有：劳尔·卡斯特罗，阿梅赫拉斯，雷东多，莫兰，克雷斯波，阿尔梅达，胡利奥·迪亚斯，乌尼维索·桑切斯，西恩富戈斯和格瓦拉；占据公地者计有：法哈多，吉列尔莫·加西亚和西罗·弗里亚向斯；曼萨尼略的生力军有：佩森特，莫托拉，亚约，埃切瓦里亚；连同靠不住的向导格拉。

成熟。在适当的时刻，我自己会宣布的。”

马修斯访问马埃斯特腊山的文章在2月24日发表后，立即使卡斯特罗成为一个国际性人物。因为第二天，古巴的新闻检查恰好暂时取消，所以卡斯特罗仍然活着的消息很快就举国皆知了。对于卡斯特的武装力量这种不正确的高估，有助于把城市的古巴人吸引到他的事业方面来。人们认为，卡斯特罗正在取得胜利，巴蒂斯塔的报导不再可靠了，所以应该拥护卡斯特罗；卡斯特的士气也提高了。巴蒂斯塔军队的士气进一步低落了，后来，当国防部长圣地亚哥·雷伊既否定马修斯能够穿过军队对马埃斯特腊山的包围，又否定卡斯特罗还活着的消息时，使得政府陷于啼笑皆非的境地，因为马修斯接着就发表了一张他本人和卡斯特罗在一起的相片。

卡斯特罗在他的部队的规模方面欺骗了马修斯，但在他的政治目的方面，却没有太多的欺骗。“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大谈国际主义、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马修斯这样写道。这些观点一定是从哈维尔·帕索斯和他在哈瓦那所遇到的象哈维尔·帕索斯这类人那里听来的。他还在哈瓦那得到了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秘密小报《革命报》，其中刊登一篇题为“革命的必要”的文章，文中出现了“社会主义”这个词儿。^①但是，卡斯特罗对马修斯说：

^① 这篇文章大多录自马里奥·列雷纳未出版的小册子，《我们的理论根据》（第23页），但是核定这本小册子的弗朗基把“社会正义”改为“社会主义”。这个词儿连同卡斯特罗在山区对这个词儿的用法，使得马修斯认定卡斯特罗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主张【《古巴的故事》（纽约，1961年），第79—80页】。这一点也是威廉斯所抓住不放的（《美国、古巴和卡斯特罗》（纽约1962年），第77—79页）。

“你可以相信，我们并不仇视美国和美国人民……我们是民主的古巴和结束独裁制而斗争的。我们并不反对军人……因为我们知道士兵都是善良的，很多军官也是善良的。”“反帝”，以至“民主”自然可以作任何解释。显然，马修斯自己把卡斯特罗看作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但是，自然不能肯定卡斯特罗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在1957年2月，确实难以估计卡斯特罗的政治目的的性质，因为，如上所述，卡斯特罗本人对他的政治教育就提出了很多互不一致的说法。最好还是认为这种教育是在形成之中而不是已经完成。在这个团体中，那个在政治上最为老练的格瓦拉，在他描写山区的运动的记述中，使人看出他甚至也很容易受到象圣地亚哥领袖派斯这类外界人士的影响；据他说，派斯无论如何是有助于他把枪擦得更加灵光的。但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加上卡斯特罗本人是当时山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仅有的几个人。他们的影响一定对卡斯特罗在意识方面起了主导的作用，而卡斯特罗本人，如上所述，并不是一个有确定不移的或条理井然的思想观点，或是一个能够坚持定见的人。即使如此，如果过高估计了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对卡斯特罗的影响的程度，也将是错误的。政治讨论的机会是有限的，这三个人都专心致志于生存、战斗和寻找食物的问题。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山区无疑是一个左右一切的人。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已经为他这类斗争，也许老实说只是为了这类斗争作好了准备。他的纲领，如同在1957年2月一份早期的《革命报》上所描述的那样，就其意思含糊，华而不实以及热切的爱国心来说，也都是确凿有据的：

革命就是古巴民族为达成其历史目的和实现其彻底统一而进行的一种斗争。这种统一包括着下述诸因素的完全统一：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特别是不同的文化。革命不完全是个战争和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一个具有不同的时刻或阶段的连续的历史过程。上一世纪的种种反叛活动，1868 和 1895 年的战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镇压和今天的反巴蒂斯塔的斗争，都是这个过程的部分……革命……就是为古巴生活的全面改造、为财产制度的彻底改变以及为各种制度的变革而进行斗争的……这个革命是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①

至于这时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这个使人烦恼而又引人兴味的问题，布拉斯·罗加这位共产党的总书记在 1960 年说：

第一批战斗小组在山区一建立起来，我们就力图给以一切可能的帮助。一个突出的、广为宣传的例子，就是我们在“格拉玛号”登陆后不久就给所有反对党派发出一封信，要求他们制止政府的杀人魔手，使其不以优势兵力去扑灭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同志们。②

大约六个月后，在 1957 年 9 月，美国共产党的机关报，纽约《工人日报》在抱怨说，古巴共产党并没有因为他们支持起义者而得到充分的荣誉。但是，事实上，在卡斯特罗和马修斯会见的消息发表仅仅四天后，古巴共产党就清

① 引自赫伯特·马修斯：《古巴的故事》，第 79 页。

② 在人民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楚表明了他们同卡斯特罗在“战术上和计划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① 尽管卡斯特罗“具有勇气和诚意”，他们却认为武装行动是错误的。他们深以恐怖主义、破坏活动和烧毁甘蔗为憾。虽然他们承认，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最接近于共产党的“战略概念”，但它对于“帝国主义霸权”——也就是对美国，迄未采取充分强硬的路线。一个月后，当时的共产党主席胡安·马里内略写信给当时将古巴情况介绍给北美而获得盛誉的马修斯说，共产党反对这种“武装斗争”的政策。它支持选举，并以罢工、民众示威和公民抗议这类标准方法促其实现。人民阵线的组成不但应该包括工人和农民，而且应该包括“古巴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所以，共产党虽然后来可以声称，在他们同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在策略的根本问题上有分歧的时候，他们曾经帮助过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但是，尽管是策略上的问题，而导致1959—1960年苏联和中国之间的、或1967年卡斯特罗和拉美共产党之间的公开分裂的，也正是这种问题。

在共产党人之间显然存在着一些分歧。以哈瓦那大学为中心的青年运动和党本身的一些年轻党员——特别是象卡斯特罗的大学同学阿尔弗雷多·格瓦拉和莱昂内尔·索托这一些人——对于把所有赌注都押在争取选举和宪法斗争的胜利上是否可取，都抱着怀疑态度；已经有这样一些人认识到中国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

^① 《人民社会党全国委员会给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信》，录自德雷珀书，第29—30页。

是拉丁美洲取得胜利的唯一希望；他们对于苏联趋向于同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的政策，已经表示不信任了。^①

在马修斯发出山区的报道之后的那几个星期，对卡斯特罗来说，并不是立即就一帆风顺的。欧蒂米奥·格拉这个假向导，终于被控以叛变罪。他痛哭流涕，要求把他处死，而只是请求照顾他几个儿子；他被枪决了，当时雷雨交加，听不到枪声。另一个三心二意的支持者，莫兰，“这个西班牙佬”，把自己的腿打伤后，获准离开团体，留在后方。^② 卡斯特罗的三个老支持者，即躲藏起来的“格拉玛号”上的三个人重新参加了队伍。^③ 但是全部兵力仍是只有二十人左右，而且士气低沉。直到3月5日他们同弗兰克·派斯从圣地亚哥派来的生力军会合以前，一直无所作为。格瓦拉气喘病复发，得留在后方几天。大雨如注，卡斯特罗的靴子已经破了。这支队伍的粮食是靠从拉斯梅塞德斯盆地一个叫作埃米利亚诺的农民和他的儿子埃尔梅斯那里买来的。埃尔梅斯被俘后，泄露了卡斯特罗的情况。在仓促逃走中，格瓦拉的气喘病几乎使他不能离开。艰难的日子继续不已。接着梅里诺高地又遭到了一次进攻，又有一次人员疏散——十二个人随同卡斯特罗，六个人随同不久本人也被击毙的西罗·弗里亚斯躲开了。至于巴蒂斯塔方面，在另一次人事调动中，巴

① 根据私人间的讨论。

② 后来他投了巴蒂斯塔，在关塔那摩被杀死。

③ 劳尔·迪亚斯、吉尔和索托隆戈。

雷拉·佩雷斯少校，就是那个曾在11月间圣地亚哥建立了秩序的人奉派负责奥连特省的军事指挥权，统率一千四百三十人，其中包括一个司令部直辖连，三个步兵连和一连附有一个山炮中队的山地部队，一队工程兵和一个通讯运输组。^①

卡斯特罗的那批人已经来不及同派斯的队伍会合了，但是，有一支由五十人组成的队伍的头头豪尔赫·索图斯千方百计找到了卡斯特罗，并且解释说，他也耽搁了，因为巴雷拉·佩雷斯把道路防守得非常严密。起义军似乎处于穷途末路的境地，甚至连他们所认识的所有占据公地者的支援都无法指望了。但是巴蒂斯塔有一些部队却由于蛮横残暴而惹起占据公地者更大的怀恨和愤怒；特别是因为有海军（分担扫荡卡斯特罗和重建秩序的部分任务）牵涉在内。所以“何塞·马蒂号”快速舰正在克鲁斯角和圣地亚哥间一带沿海巡逻；船上有一位中尉监视海军情报局局长劳伦特和他的喽罗加西亚·奥拉庸在焚烧皮隆附近一带农民房屋的行为。有些溺水毙命；乡村商人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这些行为遭到负责的陆军上校巴雷拉和他的幕僚所反对，他和他的副官送去一份在山区展开有效军事行动的计划，其中包括划一指挥权，撤换上文提到的海军暴

^① 经过坎蒂略将军的核定。司令官计有：巴雷拉，军事行动负责人；卡萨苏斯上校，副司令；海军顾问，罗德里格斯·阿隆索少校；法律顾问，埃瓦里斯托·科尔德罗上尉；第一科，里卡多·格拉奥上尉；第二科，华金·卡西利亚斯·伦普伊少校；第三科，胡利奥·卡斯特罗·罗哈斯上尉；第四科，费尔南多·巴尔·略维拉中尉。

君,和对占据公地者的善后计划;结果是巴蒂斯塔的三位部长,帕尔多·希门尼斯博士、萨拉斯·乌马拉和菲德尔·巴雷托到达了马埃斯特腊山,并且开始兴建房屋,着手创办医疗机构,为学校拟订计划,并普查儿童人口。巴雷拉司令部的哨所设立了免费食堂,每日前往吃饭的多达三百人。不到几个星期,陆军方面开始对占据公地者不怀好感了,因为他们大多数在内心里对卡斯特罗和巴蒂斯塔都是极其怀疑的。到3月底,巴雷拉已经可以考虑他的计划的第二部分了,那就是要建造一条无法渗透的防线,使卡斯特罗集团既不能通过它得到增援,也不能通过它取得供应。

第九章

攻打总统府

甚至在“格拉玛号”登陆之后，山区以外的破坏活动大都是与卡斯特罗运动无关的人们所干的。哈瓦那大学的学生和革命指导委员会一直相当活跃，尽管在革命指导委员会的领袖埃切瓦里亚和它的“知识分子的领袖”豪尔赫之间对于使用暴力问题有所争议，尽管哈瓦那大学在11月下旬曾经封闭了一段时期。卡洛斯·古铁雷斯·梅诺约所领导的左派革命党反对派的一个强大团体也一直是很活跃的。梅诺约是一个三十三岁的西班牙流亡者，曾经参加过法国抵抗运动和美国军队。1957年，他在哈瓦那开了一个杂货店。在政治帮会活动方面同他有联系的有另几个出身相似的人，比如是伊格纳西奥·冈萨雷斯，他也是一个西班牙人，曾经短期被捕并于上年12月释放。这些人虽则基本上是普里奥方面的人，他们也和以多米尼加共和国为基地的帮会分子有联系，并且通过他们而甚至同特鲁希略本人也有联系，并从他那里取得了武器。古铁雷斯·梅诺约曾经参加过著名的卡约·孔菲特斯远征队。同他们牵连在一起的有曾经在1948年参加过对加拿大皇家银行的一次著名的武装袭击的里卡多·奥尔梅多。还有一个有过非政治性活动罪行的、叫做拉蒙·阿尔法罗的人。

这些团体同卡斯特罗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并非志同道合，虽则革命指导委员会在上年夏季曾经在墨西哥和卡斯特罗达成一项协议，^① 虽则通过它同公民抵抗运动（劳尔·奇瓦斯在哈瓦那根据派斯在圣地亚哥的运动路线正在进行组织之中）的联系，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号召日益扩大。总之，古铁雷斯，梅内拉奥·莫拉，埃切瓦里亚和他们的朋友曾经一度积极地但分别地准备袭击巴蒂斯塔本人——这个计划显然首先是由古铁雷斯·梅诺约的一个同志丹尼尔·马丁·拉班德罗筹划的，拉班德罗也是一个西班牙的共和派，因在普林西佩监狱越狱，于上年秋季被捕枪决。

在这期间，在1956—1957年冬季，革命指导委员会同普里奥的联系更加密切了，虽然普里奥也把钱供卡斯特罗使用。攻打总统府的决定因卡斯特罗同马修斯会见后得到公开宣传而格外受到重视。其他一些阴谋者认为时间不再在他们一边了。

总之，2月下旬，埃切瓦里亚所领导的指导委员会的积极分子小组和已经同普里奥断绝关系而积极参加到埃切瓦里亚方面来的卡洛斯·古铁雷斯·梅诺约，拟具了一个比卡斯特罗攻打蒙卡达兵营甚至更富戏剧性的计划。曾任哈瓦那公共汽车公司，即联合汽车公司总经理的另一个前左派革命党成员、代表革命党利益的前国会议员（早先是ABC党的成员）梅内拉奥·莫拉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带来了一大批以个人身份参加的追随者。梅

^① 见本书第122页。

内拉奥·莫拉在公共汽车公司的问题上同普里奥闹翻了，因为在普里奥还是总统的时候，把公司的特许证给了现代公共汽车公司。后来，他曾一度参加到桑切斯·阿朗戈方面去，但是，他总想独树一帜，并且已在1955年中期在哈瓦那组织了一千人之后，就的确这样干了。梅内拉奥·莫拉的儿子阿尔维托，当时在大学读书，是指导委员会的一个成员，不过他是一个左倾分子，而梅内拉奥的兄弟坎迪多却参加到巴蒂斯塔方面，这时当了国会议员。^①有一些革命党人也参加了进来，例如曾经参加格劳和普里奥两任政府特务工作的塞贡多·费雷尔，这时就乘机参加了指导委员会。从一开始，并没有人向七月二十六日运动要求任何帮助或合作。（饶有兴趣的是，在1955年胡斯托·卡里略向卡斯特罗提出企图暗杀巴蒂斯塔的想法时，遭到了卡斯特罗的激烈反对。他反对这种人身攻击。^②）共产党也袖手旁观；他们把指导委员会看成是“普里奥分子、革命党分子和……特鲁希略分子混合而成的一个帮会分子的集团”。^③指导委员会的确是彰明昭著地反共的，并且特别拒绝它所认为是“红色”的那些人参加

^① 1961年，坎迪多·莫拉也许是科奇诺斯湾远征队最老的成员之一。阿尔维托后来是卡斯特罗政权下一个部长。

^② 卡里略：《手稿》，第25页。这是在塔帕丘拉会议上。卡斯特罗以这样的理由解释他的立场说，“这不会使我们当权，而权却会落到反动的军事委员会手里”。

^③ 马科斯·阿曼多·罗德里格斯给华金·奥尔多基的信，《今日报》，1964年3月21日；1957年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的塞萨尔·戈麦斯后来拿出一张年青共产党员富尔亨西奥·奥罗斯同埃切瓦里亚合摄的照片来予以攻击（同上，1964年3月8日）。

——这是明智的，因为至少申请者之中有一个是马科斯·阿曼多·罗德里格斯，这个人虽则是豪尔赫·巴尔斯的朋友，却力图巴结那个自己也想参加的共产主义青年团。^① 指导委员会领袖之一的福雷·乔蒙，后来声称，它的杂志《母校》“常常登载列宁的语录”，^② 并且它的创办人卡洛斯·弗朗基在1946—1947年以前肯定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指导委员会的一般态度是反共的、民主的、中产阶级的，并且基本上还是天主教的——不管后来人们常常怎么说法。

攻打巴蒂斯塔总统府的计划是打算采取一种突击行动，用一百人左右，以多胜少，直冲总统府的卫队。他们将一路开枪，打到一楼巴蒂斯塔的寓所，干掉这个独裁者。在这期间，何塞·安东尼奥·埃切瓦里亚和其他几个人将攻占哈瓦那广播电台，并宣告专制制度告终。详细计划由古铁雷斯，偕同梅内拉奥·莫拉和代表指导委员会的福雷·乔蒙和弗鲁克托索·罗德里格斯共同拟订，这些人都是警方所熟悉的，所以不能自由行动。3月9日，有五十个人聚集在卡洛斯·古铁雷斯租赁的一个公寓里待命。俄国诗人叶夫图申科从一个古巴人那里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在他的自传里命笔写道：

各人各有其爱好——这一个在阅读，那一个在写诗，其他一

① 这个倒霉家伙后来背叛了，落得个悲惨结局，这似乎就是他的品格的唯一解释。

② 《今日报》，1964年3月21日。

些人则在下棋。在这些革命者中，有两个画家，一个是写实派，一个是抽象派。他们一边绘画，一边激烈争论（虽然，鉴于情况特殊，是悄悄地说话的）几乎就要动武了。但是，当最后命令到达时，这个写实派画家和那个抽象派画家都去为他们国家的前途而战斗，并且一起被杀害了。^①

自然，决不是所有参加这次攻打的人都是英雄或者理想主义者；有几个不过是想领略一下紧张战斗的情况，喜欢弄枪弄炮的人。这支队伍，除了巴尔斯和平主义派不算，包括指导委员会大多数人在内，总共约八十人。有些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成员是自行参加的——其中有一些是蒙卡达时代的、原来在阿特米萨的菲德尔派成员。在攻打的当天早晨的最后一分钟，他们才问哈瓦那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主要代表哈维尔·帕索斯，菲德尔分子是否愿意参加；他拒绝了。卡斯特罗显然不知道这一切情况。他在收听到广播时，也只能告诉他的同伴说，“哈瓦那将发生一件大事了。”^②事实上，这是对总统府的一次勇而无谋的正面攻击。

因为参加人数很多，很难相信计划不会被泄漏出去。事实上，巴蒂斯塔通过窃听电话，在11日已经得知行将发生的事情了。他的反应，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嘱咐特别

^① 叶夫图申科：《一个早熟者的自传》第121页。这两个人是路易斯·戈麦斯·汪古埃梅尔特和何塞·布里尼亚斯——虽则事实上第一个人并没有死。

^② 据阿梅赫拉斯说，见弗朗基书，第131页。另一方面，利马博士说，事前他在给埃切瓦里亚的一封信中已经得知这次进攻，并加以鼓励。

警察局局长彼德拉上校通过坎迪多·莫拉这个在残余众议院中还有席位的政客捎个信给他兄弟梅内拉奥。但是这个口信显然没有讲清楚。总之，起义者在3月13日午饭后就立即发动进攻，而巴蒂斯塔的部队也对某种袭击作好了准备，虽则详情不明。巴蒂斯塔正在阅读《林肯遇刺日》以排遣他那无聊的暴君生活，他不知道袭击会在那一天临头，也想象不到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动。

进攻分两起进行。由古铁雷斯·梅诺约指挥而以指导委员会的福雷·乔蒙作为他的副指挥的第一起，有五十人，配备有手提式机关枪、十二挺卡宾枪和一批0.45口径的手枪。这些人分别乘一辆别克牌小轿车（四人）、一辆福特牌小轿车（四人）和一辆贴有“快递”标志的卡车（四十二个人）。所有的人都穿着衬衫，巴蒂斯塔一直禁止这样装束的人进入总统府。第二起，有二十六个人，是由伊格纳西奥·冈萨雷斯领导的。埃切瓦里亚和罗德里格斯·洛切斯这个马斯费雷尔的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过去成员，原定负责攻占雷洛赫广播电台，即那个多少有点荒唐的哈瓦那广播电台（它当时一分钟也不停地广播，中间夹杂着新闻和广告，经营得非常成功），并宣布巴蒂斯塔已经死亡。一如古巴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向例那样，主要角色都具有高度的历史意识：“那天早晨我们成了命运主宰者。”乔蒙这样回忆说。^①“我们知道，这次袭击……是一种会解放我们民族的崇高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业。我们将给世界作出一个具有深刻印象的范例。”

① 弗朗基书，第97页。

下午三点二十分，第一辆车就开到总统府前面。古铁雷斯和三个人^①枪击交通警察，一面开手提机关枪，一面跑到大门口。大约有十二个遭到突然袭击的士兵，或死，或伤，或逃。虽然为那往往成为二十世纪巷战之障碍物的交通所延误，第一批另外两辆车也安全到达了，但是，他们遭到了四面八方的射击，包括架在圣天使教堂上的0.30口径机关枪的射击。第一批车子上的人都向着总统府跑，或许有十个人在路上被击倒，但是，梅内拉奥·莫拉率领的九人一批一到达总统府，就很快地冲上总统府左翼的二楼。其他一些人则守在底层。古铁雷斯带同四个人在左翼楼上，用一枚手榴弹炸毁了电话总机。他们到了总统府的餐厅，一路开枪冲进总统办公室，以手榴弹开路，炸死了巴蒂斯塔书桌旁边的两个人。因为找不到巴蒂斯塔，他们认为他已在楼上总统专用的套房里。不幸的是，他们找不到上楼的楼梯，虽然他们已从普里奥那里得到了总统府的详图。

袭击者继而认为巴蒂斯塔已经把他的防御力量集中在顶层，因为由巴蒂斯塔亲自指挥的步枪和机关枪的火力正开始从那里控制了总统府的庭院和前院。电话铃响了。戈麦斯·汪古埃梅尔特回答说，“是的，不错，总统府已经打下来了。巴蒂斯塔已经丧命。我们获得解放了。”与此同时，莫拉小组的一些人已经散开了，而伊格纳西奥·冈萨雷斯领导下的第二起人，却一个也不见踪

^① 何塞·路易斯·戈伊科切亚，何塞·加斯特利亚诺斯和路易·阿尔梅达。

影，因为枪声一响，大批警察和士兵就把总统府包围起来，简直使人认为进行袭击的就是他们。甚至坦克也向总统府开过来。埃切瓦里亚攻占了广播电台，广播了一件激动人心的消息：“哈瓦那的人民！革命正在进行中，总统府已经被我们的部队拿下来了，独裁者已在他的窝里被正法了！”但是，埃切瓦里亚在炸毁了广播电台的中央控制站之后，便在街头被警察击毙了。在这期间，在总统府二楼上的人继续向上开枪和投手榴弹，但是后来终于退却了。大多数人（包括莫拉和古铁雷斯）被击毙在大理石阶上。只有进入总统办公室的三个人确实逃出了总统府。炮火直到下午以后仍继续不停，士兵不分青红皂白地开枪，打伤了一些看热闹的人。总统府附近那个小公园似乎血流成河。附近大部分建筑物都弹痕累累。

在这场争夺战中，起义者死三十五人，总统府警卫人员死五人。一个美国旅游者意外地被杀害。后来，有一批数目不详的学生、少年、个别的嫌疑分子和反对党成员都被捕并枪决了——象通常一样，很多人受了酷刑。第二天早晨，在乡村俱乐部湖边发现人民党名誉主席、前参议员佩拉约·奎尔沃被刺。根据在埃切瓦里亚尸体上搜到的文件，警方显然认为如果袭击成功，奎尔沃将成为临时总统，因此，让警察四出搜捕。刽子手是拉斐尔·利纳雷斯军曹。巴蒂斯塔本人谴责普里奥提供武器，并且告诉记者说，他有确实的证据证明此事与国际共产主义有重大牵连——虽则共产党人抱着超然态度。

攻打总统府是一种有勇无谋的行动。卡斯特罗在说

到这是“一次白白地浪费鲜血”时，尽管是不策略的倒确实是说得很对，成功的机会本来就很渺茫。总统府的三楼只有乘电梯才上得去，所以电梯如果实际上是停在顶层，这些袭击者就无法上去。没有为袭击者一旦失败时准备好善后措施，或为他们准备一个安全藏身之处。不过，第二起如果到达，这次袭击也许只会把防守者吓跑而已。这样，幸存者对不帮助他们的那些人满怀怨恨就成为意料中的事了；这些人可能在西班牙战争中作过战，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乔蒙这样评论说。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帮助救护伤员，哈维尔·帕索斯把他藏身之处让给了古铁雷斯的副手乔蒙。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也夺取了一卡车没有用过的武器，把它们藏在他们运动的一个不重要成员所住的公寓里，这个人就是随便地跟一个美国人结婚的“巴尔瓦·罗哈”·皮涅罗；后来，他们把这些武器设法运到了马埃斯特腊山。^①

攻打总统府的后果有两个特点：第一，实业界、一般上层阶级和外国商业界对巴蒂斯塔所表示的同情是很突出的。所有这几方面的领袖人物在此后几个星期中都纷纷去拜访巴蒂斯塔，谴责这次袭击；全国制糖厂主联合会、全国工人联合会（穆哈尔）、独立战争退伍军人联合会、古巴银行联合会、保险公司、美国和西班牙实业家、地主、咖啡和养牛业者联合会、稻米生产者、卷烟和雪茄烟

^① 哈维尔·帕索斯提供的材料。皮涅罗不久就成为卡斯特罗的反谍报的负责人，后来担任内务部副部长。但是，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利马博士后来却指责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盗窃武器（利马的备忘录，第4页）。

制造商以至渔民也都去了。^①4月1日，以维克多·佩德罗索，亚历克斯·罗伯茨（加勒比银行）和马丁内斯·萨恩斯（国家银行行长）为首的古巴几家主要银行和银行家都前往拜访。

大多数行刺未遂的企图都给那人们打算要杀害的对象带来好处，而这一次，现政权真是得益匪浅；巴蒂斯塔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古巴公众和商界一切风头人物的支持。他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一种压倒多数的捧场。4月7日，当他在总统府前面的广场上对群众——据他说人数将近二十五万——讲话时，巴蒂斯塔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在这些支持者中，大多数肯定把攻打总统府看作是帮会性也是带有政治性的，是无休无止的一连串暴行中的最新一次。由于发现了曾在1948年参加袭击加拿大银行的里卡多·奥尔梅多也牵涉在内，就证实了他们的看法不错。奥雷利亚诺、欧费米奥·费尔南德斯的朋友们的参与其事既为众所周知，那么，在公众的估价中，学生和七月二十六日运动都无法提高这些集团中任何一个集团的名誉了。

第二个后果是加紧镇压。警方对参与其事者继续搜索，并进行大批逮捕。4月19日，警方的埃斯特万·本图拉上尉和他手下的人，靠了案中牵连的学生中一个大学同学马科斯·阿曼多·罗德里格斯的出卖行为，得以

^① 参看巴蒂斯塔：《被出卖了的古巴》。卡斯特罗后来痛斥“上层阶级……所有上层资产阶级及其流氓(!)、帮会分子、穆哈尔分子的代表们的〔这种〕卑鄙的行径……我向你们保证说，这个阶级没有一个人在一部革命法律通过后访问过总统府。一个也没有。”（《革命文献》，1961年，第46期，第24页。）

把四个幸存的学生领袖逼进温博尔特街一所公寓里加以杀害：他们是弗鲁克托索·罗德里格斯，他在3月13日在埃切瓦里亚走后来到了广播电台外面；何塞·维斯特布鲁克，也是“广播电台的一个老手”；何塞·马查多（“马查迪托”）；还有随同古铁雷斯一起进入总统府的胡安·佩德罗·卡尔沃·塞尔维亚。卡尔沃是上年秋季在夜总会杀害布兰科·里科上校的凶手之一。罗德里格斯的叛变后来成为革命的古巴一件著名的讼案，因为后来他得到了有力量的共产党朋友们的支持，据说他后来曾向他们交代过他在墨西哥的全部罪行。^①但是，在他叛变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并且他的动机似乎主要是私人的而不是带政治性的——是对于指导委员会的积极派的一种厌恶，也可能是对于暴力本身的一种憎恶，或嫉妒，是一种想成为重要人物的愿望，也许是一种力图摧毁那些的确最后会成为反共分子的对以讨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袖们（他们不断地谴责他，虽则他曾经一度是他们的情报员）的梦寐以求的意愿。^②显然他不是为了金钱而这样作的，同样显然的是，后来他向之坦白

① 这些共产党员是华金·奥尔多基和埃迪特·加西亚·布查卡，罗德里格斯在1957—1959年流亡期间常常到他们在墨西哥的住所去。

② 参看拙作，见《新政治家》周刊，1964年5月29日。警方原来的声明说，公寓里有六个学生，马基托斯和欧亨尼奥·佩雷斯·科莱原来在那里，但是逃跑了（参看《哈瓦那邮报》，1957年4月23日）。另一个有密切关连的人的说法见劳尔·卡斯特罗：《山岳和平原》，（哈瓦那，1961年）第143—165页，恩里克·罗德里格斯·洛埃切斯所写的《温博尔特街七号的罪行》。埃斯特万·本图拉在他的《回忆录》（墨西哥，1961年）第251页也偶尔承认了有叛变行为，但却另有指控。

交代的那些共产党员也没有十分严重地看待他的叛变行为。

为这四个全都是天主教徒的学生在科隆公墓所举行的葬礼，参加的人很多。抗议之声，遍于远近，而且严厉谴责政府，对这四个青年，实际上未经审讯，就处以死刑，又没有对本图拉上尉加以任何谴责，而且上层资产阶级和商业界对本图拉也没有多少指责之词。古巴社会又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期因宽宥警察暴行而酿成的局势那样趋于分崩离析了。佩拉约·奎尔沃博士之死，无异是正告所有反对党派的成员说，他们不能指望任何保证了，而且可能使他们比过去更支持卡斯特罗和武装斗争。

攻打总统府并没有妨碍北美贵宾进行新的访问；不到一个星期，海军作战部部长伯克海军上将就前来接受巴蒂斯塔颁发古巴海军勋章了；堪萨斯州的商人仍不断乘飞机前来开会。但是“正常状态”越来越不存在了；经常不断地捕人，有的因为在甘蔗地放火；有的因为有安放炸弹的嫌疑；甚至有的因为纪念何塞·安东尼奥·埃切瓦里亚进行募捐。古巴的中等学校奉政府命令停课一个星期，在温博尔特街七号的凶杀事件后又停了一个星期。在不断的激荡气氛中，巴蒂斯塔取消了1957年届期的国会期中选举，只允许成立一个国会委员会，用“二十天的工夫来听取各政党的作证”，包括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在内，然后为将来“找出一个解决办法”。这并没有得到多大成功，虽则它听取了格劳，巴罗纳，帕尔多·利亚达和阿隆索·普霍尔这些反对党领袖的作证。

在1957年春季,游击“战争”可能是古巴生活中唯一英勇的一面,但是,全国各地并没有革命的要求。由于苏伊士运河危机,糖价很高。1957年大丰收,宣布作物解除管制,并于4月,异乎寻常地卖给了苏联一万五千吨糖,从而引起投机,使糖价继续上涨。到了4月,看来处理一次大丰收显然是不会有什么困难了,唯一剩下来的问题是,还有多少蔗糖可供利用,有六十四家糖厂还在继续榨糖,但六十四家已经完工。在奥连特省被卡斯特罗烧掉了一些甘蔗,但对丰收还不足以造成多大影响。这正是1870—1874年的重演。所以游击战和政治活动就面临着这种经济局面而以多种方式进行,正如马蒂反抗西班牙的起义时所经历过的情形那样:1894年和1957年,就经济方面来说,是同样上好的年头。1957年也采取了很多重要步骤,以期走向世界银行和其他单位久已极力主张的经济合理分工。具有代表性的是在特立尼达制糖厂和莫隆制糖厂建立的利用甘蔗渣造纸的造纸厂。3月30日,壳牌油公司一座资本二千五百万美元的炼油厂由巴蒂斯塔主持开幕。4月间,压路机已动工修建一条汽车路,以把新近完工的比亚布兰卡至巴拉德罗的公路同中央公路连接起来。哈瓦那东郊那个新郊区,正在形成。当时评论拉美事务的最卓越的美国刊物并常常批判其过激政治的《西班牙美洲报道》评论说:

经济稳定和发展依然毫无减退。政府继续在公共工程方面花费大量款项,新建筑物到处涌现,新投资……继续加速步伐,每个人的收入已经达到空前未有的纪录……政府岁入

已经比上年多了二千一百万美元。^①

内战的唯一严重后果是在旅游业方面,但是即使如此,大旅馆仍然继续兴建:哈瓦那-希尔顿大旅馆于4月间开幕,巴蒂斯塔的内阁有半数成员参加了这个盛会;加普里旅馆和哈瓦那-里维拉旅馆这两个金碧辉煌的城堡也在建造中——加普里旅馆有二十五层楼,屋顶上还造了一座游泳池。

^① 《西班牙美洲报道》,1957年5月。

第十章

山区之战(1957年3—5月)

3月16日,卡斯特罗在山区得到了第一批大援军——在豪尔赫·索图斯率领下来自圣地亚哥的五十个人。^①这批生力军在那些已在山区坚持了三个月的人看来似乎是毫无希望的。格瓦拉抱怨他们不习惯于一天只吃一顿饭,又抱怨他们带来了各式各样无用的东西。他们都由于赶了曼萨尼略这段路而筋疲力尽了。只有三十个人有武器,虽则他们确有两挺旧机关枪。他们有一段路是由一个叫作乌维特·马托斯的稻农带领的,乌维特·马托斯是一个重要的同情者,在两年半以后,将在一件著名的讼案中崭露头角。曾经在1956年11月30日领导攻打圣地亚哥海上警察总部的索图斯,已自封为上尉,并且指派了五个中尉,各带领十人。在这批人中有三个年轻的美国人——查尔斯·瑞安、维克托·布克曼和迈克尔·加尼——在关塔那摩工作的北美人士子弟。他们是抱着冒险的希望而出发的,但是,有两个人在没有参加战斗之前就离开了。

新来的人和呆了三个月的老兵之间的关系很不融洽。索图斯这个“兴隆的货栈主的儿子”,尽管在圣地亚

^① 泰伯说是五十八个人(罗伯特·泰伯:《革命史》(纽约1961年),第102页);格瓦拉则说“大约五十人”(格瓦拉:《革命战争随笔》,第48页)。

哥的弗兰克·派斯的战斗中起了显著的作用，却还成不了一个游击队的头头，他还同卡斯特罗有些摩擦。这支联合队伍被改组为三个连；分别由索图斯、^① 劳尔·卡斯特罗^② 和阿尔梅达领导，^③ 另外专设了先锋队和后卫部队，分别交由西恩富戈斯（率领四个人）和阿梅赫拉斯（率领三个人）负责。卡斯特罗本人领导下的一个小总部包括有西罗·雷东多，曼努埃尔·法哈多，克雷斯波，医生格瓦拉和参谋长乌尼维索·桑切斯。这次改组实际上没有使新来的人承担多大的责任。设置了一个小小的核心委员会以指导一切事务，其中包括卡斯特罗、三个连指挥员，连同西罗·弗里亚斯，吉列尔莫，加西亚，西恩富戈斯，法哈多和格瓦拉。这样炊事、医药和给养都分别由各小组而不是集中管理了。一支部队的轮廓已经形成，兵员大约八十名，不过人多于武器。每一个人都得为自己做一个麻布吊床，虽则也有一些帆布床可供使用。连指挥员采用了往返行军使新兵习惯于山中的艰苦，而不是象过激的格瓦拉所建议的、袭击附近哨所，在战斗中考验他们。他们向东进军，发现农民象以前一样“首先是极其害怕军队；〔以及〕第二，〔依然〕很难于使他们相信象我们这样一支服装不整，武器窳败的武装队伍能够打败军

① 索图斯部下的三个中尉是西罗·弗里亚斯，吉列尔莫·加西亚以及和他一起来的雷内·拉莫斯·拉图尔。

② 劳尔·卡斯特罗部下的三个中尉是胡利奥·迪亚斯，拉米罗·巴尔德斯（他是在3月24日于受伤后重新参加的）和“纳尼奥”·迪亚斯。

③ 埃尔莫、吉列尔莫、多明格斯和佩奥林等中尉。

队”。^①参加了队伍的占据公地者和平原人之间的关系总是不很融洽。例如，有一天晚上，因为吃了一匹马而使农民大为恼怒。

与此同时，在3月30日，巴蒂斯塔再一次宣称卡斯特罗并不在山区，还说自从“他〔在拉普拉塔〕击毙几个熟睡的士兵”之后，就一直没有人看见过他。几天后，一架军用飞机载了八十位新闻记者飞越马埃斯特腊山，表明“那里空无一人”。巴雷拉上校的计划现在开始生效了；有一些占据公地者已经集结在军队的周围，不过试图用“坚壁清野”以切断卡斯特罗的救援的方案，多少还是一种防御性质的方案。在巴雷拉指挥下的野战活动，已经划归何塞·卡尼萨雷斯少校节制，拥有一队轰炸机和一营步兵，连同海军单位调拨的山炮。这支部队的确完全足以防范起义者增加他们的力量，但卡尼萨雷斯或是巴雷拉都并不认为卡斯特罗兵员很少。到了4月初，他们觉得，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把巴雷拉上校，巴蒂斯塔在现阶段进行反攻这个策士召回了；照他的说法，他只损失了一个人，而且是由于走火的缘故。一回到哈瓦那，巴雷拉·佩雷斯就向巴蒂斯塔作了全面的汇报，巴蒂斯塔祝贺他的成功。但是这项汇报对巴雷拉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它立刻就招致了塔维尼利亚那个阴谋和诬蔑的制造机器的嫉妒；参谋长和他的至交好友宣传说，巴雷拉试图恢复占据公地者的地位，以便与敌方取得联系。又说他所

^① 卡斯特的演讲，1961年12月，〈革命文献〉，第46期，第18页。

以未能捉到卡斯特罗，是因为巴雷拉同卡斯特罗暗中有联系。巴雷拉在拉卡瓦尼亚暂时成功地顶住了这些含沙射影的陷害，而他在山区的活动，“肃清”残余的起义者，正如人们所料想的那样，则交给那个残忍的卡西利亚斯少校去接管，卡西利亚斯少校自12月以来就断断续续地在那里。巴雷拉在离开之前，事实上曾经对访问马埃斯特腊山的记者说，那里只有一股歹徒（不是卡斯特罗），“每个各有五个押寨夫人”。这位司令找来了很多占据公地者，自称对军队感恩不尽，并且他又说，在五百五十名官兵之外，他在这个地区的农民和农场主中，至少还有二百五十名情报员和政府的特务。他说自从2月9日以后山区没有任何战事，这倒是说得对的，但是，他把他所带领的特殊部队撤走，而把战场交给卡西利亚斯和按照正规方法训练出来的士兵，则当然是一个错误。

到了1957年4月中旬，起义军已经回到图尔基诺峰附近一带。这时，加西亚和弗里亚斯这两个占据公地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带着消息和食物，穿过丛林，往返奔波。曼萨尼略的安东尼奥·阿尔维苏神甫的住宅变成了信使的聚会场所。他们同军队依然没有交过锋。起义军花了几个星期来同农民建立联络线，要鉴定哪些人是可以信赖的，哪些人可充作信使，哪些人会提供可靠的情报，哪些人了解哪些地方可以安全地建立永久基地以及哪些地方可以永久筹措给养或储藏粮食。这场春季战役——虽则名实不大相称——对将来是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卡斯特罗一个来自平原的追随者是皮隆的罗博种植

园一个牙医的女儿，塞莉亚·桑切斯。^①她带来消息说，（根据阿特和哈瓦那七月二十六日组织的倡议）又有两个美国新闻记者准备来访问起义军，其中一个还带有电视摄影机。卡斯特罗接受了这个意见，于是来自帕尔马制糖厂附近的商业旅行家拉洛·萨迪尼亚斯把哥伦比亚广播系统的罗伯特·泰伯和温德尔·霍夫曼送进山区。^②同他们一起来的有一个英文翻译，是卡德纳斯杂货商的儿子，曾任哈瓦那大学工程系主任的马塞洛·费尔南德斯。两位美国人呆了几天，终于在图基诺尔峰上举行了会见。在会见中，卡斯特罗使他们象马修斯那样，觉得他态度十分温和。他说他通常是反对流血的，但是，他要造成一种政府势必垮台的气氛；他要求美国不要再输送武器给巴蒂斯塔；他是为恢复1940年宪法而进行斗争的。5月间，《古巴丛林战士的故事》的影片放映了，这部影片证明了恰恰与巴雷拉上校的声明相反，卡斯特罗确实依然住在山中。生力军继续到达，有一些来自莫隆（卡马圭）的“小牧童”埃尔巴克里托那样的人，并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和目的，只是想来作一次惊奇的历险——这是作为这个团体具有政治觉悟的格瓦拉必须加以教育的一批人；还有一些农业工人和建筑工人，他们为反抗那

① 她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是一个怪癖的妇女，罗博在他的庄园上给她盖了一个鸽房，让她在那里“睡觉、写作或幻想”。她后来成为卡斯特的秘书和最忠实的助手。

② 在接待这些新闻记者中起了关键性作用的是劳尔·费尔南德斯·塞瓦略斯这位哈瓦那第一长老会的牧师，他是一个主要宣传左翼观点的牧师，后来在六十年代依然是一个革命的热烈支持者。

个他们认为是迫害过甚的旧世界，争取一个较好的新世界，而从比那尔德里奥的老家乘了公共汽车前来投奔卡斯特罗。在这几个月中，光是山区里的活动就足以显示出革命的火炬，而且神话既经编造了出来，占据公地者在巴雷拉那番短暂的实验已成过去之后，又开始把起义军当作他们的朋友来接近了。但是，随着游击战和从前的血海深仇交织在一起，对于情报员的背叛、审讯和后来的判处死刑仍然是屡见不鲜的。

同农民的交往，并了解到他们的疾苦和他们的营养不良状况后，显然对起义军的政治观点发生了影响。格瓦拉写道：“在这些活动中，我们开始形成这样一种意识，认识到有断然改革人民生活的必要。土地改革的想法形成了，与人民交往的想法不再是一种理论了，而是成了我们生活的一个明确的部分。”^①这可能言过其实。即使时间很短，格瓦拉毕竟在危地马拉的土地改革革命委员会工作过。他的经验是并不象他所说的很需要进一步接受这种教育；他的脾气是宁愿教育别人，而不愿接受教训，甚至不愿接受经验。卡斯特罗对需要根本改革社会已是谈之已久了，不管他后来对重新解释自己的青年时代赋予多大的意义，他已经清楚地知道存在着一个改革社会的计划。但是甚至格瓦拉的“马克思主义”也多半是属于理论性的。卡斯特罗说了许多东西，主意也常常改变，因此，象《圣经》一般，几乎可以根据他所说的东西作出任何的解释。他所说过的任何话，都可以由于他在

^① 格瓦拉：《革命战争随笔》，第65页。

山区的经验而加以改变。但是，这并不是说，他的“与人民联系”不是真实的，也不是说这就不是他的政治活动的“现实化”的一个明确变化的标志。格瓦拉接下去说：“游击队和农民打成了一片，所以（没有人能够说出长征开始的确切时间）我们成为农民的一部分。”这种见解似乎是浪漫主义的，但是毫无疑问，却真实地描绘出了格瓦拉这位新队员的政治教员对马埃斯特腊山的重要性的看法。在格瓦拉同一位为增加耕地、而战斗后来被杀害的叫做班德拉斯的农民的谈话中，也清楚地预示出革命本身对土地社会化的议论纷纭，莫衷一是。

向东继续进军，而在接下来几个星期所发生的一切，乃是游击行动的策略的一个很好的示例。在阿瓜松林，起义军俘获了巴蒂斯塔的一个骑兵班长，此人自从马查多时代以来就罪行累累、臭名昭著。卡斯特罗拒绝了把他处决的要求，因为这是他在对待俘虏上采取与巴蒂斯塔集团截然相反的方式的政策。此人和他的坐骑都被生力军扣押起来，大军则继续推进，想去看看是否有一批重要的武器已经到达指定的地点，尽管信使已被扣留。但是，事实上，武器已由圣地亚哥一家大木材公司兼造船商的巴温家族一只快艇带来了——三挺带三角架的机关枪、三挺麦迪逊式机关枪、九支 M1 式卡宾枪、十支约翰逊式自动步枪和六千发子弹。巴温家族是巴蒂斯塔和军事领导人们的至交好友，但是，他们的一个职工恩里克·洛佩斯，却是卡斯特罗两兄弟的老友，对于起义军在这个地区购办粮食方面有一定的帮助。这时候，由于进一步征集占据公地者以及象雷克森西奥·佩雷斯这些各式各

样老友又重新归队，山区起义者的总数已接近一百五十人了。但是，由于有些新队员通常缺乏身体的锻炼、缺乏百折不挠的精神，或被马蝇弄得恼火了，很多人都要求准许回家。“我们天天同战斗员缺乏精神、思想和身体准备这种情况作斗争。”5月23日，卡斯特罗解散了整整一个中队，剩下了总数一百二十七人的一支队伍，其中八十人装备精良，一个名叫安德鲁·圣乔治^①的匈牙利出生的美国新闻记者兼特工人员，曾一度跟随着这支队伍，他显然返回华盛顿去汇报说，卡斯特罗是“一个自负狂和情绪不稳定的人，而不是一个共产党”。

自从2月以后，“游击战”依然是沉寂的，而巴蒂斯塔和他手下的军官们对于卡斯特罗的引起全世界兴趣，其愤怒以至惶惑之情就不难理解了。这时，决定采取新行动了：在讨论中反映出当时还是意见不一。例如，格瓦拉只想截获一辆军用卡车；但是卡斯特罗却决定攻打十哩外的埃尔乌贝罗军事哨所，该哨所的地位同拉普拉塔、同海上和巴温兄弟的庄园上那些兵营相似。起义者得到了该地区行政长官的女婿埃尔梅斯·卡尔德罗的很大帮助。卡西利亚斯少校派来的两个间谍在5月27日被枪决了；他们第一次透露出军队知道卡斯特罗就在哨所附近。对周围的形势作了一次缜密的研究。起义军在夜间沿着巴温家族为他们的伐木工修建的道路向哨所前进。根据巴

^① 马里奥·拉索：《插进心脏的匕首》（纽约，1968年），第235页。格瓦拉认为圣乔治是联邦情报局的特务，并且在一系列有关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活动的文章中（《星期日电讯报》，1968年7月7日），都把圣乔治说成是“在美国军事情报机关干过一阵子”的。

雷拉·佩雷斯的说法，这一地区的职工已遵照卡斯特罗的命令，在当天晚上宴请了当地的军队，以使他们在醉眼朦胧之中去对付一次袭击；但是关于这一节，“革命史”上并未提及。

袭击的命令就是除开临海那一面从三面包围哨所，然后不断地向它开火。凡有妇女和儿童居住的地方，必须避开。庄园管理人的妻子知道袭击迫在眉睫，但是，因为不愿引起嫌疑，所以没有离去。豪尔赫·索图斯，吉列尔莫·加西亚，胡安·阿尔梅达，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西恩富戈斯和阿梅赫拉斯所指挥的起义军小队都分别进入阵地；克里森西奥·佩雷斯控制了通向奇维里科的那条路，以防止敌人增援。格瓦拉操纵一挺机关枪。八十个人投入战斗，其余则显然守在山里。

兵营由五十二个人驻守，指挥官是卡雷拉中尉，此人自1922年以来一直在军队里，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年军官。原想在破晓前开始行动，事实上只是到了黎明以后才开始。卡斯特罗以他那支带瞄准镜的著名步枪首先射击；兵营进行还击。一上来就有一颗子弹打中了电话总机，切断了哨所通话的可能性。于是开始向前推进，袭击者条件很不利，因为缺乏掩护。有几个人受伤，有一个人被击毙。阿尔梅达从直达的小路上猛扑哨所，数人受伤，一个毙命，从前是占据公地者的吉列尔莫·加西亚也从侧翼猛扑。起义军准备在大约三个小时之后，只有一些持续零星射击的时候猛攻兵营。起义军向前挺进，攻占了住宿区并且俘获了一个看上去已不能行动的兵营医官。

在这次战斗中，在可说是起义军历来所进行的最猛烈的战斗中，有六个袭击者被击毙——胡利奥·迪亚斯（属于“格拉玛号”的）、向导埃利希奥·门多萨，莫尔，埃米利亚诺·迪亚斯（来自圣地亚哥的新队员）、维加以及索图斯的副官，“那个警察”。两个人受重伤。军队死了十四人，十九人受伤（其中有卡雷拉中尉），十四人被俘，六人逃脱。为卡斯特罗作战的有一个美国人，查尔斯·瑞安。

战斗之后，起义军撤回山中，用巴温家一辆卡车带走了能够带的一切给养和药品。他们还带走了十四名俘虏，后来（照巴雷拉·佩雷斯的说法，经过“思想教育”）予以释放，还带走了自己的四名伤员，丢下了另两名重伤员。要说动这两个人似乎是不可能的，巴蒂斯塔的人一再保证给他们以体面的待遇。事实上，莱亚尔被送到松树岛；西列埃罗斯则死于去圣地亚哥的途中。其他的伤员由格瓦拉随军护送，跟在后面，走得很慢，要不是靠了农民和圣地亚哥的律师何塞·普霍尔的佩拉德罗庄园管家的帮助，他们都险些被俘。那个管家桑切斯，后来被军队捉去，受到惨无人道的酷刑，虽则至少在格瓦拉看来，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看不起他的农民、忠于他的主子的一个人民党的管家。^①

这次行动提高了起义军的士气，使他们觉得，他们能够控制山区附近的任何小兵营了。

① 格瓦拉：《革命战争随笔》，第90页。桑切斯是在8月被农民出卖的。参看《哈瓦那邮报》，1957年8月13日。

巴蒂斯塔暂时并不想进一步按照，举例来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在马来亚对抗游击队的战役那样来对付卡斯特罗，虽说这是近代最成功的反游击战役所提出的可以对付游击队的唯一办法。在马来亚，英国人决定采取一项全面的攻击，来一网打尽陈平所领导的共产党游击队，方法是封锁道路，把一切分散的村民都迁入与韦勒的营地相呼应的防守严密的居民区，对被迁入的村民拨给一所新房屋和一笔安家费。粮食一律加封，计口配给，登记用途。同这些措施一起兼施并用的，还有大赦、给投降者发奖金，一项包括在“反省”期间按日给予津贴和给他们准备一项新职业的善后计划。另外还有攻心战、防范恐怖主义活动，在教育、医药和公共工程方面给以慷慨援助。耐人寻味的是，英国在马来亚的军队比巴蒂斯塔在古巴的军队要少，共有正规军和海军陆战队一万五千人，外加警察十五万人，志愿国民军二十五万人。另一方面，游击队却比卡斯特罗在任何阶段上的规模都大得多，最多的时候高达一万五千人——但是，正如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彼得森少校经过深思熟虑后所说的那样，肃清起义的代价是每名游击队三万英镑。即使如此，在1960年年底名义上宣布紧急状态之后，在泰国边境上活动的游击队，据说总在一千人左右——比卡斯特罗在1957年的任何阶段的人数都要多。

巴蒂斯塔是不可能完全仿效这些办法的，正如巴雷拉·佩雷斯或坎蒂略这类聪明人所了解的那样。他的四万军队同英国的一万五千军队相比，是望尘莫及的。他的警察也是这样。他任何时候都不能依靠任何一种有组

织的志愿帮助。就算起义军人数较少,如果在整个1957年有一百五十名起义者要肃清的话,每名三万英镑(八万美元)虽嫌太多了一些,总共所费不过一千二百万美元,而这笔款项是巴蒂斯塔肯定能够筹募的,或许可以掏他自己的荷包。但是成为英国办事方法之特色的坚忍与宽厚的相互结合,却是巴蒂斯塔肯定办不到的。他非但没有能力这样作,而且军队已被塔维尼利亚将军和他的至交好友这批魔王完全摧残了。巴蒂斯塔从来不肯接受古巴军队中现有的少数有头脑的军官的任何影响。在古巴担任军事顾问团成员的美国军官似乎也没有对他有任何进言献策。卡斯特罗这一支小小部队也居然使巴蒂斯塔陷于进退维谷之境:要集中很大的力量于马埃斯特腊山,则又与他扬言起义者正被打败的说法显然矛盾。城市中的恐怖活动问题也是马来亚所没有的。总之,巴蒂斯塔的政府表现出自己没有能力对付以众多农民为后援的一支坚决的、进步的、革命的游击队,一旦它有牢固基础的话。

这些事实并不意味着在1957年中期现政权已注定要垮台。游击队曾经在中国、哥伦比亚或危地马拉存在了很多年而没有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巴蒂斯塔垮台的原因并不在于马埃斯特腊山。斗争的场所是在哈瓦那,在圣地亚哥,也同样在华盛顿。美国政府在此后十八个月中所起的作用是互相矛盾的,非常离奇的,到头来甚至连巴蒂斯塔或卡斯特罗都同感不满。

第十一章

美国参加争论

攻打埃尔乌贝罗，对巴蒂斯塔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尽管塔维尼利亚提出抗议，他还是因此把巴雷拉·佩雷斯上校派回马埃斯特腊山去担任野战司令。5月这个月是个艰难时期：炸弹不断爆炸。甚至小学里也有炸弹爆炸，目的是不让学生参加年终考试。中学自发地继续进行罢课。平民伤亡，屡见不鲜。在攻打埃尔乌贝罗的当天，哈瓦那发生了一次大爆炸，炸断了五十多家人家的电话、电灯、煤气和自来水。损失三十七万五千美元，政府还拿不定主意究竟是归罪于卡斯特罗，还是归罪于选举的对手。逮捕也接连不断（其中有哈瓦那领导层的阿曼多·阿特和卡洛斯·弗朗基）。第五区警察局局长埃斯特迈·本图拉上尉在公众心目中差不多成为马查多时代的阿塞尼奥·奥尔蒂斯那样一个家伙：一个传奇故事中的死亡贩子。炸弹的目标是要炸死警察的首脑人物，象在马查多时代一样。5月11日，巴蒂斯塔几乎第一次遭到了司法方面的反对：在圣地亚哥对一百名菲德尔分子、这些“格拉玛号”幸存者的审讯中，首席法官曼努埃尔·乌鲁蒂亚宣称所有的人将一律无罪开释。巴蒂斯塔大怒之下，愚蠢地让他的司法部长对乌鲁蒂亚和不曾要求判刑的检查官提出起诉（后来作罢）。至于其他两个法官把“格

拉玛号”的人员判处八年以下不等的监禁，则是小事一端。一个法官公然反抗政府，而且连一贯谴责恐怖活动的保守派的《海洋日报》也呼吁巴蒂斯塔依据宪法，举行大选了。但是，巴蒂斯塔继续拒绝在1958年6月以前提出大选的日期。

电气工人工会方面也发生麻烦。它的领导人，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者的古巴少数领导人之一的安赫尔·科菲尼奥——直到1941年他是共产党——以涉有进行反政府破坏行动的嫌疑，在4月间被穆哈尔解除了他在古巴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中的职务。于是大多数电气工人继续进行罢工，迫使穆哈尔恢复科菲尼奥的原职。很多城镇部分地或全部地被切断了电气或煤气。电话工会也表示同情，举行罢工。结果，巴蒂斯塔采取了极端的措施，将电气工业暂时国有化，并指派了一名中介人，如同1949年普里奥在铁路事件中所采取的办法一样。几名电气工人工会的领导人被捕。科菲尼奥在断定罢工于事无补之后，命令他所领导的工人复工。他自己则以代表古巴出席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的名义离开了古巴。但是，正如后来所清楚表明的那样，科菲尼奥的行为不是无可指责的；他同巴蒂斯塔政府的关系绝不是不友好的，而同反对派的关系倒是貌合神离。

在这期间，政府的地位也很古怪。一方面，巴蒂斯塔拥有工商界领袖人物公开的和个人的支持，这在他于3月间幸免于难之后的一系列的礼仪中就表现出来了；而且这些人，以及和他们关系密切的美国同事们，对于经济情况继续表示乐观。繁荣的确是引人注意的。新事物似乎

在各方面都有所进展——哈瓦那设计了一个干船坞；安蒂列斯钢铁公司正在扩建；1957年的第一季度就业达到了新的高水平。工资很高，四亿七千六百万美元的储备金比1956年高出百分之九。糖业领袖巴雷托解释说，甚至奥连特省的四十五家制糖厂（当时所榨的糖在古巴占五分之一）都得到了大丰收。形势同1870年相似而且超过1895年，虽则马坦萨斯老牌的廷古亚罗制糖厂，在5月26日还有八天的糖要榨时，因一枚炸弹而遭到严重的损害，比那尔德里奥的安多拉制糖厂也遭到了类似的损害，有几袋糖被炸毁。同时，对巴蒂斯塔的威胁也象繁荣一样地与日俱增。同情卡斯特罗运动的甚至在富裕的中产阶级中也高涨起来了；在1957年这一年中，连最大的糖大王胡利奥·洛博也捐赠给反对派五万美元。^①

政府领导人和他们的朋友们对卡斯特罗和“共产党人”这类破坏者的经常不断的攻击，又开始活跃起来了；在镇压共产党活动局的怂恿下，巴蒂斯塔几个月以来一直根据1955年法令，批准解雇工人，如果证明他们是共产党的话。在1957年5月，他也许有点勉强地开始采取反对共产党领袖的措施——这不是因为他们个人或是作为一个政党作了任何威胁到他的事情，而是因为他受到宣传的压力。所以曾在1948年以前担任过共产党在糖业工人运动的总书记的乌西尼奥·罗哈斯于5月17

^① 卡里略：《手稿》，第35页。胡斯托·卡里略和鲁福·洛佩斯·弗雷斯克特得到这笔钱，半数给了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司库胡里奥·杜亚尔特，半数给了卡里略自己的蒙特克里斯托运动。但是洛博本人曾向作者解释说，他从来没有拿这笔钱给卡斯特罗的运动。

日在哈瓦那被捕，理由是他在帮助安赫尔·科菲尼奥和电气工人，这项指控可说毫无意义，因为科菲尼奥自从四十年代脱党之后，他和共产党的关系就是极坏的。也是在这个月里，古巴共产党通过它的哈瓦那市机构并通过工人（特别是在骚动不宁的电气工人工会中）开始对七月二十六日运动表示它的第一次行动——这一姿态并不是互惠的，而且在当时得到很小的结果。然而，不到几个星期的工夫，两个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伊拉姆·普拉特斯和巴勃罗·里瓦尔塔——就被派到马埃斯特腊山去了。里瓦尔塔是一个英俊的黑人，曾在布拉格国际学生联合会总部工作过几年，并曾于1956年10月作为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代表团的一个成员访问过中国。^①普拉特斯在1950年进入哈瓦那大学；1955年起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在1957年担任了机械工程学院青年共产党人委员会的主席。这两个人参加了格瓦拉的工作——7月间，他在卡斯特罗下面另外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工作单位。这时，巴蒂斯塔的警察对待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比以前凶恶了，几乎同对待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和革命指导委员会差不多，例如，它的一个成员阿曼多·米拉瓦尔因为不肯暴露他的同事的姓名，被毒打致死。

但是，当时，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和共产主义青年团，至少在山区以外，并不是意气相投的。当年下半年，哈维尔·帕索斯和阿曼多·阿特同押在一个牢房里，话题转

^① 同他一起在中国的一个西班牙民主社会党人卡洛斯·萨亚斯提供的材料。革命后，里瓦尔塔担任古巴驻坦桑尼亚大使——一个相当微妙的职位。

到了胜利之后是否应该让共产党合法地发挥作用。帕索斯认为应该；阿特这个出身于著名天主教家庭的子弟则认为不应该。^①

从这时起，炸弹和瓶装手榴弹，警方的专断处决和导致永久失踪的逮捕，都成为古巴舞台上的主要部分。有些炸弹是想在“斗争”中出风头的人物安放的。大多数是作为公民抵抗运动总纲领的一部分而安放的，公民抵抗运动，到了这个时候，由于卡斯特罗的一名中尉，伊格莱西亚斯（“尼加拉瓜”）在1957年中期前来访问的结果，已经放弃了它原来的非暴力的破坏政策。分支机构募款、散发宣传品、旗帜和黑红袖章。破坏行动掌握在各分支机构的特别小组手中，其中有些人，象伊格纳西奥·冈萨雷斯或梅塞德·玛丽亚·迪亚斯·桑切斯，都是三十年代安放炸弹的老手；所以，当8月间在公共工程部工作的迪亚斯·桑切斯小姐在哈瓦那的伍尔沃思商店因爆炸而受伤时，发现她过去是青年古巴的一个成员，并且早在1936年就为谋杀巴蒂斯塔而安放过炸弹。曼努埃尔·拉伊这位建筑师在1957年中期成为哈瓦那地下组织的头头。

炸弹安放者，年龄各不相等，背景也各不相同；例如，我们不妨看一看1957年8月15日被捕者的名单：弗朗西斯科·佩雷斯·里瓦斯，二十七岁，门多萨一拉托雷公司的职工，被控散发宣传品和安放炸弹；玛丽亚·乌吉奥

^① 革命后，帕索斯成为一个流亡者，阿特则成为八人组成的共产党政治局的委员之一。拉丁美洲革命组织的总书记和教育部长。

拉·莱丘加，四十三岁，未填明职业，拥有一所公寓房屋，就在这个作为特别储藏库的房屋中发现了炸弹；梅塞德斯·乌吉奥拉·莱丘加，她的妹妹，二十七岁，受雇于国民造纸公司，被控安放炸弹和爆炸品；何塞·曼努埃尔·阿尔瓦雷斯·圣克鲁斯，学生，十七岁，住埃尔塞维利亚诺郊区，被控安放炸弹；弗朗西斯科·米亚雷斯·费尔南德斯，十八岁，艺术学生，住埃尔塞维利亚诺郊区，被控安放另两个人交给他的炸弹；曼努埃尔·德赫苏斯·阿方索·希尔，十五岁，住拉比博拉，被控出售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制造的炸弹；恩里克·德尔加多·马约拉尔，十八岁，住拉比博拉，美国无线电公司实验室雇员，被控安放和出售炸弹；埃列塞尔·克鲁斯·卡夫雷拉，十八岁，学生，被控参加恐怖主义的阴谋；埃拉迪奥和伊格纳西奥·阿方索·卡雷拉，分别为十六和十九岁，被控为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招募人员；何塞·埃雷拉·莱昂，十六岁，园丁，被控为领取五美元而安放炸弹；乌瓦尔多·菲亚略·桑切斯，二十岁，药品推销员；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塞古拉，三十五岁，船坞职工；豪尔赫·阿尔瓦雷斯·塔格莱，十九岁，里奇蒙公司职员；胡安·费尔南德斯·塞古拉，三十八岁，工人；弗朗西斯科·戈麦斯·贝尔梅霍，十七岁，船坞职工；帕斯托·瓦连特·埃尔南德斯，三十八岁；诺维托，贝兰索亚兰·洛佩斯，二十四岁。在乌吉奥拉小姐的公寓里发现了：准备随时使用的爆炸品十五件；磷两瓶；大定时炸弹一个；瓶装手榴弹二十四颗；混有油脂的汽油十五加仑；0.32口径的科尔特式左轮枪六支和子弹。许多教师所给予起义的支持，不但意味着他们

的学生追随了他们，也意味着师生双方都有机会利用科学实验室取得爆炸材料——如在埃里维托·马班这个比博拉技校的教师的案件中，他在8月27日供认自己曾教导别人利用实验室的材料制造武器。

在奥连特省，有很多天主教徒和神甫现在都成为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积极分子。在夏季里，吉列尔莫·萨迪尼亚斯神甫得到哈瓦那副主教的许可，上山去作起义军礼拜堂的牧师。另一位神甫切拉拉担任了奥尔金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司库。国家司库恩里克·坎托也是一个重要的天主教世俗人士。只有主教和有正式圣职的人依然抱怀疑态度或有不同看法，不过圣地亚哥和马坦萨斯的主教对独裁制度的敌视从来没有动摇过。象费尔南德斯·塞瓦略斯这些新教牧师都是哈瓦那的积极分子。属于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一个劳工组织也建立了起来，起先由一个银行工作者的领袖阿吉莱拉领导，继而由来自拉斯维利亚斯的一个曾经是共产党员的糖业工人戴维·萨尔瓦多领导。

1957年是艾森豪威尔将军连任美国总统的第一年。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个虽则是愉快的，也是呆滞的时期。卡斯特罗先后同马修斯、泰伯和霍夫曼的会见，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卡斯特罗似乎是一个英雄，一个传奇人物，一个加勒比海的劳伦斯^①。《纽约时报》采取了一贯的偏袒而稳健的立场；例如，关于温博尔特街七号事件的一篇社论（无疑是马修斯所写的），强烈谴责“粗暴的

^① 即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1888—1935)，英国军人，以专在阿拉伯一带搞情报及进行冒险活动而有“阿拉伯的劳伦斯”之称。——译者

军事独裁”。如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样，古巴流亡者在示威和募款方面是富有机智的。从1957年中期起，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一个代理人就在华盛顿古巴大使馆进行工作，另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埃内斯托·贝当古是一个在华盛顿登记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代理人。在墨西哥，也有一个名义上由两个攻打蒙卡达老战士佩德罗·米雷特和古斯塔沃·阿尔科斯领导的类似组织。不过由于经常与流亡者运动有联系，遭到了另一些流亡者的批评，其中如卡斯特罗几个姊妹就认为他们过分风头主义了。但是美古关系的正常善邻之谊依然如故：《时代》—《生活》周刊社的董事们在古巴举行他们的特别会议；半美国半古巴籍的赫奇斯家族继续同这个独裁者保持极其友好的个人关系，这种亲密关系，表示出大多数美国实业家对现政权感到普遍的满意。巴蒂斯塔本人不断接受美国的这一种或那一种的荣誉——5月18日，他成为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荣誉公民。作为酬答，他继续把古巴的勋章分赠给常驻的或来访的美国军官或政府官吏。美国军事代表团似乎是“他们的古巴的对等成员”的座上常客。美国上校拥抱塔维尼利亚将军或巴蒂斯塔本人的照像，出现的次数已经多到足以使古巴公众认为两国已是结成亲密的盟国，正如双方的政治家所说的那样。

美国驻古巴大使阿瑟·加德纳从一开始就支持这种立场。他曾经向巴蒂斯塔建议，让美国联邦调查局或中央情报局派一个人上马埃斯特腊山去把卡斯特罗干掉；巴蒂斯塔回答说：“不，不，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都

是古巴人”。^① 在他驻古巴的四年期间，加德纳成了巴蒂斯塔的密友；他相信“我认为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比这更好的朋友……令人遗憾的是，象所有南美人一样，大家都知道——虽则我完全不知道——……几乎他所做的事情无不受到攻击。但是……他是在作一件惊人的工作。”^②

春季，调换加德纳的问题发生了，就所能见到的情况来看，这并不是由于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对他的服务有任何不满意之处，而是由于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总统就任开始之后势必发生的。原来考虑让美国外事工作中的智多星之一，当时的驻莫斯科大使、那个可敬的查尔斯·波伦去哈瓦那。这原是一个明智的抉择。但是，波伦去马尼拉了。哈瓦那的遗缺就改派了厄尔·史密斯。史密斯是一个投资经纪人，1926年耶鲁大学毕业生，在第二次大战中任空军上校并曾在战时生产局工作过，当时五十四岁，素无任何政治经验。加德纳则不想调动；他直接去找艾森豪威尔，说“巴蒂斯塔准会十分不安，因为他，加德纳，同巴蒂斯塔非常知己，这样一来，无异是表示我们在改变我们对古巴的政策和承认外界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③ 但是，加德纳在艾森豪威尔重新当选后，递上了一份形式上的辞呈。5月14日，使这位大使颇为苦恼的是，辞呈被拿了出来，获得同意。

这位大使只得回华盛顿。如同在1868—1878年和1895—1898年古巴的其他每一次内战时一样，当时的

① 加德纳对作者所讲的。

② 加德纳在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的证词。

③ 马修斯书，第68页。这是杜勒斯对赫伯特·马修斯说的。

局势很危急。加德纳认为国务院已经改变了主意，在支持卡斯特罗反对巴蒂斯塔了。负责拉丁美洲司的助理国务卿罗伊·鲁博特姆这位得克萨斯州的前海军军官，在加德纳在任时曾几次访问哈瓦那。“我的妻子和我，”加德纳三年后抱怨说，“总要问他是否不同意我们的看法，他从来都不回答……他袒护卡斯特罗。这是毫无问题的。”^①生活安适的、具有诱惑力的哈瓦那商业地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如同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一样，对一切身历其境的人都起着消磨意志的作用，住在这个地带以外的鲁博特姆对哈瓦那警察在哈瓦那的滥施酷刑却深感不安；作为一个民主党员，他对反对党寄以厚望。他的上司，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那个无处不在的美国外交家罗伯特·墨菲，抱着一种更加激烈的看法；他认为巴蒂斯塔就是一个“刽子手”。

在这期间，在国务院的加勒比海科派进了一个新人：这个人后来将比鲁博特姆更加成为美国对古巴的焦虑的替罪羊——威廉·威兰，他当时五十岁，在1925至1937年曾在古巴住过十二年。威兰的父亲早死，母亲改嫁给一个叫做曼努埃尔·蒙特内格罗的古巴人，威兰在童年时代曾一度姓这个姓。他曾在哈瓦那工作，起先在通用电气公司和古巴电气公司，之后在1933年革命期间又在《哈瓦那邮报》工作。他遇到了萨姆纳·韦尔斯，后来在1941年，“当他为美联社工作了几年之后”，韦尔斯设法介绍他进入了国务院。后来他曾在美国驻拉丁美洲的各使馆

① 加德纳的证词。

工作过，包括 1947 年波哥大事件时期在驻波哥大使馆工作在内。所以由于这番经历，在一个革命时期，他很适合担任国务院古巴专家这个工作。

但是，尽管他遭到了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及其特别顾问索瓦因的不公平的迫害，要评价他的观点却特别困难；威兰似乎变过好几次主意。“我决不是卡斯特罗的崇拜者，”1960 年他对责骂他的人说，“我相信他是一个神经上有毛病的人，心里只有自己，野心之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①同时，另一个性格比史密斯或加德纳较为坚强的商人大使威廉·波利回忆说，当他们在里约热内卢时，他“把他撵走了，（因为）他太左了”。^②威兰接受任命的时候，像墨菲和鲁博特姆一样，是坚决反对巴蒂斯塔的。华盛顿方面对古巴问题有专门研究的中央情报局人员如金上校（后来任中央情报局拉丁美洲科科长）显然也抱有这种看法，驻哈瓦那大使馆的人员，特别是它的副主管，尤其如此。

这就是厄尔·史密斯受命担任驻哈瓦那大使时华盛顿方面的矛盾气氛。在去哈瓦那之前，史密斯曾经和一位同行的商人兼外交家罗伯特·希尔商量，希尔当时担任国务院同国会的联系工作，曾任格雷斯轮船公司副总经理和驻中美洲的大使。这位刚刚奉派为美国驻墨西哥大使的希尔对史密斯说，“你要去古巴，真令人惋惜……你是被派去古巴主持巴蒂斯塔的垮台了。巴蒂斯

① 《共产主义的威胁》，第 670 页。

② 《共产主义的威胁》，第 672 页。

塔非下台不可，这是已定之局了。”希尔力劝史密斯邀请一位他可以信赖得过的公使同去，并提了一些建议，但谁也不愿接受这项工作。至少其中有一人私下对希尔说，“我不愿意去哈瓦那，因为卡斯特罗就要上台了。”希尔后来说，“当时我的看法是，有人正在帮助卡斯特罗上台，在国务院的走廊里一直有支持卡斯特罗的事业的某种活动。”^①但是史密斯不为所动。威兰建议他去看一看赫伯特·马修斯——一个聪明的意见，但这个意见几乎使他丢了饭碗。总之，史密斯去见了马修斯，马修斯对他说，他认为巴蒂斯塔是“一个残忍而腐败的独裁者……不久就要倒台，如果巴蒂斯塔被搞掉了的话，这将对古巴和……世界都最为有利……”。^②马修斯还力劝史密斯尽快到古巴其余各地去旅行，到哈瓦那以外去看看。

在美国有良好人事关系的史密斯，已经作为一个旅行者对古巴有多年的了解了。虽然他毫无外交经验，并且他的出使完全是靠了他给共和党捐助基金——自1952年以来他一直是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的领导人——他“久已想望”这项工作了。他是当时任部长的劳尔·梅诺卡尔和糖业大王米格尔·塔拉法这些古巴人的“一个老友”。6月13日，他宣誓就大使职。他的棕榈滩的游侣，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约翰·肯尼迪的妻子也参加这个典礼。但是，为了不使人们认为他的任命是意味着美国要进行

① 希尔的证词，《共产主义的威胁》，第807—808页。

② 史密斯的证词，《共产主义的威胁》第682—683页。马修斯在他的书中（第71页）指出这项证词是正确的。

干涉或政策有所改变，所以，实际上，直到7月中旬他才去古巴上任。这时甚至在外交史上也不失为奇妙的一幕已经就要开场了。

第十二章

迈阿密和圣地亚哥

1957年5月25日，一小批人在前哈瓦那飞机场工人领袖卡利斯托·桑切斯的率领下乘船离开迈阿密，这都是普里奥手下的一些人。卡利斯托·桑切斯与3月间攻打总统府事件有关，但是因为临阵脱逃，^①所以显然感到内疚。他们在奥连特省马亚里附近、卡斯特罗的故乡登陆，但很快就受骗投降。包括桑切斯在内的十六个人被当地警官枪决。这对于普里奥一直想在革命的反派中与卡斯特罗一争短长的希望，无异是一个严重的挫折。几天之前，普里奥的帮会方面的朋友中有一个最著名的人“外国佬”因在哥斯达黎加计划谋杀民主党总统菲格雷斯而和两个同伙一齐被捕；“外国佬”说，特鲁希略曾经提出给他二十万美元要他干掉菲格雷斯。于是对他提起公诉，把他押在牢里。另一个从前的古巴帮会分子也不知去向，至少是暂时失踪了。反对派团结一致以支持山区里的卡斯特罗的条件越来越具备了。

在这种情况下，紧接着埃尔乌贝罗遭到袭击之后，巴

^① 桑切斯是革命党人，曾先后参加卡里略的自由行动团体和梅内拉奥·莫拉派。在攻打总统府那天，他并未露面，后来在老友穆哈尔的帮助下离开了古巴。在迈阿密，他被看成一个叛徒，但是，他取得了普里奥的帮助，给他挽回了面子（苏亚雷斯对德雷珀提供的材料）。

蒂斯塔对起义军开始采取一种新政策。6月间，巴雷拉上校被派回到年初他曾取得有限成功的那个战场上，在帕尔马制糖厂设立了一个指挥所。在迪亚斯·塔马约突然被解除了奥连特省的军事指挥职务而由塔维尼利亚将军的至交罗德里格斯·阿维拉接替的时候，他已经拟订了一项方案，由他和他的助手桑切斯·莫斯克拉，莫雷诺，布拉沃和梅罗布·索萨分别追击起义军各个纵队。他下了一批十分新颖的命令，要求山区的农户一律撤出，以便建立一个禁区，除军队外，禁止通行。军队可以见人就开枪，不必分辨敌友，空军也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轰炸丛林。

同时，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已经决定了新计划。在山区，6月是在休养生息之中度过的。埃尔乌贝罗战役是起义军以重大伤亡而赢得的第一次战斗。伤员的疗养占去了格瓦拉领导下的一部分力量有几个星期之久。格瓦拉那支队伍，跟在主力部队后面，缓缓地回到山间深处，在这个过程中，人数忽而增多，忽而减少，因为条件艰苦，坚持不下去，所以一批批的农民参加进来，旋又离队而去；另一些由城市投奔而来的，旋又打道回城，有两个过去在巴蒂斯塔方面当过兵的参加了格瓦拉的队伍，但是他们意味深长地认为旅途太苦，又下山了。直到6月下旬，各个小组才重新会合拢来。这时，整个这支起义军队伍已达到二百人左右。巴蒂斯塔改变战争性质的决定，扩大了起义军自由活动的范围。这时简直可以说有了一个真正的解放区了，其中设有一个简陋的修理厂，一所医院，一个皮靴皮革厂，一个备有一部电锯的兵工厂，和一个负责重新填装铜手榴弹的铁器作坊。有了一些烤面包的炉子，

后来又有了学校和讲厅。所有这些地方都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虽则象拉梅萨这样几个偏僻的山谷，直到战事结束，始终没有遭到过危险，而一直是这些活动的一个牢不可破的中心。

即使山区暂时没有发生什么新战斗，这还是一个政治活动频繁的时期。几乎各省的一切公民和社会团体都以书面向政府抗议任意逮捕和在山区继续进行军事行动。由于苏伊士运河事件以及欧洲和俄国甜菜的歉收，蔗糖的销路甚旺，1957年，看来就象是古巴经济的最好年份之一。基督教圣职人员开了一次大会，结果由红衣主教阿特亚加、哈瓦那大主教和比那尔德里奥主教（奥雷略·迪亚斯）出面呼吁和平。圣地亚哥主教佩雷斯·塞兰特斯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吁。正规的人民党人和革命党人辞去了巴蒂斯塔的国会的委任，但是，国会还是通过了“宪法改革方案”，其中包括规定在1958年6月1日举行总统选举和新总统在1959年2月24日就职。格劳，人民党奥乔亚派和中央反对派的其他四个团体结成了联盟，提出由最高法院德高望重的法官以临时总统的身份接管政府，并于九十天内举行选举；格劳也宣布他将参加巴蒂斯塔的1958年选举。这种矛盾情绪使人没有可能（尽管往往是渺茫的）认真对待这种新政治阵容。

普里奥因他上次的军事远征，即“科林蒂亚号”的远征失败而弄得灰心丧气，不得不退而采取从迈阿密写信给巴蒂斯塔、要求他辞职这一权宜办法了。巴蒂斯塔的答复则是举行一次各党派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支持他在圣地亚哥开展1958年竞选运动。但是参加的只有五

千人左右，其中大多数据说是政府职员，在队伍的两边不时发生骚乱和枪声。在圣地亚哥和埃尔乌贝罗之间、马埃斯特腊山沿海地区的奇维里科，由参议员马斯费雷尔发动了一次类似的集会，原想作为现政权的一个支持点，但也失败了，虽则马斯费雷尔试图胜过卡斯特罗一筹，堂而皇之地许下分地给农民的宏愿。

巴蒂斯塔曾经几次说过，他将不参加1958年的选举，一则因为宪法不许可，二则因为他认为他已经尽了自己的本分。谁会竞选呢？副总统瓜斯·因克兰说，他希望卡斯特罗会参加1958年大选。“注册的人民党人”的头头奥乔亚，象另一个持不同政见的人民党人马克斯·斯特林一样，同意参加。从前是奇瓦斯的信徒的这两个人，因而也象卡斯特罗一样，同奇瓦斯的广大追随者断绝了关系。为把这些温和的反对党派团结在一个单一的“阵线”以内，开始作出了各种努力。

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也很忙。在墨西哥，发表了一个被称作“宣言”^①的文件，表面上包括了1956年11月卡斯特罗的观点；事实上这是马里奥·列雷纳在没有同卡斯特罗取得直接联系下写成的。无疑这反映了卡斯特罗的很多年轻追随者当时所相信的事物：人民党人只不过“是缺乏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纲领的一种古怪的形体；只是靠了奇瓦斯的人格才把他们结合拢来”；而且奇瓦斯已经去世了。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宁愿避免抽象的公式或

① <我们的理论根据：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纲领宣言>。见列雷纳<手稿>第93—95页。

胸有成竹的蓝图。“古巴革命的意识形态必须来自古巴本身的根源，来自人民和种族的条件。它将不是……从其他地方输进来的东西。”但是，七月二十六日运动认为“杰斐逊哲学还是有效的”并且完全符合于“林肯公式”。然而，也“必须注意使公用事业、土地和矿山的红利归诸古巴而不外溢”。经济设计将使国家摆脱象专利权和大地主领地这种栽培单一作物的弊害。〔对外国基地（如关塔那摩）提出了批评。〕其中有一句提到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为提高产量，希望能达到劳资团结和协调的状态，话虽莫测高深，却是颇为乐观。虽然文件没有提到1940年的宪法，但将会有有一个以真正表达民意为基础的代议制政府和一部新选举法。整个文件可以看作大体上表现了欧洲式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虽则它以宪法为指南而不是以竞选纲领为依据。^①

这个纲领和其他类似的一些纲领使得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参加了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其中有土木工程师协会会长、杰出的年轻工程师曼努埃尔·拉伊。拉伊在1946年毕业于，在普里奥时代曾经在国家开发委员会工作，最近一直是联贯贝达多和哈瓦那的米拉马尔那条隧道的工程师。虽对人民党人抱同情态度，他却采取一种稍有不

^① 列雷纳似乎根据福斯蒂诺·佩雷斯的建议，把凡是提到极权的共产主义的地方都从正文中删去了。福斯蒂诺·佩雷斯曾经对他说：山区中有一些人会认为这是不受欢迎的。他又根据马塞洛·费尔南德斯的建议，把文件中的激进部分包括进去（列雷纳：《手稿》第44页）。阿曼多·阿特后来写道，文件中包含了“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思想，即使……可能有所扩大”（信札，1957年10月15日）。

同的立场；在1957年5月1日，他同劳尔·奇瓦斯谈话之后，参加了公民抵抗运动。当时，他如同那个运动的大多数人一样，不大了解卡斯特罗，他“不大知道卡斯特的纲领”，只知道劳尔·奇瓦斯“在学校时是足球队队长”。他所以愿意担任土木工程师协会会长，基本上并不是出自什么政治目的，只是为了根除它的贪污腐败。

卡斯特罗自从到达马埃斯特腊山以来，一直避免把他的名字加在任何纲领上。不错，他对马修斯，泰伯和安德鲁·圣乔治所发表的言论，都是在山区里说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评论过《我们的理论根据》，他那些助手如象阿特和马塞洛·费尔南德斯等人，也都避免对那篇东西给以完全的认可。但是，由于它已在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员中唤起了希望，这种理论上的沉默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7月初，劳尔·奇瓦斯和人民党名义上的党魁、又是古巴最杰出的经济学家费利佩·帕索斯一同取道上山。奇瓦斯说，他去山区是一种表态，是承认武装斗争的时机已成熟了。经过几天讨论之后，于7月12日发表了一项由卡斯特罗、奇瓦斯和帕索斯签署的总宣言。宣言大部分出于卡斯特罗的手笔。它号召全体古巴人民组织一个公民革命阵线，来“结束暴力的政权、结束侵犯个人权利和警察的无耻罪行”；解决古巴和平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自由选举，建立一个民主政府；宣言强调说，起义军是“为一个自由、民主和正义的古巴这个美好的理想而战斗的”。应该绝对保证新闻自由，保证各工会的自由选举权。要求美国在内战期间停止在古巴装运军火，并拒绝外国的干涉和调停。不同意以军政府取代巴蒂斯塔。

反之，应有一个“大公无私的”无党无派的临时总统，临时政府应于就任一年之内举行选举；选举应按照1940年宪法和1943年选举法办理。

纲领的经济方面是卡斯特罗根据圣地亚哥一个年轻律师包迪略·加斯特利亚诺斯对帕索斯本人和他的同事、年轻而聪明的经济学家雷希诺·博蒂的演讲所记的笔记而写成的，博蒂的父亲是关塔那摩一个可敬的诗人。建议中还包括有许多要求，如取缔赌博和贪污；实行土地改革，使荒地分给无地工人；加速工业化；使租地农场主和占据公地者自有其田。原有的地主应得到补偿。没有只字提到公用事业的国有化、没有只字提到土地集体化，也肯定没有提到工业的集体化。这个文件还不及列雷纳在墨西哥所写的文件那么急进，还不及卡斯特罗本人在墨西哥所发表的宣言那么急进，也肯定不及《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中的建议那么急进，不及流行于墨西哥并为卡斯特罗据以推行的那份帕索斯的演讲笔记那么急进。照格瓦拉的说法，卡斯特罗“力图把有关土地改革的一些声明说得更明确些”，但是他不能破坏同其他人新结成的统一战线。^①而当时其他一些人却怀疑这场争议的真实性。^②

这个宣言是一个骗局吗？格瓦拉后来明确地评论说：

① 列雷纳看到过这个声明，但那是1956年夏末在墨西哥城。

② 奇瓦斯（《手稿》）说，卡斯特罗“从来没有试图表示出同我们共同签署的文件中那些思想有所不同的思想”。

这项折衷方案我们并不满意，但这是必要的；这在当时是进步的。等它成为革命发展的阻碍物时，它就不能再存在下去了……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最低的纲领，一个限制我们的努力的纲领，但是……我们知道，从马埃斯特腊山来实现我们的志愿，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必须在长时期内考虑到一整批“朋友”，这些“朋友”为了他们本身自取灭亡的目的，为了要通过与北美主子有密切联系的那些外来的资产阶级，以维持帝国主义在古巴的统治，而试图利用我们的军事力量，利用人民对卡斯特罗早已具有的无限信心……这项宣言对我们来说，只是旅途中的一次小憩，我们必须继续完成我们在战场上打败敌人这个根本任务。

1961年卡斯特罗的某些解释大概也适用于这个时期：“无可否认，如果等到我们开始强大起来，我们已被称为具有非常急进思想的人，那么，现在正在同我们作战的那个社会阶级在那时也是会同我们作战的”——这指的是，后来绝大多数背弃了卡斯特罗的专业的中产阶级。

从这些话看来，可以得出结论说，卡斯特罗所起草和签名的“马埃斯特腊山公约”是虚伪的；也许是由于他在马埃斯特腊山的经历，由于他在那里所受到的影响（例如格瓦拉和他的兄弟的影响），他已经下决心要以比他在攻打蒙卡达，甚或在“格拉玛号”登陆时所想象的更激进的办法来改造社会；虽说当时同古巴共产党以至它的青年运动，还没有建立任何联盟，也很少发生实际接触，但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大概通过他的兄弟劳尔，已经得知那些后来可能会同情的团体的政策已在发生变化了。

但是，卡斯特罗本人的思想，甚至也象格瓦拉的思想一样，是在演变之中；或许在这些日子里他已私下向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承担了他后来所履行的义务了；但是他还是可以欺骗他们或象他对别人那样同他们绝交。1957年，卡斯特罗专心致志于推翻巴蒂斯塔；而他同谁结盟，他说过什么，或为了达到那个目的他承担了什么义务，他都似乎并不特别在意。至于将来，胜利以后，那等将来再说，这几乎是所有战争中所有战斗员所抱的一种态度。

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政治目的正在演变过程中这一事实，从1957年8月在哥斯达黎加的圣何塞出版的《自由古巴》杂志上、据认为（显然是错误的）是卡斯特罗所写的一篇文章中看起来。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电力和电话系统国有化和“最后解决土地问题”（包括没收一百七十亩以上的农地）这两项规定。

这项马埃斯特腊山宣言签字后，就交由这个地区一个忠诚的农民埃尔特罗利内罗送回哈瓦那，并在《波希米亚》周刊上发表。这时，卡斯特罗在山区建立正式政府的计划已告失败。人民党的两个分裂集团（在哈瓦那由曼努埃尔·比斯维领导，在墨西哥，由阿格拉蒙特领导）给以充分支持；另两个（追随马克斯·斯特林和奥乔亚的）则不予支持，其他任何反对党派集团也都不予支持。“以一个事实上的政府来取代另一个事实上的政府有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的态度。

在这期间，厄尔·史密斯于7月15日到达哈瓦那。他发现首都平静如常，但是，一出首都，就是一种恐

怖气氛。在圣地亚哥，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和警察已经有了近乎公开的战争。七月二十六日运动计划以罢工和恐怖活动在奥连特省的城市和乡村挑动普遍的分裂，然后攻打城市中一些主要公共建筑场，从而夺取省的管理权。载着军警的吉普车和汽车经常受到袭击；被捕者总是有很大一个百分比是很年轻的，甚至于是小学生。7月7日，在关塔那摩，有一个八岁的小姑娘在安放炸弹时被捕。普里奥时代的旧式帮会分子就这样让位给十几岁以至更年轻理想主义的歹徒了。仿佛怠工已经和巷战联系起来，虽则有时候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旗帜会出现在屋顶上而不是炸弹出现在建筑物的下面——出现在贝达多新落成的福克萨大厦的屋顶或电视塔的顶端。但是要把所有这些活动协调起来却大非易事。也许有些是为了报私仇、雪旧怨的。例如，7月6日，圣地亚哥的校车司机丹尼尔·桑切斯的被杀害，同时在街头发现有一张“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叛徒”的条子，究竟它的真正的背景是什么？

巴蒂斯塔试图以“举办选举”为词来回答所有这一切问题，如果要他在流血和选举之间进行抉择——当然他要选举，也就是1958年的选举。他呼吁格劳·圣马丁，帕尔多·利亚达和奥乔亚的“真正”反对派继续在他的选举中展开竞争。7月4日，他发表了一项追忆杰斐逊和华盛顿的激动人心的声明。这项声明，或许除了对美侨团体，没有发生任何作用，美侨团体又大讲特讲罗斯福谈到特鲁希略的那句老格言。7月24日，史密斯举行了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我觉得，我们两国在反对共产主义的共同

斗争上，将永远是最亲密的朋友和盟邦。”^① 他也赞扬了镇压共产党活动局——这是很不明智的，因为镇压共产党活动局新近把共产党员同反对党派的所有成员都搞混了。但是，他补充说，“我们没有什么实质性东西”可以使我们相信卡斯特罗的运动“是共产党指使的”。^② 他说，他是作为一个观察家而来的；本着这种精神，他决定遵循赫伯特·马修斯的建议，尽快地走出哈瓦那，去看看这个国家的情况。他说下星期他要去奥连特省访问圣地亚哥，关塔那摩的美国基地和美国所有的莫亚湾及尼卡罗的产业，访问岛上这些最大的纯美国企业。

圣地亚哥曾经有一个令人不快的7月。谣言甚至说，美国公民正在考虑一起撤退。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旗帜常常出现。射击事件不胜枚举。学校被焚毁了。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常常使用瓶装手榴弹。在7月26—27日，攻打蒙卡达的周年纪念时，据说警察逮捕了二百人，很多是在圣地亚哥逮捕的。所有这一切自然都是企图在对公共建筑物进行大举袭击以前尽可能破坏奥连特省正常生活的缜密计划。7月30日，即在史密斯预定出发的前一天，圣地亚哥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弗兰克·派斯被圣地亚哥的警察头子何塞·萨拉斯·卡尼萨雷斯上校和他的一个走狗“马诺·内格拉”在圣地亚哥的卡列亨德尔穆罗枪击毙命，当时他只有二十三岁。几个星期以前，派斯已经被认为是警察的主要猎取物，一直在逃避之

① 厄尔·史密斯：《第四层楼》（纽约，1962年），第8页。

② 同上。

中，虽则他依然留在城内。他的兄弟何塞曾经在6月的政府示威游行中被杀害。派斯一直躲在铁器商劳尔·普霍尔的店里，劳尔·普霍尔是起义者的主要接济人之一，也被杀害了。又是一次政治犯罪，又发生了一次不经审判的执行死刑。但是，后果是不平常的。圣地亚哥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全体成员都参加了在派斯的未婚妻阿梅里卡·特莱包塔家里为他举行的丧礼。但是警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第二天，妇女集合在圣地亚哥市中心举行规模盛大的示威，表示抗议。她们表面上是上街买东西，而等到官方出来欢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大使厄尔·史密斯的时候，她们当即集合在大广场上。

这是一次成功的示威。史密斯在八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护送下，驱车进城。妇女身着丧服，向他跑过去，高呼“自由！自由！”作为向他致敬。在市政厅前面汇集了大堆大堆的人群。史密斯走进市政厅，警察用水龙头迫使妇女后退，并逮捕了四十人。在史密斯走出来的时候，这个大广场正陷于混乱之中。警察不顾一切地试图以暴力打退妇女，以致触怒了史密斯。他看到妇女被打倒在地后又被拖进警车。妇女成功地递给了他一封信，要求美国重新考虑支持巴蒂斯塔的政策。下午，大使举行记者招待会，声称：“警察的过分行动使我很不以为然。我对于我来到圣地亚哥……可能就是公众示威的原因，深为遗憾……我……相信被警察拘留的人已经获释。”后来，当派斯的遗体被大队送葬者护送到墓地去的时候，史密斯很策略地在马蒂墓前献了一个花圈。

史密斯的这些行动在古巴反对党派和他们在美国的

朋友中得到了极好的印象。《纽约时报》赞颂了他。巴蒂斯塔的朋友则公开抨击他，指责他的行为不合于外交常规。这项指责，史密斯得到了杜勒斯国务卿的维护。这时，很多人认为史密斯将会给古巴带来一个新政策。但是事实上，国务院只是训令他“改变古巴方面这种普遍看法，即认为美国大使是在进行干涉，以利于古巴政府使巴蒂斯塔的独裁制永续下去”^①——也就是说，他应设法保持中立。

在圣地亚哥的抗议和山区的大事之间是有一些配合的。在来自平原的密使离开之后，卡斯特罗已经改组了他的追随者。劳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这时各以少校衔分别统率两支队伍。格瓦拉不再是起义军的医生了，他的地位由来自平原的一个新人塞尔希奥·德尔巴列博士所取代。但是这两支队伍并不是在一个新战场上活动；卡斯特罗拒绝了平原方面所提出的开辟“第二战线”的要求——尤其是在北部米兰达糖厂附近作过不重要的努力失败之后。起义军仍然为开小差所苦，一个年轻的农民曾经因此而被枪决。7月26日，由农民吉列尔莫·加西亚领导的一个小组袭击了帕尔马制糖厂，即在曼萨尼略那边靠山最近的一家制糖厂，并在造成损失和伤亡后撤退。7月31日，格瓦拉的队伍试图袭击布埃西托铜矿开采区中的一个小小军事哨所，因为他认为卡西利亚斯少校必会到那里去看他的情妇。队伍分乘三辆卡车前往，当夜即攻打兵营，交火不过几分钟对方就投降了；乡村警卫队伤

^① 史密斯：《第四层楼》，第20页。

六人，起义军死一人、伤三人，起义军烧掉了兵营，缴获了一挺轻机关枪和对他们有用的其他东西，并俘虏了一个军曹和一个叫做奥兰的间谍作为人质，以防对村庄的报复行为，但是，这两个人后来都被释放了。他们还炸掉了一座桥，爆炸手是村庄上的一个农场主克里斯托瓦尔·纳兰霍，他后来投到起义军方面来。村庄上送了起义军啤酒和果酱。

与此同时，在平原上，在派斯出殡之后，举行了一次罢工，罢工筹备已久，只是这时才举行罢工——圣地亚哥在送葬和示威期间，店铺自然也关了门。警方试图强迫店铺开市，但是罢市持续了五天。尼卡罗镍厂也停工了。这自然是起义军雄心勃勃的全面计划的一部分。下一个星期，罢工蔓延全岛，在哈瓦那还影响到了公共汽车司机和银行职员。政府的反应是能逮捕多少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成员就逮捕多少。在奥尔金，科莱上校在一次断电期间，在街上枪决了九个人。但是，各处的罢工并没有什么配合，当哈瓦那在8月6日复工时，奥连特省在舐一舐创伤之后，也复工了。宪法保证再一次暂停实施。至少在地方上，共产党人似乎尽可能支持罢工。

从这时起，要说古巴已处于比如说象塞浦路斯岛或马来亚在危急时期所处的同样内战状态中，是不会不正确的，而内战进行的方式和一个帝国当局使用警察方法去镇压一次拥有所有各阶级大部分人同情的起义的情况相似。警察继续杀人，但每死一个人，却给起义军制造十个新的支持者。在地平线以外还朦胧地出现了无法预知的、长期以来就是古巴命运的决定者的美国的势力。美

国如果只是充当一个观察者，那是不可思议的。美国的陆、海军继续站在巴蒂斯塔一边，在无数友好集会的成千上万幅照片中，他们的白制服的耀眼仅次于巴蒂斯塔的白制服。美国实业家同现政权仍然是再友好不过的；纺织和人造丝巨头戴登·赫奇斯在6月间出殡，巴蒂斯塔和他的大多数阁员都亲自参加；赫奇斯的两个儿子，小戴登和伯克都是巴蒂斯塔最亲密的朋友。到1957年下半年，甚至在中产阶级专业人员看来，这场斗争不仅同一场反对旧帝国势力的斗争相似，而且事实上正是这样一场斗争；少数个别人士，象显然属于进步人士的史密斯或马修斯，^①或在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中的开明人士也不能弥补数以千计的实业家、士兵和旅行家的沉默；沉默无异是义务的承担；而义务的承担则无异是敌视——这种敌视似乎在奥连特省剥去了伪装，在那里，搜索卡斯特罗的第一营是由在美国训练的人员组成的，所使用的也是“最现代化的美国武器”。加德纳大使在6月间离去时，曾经声明美国无意干涉古巴事务；有些报纸还把这项声明列为头条新闻；巴蒂斯塔的手很快就摸到刀鞘，大肆谴责那种认为这样一种计划甚至可以考虑一下的想法，并且说，这样断章取义地以古巴一位老朋友的话作为头条新闻，正是编辑的鉴别力的贫乏。但是，这就明白地透露出一种掩盖不住的焦虑：谁会提供调解呢？什么时候呢？巴蒂斯塔和他的部长们有几个星期都含蓄地说，反

^① 古巴新闻记者因美国新闻记者似乎很容易就到山区去，自己却没有这种方便，而颇为恼火，这就不足为奇了。见1957年6月古巴新闻学院的抗议。

对党正在设法这样作。但是，更趋极端的美国人承认了巴蒂斯塔对卡斯特罗的估价。前驻哈瓦那大使斯普鲁伊尔·布雷登在四十年代是个进步人士，但是现在到了五十年代，由于在麦卡锡时期中情绪转变了，成为一个极右分子，他在1957年8月17日于《世事札记》上写道，卡斯特罗“即使不是一个共产党党员，也是共产党的一个同路人，并且由来已久了……”。^① 指控和反指控的把戏已经上场了。

^① 引自《共产主义的威胁》，第248页。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顾问古巴籍律师马里奥·拉索，于1957年8月间去纽约，试图使《纽约时报》停止支持起义军。在和前驻古巴大使古根海姆的一次会谈中，有巴蒂斯塔的驻华盛顿大使阿罗约在座，当时古根海姆解释说，“你必须要巴蒂斯塔号召举行大选，然后才能希望有任何改变。”（拉索书，第116—117页。）

第十三章

西恩富戈斯的海军兵变

卡斯特罗、劳尔·奇瓦斯和帕索斯在马埃斯特腊山宣言中曾经谴责这样一种想法，即认为光是一部分武装力量就会有助于推翻巴蒂斯塔。他们曾经批评巴尔金的政变。当然，要是发生了这样一种政变，那就会影响到卡斯特罗本人取得政权的机会。所以巴尔金对卡斯特罗来说是一个危险的对手。但是，9月间，西恩富戈斯的一部分海军在七月二十六日运动、革命党人等的合作下，通过驻扎在那里的海军军官，却当真试图推翻现政权了。

这项计划同古巴革命者所制订的大多数计划相似：进行一次突击，以少胜多，攻其不备，然后随机应变，酌情行事。西恩富戈斯的形势有利于进行这种行动。但是与攻打蒙卡达有所不同，冲进兵营的战士在袭击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且，与蒙卡达有所不同的还在于美国大使馆已经得到了情报；根据美国大使的说法，美国大使馆的中央情报局的第二把手（威廉·威廉森）确实曾对这些谋反者说，由于起事成功而建立起来的任何政府，都会得到美国的承认。史密斯虽则对中央情报局的人的活动一无所知，他却知道所计划的起义。

几个月来，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已经在海军的年轻军官中获得了一批追随者，其中很多人对于海军情报局局

长劳伦特这个野蛮的刽子手及其走狗痛恨已极。在5月底，西恩富戈斯一批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成员的青年公民已经被捕，并惨受酷刑。这是夺取海军基地的一个野心勃勃的新计划的信号。西恩富戈斯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领导人埃米略·阿拉贡内斯(出身于该城的一个良好家庭)会见了哈瓦那地下的临时头头哈维尔·帕索斯。他为此计划取得了同圣地亚哥、同卡斯特罗方面的配合。帕索斯把“哈瓦那所有的枪支都(送)到了西恩富戈斯”。但是，阿拉贡内斯并没有表现出一个超群出众的组织者的才能，很多枪支都没有加以利用。不过，海军方面的谋反者并非完全依靠卡斯特罗的运动，因为有几个人和卡里略的蒙特克里斯蒂运动、普里奥和革命党人有了联系。卡里略曾经把他得自胡利奥·洛沃的那笔二万五千美元的款项用到了这次冒险事业上。这项方案也并非局限于西恩富戈斯一地。计划认为解决局势的要害是在于夺取“古巴号”巡洋舰，夺取当时停泊在哈瓦那港的其他船只，以火炮对准哥伦比亚兵营以及莫罗和普林西佩两个要塞，然后以海军方面的力量和哈瓦那的地下人员来夺取该城。其他港口也被卷入了。在谋反者的压力下，人们一心一意从事于越来越是大而无当的计划。细节都被置诸脑后。在9月5日袭击届期的前一天，哈瓦那的海军军官自认为还没有作好准备。在马里埃尔和圣地亚哥方面推迟一切行动的努力获得了成功，但是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在西恩富戈斯发出了照旧进行的指令。^①

攻打西恩富戈斯是由一个革职的海军中尉迪奥尼西奥·圣罗曼领导的，圣罗曼以前曾经在西恩富戈斯服过

役，并于1956年在巴尔金阴谋中起过不大的作用。在基地内的二十八名谋反者是由一个小军官圣地亚哥·里奥斯领导的。他们的任务是在夜间夺取基地，逮捕军官，并为圣罗曼和由米格尔·梅里诺及劳尔·科尔率领的革命党人谋反者开大门。很多已婚的官兵都在城里过宿，所以，睡在基地的大约只有一百五十人。黎明时分，里奥斯和四个士兵占领了军械库和大门楼。军械库的哨兵和几名门岗参加了起义，其他的人则被禁闭起来。所有内部的警卫岗哨都被夺占。到了清晨五点半钟，基地已落在起义者手中，虽则司令官罗伯托·科梅萨尼亚斯上校仍在睡觉。圣罗曼从城里来，唤醒并逮捕了司令官。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成员一百五十人，偕同革命党员五十人开到了。大家都领到了武器。

官兵开始从城里到达。每个人立刻就面对着或者就擒或者参加起义这一抉择。六名军官和大多数士兵采取了第二种抉择，同时有十八名军官被捕。

起义这时已蔓延到城里；到处响起“古巴万岁！革命万岁！战斗的海军万岁！圣罗曼万岁！”的呼声。上午八时，港口警察的一名起义警官接管了海上警察局，杀死了局长塞哈斯少校。西恩富戈斯驻军司令欧亨尼奥·费尔南德斯少校在乡村警卫队总部被捕。剩下的只有被起义者包围起来的警察局了。警察局长鲁伊斯少校打电话向哈瓦那求援，力图拖延。于是开始炮轰了。警察投降，全

① 从哈瓦那卷进这次行动的卡里略说，哈瓦那的福斯蒂诺·佩雷斯明知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却下达继续进行的命令，——原因是卡斯特罗希望那些可能是他的反对派对手，巴尔金分子，最好死掉。

部被俘往海军基地。到了这时，城里自然知道这次袭击了。但是，尽管许多店铺都关了门，人行道和阳台上却挤满了看热闹的。除圣克拉腊街的乡村警卫队基地外，西恩富戈斯已被攻下来了。很多对起义抱怀疑态度或迟疑不决的支持者都佩上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红黑两色臂章或革命党的橙色臂章。

西恩富戈斯的解放只持续了一个早晨。午后，坎迪多·埃尔南德斯上校率领摩托化步兵从圣克拉腊开来。他们在马蒂公园遭到伏击，伤亡甚众，这个上校受伤，他的儿子丧了命。但是不久，由美国作为美-古军事计划一部分而供应的 B-26 轰炸机，开始在城市上空盘旋，投下了几枚炸弹，并以机关枪扫射海军基地和起义者的防守哨所。以最近美国物资所装备的坦克和装甲部队也在哈瓦那出现了。全城发生巷战，起义者没有胜算的把握。他们本该在获得初步胜利后，撤到埃斯坎布拉伊山的，但是，由于胜利过于彻底，以致不能采取这样一种被看作是退却的作法。起义者的指挥官们也没有预料到会出现如此猛烈的反应，因为他们认为哈瓦那当时也在发生战斗。使用坦克、装甲车和 B-26 轰炸机在技术上说来，是违反美-古军备协议的，因为该协议特别指出，非经同意并为保卫本半球的需要，不得使用这些武器。结果是起义者并没有持久的防卫计划。一些被切断了的小股起义者，绝望地通宵战斗下去。但是，到了傍晚，海军基地再一次落到政府军手中，第二天，在警察总部坚持抵抗的最后一批起义者被打败了。

有六十七名起义者向海军司令科梅萨尼亚斯上校投

降，后来送交审判。少数几个起义者，如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头头阿拉贡内斯和海军中尉胡利奥·卡马乔从城里逃出。大多数俘虏被枪决，其中包括在警察总部投降的大约三十人和在洛伦索小学投降的、由最勇敢的起义者之一迪马斯·马丁内斯所领导的四十人在内。由加西亚·奥拉庸上尉领导的海军情报局逐户搜查；凡是看上去有过参加起义迹象的——如藏有武器，负伤，衣服上有血迹，以至根据某些人的说法，单凭年纪轻这个事实——都一律被拉出去枪毙。圣罗曼被捕了，受了几个月的折磨之后遇害——当然没有经过审讯。后来，据世界医学协会秘书长称，有二百名伤员被活埋了；虽然这个数字或许有所夸张，但是，实际数字是高于巴蒂斯塔本人所说的四、五十人之数的。根据军方的说法，部队有十二人死亡。^①参加战斗的起义者总共约有四百人，死亡大概不下三百人之多。这是迄当时为止的内战中最大一次战斗。西恩富戈斯被切断达几天之久——但是，报纸贬低了援军的作用。一般古巴人大概认为，起义已被海军基地的部队击败了。

出现了一些重大后果。政府使用了轰炸机、坦克和装甲车是瞒不过美国大使馆或军事顾问团的；因此他们要求它解释。“我们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威廉·威兰

^① 《哈瓦那邮报》，1957年9月8日。最可靠的英文记述是泰伯书，第173—181页的记述。参看莫雷略，《纽约世界电讯》，和胡雷斯·杜波依斯，《芝加哥论坛报》，他们都曾经在那里。另见卡洛斯·弗朗基于1958年9月5日在起义军电台上宣读过的并重刊于《革命报》，1959年1月26日，第11页上的记述。

几年之后这样说。而且，在随后几个星期中，“以美国赠与的装备来供应整个半球的防卫之用的武器都分散到岛上整个东部的各战区。这是事先没有征得我们的同意而作出的。”^① 时日迁演，依然没有作出任何适当的解释，以致美国国务院以鲁博特姆和威兰为首的一批进步人士开始考虑，这是不是停止装运军火给巴蒂斯塔的一个理由。卡斯特罗和普里奥在美国的支持者极力主张采取这一行动，在整个冬季中，这已成为美-古关系上的主要争论问题了。

这时，美国新任大使厄尔·史密斯所起的作用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史密斯反对圣地亚哥警察暴行的立场在反对党派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阿根廷、巴西、智利的侨民团体却不赞成，甚至谴责史密斯同普里奥的驻美大使路易斯·马查多或普里奥手下的经济总署署长和后来的世界银行古巴董事华金·梅耶尔这样一些反对党派的温和党员一起打高尔夫球。巴蒂斯塔的前总理加西亚·蒙特斯拒绝出席法国大使馆为史密斯举行的一次宴会。事实上，史密斯对反对党派毫无同情。在他到任的最初几个星期，他可能就受到了自由党员约翰·托平这些政治官员和中央情报局的代表们的影响——不仅仅受到了“第二把手”（他在西恩富戈斯起义中所起的作用，在六十七名起义者的审讯时暴露了出来）的影响，而且受到了被史密斯视为“菲德尔分子”的中央情报局驻哈瓦那头头的影响。史密斯要他调查共产党在古巴的力量，他似乎曾

① 威兰的证词，《共产主义的威胁》，第541页。

予以拒绝过，并且在走出史密斯的办公室时，嘟哝说：“我们才不管你是怎么想的。”^①这个人不久就走了，但是，美国大使馆的其他成员（其中很多是新来的）依然对巴蒂斯塔抱敌视态度；军火交运问题闹了整整一个冬季，由于在迈阿密发现军械库而逮捕了普里奥分子这种新事件，以及甚至象格劳所说的美国光是承认巴蒂斯塔就是在进行某种形式的干涉的这种看法，而使问题更加恶化。但是，一般说来，美国大使馆对卡斯特罗本人是有所提防的，作为民主主义者，他们是会喜欢由卡斯特罗以外的人来作为巴蒂斯塔的继任者的；但是由于他们怀有反对干涉的想法，他们不敢采取任何积极行动来推翻巴蒂斯塔。于是武器禁运似乎就是消极行动中的最积极的方式了。

当时有这样一种想法（当然并无充分证据）：认为卡斯特罗所以极力主张在西恩富戈斯发动起义，是怀着一个借刀杀人的愿望，想看到他的对手巴尔金分子身遭屠戮，让蒙特克里斯托集团的领袖卡里略——以前是卡斯特罗的一个支持者，不过是一个抱怀疑态度的支持者——在仍然是监禁巴尔金的地方的松树岛发动一次政变。^②卡里略得到了阿根廷副总统罗哈斯海军上将和洪都拉斯总统许以帮助的诺言——两个人没有一个践约；

^① 史密斯书，第 34 页。

^② 卡里略记载说，“这里暴露出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切望极权主义的权力，也暴露了其领袖的道义态度，为了防止另一个派系的胜利而不惜拿数百人去送死，结果是 9 月政变的失败造成了陆、海、空军十名官员的垮台。”（《手稿》第 37 页。）

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拉腊萨瓦尔海军上将，巴尔金在华盛顿的一个老友，也曾许以帮助。

在马埃斯特腊山，格瓦拉的队伍在西恩富戈斯事件以前就同由梅罗布·索萨少校领导的一支驻军在一个称为翁布里托的小山上有过一次冲突；紧跟着是卡斯特罗在奎瓦斯区攻打了帕尔马莫查河，四个老菲德尔分子战死，巴蒂斯塔的士兵死了五十七人。这次袭击可以说是巴蒂斯塔的军队最后一次进入山区。这时，由于塔维尼亚将军的阴谋，干练的巴雷拉·佩雷斯上校又一次被解除了指挥权，取代他的正是那个既无能又残酷的吹牛大王、因蒙卡达而著名的阿尔维托·德里奥·查维亚诺。

如果没有卡斯特罗，是不是就真有一个民主解决的可能呢？就纯粹政治术语来说，这似乎是可能的。巴蒂斯塔本人所作的将不参加1958年选举的声明，无疑是真诚的。他这时所想得到的是在历史面前的责任，至于历史的爱憎却在其次。他希望把他那一套制度交给他的继任者，这样，一切反对党派终将都会牵连在内。但是，哪一个可以作他的继承人呢？他的兄弟潘钦吗？那就有点太象多米尼加共和国了。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这时总统虽是埃克托尔·特鲁希略，而权力却掌握在他的兄弟、那位将军的手里。洛佩斯·卡斯特罗那位开发委员会的头头吗？总理里维罗·阿圭罗吗？但是，这些人要是没有巴蒂斯塔本人就没有任何独立的政治后援。这样一些继承人，会被卡斯特罗和人民党的一次军事胜利或者更可能会在某位将军或警察头头的更加粗暴的独裁统治下一扫

而尽。离开选举还有一年，巴蒂斯塔坚决拒绝提前举行，一则因为要这样作，无异是承认现行制度是非法的或临时的，一则因为如果他要巩固现行制度，他还需要时间。在这个阶段上，在1957年初秋，许多人和许多政党都认为，他们不如还是同巴蒂斯塔合作到参加他所举办的选举为止。巴蒂斯塔本人则正以选举作为他的政策的主要推动力：

什么都阻挡不了人民前往投票所的去路，(他在9月4日这样说,)谁也不能使我们退却……本年头六个月的票据交换的余额，表明了本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有人企图把他们吓跑的那些外国投资家继续宣布了新的投资。

这是事实。在1957年初，几乎天天都有一家美国大公司的某种新投资。在莫亚湾，有一项非同小可的新投资计划已经开始。9月间，莫亚湾的所有主弗里波特硫磺公司总经理兰伯恩·威廉斯在和巴蒂斯塔会见后说，工程将立即开始；莫亚湾被认为是自由世界中新开采的镍的最好来源，其中钴所占的百分比特别高。

现在问题在于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是否会作出任何妥协。卡斯特罗认为他已经强大到足以拒绝这样作了，并且完全不予理会，例如，中间派的主要反对党领袖格劳声称，他拥有三十万登记的选民这一事实。1957年秋季，在山区有寥寥几次小型战事，例如9月10日阿瓜松林的战事，但是，卡斯特罗已经得到了他为巩固他的地位所需要的一切时间了。有几次象军队在奥罗德基萨屠杀五十三

个农民的军事行动，只不过使巴蒂斯塔更加丢脸罢了。农民开始感到与其留在自己家里，冒着来自里奥·查维亚诺的死亡的危险，还不如到山区同卡斯特罗在一起更为稳妥。政府和起义军、警察和炸弹安放者把他们的神经战逐步升级。同卡斯特罗一起工作的很多农民为莱昂纳多·巴罗所出卖。无穷无尽的一连串青年一个接着一个转入地下，很多人被投入监狱。一位叫做豪尔赫·鲁伊斯·拉米雷斯的医生，因为试图给一个青年医治在同警察冲突中所受的枪伤而遭暗杀。古巴医学协会提出了一项新抗议，很多医生只是为了背弃巴蒂斯塔就变成卡斯特罗的同情者。马斯费雷尔的《古巴时代报》的助理编辑路易斯·曼努埃尔·马丁内斯在哈瓦那被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击毙。10月间，炸弹炸毁了奥连特电台。圣地亚哥施行宵禁，一如通常在这种场合下所出现的情况那样，又有几个青年的尸体被吊在街上。整个奥连特省置于军事管制之下，陆军负责北部，海军负责南部。交通受到限制。为卡斯特罗的头颅悬赏十万美元奖金。厄尔·史密斯很快变得不那么相信国务院或他自己的大使馆的顾问们了，打了电报给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建议在山区安置一个特务在卡斯特罗的身边，“查明共产党（对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控制到了何种程度”。显然这是作不到的，总之，中央情报局在古巴本身依然是褊袒、而不是反对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①虽然同起义军的关系，并没有因颁给

^① 史密斯书，第35页。但是莱曼·柯克帕特里克隐约地说，已把特工人员成功地安置在山区（《真正的中央情报局》，第159页），他或许只是指安德鲁·圣乔治而言，此人这时已回到美国。

卡洛斯·塔维尼利亚上校以美国荣誉勋章而得到改善。11月间，从新泽西给巴蒂斯塔送去了一大批武器，而由塞萨尔·维加所率领的三十一个古巴人，连同运给卡斯特的武器，却在佛罗里达州一并被一个美国便衣特务所拘获。美国各种右翼人物力称对巴蒂斯塔的任何武器禁运都会“导致共产党的控制”。仿佛是为了要回答这些怨言似的，《工人日报》辩称，古巴共产党并没有因为他们对起义军的支持而得到应得的荣誉，美国报纸总想隐瞒这个事实。10月间，苏联政府对古巴的斗争作出了第一次直接的暗示，当时苏联出席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代表攻击巴蒂斯塔的政府是一个“压制和迫害其人民的恐怖主义的政府”^①，这倒的确是事实；尽管有很多巴蒂斯塔分子被起义军杀害了，却似乎找不到遭受过起义军的酷刑的例子。

在初冬，在美国的流亡者虽然不停地活动，但对卡斯特的计划却心中无数；难道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只是人民党的派生物吗？还是人民党不过是同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合并了？派斯死后，实际上是哪一个组织组成了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中央委员会？费利佩·帕索斯，莱斯特·罗德里格斯（圣地亚哥一个蒙卡达分子）、马里奥·列雷纳和路易斯·莫兰（在5月间审讯“格拉玛号”的犯人时曾为其中几个人辩护的圣地亚哥律师）在林肯·罗东的迈阿密家里举行的七个反对党派的大会上代表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发言，林肯·罗东是1952年以前的古

^① 《西班牙美洲报道》，1957年11月。

巴众议院议长。出席的还有代表人民党两派的阿格拉蒙特和比斯维；革命党的普里奥，巴罗纳，埃维亚和卡洛斯·马里斯塔尼；^①代表大学生联合会残余的拉蒙·普伦德斯；代表最近从大学生联合会分出来、另组大学生指导委员会的弗雷·乔蒙这个攻打总统府的副指挥；以及代表工会反对派的安赫尔·科菲尼奥和伊里戈延。这些人成立了一个他们称为全国解放委员会，包括除开共产党、格劳的革命党和追随奥乔亚或马克斯·斯特林的那些赞成参加竞选的人民党人以外的所有反对党派的代表。普里奥的最后一任总理“托尼”·巴罗纳（自9月以来在流亡中）被指定为主席，人民党人比斯维担任秘书，而全国委员会则完全由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人所组成——马里奥·列雷纳（宣传）、莱斯特·罗德里格斯、弗兰基（组织）和劳尔·奇瓦斯（财政）——后者这时已经脱去了人民党的外衣。这个新委员会首先声称“斗争”必须继续到恢复民主统治时为止，应“尽早”举行大选，无论如何不得超过今后十八个月。应该恢复1940年宪法。唯一的经济要点是：“应创造就业的新源泉以及较高的生活水平”。^②因为普里奥不但资助革命党的两派，还资助学生、工会会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资助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所以他必然成为注意的中心，被看成是主要的组织者。

① 这时事实上已一分为二——古巴革命党或革命党人；和由马里斯塔尼领导的人民党组织比较积极的支派。马里斯塔尼曾任普里奥的交通部长。

② 全文和评论载胡莱斯·杜波依斯书，第188—190页和《共产主义的威胁》，第579—586页。关于指导委员会的观点，参看恩里克·罗德里格斯·洛埃切斯《前往埃斯坎布拉伊》（哈瓦那，1960年），第21页。

这项声明在美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帕索斯和其他两个七月二十六日运动者并没有同卡斯特罗讨论过这些问题；其实在作法上，帕索斯并没有任何真正权利可以使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承担义务，他这时同奇瓦斯都只不过是它的最著名的支持者。迈阿密公约的消息只是通过《纽约时报》才传到了卡斯特罗那里。不难理解，这使得卡斯特罗大为恼火，与其说是为了公约的内容，不如说是为了他本人没有与闻其事就签订了公约。虽然如此，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全国指导委员会首先对帕索斯和莱斯特·罗德里格斯所作的反应是相当谨慎的，说迈阿密协定“看上去象是反对党派某些靠不住的领导人的一种狡猾的政治诡计”。只是到了迈阿密的委员会产生了民主政治的一切常见的困难和混乱时，卡斯特罗的态度才强硬起来。在11月的某一天，全国指导委员会的组织部长阿曼多·阿特在写给迈阿密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代表马里奥·列雷纳的信中似乎要求解散迈阿密委员会，而代之以一个由无党无派人士组成的全国委员会：将劝使“军方、银行、大保险业者、糖厂所有主”都来支持这样一个团体。^①列雷纳认为这办不到，因此，他在11月26日写给阿特的一封信中指出，必须由中央委员会来决定他们是否要同委员会决裂。最后，在12月14日，在起义军于贝吉塔斯以二百人的一支兵力打败了巴蒂斯塔一支三百人的队伍并使其伤亡一百七十人之后，卡斯特罗给解放

^① 所有这一切都取材于列雷纳的《手稿》。究竟由谁组成指导委员会，始终不清楚，但这时似乎是阿特，福斯蒂诺·佩雷斯和卡斯特罗。

委员会写了一封长达四千字的信，谴责说：

那些正在同一支在数量上和武器方面无比强大的军队进行战斗的人们，除了我们所凭以为我们真诚热爱的事业而战斗的尊严之外，整整一年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又被拥有充分供应的而一直系统地……不给我们任何帮助的同胞所遗忘，对那些人来说，迈阿密公约是一种粗暴的行为。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并没有授权任何人签字。普里奥既经拒绝给他们武器，现在他们怎么能够同这些人坐在一个会议桌旁？

卡斯特罗批评了迈阿密公约一点也不对外国干涉作出任何声明——“这是一种严重缺乏爱国主义和自我暴露的懦弱行为的明证”。^①他还谴责不对军队作出任何考虑：“让我们没有任何军事委员会……让人民统治……让士兵回到兵营里去。”虽然应该有“完全的宪法标准”，将来的总统“在自由任命人员的权力方面不应受到限制”。^②当然，古巴人将不得不对“加勒比海的其他独裁者”进行斗争。“新政府应根据1940年宪法进行统治，应保证宪法中所承认的一切权利，不受一切政治党派性的拘束……”，政党“在过渡期间（应只有一种权利）——在我们宪法的自由结构内，有组织和参加普选的自由”。最后，临时总统不应是帕索斯或任何在迈阿密的人——而应是乌鲁蒂亚法官，他曾经认为“格拉玛号”远征队在试图以武力推翻

① 马埃斯特腊山宣言包括有这一点。

② 也许正是这一句话使美国国务院古巴科科长威兰灵机一动，认为这勾勒出了一幅“相当令人发指的独裁制的画面”。（见威兰书，第579页。）

巴蒂斯塔时，其所作所为都是合乎宪法的。这倒是一个聪明的动议：乌鲁蒂亚担任法官已达三十一年，政治上是一个温和派。卡斯特罗之所以提他，并不是把他当作一个强有力的人，而是故意把他看作一个平庸的人，一个可以不使任何更加危险的候选人（即如帕索斯）得以取而代之的人。^① 乌鲁蒂亚当时仍在古巴，经过和马里奥·列雷纳通信讨论之后，阿曼多·阿特和路易斯·布赫代表了卡斯特罗同他进行接触（只在11月26日接触过一次），因为当时他的政治活动还不为人所知，所以他能够相当方便地往来于美国和古巴之间。阿特和布赫问乌鲁蒂亚是否愿意参加一个五人的古巴流亡政府。乌鲁蒂亚同意参加，但要求给以“宽限，以便设法取得司法官的退休金”。他在12月23日到达迈阿密。这时，他没有时间来全神贯注于流亡者的种种阴谋活动。大约在圣诞节前后，路易斯·布赫和劳尔·奇瓦斯拿了阿曼多·阿特的一封信，向乌鲁蒂亚明确提出，要他担任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总统候选人。（阿特本人事实上已在致迈阿密的列雷纳的一封信中说过，他其实是宁可让卡斯特罗本人担任临时总统的。）

阿特的信照例是措辞冠冕堂皇的（“命运为我保留了写这封信的荣幸”）。他说，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是“一个青

^① 其他几个候选人是古巴医学协会的赫拉西奥·佩雷斯，加西亚·巴尔塞纳和卡里略。乌鲁蒂亚，当时五十六岁，生于亚瓜哈伊（拉斯维利亚斯），1923年大学毕业，1928年任希瓜尼的法官。他作为马坦萨斯的一个法官，曾在1933年救过被马查多的警察追捕的两个人的性命，以致他自己不得不躲在哈瓦那。他的父亲是古巴独立战争中的一个少校。（《革命报》，1958年1月4日。）

年运动，它正在为争取忠于暴动者传统这种唯一光荣而牺牲一切”。迈阿密方面存在着的种种困难，即古巴历史上那个一直存在的问题，仍然“不适宜”于建立一个流亡政府。虽然如此，乌鲁蒂亚将依然是“人民的候选人”。七月二十六日运动认为它可以撇开其余的反对派而单独行动：“我们单独开始，我们也许不得不单独继续干下去，因为我们必须完成这个圣战，使得古巴在历史上极有可能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而存在。”阿特又说：

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是空前激动人心的，对于一些政治上分崩离析、社会上不成熟、而经济上又穷困的小国来说，如果这个过程不能获得成功，也许现在正在争夺世界的某一个帝国主义就会把我们完全吞并，把古巴应占有解放者所梦寐以求的那个地位的一切希望都消灭殆尽。^①

乌鲁蒂亚在得意之余，认为他的接受将有助于整个反对派的联合一致。他并不重视各旧政党会要其他的候选人。另一方面，也难以相信他会认真看待阿特那封信：因为如果信中所提条件完全实现了，就意味着要同美国发生冲突，而这显然是他所反对的。但不久就变得十分明白了，用马里奥·列雷纳在1月初写给马塞洛·费尔南德斯的一封信中的话来说，这位新选定的总统乃是一个“闻所未闻的天真”人物。^②

^① 这封信见曼努埃尔·乌鲁蒂亚·列奥：《菲德尔·卡斯特罗有限责任公司》（纽约，1964年），第8—10页。译本略有修改。

^② 列雷纳致费尔南德斯信，1958年1月6日，《列雷纳手稿》。

这些新情况具有害多利少的后果。卡斯特罗(他12月14日的信在12月30日前后到达迈阿密)提出七月二十六日运动退出解放委员会。佩拉约·奎尔沃的儿子奥尔兰多辞去了迈阿密七月二十六日小组的主席职务,表示对帕索斯的信任。人民党人比斯维和阿格拉蒙特也退出了。委员会垮台了。改组了的大学生指导委员会恳请卡斯特罗重新考虑一下。普里奥也这样恳请。巴罗纳说,他这一派愿意接受乌鲁蒂亚为临时总统,但是他们不能同意在过渡期间让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统率军队并负责治安。这会意味着继续进行军事统治。卡斯特的答复只是说,他的办法是要“摧毁暴政”;他说,普里奥现在在古巴是无足轻重的。帕索斯等人脱离了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乔蒙谴责卡斯特罗并准备组织他的进袭古巴的力量,但是这样的摊牌反而增加了而不是结束反对派的分崩离析;整个美国和中美洲各地无数的团体和领袖都各自声称是代表“菲德尔”的。^①

卡斯特罗已经号召破坏1958年的甘蔗收成了:“有巴蒂斯塔就没有甘蔗收成,有甘蔗收成就没有巴蒂斯塔”;“在暴君进入坟墓之后……我们就有甘蔗收成的自由。”已给甘蔗工人散发了一份单页宣传品,指示他们放火烧甘蔗,其中还建议把一块火油浸透的海绵绑在老鼠身上。巴蒂斯塔以批准12月份开始榨甘蔗来对抗这个计

^① 这样,在纽约就有分别由前“格拉玛号”一个叫做巴勃罗·迪亚斯的黑人以及安赫尔·佩雷斯·比达尔和阿纳尔多·巴龙领导的三个团体。在迈阿密,莱斯特·罗德里格斯,马里奥·列雷纳和豪尔赫·索图斯等争取菲德尔的好感比他的代表尤为热切。

划。派出了更多的部队赶赴甘蔗田。放火事件不一而足。准许部队对一切嫌疑分子开枪。穆哈尔号召工人“放哨，严防火炬”。

在 11 月和 12 月期间，逮捕、处决和炸弹，日有所闻。最为轰动的事件是奥尔金区的司令、人所痛恨的费尔明·科莱上校在一个磁器店遇刺。他应对上年 12 月杀害许多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人负责。上校之死不出所料地在两个星期之后就有六个无辜的人遇害，作为报复。12 月 16 日，革命党的参议员孔拉多·罗德里格斯写信给参议院议长戈多伊，抗议为试图搞垮反对派而造成五百名古巴人死于非命；卡斯特罗在山区代表三千个死于非命的人号召进行更多的暗杀，就象暗杀科莱那样。不安的情绪终于渐渐地蔓延到劳工中。一个穆哈尔分子的码头工人领袖纳贝亚·阿兰巴里据说因为反共，被人暗杀。这年冬季，仍然担任工会总书记的穆哈尔，越来越倾向于把工人运动和现政权公开地视为一体，这就不足为奇了。劳动部长宣告，有计划的旷工将被视为“反政府行为”。穆哈尔扬言“只要我活着一天，就一天不会有总罢工”，试图压制反对党派进行一次总罢工的威胁。他这样鼓吹说，工会工人已经从提高最低工资中得到了好处；干吗还要罢工呢？诚然，尽管发生暗杀和流血事件，1957 年还是一个打破纪录的年份。得自蔗糖的总收入是六亿八千万美元，比 1956 年多了二亿美元，也比 1952 年以来所取得的任何总数高。1957 年新投放的外国资本共为二亿美元。圣诞节的奖金为数甚多。金钱在岛上遍地流。职业帮会分子涌集在哈瓦那一些新开的旅馆里。帮会分子安

纳斯塔西亚在芝加哥的遇害是同他打算夺取梅耶尔·兰斯基在哈瓦那经营的赌场有关的。很难把盗匪行径和革命热忱区别开来；所以12月间，当美国大使厄尔·史密斯通过美国驻特鲁希略城的大使馆得到消息说，“参加卡斯特罗革命的共产党员正在阴谋行刺我”的时候，究竟是共产党员（至当时为止他们对暴力行动一直没有什么兴趣）还是革命党人是这类事情的真正根源就弄不清楚了。史密斯本人现在对现政权不再抱怀疑态度了；12月，当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肯尼迪参议员在大使馆欢度圣诞节时，巴蒂斯塔同肯尼迪夫妇共进过餐。

卡斯特罗的兵力仍然为访问者尤其是为美国人所夸大。3月间上过山的查尔斯·瑞安，在10月下山时带来消息说，那里有一千人；《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个记者唐纳德·霍根则说有二千人，其中半数装备齐全。这些数字没有一项是真实的。当年年底，卡斯特罗所拥有的武装人员仍然不到三百人。

第十四章

禁运武器

这时，卡斯特罗已在山中呆了十二个多月。他不再是一个被追捕的逃犯，而是统率着一支游击部队，可以在奥连特省的中央公路以南和以西的几乎整个地区——差不多有二千平方哩的面积——随意活动。在这个区域内，在取得友好农民默许的基础上，已经组成了一个维修和供应的精心结构的系统。许多商货从曼萨尼略、巴亚莫和其他地方用骡子运上了山。在马埃斯特腊山的心脏地带，这时还有了一些苦心经营的工厂：在制靴厂和枪炮修理厂之外，还增加了一个小型的雪茄烟工厂，加上一个屠宰厂、一个炸弹工厂和几所医院。但是，武器依然极其缺乏——除开攻打总统府失败后的大量武器之外，能够运到的只是寥寥可数的几批。在边缘地区，袭击继续不断，特别是在曼萨尼略附近，农场机器被毁，稻田和甘蔗田被焚烧。在卡马圭以西，用了私人飞机在甘蔗田里投洒磷粉。

在马埃斯特腊山本身，革命军越来越专心致志于不妨看作是它的发展的第二阶段的部署——即部队本身和农民间的纪律问题。很多农民，正如格瓦拉后来所解释的那样，^①不是疑虑满腹，就是担忧害怕，有时还抱着玩

^① 参见格瓦拉：《革命战争随笔》，第171页及以下。

世不恭的机会主义态度。格瓦拉评论说：“对于那些利用全国所存在的暴力局面而从中渔利的反社会的人执行死刑的事，不幸在马埃斯特腊山中也并不是罕见的。”^①小事故不计其数，有的造成了不必要的死亡，例如拉洛·萨迪尼亚斯上尉错误地打死了一个不服从的农民。^②很多土匪接管了所谓解放区的若干地段。枪决背叛的农民、土匪或大麻走私犯（例如华籍土匪张某之类）是常见的事，理由很简单，起义军没有监狱。^③

在大城市中，尽管有很多人被捕，破坏行为依然有增无减。工程师拉伊从工程师奥尔图斯基手里接过了哈瓦那公民抵抗运动的领导权。逮捕终于越来越使得被捕者从此不见踪迹了——例如，在瓜纳哈伊，根据佩雷斯·潘托哈少校的命令，^④1月6日，路易斯·恩里克·阿尔瓦雷斯因受严刑致死。有的被绑上沉重的东西投进海里——仿照马查多的办法。1月间，埃索煤气储藏站被炸毁，损坏了哈瓦那的自来水总水管。还攻打了一个建筑公司，二百八十磅炸药连同十八个电雷管一并失踪。1月15日，哥伦比亚兵营发布的一项军事公报说，在洛斯翁布里托斯的一次“遭遇战”中，有二十八个起义军被击毙；事实上，这些人是从博尼亚托监狱里拉出来枪决的囚

① 格瓦拉：《革命战争随笔》，第152页。

② 同上，第154页。拉洛·萨迪尼亚斯经过了多数票的审讯：七十票赞成将他处死。七十六票赞成不同的处罚。一百四十六名游击队员参加了这次投票。后来，有几个在这次投票中失败的人退出了。

③ 一个革命党的律师，温贝托·索里·马林在平原上争论之后来到山区，参加这些判决。他后来担任农业部长，同卡斯特罗争吵后逃往美国，又作为一个谋叛者而回国。于1961年4月被枪决。

④ 佩雷斯·潘托哈本人在巴蒂斯塔失败后被枪决。

犯。侥幸脱逃的两个人是哈瓦那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杰出人士，哈维尔·帕索斯和阿曼多·阿特(二次被捕)，一同逃出的还有圣地亚哥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情报负责人安东尼奥·布赫。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布赫家族——路易斯·布赫是圣地亚哥公民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不是向古巴的什么机构抗议，而是向《纽约时报》抗议；认为那家报纸如果提出抗议，原是可以有助于防止可能的死亡的。但是，警察方面接连不断的暴行并没有限制了破坏者的活动；实则，适得其反，反而刺激了报复的意愿，激起了越来越多的青年男女渴望在现实生活中重新出现电影院中那种惊险的场面。“革命”的而不是“起义”的概念集结了越来越多的朋友。

当然，渴望结束这种越来越尖锐的政治危机的，也大有人在，尤其是美国的实业界和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一般移民团体。其中突出的是厄尔·史密斯。他同教廷使节森托斯阁下以及诸如三十年代当过大使和当过ABC党的司库的吉列尔莫·贝尔特或前驻美大使路易斯·马查多这些“中立”人士举行了令人苦恼的会议。但是这些守中立的绅士都同革命力量毫无接触。例如马查多是巴拉德罗海滩的百万富翁艾琳尼·杜邦的法律顾问。这些人都会指出，不管政治局势如何，经济局势却是再好也没有了。他们都说得对。所以史密斯对于威兰在1月初的一份国务院文件中所写的那段提到古巴已陷于破产之中的经济描述，深感出乎意料之外。威兰还建议美国应对巴蒂斯塔政府施加压力，加速其最后垮台。大使馆的政治组组长托平帮同威兰拟具了一份载有同样情报的大

使馆备忘录。史密斯怒气冲冲地前往华盛顿，由于助理国务卿鲁博特姆显然不愿会见这位大使，不顾一切地硬说国务院没有这笔旅费的开支，他只好自付旅费。

史密斯一到华盛顿，就说如果美国不顾巴蒂斯塔将美援装备错误地使用于西恩富戈斯，仍然保证将他所订购的二十辆装甲车如期交货，那么，巴蒂斯塔将会在古巴恢复宪法保证。这项安排原是应该保密的，但是，因为这时卡斯特罗已在古巴驻华盛顿大使馆里安插了一个特务（助理武官萨维德拉），所以消息立即以理所当然地更加精心撰写的词句送达马埃斯特腊山。于是卡斯特罗便对《纽约时报》的记者霍默·比加特说，巴蒂斯塔已答应恢复公民自由，以换取美国对在该国境内的古巴革命团体采取行动。^①虽然普里奥确实因计划从迈阿密输送武器到古巴而再度被控告于联邦陪审团，但卡斯特罗的情报员却对上项消息断章取义。不过，他确实得到另一种事态发展的确切消息：厄尔·史密斯在华盛顿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在招待会上说，他不认为“美国政府”有一天能够“同菲德尔·卡斯特罗有什么生意往来”，因为他认为卡斯特罗既不尊重国际义务，也不维持法律和秩序。这种说法自然也公布出来了。

作出这类判断的并不只是史密斯一人。1月间，被塔维尼利亚解职的巴蒂斯塔的最能干的将领之一，加西亚·图尼翁将军到华盛顿访问威兰，试图说服国务院相

^① 《纽约时报》，1958年2月25日。1月9日卡斯特罗指派马里奥·列雷纳和劳尔·奇瓦斯分别担任流亡的古巴委员会的主席和司库，卡斯特罗认为这个委员会是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在美国的唯一代表。

信取代巴蒂斯塔的最好办法是设置一个由各种官员组成的军政府,包括他本人、巴尔金以及巴蒂斯塔的官员中象坎蒂略这样一些比较明智、比较宽厚的人。但是威兰一时大意,竟向一个新闻记者透露了,这些话后来使他经常感到不安:

我知道很多人把巴蒂斯塔看作是狗崽子……但首先从美国的利益说来……他至少是我们的一个狗崽子,①他不是在同共产党玩球……另一方面,菲德尔·卡斯特罗却是被共产党包围住了。我不知道他本人是不是共产党……(但是)我相信他是受共产党影响的。②

不久之后,威兰本人的解释是:

我们的问题……是想要看到古巴的政争有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以便保证获得一个民主的过渡,获得古巴……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从而能够消除来自当时卡斯特罗部队所发动的任何暴力的大威胁……当时卡斯特罗还是东方的一个小人物……我们并不想把一种政府形式强加于人……③

巴蒂斯塔本人依然墨守着他的老方案不变——夏季举行选举,他自己不担任候选人。但是他确曾说过,他以后可以担任陆军参谋长。因此,有理由可以认为,安德列斯·里维罗·阿圭罗(将是执政党的候选人)的担任总

① 这个词句自然是学罗斯福谈到特鲁希略时所用的词句。

② 《威兰证词》,第1—4页。

③ 《威兰证词》,第540—546页。

统将只不过是巴蒂斯塔时代的延长的一种掩护，是三十年代的傀儡总统时代的再现罢了。2月间，联合专业协会指责筹备选举的工作中出现了“古巴历史上最可耻的欺诈行为”，极力主张在古巴处于内战期间，不应举行选举。这些指责成为帕尔多·利亚达——“根本不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候选人”——退出竞选的机会，而参加竞选的只剩下反对党的格劳和马克斯·斯特林两人了。

接着卡斯特罗通过曼萨尼略的自由党众议员曼努埃尔·德赫苏斯·莱昂·拉米雷斯提出了一个奇妙的建议。如果巴蒂斯塔将所有部队撤出奥连特省，卡斯特罗保证同意在美洲国家组织监督下举行选举。他还对霍默说，他毕竟不坚持由乌鲁蒂亚当总统。这对于乌鲁蒂亚说来倒是一件新闻，他(间接)得知由他作候选人的这个建议，只有“在革命胜利的情况下”才会有效，^①巴蒂斯塔把卡斯特的建议看作是软弱的表示，所以加以拒绝。因此七月二十六日运动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分裂；劳尔·奇瓦斯说，卡斯特的声明一定是被误解了，因为“在巴蒂斯塔主持选举之下，(不可能获得)任何政治解决”。^②卡斯特罗本人在3月9日写给乌鲁蒂亚的一封信中重申了对他的支持。但是，对待“选举”的这种谨慎的态度，无疑是取得妥协的一个可能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却被政府拒绝了。

之后，各方立即重新活动起来，各种新的游击队伍出

^① 乌鲁蒂亚书，第12—18页；恩里克·梅内塞斯：《菲德尔·卡斯特罗执政七年》(马德里，1966年)，第64页。

^② 《公告》周刊，1958年3月5日。

现于奥连特省北部，在那个地区建立永久性的第二支游击部队的计划已经制定。1958年2月16日，卡斯特罗摧毁了阿瓜松林一支小小的驻防军，击毙十人，俘虏军官一人。格瓦拉把这次交战说成是标志着游击队“长期以来巩固后方”的结束。在那个日期以后，山区的老百姓开始认清，卡斯特罗和他手下的人要在那儿呆下去了，因此，同巴蒂斯塔的军队一道工作，终究得不到任何好处。各省都传来杀人和破坏活动的报道，在若干城镇外面都可以看到悬挂着的尸体。三个大学生联合会（哈瓦那、圣地亚哥和拉斯维利亚斯）的主席一致声明，没有和平，学生决不复课。铁路怠工已经达到高峰，东古巴的行车时刻表天天变更，每一列车都要由军队押送。港口、货栈、商店和学校都有火警。在哈瓦那，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洗劫了中央票据交换银行，毁掉了价值一千六百万美元的支票。2月23日，阿根廷的汽车竞赛者凡希奥在旅馆中被绑架，作为宣传，以阻止他参加第二天的比赛。他后来被送回。在比赛中，有一辆车子刹不住车，直冲进人群，撞死六人，伤五十人。政府指控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在跑道上泼油；这项罪名被否决了，但是事情始终没有得到圆满解决。绑票者的头头奥斯卡·卢塞罗后来被捕，经过严刑拷问后被杀。

在这期间，由指导委员会的人所组成的一支游击战士新远征队在古巴北海岸努埃维塔斯附近的圣丽塔滩登陆后，向西南缓缓推进，深入埃斯坎布拉伊山；对他们来说，在攻打总统府的一周年纪念日以前登陆，是一个“荣誉问题”。1月31日，十五名男子和一名妇女从迈阿密

启程,于2月8日夜十时三十分到达,^①象卡斯特罗一样志在实现乔蒙所谓的“为我国获得一个光辉灿烂的早晨”。他们也象卡斯特罗一样用了一艘美国所有的船,“索尔第二号”,这艘船是属于迈阿密的奥尔顿·斯威廷的。2月13日,他们到达马埃斯特腊山。(自从1957年中期以来,就有很多不同政治关系的反巴蒂斯塔分子在这些山里——例如拉斐尔·洛佩斯·卡德纳斯。)指导委员会随身带有五十支意大利卡宾枪、两挺英国斯坦式机关枪、一支汤姆生式冲锋枪、两支斯普林希德式、一支加伦式半自动步枪、两支M3s和一支M1,连同五支带瞄准镜的雷明顿半自动步枪。参加的还有几名当地的成员,包括拉斯维利亚斯的秘书拉蒙·潘多在内。到了2月17日,在埃斯坎布拉伊山的第二战线已经有起义军二十九人,计分三队;他们曾经袭击巴脑的卡卡普亚尔地方一个军事哨站,击毙了三个人。^②但是,2月19日,他们的前卫遇到了十个兵士,被击溃了。潘多、埃德尔米拉和他们的向导被俘后遵照圣斯皮里图斯警察局长米拉瓦尔上尉的命令被残杀。在迪亚纳山坡作了进一步的散兵战后,他们终于向库瓦纳坎那个印第安老城的城址移动,他们在那里在老鼠的包围下停留了几天。2月24日,他

① 计有:阿尔维托·莫拉(在攻打总统府时牺牲的议员梅内劳·莫拉的儿子),爱德华多·加西亚·拉文德罗,卡洛斯·蒙铁尔,胡利奥·加西亚,福雷·乔蒙,阿尔维托·布兰科,劳尔·迪亚斯·阿圭列斯,罗兰多·库维拉,安东尼奥·卡斯特尔,恩里克·罗德里格斯·洛埃切斯,卡洛斯·菲格雷多,吉列尔莫·希门尼斯,加西亚·奥利维拉,路易斯·布兰科,拉蒙·潘多(他是在他们到达后参加的),古斯塔沃·马丁和埃斯特尔·马丁。恩里克·罗德里格斯·洛埃切斯:《前往埃斯坎布拉伊山》,第50页。

们发表了一项新宣言,申述了他们的目的:

我们不愿意作……许假愿的人……我们正在战斗,以根除我国青年受不到教育、成年人找不到工作这种观念……我们不仅要重新建立……为独裁制所忽视的社会保证。鉴于我国具有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一定保证每一个古巴人有工可作……这项宣言虽是特别针对古巴而言,我们也

② 这三队是:

甲 队	乙 队	前 卫 队
库维拉	拉文德罗	拉蒙·潘多
达里奥·佩德	乔蒙	威利·摩根
罗素		(美国人)
巴勃罗·马钦	路易斯·布兰	阿托拉
“卡德纳斯”	科	
	阿曼多·弗莱	拉米罗·卡马
	特斯	胡安尼
罗德里格斯·	埃洛伊·古铁	埃德尔米拉
洛埃切斯	雷斯·梅诺	福斯蒂诺(向
	伊	导)
卡洛斯·非格	(3月13日袭	
雷多	击的头头的	
	兄弟)	
胡利奥·加西	伊凡·罗德里	
亚·克利雷	格斯	
拉		
加上另七个人	奥斯卡·鲁伊	
	斯	

在这批青年中,库维拉和古铁雷斯·梅诺约后因试图谋杀卡斯特罗而被监禁。弗莱特斯于1961年初逃往美国。1961年,威利·摩根因反革命活动被枪决。潘多、埃德尔米拉和福斯蒂诺都在到达后不到一个月被枪杀。另一方面,乔蒙自1960年以来一直担任古巴的一个部长;马钦是少校,负责一个工厂;罗德里格斯·洛埃切斯是一位大使。卡洛斯·非格雷多和胡利奥·加西亚两人都在卡斯特罗手下的内政部工作。

要把它推广到美洲大陆。指导委员会……主张建立一个美洲共和国联邦，如同米兰达和博利瓦尔所要求的那样……①

但是天哪，事情演变得很糟，两派分开来了，乔蒙和他那一组暂时去哈瓦那了。古铁雷斯·梅诺约在埃斯卡布拉伊山以很少的几个人艰苦地支撑下去，等乔蒙回来之后，他自己就单独另立一个指挥部。

卡斯特罗当时的行动已不是那么充满戏剧性了。1月间，他对再度上山的安德鲁·圣乔治说：“我个人已开始觉得，国有化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累赘的工具。看上去它不会使国家更强，而倒会削弱私人企业……在这里，外国投资将永远受到欢迎。”②对自愿担任美国军事情报员的圣乔治讲这番话倒是合适的。2月21日，卡斯特罗在山中发布了他的第一道行政命令，把一个刑事管辖权的方案适用于他当时所控制的解放区。此后他便俨然成为奥连特省部分地区的事实上的统治者了。他早已有了一家报纸，《自由古巴人》，起先由两个游击队战士经营，后来由人民党人路易斯·奥兰多·罗格里德斯经营，再后来又由卡洛斯·弗朗基经营。2月24日，一座无线电广播电台开始从山间广播：这是从古巴解放区马埃斯特腊山广播的起义军电台！③

① 罗德里格斯书，第72—82页。

② 同一个革命者的会见，《王冠》杂志，1958年2月。

③ 胡莱斯·杜波依斯书，第212页。它的新闻公报是卡洛斯·弗朗基写的，这个机构其他一些人里有里卡多·马丁内斯，奥雷斯特斯·巴莱拉，比奥莱塔·卡萨尔斯和豪尔赫·门多萨（雷内·拉伊·里维罗书，第60页）。

也是在这个时候，小心翼翼的古巴共产党似乎也终于决定支持在城市和乡村进行“武装斗争”这个意见了——也就是说，要支持以前被他们谴责为搞政变的那种事业了。^①党的领导似乎在2月间已经通过了一项支持卡斯特罗的决议。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几个成员（如普拉特斯^②和里瓦尔塔）在1957年就已经到了山区。至少有一个共产党员，叫做孔拉多的农民，从1957年开始就同格瓦拉有了接触。从格瓦拉的文章中也可以清楚看出，他在1958年初就同共产党有了接触，因为他告诉我们他如何责备一个地方党的领导人。“你所能建立的队伍，虽能不惜在土牢中默默无闻地牺牲……却不能攻取一个机关枪阵地。”^③党中央的一个成员奥斯瓦尔多·桑切斯·卡夫雷拉，曾经作为一个中间人去访问过卡斯特罗的总部。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后来谈到在1958年2月“公开”指示共产党员去参加卡斯特罗方面。但是到那时为止还没有明确的联盟，只是一般联系而已；甚至在以党为一方，以公民抵抗运动和哈瓦那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为另一方之间，也缺乏这种联系。

实则，要不是共产党本身开始首当巴蒂斯塔警察的

① 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基础》月刊，1959年8月；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今日报》，1959年4月15日第3页。肯定是经过争论后才作出决定的。后来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说，在1957年8月，弗兰克·派斯在圣地亚哥被害后，他曾经在哈瓦那亲自同作为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代表的艾德·桑塔马里亚有过接触。参见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古巴革命与过渡时期》（两卷本，哈瓦那打字稿，1966年）。

②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全国组织者。

③ 前引格瓦拉书，第178页。

攻击之冲，他们也未必会作出这项决定。内战的发展和把起义军视同共产党的这种宣传上的需要，使得现政权越来越不得不对知名的共产党员加以打击——纵使不打击全国性的领导人，至少也要打击地方斗士。这样，在拉斯维利亚斯以北的亚瓜哈伊的警察就开始滥捉乱捕各种共产党员了。在那个地区——三个制糖厂（纳尔西萨厂、维多利亚厂和内拉厂）的中心——有二十多个党员的房屋被焚。该省其他地方出现了警察虐待事件。但是，最无法无天的实例是在亚瓜哈伊，主要是因为共产党在工会运动——他们声称在纳尔西萨制糖厂占工人的百分之三十一——和在组成了抗拒夺地同盟的小农场主中势力特别强大。结果是警察把当地共产党员硬逼成半起义状态，而产生了一个游击小组。指派了哈瓦那一个共产党员费利克斯·托雷斯作为司令。另一个游击小组，指导委员会的派生物，拒绝共产党员参加，但是不到两、三个月工夫，托雷斯就领导他自己的一支由五十人组成的共产党游击部队，称为马克西莫·戈麦斯纵队。

在共产党开始转向革命事业的同时，另一个机构从甚至更加处于沉闷的冬眠状态中惊醒了：2月底，教会决定在古巴的政治危机中插上一手。这是出自下面的压力的，例如，比利亚努埃瓦大学的四个青年天主教徒在前往参加起义军的途中被警察杀害。2月10日，哈瓦那圣灵教堂的安赫尔·加斯特鲁神甫在讲道时曾严厉谴责现政权。天主教行动组织发表了一项类似的声明，天主教《双周刊》也开始谴责现政权。巴蒂斯塔的保守派政敌原曾一度希望教会能加以领导。天主教的重要报纸《海洋

日报》的确把政治危机归因于上层阶级的腐朽和天主教道德的堕落。3月1日，以红衣主教阿特亚加和教皇使节森托斯阁下为首的一批古巴主教号召政府通过成立民族团结政府以实现和平，号召革命者放弃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建议成立一个“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应包括自1911年以来任众议员并于格劳总统任内和在1933年任副总统的一位贵族劳尔·德卡德纳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副总统和外交部长、这时担任巴蒂斯塔夫人的妇科医生的古斯塔沃·奎尔沃·鲁维奥；银行行长维克托·佩德罗索；和黑人教士帕斯托·冈萨雷斯神甫等人。

政府设法不让哈瓦那报纸发表这项不受欢迎的计划，但是，不久就透露出来。有一些主教，包括圣地亚哥的佩雷斯·塞兰特斯（他曾经鼓励这项计划）在内，都要发出更加强硬的号召，包括要求巴蒂斯塔辞职；另外像卡马圭和西恩富戈斯一些主教，却反对这个主张，因此，实际上，这是一个象佩雷斯·塞兰特斯这类人也不真正同意的折衷性文件。

但是，它的效果却是立竿见影的：3月3日，巴蒂斯塔的外交部长格尔博士对厄尔·史密斯说，他的主子将乐于邀请美洲国家组织、联合国和世界的报刊来参观古巴选举。巴蒂斯塔还着手筹备一个新内阁，选定驻联合国大使埃米略·努涅斯·波图翁多博士^①任首揆——这

^① 埃米略·努涅斯·波图翁多（生于1898年），革命将领努涅斯的儿子；铁路的律师兼顾问；众议员和参议员。他是1948年任总统候选人的那位医生里卡多·努涅斯·波图翁多的兄弟。

显然是打算讨好美国的一着，因为波图翁多向来在美国是很知名、很得人望的。巴蒂斯塔宣称，他将高兴会见教会的协调团体。这倒是很合时宜的，因为美国政府在供应巴蒂斯塔武器的问题上意见渐渐坚定起来了。古巴人使用美援装备对付起义军的问题已经在3月5日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提了出来，鲁博特姆则两面讨好。大使馆事实上虽向巴蒂斯塔提出抗议，但是，没有接到迅速的答复。3月6日，事情已经明摆着，努涅斯只有在联合国监督选举的条件下，才会接受总理职务。同一天，十三名法官对这个暴力政权提出一项全面抗议，使内定的总理看到现政权所面临困难的程度。因而他到头来组不成阁，于是，3月12日，原外交部长格尔博士接掌了一个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的政府。3月9日，卡斯特罗虽则明知主教的好意，却声称他决不接受教会的协调委员会，因为它太偏袒巴蒂斯塔——对奎尔沃和佩德罗索作了公允的评论，但对冈萨雷斯神甫和卡德纳斯却不是这样。卡斯特罗这时正在召集那个于3月7日至10日举行的所谓“马埃斯特腊山区全国指导委员会再团结”会议，讨论关于同现政权进行妥协这个2月下旬以来不断流传的谣言。全国指导委员会向其全国各省代表指出，这——反映在《纽约时报》所载霍默·比加特的会见记中——纯粹是一种“耍弄策略的手法”。^①

巴蒂斯塔这时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有增无已。3月11

^① 《组织通报》(古巴的圣地亚哥,1958年3月18日)补充说,卡斯特罗和全国指导委员会都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但是劳尔·卡斯特罗于3月10日带同他的队伍,从马埃斯特腊山起程前往奥连特省北部。

日，哈瓦那一个敢作敢为的司法官阿拉包·特雷列斯同意为四个青年的遇害对警方的本图拉上校和海军情报局局长劳伦特提起公诉。一次严重的危机无可避免了。3月12日，巴蒂斯塔再度暂停公权，并又对报纸和广播电台实行检查。公诉被司法部长取消了，阿拉包逃往美国。于是万人痛恨的皮拉尔·加西亚上校接任警察局局长。暴戾加剧的情况，到处都是显而易见的。这时有七万五千名中学生罢课。所有的学校都关闭了。唯一选举派的人民党人马克斯·斯特林，偕同鼓励兴建哈瓦那-希尔顿旅馆的律师马里奥·拉索，访问了厄尔·史密斯大使；两人一致认为，事实上只有把大选推迟到11月，把新总统就职推迟到1959年2月；在马克斯·斯特林同意“卡斯特罗会比巴蒂斯塔坏十倍”这个说法时，他证实了史密斯本人具有这个看法。^①

卡斯特罗拒绝了主教们的计划之后，他在山区发表了一项新宣言；^②其中提到了那种古代的大棒，“以军事行动为后盾的革命总罢工”。哈瓦那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事实上正在准备这种行动。卡斯特罗重申（对美国的警告），如果竟由军政府接替巴蒂斯塔的话，罢工和战争将会持续下去。接着便提出一些颇为自负的要求：在奥连

① 史密斯：《第四层楼》，第81页。拉索同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一贯有密切联系，参见莱曼·柯克帕特里奇：《真正的中央情报局》，第179页。

② 由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全国指导委员会根据3月30日马尔塞洛·费尔南德斯写给马里奥·列雷纳的一封信起草的，并由“武装部队总司令”卡斯特罗和“全国代表”福斯蒂诺·佩雷斯签字。出席者有继派斯担任圣地亚哥行政负责人的雷内·拉莫斯·拉图尔少校（见《绿橄榄树》周刊，1963年5月10日，卢松少校的文章）。

特省一切公路和铁路运输应一律停止。自4月1日起，凡向国家或省市当局缴纳的税款应一律暂停。如果缴纳，应宣布无效，并须向（以乌鲁蒂亚为首的）新临时政府重新缴纳。凡在4月5日以后留任政府行政部门负责职务的人，应判以叛国罪。凡在4月5日以后继续在部队中服役的官兵应一律遣散。今后凡参加过部队服役的人均应判罪。凡志愿在革命胜利后继续工作的法官，应先行辞职。整个国家应认为本身已处于反抗暴政的全面战争状态中。最后，“劳尔·卡斯特罗少校统率的起义军第六纵队……已进入奥连特省的北部（率同五十人）^①……举国上下，都已下定决心，不自由毋宁死。”^②这时，卡斯特罗本人所直接指挥的兵力，事实上只不过一百至一百二十人，他的兄弟和阿尔梅达所带的人不算在内——人数简直不比六个月以前多。他在平原上有多少支持者，是不清楚的，但相当明显的是，必远超过此数。这个组织是以古巴各地的小组审慎地建立起来的^③，每月分别给各个小组以指示。所以在3月间，据说行动委员会将在奥连特省发动全面战争，并将武装行动扩展到拉斯维利亚斯省和比那尔德里奥；据说工人委员会将组织工人战线作为“斗争的旗帜”；而负责与公民抵抗运动建立关系的抵抗小组首先必须环绕着司法人员采取行动，设法使他们按照3月12日声明的要求自行辞职。

① 《革命文献》，1961年，第46期，第12页。他的任务是阻扰运输，切断交通。阿尔梅达率领由三十五人组成的纵队已经东去。

② 译文见胡莱斯·杜波依斯书，第240页。

③ 小组计有：行动，财务，工人，宣传，抵抗和组织。

3月13日，巴蒂斯塔在库基内别墅接待厄尔·史密斯。巴蒂斯塔坐在众所周知的四周挂有许多林肯半身像的书房中，对这位大使说，他愿意接受教会的协调委员会的“一切合理的要求”；^①他愿意调查有关索萨·布兰科上尉等人的蛮横行为的种种说法；并且革命者如放下武器，他可对他们施行大赦，并接受一切有关选举的建议。他本人当于1959年2月24日下台，从此安享光荣的退隐生活，以遂初衷。第二天，古巴医学协会会长兼公民协调委员会（促进和平的公民团体中最可尊敬的一个）主席劳尔·德贝拉斯科向史密斯保证说，如果巴蒂斯塔把权力交给一个中立政府，选举是不成问题的；同巴蒂斯塔或他本人指定的继任人则无和平解决可言。仿佛是要证实这种观点似的，在最近内阁人事调动以前担任商务部长的劳尔·梅诺卡尔差点儿在3月13日遭到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暗杀：甚至在史密斯同贝拉斯科谈话时，华盛顿方面就象征性地作出了关于战争的最关键性的决定：美国暂停装运原应运往古巴并已存放在纽约码头上的一千九百五十支加伦枪。这实际上是美国对巴蒂斯塔的武器禁运；官方除了以一些火箭调换以前供应的残缺不全的项目以外，不再运送任何武器了。

再没有象卡斯特罗所采取的措施这样使巴蒂斯塔沮丧了。眼看他的老朋友在抛弃他。巴蒂斯塔向史密斯抱怨说，中立地位“对古巴的立宪政府（起了）不利的作用”。

^① 折衷方案发表后，马坦萨斯的缪勒主教曾访问过巴蒂斯塔，要求他辞职——一个毫无结果的呼吁。

禁运实际上是使“极端派”处于交战者的地位。史密斯在这个问题上是不需要人家说服的。他拚命反对这种禁运，甚至使巴蒂斯塔也毫不怀疑地认为，他相信卡斯特罗的运动是“有共产党渗透的”。穆哈尔随即派了一个密使来对史密斯说，如果美国正在改变对古巴的态度，他，穆哈尔倒希望知道，因为他也不见得会坚决支持巴蒂斯塔：工会是一个非党派性的组织。

在各方面的包围下，史密斯说，美国不能进行干涉，并且他无法预料他本国政府的行动。他要求国务院至少递交以前要求的二十辆装甲车；同一天（3月18日）他同在哈瓦那采访的《纽约时报》赫伯特·马修斯共进午餐，马修斯说即使大使要求举行选举，也等于是进行干涉。

在这期间，贝拉斯科的委员会，象其他一切反对党派一样，在美国这种行动的鼓励下，发出了新号召，要求巴蒂斯塔辞职，成立一个中立政府，宣告取消1952年以来对一切政党的定罪。米罗·卡多纳律师，据说就是这项文件的起草人，被迫躲藏起来，乔装为一个牧师。他从乌拉圭大使馆的避难所里给哈瓦那律师公会的理事写了一份报告说，既然巴蒂斯塔政权是不合法的，就不能要求选举。

这种一触即发的局势，意味着巴蒂斯塔除了照马克思·斯特林的主张，把选举从6月推迟到11月外，别无其他选择。为了保全面子，他还公开取消了从美国订购装甲车的订单。史密斯请求国务院在禁止一切武器装运之前，至少要让他向巴蒂斯塔建议，他只有在选举期间离开，由一个临时政府和军队监督选举。国务院又认为

史密斯的建议就等于是进行干涉而不予考虑。另一方面，仍然留在哈瓦那的马修斯，则象他以前的圣乔治等新闻记者一样，以歌颂英雄的字眼说卡斯特罗是“何塞·马蒂以来……古巴历史上最了不起的英雄人物。”^①卡斯特罗当时在宣传上之需要这种支持，几乎不亚于需要武器；而且这两件事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有那么多武器是来自美国的；是用那个国家一些好心人的捐款购买的。例如，在3月27日，美国水上警察在阿纳尔多·巴龙（纽约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一个分裂组织的头头）所有的游艇“埃尔奥里翁号”上查获了要运往古巴价值二万美元的武器和三十六个人。这项挫折由于一个叫做佩德罗·迪亚斯·兰斯的飞行员从哥斯达黎加空运大批补充武器的到达而得到了补偿，此人后来在1959年曾一度耸人听闻地成为古巴空军的首脑。委内瑞拉的新政府也赠给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乌鲁蒂亚五万美元，^②圣地亚哥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因袭击博尼亚托兵营而在宣传上得到了很大成功。^③

美国大使这时象1902年以来每逢古巴多事之秋那样，成为一个人吐露私衷、希望和忧虑的兼收并蓄者；工人领袖塞拉芬·罗穆亚尔多对大使说，他很怕被人看到同巴蒂斯塔在一起；天主教大学的校长在拉斯维利亚

① 马修斯书，第70页。

② 乌鲁蒂亚书，第17页。这位独裁者希门尼斯已于1月被推翻。

③ 这次袭击是当时圣地亚哥行动组组长贝拉米诺·卡斯蒂利亚领导的，卡斯蒂利亚是在革命后的古巴作出最大贡献的起义军的军官之一；他后来（1966年）担任了参谋长和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斯说,教会力主美国进行干涉,大概是主张占领。史密斯在哈瓦那的比尔特莫尔俱乐部对英国大使福德姆^①说,万一发生紧急情况,他们两人应该象连体双胞胎一样地共同行动。他无疑是希望安格鲁撒克逊人站在一起的。

^① 艾尔弗雷德·斯坦利·福德姆(生于1907年),同一个秘鲁女人结婚;先后毕业于伊顿学校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过去曾在美国领事馆,拉丁美洲、斯德哥尔摩和华沙等地工作过,后封爵士。

第十五章

4月9日的罢工

卡斯特罗公开宣称，即将号召总罢工，但是政府不知道将在什么时候罢工。看来还得视机会而定。按照计划是由哈瓦那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和公民抵抗运动号召罢工，但是，除了在他们势力强大的各种企业外，这个号召能否受到尊重，就要靠运气了。负责指挥和协调工作的是全国指导委员会的成员福斯蒂诺·佩雷斯，他是“格拉玛号”的幸存者，专在哈瓦那向卡斯特罗的支持者保证一切顺利。^①他当然没有得到大多数工会的支持，也没有得到在有组织的工人中确实拥有追随者的唯一的反对党——共产党的支持。共产党人原来准备参加罢工委员会，但是遭到了拒绝。^②可是，3月28日，卡斯特罗从山区寄信出来，建议一切反对党派，包括共产党人在内，一律参加；但是哈瓦那的罢工委员会认为，这种意见在这样晚的时刻已难于实现了。在山区的起义者和平原的起义者之间，早已

^① 卡斯特罗是否真正要搞这次罢工，不甚了然。据说(但无证据)，当时真正控制马埃斯特腊山以外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福斯蒂诺·佩雷斯曾就号召罢工一节对卡斯特罗施加过压力。

^② 全国、省、市各级罢工委员会均由六人组成——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协调员一人，代表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行动组长和宣传组长各一人，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工人战线组织的工人代表一人以及公民抵抗运动和学生的代表各一人。

疑虑重重,其中很多人把卡斯特罗看成是一个所谓“独裁者”,把他的追随者都看成是一些军阀。同时,罢工的组织完全交由七月二十六日行动委员会去负责,而与工人没有任何真正的接触。哈瓦那这个关键性地区的罢工委员会终于由下列人士组成:佩雷斯、曼努埃尔·拉伊(工程师)、戴维·萨尔瓦多(自1957年中期以来一直担任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工人组织的头头)、费尔南德斯·塞瓦略斯博士(古巴福音会的首脑)、卡洛斯·莱丘加(人民党的新闻记者)、埃拉迪奥·布兰科博士(一个时髦的医生)。这些人中,没有一个赞成同共产党人结成同盟,这与其说是基于理论上的原因,不如说是因为这样一种同盟会对抱有自由主义见解的人的事业造成损害,抱有自由主义见解的人与其说是把古巴共产党人看作是具有威胁性,毋宁说是鉴于他们过去同巴蒂斯塔的关系而把他们看作是绝对不可靠的。4月4日,乌鲁蒂亚和列雷纳(代表在流亡中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公开声明他们不同共产党人合作。

共产党人自己后来广泛地讨论了这次罢工,他们说:

如果是按照正确道路发展的话……靠山区的武装支持,罢工未始不可以使得暴政崩溃。总罢工遭到了各种因素(也就是公民抵抗运动)的破坏,纵使一切因素都是有利于它的……胜利……我们事前曾为这样一种前景作出计划。群众将会在暴政之下继续斗争到武装斗争的阶段……但是,我们长时期没有采取实际的步骤,来促进这些目的……这是我们的失败。

虽然如此，共产党人还是欢迎以罢工“作为一个步骤，来组织群众，从而摆脱过分依赖于虽则英勇但不起决定作用的游击战争、徒劳无益的爆炸和破坏行动”。^①但是，后来，卡斯特罗谴责由于“对客观情况的错误估计”而“过早”地发动了总罢工。^②

公民抵抗运动关于罢工的指示如下：

你们一接到罢工的命令，就立刻进行怠工，同你们的工人伙伴一起离开岗位……听从七月二十六日广播电台发布的指示。不要利用警察或工贼所驾驶的公共汽车。照旧营业的企业主将被视为独裁制的合作者。用废铜烂铁、垃圾箱，瓶瓶罐罐封锁街道；收集瓶装手榴弹；不自由，毋宁死。

福斯蒂诺·佩雷斯乘机公开声称：

目前的革命运动绝不是共产主义的……我们……有必要经常反复重申：我们的领袖（卡斯特罗）决不参加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将在最短期间内举行全国选举……我们将为我国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国内外投资创造一种信任和安全的氛围。^③

事实上，这次罢工与其说是一次停止劳动，不如说是

① 美国《工人日报》，1958年5月7日，引自罗伯特·希尔和莫里斯·蔡特林：《古巴：美国的悲剧》，修订版（1964年），第127页。

② 《革命文献》，1961年，第46期，第12页。

③ 胡莱斯·杜波依斯书，第249页。

一次城市暴动，而且也应该算是这样一种运动。它的领导人都是对卡斯特罗以及对他依靠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早已多少抱有怀疑的一些人。

巴蒂斯塔似乎颇有自信。他对一个叫作斯克利的新闻记者说，任何罢工，卡斯特罗都没有取得胜利的机会，他倒说得对。到了4月9日，尽管出现了很多纷乱的暴力行动，但是，大多数店铺都照旧开门，正如大多数工厂和港口照常劳动一样。古巴工人联合会和共产党都不理睬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号召，所以运输系统照常工作。几家电气公司遭到破坏，一些公共汽车被推翻，两家大商店遭到袭击，但是，没有触及哈瓦那的电力供应，虽则原来认为破坏电力供应是罢工开始的讯号。大约有二十名平民和三名警察被杀，但是也许另外有八十名革命者被枪决。哈瓦那谣传说，罢工是巴蒂斯塔为了破获反对派的根据地而引起的：很多在早上罢工的工人，下午又回去上工了，在圣地亚哥，同样进行了一次未遂的袭击。有三十人被杀害，很多是被马斯费雷尔斯的私人暗杀团杀害的，其余是被警察杀害的。这是一个流血的日子，而对于抗议的力量来说，却不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日子。

后来出现了互相指责：共产党人谴责福斯蒂诺·佩雷斯和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全国指导委员会的“单方面号召”。^①共产党最聪明的领导人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希望这次罢工失败能使卡斯特罗相信有必要把格劳

^① 西奥多·德雷珀：《卡斯特罗的革命：神话与现实》（伦敦、纽约，1962年），第12—13页。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新法兰西》周刊，1958年7月第17—22页。

和普里奥的支持者包括在一个未来的政府中，有必要压低任何反美宣传的调子。几个星期后，共产党人把卡斯特罗的运动说成是由“依靠恐怖行动和阴谋政变为驱逐巴蒂斯塔的主要手段的那些人所组成的”。福斯蒂诺·佩雷斯在解释罢工失败的原因时，并没有提到共产党人，而是提到“出自某种策略上的因素，即我们为避免血流成河，不至于再给原已受尽苦难……的人民加上额外的痛苦”。^①

这次罢工失败大大降低了卡斯特罗的威信。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都沉寂下来了，5月间，甚至旅行家也开始回到古巴来。巴蒂斯塔得意洋洋地得到了多米尼加共和国五架运输机的步枪。在哈瓦那以外，没有什么革命活动。人们打教堂里搬走了女月神圣马克的守护神的雕像，不让四月下旬在那里举行狂欢节。但是，遵照卡斯特罗3月份对公务员所颁布的命令同现政权断绝关系的寥寥无几。只有二十六名飞机驾驶员辞了职。大多数人民照旧如数缴税。美国中央情报局中美科科长访问史密斯大使，引以为慰地说，他十分同意这位大使对古巴共产党的危险的估计。在共产党公布他们谴责福斯蒂诺·佩雷斯的那一天，史密斯正在忙于注意更多的“关于共产党支持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报告”。他说这是来自埃德加·胡佛的一份最新的报告，仿佛这就可以解决问题似的。^②史密斯也正忙于组织关塔那摩给水的保卫工作，因为关

① 胡莱斯·杜波依斯书，第258页。

② 埃德加·胡佛（1895年生），生于华盛顿；乔治·华盛顿大学毕业；自1924年起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出版过很多署上他名字的书。

塔那摩的给水是在基地范围以外的。双方同意，如果古巴军队不得不撤出(调供其他地方使用)，美国海军陆战队就可以开进去。史密斯同巴蒂斯塔的关系再好也没有了。

为达成妥协的种种努力仍在继续进行，但是，只有那些主教是乐观派。教皇使节森托斯阁下问美国是否不能进行干涉，强制休战。史密斯说不能。美国能否供给缪勒主教(前往奥连特省试图会见卡斯特罗的一位新副主教)一架美国海军的直升飞机呢？这也会构成干涉。虽然如此，缪勒主教还是出发了。在当月底(在卡斯特罗方面或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什么活动或根本没有活动)，主教方面要求成立一个特别的中立政府，它的领导人将来没有资格担任任何职位。总理应由主教方面选择。但是，这时，巴蒂斯塔已不象3月间那样的忧心如捣了。甘蔗收成已差不多到手；四百五十万吨糖，怠工几乎又是无足轻重了。已经获得代替美国武器的代用品。哈瓦那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因罢工失败而受到损害。福斯蒂诺·佩雷斯虽未被捕，但到处在搜索他，因而上山去了，由马塞洛·费尔南德斯接替他担任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全国协调员。戴维·萨尔瓦多从负责工人活动方面调去改组哈瓦那的地下工作。拉伊依然是公民抗议运动的首脑。

罢工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情况。第一，卡斯特罗，正如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所希望的那样，故意发表了为说给美国舆论听的缓和的声明。他在5月中旬接见胡莱斯·杜波依斯时说：

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从来没有谈到社会主义或工业国有化……我们一开始就宣布我们是为全面实施 1940 年宪法而斗争的，宪法条文为参加生产的一切成分，包括自由企业和所投入的资本在内，制定了保证、权利和义务。^①

他也同样着手促进反对党派在国外为新的联合所进行的谈判，以取代上年 11 月的那个不幸的委员会。这一点因 4 月 29 日在马埃斯特腊山和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之间建立了直接无线电话而得到助益。而且他还不让其他反对党派或那些正在同其他反对党派成员进行谈判的自己的追随者知道，而开始对那种主张同共产党采取正式合作的意见抱着更加同情的态度。

颇有意思的是，卡斯特罗在采取这种新做法的时候，正值他的弟弟，那个“更为激进的”劳尔（他后来这样提他弟弟）远在奥连特省北部。4 月 20 日，劳尔·卡斯特罗给他哥哥写了第一封快信。当时他已经离开了一个多月，自 3 月 10 日起，就一直在旅行，有时乘吉普车，有时步行。随同他去的有老卫士曼努埃尔·法哈多，西罗·弗里亚斯和埃菲赫尼奥·阿梅赫拉斯等人，没有几天，他就到达了他童年时代熟悉的马亚里地区。同他一起的还有一位圣地亚哥的安东尼奥·里瓦斯神甫，正是因为他同教会的关系十分好，所以何塞·查维维神甫在他的每周广播节目中从圣地亚哥向他广播秘密消息。到了 3 月 16 日，劳尔·卡斯特罗已到了克里斯塔尔山。他在那里同很多其他的起义者——德梅特里奥·蒙特塞尼

^① 胡莱斯·杜波依斯书，第 263 页。

（“比利亚”）上尉、由他提升为上尉的劳尔·梅嫩德斯·托马塞维奇和关塔那摩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领袖“托托”·拉腊——建立了关系。在这些先前存在的队伍之中有一些是共产党人。^①劳尔也接受了拥有大约二百名“步兵”的一批人。^②

好样的小伙子大多是来自那个地区，都怀着一种革命的幻想住在不同的营帐里，有吉普车……在有厨师等一切设备的一个农场里免费吃饭；人民供应他们一切，而他们所作的只是象发了疯的小鸡那样乘着他们所拥有的一切车辆，赶来赶去……其中的负责人藏有一千比索……我对这些先生说，我们就呆在这儿了。^③

后来，劳尔·卡斯特罗清洗了这支游击队——虽则在这个地区至少还有其他两个起义团体——跟劳尔不是亲戚的阿曼多·卡斯特罗手下有两百人，当过军曹的维乔手下有三十人。劳尔·卡斯特罗在这个偏远地区建立一支公共工程队伍（用拖拉机修筑新路）；一个由希尔维托·卡尔德罗负责的炸弹制造厂，有一个美国人伊万斯·拉塞尔在他下面工作；一个卫生站；一个总部和甚至一个临时空军基地。劳尔·卡斯特罗所表现的组织能力，是

① 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的文章的附注，〈今日报〉，1959年6月28日，“共产党农民……在组成弗兰克·派斯的第二战线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② 其中包括维森特·鲁德亚中尉，赫苏斯·亚历杭德罗·丘丘少尉，阿赫利奥·坎波斯和胡利奥·佩雷斯上尉。

③ 见略斯·帕冯的文章，〈绿橄榄树〉周刊，1963年3月24日。

先前看到他在他哥哥身边工作的那些人所不表示怀疑的。这支日益增长的力量分成三个中队，分别由阿梅赫拉斯，曼努埃尔·法哈多和弗里亚斯率领。阿梅赫拉斯有一队卫兵随从左右，这队卫兵由于外貌粗犷，被称为茅茅人。^①4月8日，对拉蒙德拉斯亚瓜斯兵营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袭击。虽然攻占了几个村庄，但是后来大多又照例被放弃了，不过，象费利西达德德亚特拉斯这样的村庄有一、两处却一直掌握在他们手里。不久，巴蒂斯塔部队中由萨帕塔军曹和卡洛斯·利特中尉（“佩佩西托”）领导的一个叛变集团投过来了。在这个荒漠地区，法律几乎全部瓦解；实则法律可曾存在过？革命感染了老老小小。一个十岁的男孩杀死了一个兵，夺了他的步枪，然后步行到山区，投到卡斯特罗这边来。

4月中旬，劳尔·卡斯特罗派遣西罗·弗里亚斯率同他的一小批追随者——第五中队——去关塔那摩城的东面。但是，这支队伍被击退了，弗里亚斯在对东南海岸上巴拉科亚和关塔那摩之间、有十五名守卫队的伊尼塔斯兵营的袭击中被击毙了。立即下令发动一次新进攻——由阿梅赫拉斯偕同费利克斯培尼亚（接替了弗里亚斯）和法哈多袭击亚特拉斯地区的牙买加兵营；劳尔·卡斯特罗本人则袭击索莱达德糖厂的兵营。这些进攻都不是成功的。对凯马内拉海军兵营的第三次袭击，成绩比较好。这使起义军靠近了关塔那摩湾的美国基地。但是劳尔·卡斯特罗的主要成就，与其说是在实际进攻方面（虽则

^① “茅茅”是肯尼亚非洲人反对英国殖民者的爱国武装组织，1952年开始在吉库尤人中建立。——译者

这样做可以使军队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中),不如说是在统一活动于那个地区的许多起义队伍所取得的成就方面,而所以获得成功却是由于高度的纪律和士气,加上一个包括有一位法律顾问(奥古斯托·马丁内斯·桑切斯,一位来自奥尔金的律师)和一位牧师的民政组织。到4月底,一个亚马孙小组已经从关塔那摩城派出,供应品也从该城和其他城镇得到了保证。所有五个中队都在奥连特省东部组织齐妥,并得到市民的有效支持。^①劳尔·卡斯特罗的总部设在距关塔那摩两小时路程的鲁斯山。禁止抢劫的条例几乎根除了境内的盗匪活动。到了仲夏,劳尔·卡斯特罗对于大约一千名过去的土匪或散兵游勇已经多少建立了领导权。^②

如果说在1958年中期卡斯特罗更接近共产党人,那么,他也正在越来越得到教会的积极支持。劳尔·卡斯

① 第一中队:梅嫩德斯·托马塞维奇——上松戈,

第二中队:阿梅赫拉斯——关塔那摩,

第三中队:胡利奥·佩雷斯——萨瓜-马亚里,

第四中队:法哈多——亚特拉斯,

第五中队:培尼亚——关塔那摩以东的巴拉科阿。

② 这段记述的资料来源,劳尔·卡斯特罗的日记,发表于《革命报》,1959年1月26—29日。另参看他的助手何塞·考塞的一篇文章,载《绿橄榄树》周刊,1963年3月24日。后来的一次改组把劳尔·卡斯特罗的所部全部编入分别由卢松,贝拉米诺·卡斯蒂利亚和培尼亚三个少校所领导的纵队,最后在战事结束时又有了伊格莱西亚斯(“尼加拉瓜”)少校所领导的第四个纵队。除培尼亚在1959年暴死外,这些人在六十年代依然是革命军的柱石。所以这些司令以及希门尼斯·拉赫,菲利维托·奥利维拉,科洛梅(“富里”)·佩皮托·库萨,萨穆埃尔·罗迪莱斯和费利克斯·卢加诺(皮隆)诸上尉大体上一直是新古巴军队的革命司令,在这些司令之中有七位(卢松,科洛梅,希门尼斯·拉赫,奥利维拉,法哈多,梅嫩德斯·托马塞维奇和阿梅赫拉斯)都是1965年新古巴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特罗在圣地亚哥同牧师的接触，可以同卡斯特罗和阿尔梅达两个小组中所设的礼拜堂牧师职位相媲美；菲德尔·卡斯特罗不久就有了一个新教的牧师和一个天主教的神甫。在哈瓦那，有一位马德里加尔神甫，担任了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司库；4月间，几个青年天主教徒死于警察之手以后，博萨·马斯维达尔神甫的教堂变成了活动的另一个中心。教皇特使森托斯阁下已经接受了为上述理由向巴蒂斯塔提出的一份由很多教士签名的抗议书，但巴蒂斯塔拒绝接见他。世俗的天主教领袖在远比共产党人更大的规模上继续积极活动。

卡斯特罗这时还决不是在战场上反对巴蒂斯塔唯一对手。他的最不可轻视的竞争者是巴尔金。巴尔金虽仍押在监狱里，但是，他自己那个军官集团（因1957年他们那次未遂政变的日期而自称为四·四运动）和由胡斯托·卡里略领导的蒙特克里斯蒂运动，正在松树岛上设法进行一次政变来使他出狱。卡里略这个计划，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拉腊萨瓦尔海军上将曾经答应予以支持；委内瑞拉将提供漆上多米尼加共和国国旗的飞机；但是，为了获得这个帮助，卡里略将设法取得美国的同意或默许。于是，卡里略飞往华盛顿去会见古美防务委员会美国代表团团长达西将军。卡里略仍念念不忘他所认为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在西恩富戈斯起义是一种背叛行为，向达西描述了如果卡斯特罗胜利了，美国将要面临的局面，“即使迄仍不相信卡斯特罗会成为莫斯科的直接代理人”。他对达西说，“革命胜利越迟，革命越是激进，”而且这种激进主义将会成为一种反美主义，因为美国虽然对

巴蒂斯塔实行武器禁运,但是军事代表团的继续存在、象以美国勋章赠给塔维尼利亚这种事情、或把禁运前所订购的武器继续交货等,就已经把禁运抵销而有余了;他补充说,如果巴蒂斯塔的军队被卡斯特罗打败了,卡斯特罗将以起义军代替古巴军队,那么落在美国身上的最起码的灾害眼看就将到来,“美国不能指望古巴军队……象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①

达西说他不可能同意卡里略利用委内瑞拉的飞机,美国希望防止而不是挑起加勒比海的动乱,并且劝告卡里略设法创立一个战斗的天主教运动去同巴蒂斯塔进行斗争。这样,卡里略为使巴尔金获得自由并使他在反对党派中成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一个军事抗衡力量的计划,就再度遭到了挫败。拉腊萨瓦尔终于供给古巴的反对巴蒂斯塔的党派以武器,但他只是在11月中才作到,并且当时是直接给予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②

① 卡里略:《手稿》,第38—39页。

② 卡里略:《手稿》,第38—39页。武器是由路易斯·布赫和乌鲁蒂亚“总统”所搭乘的那一架飞机运到山区的。

第十六章

1958年5月巴蒂斯塔的“大进攻”

5月24日，巴蒂斯塔对马埃斯特腊山发动了唯一的一次大攻势：夏季作战。已经集中了十七个营，每营附有一个坦克连；另有海、空军的支援和乡村警卫队。司令是坎蒂略和德尔里奥·查维亚诺两个将军。这两位官员是见面连话都不讲的，后来的失败大都是由于他们私人交恶的缘故。他们的目标是要以压倒优势的兵力挺进山区，切断卡斯特罗的供应，把他的活动地区缩小到几平方哩，以便为最后的进攻廓清道路。

无法得知进展的情形达几个星期之久。甚至在山区以内也很难得到消息。巴蒂斯塔的军队大都沿着北线山麓困难而稳步地前进。卡斯特罗把他所有的队伍都从南面调回来（当时都是编成许多小分队）。^①政府军不断地遭到伏击，伤亡惨重，特别是经常碰上卡斯特罗小心地埋下的地雷。但是整整二十五天来，军官们奋力驱迫兵士前进，另一方面，坎蒂略却被巴蒂斯塔的命令弄得多少有点不知所措，因为根据命令要拨出四分之一兵力去保卫

^① 卡斯特罗手下的司令员以前是：第3纵队，阿梅达（科布雷）；第2纵队，西恩富戈斯（中部）；第4纵队，巴尔德斯（图尔基诺）；第7纵队，克雷森西奥·佩雷斯（山区以东）；第8纵队，格瓦拉；第1纵队，总司令部，卡斯特罗。这些纵队都被调回守卫山区的咽喉路径（希门尼斯书，第582页）。

该地区的咖啡作物和制糖厂。

起义军电台呼吁医生和一些新人来支持这个事业。卡斯特罗后来回忆说，他的困难日增，因为这时他不象以前那样可以流动；他已经有了整套工场和一个苦心经营的交通系统，甚至还有了一个雪茄烟工厂。“所以我不得不把我们除圣地亚哥以外的所有部队重新集合在一起，以抵抗敌军的攻势；〔但是〕我们几乎还不足三百人，其中有六十人装备极差……”^①所以又把圣地亚哥附近的阿尔梅达的纵队和奥尔金附近的西恩富戈斯一支侦察队都召回来。

6月中旬，巴蒂斯塔的军队正从南北分两路前进，南路似入无人之境。分别由桑切斯·莫斯克拉上校和梅嫩德斯·马丁内斯少校率领的两个营，从布埃西托矿区出发。越过马埃斯特腊山的主脉，向圣多明各进发。6月19日，这两支部队顺利地到达圣多明各的拉斯维加斯—德希瓦科阿和纳瓦哈尔。一、两天后，他们擦过加维罗，这样，就在圣洛伦索峰把马埃斯特勒山包围起来了。南、北两路的军队已深入山中。在两支前卫部队之间，卡斯特罗确实只有四平方哩的活动地区；“我们的地方缩减了又缩减，直缩到我们无可再缩为止。”^②但是，到了这时，军队的士气已日趋低落了。其中有很多兵都没有在这种地区

^① 《革命文献》，1961年，第46期，第12页。1959年1月9日，卡斯特罗说他有三百支步枪（《革命报》，1959年1月10日），但是，格瓦拉（见《革命战争回忆录》，第197页）说只有二百支完好的步枪。泰伯解释说，卡斯特罗的政策是要把巴蒂斯塔的部队引入山中（泰伯书第249页）。

^② 《革命文献》，1961年，第46期，第12页。

锻炼过，已经筋疲力竭了。在突进到最深的地方，他们作了一次休整；克维多少校把第十八营带到纳瓦哈尔后，又从普拉特河口前进，苏亚雷斯·索莱特少校则率领第十九营深入到梅里诺。6月29日，正在圣多明各一个山谷中休息的桑切斯·莫斯克拉所部的第十一营，被卡斯特罗的步枪手从三面包围起来。桑切斯·莫斯克拉有将近一千人，卡斯特罗的人数还不足三百。但是，在随后三天的打打停停中，桑切斯·莫斯克拉的队伍伤亡甚众。很多人被俘，逃命的只有三分之一。桑切斯·莫斯克拉本人受伤，他的某一连的短波无线电设备，连同军用电报密码和许多武器，都落到卡斯特罗手中。主要的原因是，卡斯特罗部队的“战争情报”大大胜过敌方——“巴蒂斯塔部队一有行动，只消过几分钟，就有一个汗流浹背的人跑来把这个消息报告卡斯特罗。”^①

这番挫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这时，由一群毫无战斗经验、风纪荡然的贪污、残酷和懒惰的军官组成的巴蒂斯塔的最高指挥部，开始担心将被人数和去向都毫不清楚的敌人全部消灭了，他们也许甚至相信他们自己的公报所说的有无数起义军被击毙的消息。桑切斯·莫斯克拉的溃败程度被夸大了。于是停止前进。同时，起义军对一切暴露的和最前沿阵地发动了一连串进攻；接着在梅里诺，埃尔希古埃，圣多明各，拉斯维加斯—德希瓦科阿和拉斯梅塞德斯各地，相继发生了新战斗。为了避免被切

^① 迪基·查佩尔的文章，见弗兰克林·马克·奥桑加编：《现代游击战》（1962年），第320页。

断，军队试图撤退。有些人开小差了（例如，7月24日，在埃尔塞罗，八十人中有三十人开小差）。空军分辨不出巴蒂斯塔军和起义军，前者有些被凝固汽油弹烧毙。他们由于害怕起义军，竟然不是派坦克到前面去保护步兵，反而由步兵走在前面守卫坦克，于是全部成了炮灰。

在下一个半月之内，几乎全部军队都从马埃斯特腊山撤出。最高指挥部惊慌失措，撤退得如此彻底，以致简直没有作什么抵抗。由于看错了地图，曾下令作小规模进攻。卡斯特罗掳获了敌人的电报密码后，使他不但能够发现军队的调动，甚至还能发出迷惑人的命令（包括对空军）。不同纵队之间的通讯简直不存在了。到了8月初，不仅桑切斯·莫斯克拉的第十一营，梅嫩德斯少校的第二十二营和苏亚雷斯·索莱特少校的第十九营也都被击得溃不成军了。第十八营也溃不成军，一则由于缺乏粮食和饮料，一则因为卡斯特罗已同克维多校有了联系，卡斯特罗在大学时就认识他，他后来参加了起义军。其他几个部队损失惨重。起义军得到了武器：一辆十四吨的坦克、十二尊迫击炮、两尊反坦克火箭炮、十二挺带三角架的机关枪、二十一挺手提式机关枪、一百四十二支加伦枪、二百挺克里斯托瓦尔式机关枪。起义军伤亡总数是死二十七人，伤约五十人；死者包括五名军官（将近百分之二十——一个很高的百分比，虽则在这类小规模战争中这是不足为奇的）。起义军俘虏了四百三十三人，其中四百二十二名移交给红十字会的职员，二十一人（原文如此。——译者）交还军队本身；没有一个受到虐待。一百一十七人受伤，其中二人死亡。这些人所受到

的照顾，即使只是为了政治目的，也是值得作为楷模的，因为这同巴蒂斯塔的对待俘虏形成如此强烈的对照，又给军队声望一个打击。军队直到这时为止还没有抓到一个俘虏。卡斯特罗为这种不平凡而明智的方法辩护说：

战争不只是步枪、子弹、大炮和飞机的问题。迷信武器曾经多次是暴政军队失败的原因之一……自从1957年1月以来……政府军约有六百名……落到我们手中……一个也没有被杀害过……而落到敌人手里的每一个起义者、同情者、甚至每一个嫌疑者，却肯定逃不了酷刑和死亡的命运。在很多场合下，竟用屠杀农民，增加尸首的数目，来证实参谋长所捏造的消息……六百多名手无寸铁的市民，在各方面说来，都同革命活动毫无关系，也遭到了（军队的）杀戮。在这二十个月的战役中，杀戮并没有使谁强大起来。杀戮使他们变弱了；不杀戮使我们强大起来了……只有懦夫和凶手才会杀害投降的敌人……起义军决不能采取我们所与之斗争的暴政相同的策略……”

对于起义军说来，把俘虏遣送回去，自然比养着他们更省开支。在现行经济条件和失业的情况下，卡斯特罗说，他们决不会缺少为军队作战的人……但是“胜利很少取决于人，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士气”。^①这一种说法得到了美国一个聪明的游击战专家的记者德基·查佩尔的证实，他后来写道，对俘虏这样处理，乃是“对战败者的战斗力的极端蔑视的表现，它可以说具有物质影响的力量

^① 在起义军电台上的讲话，引自希门尼斯书，第578—592页。

的”。

卡斯特罗这些胜利的消息，被巴蒂斯塔的最高指挥部隐瞒了，所以，一连两个晚上——8月18日和19日——卡斯特罗在起义军电台上作广播，把这些遭遇战用后来古巴听众十分熟悉的那种动人而精练的言语尽可能地加以详述：他特别提到军队，谴责最高指挥部和坎蒂略将军，说坎蒂略将军是一个懦夫，因为他眼看他的同僚查维亚诺，本图拉，皮拉尔·加西亚等人在古巴各条街上、各个城市留下一连串的尸体而无动于衷，为了作个对比，他伸出了手，指着一些青年军官说，“他们在这几个月的战争中，真使我们感激，他们不贪污腐化，他们热爱他们的职业和他们的军务。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把他们卷了进去的战争是荒谬的……但他们不得不服从命令。”他聪明地拿他们同高级军官作对比，那些高级军官靠了开设赌场、靠了保护缺德事情以及其他的胡作非为已成了百万富翁。他谈到了军队可能发生一次政变；如果政变是一些投机军人所干的，他们只是急想保全自己的财富，力图为暴政集团谋求一条最好的出路。

但，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因为……决不能再象过去那样，作出了牺牲和洒掉了热血，而局面仍是原封不动，再重演马查多倒台以后的历史。如果军事政变是正直的人干的，并且有着真诚的革命目的，那么，就有可能在公正和有益的基础上谋求和平解决。在军队和革命之间，他们的利益并不是，也绝不应该是互相矛盾的，古巴的问题是可以获得解决的。我们是在同暴政，而不是同军队作战的……军

队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要么迈步前进，同巴蒂斯塔政权这具僵尸一刀两断，要么作为一种制度而自杀。今天保得住军队的那些人，在三、两个月内，就保不住它了。如果战争再继续六个月，军队就将完全解体……

接着，卡斯特罗告诉军队怎样才能获得和平：逮捕巴蒂斯塔、现政权的政客和“听任进行酷刑的一切官吏。此后应使军队脱离一切政治争端，以使他们再也不能成为任何独裁者或政党的工具。”他还引了马塞奥的一句语录（“只要还存在着每一件不公正的事情，革命就要继续进行下去”），然后作了一个鼓动人心的结论。另一方面，巴蒂斯塔则发表了一个安抚人心的公报，说军队的巡逻队消灭了一支望风而逃的敌人。

巴蒂斯塔的攻势，虽说对于战争来说颇为重要，却由于6、7月间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北海岸的战术而使许多人觉得意义不大。夏季中最严重的事件也许就是在行刺国防部部长雷伊未遂案之后，警察杀害了圣地亚哥的希拉尔两姊妹，和一个十五岁的男孩行刺巴蒂斯塔未遂案。6月26日，劳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两百名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成员从克里斯塔尔山来到莫亚湾，绑架了十个美国人和两个在那里工作的加拿大人，其中包括明尼苏达大学采矿工程系的系主任。往南四十哩，埃尔米塔制糖厂的田间管理人德斯蒙德·埃尔斯莫尔也被绑去。6月29日，伊萨贝尔制糖厂的加拿大籍经理理查德·萨金特被活捉，二十七名美国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在关塔那摩附近远足，在搭乘古巴公共汽车返回时被绑架。6月30

日，尼卡罗镍矿的总经理和另一个经理人员被绑架。同一天，史密斯大使接到了劳尔·卡斯特罗的一封信说，被绑架的人员将在下述条件下予以释放：第一，美国停止向古巴政府装运一切军事装备——包括过去所供应的武器的备用部件和残缺部件在内；第二，美国应停止从关塔那摩基地以燃料支援古巴政府的飞机；第三，美国应从巴蒂斯塔取得一项保证，担保古巴不用美国的军事装备来对付卡斯特罗。最后，在7月初，有四个联合果品公司的工人和两名职员被绑架。

这些举动自然激怒了美国政府。诺兰和斯太尔斯·布里奇斯两参议员提出：如果人员不在四十八小时之内释放，“就应该给巴蒂斯塔以有效的援助”。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不(能)被讹诈得去帮助起义军”。国务院否认它给古巴飞机加燃料和供应武器给巴蒂斯塔，但是没有提到起义军的第三项要求。

不管真相如何，巴蒂斯塔这时确是困难重重。他既然无法击退卡斯特罗，他就不能保证把被绑架的人员弄回来。史密斯大使认为他本来会让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去这样做。史密斯、海军和华盛顿其他各方也想这样做。海军确曾建议“立即对古巴进行局部的干涉”。国务院正确地辩称，进入古巴易离开古巴难，而进行军事干涉也不见得能使海军陆战队的性命不受损失。

结果是，没有从美国那里敲诈到任何让步就把被绑架的人释放了，只不过是克里斯塔尔山上的起义军有了两、三个星期不受空袭。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为了释放俘虏作了最大限度的宣传，俘虏受到了良好的待遇，虽则受

到圣地亚哥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一位年轻姑娘比尔马·埃斯平的长期盘诘，这个姑娘从3月以来一直耽在克里斯塔尔山上。这些绑架的后果使卡斯特罗失去了在美国积累起来的一些善意。但是，当7月底古巴撤出亚特拉斯，不再为美国保卫关塔那摩的水源时，卡斯特罗又得到了一次胜利。当时美国军队前去接管。卡斯特罗提出抗议。于是，美军撤退，古巴人又回去了。

在这次大进攻和山区中继续进行绑架的过程中，在平原上，卡斯特罗的支持者和其他一些反巴蒂斯塔派别间已经有了很多重大的变化。在4月罢工之后，在山区以外的古巴大部分地区，有过一段相当平静的时期。哈瓦那活动的指挥者拉伊和福斯蒂诺·佩雷斯成功地避开警察的追捕，在6月中旬到达山区，以便在6月中旬同卡斯特罗会商，但是，到了6月17日，他们得到消息说，哈瓦那公民抵抗运动和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执行委员差不多全都被捕，或者不得不离开古巴。拉伊和佩雷斯没有见到卡斯特罗就迅速返回哈瓦那。他们发现他们的组织差不多是群龙无首。很多小组都彼此失去联络。这时，遭到公民抵抗运动拒绝的哈瓦那共产党人，正在同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就劳工方面谈判一项协议。七月二十六日运动这方面，则根据4月的经验，认为如果需要工会或工人有所行动，就必须获得有实力的组织的支持。共产党人就是唯一可能支持的力量。6月5日，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给《新法兰西》周刊(巴黎)写了一篇文章，清楚表明谈判至少已经开始。罗德里格斯还在那一天写信给法国新闻记者克洛德·朱利安解释说，仍有需要把象普里奥

和格劳这种人拉进反对党派的联盟,结成一个“将会超过反对帝国主义这种限度”的大联合。^①

有三、两个星期没有出现任何重要的发展,大概是作为一种威胁,共产党本身在6月28日鲜明地提出了要求“正直和民主选举”——显然是一种与卡斯特罗的政策背道而驰的新退却。结果,拉伊代表公民抵抗运动对共产党人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能对这个斗争作出任何贡献。于是,共产党人着手在卡马圭、埃斯坎布拉伊山以至比那尔德里奥组织了游击小组。劳尔·卡斯特罗一直同哈瓦那的共产党人保持接触,因为在6月底,他派了一个共产党员,糖业工人领袖“佩佩”·拉米雷斯就绑架美国实业家情况亲自向哈瓦那政治局作了汇报,下一个月月初,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代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取道上山,先去看劳尔·卡斯特罗于克里斯塔尔山,然后上马埃斯特腊山。^②菲德尔·卡斯特罗(似乎对这次拜访,有点感到意外)不知是太忙,还是专心致志于战争,或是过于谨慎,隔了好几天才接见他。罗德里格斯后来回忆说:“在劳尔·卡斯特罗所控制的克里斯塔尔山,对共产党人没有别的只有谅解。可是我一到了马埃斯特腊山菲德尔那里,这种谅解却变成了猜疑。”^③

① 克洛德·朱利安:《古巴的革命》(巴黎,1961年),第123页。

② 《今日报》,1959年1月11日;1966年6月,罗德里格斯向作者证实说,那时他上了山。罗德里格斯所以有机会上山,是因为卡斯特罗邀请了所有革命党派去同他商议,乘机而去的只有共产党和指导委员会。

③ 见贾尼·科尔维所写的同罗德里格斯会见记,载《快报》周刊(意大利),1964年1月26日—2月23日,以及他在马基托斯案审讯中的证词,《今日报》,1964年3月25日。

在这期间,除共产党和两个“选举派”政党(格劳的党和马克斯·斯特林的党)以外的所有反对党派又在加拉加斯举行了一次会议,这一次,它们同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在7月20日签订了一个真正的公约,由凡有代表出席的组织组成了一个“团结会议”,也就是“革命民主公民阵线”。出席的有很多亲身参加过斗争的人,也有另外一些一直在流亡中活动的人、工会领袖和学生。名单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普里奥;米罗·卡多纳(公民对话的律师);巴罗纳;罗德里格斯·洛埃切斯和奥尔兰多·布兰科(代表革命指导委员会);戴维·萨尔瓦多(七月二十六日日运动);帕斯卡西奥·利纳雷斯,劳罗·布兰科,何塞·玛丽亚·阿吉莱拉和安赫尔·科菲尼奥——都是工会领袖,工人联合战线的成员;何塞·普恩特和奥马尔·费尔南德斯,大学生联合会的领袖;加维诺·罗德里格斯·比利亚维德,代表巴尔金系的军官(四·四运动);胡斯托·卡里略,当时领导天主教民主蒙特克里斯蒂运动的一位经济学家;林肯·罗东,1952年的众议院议长,代表民主党;安赫尔·玛丽亚·桑托斯·布赫,公民抵抗运动的流亡领袖;以及最后,何塞·利亚努萨^①代表卡斯特罗,事先已经获得卡斯特罗的签字,并以无线电同他保持接触。卡斯特罗似乎坚持要普里奥再付四万四千美元后他才签字。^② 公约要求“建立一个以武装起义来打倒独裁制的共

① 后来卡斯特罗革命政府的体育负责人和教育部部长。利亚努萨在艾德·桑塔马利亚·德阿特的推荐下,在4月间开始崭露头角。

② 普里米蒂沃·利马(指导委员会的代表,加拉加斯)的证词。普里奥答应再给加拉加斯公约同盟六千美元,但并未支付。

同战略”，建立一个短期的临时政府“以促使……充分行使宪法和民主程序；制定一个保证处罚犯罪者，保证工人权利、履行国际义务……以及古巴人民的经济和政治进步的计划”。^①

一般说来，这个公约自然使反对党派有了一个可尊敬的和有希望的阵容，但是，实际上，这不过是意味着暂时停止自相残杀的争吵，而不是一个共同战略，而且不久就发生了无数的争吵，特别是关于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从指导委员会“盗窃”武器的问题：原来打算运往埃斯卡布拉伊山的武器，却运给了克里斯塔尔山的劳尔·卡斯特罗。^②此外，卡斯特罗被推选为总司令，并没有使其他团体不再保持各自的军事行动，不过这确实使卡斯特罗得以更有力地提出要求，凡是要采取直接行动的人，都应该受他在马埃斯特腊山的节制。

① 胡莱斯·杜波依斯书，第280页。

② 普里米蒂沃·利马的证词。巴尔金系的代表加维诺·罗德里格斯作证说，革命民主公民阵线所筹募的款项仅够一个小宣传机构和派到日内瓦红十字会去的一代表团的经费之用（加维诺·罗德里格斯的证词）。

第十七章

崩 溃

1958年8月，在军队终于撤退之后，卡斯特罗把他的司令部设在离海两三哩、拉普拉塔河附近的地方。制定了三项新的作战计划，卡斯特罗和主力将试图包围圣地亚哥；格瓦拉将率领一百四十八人（第8纵队，西罗·雷东多）西去拉斯维利亚斯省，系统地切断岛上东西两端间一切交通机关，并对仍然活跃于埃斯坎布拉伊山中的那些游击队树立卡斯特的权威——指导委员会这时再度置于福尔·乔蒙的领导之下，他上个月刚从哈瓦那回来。^①西恩富戈斯将率领八十二人向比纳那德里奥移动（第2纵队，领队安东尼奥·马塞奥）。卡斯特罗指派格瓦拉为拉斯维利亚斯省（包括城镇在内）一切反对党派的作战部队的司令，并赋予他以收税、实施新刑法和开始土地改革的权力。至于指导委员会是否会接受这些强加的作法，尚有待分晓。指导委员会并不是活动于埃斯坎布拉伊山的唯一组织，因为还有一个从它分裂出去的半帮会性的团体，称为“埃斯坎布拉伊山的第二战线”，显然是在普

^① 见格瓦拉的文章，《绿橄榄树》周刊，1960年10月5日。关于乔蒙的回来，见罗德里格斯·洛埃切斯书，第99页。关于在埃斯坎布拉伊山和奥连特省所化的力量的准确比例问题，在加拉加斯阵线的合作协调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上（我曾经见到）充满了一片争吵。

里奥的鼓励下这样干的。这批人是由古铁雷斯·梅诺约这个同攻打总统府有关的西班牙人的一个兄弟领导的。此外，当时在拉斯维利亚斯省还有由费利克斯·托雷斯所领导的共产党的“马克西莫·戈麦斯”纵队，这时兵力已有六十五人。

格瓦拉和西恩富戈斯于8月底动身，在他们的卡车被一次空袭毁掉后，徒步前往。格瓦拉有圣克拉腊的一位老共产党员阿曼多·阿科斯塔同行，阿科斯塔虽然离开圣克拉腊只有两、三个星期，这次回去却有了一个上尉军衔并化名为“罗德里格斯”。

在这期间，卡斯特罗在拉普拉塔继续同共产党人和反对党派的所有其他成员进行谈判。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于8月10日离山，带去了他后来称之为卡斯特罗的口头承诺，即菲德尔分子和共产党人团结一致的想法。至少又有一个共产党员，路易斯·马斯·马丁（卡斯特罗在大学读书时，他是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成员）也来到了马埃斯特腊山，并且此后就作为驻司令部的共产党代表。至于“平原”，也就是说在哈瓦那，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会见了曾经签署加拉加斯公约的地方党代表，并且使他们大吃一惊地对他们说，卡斯特罗已经认为共产党人应该参加到他们里面去，至少在工人运动应该如此，因为工人运动是为改造那里头的反对党派而筹设的。加拉加斯公约签字各方在哈瓦那召开了一次会议，大家都拒绝这个意见，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代表德利奥·戈麦斯·奥乔亚不顾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说这是卡斯特罗的意见，特别反对这个计划，卡洛斯·拉斐

尔·罗德里格斯于是决定再度上马埃斯特腊山，因为他确信卡斯特罗会不同意加拉加斯会议刚刚所作的决定。但是，接着共产党又作了两次交涉——这一次是由共产党主席马里内略出面的——也都遭到拒绝。戈麦斯·奥乔亚重又“以一种可说是蛮横的态度”从中作梗。^①在5月23日已经下山去哈瓦那（也就是早在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第一次上山之前）的戈麦斯·奥乔亚，是哈瓦那大学外交法律系的一个人民党学生，一个地主的儿子，一个强烈的反共分子和劳尔·卡斯特罗的对头。其实，既然卡斯特罗本人正在同共产党进行谈判，他完全有可能派戈麦斯·奥乔亚作为他在哈瓦那的代表，以代表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右翼。^②由于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又上了山，因此，甚至同共产党人关于统一工人运动的问题的谈判都仍然没有谈妥。他这次留在山上，不是住在卡斯特罗的司令部里而是住在拉斯维加斯附近另一个营帐里。跟他在一起的有一个著名的共产党员、糖业工人领袖乌西尼奥·罗哈斯。

不久之后，关于共产党人参加起义军的权利问题有了一个明确的协议。德利奥·戈麦斯·奥乔亚这时已从哈瓦那撤回山区，由一位较有外交手腕的人马尔塞洛·

^① 曼努埃尔·莱东提供的材料。据说如此，但是，显而易见，哈瓦那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某些成员是赞成同共产党达成协议的——特别是里卡多·阿拉尔孔，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学生方面的领导人（1969年古巴驻联合国大使）。

^② 参看路易斯·西蒙《手稿》，第254页。西蒙在5月间陪同戈麦斯·奥乔亚下山来到平原，10月间又陪同他回去。

费尔南德斯接替了，关于统一工人团结问题的谈判于是有了比较迅速的进展。费尔南德斯就可以靠后来的行为来抹掉在1959年期间那种顽强保守主义和反共的污名了，并在1965年参加了古巴共产党的新中央委员会。但是，卡斯特罗和罗德里格斯的关系并不密切。当时罗德里格斯似乎又得等上几天才能得到卡斯特罗的接见，并且在他们之间似乎不可能就胜利后古巴的性质达成任何口头的或书面的一般政治协议。革命指导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曼努埃尔·莱东在写到1958年8月，在哈瓦那为在签订加拉加斯公约后、达成各反对党派之间的团结所作的种种努力时说，当时除了撵掉巴蒂斯塔，没有一个人关心到其他事情。显然可以这样假定说，除了恢复1940年宪法，别无他求。

从有关统一工人运动问题谈判的观点来看，这时，在劳尔·卡斯特罗所控制的地区正在召开一个重大的会议，所以选择这个地点，是因为上马埃斯特腊山有种种困难。一大批顽固的工人领袖——戴维·萨尔瓦多，赫苏斯·索托，奥克塔维奥·洛伊特（卡夫雷拉），孔拉多·贝克尔和尼科·托雷斯——来到了克里斯塔尔山，他们在那里受到了劳尔·卡斯特罗的接待，劳尔向他们大声疾呼必须同共产党人团结一致；结果，这个年轻游击队员竟凭自己的威望自行其是，不顾几乎所有这些人多少年来都一直是共产党的对手，甚至于是共产党的敌人这个事实。

卡斯特罗在击败了政府军，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的而不是游击队的领袖的角色之后，觉得胜利在握。早在夏初，他已经对制糖厂出产的每一袋二百五十磅装的食物

糖课以一角五分的税。在奥连特省，甚至于美资制糖厂也经常遵令缴税。9月间，他向公众提出要求：抵制宴会、抵制彩票和报纸，只购买生活必需品。卡斯特罗还号召大家给起义军以力所能及的帮助。

这时，他似乎第一次考虑到未来政权的性质。9月间，哈瓦那公民抵抗运动的头头曼努埃尔去访问他（第一次同他会面）。卡斯特罗要拉伊制订一个土地改革计划。拉伊为卡斯特罗所感动，同意在胜利之后，必须对军队进行清洗，并由起义军加以接管。但是他们对于军队的规模意见不一——根据拉伊的回忆，卡斯特罗显然热衷于搞大规模的军队。^①卡斯特罗还希望各省有一所供二千名农村儿童寄宿的学校。哈瓦那的地下组织一直在担心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在山区的影响，但是，这时，这两个人都不是同卡斯特罗在一起的。劳尔·卡斯特罗由于在奥连特省的列车中营救了圣地亚哥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一个著名领袖卡洛斯·伊格莱西亚斯（尼加拉瓜），刚刚又完成了一件惊人壮举。

格瓦拉已经在9月7日率领他的纵队跨过霍瓦沃河，进入卡马圭省，沿着本岛的南海岸前进，在南圣克鲁斯附近同政府军发生冲突，他手下的一个上尉马科斯·巴雷罗被击毙。这次远征，条件之坏，同从前在山区的条件不相上下。西恩富戈斯在10月间所写的报告中说：

^① 拉伊致作者函。拉伊对于这些谈话很高兴，对于强调要搞大规模军队这一点也永志不忘。《华盛顿邮报》的卡尔·迈耶回忆在9月的会见中，卡斯特罗似乎一心只想到他的反政府军的斗争在本半球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他看来，进行一次反政府军的成功的革命，正确地说，不但从古巴的观点，而且从整个拉丁美洲的观点来看，都是非同小可的。（迈耶致作者函。）

行军四十天，都是以南海岸和指南针作为唯一的向导。在十五天中，我们都是泥水没膝的条件下行军，为了避免埋伏，总是在夜间走路……在我们横跨卡马圭省三十一天的行程中，只吃过十一顿饭。挨了四天饿之后，我们不得不吃掉一匹母马……差不多我们所有的牲口都丢在沼泽地了。^①

作为领袖，格瓦拉节约吃苦，正不亚于他的追随者，从而使他自己跟山区里的卡斯特罗显得截然不同，卡斯特罗总是有可能就要过得舒服。

格瓦拉和西恩富戈斯这两个纵队，在早期总是共同行动——比如在南圣克鲁斯进行散兵战时——后来则分别行动了，除了间或执行法律^②或与守军发生冲突，总是尽快推进。他们只遇到过一次严重的挫折，那是在9月27日，格瓦拉纵队中海梅·维加上尉所领导的一个小组被俘，后来被政府军的奥塔尼奥军曹所屠戮。格瓦拉在卡马圭省得到了当地共产党的帮助，他们供给他一架滚筒印刷机和一些传单。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一个成员，华金·托雷斯在埃斯坎布拉伊山山麓的瓜西马尔对他说，他的组织也能照样供应这一切东西。但是格瓦拉表面上接受了这些意见，却继续利用共产党人。

巴蒂斯塔政府对于还不是战败、却是战事拖长的可

^① 报告载弗朗基：《十二人传》，第136—137页；《绿橄榄树》周刊，1961年10月29日。

^② 有两个人，马克西莫·克维多和埃德尔·卡萨尼亚斯因抢劫被西恩富戈斯枪决。弗朗基书，第239页。

能性，反应很慢。象他以前的大多数古巴统治者一样，巴蒂斯塔归咎于美国；美国不但因拒绝给他武器而帮助了起义军；而且因为他们让叛军得到武器而犯了疏忽之罪。^①但是，在美国国内，流亡者依然在谴责艾森豪威尔政府应对巴蒂斯塔负责；例如，“本半球防务”所必需的军事代表团依然存在。何况，在9月间，美国的盟国英国又承诺卖给巴蒂斯塔十五架海神式战斗机。卡斯特罗以自由的名义电请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阻止这项交易。麦克米伦不为所动，这项交易未遭异议。交货时，起义军总部颁布了“第四号法律：反对英国侵略”。提出了没收英国公司财产的计划；要求所有善良的古巴人抵制英国货。

城市中的情况比较安谧，但是不管有什么行动，警方总是报之以空前野蛮的手段。这样，8月间，哈瓦那爆炸了两枚炸弹之后，第二天就有七个青年被吊在街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总视察柯克帕特里克就实际上无异是中央情报局一个分支机构的镇压共产党活动局所施的酷刑对国防部长表示不满，但毫无效果。一次小小的危机牵涉到了水手的守护神雷格拉的黑圣母；两个孩子把它偷走，显然在他们逃跑时丢了。但是谣传纷纷，说是警察调换了一个假的小黑圣母。警方给搞得惊慌失措，把9月8日的传统节日也禁止了，而起义军却正试图不让人参加一切宴会。9月间，哈瓦那飞机场有大约值二、三百万美元

^① 见8月28日的一项照会。但是，9月9日，美国抓住了载有一吨半军火的“鱼叉号”。

的商货被破坏，六个武装人员投了一枚炸弹，炸毁了哈瓦那古巴全国电路局电力传送站和航空港的电台。城市中的游览者惊奇不已，因为中产阶级、扶轮社社员和专业人员对卡斯特罗的支持甚至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圣地亚哥，那儿的象美景村或乡村俱乐部这类漂亮的住宅区无异是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严阵以待的堡垒。

其实，到了1958年秋季，战争终于开始在经济方面暴露出它的痕迹了。到11月，所有市场都有江河日下之势。店主把存货和周转减少到最低限度。逮捕层出不穷，其中有哈瓦那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领袖，萨尔瓦多和洛伊特这样一些人，所以，曼努埃尔·拉伊实际上成为全岛各城市一切地下活动的负责人。卡斯特罗所干的另两件绑架美国人的事件（德士古的雇员）使人焦急不已，虽则他们很快就被释放出来。一艘美国运输船从尼卡罗运走了五十五名美国公民，这表明不相信巴蒂斯塔政府能够维持秩序。国务院谨慎地说，如果绑架不停止，“美国也许就要采取行动”，卡斯特罗则为了挑起美国干涉，分别谴责史密斯和巴蒂斯塔。10月27日，一架载有十二名旅客的DC3式飞机在飞迈阿密途中，被迫在马埃斯特腊山降落后被劫持了。

卡斯特罗并没有把他的活动局限于神经战。10月间，同共产党人就统一工人运动的谈判已告结束，成立了一个称为全国工人联合战线的松散联盟。谁也不认为这个组织有多大重要性；它似乎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战术上的联盟。蒙特克里斯蒂运动的一个成员回忆说，“共产党人当时表现得异常温文尔雅、谦恭有礼”。他们一面要求

参加统一战线，一面又表示可以不参加，要去参加工人组织。在这方面的工人中，他们还可以指望“一点微弱的力量”。^① 共产党所控制的古巴工人联合会的一些老会员（例如侍应生和“烹调”工人工会的阿尔弗雷多·兰卡尼奥或铁路工人领袖何塞·米格尔·埃斯皮诺）在这个新的工人组织中都有一定的地位。但是，事实上，甚至到了1959年1月巴蒂斯塔倒台的时候，全国工人统一战线还几乎是不存在的。比较重要的似乎是要在胜利后施行的一份土地改革法——马埃斯特腊山的第一号法律。这项法律的基本精神是，凡占有土地不到一百五十亩的人，将得到保障。凡占有土地不到六十亩的人，可以分到土地，而拥有大量荒闲地产的人，如其地产被夺占了，得予以补偿。国家土地和巴蒂斯塔的土地应分配给农民。其中没有提到合作社（象《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中所许诺的那样）也没有提到公社持有地或集体持有地的任何确切的做法。土地改革将主要是分地，这是一种古代农村无政府主义的空想。^② 同时，又颁布一项法律，宣布凡参加11月3日巴蒂斯塔的选举者，将判处三十年监禁或死刑；而且，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中，当地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分子确实将卡马圭省一个著名的巴蒂斯塔派政客阿尼瓦尔·维加“处以死刑”，以表示说到作到。

① 安德雷斯·苏亚雷斯致德雷珀函，1962年9月17日。

② 在山上参加商讨这项法律的人显然有温贝托·索里·马林，福斯蒂诺·佩雷斯，安赫尔·M-路易斯·罗德里格斯，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路易斯·马斯·马丁，卡洛斯·弗朗基，奥雷斯特斯·瓦莱拉，豪尔赫·门多萨，埃弗伦·冈萨雷斯等（路易斯·西蒙：《手稿》，第150页甲）。

秋季到过山区卡斯特罗营地的人，就可以看到“司令部”这时已颇具规模地组织起来了。来自皮隆的一个牙科医生的女儿塞莉亚·桑切斯，专任卡斯特罗的秘书，她有效地控制了他的时间和前来访问的人。以奥尔加·格拉瓦拉所领导的那个称为“玛丽亚娜·格拉哈雷斯营”的妇女小组作为总司令的私人班子。一直随侍左右的其他人员之中，还有起义军电台的组织者（弗朗基，巴莱拉，比奥莱塔·卡萨尔斯）。福斯蒂诺·佩雷斯住在附近的茅棚中。吉列尔莫·萨迪尼亚斯神甫作为一个礼拜堂的牧师巡游各地，试图根据卡斯特罗的命令，以正式婚姻来限制无可避免的放纵的性生活，但没有多大成效。不过，甚至一个多少抱有敌意的观察家路易斯·西蒙（他在10月间访问过“司令部”）也认为这种“道德的瓦解”（他这样称呼）并没有超过正规军队通常所达到的程度。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和路易斯·马斯·马丁这两位共产党的政治代表在山区的活动中并没有起过任何军事方面的或其他任何方面的作用；他们的举动，与其说是经过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许可上山来作政治组织者，不如说是政治避难者，如同何塞·帕尔达·利亚达（他跟他们住得很近）一样。他们既不插手处理补充新兵事务（这是由阿尔多·桑塔马利亚负责的）；不处理农民方面事务（这由福斯蒂诺专司其事）；也不处理经济方面的事务，经济问题当时主要是由总会计检查员索里·马林处理的。根据路易斯·西蒙的说法，罗德里格斯“经常看联合国的统计材料和劳尔·普雷斯维斯^①所编的另一些材料，他下

^① 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主席。

棋并不高明，不过输得颇有风度”。^①

10月中旬，格瓦拉和西恩富戈斯到达了拉斯维利亚斯的山区。格瓦拉这时只有一百四十二人而不是一百四十八人了。在政府军中开小差的人和他們所过之处的当地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分子的帮助下，他们大都沿着马塞奥和马克西莫·戈麦斯在1896年所走过的那条路线前进。10月14日到达拉斯维利亚斯之后，西恩富戈斯同费利克斯·托雷斯的部队联合起来了，费利克斯·托雷斯是亚瓜哈伊地区的共产党部队司令，他用了通常的少校军衔。费利克斯·托雷斯有六十五个人，这时编成三个小队，但是，他立刻“自愿划归〔西恩富戈斯〕节制”，并参加了与为数约一百五十人的一批政府军交火。托雷斯还同指导委员会的司令“迭戈”另有纠纷，“迭戈”曾指示他所联系的农民不要帮助托雷斯，因为托雷斯他们是共产党人——虽则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有一、两个成员事实上已参加了托雷斯的部队。如同在其他一些地方一样，妇女主要是帮助通讯联络。哈尔豪埃卡的鞋匠帕斯托尔·冈萨雷斯，是武器、消息、被服和人员的联络交通中心，亚瓜哈伊的莫德斯托·阿莫神甫也从旁协助，他有时甚至和这些部队同行。

格瓦拉到达之后，出乎意料之外地收到了指导委员会更为狂妄的分裂集团，埃斯坎布拉伊第二战线的领导人之一赫苏斯·卡雷拉斯的一封信，通知他说，如果他的行动事先不同他商量，就不得进入埃斯坎布拉伊。格瓦

^① 西蒙：《手稿》，第266页。

拉不予理会，继续向圣斯皮里图斯附近的丘陵地带挺进，在奥维斯博山山顶建立了他的根据地，然后在那里等待供应游击战的必需品——新皮靴。格瓦拉同半醉半醒所以易于哄骗的卡雷拉斯“少校”以及他的同事培尼亚“少校”作了一番有趣的、纠缠不清的和不太友好的谈话，培尼亚“少校”是“以劫掠牲口而在该地区大名鼎鼎的”，他着重地禁止格瓦拉去攻打吉萨德米兰达，因为那里是“他的地区”。该省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协调员恩里克·奥尔图斯基从特立尼达前来，试图进行调解，并会见格瓦拉，然后再北去访问西恩富戈斯。共产党员瓦尔多·雷娜和阿曼多·阿科斯塔也带了大批给养给西恩富戈斯，后来又有一个共产党员曼努埃尔·德尔佩索也带了一批给养给他。^① 格瓦拉还会见了包括乔蒙和库维拉在内的一些指导委员会的司令，虽则前者不肯同该省的共产党人达成任何协议，因为他对在大学时他们把他作为“革命中的一个帮会分子”而进行攻击的情形记忆犹新。乔蒙担心“卡斯特罗的诡计”会使他改变他的原则。^② 格瓦拉则精明地断定，只有通过联合攻击敌人才能真正取得团结。当时成为格瓦拉主要助手的阿曼多·阿科斯塔帮同在称为卡瓦列特德卡萨山峰上建立了起义军司令部。开始试图切断联络岛之东、西两端的道路。指导委员会的一些怀有不满的部队（古铁雷斯·梅诺约所部）奉令调走。自1956年下半年起就一直坚持在马坦萨斯的维克多·博尔东少

① 1965年古巴驻莫斯科的武官。

② 曼努埃尔·莱东提供的材料。乔蒙建议搞一个全国性的公约，使得卡斯特罗“大为震怒”。

校所部，刚刚开到就同格瓦拉合并。这批人经过格瓦拉清洗后，将博尔东降为上尉。在这期间，西恩富戈斯正忙于搞集体读书会，研究马蒂的作品和“有关马塞奥将军的一切材料”，这些材料都由西恩富戈斯亲自以深沉的声调朗读出来。他并不热心于向比纳那德里奥挺进。农民、城市工人和妇女越来越集结到这个事业中来。到11月，土地改革已经在实施了。把巴纳奥附近属于拉斯维利亚斯省省长塞贡多·恩里克斯的拉迪亚纳庄园的土地，分给了这一地区的农民，每户还分得了大车两辆。在这期间，当地七月二十六日运动领袖因格瓦拉的依靠共产党人而越来越怒不可遏，并通过他们自己的组织向当时的全国调协员马尔塞洛·费尔南德斯大发牢骚。费尔南德斯偕同拉斯维利亚斯的领导人华金·托雷斯和奥尔图斯基去见格瓦拉，以毫不含糊的词句向他提出他们的不满。格瓦拉回答说，他决不坚持任何政治关系，任何古巴人都可以参加他的队伍；最后，经过一番激烈辩论后，格瓦拉说，他同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之间存在着一条政治鸿沟，目前虽然他们能在反对巴蒂斯塔的斗争中联合起来，但迟早总会以分道扬镳而告终。^①但是，在这期间，哈瓦那开了指导委员会和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议：在攻打总统府时牺牲的梅内拉奥·莫拉的儿子阿尔维托·莫拉会见了

^① 出席这次会议的华金·托雷斯的备忘录。在出席这次会议的人中，值得注意的是，马塞洛·费尔南德斯，他在1968年是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是格瓦拉的过分集中化政策的一个反对者）；奥尔图斯基当时仍在土地改革协会工作；而托雷斯在流亡中。

奥尔金一位老共产党领袖拉蒙·尼古劳。^①

巴蒂斯塔的总统选举如期举行了。选举前夕，福斯特·杜勒斯出席了华盛顿古巴大使馆的一次招待会，从而至少认可了这个程序。但是事情已经摆明了，唯一具有任何身份的反对党候选人，马克斯·斯特林是毫无希望的——一则因为肯定知道投票必是骗人的把戏，一则因为他个人也得不到足够的选票。凡此种种都是同选举的想法背道而驰的。结果当然是一个无可避免的结局：巴蒂斯塔的候选人里维罗·阿圭罗当选。此人是同巴蒂斯塔一道飞黄腾达起来的，也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物，是一个孤儿，七岁就在田里劳动^②——他的成功，要是在平常时期，也许会被称颂为又是一个奥拉蒂奥·阿尔赫的成功的故事，就象巴蒂斯塔自己一样。这时却不是平常时期。很少人注意他的胜利。很少人认为如果他在2月24日照原定计划接管政府，政权会有什么两样。很少人认为他会接管政府。他毕竟不是公平当选的。《纽约时报》记者估计，参加投票的不过百分之三十，有些地方的投票低达百分之十，事实上，一整套假选票早已由

① 安排这次会见的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方特提供的材料，莫拉到达时穿着一套高价的细麻布衣服，这位老共产党员对于指导委员会最近攻打马里亚瑙的恐怖主义作法表示厌恶。这次会见是在尼卡西奥·西尔维里奥那幢漂亮的房子里举行的。

② 生于奥连特省巴内斯；十岁时成为孤儿；十五岁去圣地亚哥，目不识丁；夜间在哈瓦那大学读书；后来作律师；1934年在卡洛斯·曼努埃尔·德拉克鲁斯的支持下进卫生部；任巴蒂斯塔的政治秘书；咖啡研究所所长；农业部助理部长；1940年农业部部长；1952年教育部部长；1957—1958年总理。他虽然蓝眼睛，细皮肤，却是卡斯特罗过去一个人民党的朋友、黑白混血种的路易斯·孔特·阿圭罗的隔山兄弟。

陆军印好，填好，并由空军早在选举以前就散发了，印刷所共得到了四万美元。这是古巴有史以来最彻底的一次舞弊行为。甚至在厄尔·史密斯看来，这桩舞弊行为也是无法容忍的，从此他就认为不能再容许巴蒂斯塔恋栈下去，他的政府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找人换马了。在古巴西部，气氛紧张，但还不顶厉害。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士兵把守着八千五百个投票站。在奥连特省，由于卡斯特罗的威胁，有极大多数人弃权。在拉斯维利亚斯省，格瓦拉和西恩富戈斯尽其力所能及不让投票箱运到。尾随在里维罗和马克斯·斯特林之后的格劳申请最高法院宣布选举因舞弊而无效。古巴众议院宣布选举有效；注意者又是寥寥无几。古巴的命运正决定于其他方面。

但是，大约在11月15日，里维罗·阿圭罗，以当选而尚未就任的总统身份访问了史密斯大使，他对这个大使说，他正在研究如何和平解决古巴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得到百分之九十的人民的的支持。他象史密斯一样认为卡斯特罗必会反对任何和平解决方案，不过他认为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支持。史密斯大使于是前往美国。他在华道夫—亚斯多里亚饭店举行了一次跳舞会——为商业目的筹募弗洛伦斯·普里切特·史密斯奖学金的一个募捐会——之后，在11月23日前往华盛顿。他力请国务院同意里维罗要求美国支持的呼吁。鲁伯特姆和威兰说，美援也无法解决古巴的问题。他们也不想支持或鼓励教会进行调解，他们并不认为民政、军政方面的任何人士会支持那个尚未就任的总统。史密斯说，他已经知道巴蒂斯塔不会久长了，因为经济日趋衰退，桥梁正被

炸毁等等。副国务卿墨菲问史密斯是否可以把卡斯特的运动看作是共产主义的运动，史密斯说他可以使任何陪审团相信它是共产主义的运动。结果，史密斯回到哈瓦那，要他探明里维罗·阿圭罗是否有任何可能，想出他所提的那种解决办法，并得到各主要反对党派分子的支持。但是，结果发现，里维罗不过又是回到了巴蒂斯塔的旧立场，依然是无限地凭靠武力。^①

这个失败确实使美国采取了新行动。几天之后，在迈阿密前大使兼商人威廉·波利（二十年代古巴航空公司的创始人）的一幢房子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副国务卿帮办斯诺，^② 助理国务卿亨利·霍兰，^③ 和中央情报局负责拉丁美洲科的金上校。所讨论的是：“你对这个古巴问题怎么办？”波利说，“我们现在所作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错的。我对他们说，我们现在应该力图保全和平，看看我们是否能够到那里去，让巴蒂斯塔屈从于一个对他虽不友好但却使我们满意的看守政府，我们就可以立刻承认这个看守政府，并给予军事援助，以便不让菲德尔·卡斯特罗上台。”第二天，他们一起去华盛顿，并且在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进行了商谈。于是波利被“选定去古巴同巴蒂斯塔谈判，看看我能否说服他投降，我照办了”。^④

① 《威兰的证词》，第 661—662 页，第 545—547 页。

② 后来任驻缅甸大使。

③ 1954 年，在他虽则反对但暗中参与其事的危地马拉政变期间，他曾任国务院拉丁美洲司司长。

④ 《共产主义的威胁》，第 739 页；柯克帕特里克书，第 178—179 页。

但是，在波利肩负着这个有点孤注一掷而又别出心裁的使命到达以前，局势已经开始急转直下。虽然一则由于革命党在哈瓦那的代表被捕（他在严刑拷打之下泄露了消息），一则由于卡斯特罗坚持要把武器火速送到山上，哈瓦那的抵抗运动已经达于低点。但是，在11月底，却发生了一些孤立的事件，例如又有一架从迈阿密满载游客飞往巴拉德罗的飞机，被一个来历不详的非正式的卡斯特罗支持者所劫持，结果造成飞机上全体机组人员和旅客十人死亡，飞机堕入尼佩湾。卡斯特罗已经将他的司令部从拉普拉塔迁到拉米耶尔，计划攻打布埃西托村，但是守军在进攻前就撤退了；于是起义军向吉萨推进，绕过巴亚莫，旨在集中兵力于圣地亚哥一带。一个小学教师兼稻农乌维尔特·马托斯，率领二百四五十人和阿尔梅达率领三百五十人，开始包围该城。攻城的谣言传播远近，爆炸事件层见迭出。在关塔那摩一带也有几次小冲突。卡斯特罗在吉萨，以二百名游击战士（其中一百人是初次参加战斗的）迎击巴蒂斯塔的五千人。巴蒂斯塔的一些指挥官开始绝望了：“我们的军队，毫无轮换地打了两年仗，疲惫不堪，伤亡惨重，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投敌的人，日益增多。我们缺乏后备，幽居兵营中的大部分军官或许（是）……同敌方有了联系。”巴蒂斯塔本人将在2月间放弃权力的前景，造成了进一步的士气衰落。由于象克维多这样一、两个军官的投降卡斯特罗和另外两个军官（比利亚米尔和乌尔维诺·莱昂）的投降格瓦拉，导致了与所造成的损害不相称的惊慌。有几个军官，因巴蒂斯塔怕他们要倒戈而被捕下狱。^① 劳尔和菲德尔·

卡斯特罗所部会合了，而巴蒂斯塔王国的各个部分似乎是彼此都失去了联系，而且全都同哈瓦那失去了联络。越来越多的人上马埃斯特腊山，并且往往是出自投机，一下子就去参加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虽则这些人当时在其他的组织中很活跃。巴蒂斯塔似乎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取消禁运武器上面，但是，在史密斯从华盛顿回来后的—次会见中，已使巴蒂斯塔对华盛顿方面那种“不愉快”的气氛毫无怀疑的余地了。大约在12月初，史密斯会见了一批当地的商人，他们大多认为巴蒂斯塔支持不到任期届满，甚或挨不过1月1日，除非美国给以支持。这些人力称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是“受共产党控制的”，埃索公司的代表波茨说，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最近的一项声明看上去竟同危地马拉的阿本斯^②政府的声明十分相似。大家都认为，美国最好是支持一个军政府。史密斯在上报这一切情况时，建议劝说里维罗·阿圭罗立刻上台，由美国帮助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政府。12月5日，联合果品公司的总经理肯尼思·雷德蒙电请杜勒斯帮同保全奥连特省的甘蔗作物：起义军因为联合果品公司拒付每袋

① 他们是：佩德罗·卡斯特罗·罗哈斯，何塞·罗德里格斯·圣佩德罗，何塞·比亚蒙特斯·哈迪内斯，欧亨尼奥·梅嫩德斯，费利克斯·古铁雷斯·费南德斯和何塞·罗夫莱斯·科尔特斯。

② 阿本斯是危地马拉的民族主义者，于1951年当选总统，他的政治纲领是发展国民经济，使国家摆脱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特别是自1952年起实行了比较激进的“土改”，没收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和大地主的土地，并实行比较独立的外交政策。1954年在美国的策划下，被反动军人推翻。——译者

二百五十磅装食糖的一角五分的税款，已切断该公司普雷斯顿厂的水源。^①

巴蒂斯塔绝望地更换了大批指挥官。坎蒂略被任为奥连特省的作战负责人，德尔里奥·查维亚诺（巴蒂斯塔对他恨之入骨，一直在圣地亚哥司令部任职）被调到拉斯维利亚斯省。佩雷斯·科希尔上校从杜埃尼亚斯上校手里接管了卡马圭省的军事指挥权。在奥连特省，苏亚雷斯·苏斯克特上校和桑切斯·莫斯克拉上校力图不让他们的部队驻定下来。即使如此，还是有更多的军官投到卡斯特罗方面，特别是在希瓦科亚被拘留过的迪亚斯上尉和奥肯多上尉。帕尔马索里亚诺不战而陷。到12月初，圣地亚哥、巴亚莫、奥尔金和其他几个大城仍在政府手里，但是除了这些地方，卡斯特罗似乎控制了奥连特省的南部。到12月7日，由于运到了一部发报机，而使他得以同在拉斯维利亚斯的西恩富戈斯用无线电联系，因而他得知格瓦拉终于同指导委员会达成了一项成功的协议，这项由格瓦拉和库维拉签字的公约（在乔蒙代表指导委员会和拉米罗·巴尔德斯代表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参加的一次会谈之后）提到了在军事目的方面的全面协商，全面合作，还提到了指导委员会同意卡斯特罗进行土地改革。但是公约并没有提到格瓦拉或卡斯特罗有权指挥指导委员会；这个问题将留待以后再行考虑，在这期间，指导委员会在哈瓦那的少数几个代表接到前往拉斯维利亚

^① 《西班牙美洲报道》。1954年使杜勒斯对危地马拉的局势有了警惕的就是这样一份电报，大约也是雷德蒙拍发的。杜勒斯曾一度担任联合果品公司法律顾问。

斯省的命令。起义军由于有这项协定作为后盾，便把一支政府军一举打出圣卢西亚，从而使格瓦拉得以炸毁那座中央公路凭以跨过图伊尼库河的桥梁。这时，格瓦拉部下的何塞·席尔瓦上尉已经控制了自特立尼达至圣斯皮里图斯的那段公路；铁路干线两头都被破坏。

12月9日，波利会晤巴蒂斯塔达三小时之久——史密斯大使（并不知情）已飞往华盛顿。他为巴蒂斯塔提供一个再去住在德托纳比奇的机会。他建议古巴的新临时政府不妨由巴尔金上校、博尔旺内特上校、迪亚斯·塔马约将军和巴卡尔迪家族的佩佩·博什来组成。据波利说，麻烦的是，他无权说美国一定会执行他们那方面的协议，只能说“我一定极力劝说美国政府”。不管怎样，巴蒂斯塔拒绝了，他而且对他的一个侍从军官说，他真想“把这个波利踢出去”。^①

第二天，史密斯在华盛顿见到他的国务院同事和杜勒斯；他接到训令，要破除巴蒂斯塔的幻想，不要以为里维罗·阿圭罗会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所以史密斯再一次回到哈瓦那，告诉外交部长格尔博士说，“我的不愉快的任务就是通知贵国总统说，美国将不再支持古巴的现政府，我国政府认为贵总统已在逐渐失去有效的控制了”；格尔说，巴蒂斯塔将于日内接见史密斯。

此时，巴蒂斯塔作了一次最后的努力来集结他的军

^① 《共产主义的威胁》，第739页；柯克帕特里克书，第179页。苏亚雷斯书，第105页。后来巴蒂斯塔懊悔没有接受波利的计划，并且说他如果知道美国政府真正支持这个密使的话，他原会照办的（拉索书，第162—163页）。

队。将各拥有兵力一百人的十个连派往圣克拉腊，以各有兵力四百人的三个营为后援。他们的任务一部分是防止破坏桥梁。这个防卫系统的关键点是罗塞尔·莱瓦上校负责的西部铁路上所准备的一列装甲火车。

大约在12月中旬，巴蒂斯塔将各军种的所有司令一起召集到军人城。原来这个总统是在考虑某种不顾一切的行动。他对他的追随者说：“我们必须设法更换政府……(并且)经常会面，讨论每一件新的大事。”塔维尼利亚将军，这个巴蒂斯塔的眼中钉，也是军事失败的真正祸首，他不顾协议的保密性，却对很多军官说开了。巴蒂斯塔派人去找他来，塔维尼利亚说，“士兵厌战，军官也不愿意打仗，再也无法可想了。”事实上，奥连特省的司令坎蒂略已经奉塔维尼利亚之命，在准备和卡斯特罗谈判了。塔维尼利亚将军要他的儿子“西利托”·塔维尼利亚(仍然是巴蒂斯塔的私人秘书)告诉总统这个消息：“西利托”不肯这么做，只是表示愿意誓忠总统，“死而后已”。^①12月17日，史密斯终于会见了巴蒂斯塔，并奉命说，国务院认为巴蒂斯塔不再能在古巴维持有效统治，如果他下野的话，当可避免大量流血。巴蒂斯塔回答说，没有他，军政府就存在不下去；没有他，军队就会瓦解。美国能插手制止战斗吗？史密斯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巴蒂斯塔问他是否可以去佛罗里达州他的德托纳比奇的故居。史密斯则建议他去西班牙，并问他是否认为能控制局势至2月；巴蒂斯塔说，因为美国在他紧急的时候拒绝给以武

^① 巴蒂斯塔书，第99页。

器，他很难支持到2月。他仿佛神经错乱一般，匆匆提出了许多可能的解决办法。毫无疑问，到了这时，他已经决定离开古巴了；总之，在不到四十八小时的功夫，他已经在询问空军首脑（“文塞”，或卡洛斯·塔维尼利亚准将），他能立刻保证在一架飞机上给他多少席位。史密斯后来把他在这次会见中的行动看作等于是给巴蒂斯塔一道离国的训令。这时，甚至哈瓦那的商界也似乎同意胡利奥·洛沃的看法：“我们才不管谁推翻巴蒂斯塔，如果有人这样作的话。”^①

但是，就古巴而论，波利出访巴蒂斯塔的使命，并不是1958年12月中央情报局所从事的唯一活动。胡斯托·卡里略仍在希望实现他那营救巴尔金上校的计划，而这时他和他的助手安德里斯·苏亚雷斯博士，由于未能得到阿根廷、委内瑞拉和洪都拉斯的援助，终于去同中央情报局发生联系——或者不如说是去同它驻哈瓦那的代表比尔兹利，及驻迈阿密的罗伯特·罗杰斯发生联系了。这个计划这一次没有遭到拒绝，而且当波利在哈瓦那的时候，华盛顿中央情报局一定已正在考虑中。

① 胡利奥·洛沃提供的材料。

第十八章

巴蒂斯塔是怎样倒台的

在这次同史密斯会见的当夜，巴蒂斯塔接见了他的将军们，这些将军，不消说，是在巴望听到总统已在放弃斗争了。事实上巴蒂斯塔是要为防止“他的部队的整个分崩离析”作出准备。将军们“对我说，真是奇怪，敌人在数量上和军力上，都不可能拥有使政府军动弹不得的必要力量，而各种队伍却不断发生不战而降的情况。”^①这时，卡斯特罗的部队的确正沿着中央公路进行着稳步而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而中央公路上的康特拉马埃斯特雷已为弗朗西斯科·卡夫雷拉少校所攻占。这意味着圣地亚哥的公路已被切断了——这与其说是一种战略上的大打击，不如说是一种心理上的大打击。这个小城市的被攻占，这个人口超过一千的小城市的陷于起义军手里，对巴蒂斯塔政权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难民开始逃入圣地亚哥，巴蒂斯塔的空军有点勉强也有点无能为力地轰炸了被卡斯特罗攻占的那些村庄。桑切斯·莫斯克拉少校已经动弹不得，全被包围了。他本人受伤。在拉斯维利亚斯省，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政府军比在东部甚至更加乱成一团。由于格瓦拉的成功和敌军士气

^① 巴蒂斯塔书，第103页。

愈益衰落，因此决定命令西恩富戈斯率同他的纵队留驻拉斯维利亚斯省，而不是按照原来打算，象马塞奥那样地向比那尔德里奥挺进。西恩富戈斯应该帮助格瓦拉于此时此地将全岛切成两段。12月18日，格瓦拉攻占福门托，12月21日，袭击卡瓦伊古安和该城以东离圣斯皮里图斯数十哩的瓜约斯；博尔东上校接受了瓜约斯的投降，22日，卡瓦伊古安也向库维拉上尉投降了。^①12月22日，西恩富戈斯在该省北部向临海的亚瓜哈伊发动了全面攻势，而格瓦拉则转向哈瓦那攻打普拉塞塔斯的公路交叉点，他夺取了这个差不多被抛弃了的的城市连同它的三万居民。

在本岛中心进行的这一切军事活动都完全使巴蒂斯塔措手不及。由于卡斯特罗原来的战略思想，大胆地把格瓦拉派到本岛中心地区而当时并未吐露出来，这就使格瓦拉十分清楚地显示出他的出色的将才。巴蒂斯塔后来谴责他的两个军官冈萨雷斯·菲纳莱斯少校和乌维内奥·莱昂中尉为贪图金钱贿赂而听由格瓦拉通过他们的防区。但是，即使这是事实——因为关于这一点没有任何证据——也未必就能说政府军是处于健全状态的。12月20日，他拒绝了特鲁希略派遣二千名“精兵”在马埃斯特腊山着陆，另二千名在圣克拉腊着陆的建议；“我不愿意同独裁者打交道，”他对特鲁希略的密使、古巴驻

^① 博尔东在格瓦拉到达之前，已经在埃斯坎布拉伊山耽了差不多两年，指挥为自由而战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部队。格瓦拉到达之后，他曾经被降级，但这时又恢复了原来的军衔。库维拉是指导委员会的一个领导人。

圣多明各武官埃斯特维斯·马伊米尔少校这样说。

巴蒂斯塔终于对似乎可能失败开始有了最后的痉挛性的反应了。他派他的最老的伙伴、1940年被解职的参谋长佩德拉萨将军接替德里奥·查维亚诺在拉斯维利亚斯省的职务，而把后者调往奥连特省。但是塔维尼利亚劝请总统最好把佩德拉萨留在总部，于是把卡西利亚斯·伦普伊少校从松树岛调任圣克拉腊的司令。从这些任命的性质看来，似乎巴蒂斯塔正在作出认真的努力，以重新获得主动权，因为他已把这种主动权令人难以相信地丧失给一小撮对手了。在这期间，在他的军官当中，已经准备发动政变，来防止卡斯特罗取得胜利。计划是由坎蒂略将军接管奥连特省，卡雷拉舰队司令德里奥·查维亚诺将军和当时名义上指挥圣克拉腊装甲列车的罗塞尔上校等也参与其事。将商请仍在狱中的巴尔金上校接管拉斯维利亚斯省，而哥伦比亚兵营的指挥权则交给在1956年他的未成功的武装政变中同他有联系的军官之一。卡马圭和奥尔金的军事首脑（佩雷斯·科希尔上校和乌加尔德·卡里略上校）如拒绝参加，就加以拘捕或杀掉。把巴蒂斯塔和塔维尼利亚分子一起装在一架飞往美国的飞机上。当时在狱里的巴尔金显然同意了，所以把他的毕业纪念戒指送去作为他同意的证物。象罗塞尔上校这么一批军官，显然不但把巴尔金看作是一个折衷的人物，而且把他看作是一个能够打败卡斯特罗的军官。12月26日的行动计划已经拟订好了。后来德里奥·查维亚诺将军又认为，把塔维尼利亚分子也邀进来，并把要分配给他们的任务也告诉他们比较合适。这时，无论是

美国大使馆或是巴蒂斯塔对于所发生的一切，全都不知情。巴蒂斯塔本人正在会见他经常会见的那批主教，并对他们说，“如果能够制止恐怖主义，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实则内战远还没有失败，只要巴蒂斯塔自己肯承认本来就存在着内战就好了。

他的将领们依然认为局势在他们的控制之中。塔维尼利亚撇开巴蒂斯塔，派坎蒂略将军到奥连特省，设法同卡斯特罗讨论休战。当时德尔里奥·查维亚诺已经把军事武装政变的计划告诉了塔维尼利亚，他自己还决定试图修改这个计划。但是在12月22日，巴蒂斯塔得到了关于这些举动的消息之后，一面质问塔维尼利亚，一面在当晚的一次会见中，允许坎蒂略前往奥连特省，尽其力所能及去同卡斯特罗谈判；坎蒂略从巴蒂斯塔的办公室里出来，对巴蒂斯塔的军事秘书（仍然是“西利托”·塔维尼利亚）说，“‘西利托’，每次我阅读一部伟人传记，我总是略掉最后数页，因为结局总是令人不快的。”^①12月23日，在另一次会晤时，塔维尼利亚直率地对巴蒂斯塔说，他认为仗是打败了。他得到消息说，关塔那摩城当时已经被山上下来的部队包围了，队伍是由那个指挥所谓奥连特省第三战线的黑白混血种歌手胡安·阿尔梅达统率的。同一天，由共产党员阿曼多·阿科斯塔率领的格瓦拉所部的一些队伍到达了圣斯皮里图斯的郊外，于是这个有十一万五千人的城市不战而降。城市当局毫无抵抗

^① 这是坎蒂略和苏亚雷斯·努涅斯的说法，见后者著作中的记述（第99页），但巴蒂斯塔后来否认他给过坎蒂略这样的许可。不过，上文所述似乎是正确的。

的精神，而且除了警察，也没有可以抵抗哪怕是一小批人的有效武力。第二天（圣诞节前夜），在奥连特，坎蒂略（已经付给乌加尔德·卡里略和赫苏斯·玛丽亚·萨拉斯·卡尼萨雷斯两上校各一万美元，付给佩雷斯·科希尔上校一万五千美元）^①通过圣地亚哥的古斯曼神甫，顺利地安排了同卡斯特罗在奥连特制糖厂（曾一度是奇瓦斯家族的产业）作一次会见。出席的还有谢拉·塔拉维拉和何塞·克维多两上尉。乘直升飞机到达的坎蒂略，答应军队将在12月31日下午3点以前起义，并不让巴蒂斯塔脱逃。根据这次会议的一个见证人说，除了卡斯特罗希望仍应让巴尔金集团的军官关在狱里以外，双方对一切都取得了协议。圣诞节那一天，坎蒂略从圣地亚哥飞返哈瓦那。他碰到了巴蒂斯塔，巴蒂斯塔对他作了一番狡猾的盘问。坎蒂略说，塔维尼利亚坚持要他找到卡斯特罗。巴蒂斯塔还没有听清楚制糖厂会见的经过原委，就对坎蒂略说，他准备将权力交给以坎蒂略为首的一个军官委员会作为对古巴国人的表态，并在1月26日离开古巴。

卡斯特罗在上塞德罗制糖厂附近的马尔卡内和他哥哥拉蒙同度圣诞节；但是，格瓦拉则正在进攻北海岸附近的雷梅迪奥斯，控制拉斯维利亚斯省省会圣克拉腊北部的要津。26日，雷梅迪奥斯陷落，守军司令格雷罗上尉交出了一百五十件大型武器。同一天，沿岸以下几哩的凯巴连也陷落了。该地守军司令海军上校路易斯·阿拉贡

① 苏亚雷斯·努涅斯书，第110页。作为离国的贿赂。

未作任何抵抗。这就切断了圣克拉腊南、北两面的增援部队。格瓦拉第二步准备攻打圣克拉腊。但是这样大规模的进攻也许是不必要的。28日，卡斯特罗接到了坎蒂略一件词意暧昧的通知说，“局势虽然发展顺利”，但是最好是至少把行动推迟到1月6日。坎蒂略这时踌躇不决了。卡斯特罗说不能等待，并谴责坎蒂略背叛，同时继续在圣地亚哥周围集结他的部队。可是，卡斯特罗并没有料到巴蒂斯塔会象他现在这样快就垮台。^①

12月29日，史密斯大使既不了解他所极其厌恶的大局发展趋势，又显然对于首都一直在进行着的阴谋诡计同他对于其他各地的战役一样毫无所知。这时，塔维尼利亚父子两将军，偕同德尔里奥·查维亚诺前来见他。老塔维尼利亚说，在他看来，军队再也不会打下去了，政府也支持不下去了。但是他，塔维尼利亚急想把古巴从“混乱、卡斯特罗和共产主义”之中拯救出来。他建议组织一个军政府包括坎蒂略、索萨·德克萨达（一个革命党左派的军官）、加西亚·卡索内斯（一个空军军官）各将领和一些海军军官在内：美国会承认这样一个政府吗？史密斯说，很抱歉，他只能同巴蒂斯塔打交道。他问塔维尼利亚是否同巴蒂斯塔谈过？他回答说谈过了，但是巴蒂斯塔没有任何计划。巴蒂斯塔的确还要塔维尼利亚“赶订一个计划”。史密斯要塔维尼利亚再回去同巴蒂斯塔谈一谈。

^① 后来坎蒂略在华盛顿对厄瓜多尔的前总统加洛·普拉萨这样说。以前他和巴蒂斯塔都曾经接受加洛·普拉萨作为调解人。（加洛·普拉萨提供的材料。）参看卡斯特的讲话，《革命报》，1959年1月4日。

事实上，巴蒂斯塔是在打算离国，正如他同坎蒂略说过那样，日期不是1月6日，便是在这之前。他的孩子们已经在29日秘密地从哈瓦那动身去美国了。他已经把他很多私信和其他文件烧毁。他已经安排了飞机。在作出这个决定时，他只考虑到他自己和少数几个亲密的追随者。至于曾经同他一起工作并以其财产，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以其性命都付托给他的成千上万的古巴人，他一概撒手不管。他已经有了一张可以同他一起逃跑的人的名单。在这期间，卡斯特罗已经通过信使同圣地亚哥的指挥官雷戈上校有了书信往还，雷戈是参加坎蒂略的阴谋的。格瓦拉已经攻打了圣克拉腊。另一方面，当地大多数政治领袖和市长都放弃了他们的职位，借口身体不好，偕眷急切逃往国外了。

12月28日，格瓦拉从沿海的凯巴连循着公路一路到了卡马华尼，然后走小路，在黄昏时到达了圣克拉腊城郊的圣克拉腊大学。他在这里分兵两路（为数共约三百人）。南路一支首先遇到防守军（最后三、两天由卡西利亚斯·伦普伊上校指挥）。这个上校所非常仰仗的一列装甲火车开到城东北的卡皮罗山脚下，在那里建立了指挥所。格瓦拉派出了小股兵力，由十八岁的加夫列尔·希尔带队，去攻打那座山，大都是使用手榴弹，并凭山隐蔽，不让火车上的人看到。^①守山部队以惊人的速度撤退后，列车也撤往城市中心地带。守军的士气可以看出是

^① 加夫列尔·希尔曾经在“格拉玛号”上。在阿莱格里亚德皮奥一役后失纵，1957年2月又到山间投奔卡斯特罗。

非常低落的。格瓦拉成功地开动了大学农学院的拖拉机去挖起路轨。列车因而出轨。车内的军官都被摔了出来，立刻受到攻击。他们要求休战。军队里的普通士兵一看到这番情况，便开始同起义军友好往来，并说他们厌恶打自己的同胞了。不久之后装甲列车投降，把三百五十名官兵当作俘虏运走了。列车成了进一步进攻的基地。在城内，警察和公民抵抗运动也在作战。12月31日那一天战斗十分激烈。巴蒂斯塔的空军——常见的B26飞机和英国海神式——轰炸城内格瓦拉所占领的部分，但只炸死寥寥数人。

巴蒂斯塔份子踞守了五个主要中心——莱昂西奥比达尔兵营；中央警察局；省政府大厦；正义宫和格兰特旅馆。正义宫由两辆坦克防守。这两辆坦克遭到了十八岁的起义军罗赫略·阿塞维多上尉的攻击。^①站在坦克车旁边的三个人受伤。不久后，正义宫就同省政府和格兰特旅馆一起陷落了。警察局遭到起义军一个青年上尉“小牛娃”^②率领的敢死队的进攻，“小牛娃”在攻击中阵亡。巴蒂斯塔系的指挥官科尔内略·罗哈斯上校，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儿，下令抵抗到最后一个人，但他还是被活捉了，警察局也陷落了。飞机照常飞来袭击起义军所攻下的哨所，在1958年除夕薄暮的时候，卡西利亚斯·伦普

^① 后来是革命的忠实军官之一。1965年，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② 罗伯托·罗德里格斯，身材非常矮小，约二十岁；他是来自莫隆的一个卡马圭省人。格瓦拉说他是一个特别“快快活活的”、“谎话吓人的”青年，总是用空想粉饰事实，但有惊人的胆气。

伊上校仍然守住了半个城，虽然拥有兵力五百人，其中很多人却想开小差。巴蒂斯塔给圣克拉腊的卡西利亚斯上校拚命打电话；并且从电话上得知卡西利亚斯上校和退守总部的费尔南德斯·苏埃罗上校之间争吵的消息。巴蒂斯塔后来回忆说，“我们最后一次同他们通话，他们的话实际上是无法听懂，他们由于要在一片喧嚣声中使人听懂他们的命令，叫嚷得连嗓子都嘶哑了”——“不守纪律的人员”的叫嚷和四面八方的枪声构成一片喧嚣。这个被巴蒂斯塔称为“方形堡的英勇保卫者”的卡西利亚斯前往逮捕那个“动摇军心”的苏亚雷斯·福莱尔少校，因为他主张战斗人员放下武器。晚上9点钟左右，参谋长罗德里格斯·阿维拉将军劝告巴蒂斯塔说，在他看来，拉斯维利亚斯省已无法踞守了。到了10点钟，坎蒂略将军对奥连特省也作出同样的劝告。于是当时在库基内庄园的巴蒂斯塔命令他的内阁和将领到哥伦比亚兵营来同他一起辞岁。这事十分平常，对于这项邀请，谁也没去多想。同时，在华盛顿的五角大楼里也在举行一个会议，在会上，海军参谋长伯克海军上将在艾伦·杜勒斯和罗伯特·墨菲的一定支持下，力称对古巴来说“卡斯特罗不是一个合适的人”，为了防止他夺取政权，应该在那里采取某种行动。会议一直开到凌晨两点钟，但是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其实除了海军陆战队立刻进行干涉以外，在那样晚的时刻，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巴蒂斯塔政权的人员及其妻室都齐集在军部里。在一片慌乱的集合中，可以看到巴蒂斯塔、军人、政客、巴蒂斯塔的妻子；哈瓦那市长何塞·路易斯·德尔波索；象

加西亚·蒙特斯或圣地亚哥·雷伊这些部长；未就任的总统安德烈斯·里维罗·阿圭罗；参、众两院议长安塞尔莫·阿列格罗和加斯东·戈多伊等人以及他们的眷属。当这些人大多在神经紧张地喝咖啡时，巴蒂斯塔却在内室会见三军参谋长。他们一致认为，他们再也支持不下去了，巴蒂斯塔隐约地提到要把权力移交给坎蒂略，这样，坎蒂略手里就有了两个互相矛盾的阴谋，一个是同他那些兄弟军官合谋的，一个是同卡斯特罗合谋的，两者都无法协调。后来，巴蒂斯塔到了外面，分别和每一簇人谈话，说他准备辞职，“以避免流更多的血”。他还对十分亲密的朋友，提出了飞机席位，飞机将于当夜飞往美国或其他地方。与此同时，他要求参议院议长安塞尔莫·阿列格罗指定资格最深的最高法院法官（卡洛斯·曼努埃尔·彼德拉）为临时总统。在座的彼德拉同意了。坎蒂略将军则继罗德里格斯·阿维拉任参谋长。巴斯蒂塔于是正式辞职，凌晨三点钟从军用机场起飞，同行的有四十人，其中有他的妻子和儿子豪尔赫；贡萨洛·格尔夫妇；安德烈斯·里维罗·阿圭罗；加斯东·戈多伊，罗德里格斯·阿维拉，罗德里格斯·卡尔德隆和罗哈斯各将军以及奥尔兰多·彼德拉和费尔南德斯·米兰达两上校。他们并不是首途美国，而是前往多米尼加共和国。照卡斯特罗的说法，他们随身带走了三、四亿美元，但是，巴蒂斯塔和他的追随者早已把钱存在国外，而且看上去他们也未必有时间来搜罗许多现金。巴蒂斯塔的兄弟哈瓦那省长“潘钦”，在夜间更晚的一个时候，偕同四十人从哈瓦那起飞，其中包括一些部长和警察官员。同时，马斯费雷尔

在接到电话的警告之后，连忙乘快艇悄悄地离开圣地亚哥。接着又有几架飞机起飞，（塔维尼利亚份子和皮拉尔·加西亚）飞往新奥尔良或杰克森维尔。^① 逃跑的不仅是一些政客，还有象赌场老板梅耶尔·兰斯基这些人。巴蒂斯塔集团的重要分子一经逃脱，讯息立刻传到同他们关系良好的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电台，于是全世界都从那个中心得到了这项消息。

究竟巴蒂斯塔富到怎样的程度，自然不得而知。他那个在流亡中的新闻秘书兼一度是他那个党的青年领导人，在 1958 年估计巴蒂斯塔的财产为三亿美元，大部分在国外投资于瑞士、佛罗里达、纽约或墨西哥。^② 诚然他得自保护费的收入一定相当可观，虽然每月估计所得的一百二十八万元还要分给很多人。

于是，这时当了参谋长和在 1959 年 1 月 1 日有效地控制着古巴西部的坎蒂略，召集了一个军官会议，对他们讲出了这项消息，消息很快地传遍了哈瓦那，随即传遍了全国。欢欣鼓舞的群众涌上了依然一片漆黑的街头。彼德拉法官，偕同其他一些高等法院的法官和努涅斯·波图翁多、奎尔沃·鲁维奥和劳尔·德卡德纳斯这些社会名流，在总统府大声宣读了一项致军队的停战令，并号召卡斯特罗也照此办理。但是这个影子政府并没有获得任何支持。到了早晨，大混乱发生了，卡斯特罗或指导委员会的支持者开始身着制服出现街头，宣称他们要维持秩序，

① 后来美国不准巴蒂斯塔避难。

② 苏亚雷斯·努涅斯书，第 26 页。比较谨慎的估计是《每日邮报》，1969 年 12 月 11 日提出的：“四千多万美元”。

因为这时巴蒂斯塔集团的军警都已无影无踪，或者飞往国外(整个早晨飞机不断起飞)，或者进入外国大使馆，或者只好找个地方藏身。厉行巴蒂斯塔镇压政策的大多数首脑人物都已在清晨逃走了。正午前后，宣布飞机场封锁向外起飞，不过，到了这个时期，象海军情报局局长劳伦特或政治警察局的本图拉上校这些革命者要报仇雪恨的最大对象大多已经逃跑了。至于其他如哈辛托·梅诺卡尔这些人则已经自杀了，与此同时，兵营的守卫者卡西利亚斯上校在圣克拉腊一听到巴蒂斯塔逃跑的消息，火冒三丈。他和费尔南德斯·苏埃罗上校，在把指挥权交给他们的副手埃尔南德斯上校之后，急忙换了便装逃走。就在这时，在黎明后不久，格瓦拉派了一个三人和平代表团，要求对方投降。^①巴蒂斯塔的军队再一次要求和睦相处。埃尔南德斯上校请求休战。在讨论时，坎蒂略在哥伦比亚兵营打来了一个电话。和平代表团拒不承认坎蒂略为参谋长。于是，到了下午一点半钟的时候，他们宣布战争将于两点十五分重新开始。经过一番讨论后，巴蒂斯塔的军队在那个时刻以前在圣克拉腊无条件投降。这时，博尔东少校已经把卡西利亚斯上校生擒；后来由于他想逃跑(似乎是真的)被击毙了。圣克拉腊既已到手，卡斯特罗便命令格瓦拉向哈瓦那挺进。他本人在《中美洲电台》上听到巴蒂斯塔逃跑的消息后，又气又惊。他完全归咎于坎蒂略，于是下令总攻圣地亚哥。但是进攻是不

^① 努涅斯·梅内斯，罗德里格斯·德拉维加和著名的地理学家里奥斯中尉即努涅斯·希门尼斯博士，后者是在圣诞节前夕才投奔格瓦拉的。他是一部著名的古巴经济地理大纲的作者。

必要的。雷戈上校已决定投降（这两个人是通过巴蒂斯塔的一个部长进行书信往来的），并乘直升飞机飞往卡斯特罗的总部请降。卡斯特罗同雷戈的军官谈话，对他们说，巴蒂斯塔的军队的军官绝不是全都是刽子手，并劝大家或者参加他的部队，或者放下武器。两艘快速舰也投降了。圣地亚哥的司令官们似乎认为他们这种态度也许可以使得军队将免于瓦解，何况卡斯特罗还答应让雷戈上校当古巴陆军参谋长。

但是，这时，1956年政变的“自由派”军官的领袖巴尔金上校已经又在哈瓦那露面了，他是由卡里略上校用飞机从松树岛的监狱里送到这里的。^①他的释放似乎是全靠中央情报局稍嫌不够及时的介入，中央情报局在12月30日曾派一个人，在胡斯托·卡里略的支持下向典狱长出十万美元换取这个囚犯的释放。^②坎蒂略将军由于认识到不可能成立一个折衷的军政府，这时把指挥权交给了巴尔金，他自12月20日以来就一直同巴尔金有了接触。所以巴尔金自称为哈瓦那武装部队的首脑。他任命他在1956年的一些共谋者以类似的职位（博尔邦内特负责步兵第一师，巴雷拉负责拉卡瓦尼亚，比利亚法尼亚负责空军，安德烈斯·冈萨雷斯负责海军）。但是，因为他当时是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成员，所以他又同哈瓦那

① 不是胡斯托·卡里略，而是他的一个堂兄弟。

② 卡里略和中央情报局的交涉开始于12月初，最后取得的结果：不是采取他早些时候所计划的在松树岛进行更加惊人的武装政变。提供给典狱长的这笔款项，从卡里略手稿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手稿中还写了12月30日卡里略同中央情报局的威拉德·赫伯特·卡尔两人商议的情况。

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地下领袖保持着接触，他还逮捕了坎蒂略，并打电话给圣地亚哥的卡斯特罗，问乌鲁蒂亚什么时候担任国家元首。他就这样一方面隶属于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一方面毫不放弃搞一种中央政府的机会，照他说，街上正在发生抢劫行为。俱乐部遭到捣毁。马斯费雷尔的《古巴时代报》馆也被捣毁了。《警觉报》已被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接管。壳牌油公司的总办事处同样被捣毁——因为当时一般认为古巴壳牌公司总经理应对英国运来海神式飞机和坦克负责。一些停车计时器（因其利润都落入政府一小撮人的私囊而特别不得人心）和公共电话都被砸毁。本图拉和皮拉尔·加西亚的家宅被洗劫。哈瓦那其余的官员和原服务于巴蒂斯塔军队中的人们都在观望，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哈瓦那的老住户真弄不清楚会不会重演推翻马查多时的流血场面。但是，卡斯特罗从圣地亚哥发出紧急广播，呼吁人民不要随意搞私刑，并且由于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人和指导委员会都已进入各处警察局，这类暴行显然绝迹了。但是，卡斯特罗和共产党人所号召的总罢工却仍坚持下去——这确实是全国工人统一战线这个反巴蒂斯塔的工人战线的第一次成功，也是它的存在的第一个信号。

巴尔金上校在哥伦比亚兵营也许不能撇开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和卡斯特罗而独立存在，而且他似乎也不想认真这么做。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阿曼多·阿特和金廷·皮诺同他一起在哥伦比亚兵营。但是，巴尔金如果有这个意图的话，他倒未始不会把事情弄得卡斯特罗感到非常棘手。可是，他不久就发现，古巴的大部分地区都在起义

军的控制之中，他便在他的第一次声明中承认“解放军的英勇功绩”。而且，显然大出意料的是美国大使馆也一点没有劝说他继续掌握指挥大权。他在哥伦比亚兵营期间，只接到过史密斯大使的两个电话：第一次是为特鲁希略的驻古巴大使波菲里奥·鲁维罗萨要求一张安全通行证；第二个是要求保证以外国大使馆为避难所这一拉丁美洲的通常权利。^①

在1月1日至2日的夜间，决定性的军事大事发生了。

格瓦拉率同所部抵达哈瓦那，直趋拉卡瓦尼亚，并于清晨四点钟从巴莱拉上校手里接管了指挥权。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偕同维克多·博尔东和所部七百人进入哥伦比亚兵营，接管了巴尔金的指挥权，^②库维拉和乔蒙两少校代表指导委员会占领了总统府。在一个不那么公开宣传的军事行动中，这时突然以“少校”军衔出现的、来自埃斯坎布拉伊山的格瓦拉的助手、共产党员阿曼多·阿科斯塔，取得了哈瓦那港两边正对拉卡瓦尼亚的拉彭塔旧炮台的指挥权。与此同时，加拉加斯公约联盟的秘书米罗·卡多纳，1952年人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阿格拉蒙特，偕同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两个成员（利亚努萨和艾德·桑

① 巴尔金致梅耶尔函。有七十二个人得到了第二个电话的好处。其中包括诸如米格尔·安赫尔·坎帕，安塞尔莫·阿列格罗，圣地亚哥·雷伊，洛佩斯·卡斯特罗，瓜斯·因克兰，劳尔·梅诺卡尔，小卡洛斯·萨拉德里加斯，胡斯托·路易斯·波索，奥克塔维奥·蒙托罗，达马索·索戈和莱奥波尔多·皮奥·埃利萨尔德这些政客；象穆哈尔这些工会运动者；以及象卡尔维尼奥这一些刺客（参看名单，载《革命报》，1959年1月10日，第11页）。

② 1月3日《革命报》说大约四千人！

塔马里亚)从迈阿密飞来古巴,他们不是为了接管哈瓦那的权力,而是飞到马埃斯特腊山附近的一个飞机场。1月2日,指导委员会的哈瓦那成员和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追随者在街上巡逻,甚至史密斯大使也发出了违心的喝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依然握有非同小可的控制力。”没有放一枪,而且在这里,也象在其他地方一样,不久就看到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和巴蒂斯塔的士兵和睦相处了。

这时,卡斯特罗到达了圣地亚哥,接受该城投降,并于1月1日至2日的深夜时分,在一次对广大人群的讲话中,宣布圣地亚哥“这个自由的堡垒”将成为古巴的新首都。他宣称“人民已经选举”乌鲁蒂亚法官为临时总统;他谈到了即将到来的革命;还谈了一下他同坎蒂略和雷戈上校进行谈判的情况。他对那些不是“战犯”的军队成员,伸出了和平之手。在古巴全国各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地方部队(或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和大学生指导委员会的混合部队)都在忙于占领各行政大楼、警察局、广播电台、电话局、兵营以及地方工会大厦。巴蒂斯塔集团的官员家宅被洗劫事,到处都有所闻,但是没有大屠杀。鉴于美国在古巴革命发展中所起的照例心情矛盾的作用,颇有象征意义的是,一个在国内来历不明的出生于美国的威利·摩根少校,率领指导委员会部队占领了西恩富戈斯。^①

^① 古巴的国外大使馆也被接管:例如,在华盛顿,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代表,埃内斯特·贝古当和埃米略·帕尔多(公使)从巴蒂斯塔的前公使阿罗约手里接收过来。在这一天的晚些时候,前驻古巴大使阿瑟·加德纳打了一个电话,使阿罗约得以将私产和狗带走。特雷莎·卡苏素也在墨西哥进行了接管。全世界各地都发生相似情况,虽则在某些地方(例如德国),大使(阿道弗·卡瓦尔)立即参加了卡斯特罗运动。

1月2日，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曾经号召总罢工，作为旧政权结束的标志，在哈瓦那和大多数城市中，总罢工是相当圆满的。在哈瓦那，上年10月在共产党支持下好容易组织成立，这时设在共济会借给他们的办公室里的起义者工会全国工人统一战线，号召举行群众示威游行。戴维·萨尔瓦多从狱中出来，以总书记的身份领导了工会。所有工会中的起义者委员会都出来公开活动了。在中央公园举行了一次会议，有一连串的新、老工人领袖在会上讲话。^①一个跳木屐舞者在人群中唱道：

呀呀呀呀，你们已经赢得了战争，
现在还须赢得和平，
穷凶极恶的人，
必有报应。

^① 古巴工人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有无线电电视工人领袖维尔弗雷多·罗德里格斯；烹调工人工会中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成员但也是共产党员的阿尔弗雷多·兰卡尼奥；曾惨受巴蒂斯塔酷刑的、来自关塔那摩的铁路工人领袖奥克塔维奥·洛伊特；运输工人工会的一个大约自三十年代以来的共产党员何塞·米格尔·埃斯皮诺；也曾经发表过一篇“充满了革命概念和富有智慧的”演讲的指导委员会成员奥尔兰多·布兰科；因计划“火炬政策”而在1957年被捕的前革命党左派国会议员兼糖业工人领袖罗德里戈·洛明查尔；来自埃斯坎布拉伊山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成员赫苏斯·索托；和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总工会首脑戴维·萨尔瓦多（《革命报》，1959年1月3日）。这些以及其他一些人都自封为各委员会的成员，而这些委员会控制着旧古巴工人联合会所属的一切工会。1月5日号召罢工的命令是由利维奥·多明格斯，内斯托尔·皮内洛，安东尼奥·德尔加多，帕特里西奥·杜兰，阿尔弗雷多·兰卡尼奥，吉多·吉拉多，爱德华多·加西亚，纳尔西索·萨斯特雷，曼努埃尔·索拉温和卡尔门·玛尔塔·米利亚签署的。（《革命报》，1959年1月5日第2页。）

同巴蒂斯塔妥协的、以穆哈尔为首的旧古巴工人联合会的领袖们，已经躲藏起来了，穆哈尔本人躲在乌拉圭大使馆。在古巴工人统一战线大会上，发言者主要是谈论根除古巴工人联合会的腐化问题。

在随后的几天内，所有的工会都自行改换了新领袖。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和指导委员会的斗士以事实上的警察身份进行接管。支持过巴蒂斯塔的报馆都被占领。流亡者开始从迈阿密、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其他各地纷纷回国，其中包括左派革命分子和卡斯特罗的九岁的儿子。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受到款待；老帮会分子“外国佬”冈萨雷斯·卡塔斯径往拉卡瓦尼亚。哈瓦那还是有一些枪击事件，一个民兵被本图拉一个警察击毙。

但是，另一个无可避免的过程开始了。前巴蒂斯塔的士兵、警察、军官、执法人员、政客和官吏，都不时地被捕下狱候审。自共济会至西班牙流亡侨民团体、商会和甘蔗种植园主，所有这些不久前奉承过巴蒂斯塔的人们，都自称他们支持过革命。起义军的新部队陆续到达，其中有些是作为怠工者在哈瓦那或马坦萨斯坚持了数月之久的小组，例如圣希尼斯“少校”和帕内克“少校”。在这期间，指导委员会仍然控制着总统府，于是他们是否要让给乌鲁蒂亚，就开始成为一个问题了。这毕竟是他们在两年前攻打过的。现在他们认为就是他们的。他们的总书记福尔·乔蒙公开抱怨卡斯特罗没有得到其他革命团体的同意或建议就在圣地亚哥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被乌鲁蒂亚新任命为哈瓦那陆海空军武装部队首脑的西恩富戈斯在哥伦比亚虎视眈眈。

1月2日，以前秘密发行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报纸《革命报》公开问世了。这个报纸被认为是卡斯特罗的喉舌，虽则暂时不过是哈瓦那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喉舌。1月5日，它已经由卡洛斯·弗朗基从它的秘密董事手里接过来，卡洛斯·弗朗基是山区起义军电台的负责人，前共产党党员，自1955年以来就一直在报纸和广播方面帮助卡斯特罗。《革命报》在巴蒂斯塔逃跑之后的最初时期，就对各种事情定下了调子：在4日那一天，在卡斯特罗的一幅照片下面写着“古巴改革的英雄导师。愿上帝继续使他闪耀光辉”。整个《革命报》的篇幅，以及古巴全岛的电视、广播，立刻果然出现了一系列传奇式的、似乎比真人还要高大的英雄人物——“光荣的西恩富戈斯少校”；“举世无双的切”；“拉米里托”（拉米罗·巴尔德斯），所有这些人都是以他们的教名相称。这里显然至少是一个渴望英雄主义的国家。

卡斯特罗本人正在缓缓地前来哈瓦那，因为受到渴望一瞻风采的人群的欢迎而耽搁了行程。1月1日，他从圣地亚哥出发，但是，到了1月4日，他才到达卡马圭。在那里以及在奥尔金，他都发表了演讲。无疑他是有意识地让哈瓦那等待的，尽可能使那里的人们的激情持续下去，象在竞选旅行那样以争取全国其他各地的选票；也为了，正如他在卡马圭所解释的那样，他必须在他一路西去的途中“组织革命力量”——也就是说，任命许多人选。他让他的弟弟劳尔偕同一个二十四岁的文职助手卡洛斯·查因在奥连特省指挥一切。1月2日和5日，格拉拉和西恩富戈斯乘飞机去同卡斯特罗会商。卡斯特罗的

耽搁也有助于为西恩富戈斯增加一批群众。在哥伦比亚兵营有成千上万的人去看他本人，在哈瓦那电视上瞻仰他的人也有成千上万。这位游击队首领的随和的态度似乎使巴蒂斯塔的旧兵营破天荒第一次有了生气。西恩富戈斯把哥伦比亚兵营关在笼子里的鹦鹉都放出来了，对必然在场的新闻记者说，“鹦鹉也有自由的权利。”^①甚至史密斯大使也不得不代表旧政权的老朋友们去访问西恩富戈斯，他也发现他“虽是颇为冷淡却尚有礼貌”^②。带胡子的人出入于西恩富戈斯的办公室，步枪前摇后摆。格瓦拉在拉卡瓦尼亚，使人可望而不可即，听任西恩富戈斯登上报纸的头条大新闻，自己却在出谋划策，保持慎重的沉默。使哈瓦那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这位竟然成为起义战士的符号的西恩富戈斯，他的行动倒是无可指摘的。那些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大胡子，既不喝酒，又不抢劫，循规蹈矩，仿佛都是一些圣人。在哈瓦那，象这种行为的军队，倒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革命指导委员会依然离心离德。1月4日，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不得不正式要求指导委员会在乌鲁蒂亚到达前离开总统府。当时因为他们的总书记乔蒙不在，他们要求放宽一些时间。西恩富戈斯曾考虑以武力攻取总统府。乔蒙回来了，总统府终于交给乌鲁蒂亚（指导委员会向他三呼“总统万岁”），但是在1月6日，乔蒙不期而然地竟然在哈瓦那大学的著名的大石阶上，当着乌鲁蒂亚的面，对

① 《革命报》，1月5日。

② 史密斯：《第四层楼》，第202页。

一个人数众多的集会说，指导委员会自认为是鞠躬尽瘁了；团结已经使得革命和胜利属于每一个人，而不仅是属于某个集团；但是，指导委员会在政府中没有一席之地。指导委员会的前途问题尚有待于解决。他们甚至已开始集积和夺取武器。

1月8日，卡斯特罗终于到达哈瓦那。他已获得完全胜利。哈瓦那倾城出来欢呼。电视摄影机布满在进来的一路上。标语牌上写着：“谢谢菲德尔”。卡斯特罗那支包括有小轿车、吉普车、坦克车和辎重车的车队从东面缓缓进来，停在总统府的前面。卡斯特罗同乌鲁蒂亚总统谈了一下，还确实同来自迈阿密的普里奥和巴罗纳这些老手谈了一下。走在他的后面的武装人员和大胡子的人也受到了欢呼。卡斯特罗背着他那支带瞄准镜的著名步枪。他在总统府的阳台上对人群演讲。甚至二、三十年来目睹古巴政府多次更迭的菲利普斯也深受感动：“当我注视着卡斯特罗的时候，我体会到他这个人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他似乎在对他的听众撒一只催眠力量的网，使他们相信卡斯特罗本人关于政府功能和古巴命运的概念。”^①他批评那种要占有总统府的想法，不过“行政首脑总得有个地方”，目前既然没有钱去另盖一个总统府，“我们正在设法照顾到人民对这个建筑物的感情……但是，马埃斯特腊山的领袖是怀着什么感情进入总统府的呢？……这正同我进入古巴其他任何建筑物所怀有的感情一样。”后来，他要求群众让开一条路，让他进去，而

^① 鲁比·哈特·菲利普斯：《古巴，自相矛盾的岛国》（纽约，1959年），第406页。

不必由士兵来为他开路。他前往哥伦比亚兵营，沿途受到一群一看到他就欢欣若狂的群众的欢呼。他在这个要塞里发表了一篇比较长的演讲，并且让电视听众看到。

这并不完全是一篇兴高采烈的演讲：

我们显然已经赢得和平，但是，我们还不应该那么乐观。当人民今天放声大笑，心情愉快的时候，我们却全神贯注于……谁是“革命的敌人”……我们这些革命者……也许到头来会象过去很多革命者那样，拿着一支0.45口径的手枪荡来荡去，威吓人民。反马查多的革命的最糟的部分就是后来革命者结成帮伙四处游荡，彼此混战。

卡斯特罗多少暗示着大学生指导委员会（他们在两天前从哥伦比亚兵营拿走了武器）正在堕落成为这种帮伙之一。而且这也许就是这篇演讲的唯一正确的陈述。至于其余部分，则看上去仿佛就象是威廉·詹宁斯·布莱恩^①的再世。一个西班牙的布莱恩，一个年青、健壮、高大的无疑是军人的布莱恩，不过，只是就他对广大听众起催眠作用方面来说，是象一个布莱恩，另一方面，群众却再一次乐观地认为，何塞·马蒂已真的又出现了。当卡斯特罗开始讲话时，群众中有人放出了两只白鸽；其中有一只落在卡斯特罗的肩上：和平的象征和预兆。

^① 威廉·詹宁斯·布莱恩(1860—1925)，美国民主党领袖，曾三次被推选为总统候选人，1913年出任威尔逊总统当政时的国务卿，1915年由于对威尔逊起草的对德照会的强硬措词不满而辞职。——译者。

第十九章

胜利的源泉

发生了什么事情啦？是一篇英雄史诗吗？1956年年底在马埃斯特腊山区被搜索的这一帮人，两年以后，似乎都变成了一支军队，壮大得足以击败政府军，赶走暴君，解放全国人民了。这些起义者显然全是青年人，他们的领袖只有三十二岁，其他一些人中，有许多不过二十多岁，甚至还要年轻些，这是经过战争锻炼、以前从没有遭到过政治挫折的一代人。新的领导人（虽然并不是他们中最重要）有许多出身相当微贱。对于象古巴人这样易动感情、乐观慷慨的人民来说，卡斯特罗的夺取政权，以及重新进行独立战争、弥补马蒂和比那更早的塞斯佩德斯的失败的那种无疑是自觉的、而又不可抗拒的气概，使人感到由衷的庆幸和欣慰。南北美洲有不少人对艾森豪威尔时代那种即使往往颇有价值、看来却象一望无垠的大草原，已经生厌了。对他们来说，卡斯特罗的胜利也提供了一个传奇般的时刻，一片阳光，一个甚至早于马蒂的英雄时代——西班牙征服者时代^①——的回声。有几个星期，在艾森豪威尔的美国看来，卡斯特罗就是第一次世

^① 加拉加斯的《独立报》这样写道，“事实上，菲德尔·卡斯特罗以他的光荣的史诗，使我们时代不大熟悉的一种英雄主义的概念又恢复了”（引文见1959年1月26日《革命报》）。

界大战时期英国人心目中阿拉伯的劳伦斯。这种在国内和国际间的声望，使卡斯特罗从胜利的时刻起，便不理睬他的盟友，忘却了“加拉加斯公约”，并且让人以为是他独自打赢这场战争的。

卡斯特罗对古巴人的控制，在巴蒂斯塔逃跑后没有几天便确立起来了，所以，尽管在1月1日以前他只有少数追随者，但在几星期内，便有成千上万的人相信他是不会做什么坏事的。他们是他们的解放者，不仅是把他们从巴蒂斯塔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且是把他们从以往的一切祸害中解放出来。在这场斗争中牺牲了的人们的母亲，成群结队去见他。往往经过多年的斗争与失望之后，为了种种理由，人们总会决定把他们集体的意志力交到一个人的手里。自从马蒂逝世以后，古巴人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人。现在，他们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这并不是加勒比海的波拿巴主义。它倒很象几年以前那么许多人对克拉贝利托——凭嗓音来治病的那个离奇的电台广播员——的那种信心：古巴是一个政治、魔术和宗教在那里相互毗邻，往往疆界不分的国家。同时，“胜利”给整个社会注入了古巴以前从来未曾有过的一种公共道德的精神。以前，古巴人是没有什么可相信的。在比较稳定的国家里，风俗习惯对个人的野心和群众感情激动时的期望起着约束的作用，而在古巴，无论在现代的工业社会中或是在以前的奴隶社会中，却几乎从来不存在这种情况。

关于卡斯特罗运动的这些意见，有不少是很有根据的：卡斯特罗和他的部下人数始终不多；他们却很勇敢。

大多数人都有团体观念。他们在众寡悬殊的劣势下取得了胜利。有许多同志被打死或是遭到残暴的迫害。虽然许多人都认为自己过着史诗般的生活，但是自觉往往才是真正英雄的标志。在应受荣誉的地方就授予荣誉吧。不过，巴蒂斯塔的失败则不只是由于军队在战场上打败了，或是由于卡斯特罗起义军的功勋。的确，内战中发生过激烈战斗的，也不过是圣克拉腊的那几仗和1958年夏天导致政府军进攻失败的那几仗。然而，即使这几次战斗，规模也很小——在圣克拉腊，格瓦拉的军队中有六名兵士阵亡，在1958年导致巴蒂斯塔进攻失败的那几仗中有四十名阵亡。这样缺少阵地战本来就是游击战的特征，可是事实上，连进行游击战的次数也是很少的。作战的规模也远比，例如马来亚的战斗为小，尽管巴蒂斯塔的空军在1958年下半年曾经试图炸毁起义军据有的象萨瓜德塔纳莫那样的城镇。卡斯特罗以游击队领袖的身份谋求土地时，他的行动就象一个政治家在谋求影响舆论那样。古巴的内战实际上是专制政体下的一场政治运动，只不过运动的领袖有武装人员保护着。他所关心的第一件事是，在一片难以制服的土地上站住脚；这一件事他办到了，虽然直到1958年年初，他好不容易才做到了这一点。^①同时，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巧妙地利用外

^① 雷吉斯·德布雷在《革命的革命？》（巴黎，1967年）中所确定的一点；这一点象前文所说的那样，是经由卡斯特罗过目而且显然修改过的：“经过十七个月连续不断的战斗之后，起义军于1958年4月终于在马埃斯特腊山的中心建立了一个游击基地。”（第64页）

国报刊——在1957年6、7月以前，没有一个古巴记者到过马埃斯特腊山^①——他在南北美洲（不过特别是在北美洲）同在本国国内一样，为自己树立起了名声。1959年1月，格瓦拉说，“那时，对我们说来，一个外国记者（最好是一个美国记者）的到来，比一次军事胜利还更重要。”^②因此，到了1957年年初，卡斯特罗就成为一面反抗的旗帜，成了国内其余地方和逃亡海外，甚至远方的反对者可以重新集结起来的一个依据目标。

这里，巴蒂斯塔帮了卡斯特罗的忙，尽管那些使他垮台的力量（军队中的分裂和玩弄权术）在1952年也的确使他取得了政权。自从1933年的军曹起义以后，古巴的军警——在士官一级上，这两支部队是紧密地连在一起的——由于政治上的分裂，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以塔维尼利亚为首的巴蒂斯塔那群党羽，1933年9月4日的那帮人，在革命党执政时期大多数被解除了兵权，1952年竟然全回来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弟和其他党羽把全部兵权都抓到了手里。不仅是革命党的军官们（对任何武装部队来说，都并不是一个损失），^③连年纪较轻的职业军人，没有政党关系的专业人员，都被排挤在一旁；甚至

① 最早去的是新闻影片《古巴新闻》的爱德华多·埃尔南德斯和《波希米亚》周刊的阿古斯丁·阿列斯（参看《革命报》，1959年1月14日）。

② 1959年1月27日，格瓦拉对“我们的时代协会”发表的谈话，见《革命文献，1959—1967》（1968年），第25页。

③ 他们被巴蒂斯塔的早期伙伴顶替后，毫无怨言，而且几乎没留形迹地从军事或政治生活中消失了（例如，参看《波希米亚》周刊1952年8月3日，高级军官的名单）。没有一个人再在政治中起过任何较为重要的作用，或者为人所知。

连 1952 年拥护巴蒂斯塔的人，两年后也分裂开来；例如，那些坦克部队，他们不管是否赞成巴蒂斯塔，都想建立一种军事独裁的政权，也许类似多米尼加共和国那样的；巴蒂斯塔政权里还有几个警务人员，象卡拉塔拉或是本图拉，他们由于城市中武装内战的性质，不是名义上就是事实上成了司令官。下级军官们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怨恨，尤其是想到高级军官俱乐部里去而又进不得去的那些人。

假如晋级公然出自徇私舞弊，那么军官中的纪律便很差。假如军官不守纪律，那么兵士的纪律便更差。巴蒂斯塔的军士们以过度的热情和凶残去讨好司令官们，因为他们根据经验知道，讨好这些军官总有效果。兵士们的懦弱行动有时反使他们晋升到了伍长、军曹。军官们把兵权仅仅看作是使用威胁方法发财致富的手段。军队已经腐败，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愈变愈糟；同时，奥连特省实际发生的事情和政府就它所宣布的情况，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增大。巴蒂斯塔的警察和武装部队的官员全把空闲时间消磨在俱乐部或是夜总会里，勒索保护钱和接受贿赂来发财致富。还有，象在巴蒂斯塔当权初期一样，军队是最受宠爱的部门。军人们的新营房、新俱乐部、军官们的新住宅、新军用医院，经常建造起来。在前后两个时期里，^① 军人们还承担了通常是由公共工程部、卫生部、教育部、劳动部和内务部经办的许多工作；军队

^① 指 1940—1944 年巴蒂斯塔任总统时期和 1952—1958 年巴蒂斯塔发动政变，再次夺取政权，成立独裁政权时期。——译者

虽然腐败，却渗透到了各部门。然而，普通兵士的待遇则很低；每月仅仅领到三十元，所以到1958年下半年，几乎不可能招募到新兵了。

在反击卡斯特罗的战争中，巴蒂斯塔方面的伤亡人数大概不过三百人。^①但是，好几个军官（比利亚法尼亚，冈萨雷斯·菲纳莱斯，乌维内奥·莱昂，克维多，奥肯多，杜兰·巴蒂斯塔，布劳略·科罗努）在1958年下半年全都投诚了卡斯特罗。武装部队中往往有暗中支持卡斯特罗的人，特别是海军，虽然在西恩富戈斯的那次起义后，谋反者多少有所畏惧。担任巴蒂斯塔军事情报工作副手的一个军官，就是卡斯特罗的一名间谍。到1958年下半年，下级军官对长官们幻想的破灭普遍蔓延开来。军队的配备也不够精良：炮兵用的大炮是施奈德斯制造的保卫凡尔登的那种；沿海炮台大炮是奥多涅斯制造的古西班牙式的；步枪往往是1903年型的。

卡斯特罗在这场斗争中的任务是，在古巴造成一个内战的局面，使巴蒂斯塔政权变得同军队公然形成一体，然后再迫使被推到这么显著的地位上来的这支军队，通过自身的弱点、倾轧、猜忌和过失来瓦解毁灭自己。这件事他做到了，同时还迫使古巴人不能不恨巴蒂斯塔，象一个古巴心理学家有一次评论的那样；这无疑是以更明白的方式表达了，格瓦拉随后在他的论游击战的手册里所说的，“你不必等待一个革命局面的到来：这个局面是可

^① 卡里略上校于1959年对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说，他在十四个月中的伤亡人数是两百至三百人（见《共产主义的威胁》，第361页）。

以被创造出来的。”^①

在美国实行禁运武器之后，巴蒂斯塔军队里的士气进一步低落下去。以前，巴蒂斯塔还可以用成百种琐细的方法来表示，倘使有必要的話，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武装力量可以成为他的后盾。这种印象通过美国陆海军将领和政治家们的访问，通过报纸上常常刊登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军官们和巴蒂斯塔或是塔维尼利亚一起照的照片，而精心地制造出来。巴蒂斯塔的美国新闻顾问爱德华·切斯特保证使这种印象广泛地流传。在禁运武器之后，这个政权自尊自大的一根支柱倒掉了；政府的沮丧传到了军队里。1958年，经过长时间盼望之后，设置了一个参谋长和总司令部，这时候，士气受到进一步的打击。这个最高司令权竟然授给了名誉扫地的塔维尼利亚将军，同时还提升了一大批不得人心、名誉扫地的其他军官；等到埋怨变得无法制止后，巴蒂斯塔只好集体提升所有的军官。^②最后，巴蒂斯塔自己的怠惰软弱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损害了士气：总统应该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却在打“五千分”；象他的新闻秘书在流亡国外后所说的那样，“‘五千分’是非德尔·卡斯特罗最大的一个盟友。”^③撇开士气的问题不谈，巴蒂斯塔还花了不少时间去处理他的许多私事，他的国外财产和财产的处理问题，这使他简直没有什么时间来处理国家大事。塔维尼利亚也是如

① 见格瓦拉：《游击战》（莫里译，纽约，1961年），第111页。

② 巴雷拉·佩雷斯上校的文章，《自由波希米亚》，1961年9月3日。

③ 见苏亚雷斯·努涅斯书，第11页。

此：胡利奥·洛沃说，当塔维尼利亚把他的兵士在皮隆制糖厂驻扎下来时，他为了塔维尼利亚的个人利益，就得送出三份发货单去要糖厂仓库供应商品。

卡斯特罗的方针是继续不忙于作战，而是保持实力，使自己存在下去，偶尔通过对一处慎重选定的哨所发动一次筹划周密、大肆宣传的袭击，来提高城市中和他自己的部下的士气。军队要同这个神出鬼没的敌人作战，唯一的方法就是象前文所说的那样，建立一种苦心经营的防御体系，如同英国人在马来亚建造的那样。巴蒂斯塔却做不到这件事；的确，任何正规军，不论传统的军纪多么差，跟卡斯特罗所部那样一小队人对比起来，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卡斯特罗军队人数少这一点是有利的。1958年盛夏，当巴蒂斯塔终于不得不承认，对他的挑战十分严重，而在向马埃斯特腊山大举进攻时，他那支相当大的部队的斗志是很低的。很多兵士被留下来保卫制糖厂。军官们显得只对残杀农民感觉兴趣。各个纵队没有能同其他的纵队互通消息，听任自己被卡斯特罗各个击破。古巴军队毕竟毫无作战经验，因此也毫无作战传统；独立战争全是在军队建立以前由非职业军人打的。没有任何团队建立过什么战功，没有任何团队缴获过可以悬挂在团队小教堂里的军旗。此外，1957—1958年的军队大都没有受过丛林战或是游击战的训练，而卡斯特罗的宣传——关于他的作战方法和他的政治目的——却对士兵们非常有号召力。

格瓦拉和西恩富戈斯把战争进行到拉斯维利亚斯省；1958年，革命指导委员会在类似于前一年卡斯特罗

在马埃斯特腊山所处的那种情况下，在那里一直坚持下来，尽管领导人没有那么吸引人，没有那么有才能。还有托雷斯所领导的那队共产党人，维克托·博尔东领导下的一个独立的七月二十六日团体和“埃斯卡布拉伊第二战线”的那支半土匪式的队伍。这些人在1958年10月格瓦拉和西恩富戈斯到达前，并没有什么作为——虽然几乎就同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腊山头六个月的情况一样。新来的人改变了拉斯维利亚斯省的局面，诚然还改变了战争的局面。格瓦拉的领导能力竟然丝毫不比卡斯特罗本人逊色，虽然他的分析能力较强，但直觉力较差。此外，他的来到拉斯维利亚斯省，正同共产党加入革命事业巧合：这意味着，已经拿起武器的拉斯维利亚斯省的共产党人，准备给他以全力支持。也许，他们本来会支持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任何领袖的——例如，他们支持过西恩富戈斯（他不大有什么政治思想）就同他们支持格瓦拉一样——但是格瓦拉的政治倾向至少助长了有效的合作。到了1958年12月，拉斯维利亚斯省已是革命汹涌，势将威胁到奥连特省的交通，全岛有被截成两段的可能了。到12月中旬，格瓦拉便发动了他那辉煌的最后战役。

1958年年底，起义军是一支至多只有三千人左右的杂牌军，内中有许多还是随军的非武装人员。1958年6、7月，只有三百人拿起武器在反对巴蒂斯塔，而在12月初，大概也只是一千五百到两千人，所以在年底投入战斗的人，大都是新近增补的。也许有二百名不是古巴本地人（北美或南美的人）；每二十个人中大概有一个妇女。除了后来著名的娘子军外，妇女都是非战斗人员，而娘子

军营的伤亡人数也只有一个——有一个姑娘负伤。^① 这些数字包括拉斯维利亚斯省西恩富戈斯、格瓦拉和革命指导委员会领导下的那些人。年纪最轻的军官恩里克·阿塞维多，只有十六岁。

1958年下半年，基层单位是由一名中尉率领着的四十人组成的排；这些排通常再合组成连，由上尉统率着。并没有正式的军士，尽管有些普通士兵被指派了负责的职位。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军官。军衔最高的指挥员是少校；1958年年底，少校大约有四十名。没有一名是领饷的。

1958年，起义军通常是完全供应膳食——通常总是米饭配上点牛肉；他们有着比1957年好得多的衣服、鞋和毯子。使用的武器大概有85%是缴获的；诚然，在1958年4月以前，从城市里运送到山区去的武器，数量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在攻打总统府失败后运到了一大批，还有一批是3月里从墨西哥空运进来的。虽然卡斯特罗本人经常坚持说，城市应该把武器优先运送到山区去，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到1958年下半年，起义军才有了几十

^① 1958年12月的第三星期中，卡斯特罗对美国记者迪基·查佩尔所举的数字（见奥桑加书，第327页）；我一直就遵照着它，尽管有些和这相反的意见：例如，西恩富戈斯对《革命报》（1959年1月8日）记者说，他率领着大约七千人到达哈瓦那（同上，1959年1月13日）。鲍里斯·戈登堡（见《古巴革命与拉丁美洲》（伦敦，1965年），第162页）说，1959年2月他被告知，卡斯特罗在12月有八百零三名“公认的”士兵。在哈瓦那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中并在山区显赫一时的哈维尔·帕索斯提到，当巴蒂斯塔逃跑的时候，有“两千名配备精良的起义军”（《剑桥舆论》，1963年2月）。这也是卡罗尔所举的数字（《掌权的游击战士》，巴黎1970年第167页脚注①）。

辆吉普车(全部是缴获的)和几辆卡车。

战争结束时，起义军里大概有一半人是马埃斯特腊山区的占据公地者和咖啡或是甘蔗种植园的雇工。其他的人大都是某种城镇工人，但也有些是来自古巴其他地方的农业工人。^① 1958年参加卡斯特罗部队的人，大多在马埃斯特腊山某一偏远的地方接受过某种基本训练。大家都知道，要是被俘获了，他们大概会遭到杀害、拷打或是两者兼备。这种恐惧心理使他们在巴蒂斯塔继续掌权时不敢回家。领袖们是起着典范作用的。例如，格瓦拉和卡斯特罗一样，都被认为在战斗中身先士卒，抢救伤员在先，牺牲在先。司令员们的进步观点对军纪也有所帮助，例如，有个天主教徒伊斯雷尔·佩雷斯·里奥斯就说格瓦拉是一个“杰出的人，一个世界性的人物；他的思想里是那么富有人性；尽管有人说他坏话，攻击他的为人……我却可以向你们保证，他的思想是来自一个宽厚的心胸的。”人们对西恩富戈斯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不是一位首长，是一位朋友，是我们大家的一位指路人；对士兵来说，他是父亲，教导大家，亲切而诚恳地对待我们并教我们要有人性；他甚至坚持应该先让俘虏们吃饭。”^②

总司令(1959年1月1日，他自己以这个名义签署文件)当然是菲德尔·卡斯特罗。他的主要副手是格瓦拉(在拉斯维利亚斯省负责指挥)和以克里斯塔尔山为根

^① 例如，乌尼维索·桑切斯·罗宾·布莱克本在《古巴革命的序幕》(《新左派评论》，1963年10月)一文中估计有75%是农民。

^② 见《革命报》1959年1月7日刊载的这些人的回忆录。

据地(“弗兰克·派斯第二战线”)在奥连特省北海岸负责指挥的劳尔·卡斯特罗。拉斯维利亚斯省北部安东尼奥·马塞奥纵队的司令员卡米洛·西恩富戈斯,也具有同等的地位;第三战线(东部)——也就是关塔那摩地区——的司令员黑白混血种人胡安·阿尔梅达也是如此。所有这些人,包括卡斯特罗在内,全有着少校的军衔。

到1958年下半年,起义军已经不只是一支战斗部队了。它包括管理奥连特省解放区的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一个秘书处,在几处不同的地方还设有分处,下面更分成主管司法、卫生、教育、甚至工业的各部门。战争结束时,主持行政机构(总部设在拉普拉塔)全部工作的是“格拉玛号”上的那个医科学生福斯蒂诺·佩雷斯;在4月那场罢工失败之前,他是哈瓦那七月二十六日地下运动的司令员,后来便到马埃斯特腊山区来了。行政部门的秘书长是在哈瓦那指挥民众进行抵抗的那位建筑师的胞弟雷内·拉伊。司法部则是由温贝托·索里·马林博士主管。他跟佩雷斯和拉伊一样,也曾经在哈瓦那从事过地下工作,以前还是一个革命党人。主管卫生部的是曼萨尼略来的一位医生,雷内·巴列霍博士;主管教育部的是罗多尔福·费尔南德斯;主管工业及修理部的是何塞·佩隆;而主管人事的则是一位工程师豪尔赫·里瓦斯。事实上,就行政机构、人员总数和种种不同的活动来看,起义军正愈来愈象一支正规军,结果,无疑将不得不按正规方式进行作战。

但是,除奥连特省和拉斯维利亚斯省的战争外,还有城镇居民的抵抗运动。这些男女受到的镇压最为凶残。不

论内战中实际打死了多少人，城市里的男女和青年人却占去了一千五百到二千左右的死伤人数中的极大部分。^① 公民抵抗运动的意义不可能说不是很大的。当然，倘使没有卡斯特罗出现在山区，那么这种抵抗运动也不会展开。而公民抵抗运动单独当然也不可能迫使巴蒂斯

① 数目很不易估计。1957年下半年，参议员孔拉多·罗德里格斯提到有三百人被击毙；卡斯特罗迅速反驳说有五千人。1958年8月，卡斯特罗说，有六千多人被打死了。1958年下半年的某一个时候，格劳·圣马丁说，有两万人被打死了。这个数目被《纽约时报》记者加以引用。但是巴蒂斯塔却认为这是大肆夸张而加以否认。然而两万人这个数目却保持下来，后来被广泛地加以引用。这些估计中有哪一个不仅是一种猜测，这是深可怀疑的。唯一的一份死亡人数表出现在1959年1月11日的《波希米亚》周刊上，后来又出现在随后的几期上，合计起来如下：

起义军	429
巴蒂斯塔分子	153
在小战斗中被政府方面打死的	18
在小战斗中被起义军打死的	85
在小战斗中不知被哪一方打死的	24
恐怖分子的炸弹炸死的	25
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处决了的(间谍等)	12
	<u>746</u>
1953年7月在圣地亚哥被打死的平民	48
1957年3月攻打总统府	30
西恩富戈斯的海军起义	62
1956年戈伊库里亚兵营	12
	<u>152</u>
总 计	898

我直觉地认为，这些数字大体上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它们必然忽略了军队在奥连特省所杀害的许多农民——这大概会把总数至少再提高好几百。确切的数字大概是永远无法获得的，但是认为在1952年和1958年间有两千多名古巴人直接由于古巴的政治危机和内战而死亡，这是难以置信的。虽然如此，两万人这个数目在巴蒂斯塔逃跑后的那些日子里却被加以引用。《革命报》在1月2日提到“上百位英雄和好几万死者”。参看拉索：《插进心脏的匕首》，第124—125页。

塔逃跑，不过他们的勇气和不断的活动在政府本可以藐视呆在山区里的卡斯特罗时，却牵制住了军警并使政府意志沮丧。格瓦拉和其他革命人士后来非常轻视平原上的这些游击战；这却是一点也不公正和恰当的，尽管平原上的领袖们有许多后来在政治上全变得湮没无闻。^①

然而，卡斯特罗的出现在山区，却促成了反对巴蒂斯塔的所有其他官方团体的分崩离析。巴蒂斯塔本人在1952年彻底捣毁了古巴的旧政治制度。正如同共和国早期的“制度”是被它的奠基人之一马查多将军摧毁了一样，1933年革命后新建立的“制度”则是被1933年出色的革命家巴蒂斯塔于1952年摧毁了，虽然革命党没有能实现该制度所提出的保证，却促使它象巴蒂斯塔的军队一样，自身走向死亡。

1956—1958年的内战使古巴全国两极分化：到了1958年12月，这场斗争倒象是巴蒂斯塔和卡斯特罗两人之间的一场决斗了。革命党人象格劳、普里奥和巴罗纳；人民党人象奥乔亚、阿格拉蒙特、比斯维和马克斯·斯特林；ABC党的老领袖萨拉德里加斯或是马丁内斯·萨恩斯，所有这些人被撇在一边。较老的政党的政客们，例如，不论怎样替巴蒂斯塔效过劳的自由党党员们（自由党是共和国初期的第一个政党），至少也毁掉了。这种毁

^① 参看格瓦拉的《游击战》。德布雷的评论，是基于南美的前途来考虑这些经验的价值。其他地方，象亚丁、塞浦路斯、爱尔兰和欧洲抵抗运动等的经验将显示出，城市游击战既可以从城市里很有效地加以指挥，又可以成为促使起义针对着的官方当局遭到失败的决定原因。1967年，当卡斯特罗鼓动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和北美的黑人摧毁美国城市的心脏时，他似乎也同意了这种议论。

灭牵连到过去二十五年里替古巴，还替他们自己，效劳出力的许多政客。（从1952年到1959年做过国家银行行长的马丁内斯·萨恩斯，不久便跟埃内斯托·萨拉德里加斯博士和不明智地在古巴留下来的巴蒂斯塔时代的其他政客，例如埃内斯托·德拉费或是埃梅特里奥·桑托维利亚，一起被捕了。）总而言之，过去这些年里，巴蒂斯塔已完成了由政治腐败、土匪行径、大批失业和经济萧条所发端的工作：“古巴人民对统治他们的那些人早已完全失去了信心，可是由于他们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所以并没有听任自己去过呆板单调的生活，而是在内心里保持着巨大的潜在信心与希望，这种信心与希望后来都被卡斯特罗发动起来了。”^①

象对军队一样，卡斯特罗只要莫测高深、超然不屈的待在监狱或山区里，听任那些老政党自相残杀就行了。有些革命党人声誉扫地，倒不仅是因为他们自己当权时期所留给人们的恶劣回忆，而是因为他们作为立法机关中占有席位的官方反对党的成员，或是作为1954年或1958年选举中反对党的候选人而多少同巴蒂斯塔合作过。格劳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确，1月里眼看便将列名于被清洗的大学教授的名单里——他那时还保持着医学院教授的职位。其他的人由于私人的争吵，也声望低落。普里奥是被巴蒂斯塔废黜了的总统，但是他并没有采取行动来重新取得政权，来提名自己为合法的总统，别人也

^① 费利佩·帕索斯在圣胡安(波多黎各)对里昂俱乐部的讲话，1961年3月29日。

没有一个代他提出这项计划来。1月4日，他发表了一项宣言，在“这个民主和自由的新时代”^①里向新的革命政府和革命本身致敬。他根本不支持那种想法：认为战争是由他在里面也起了作用的一个联盟所打赢的。

人民党人也激烈而致命地相互争吵。1952年，只有一个由埃迪·奇瓦斯的助手阿格拉蒙特松弛地领导着的人民党。到了1959年，至少还有四个这样的党派。虽然他们的分裂削弱了老的政治党，他们在反巴蒂斯塔的战斗中没有能从军事方面起任何作用也削弱了他们。

诚然，在那次攻打总统府中，在西恩富戈斯的海军起义中，当然还在普里奥所发动的几次攻击（例如坎迪多·冈萨雷斯对北海岸的那次攻击）中，都有革命党人参加在内。但是，领袖们还是没有牵连进去。普里奥曾经把一支又一支远征队派到古巴去送死，而他自己却太太平平地待在迈阿密；攻打总统府时牺牲的前革命党参议员梅内拉奥·莫拉，在那次攻击前便跟普里奥断绝了关系；而参加反巴蒂斯塔战斗的人民党人则明白地集结到卡斯特罗的运动中来。费利佩·帕索斯和劳尔·奇瓦斯就此成了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成员，奇瓦斯如今是一位“少校”，还蓄起了胡子。阿格拉蒙特就这样在第一届革命政府中成为外交部长，比斯维成为驻美大使。

即使革命党人和老政党中的其他人士没有加入巴蒂斯塔的政权，他们也还是声名狼藉。他们这些人象这个国家本身一样，已经适应于旧古巴的混乱、反常和持久的

① 《革命报》，1959年1月5日。

政治危机。他们中有许多人根据山区的那道法令(那道法令至今仍具有法律的效力)全被排除在外,不能参加将来的任何一届政府,因为那道法令规定,凡是参加过巴蒂斯塔的任何一次选举的人,三十年内不得担任公职。战争的确不仅摧毁了政府,它还摧毁了这个政府之前的那套制度;没有人再听说到“加拉加斯公约”或是战时的其他协定了。1958年,卡斯特罗提出的口号中,有一句要求展开一场反对“(1952年)3月10日而不回到9日去”的斗争;这句口号我们往后即将看到,是获得很多人支持的。

第二十章

1959年：卡斯特罗与南北美洲

胜利者是什么样的人或者是谁呢？卡斯特罗的周围当然有些很有势力的人。那些曾经跟他一起经历过山区斗争的人，都是他所听信的。然而，这些声音并不是和谐一致的。有些人，象胡安·阿尔梅达手下的那些人，皮隆来的那个医生的女儿塞莉亚·桑切斯手下的那些人，或是新的警察总监埃菲赫尼奥·阿梅赫拉斯，就把他看作是一位领袖而对他效忠输诚，并且大概会奉行他所决定的任何政策。其他的人则各有自己的见解：劳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肯定会提出极端的、虽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见解，而是认为古巴的抉择在于两个极端之间：或者容许北美化的资产阶级（人民党以前的领导人入大都可以归入这一阶级）破坏社会革命的前途，或者建立起一个无产阶级的独裁政权来。这一抉择也许在卡斯特罗执政的初期，就摆在他面前了；材料表明，在当时那些雄辩的词藻后面，他正在冷静地试图决定朝哪个方向走：第一种方式将带来众所周知的舒适生活和可能的精神上的腐败堕落，第二种方式却包含着捉摸不定的危险。甚至在明确的意识形态问题上，就政治家而言，这样明确的决定通常也是深思熟虑的大事。然而，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作为最卓越的司令员，一直是对卡斯特

罗具有很大的影响的。他们那种富有诱惑力的意见既不会得到非共产党人士，也不会得到反共人士的考虑。但是，格瓦拉的意见甚至在1959年也说得很含糊。他不是一个人，而且从来不是一个党员。^① 1964年，有人问他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时，他是否就已经预见到，古巴革命会象后来那样采取那么激进的方针。格瓦拉回答说，

我直觉地感觉到了。当然，革命的方向和革命这种十分激烈的发展，是不可能预先见到的。马列主义的方式也是不能预先见到的……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影响着同我们一起战斗的农民们的问题；也看到了工人们生活中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多少有了一种模糊的概念。^②

稍早一点，他曾经解释说，“我们只是一群有着崇高理想而没有什么准备的战士……我们得改变这些结构；于是我们便毫无计划地着手改变起来。”^③ 一个待在山区的西班牙新闻记者无意中听到卡斯特罗在责备劳尔·卡斯特罗跟格瓦拉通信，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后者“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论点。”^④

关于卡斯特罗在1958—1959年的观点，格瓦拉在1964年回答说：

① 见本书《卡斯特罗在墨西哥》一章。1月初，他再次明确否认他是一个共产党员（《革命报》1959年1月6日）。

② 利萨·霍华德，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视访问（实际访问是在2月间），1964年3月22日。

③ 1963年7月13日在阿尔及尔的讲话（《今日报》1963年7月16日）。

④ 恩里克·梅内塞斯：《菲德尔·卡斯特罗，执政七年》（马德里，1966年），第62页。

我早就知道他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不过我认为我也知道他会成为共产党人，就象我当时知道我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不过我也知道我在短时期内会成为共产党人，而且革命的发展将使我们大家走向马列主义。我可不能说它是一种清楚明确的认识，而是一种直觉，是仔细地估计了美国态度的发展……和（美国）当时……为支持巴蒂斯塔所采取的那种行动……的结果。^①

一个往往很率直的政治家所说的这番含糊的话，大概可以尽量使人理解1959年1月1日前后格瓦拉的心情。但是到那个月底，格瓦拉在对我们的时代协会——哈瓦那一个知识分子团体，有部分成员是共产党人——所作的一次讲话中，提出了他后来发展成为一套相当连贯的哲学的大部分意见：他说明了山区里的起义军怎样出于农民的需要，而改变了土地改革的计划；山区里的经验怎样证明，“一小群意志坚决的人”可以战胜一支正规军，这又怎样给拉丁美洲其余各国提供了一个榜样，因为拉丁美洲的其他人民也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寻求自身的解放；起义军从此以后将怎样成为改革古巴社会的主要动力（“我们的第一斗争工具……古巴人民的先锋队”）；以及全体古巴人民最后应该怎样把自己变为一支游击大军。这些思想不象格瓦拉后来惯常的那样武断地提了出来；他还回想起，宪法规定要实行土地改革，暗示革命的目的在这方面至少应该是实行宪法的条文。虽然如此，我们必须

^① 利萨·霍华德，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视访问，1964年3月22日。

假定，在他们的多次谈话中，格瓦拉对卡斯特罗所说的，大概就是以比较坦率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这种思想。但是，格瓦拉在这一阶段所想象的土地改革，似乎原则上并不是集体主义的，而依然是根据从前那种分大庄园的旧想法，同时实行一种可以鼓励国内广大市场的、体现某种关税政策的形式。

至于劳尔·卡斯特罗，他以前倒确实是一个共青团员，但是他一直不是一个正统派；他与其说受了党内朋友的影响，不如说是受了他哥哥的影响；此外，由于他现在已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大权，他并不希望同别人分享这个权力。他显然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但并不一定是一个屈从于党的任何路线的人。他跟格瓦拉在马克思主义的细节方面具有明显的分歧，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起义军中在军阶和声誉方面可以同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相比的唯一司令员，就是西恩富戈斯；的确，西恩富戈斯（他父亲是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以他那开朗愉快的态度和热情的微笑，一度大有希望可以变得几乎同卡斯特罗一样深得人心。卡斯特罗后来称他是“一个心地纯洁的革命者，具有共产党人的素质……这从他的书籍、著作，以及他信里所表现的单一精神中就可以看到；在那些信里，他提到在拉斯维利亚斯省遇见费利克斯·托里斯（亚瓜哈伊的那个共产党人）的情况”。^①然而，大多数人都有不同的看法：“肯定是反共的，不只是中立

^① 《革命文献》，1962年，第10期，第22页（1962年3月26日）。

的”；^①“一个孩子般的人，老是在玩枪玩炮”。^②不过西恩富戈斯对卡斯特罗的影响，却是微不足道的；卡斯特罗后来说，由于他“政治水平低”，^③他本来会被免去司令员职务的。西恩富戈斯在战争的最后三个月才显露头角；他在拉斯维利亚斯省作战，远不及格瓦拉。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则是较为亲密的同志，不过我们有必要想到六年以后格瓦拉离开古巴时，他所作的这段措词含糊的评论：“我的唯一严重的缺点是，未能在到达马埃斯特腊山的最初时刻就很信任你，未能迅速地理解你作为领袖和革命者的品质。”^④我们还应该想到劳尔·卡斯特罗几乎从1958年3月以后便离开了山区卡斯特罗的身边，而格瓦拉在九月里也离开了。还有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说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成员中最反共的人（例如，哈瓦那的前共产党员弗朗基、全国协调员马塞洛·费尔南德斯或是福斯蒂诺·佩雷斯）也是反美的；他们敌视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保守的、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化的，而且对北方的大国也批判得不够有力。

卡斯特罗作为起义军领袖的号召力，由于他的口才

① 哈维尔·帕索斯提供的材料。

② 劳尔·奇瓦斯的证词；鲁福·洛佩斯·弗雷斯克特：《跟随卡斯特罗十四个月》（纽约，1966年），第58页认为，他“心地愉快、无忧无虑、喜欢冒险”。其他的人指出，西恩富戈斯很受他胞兄奥斯马尼的影响：奥斯马尼后来在古巴共产党执政时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在墨西哥便已经同古巴共产党取得了联系。

③ 《革命报》，1962年3月28日，第6版。

④ 1965年4月1日写给卡斯特罗的一封信。我想这是真实的。关于相反评论，参看1965年10月25日《新领袖》中A·德拉卡雷拉的文章和《共和国报》上S·卡萨利斯的文章。

而有所增强。这一点于1月1日晚他在圣地亚哥塞斯佩德斯公园里发表讲话时，第一次就获得大量听众而使人看得很清楚了。他以文雅的态度作了长篇发言，讲得朴实易懂而又富于浪漫主义情趣，并且没有拿讲稿。他的颀长的身材和庄重、年轻而又严肃的脸，端正的容貌，配上一部胡子，对那些亲眼看见他讲话的人说来，的确是威风凛凛的。这种印象对电视的更为广大的观众说来，也丝毫未见逊色。甚至在这第一篇讲话里，他使用上了后来很熟悉的那种足智多谋的顾问、慈父和革命家的口气；这种口才激昂慷慨、易于理解，适合于表现革命战争的英雄史诗：

有什么荣誉比人民的爱护更大的呢？有什么酬劳比对我们这样充满希望、信心和热爱的这么成千上万只挥动的双臂更大的呢？我们始终没有让自己被虚荣心或是野心冲昏了头脑，因为正如我们的先哲〔马蒂〕所说的，世界上的一切荣誉都会象一粒玉米那样消失；没有一种喜悦，没有一种酬劳会比尽我们的义务——象我们到现在为止所做的和今后将经常做的那样——更大的了；我并不是以我的名义说这番话的，我是以千千万万〔一个大概可以原谅的夸张说法〕使胜利成为可能的战士的名义说话的。我讲到……对战死的人，对阵亡者，应当怀有的敬意，他们是决不会被人遗忘掉的……这次，不可能象其他时候那样，说我们会背弃我们的死者，因为这次死者将继续掌权。就肉体来讲，弗兰克·派斯是不在这里了，许多其他的人也不在这里了，但是他们的精神却在这里——而且只有满意地知道他们的死不是白死，才能弥补他们身后所遗留下来的那一大片空虚。①

然而，在1959年1月，卡斯特罗的政治态度可能是连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的。三年以后，在一篇著名的讲话中，他就这个问题确实讲得过于明确了一点：

我绝对相信马克思主义！〔1959年〕1月1日，我相信吗？〔1959年〕1月1日我就相信……我象今天这样理解吗……没有……1月1日我能自称是一个毫无过失的革命者吗？不能，那时我甚至不能自称是一个“可说是毫无过失的革命者”。②

但是，有哪一个政治家能在三年以后老老实实地说出三年以前自己的信念呢？一个人能从革命者那里要求比自由主义者更大的言行一致吗？卡斯特罗在这样说的时侯，他已跟共产党结成了亲密的同盟，当时他大有被共产党包围的危险。为了战术上的理由，他正在试图证明自己的革命价值。1963年，卡斯特罗对赫伯特·马修斯说道：“在攻打蒙卡达兵营的时候，我是一个单纯的革命者，但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我在受审时的辩护词里，概述了一场很激烈的革命，不过那时我以为革命是可以根据1940年的宪法、在一个民主制度的范围内进行的。当时我还是一个空想马克思主义者。”③ 哈维尔·帕索斯

① 《革命报》，1959年1月5日，第4版。

② 《革命文献》，1961年，第46期，第35页。

③ 赫伯特·马修斯：《返回古巴》，1964年，第11页。如果说话算数，这表示卡斯特罗在1953年7月和10月之间，从“单纯的革命者”转变成为“空想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那时，说话并不总是算数。

是一个比卡斯特罗年轻十岁的前马克思主义者，又是1957年下半年卡斯特罗班子里一个城市地下工作人员。他于1962年这样评论道：“我在马埃斯特腊山所认识的卡斯特罗……肯定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对社会革命也不特别感觉兴趣。在政治方面，他主要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一个具有坚定的意志和非凡的雄心的人。”^①一个西班牙记者回忆起在山区听见卡斯特罗说：“我可不拼命去跟一个专制政权作战，而又落到另一个专制政权的手里”，因为他恨“苏联帝国主义不下于（他恨）美国佬的帝国主义”。^②卡斯特罗本人和其他的人所发表的另外一些评论，也可以用来说明，要作出一个判断是何等困难。另一方面，几年以后，有一位亲密的友人问他，要不是亏了苏联，他在古巴怎么办。他吸了一大口雪茄烟，沉思了一会儿后说：“我会同国内的资产阶级鬼混上十年，可是结果还是一样。”^③如果1月里卡斯特罗已经不太经意地想着，要把古巴带进共产主义阵营去，他的动机大概是出于要使自己所能设想的最艰难、最英勇和独特的任务付诸实行的一片热忱，而不是因为他深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正确的。

那些年轻时候便认识卡斯特罗的人一致认为，他向

① 《新共和》，1962年11月2日。

② 梅内塞斯书，第62页。

③ 据一个当时在场的人报导。这种事后的评论当然不一定是可靠的。但是，跟着卡斯特罗待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那个经验丰富的共产党代表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后来回忆起1958年在山区跟卡斯特罗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卡斯特罗说，共产党纲领的缺点之一是，它把革命的目的规定得过于明确，从而使敌人有所提防。（卡·拉·罗德里格斯：《古巴革命与过渡时期》，哈瓦那，1966年油印本，第2部第37页。）

来就极喜欢扮演历史性的角色，喜欢在拉丁美洲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使人回想起解放战士博利瓦尔或是圣·马丁。^①在政治生活中，出风头本是一种极为普遍的愿望，因此任何人也不应当发现古巴人爱出风头而感到惊奇。

多年的斗争经验，加上卡斯特罗本人的机敏的气质，使他把这个角色看作是最卓越的革命领袖的角色——而且还是全美洲的起义者。1月1日在圣地亚哥，他解释说，“美洲人的眼睛全”盯着古巴，古巴由于它的“勇气、智慧与坚定”，应该成为世界第一流国家之一。进行什么样的革命呢？也许，这是不太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个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因此，路易斯·布赫（圣地亚哥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成员）于1958年写给当时在狱中的阿曼多·阿特的一封信中说：“胡斯托·卡里略是一位革命者；他希望进行一场温和的革命：不是我们正在计划的这种革命。”^②“这个革命”将使塞斯佩德斯、马塞奥和马蒂的梦想得以实现。虽然许多古巴政治家以前都曾倾吐过这样的志向，卡斯特罗的个性、较轻的年龄和先前的经验，使他从心理上坚持认为，这回决不应该妥协。“三次独立战争中阵亡的人，现在将在地下和1956—1959年阵亡的人会合起来。”可是时代已经改变了，马蒂的使命可能不得不重新加以解释。根据卡斯特罗的意见，这毕竟是

① 西蒙·博利瓦尔（1783—1830）是委内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委内瑞拉人民在他的领导下于1811年终于赢得了独立。他还支援了南美其他几个国家的独立运动。

何塞·圣·马丁（1778—1850）是阿根廷的将军和政治家，曾帮助秘鲁和智利赢得独立。——译者。

② 卡里略：《手稿》（这封信转抄给了蒙特克里斯蒂运动）。

“一场全民的革命”。过去的幻灭，1898年和1933年的幻灭，使卡斯特罗成为一条长链子中的一个环节，必然变得更加激进。1月1日晚上在圣地亚哥发表的那第一篇讲话里，他告诉他的听众，“革命现在刚在开始。革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个最初的阶段，尤其危机四伏。”不过它决不会是1895—1898年的那种情形，“那时候，美国人在最后一刻进行了干涉，使得卡利斯托·加西亚不能在收复圣地亚哥时到场”。它也不会象1933年那样，先是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后是巴蒂斯塔，出来背叛“革命”；也不会象1944年那样，“取得政权的人竟变成了盗贼”。坎蒂略想推举出来当总统的彼德拉法官，教名用的也是卡洛斯·曼努埃尔，但是“决不是新的卡洛斯·曼努埃尔了”。^① 革命不是一天便会到来的，但是它最后终将实现。共和国第一次将是真正自由的——“四百年来的第一次”。^②

“这个革命”具有什么意义呢？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成员们总是表示，他们很知道过去的悠久的“革命”历史；他们讲到“革命的义务”和“革命的责任”，仿佛“革命”这个词儿包含着早已制订的众所周知、普遍承认的目标似的。不过，在圣地亚哥的那篇讲话中，除了计划在马埃斯特腊山区为两万名农民子女办一所学校外，卡斯特罗并

① 《革命报》，1959年1月3日。1898年和1933年的比喻曾经被其他的演讲人一再加以引用，例如1月6日，阿曼多·阿特在大学里。西班牙共和国被张伯伦出卖一事，1月中至少被引用过一次，作为一个应当避免的先例（1959年1月28日）。

② 同上，1959年1月4日。

没有具体地提到什么,而该项计划在他离开墨西哥以后,他至少便一直记在他心里了。1月5日在卡马圭,他说,“我们战斗,是要使今后决不再有新闻检查”^①——这一见解他在哈瓦拉又曾经说过。1月6日在马坦萨斯,他说得更为明确:“我们将消灭文盲、贪污、恶习、赌博和疾病。”古巴人民将从道德方面来拯救他们自己。阿曼多·阿特在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中当然是超群出众的;他参加了加西亚·巴尔塞纳的前驱,而且还出身于一个天主教徒的中产阶级家庭。1958年夏天,在一封从普林西佩监狱中寄出来的信里,他曾经写道:

我在这里把一切革命行动的两个方面都具体化了:教导全体成员,使他们知道我们要往何处去,我们如何去法,以及我们是干什么的,以便对构成社会的一切实力取得较大的统一和充分的、通达的理解……这样,我们大家就可以在革命的全面发展中发挥适当的作用……假如我们没有取得胜利,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获得恰当的历史时机……(在结束这封信时)谨以革命的拥抱向全体同志致意。^②

但是,目的方面的含糊不明却掩盖了方法上的坚定不移。1961年,有一个记者问卡斯特罗,当他在马埃斯特腊山时,他是否就已经想象到革命“将出现目前的这种局面”。卡斯特罗回答说,“我们知道我们希望什么样的革命……而这种革命将在它的发展的客观条件许可下迅速前进。”

① 《革命报》,1959年1月5日。

② 1958年7月25日致金廷·皮诺的一封信(卡里略的档案)。

我们要给我们的人民以最大限度的正义和幸福。”^① 根据卡斯特罗后来对 1958—1959 年他自己的意见的说法，根据他后来的观点，又根据对他过去的考虑，可以清楚地看出，卡斯特罗在 1959 年 1 月只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愿意或渴望用“革命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但是对于这些目的的正确性质、它们是否切合实际和着手来实现它们的最贤明的方法，却都捉摸不定。他比自己在马埃斯特腊山向赫伯特·马修斯和安德鲁·圣乔治所说的更为“极端”，而他在山区的经验又加深了他的自信和雄心壮志。就作为一个秘密政党的成员，或是一个深受马克思著作影响的人的这种意义来讲，他并不是一个共产党人。相反的，他已经比古巴共产党更富有“革命性”，更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不顾习俗、雄心勃勃、旁若无人；他满腹狐疑地看待古巴共产党，几乎跟六十年代后期他看待拉丁美洲相当类似地组织起来的其他共产党一样。诚然，他的野心太大，他的气质太似唐·吉珂德了，使他不能服从于共产主义认为必要的那种纪律和更高权力；对于 1959 年他那批核心的追随者来说，四十年代后期他的第一个政治组织的名称（尽管不是它的政策）——革命起义同盟——将是十分贴切的。

在这种不很明确的为革命而沉缅于革命中的精神里，始终有一种加里鲍尔迪式^②的浪漫主义；这在革命的

^① 《革命报》，1963 年 5 月 13 日。他还补充说，“我们将在我们的实力和环境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长时期地把革命继续进行下去。”

^② 朱塞佩·加里鲍尔迪（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译者

口号和标语中表现得特别清楚——例如，卡斯特罗不久便用“誓死保卫祖国（代替“誓死取得胜利”），我们必胜！”这句口号来结束他的讲话：这是意大利复兴运动的直接的回声，尽管它们也应和了独立战争的回声（孟比的名言从1895年到1898年是：“誓死取得独立”；1902年以后是“祖国与自由”——这一句口号在古巴的硬币上还可以见到）。简直可以说卡斯特罗和他的同僚们仿佛爱上革命这个概念或是这个词儿了。然而，这难道至少不是1895年以来古巴人的风尚吗？马丁纳斯·奥尔蒂斯在他写的古巴独立初期的历史中，十分肯定地向读者说，1899年哈瓦那的新市政厅是由“出身很好的革命者”组成的，尽管这些人中也有阿尔弗雷多·萨亚斯；1933年塞斯佩德斯的“开明”政府中的陆军部长奥拉西奥·弗雷尔在他自传的序言里，被说成是“一个增加与抬高‘革命者’这个词儿的意义的革命者”。^①奇瓦斯说他自己从二十岁起就是一个“革命者”；格劳则认为1933年他的政府是“革命的”；“博士，我们是古巴仅有的纯粹的革命者，”1933年12月，当格劳的政权摇摇欲坠时，胡斯托·卡里略这样对格劳说到他自己和学生们的。的确，奇瓦斯对这个词的应用说明了许多事；他把他的左翼民主组织称作“革命左派”；1937年，他在一篇文章里解释说，“革命并不是暴力的同义词。恐怖主义者和极端主义者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从没有革过一次命，相反的，却破坏过许多次革命”。^②

① 奥拉西奥·弗雷尔：《将步枪扛上肩》（哈瓦那，1950年），第11章。

② 孔特·阿圭罗：《爱德华·奇瓦斯》，第236页。

还有,尽管在局外人看来,“革命”这一概念可能似乎是不成熟的或荒谬的,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但是它却显然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概念,跟“民主”或“宪法”这些概念不同;它是把1959年的古巴跟1868年的古巴连接起来的一个概念,其中包括着奴隶们争取自由的斗争,克里奥尔人^①反对西班牙人的斗争,古巴人反对美国的斗争。“再没有比认为可以试图根据西班牙法律来成立一个开明的政府更为愚蠢的了,”伍德将军曾经这样说,但是话虽如此,二十世纪的古巴,却具有一种古老的、和美国截然不同的文化;不论在伍德那一代的美国人眼里看来,古巴是多么软弱,那种文化仍多少存在下来——或者至少是人们希望它确实存在下来,或是希望会使它存在下来。北美人力图把他们自己的不问多么优越的价值,强加在古巴人的不问多么“颓废的”价值上,几乎肯定是逡巡不前的。虽然革命的意义含糊不明,全国人民不久却听说到了反革命分子——例如,“坎蒂略集团”;古巴人在哥伦比亚兵营听卡斯特罗讲话时,第一次听说到“革命的敌人”。

但是“革命”这一概念不论如何解释,却是最根本的。二十五年来,人们对革命已经谈论得很多,以致卡斯特罗仅仅实行了古巴改良主义政治家的前辈们说他们已然做到了的事,便能够最后引起国际动乱。1959年之前,卡斯特罗并没有任何理论,即使他或许私下渴望有一套。一切如果说是豪言壮语,也都是模糊不清的。他和七月

① 指在拉丁美洲出生的白人,特别是原籍为西班牙的。——译者

二十六日运动的领袖们对民族主义和社会改革，一般都具有某种笼统的概念，而没有明确的纲领。到了一定要为革命下定义时，分歧便出现了。象所有的革命一样，它对未来的理想是靠过去的一种观点支持着的。

事实上，到了1959年1月，卡斯特罗已经提到许多目标了。有蒙卡达讲话中谈到的“根本法”，以及最近的加拉加斯宣言。还有其他好几个政策性文件和对记者发表的许多次近乎承担责任的谈话，有几次是涉及私事的，有几次则涉及公事。其中没有一个是详尽地拟出来的，大都是战术上的妥协，以便取得更大的拥护。1961年，卡斯特罗对一个北美人说：

有时候在山区里，在战斗间歇时，我会想到，等我们取得胜利后将会发生些什么，我们将怎样组织起一个新政党，为人民的需要而战斗……这都是很傻气的。一旦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就有权办事了；我们不需要政党政治……在山区里……我们只能按旧的方法来考虑政治，根本没有认识到那并不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他又说]我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人，有着中产阶级的思想，许多思想还是在学校中学来的，从来没有在生活中实践过。^①

1958年9月，卡斯特罗对卡尔·迈耶说，他个人对于成为革命政府的一员并不感到兴趣。12月31日，在写给雷戈·鲁维多上校的一封信里，他重复了这样的话：

^① 卡尔·马萨尼：《菲德尔·卡斯特罗：一个游击队员的意见》，《主流》杂志，1961年5月。

“就我个人来说，权力并不使我感到兴趣。”^① 在圣地亚哥发表的第一篇讲话中，他说，“任何人也不要以为我想担任比共和国总统更高的职位，”附带又说，“幸而我们都毫无野心和名利思想。”^② 这些话不是自欺就是欺人，除非（这并不是不能想象的，尽管是不大可能的）他在随后几星期里，被公众给予他的支持的性质弄得不知所措，从而改变了主意。^③

假使卡斯特罗贪求权力，假使他一旦取得权力便象大多数其他的政治家那样，不经过一番斗争决不肯放弃权力，又假使他肯定要以革命方式行使这种权力，那么美国不可避免地将被牵连进去。因为多年以来，美国大使至少一直是古巴的第二号最强有力的人物。美国把古巴多少看作是它的最亲密的外国朋友。古巴和美国的经济实际上是一体的。1959年，美国在古巴投资的价值，除委内瑞拉外，仍然比在拉丁美洲任何其他国家为大，而且按人头计算，美国在古巴的企业的价值，是在拉丁美洲任何其他地方的三倍以上。然而，除了制糖业，都投资在公用

① 《革命报》，1959年1月4日。

② 同上，1959年1月5日。

③ 例如，1961年4月，在为“法兰西无线电电视台”摄制的一部影片里，卡斯特罗说：“我必须承认，我们（即他自己）有一时期当真相信，可以把权力交给别人；我们是有点……象空想主义者了。在初取得胜利后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完全避开了政府，没有参加部长会议的决议……”引自莱斯利·杜尔特：《古巴，教会和危机，古巴革命中的基督教和政治》（伦敦、纽约，1964年）第82页。塞莉亚·桑切斯后来对赫伯特·马修斯说，“我们不可能先知道，当胜利到来时，我们和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会这么强大和深得人心。我们以为我们将不得不跟革命党和人民党等联合起来组织政府。相反地，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成为古巴的主人。”（赫伯特·马修斯：《卡斯特罗，一部政治传记》，伦敦1969年，第100页。）

事业方面，而这些都是，或者似乎是独占企业，因此也就似乎和政府是一体，或者至少是由政府管理的。这些事实，加上美国政府还继续租用关塔那摩那个基地，就意味着一种政治上的爆炸性事件始终迫在眉睫，或者可以使之迫在眉睫。这些事实还意味着美国商人、厂主和种植园主人会向美国大使馆求情。美国和古巴商业利益的息息相关，使美国对古巴的所有政府都十分关切。但是，卡斯特罗从一开始就决心不落进拉丁美洲进步领导人的窠臼，这些领导人经过一两年冗长的执政后，都成了华盛顿的驯服傀儡。他也几乎从一开始就对加勒比地区“开明”领导人，象哥斯达黎加的非格雷斯、波多黎各的穆尼奥斯·马林或是委内瑞拉的贝坦科尔特的那种结合抱敌视态度。也许，这是年龄的问题。在卡斯特罗看来，这些人在欢迎他作为他们所创办的俱乐部的年轻成员时，或许是多少有点儿一派恩人神气。

艾森豪威尔的美国也表现出了一派恩人神气。艾森豪威尔和卡斯特罗两人在气质上的差异不可能再大了。但是气质的差异并不一定就要引起国家的争吵。这两个人始终没有会过面。卡斯特罗的古巴和艾森豪威尔的美国，两者之间后来所形成的紧张关系，是有较深的根源的。首先，卡斯特罗的古巴渴望干出些英雄事迹来，渴望写下一首英雄诗篇。艾森豪威尔的王国则是舒适安乐的。卡斯特罗自己的气质需要紧张，也许还要求有一个敌人；如果可能的话，还需要有一种局面使他可以竭力充作，或者是继续充作四面受敌、严阵以待的起义军领袖（因此他很早便提到革命的敌人或反革命分子）。其次，

如同两年后他自己所说的，^① 甚至他在 1959 年 1 月所想到的那种革命，肯定是敌人所喜欢的，是一个利用民族主义以解决民族分歧的反对者所喜欢的。第三，古巴和美国的关系从 1898 年以后，无论如何是十分暧昧的。许多古巴知识分子多年以来就指望有一天可以清算一下。他们读了埃米尼奥·波特尔·比拉、拉米罗·格拉或是费尔南多·奥尔蒂斯的书或演讲，斥责美国的外交政策或是斥责美国似乎予以支持的制糖业，并且梦想报仇。对于许多古巴人，尤其是对于卡斯特罗说来，想要自由就是等于要采取一种故意激怒美国的行动。^②

古巴的知识分子意识到美国的文化威胁，就象几年前发表梅西的报告时的加拿大人一样，也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其他更重要的国家，甚至象旧世界一些国家所感到的那样。这种情绪似乎并不是群众的情绪。北美人在古巴一直比在墨西哥或是其他的国家受人欢迎。然而，革命人士的不相信美国，不仅是由于遥远的过去，也由于新近的经历。美国官方通过它的大使和军事顾问团团长，显得同巴蒂斯塔形同一体；内战中所使用的美制炸弹；古巴的北美人没能批评警方的暴虐行径——正象马查多时代的情况一样；总之，这一切使革命政府和艾森豪

① 两年以后，卡斯特罗很露骨地说（《革命文献》，1961 年 1 月 25 日，第 6 页）：“一场不受到攻击的革命，首先肯定不是真正的革命。其次，一场没有敌人的革命，很可能遭到衰退的危险。”

② 1969 年，我问共产党领袖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是美国把卡斯特罗推进共产主义中去吗？“不是。菲德尔对他所希望的那种革命一直抱有一种激进的想法。不过你不妨说，美国通过它的行动，加快了古巴革命的发展。”1969 年 1 月和作者的谈话。

威尔政府之间的关系，有可能从一开始就很冷淡。卡斯特罗只在圣地亚哥发表的第一篇讲话里，才提到一次美国（指出美国在1898年不让古巴人获得“胜利”果实时所扮演的角色）。他还毫无必要地说，等“时间”一到，倘使有必要的话，将不是四千，而是四十万古巴人随时准备来保卫他们的自由。他对这个问题的沉默是其兆不祥的，就同他的爱国主义具有过激的、排他的性质一样。假使古巴过去是悲惨的，那么除了美国应该怪谁呢？报仇在决定私人生活上往往是起着主要的作用的。假如报仇在决定国家大事上也是如此的话，又有谁会感到惊异呢？

许多古巴人过去曾经模糊而杂乱地想到美国，就象卡斯特罗那样。在某种意义上讲来，卡斯特罗使古巴人坚持或是顺从这种思想。第二，卡斯特罗并没有什么计划。假如象哈维尔·帕索斯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那他也是一个有灵感的人，能够直觉地抓住适当的时机，从中榨出所有的利益。不能认为他在1959年1月就已经决心要在古巴建立一个，比如说是，共产主义的国家；也不能不认为他准备把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会进一步坚持下去。象大多数古巴人那样，卡斯特罗个人似乎并不是反美的；但是他看到向美国挑战，至少是维护自由这一概念的一种方法，或许还是最容易的方法。向美国挑战并抵挡住它的忿怒；为1898年谢夫特将军^①侮辱卡利斯托·加西亚将军报仇；为1933年萨姆纳·韦尔斯不

^① 威廉·R·谢夫特将军（1835—1906）：美国将军，1898年率领美军入侵古巴。卡利斯托·加西亚将军（1836—1898）：古巴民族革命领袖之一。——译者

算是故意侮辱格劳·圣马丁报仇；难道这不是一个体面的古巴人，凭着旧式的本能，可以由此而找到自由的唯一途径吗？

唯一真正的古巴毕竟仍旧是一个起义的古巴。过去，当起义者夺取了政权后，他们总是又变成了一个抗议的新原因。古巴人能从过去百年来的动乱中清理出来的，代表本民族的唯一光荣事迹的就是起义。卡斯特罗，这个起义者的化身，现在总是穿着山区起义军所穿的那种橄榄绿的军服；他有意无意地认识到，要完整地保持他的起义和在他以前的绵长的起义潮流，唯一的方法就是把起义继续下去，现在不是攻击巴蒂斯塔，而是攻击多年来是巴蒂斯塔朋友的那个莫测高深的强大国家，美国。他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洛佩斯·弗雷斯克特说，“卡斯特罗计划使古巴社会主义化。他认为这样会自动跟美国疏远。因此，他开头就不存在获得美国友谊的希望。”^①但是，难道他事实上不希望先跟美国“疏远”，然后再计划使古巴社会主义化吗？卡斯特罗即使不是憎恨美国，但是他要向美国挑战的愿望，却似乎是根深蒂固的。^②1958年6月，在一枚炸弹击中一所农舍后，卡斯特罗写道，“我发誓要使美国人对他们所干的勾当付出巨大的代价。等这场战争结束以后，我将展开一场更为广泛、更为巨大的战争。我将对他们发动战争。我对自己说，那才是我的真正的

① 洛佩斯·弗雷斯克特书，第167页。

② 比较菲利普·邦斯尔：《古巴、卡斯特罗和美国》，《外交季刊》，1967年1月：“倒不是卡斯特罗对共产主义的偏爱，而是他对据认为存在于……古巴的美国权力结构的病态般憎恨，使他终于走进了共产主义的阵营。”

命运。”^①

这种百年之久的忧虑，又由于现在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忧虑而加深了。1959年1月，杜勒斯还是国务卿。对他，一般对美国政府来说，中立的政府和公开的敌人同样是不可相信的。杜勒斯和他的弟弟、当时仍然是中央情报局头子的艾伦，策划了颠覆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阴谋。在那次反革命的高潮时刻，格瓦拉正在危地马拉。他、卡斯特罗和他们的副手都知道，到了要实行可说是任何的改革时，美国的那帮人便会要求采取“行动”（由海军陆战队或中央情报局）来推翻古巴政府。他知道，凡是牵连到要把美国产业收归国有的那种“革命”——这对拉丁美洲一个执政的革命领袖来说，是一种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做法——就会使人广泛地听到这种意见。他大概认为，不论他采取什么改革方针，都有跟美国发生某种关系紧张的危险。

恰巧他的情报有几分错误。美国已不再简单化地反对中立主义了。国务院、商业界和政府其他部门中的保守分子在1959年的地位已不及1954年了。在北美政府的许多官员中（尤其是威兰、鲁博特姆、菲利普·邦斯尔），都有一种强烈愿望，要帮助古巴建立一个实行改革的政府。这些人对1952年以后到古巴当过大使的那些商人，都是大加非难，甚至是反对的。在1958年末1959年初这段期间，美国对古巴，也可以说实际上对拉丁美洲是没有什么政策的。对副总统尼克松的攻击只是使人认

^① 引自赫伯特·马修斯：《卡斯特罗，一部政治传记》，第107页。

为出了什么毛病，但是什么毛病则不清楚。还有其他许多问题。卡斯特罗这个久已成为世人所难以预卜的人物，不十分知道史密斯大使并不是一个独树一帜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史密斯大使说卡斯特罗的政府到头来将是共产主义的，这个判断倒很正确；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加德纳和史密斯这些人在每一丛灌木后面看共产党人的这种旨趣，却助长了该政府对共产主义的欢迎。

在这番议论中还另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道理。一个坚强的民主立宪政府按情理而言，将会从美国政府的开明人士中获得不少的支持；援助、技术支援、资金将会涌了进来；古巴的生活水平肯定将会上升；大多数古巴人，特别是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古巴人，而且也有不少工人，肯定将会过着一种较好的生活，但那将不是一种古巴式的生活；那将是美国生活的一部分，具有美国生活的全部奢华与苦难。卡斯特罗也许下意识地认识到，这是确立一种岛国的特性的最后一个机会，它有几分是西班牙的、有几分是非洲的，无论如何不是北美的。

那时候，美国在判断另一个国家的政权是好是坏时，有没有任何原则呢？这个词儿也许过于生硬，因为美国出于习惯，看待西半球一向同它看待欧洲或非洲大不一样。在欧洲或非洲，一党专政的国家，甚至共产主义国家，都还可以容忍得了，甚至可以与之进行贸易。尽管有杜鲁门主义，那些国家终究是别国的势力范围——即使在那里，在一个意识形态上不可宽恕的政府当权的最初时刻，美国政府是决不会“袖手旁观”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则不同了。自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那个仍然没

有发霉的门罗主义的时代起，如果认为西半球有着一个积极反美的国家，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当然是一种不惜任何代价应予避免的事。自由的原则如果不是被解释为自由经济企业的制度，那就不是主要的。外交并不受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商业利益所支配，但是很明显，由于这种利益是庞大的，那就是一个因素。外交是受友谊或敌意支配的，是“我们的狗崽子”对他们的“神童”。

古巴是一个特殊事例。美国在古巴多年处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统治地位，使得许多去古巴的北美人——也许是大多数人——都摆出一派恩人神气。哈瓦那多少年来已成为一个玩乐的地方，其中有妓女，雪茄烟，黄色电影，“邈邈的乔”或佛罗里达酒家里的台克利酒，以及在轮盘赌台上的一押就赢。“酩酊大醉的绝妙去处，”埃罗尔·弗林^①在大教堂附近一家著名的饭店博德吉塔—德尔梅迪奥的菜单上这样写着。那么许多北美人的确在古巴玩得非常快乐，以致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种交往会是对古巴人的耻辱。此外，他们对于古巴那种决不可以忽视的精神生活却一无所知。他们的历史书上并没有提到何塞·马蒂，甚至他们的百科全书上也没有提到他。就北美人来说，古巴的独立战争是早被遗忘了的美西战争的序幕，甚至连历史家们也认为，是美国军医沃尔特·里德和威廉·戈尔加斯单独发现了黄热病的起因，并没有得到古巴医生卡洛斯·芬利的任何帮助。1956年，甚至在巴蒂斯塔的统治下，美国和古巴之间也发生了

^① 美国电影演员。——译者。

两件重大的争吵：一件是电视比赛的优胜者——那件六万四千美元的公案——因为说了是沃尔特·里德而不是卡洛斯·芬利发现了黄热病的治疗方法，从而赢得奖品；一件是好莱坞的影片《圣地亚哥》把马蒂和马塞奥处理得荒谬绝伦了。这种笨拙愚蠢的态度，就象英国人对阿拉伯或是埃及民族主义的看法那样。这种态度从美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以至商人和游客的举止上都表现了出来，并且已在古巴的精神生活中反映了出来。

最后，这又是古巴的特点，古巴同美国的商业关系容易受到种种误解，而且自从1904年的通商条约签订以来便是如此，该条约的基本大纲又于1934年重新开始实行：诚然，古巴可以按很高的价格出售大量食糖给美国；这项协议不仅使古巴更难于使其生产多样化，而且使美国公司得以各种便宜而往往无聊的商品充斥古巴市场。这些商品按照北美的广告的方法进行销售，进一步削弱了古巴人的文化生活。

在过去十五年里，美国同拉丁美洲的关系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而最重要的是，在目前的对比中，差距甚至更大。美国的实力不仅在西半球，在全世界都是最大的。它的生活水平同拉丁美洲的比较起来，简直高得惊人，而拉丁美洲有些国家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相比，甚至反而要低。它的军队装备那么精良、人数那么众多，简直是西半球的其他国家所无与伦比的。它在这个半球缔结的双边盟约，使西班牙帝国的一些古老的继承国，得以把其军警从服装褴褛，赤着双脚的凶手集团，变成娴熟老练的二十世纪的古罗马御林军，使得这些政府更为强大，

并在大陆各地增加了武器的效用。美国是唯一的火力来源——南北美洲的其他国家没有一个具有如此规模的军事工业——这时又是最大的投资来源。英国可以竞争的日子早已过去了。

尽管拉丁美洲的生活水平并不一定提高了，它的财富却有所增加。委内瑞拉就有一些石油的百万富翁，然而，石油并没有使奥里诺科河^①流域的工人生活大为改善。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商品价格下跌，因此，生产增加无济于事。同一个时期，美国从拉丁美洲抽走的利润超出了它的投资数——对不发达的国家说来，一般总是这情况。拉丁美洲的人从自己本国抽走资金，也比其投资迅速，^②这多少是由于美国的鼓励社会改革的善意政策。

随着经济方面的改变，美国的总政策也明显地改变了。罗斯福的睦邻政策，以及它那不干涉内政的声明，使美国在拉丁美洲有了许多朋友。但是现在，这些朋友自己不是上了年纪就是快要死了。他们尽管在三十年代也许是激进的，如今却都是维护现状者了；这种现状，这种对美国 and 拉丁美洲之间的关系的解释，越来越表现在法律或外交条约上，而不太表现在现行的关系上。“除了进出口银行，”阿瑟·施莱辛格写道，睦邻政策“缺乏一种经济上的广泛关系”。^③他指出，南斯拉夫这个共产主义国

① 南美洲北部的大河，源出委内瑞拉南部，注入大西洋，全长约一千六百哩。——译者

② 雷内·迪蒙[《古巴，社会主义及其发展》(巴黎，1964年)]估计，有二百亿美元存在瑞士的拉丁美洲人士的帐户里。

③ 阿瑟·施莱辛格：《约翰·肯尼迪在白宫一千天》(伦敦，1967年)，第155页。

家，在1945年到1960年间接受的经济援助，超过整个中美洲和南美洲。还有一点是：北美那些实用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并且大都很有成就的改革家，并不是跟南方那些辞藻华美、有条不紊、热爱制度、而又富有浪漫主义情趣的西班牙美洲人，过着同一种知识传统的生活。南美人像所有没落的族长社会那样，习以为常地按各个阶级间的政治冲突来观察社会；北方则从来不是族长式的，所以在他们看来，把社会分成地主、资本家、工人阶级和农民完全是老式的，甚至还有点侮辱性的。尽管从1958年春天，副总统尼克松到那里作过一次灾难性的旅行后，华盛顿对拉丁美洲有了新的、老练的兴趣，却很难看出，北美洲怎么不把南美洲看作是一个敌人或是一片殖民地。同时，古巴的全体知识分子除了对他们的社会具有有条不紊的看法外，内心里还蕴藏着大量的反美情绪，部分是陈腐的，部分是肤浅的，但是，这些情绪都是来自普拉特修正案的时代，或是来自1933年萨姆纳·韦尔斯的古巴通告，而这些都是他们那辞藻华美的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第二十一章

抒情 的 幻 想

1959年1月，欧内斯特·海明威以惯常的轻描淡写口气这样提到古巴，“这是经过一段激烈的重新调整的时期之后一个相当不错的时刻。”他又说，现在将有一个和平的政府了，^① 暴君的逃亡、他的走狗们的失败、青年人的夺取政权、勇敢的举动所带来的奇迹般的顶峰、举世的瞩目；有一支忠诚的军队守卫着公共建筑物；即将实行的重大改革计划；青年人不论有着何种经验或是一无经验，却准备去做任何工作，任何事业。这一切使古巴在1959年年初，具有一种充满希望、信心、热忱和同志情谊的异样的情调。象何塞·博什的巴卡迪甜酒公司和阿图埃啤酒公司这些公司，都提出要预缴全年税款。

新政府就是激起人民热忱的第一原因。没有人知道临时政府总统乌鲁蒂亚法官；虽然如此，他却显得是一位合乎理想的行政首长，一位执法严明的法官，也许有些拘谨守旧，但是，如果面临考验却是一个会毅然地、甚至勇敢地采取行动的人。总理米罗·卡多纳似乎是一个同他

^① 海明威(当时在美国)在古巴科希马前前后后居住了好多年；据他说，有十二个男孩在科希马受到巴蒂斯塔警察的虐待和杀害。(《革命报》，1959年1月23日)。〔按：欧内斯特·海明威(1898—1961)是美国小说家，他对卡斯特罗表示同情和支持。——译者〕

性格极其相似的人，他也是一个不肯向独裁者低头的体面而精明的律师，他作为律师公会会长，曾经跟德拉托里恩特一起是该公会发起的“公民对话”的发起人，又曾经在名义上担任协调加拉加斯公约所组成的战线工作的秘书长。革命政府（人们这样称呼它）的第一届内阁可以根据年龄与出身相仿而分为两类，凡是年龄和出身相仿而年纪很轻的都是卡斯特罗的追随者。第一类是：1952年人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阿格拉蒙特，当了外交部长；经济学家和税收专家、《海洋日报》的经济专栏作家、格劳政府财政部长的技术顾问和普里奥政府开发银行的实业部经理鲁福·洛佩斯·弗雷斯克特当了财政部长；^①另一个经济学家和新闻记者塞佩罗·博尼利亚，当了商务部长；另一个中产阶级律师，乌鲁蒂亚的朋友安赫尔·费尔南德斯，当了司法部长；次长则是马诺洛·卡斯特罗从前在大学时的合作者，人民党的一个小政治家亚武尔；路易斯·奥尔兰多·罗德里格斯当了内政部长，就此穿上一身裁制得很好的制服和一双闪亮的皮靴，此人一度担任革命党青年运动的秘书长，又是大学中通称为“大学联”的那个反共团体的领袖，后来又成了人民党党员，参加了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在他办的报纸《街道报》（它在1955年支持过卡斯特罗）被查封后，便到山区去主编《自由古巴人》。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当了劳工部长，他在三十年代曾经是吉特拉斯的追随者，青年古巴的成员，五十年代

^① 参看洛佩斯·弗雷斯克特书第8页。洛佩斯·弗雷斯克特在巴蒂斯塔统治下曾经私下开业，并在公民抵抗运动中工作。在1958年年初，他曾被邀担任财政部长。

则参加了加西亚·巴尔塞纳的民族革命运动，是一个浪漫主义的革命者；年龄较轻的是经济学家雷希诺·博蒂，他是关塔那摩一个著名的老诗人的儿子，和费利佩·帕索斯共同起草了革命时唯一的一份经济计划，这时刚从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回来，担任经济部长；政府中仅有的一个妇女，就是那位孜孜不倦的社会工作者埃伦娜·梅德罗斯，她当了社会福利部长。跟这类人联合在一起的，还有其他一些著名人士，例如费利佩·帕索斯和胡斯托·卡里略；他们分别回来担任国民银行和开发银行的行长；这是他们在普里奥执政时期担任过、而在巴蒂斯塔发动政变后辞去的位置。帕索斯和劳尔·奇瓦斯一起，曾经在迈阿密跟卡斯特罗进行过那场奇特的论战，但是在胜利的欢乐中，这种事情暂时都被忘却了。埃米略·梅嫩德斯，巴蒂斯塔时代廉洁奉公的少数法官之一，接手担任了新的最高法院院长。一位著名的律师，以前当过普里奥的外交部长的埃内斯托·迪戈，成了驻美大使。象阿格拉蒙特一样，也是人民党一个派系的领导人的曼努埃尔·比斯维，则成了驻联合国的大使。这些人的参加，使这届政府多少有点象阿格拉蒙特可能会任命的那种内阁，倘使他在1952年当选总统的话，都是颇为不错的时代的一些颇为不错的人。

然而，他们的“资产阶级”性质，把他们统治着一片真空的这一事实掩盖起来了。外国政府以为，既然他们都是中产阶级人士，他们的政府也将是中产阶级的。乌鲁蒂亚的确迅速安定下来，着手从事一位老式古巴总统的称心的工作；他每天都在接见记者和老朋友、共济会会

长、教士和主教、前总统普里奥，偶尔还接见一些新部长。他用的是革命的语言，但是，从前别人也是如此。不过，乌鲁蒂亚自己所创议的只是提出禁绝赌博和妓院。他不是一个人。

跟乌鲁蒂亚和那些中年部长成为对比的，有菲德尔派和起义军或公民抵抗运动的积极成员。哈瓦那的公民抵抗运动的两个领袖都当了部长——浸礼会教徒，以前的医科学学生的福斯蒂诺·佩雷斯，从加西亚·巴尔塞纳的民族革命运动和“格拉玛号”的日子起便为革命事业做了多年各种不同工作，现在当了负责照管从巴蒂斯塔和他朋友那里没收过来的产业的部长——例如本来是巴蒂斯塔的库基内别墅和华盛顿制糖厂，本来分别属于何塞·比利亚博伊和何塞·伊格莱西亚斯的古巴航空公司和魁北克航空公司；另一个是建造阿尔门达雷斯隧道的那位声名显赫的工程师曼努埃尔·拉伊，他毫不畏惧地在1958年领导了哈瓦那的怠工运动，现在当了公共工程部长，立刻负责修复在战争中遭到破坏或损毁了的桥梁、铁路、公路和其他公用事业，特别是在奥连特省。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第一个全国协调员和组织者阿曼多·阿特(当时担任最高法院副院长的一位法官的儿子)，他于学生时代在豪尔赫·马尼亚奇正在发表电视讲话时，煽起了一场骚动，因而第一次受到人们的注意，后来在1955年参加卡斯特罗前，曾经是加西亚·巴尔塞纳的民族革命运动的成员，他当上了新教育部长时才二十八岁。新的国防部长奥古斯托·马丁内斯·桑切斯和农业部长温贝托·索里·马林，以前都是律师和辩护士，分别在克里

斯塔尔山和马埃斯特腊山担任劳尔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顾问；后者以前是一个革命党党员。交通部长恩里克·奥尔图斯基是俄罗斯犹太难民的儿子，拉斯维利亚斯省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组织者；他象阿特一样，还不过二十多岁，曾经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大学学过工程学。卫生部长马丁内斯·派斯博士在马埃斯特腊山负责过一所医院，而内阁秘书——向来是一个要职——则是出身于圣地亚哥一个自由党人家庭的律师路易斯·布赫，他曾经在圣地亚哥领导过公民抵抗运动，并且多次当过哈瓦那和迈阿密之间的信使。所有这些人似乎都是精明诚实、爱好和平、受过教育、很有学识的，不大会给西班牙政治那种血腥的争权夺利增添荣誉。

卡斯特斯作为起义军总司令，是政府成员之一，但是在1月初，他并没有出席过内阁会议。然而，他从一开始就好像是担任政府的一种特别主席，他在内阁中的亲密朋友，象阿特和马丁内斯·桑切斯，总和他一起在哈瓦那一希尔顿大饭店的那套房间里举行非正式的会议，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①但是内阁成员，甚至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成员，跟他熟悉的为数寥寥；例如，拉伊只在山区见过他两次；阿格拉蒙特只记得他在人民党运动的好恶参半的那段时期。他跟1958年曾经在山区耽过的索

^① 后来，卡斯特罗说，这时候，“我们对政府问题很外行。那就是说，我们对政府这一工具和它如何发挥作用很外行……我们是通过一系列概念和根本观念，看待革命问题的。”（《革命报》，1961年10月4日，第8版）财政部长洛佩斯·弗雷斯克特回想起（他的著作第41页），这些部长“每逢提出一项计划要内阁考虑时，总宣称他们已经跟卡斯特罗先讨论过了。”

·马林和马丁内斯·派斯的关系也很疏远。至于他自己在有可能取得权力以前的地位，卡斯特罗在1961年对法国的电视观众说，“我们(或者不如象别人所说的是我)完全避开政府，不干预内阁会议的决议。我们毫不怀疑，负责的人将会采取人民所期望的基本措施。”^①

首先，卡斯特罗的不干预政府工作，并没有什么有益的或有害的后果。内阁大部分时间都在开会，往往一直开到深夜，企图保持连续不断的行政管理。财政部长回忆说，“没有一次概述过政府的总方针……每次内阁会议的大部分时间，”他补充说，“都是用来准备一部新宪法。”^②他们还要通过许多任命。政府大多数部门里的高级人员不是逃走了，就是得加以清洗。革命的英雄们作为行政人员，到处接收，往往是在他们自己的坚持之下进行的。不过一些新部长通常总能避免做出最最愚蠢的事：洛佩斯·弗雷斯克特留用了财政部的三分之二的旧人员，并且设法说得卡斯特罗相信，某一个少校想担任汽车税的主管大员是不适宜的。^③部长们有很大的用人权。象索里·马林这些天主教徒部长都任用了天主教徒，理性主义者任用了理性主义者，军人指派了军人，萨博纳罗拉派指派了萨博纳罗拉派。同时，每一个部都忙于揭发领乾薪的

① 赫尔韦·夏奈：《古巴革命：我们时代的镜子》（《世界的弟兄们》，1962年第3期，引自杜尔特书第82页）。卡斯特罗有一次对洛克伍德又说，“当我们在进行革命战争，并制订计划要成立一个政府以代替巴蒂斯塔的政府时，我并没有打算担任总理、总统或任何类似的职位。”（洛克伍德：《卡斯特的古巴：古巴的菲德尔》，第17页。）

② 洛佩斯·弗雷斯克特书，第42页。

③ 洛佩斯·弗雷斯克特书，第75页。

人员以及——往往发现是同一批人——贪官污吏：有八百名领乾薪的人员离开了财政部，三百名离开了海关，二百六十五名离开了运输委员会，五百八十名离开了卫生部。这些人中，无疑有许多以前都是帮会分子，他们在普里奥企图扑灭帮会活动时，曾从他手里接受了工作。报纸上每天都揭发出新的贪污渎职的事件。属于巴蒂斯塔或是他的家族和朋友的支票、股份和各种交易，都由革命报纸《革命报》津津乐道地刊载出来，接着其他报纸也刊载了——不过没有那么热烈，因为许多体面的新闻记者和报纸在财务方面跟旧政权的关系，也令人发窘地被揭露出来了。最高法院四十个法官中有三十六个被免了职；新任命的法官接着又清洗了司法部门中的中下级人员：结果，大约有 20% 的法官因为替旧政权效劳而被免了职，而在反对巴蒂斯塔的怠工中起过重大作用的一个崭露头角、年龄较轻的教师米尔塔·罗德里格斯，则要求对学校教师、教育部人员，甚至学生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洗。大学里也要求进行清洗，因此没有立即复课。

有一个解决得比预料还要迅速的问题，大概就是革命指导委员会的问题。人们都真正担心他们同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之间会发生战斗。1月9日，即在卡斯特罗抵达哈瓦那后的那一天，他们被卡斯特罗的口才和他的讲话在民众中所取得的成功打动了，开始交还武器。但是他们的领袖乔蒙在做出这个姿态的同时说，卡斯特罗无权把圣地亚哥定为首都。作为答复，卡斯特罗在1月9日晚间的一次电视接见中，试图把乔蒙跟库维拉那样的其他领袖，或是跟已故的埃切瓦里亚的鬼魂分开；“我以前一

向认为,革命应该成为单一的运动。我们的论点是,这一集团或那一集团不应发动革命,发动革命的应该是人民。”^①然而,任何人也不希望再流血,至少不希望立即再流血。一群古巴母亲要求允许她们到指导委员会堆积武器的大学里去:她们已经对战斗厌倦了。这个提议送交给卡斯特罗时,他正在发表电视谈话——这件事不免引起怀疑,不知道它是否真象外表看来那样是自发的。《革命报》评论说:“菲德尔低下了头,眼睛闭了一会儿,移动了一下身体,睁开眼说道:‘这说明了,在一个民主政体下,舆论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②1月13日,卡斯特罗和指导委员会举行了会谈;经过不少争论之后,卡斯特罗深信他的统治已获得群众的拥护,很快便说服了指导委员会放下武器。指导委员会实质上是向大势的压力低头了。几星期内,他们的领导成员都接受了政府中次要的职位——库维拉到布拉格去做大使馆武官;很久以后,当古巴与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时,乔蒙成了大使。^③这项困难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不过这项困难本身也是一个原因,何以甚至总理米罗·卡多纳(对他本人说来,是成败攸关的)都没有坚持要召集所有那些参加“加拉加斯公约”的政党和团体开一次会。

揭发、控诉和惩罚是革命政府的首要任务。诚然,还

① 《历史演讲》,第20页。

② 《历史演讲》,第22页。

③ 这两个人命运截然不同:库维拉在1960年成为破坏哈瓦那大学的主犯以后,1966年又因为图谋杀害卡斯特罗而受到审讯,被判监禁三十年;乔蒙在卡斯特罗的政府中担任了多年的部长,1965年是古巴共产党书记处的一个成员。

有许多其他的保证、希望、期望和计划。除了乌鲁蒂亚总统，其他一些人还希望国民彩票机构将被改成一个国民储蓄的机构。恶习当然要革除掉——尽管巴蒂斯塔警察的绝迹，意味着它的经济后台一大部分反正已经倒掉了。扫除文盲的计划将大力展开。国家工业化的计划将制订出来。各大学尽管经过清洗，将重行上课，就象中小学已经重行上课一样。政府肯定将减低电费和电话费。还将实行土地改革；甚至蔗农协会也连忙改变了对巴蒂斯塔的阿谀，要求改革应当真正有效。诚然，卡斯特罗过去曾经对土地改革提出过那么许多不同的计划（而且有一个根据分配大庄园的概念拟定的计划，事实上已在拉斯维利亚斯省和奥连特省部分地区开始实行了），因此这种改革究竟将是怎样还是弄不清楚，但是很少有人怀疑，它将把小佃农变为土地所有人；它将坚持有效地使用可耕而未耕种的土地；它还将把订入1940年宪法中的对大庄园的攻击付诸实施。结果，一连好多天社会各阶层都向革命作出令人不安的致敬。它们读起来象老教堂里一些可笑的墓志铭一样：“致光荣的起义军：正如昨天我们在山区站在你们身旁一样……今天我们已同你们一起来巩固祖国了。全国咖啡种植人协会。”共济会会员和1898年的老战士，百货商店和纺织公司，保险公司和银行家，都热情洋溢地向革命政府致敬。富豪、银行家和保险商维克托·佩德罗索这些人全都赞扬乌鲁蒂亚，就象不到两年之前总统府遭到攻击后，他们赞扬巴蒂斯塔一样。许多奇怪的人都戴上了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臂章。同时，1月初，大厦和机构开始以已故的革命人士的姓名来命名了；这样，

塞瓦德尔阿瓜工艺学校就变成了胡安·曼努埃尔·马克斯工艺学校。

但是，政府在最初几个星期里的主要问题是逮捕与惩罚。这件事如何才能办到呢，巴蒂斯塔那些警察头子不是逃跑了，就是躲藏了，或是已被军队逮捕了。可是，决不是全体警察都被捕了。那些没有犯过杀人、打人或是在其他不法行为的罪行的人，都留在他们的岗位上：“凡是具有优良正直记录的人，都将加以核实。”不过，在他们上面迅速地——那就是说，在1959年1月1日后的一星期内——设置了一个新的警察指挥机构，起先由哈瓦那怠工的主要组织者（“行动总指挥”）阿尔多·贝拉负责，后来在卡斯特罗抵达首都以后，由“格拉玛号”时代卡斯特罗的忠实的朋友，“身经百战的英雄”，以前的汽车司机埃菲赫尼奥·阿梅赫拉斯负责；他有两个胞弟都在对巴蒂斯塔的战斗中牺牲了，有一个是在攻打蒙卡达以后。^①阿梅赫拉斯把警察的指挥系统组织起来，并使它牢牢地置于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成员的掌握之下；他本人明白地说，他执行的不是传统的警察总长、内政部长路易斯·奥尔兰多·罗德里格斯的命令，而是总司令卡斯特罗本人的命令。起先，阿梅赫拉斯接受了现状，在各区里承认当时实际占有各警察局的地下组织成员为新警察。但是，1月底，哈瓦那十九个警察局中，只有四个还同月初一样，是在同一人的手里：新局长主要是一些马埃斯特腊山的

^① 根据埃斯特万·本图拉·诺沃上校的《回忆录》（1960年）第35页，阿梅赫拉斯于1955年因有关风化的罪名进了监狱；他并且化名“霍梅吉亚”干过些其他的犯罪活动。

战士。阿梅赫拉斯不过二十七岁。他跟卡斯特罗私人关系很密切，由于他没有什么政治思想，所以准备跟卡斯特罗跟到底。“能干而又很有胆量，就某种程度而言，是一个天生的领导人，”有人这样评论他；“他对待他的部下会好得出奇。”^① 为了消除以前那么臭名远扬的旧形象，迅速地更换了警察的制服。同时，还提高了警察的待遇。虽然如此，就连在地位很高的警官中，还可以发现一些巴蒂斯塔警察里的显要人员：这样，莱唐上校就成了哈瓦那交通警察的头头。^②

还有原来的军队问题。卡斯特罗开始时继续实行他在山区历次声明的方针：除了“战犯”，旧军队将和新军队合并。1月4日，西恩富戈斯对新旧军官和两方的士兵说道：“我们将要把这两支军队合成一支军队——合成一支将忠实地保卫国家利益的军队，一支将维护我们的权利和国家的民主的军队。”新政府对旧官兵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但是，在卡马圭跟卡斯特罗商谈之后两天，西恩富戈斯的语调改变了：“必须用忠于革命的人，而不用专制政权的帮凶来改组武装部队。”1月9日，卡斯特罗在哥伦比亚兵营的第一篇讲话里说，总统特别要他“改组军队”。卡斯特罗说，“国家需要有一支军队，”因为“敌人带走了几百万比索，可以用来进行反革命活动，”还因为

① 哈维尔·帕索斯对作者所说。

② 1959年1月28日《革命报》，《过渡时期》一文。有些警官曾经暗地里偏袒起义军——例如，加夫列尔·阿拜。据J.P.默里说（《古巴的第二次革命》，纽约，1962年，第35页），大约有一千一百名“起义军兵士”被调入警察部队。

特鲁希略对古巴一直抱有敌对情绪：“不能让国家毫无武装。”但是，卡斯特罗又说，他本人希望统率“国家最优秀的队伍，那就是人民”。^①谁也没有从这句话里看出了是要搞民兵的预兆。“我们已经看到……〔说什么〕如果不爆发全面经济危机就不能搞一次对抗现代化军队的革命，这是错误的。”^②1月22日，他把一个要求他废除军队的新闻记者说成是无政府主义者。这时，中间派的几个旧军官，军队中的民主人士，都被推在一边。中心人物巴尔金成了军事学院的首长。巴尔金的主要追随者、曾在1月1日至2日于拉卡瓦尼亚负责指挥了几小时的博尔旺内特，则接下了坦克部队司令员这个有名无实的职位。被乌鲁蒂亚命令任命为陆军参谋长的原圣地亚哥那个“体面”而“可敬”的司令官雷戈·鲁维多上校，奉派做了驻巴西的大使官武官。同时，1月14日，“提高起义军文化水平”的第一所军事文化学校，在格瓦拉主持下于拉卡瓦尼亚开学了。

岛上各省的军事指挥权自然交给了起义军所信任的成员——劳尔·卡斯特罗在奥连特省，乌维尔托·马托斯在卡马圭省，卡利斯托·莫拉莱斯在拉斯维利亚斯省，德米蒂奥·埃斯卡洛纳在比那尔德里奥省、威廉·加尔维斯在马坦萨斯省。一个不十分“革命的”人，曾经从中美洲把武器空运到山区去的一个民用航空公司的驾驶员佩德罗·迪亚斯·兰斯，成了那支人数不多的空军的司令员；他是马查多审讯过的一个陆军军官的儿子。雷戈·鲁

① 《历史演讲》，第20页。

② 卡斯特罗对新闻记者说，《革命报》，1959年1月23日第13版。

维多担任的陆军参谋长的职位，则由西恩富戈斯接任。旧政权的兵士有些获得释放，但是被吸收到新军里去的为数寥寥。至于军官，则稍有不同：在总司令部里，托马斯·阿里亚斯上校成为人事处长；克维多少校成为后勤处长；在攻打蒙卡达之后救了卡斯特罗性命的那个黑白混血种人亚涅斯·佩列蒂耶上尉，成了卡斯特的警卫长。^①

另一方面，1月19日，有一百四十五名以前的军人跟大约三十名警察和二十五名平民，一起被关进了哈瓦那普林西佩监狱。

这支新军不久便显得实质上是这个政府的执行机构。例如，加尔维斯少校在马坦萨斯省解决了人造丝厂和久已著名的廷瓜罗制糖厂（它这时属于胡利奥·洛沃）的一次劳资纠纷。

这些治安部队，这支新军队和这支半新的警察部队，都是政府执行惩罚政策——这个处罚战争罪行的难决问题——的权力机构。巴蒂斯塔时代的一系列情况与恐怖，只是在它结束以后才变得很明白。尸体和骷髅，刑房和非刑拷打，都被发现后拍成照片，登载在报上。那些有儿子或是弟兄、丈夫或是同伴失踪了的人，都出面来要求报仇。采取手段来隐瞒自己身份的凶手为数寥寥。1月1日以后，天天都进行逮捕。规定采取这些步骤的法律，就是卡斯特罗和他的法律顾问在马埃斯特腊山颁布的那些通告。那些通告号召武装部队的军官们抛弃他们的职

^① 然而，有意义的是，旧军官们继续领取他们的年金。

守，号召政治家们不跟任何选举合作，并且断言要惩办那些即使是根据政府命令犯下罪行的人。因此，就这种意义而言，巴蒂斯塔手下的古巴人都受到了充分的警告，这项法律是在犯罪之前就制定了的；就这种意义而言，如同包括卡斯特罗在内的革命政府的辩护人所指出的，古巴的战犯审讯从法律方面讲，也胜过了纽伦堡的审讯：“称赞纽伦堡法庭的人，不可能反对我们的军事法庭。”《革命报》在1月13日辩论说。

还有其他一些不很具有法律意义的争论。外交部长阿格拉蒙特对来见他的外国大使和新闻记者辩论说，这是由于担心死者或遭受迫害的人的亲属会任意进行惩罚，象马查多逃亡后所发生的情形那样，才进行审讯的。担心会出现历史上相仿的情况，的确是很重要的一点。政府担心会象1933—1934年所发生的情况那样，一次成功的革命会产生出无数支小股匪徒，在全国各地粗暴地流窜。结果却是很少出现私自报仇雪恨的事情，这可以说是古巴在如此情况下的一个史无前例的发展；人们只要想到法国刚刚获得解放时的情况，^①就不难看出古巴人——这个在世界上动辄杀人的民族之一——所取得的是多么大的成就。对这种意见可以提出的唯一的保留是，一百名左右的俘虏所受到的待遇；他们似乎一到圣地亚哥，便立即被劳尔·卡斯特的士兵枪杀了。^②

① 指1944年法国从纳粹德国下获得解放。——译者

② 要读一篇似乎是真实的报导，可参看圣地亚哥天主教青年会的牧师豪尔赫·贝斯神甫对詹姆斯·莫纳汉和肯尼思·吉尔摩的谈话。（《大骗局》，纽约，1963年，第27页。）

接下来的审讯战犯，是由两三个起义军人员、一个陪审员、也许还有一个受人尊敬的当地公民所组成的法庭来办理的。^①此外，还有一个检察长和一个辩护律师。1月1日后立即主持审讯的是临时军事法庭；结果，全国各地大约有一百名左右的军官和警察人员被处决。但是，到1月10日，正式的法庭成立了；从此以后，根据报上的报道可以看得很清楚，从作了真诚的努力去证实被告是否有罪这个意义上来讲，审讯应该说是公正的。许多人承认有罪。一旦真相大白以后，情况当然不适宜于作出温和的判决。报上每天都刊登有支解的尸体的新照片，或是种种暴行的报道。虽然如此，决不是宣告有罪的人都被枪决了；巴蒂斯塔的嫡亲表弟萨尔迪瓦中尉因为虐待俘虏，在曼萨尼略被判了一年半的徒刑。有些人被判处较长期限的徒刑；有些人经过调查以后，没有加以审讯便获释了。到1月20日前后，大概有两百零几个人被枪决，他们都是因为残杀俘虏或是虐待俘虏。有些人，象那个因为在凯巴连以使用非刑而知名的警探卡拉·琳达，被捕之后又逃脱了，在乡间过了一段时期半土匪式的生

① 在圣地亚哥，是贝拉米诺·卡斯蒂利亚少校；阿亚拉上尉和奥连特·费尔南德斯上尉，孔塞普西翁·阿隆索博士和检察长豪尔赫·塞尔格拉。圣克拉腊：奥尔兰多·潘托哈上尉（格瓦拉在埃斯坎布拉伊时的副官，孔特拉马埃斯特雷以前的一个书记官），温贝托·豪尔赫·戈麦斯，德利亚·加约索，奥尔纳尔多·罗德里格斯，何塞·加尔班·德里奥，哈瓦那（拉卡瓦尼亚），调查工作：安东尼奥·利布雷上尉，阿尼瓦尔·索托隆戈、何塞·M·杜克·德埃斯特拉达，胡安·里维罗。在这些法官中，卡斯蒂利亚于1969年成为古巴军队的总参谋长，阿亚拉于1962年是政治警察的审判长，奥连特·费尔南德斯在六十年代中一直是卡斯特罗的一个重要的副手，处理建筑计划，塞尔格拉先是大使，后来1968年是无线电和电视台的主管人，潘托哈跟格瓦拉一起在玻利维亚被打死了，利布雷则一直在参谋部里工作。

活。^①枪毙的人中有许多根据大多数标准看来，都是死有余辜的。假如把他们监禁起来，往后再予释放，他们肯定会干出私自报复的行为来。这些人大部分是伍长、军曹或下级军官。坎蒂略将军因为让巴蒂斯塔逃跑，原定于1月5日不经审讯就枪决，后来由于厄尔·史密斯和巴西大使巴斯科·达库尼亚的干预而幸免一死。

然而，象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发生的情况那样，有势力的人逃脱了，只留下一些小人物来受惩罚；就这种意义而言，则这些审讯是不公正的。马斯费雷尔待在佛罗里达——1月6日乘坐他的快艇带着一千七百万美元到达后，立刻遭到拘留——可是他的汽车司机却在圣地亚哥等候审讯。警察头子本图拉上校也在美国，可是他的私人秘书却在哈瓦那监狱里。一些以前的部长——包括圣地亚哥·雷伊，他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名义上是所有这些人的首长——则待在外国使馆里，受到政治避难的法律庇护，随后被护送着坐飞机逃跑，他们对古巴的最后回忆便是群众所发出的“卖国贼——强盗——杀人犯”的呐喊声。

这些古巴战犯审讯刚开始，立刻就在美国受到攻击。两个重要的批评者是参议员韦恩·莫尔斯和《时代》杂志。这使得革命政府还成立不到两周，古巴和美国便产生了一种紧张局面，而1月14日国务卿杜勒斯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一份换文的副本却表明，国务院正在考虑对古巴施加某种压力，“以保证有一个遵守法纪和正义的

^① 卡拉·琳达直到1962年才被击毙（《革命报》，1962年7月24日）。

政府”。^①

史密斯大使这时已经离开哈瓦那，辞职了；大使馆交由一个代办负责；美国于1月7日承认了新政权，这无疑地是想起了1933年他们拒绝承认格劳后，接着而来的相互指责。其他的国家也继起仿效。

卡斯特罗在圣地亚哥或是哈瓦那的最初几篇讲话里，几乎没有提到美国。1月9日，有人问他是否知道美国提议援助这个国家的复兴工作。他回答说，所有的援助都是欢迎的。卡斯特罗可知道美国政府正在建议撤走它的军事顾问团吗？如果古巴政府要求顾问团撤走，那么它就不得不走。这并不是美国的特权，而是古巴的特权。此外，军事顾问团对巴蒂斯塔有过什么用处呢？他们出谋献策如何打败仗吗？“假如他们预备教我们这一套，那他们还是什么也不教我们的好。”当你为一个正义而光荣的事业作战时，战争往往就会取得胜利。1月13日，卡斯特罗暗指参议员韦恩·莫尔斯对审讯战犯的责难：

古巴革命已经受到……来自美国的……批评……有些产业，有些公司，害怕会从它们手里拿走一些不法的特权。军事顾问团也是如此……他们不能说我们是共产党人，因为如果这么说，他们就不得不讲，全体古巴人民都是共产党人。那将是荒谬的。^②

^① 参看威廉·A·威廉斯，〈美国、古巴和卡斯特罗〉第37页上的议论。

^② 〈革命报〉，1月14日第2版。

在这一篇讲话里，他说，“‘普拉特修正案’完蛋了。我认为它是强加在为独立而战的那一代人身上的，是不公正的。”但是，纽约的《每日新闻》却选在这个时刻登载了一篇文章说，“普拉特修正案”应予恢复。

参议员莫尔斯的批评，特别是他的建议，认为美国应当考虑诸如削减食糖份额，或冻结古巴资产这种报复手段，激起了莫大的愤慨，再加上有了丰富的历史事例，显然是很容易使古巴人发问：过去对巴蒂斯塔的暴行提出过什么抗议？1895—1898年，当这个“有利害关系的邻国”在古巴胜利的时刻进行干涉时（尽管它对韦勒的“集中农民”一声也不吭），不是发生过同样的事情吗？1933年又怎样呢？巴蒂斯塔跟国际间的报刊不是有着牢固的联系吗？因此，《革命报》的这篇社论宣布，晚上五时——加西亚·洛尔卡亡故的时刻（社论暗示，由于外国的忽视，另一个青年人被杀害了）——将举行一个声势浩大的民众抗议大会。从这时刻起，古巴人每天都从报纸上听说到一场“来自国外的”反革命的“阴险运动”。美联社由于过去跟巴蒂斯塔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又由于这一令人发窘的揭露，说美联社新近派驻哈瓦那的记者何塞·阿罗约·马尔多纳多每月从国民彩票机构领取了一笔七十一美元的乾薪，美联社便成了批评的特别目标。卡斯特罗在电视上说，他想跟美国保持最好的关系，但是他不能对那个国家采取卑躬屈膝的态度。“我并没有把自己出卖给美国，我也不接受他们的命令。”劳尔·卡斯特罗在圣地亚哥说，他无法明白美国如何能为处决战犯大鸣不平，因为美国以前就曾经把武器卖给巴蒂斯塔“来大量残杀古

巴人民”。^① 批评开始集中在巴蒂斯塔允许美国开发莫亚湾的这件事上。更糟的是，美国大使馆有四名人员结果竟是那个受人憎恨的特别警察的名誉成员。用强硬的语调讲话的，也不仅是卡斯特罗和他弟弟。乌鲁蒂亚总统也说得明白，他支持卡斯特罗所说的一切。

为了弥合这些开始出现的裂隙而作了一些微弱的努力。美国商会的领袖保罗·赫尔曼拜访了商务部长。美国大使馆否认政府跟莫亚湾的开发有过任何关系。但是使美国窘困的消息不断地出现。特别警察被查明跟联邦调查局一直有着特殊的关系；还有一些迹象（事实上始终未经证实），表明1952年巴蒂斯塔的第一任情报部长埃内斯托·德拉费，甚至从联邦调查局领过一笔薪金。好几个“战犯”——包括受人憎恨的警察头子本图拉、皮拉尔·加西亚和卡拉塔拉——都在美国避难。卡斯特罗要求引渡他们。1月15日，他以益发激烈的口气对一群美国新闻记者说，假如美国对古巴正在做的事情不高兴，他们可以把海军陆战队派来，那么就会有“二十万名美国鬼子死掉”。^② 1月16日，在奇瓦斯墓旁的一次讲话中，他把这个比喻反过来说，假如海军陆战队来了，就会有六百万古巴人死亡。在同一天的另一篇讲话里，他指控美国想阉割革命。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不接受国外命令的古巴政府在执政了。卡斯特罗再次为他的听众谈了些历史，讲得比以前更严厉了些：“普拉特修正案”是“一种羞耻和侮辱”；1933年，美国收买了巴蒂斯塔。得让全世界知道，古

^① 《革命报》，1月16日第8版。

^② 鲁比·哈特·菲利普斯：《古巴的窘境》（纽约，1962年），第28页。

巴“知道怎样保卫它自己。我们是一个很小的民族，但是很自豪……”“假如他们要跟古巴人民保持良好的关系，他们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尊重我们的主权。〔内战时期的〕罪犯并不是古巴人，而是当古巴人民遭到屠杀时一声也不吭的那帮人。”^①格瓦拉在拉卡瓦尼亚更进一步说：华尔街一向反对各国人民为争取自由的斗争，就象在危地马拉所发生的情形那样。对古巴也在准备着类似的侵略。当然，1月里，剑还没有出鞘。卡斯特罗只提到美国的经济利益，并没有提到政府。然而，象他本人所说的，这时候关系已经很紧张，即将响雷的阴沉空气已经出现。到1月底，美国军事顾问团即将最后撤走了。

^① 《革命报》，1959年1月17日。

第二十二章

最初的阴影

共产党的问题自然很早便出现了。古巴共产党即使声望不高，毕竟在巴蒂斯塔时代结束之后还存在下来了。1月2日，格瓦拉对一个北美共产党人约瑟夫·诺思说，在新古巴，共产党将象所有其他政党一样进行活动。但是，格瓦拉对他本国阿根廷来的一个记者激烈地否认，七月二十六日运动跟共产主义有任何关系。

我们的运动是民主主义的，我们都是民主主义者，心胸宽阔，对全美洲的合作很感兴趣。把拒不服从他们的人叫作共产党人，这本是独裁者们的一个老把戏。在一年半之内，一个具有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将要组织起来。到那时，就要举行选举；这个新政党就将跟其他这些民主党派展开竞争。^①

事实上，格瓦拉在抵达哈瓦那后不久，就派了他的一名军官，地理学家努涅斯·希门尼斯博士，去夺取镇压共产党活动局的档案和文件；这个机构是巴蒂斯塔和美国大使加德纳建立起来、并经中央情报局的莱曼·柯克帕

^① 《晚邮报》，1月5日；引自《革命报》1月5日。这似乎是格瓦拉所说的少数谎言之一：他通常倒是坦率的。

特里克视察和改组过的一个反共的警察调查局。局长法赫特上校逃到了迈阿密，但是他的副手卡斯塔尼奥上尉则被逮捕了。^① 1月6日，一道法令暂时取消了所有的政党。因此，共产党的地位就正式同革命党一样。^② 很少听人提起共产党人在山区或是拉斯维利亚斯省的作用，尽管那是微不足道的。费利克斯·托雷斯、阿曼多·阿科斯塔、巴勃罗·里瓦尔塔、伊兰·普拉特斯并没有置身在“革命的英雄”中，虽然实际上，他们和其他一些人曾经起过某种有限的作用。1月9日，西恩富戈斯对一个记者说，他本人在山区里只认识三个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但是，只要共产党不代表一个外国的利益，他们就有权象所有其他的民主党派一样把自己组织起来。群众对格瓦拉的政治见解所感到的不安，由于格瓦拉的可敬的父母到达哈瓦那而暂时有所缓和，尽管老埃内斯托·格瓦拉说，古巴的解放应当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

共产党在1958年年底的处境的的确是很奇怪的。在反对巴蒂斯塔的斗争中，它所起的作用比一般天主教徒还小。1958年4月那么晚的时候，它在总罢工中还准备采取同七月二十六日运动背道而驰的行动。后来，领导成员商定跟卡斯特罗结成同盟，派遣了它的最开明的党员

① 卡斯塔尼奥后来因为奸污了一位革命妇女而被枪决。他是一个干练的官员，能讲七种语言（见巴雷拉·佩雷斯的文章，〈自由波希米亚〉，1961年9月3日）。

② 据丹尼尔·詹姆斯说，何塞·伊格纳西奥·拉斯科代表〈消息报〉于1月6日在圣克拉腊访问了卡斯特罗。他们亲切地谈论过去一起上学的情况后，拉斯科问起“共产党的渗透”问题。卡斯特罗勃然大怒，据说立刻把话题岔开，谈起“美国佬的帝国主义”，以及他决不做“美国佬的另一个走卒。”詹姆斯：〈古巴：美洲第一个苏联卫星国〉（1961），第107页。

之一，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到山区去。拉斯维利亚斯省的党的领导成员于10月间抵达该省时，就跟格瓦拉和西恩富戈斯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同一个月，党的劳工领袖们跟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劳工部结成了同盟。所有这些自然都是新近发生的事，可能只是到胜利之后便不能维持多久的一种战术安排。诚然，劳工的安排就没有能持续到胜利以后。1958年11月，党认为反对党派的不和，使得在最近的将来不大可能推翻巴蒂斯塔，因此仍然希望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①而这时开始出现在反对党派秘密团体中的一些共产党员，则是“亲切谦恭、简直是委曲求全的；他们不要求别的，只要有机会来出点力”，因为他们认为卡斯特罗所领导的起义只有“一丁点儿的成功机会——而且也仅此而已”。^②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在1957年派了两个成员作为代表到山区卡斯特罗那里去；还有其他一些个别人物参加了起义事业。其中没有一个是重要的。然而，它却使共产党可以心满意足地来迎接胜利，并且在独裁时代宣告終了后，不象倘若巴蒂斯塔（比方说）一年前就逃走时，它会显得的那么不光彩。例如，它在精神方面的地位就多少胜过了主教们，因为主教们作为一个团体，在1959年1月1日以前并没有支持过任何一方。

因此，党原封未动地存在下来了。由于它没有参加

^① 致智利共产党的信，引文见路易斯·E·阿吉拉尔：《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纽约1968年），第42—43页。

^② 阿尔弗雷多·桑切斯的文章，《剑桥舆论》，1963年2月号。1958年，桑切斯曾参加哈瓦那的地下活动。

过巴蒂斯塔的任何一次选举，山区里颁布的任何一道法令都不妨碍它参加一切公共活动。1959年年初，它是在全岛各地具有健全组织的唯一政党。它可能有一万七千名左右的党员。^①如果是这样的话，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在人数方面大概超过了它。不过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是一种没有一套理论的业余运动，是一个同盟而不是一个政党，^②而是一个组织；有很多名义上属于其他政治团体的人，在巴蒂斯塔最后逃亡前一个月，仅仅因为告诉别人，甚或自认为自己是这一运动的成员，而非正式地参加了这个组织。因此，不论出现何种情况，古巴共产党在巴蒂斯塔垮台后的古巴都将能够起着较大的作用。在1947年，它毕竟曾经赢得十二万张选票，而在那以前，共产党人连续十年都很胜任地管理着各工会。1959年，他们所有的最著名的领导人都参加过1933年的革命。

此外，共产党不得不面对着的那种不光彩情况，可能是被夸大了的。它在战争时期的跟巴蒂斯塔合作，以及它跟格劳的合作，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事实上，党在巴

① 这是1959年11月中央情报局的卡贝尔将军的估计。其他的材料也说明同样的数目。安德烈斯·苏亚雷斯探讨了其他的数字（《古巴：卡斯特罗主义和共产主义》，卡迈克尔和哈尔珀林译（1967年，第6页））；他认为这些数字过高。1946年，党宣布有十五万名党员。在可以查明出来的人中——一般认为只有七万七千人——64%是白人，36%是黑人或混血种人；42%是产业工人，9%是农民，12%是中产阶级人士——技工、商人、专业人员、雇主和学生。

② 关于1959年以前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成员的人数，我未能找到任何正确的数字或者甚至估计。在《古巴和马克思主义》（巴黎，1963年）第103页上，雅克·阿尔诺说，哈瓦那有四百名成员。安德烈斯·苏亚雷斯（他的著作，第33页）认为这是言过其实。卡里略说，1959年1月1日他们的钱库里有三百万美元。

蒂斯塔第二次统治的大部分时期中所采取的消极路线，到了那个令人陶醉的胜利的日子里反倒更会遭到咒骂。在攻打蒙卡达兵营或是在“格拉玛号”上的那种史诗般的日子，大部分党书记到哪里去了？“躲在床底下，”卡斯特罗后来这样说。^①为了抵挡这种说法，他们只能说，他们一贯反对美国，反对巴蒂斯塔直到快要完蛋时的这个主要的后台老板。他们还有其他一些“资本”。他们可以夸耀说，在一些旧政党中，只有他们算是相当廉洁的。例如，1947年以前，当那个眉清目秀的黑人拉萨罗·培尼亚担任工会总书记时，他曾经因为每月从工资六百元中交回五百元而知名。古巴许多最优秀的作家不是共产党员，就是党的同情者，从继承他朋友加西亚·洛尔卡传统的一位口才敏捷的黑白混血种人诗人尼古拉斯·纪廉，到曼萨尼略的诗人曼努埃尔·纳瓦罗·卢纳。这些人把古巴共产党跟伟大的国际左翼文化传统，跟西班牙内战（纪廉曾经前去参加，尽管是作为一个“文化战士”），跟巴勃罗·聂鲁达、拉斐尔·阿尔维蒂和其余的人联系起来。他们的领导人中，有几个象罗德里格斯或是法维奥·格罗瓦特都是很有才干的人，在他们的追随者中，有许多都是心意善良的社会改革者。所有的领导人都有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而二十五年坚定不移地支持莫斯科（包括斯大林在内）使党所蒙受的不名誉，大概由于领导集团的连续不变动而抵消了。还有，布拉斯·罗加顺利地经历了1956年的“非斯大林化”的危机而存在下来；他在1957年到过

① 见1962年3月27日他的讲话。

中国,直接感受到他称之为“毛泽东的那种品德”。^① 罗德里格斯和马里内略在战时曾经担任内阁阁员,是拉丁美洲最早参加内阁的共产党员。最后,巴蒂斯塔把他的反对者都说成是共产党人的这件事,也帮助了这个党。他们获得了自己也许从来就没有企望过的一种重要性。1959年2月8日,《波希米亚》周刊发表了弗朗西斯科·帕雷斯(居住在古巴的一个西班牙内战的流亡者)写的一篇长文章;它有力地指出,共产党是“唯一在航行中的政党”。他还说,“菲德尔的菲德尔主义是不足以保证菲德尔主义生存下去的”,这真是一个精明的预言。

同时,共产党机关报《今日报》自1953年以来又第一次公开出售了,它由巴蒂斯塔时代共产党的五巨头之一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担任编辑。1月1日,哈瓦那的共产党搬进了他们在格劳执政时期建造的旧工人宫,古巴工人联合会的那个总部。但是他们不久就让给了全国工人统一战线。他们还接收了好几处小赌场,捣毁了里面的设备,在外面挂起牌子,表示共产党支部就设在那里。在哈瓦那,共产党夺取了1958年的一个次要的总统候选人阿尔维托·萨拉斯·阿马罗的政治总部作为党的总部。他们开始很慎重地举行会议,他们的第一个大会是为了纪念1933年的英雄老诗人马丁内斯·比列纳——这在一般党员以外总是可以获得同情的。诚然,对马丁内斯·比列纳和梅利亚的纪念,是党的最强有力的号召之一。在那几星期中,情况异常混乱,因此卡斯特罗

^① 见《今日报》,1959年5月6日罗加的访问记和1959年9月4日他这篇谈毛的文章。

至少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共产党人干了些什么。不过他们当然是唯一有组织的政党，也是在1月初不辞劳苦发表一篇新宣言的独一无二的团体。就是在卡斯特罗抵达哈瓦那之前1月6日发表的那一篇，其中共分四点：把起义军改为未来的军队的核心；向全国公布10月的土地改革法令；到东欧去为古巴的商品寻找新市场；以及恢复1940年的宪法。

在幕后，党已经设法在军队的一个部门中巩固自己的地位。格瓦拉从拉斯维利亚斯省带来了许多共产党员。虽然并没有对这些人公开加以宣传，但是有一两个在最初权力崩溃的混乱时刻里获得了，或者不如说是夺取了战略上的要害职位。这样，拉斯维利亚斯省的共产党领导人，圣克拉腊战役中格瓦拉的得力助手，又曾经以粮食接济过西恩富戈斯的阿曼多·阿科斯塔，成了面对埃尔莫罗和拉卡瓦尼亚、在港口的哈瓦那这边的古老要塞拉彭塔的司令员。这样一个职位也许只有象阿科斯塔这样一个能干的人才能得到，而不是在格瓦拉的示意下，或是由格瓦拉本人在拉卡瓦尼亚所作出的任命。几个星期内，新近加入共产党的马科斯·阿曼多·罗德里格斯，以“教官”的身份出现在拉卡瓦尼亚，^①他后来成为温博尔特街七号的叛徒而出了名。还有，阿科斯塔不久便接管了拉卡瓦尼亚的“文化活动”；这意味着他掌管着军事教育和业余活动，这一职位他自然以独断独行的热忱干了起来。好几个共产党员在他下面工作，其中有在

^① 《今日报》，1964年3月25日。

法国长大，并在危地马拉革命中取得了经验的阿尔维托·拉万德拉和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古巴志愿兵的政治委员、1958年共产党和指导委员会之间的“联络员”拉蒙·尼科劳。毫无疑问，在拉卡瓦尼亚所作的这些任命，是共产党势力进入起义军的开始。这显然是一种过程的开始而不是结束，而且第一步是从何而来的也不十分清楚——大概是从格瓦拉那里来的。但是应该假定的是，军队里的共产党员尽管人数很少，却从胜利后的第一天起，便利用一切机会来改善并扩大他们的势力。从1月初开始，他们便称赞革命的胜利。《真理报》在1月3日为古巴革命发出了欢呼：“古巴人民已经受尽了苦难，不可能被吓倒了。爱国人士有着……把解放事业进行到底的〔任务〕。”可是从另一方面，这已经引起了怀疑：一个美国外交官，哈瓦那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威廉·鲍德勒，在1959年1月16日左右断定，“共产党人到处都获得了地位”，^①而且尽管巴蒂斯塔逃走後共产党所发表的第一篇声明，即1月6日的那篇，是很温和的，1月11日发表的《论目前局势》却似乎相当激烈。

军队中所出现的情况也有可能出现在工会中。不过工会有一种反共的传统。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处境。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在所有的劳工运动中都有坚强的组织。因此，到1月底，甚至原来参加了1958年10月成立的工人同盟（全国工人统一战线）的共产党员，也发现自己被排挤出了全国工人统一战线那个人数较少的新执行委员会

^① 1962年鲍德勒对作者所说。

了。^① 他们并没有失去所有的追随者，因为他们还控制着几个工会——例如，码头工人和饮食业工人——还因为象后来泄露出来的那样，有些名义上中立的劳工领袖（例如，索托或是阿吉莱拉），实际上却愿意对他们表示同情。但是虽然如此，他们还是遭到了一次挫败；新的劳工部长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是一个知名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以前的劳工领袖象拉萨罗·培尼亚等，不是还流亡国外，就是需要时间来重新适应这种情况。

1月16日，卡斯特罗在奇瓦斯的墓前，亲口正式否认他是共产党员——鉴于奇瓦斯始终是共产主义的敌人，这倒是一个很合适的地点。他对奇瓦斯的称赞似乎证实了这一点。一个人当然不可能既事奉奇瓦斯又事奉马克思。卡斯特罗于1月22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重申这种否认。

如果说共产党人是在彼此相帮着获得有影响的地位的，那么天主教徒和其他的人也是如此。例如，农业部长、前革命党人和天主教徒索里·马林，就委派曼努埃尔·阿蒂梅和罗赫略·冈萨雷斯·科尔索这些青年天主教徒去统率乡村民兵和担任农业局长。

1月9日，卡斯特罗在抵达哈瓦那后的第二天说，将在“十五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举行选举：

^① 这是由九个委员组成的，不是二十一个。他们是何塞·佩隆、孔拉多·贝克尔（以前是糖业工人的司库）、安东尼奥·托雷斯、何塞·德赫苏斯·普拉纳、赫苏斯·索托和何塞·玛丽亚·阿吉莱拉。萨尔瓦多派到地下运动中来的代表奥克塔维奥·洛伊特和雷诺尔·冈萨雷斯分别担任了组织和国际关系的书记。安东尼奥·托雷斯在1956年11月30日关塔那摩的总罢工中是洛伊特的副手。

各政党将在八至十个月内组织起来。在初解放的三个月里，把人民推进政党斗争中去，那是犯罪的。宁可热狂地工作来重建祖国……在拉丁美洲，难得有不仅仅是军事政变的革命。

宪法要修订吗？“等到把一位临时总统推出来执政的时候，就标志着作了一次修订。”^①两天以后，卡斯特罗又接见记者，这一次是接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记者：学生指导委员会将参加不久即将举行的选举吗？“自然罗，”卡斯特罗说，“假如我们不给各党派自己组织自己的自由，我们就不是民主的民族了。我们就是为了给我们的人民以民主和自由而战斗的。”有些什么保证可以肯定将要举行选举呢？“舆论……我们的话……我们的意图……因为我们是没有任何私心的……因为显而易见的，不举行选举对我们并没有一点好处。”^②当然，大家已经知道，卡斯特罗想创造出“一个模范的美洲民族来”。^③1月13日，在里昂俱乐部，有记者就这些问题稍许追问了他一下：在选举之前，将要召开任何形式的国民议会吗？“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替换现行的宪法，而在于修订它，因此提到国民议会将是消极的。”有没有一个临时立法会议来帮助分担部长会议的繁重的负担呢？“临时政府将是短暂的，并且将……使人人都工作。我们的革命是真正古巴式的，真

① 《历史演讲》，第27页。

② 1月11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访问，引文见莱奥·萨维奇：《卡斯特罗主义剖析》（巴黎，1962年），第74页。

③ 1959年1月10日，他在国家警察局说这番话的。

正民主主义的。”^①两天之后，总理米罗·卡多纳博士解释说，1940年的宪法已经通过这次革命“获得实现”了。然而，这后来似乎意味着，宪法中有几条将予以修改。例如，使刑法可以追溯既往的第二十一条，假使被告获得宽恕，就可以暂停应用，把与“暴君”合作的人排除在外。禁止判决死刑的第二十五条也加以修改，以便明白规定对巴蒂斯塔的党羽和其他的人使用这种处罚。将实施没收巴蒂斯塔党羽的产业。当然，这些宪法条文的修改都是以法令形式公布的。只有总理米罗似乎提出过抗议。但是他为了对那些他理直气壮地认为是极权主义的做法表示抗议而提出的辞职要求，被同僚们撇在一边后，他也没有再坚持下去。

内阁几乎连续不断地通宵开会。这时候，内阁除了其他任命以外，还批准任命一个部长去“考虑革命法律的根据”——也就是说，宪法的性质。这个职位落到了西恩富戈斯一个四十岁的律师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的身上。多尔蒂科斯出身于创建西恩富戈斯的一个家庭，跟十九世纪的百万富翁托马斯·特里是远亲——跟一个老革命党人、新近被捕的巴蒂斯塔工农业开发银行的官员之一，佩德罗·洛佩斯·多尔蒂科斯则是较近的亲戚。他年轻时曾向共产党献过殷勤，一度担任过共产党文艺主管人胡安·马里内略的私人秘书。但那已是很早以前的事了；马里内略是一个傀儡。如今，西恩富戈斯游艇俱乐部主席，西恩富戈斯各大公司的律师，全国律师公会会

^① 《革命报》，1959年1月14日。

长多尔蒂科斯，显然是新部长中资产阶级气息最浓的。他在西恩富戈斯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也很小。

在乌鲁蒂亚的临时政府中被安排得很好的那些自由党人，不幸未能维护他们的崇高原则。虽然这主要可以用卡斯特罗的政策、权力和个性来解释，但是他们却为自身的毁灭创造了条件。首先，乌鲁蒂亚跟卡斯特罗一致认为，十八个月内将不举行选举。在那时以前，将通过法令来统治。这一决定似乎并没有遭到任何人反对。内阁颁布的第一批法令中，有一道是解散巴蒂斯塔的国会。另一道是解散过去所有的刑事法庭。第三道法令是取消所有的政治党派：《革命报》这样鼓吹说：

我们结束了过去一切弊端、从前的一切政治把戏。革命的胜利不能为各个时期的机会主义者的微小利益开绿灯。决不允许没有参加过革命斗争的傀儡们……有任何机会以他们的莫大的伪善来出卖革命。隶属于一定的政治党派的高尚人士，在……临时政府中已经有了职位……其他的人……还是保持缄默为好。^①

第四道法令禁止 1954 年和 1958 年选举中的全体候选人参加政治生活。有些人，象菲德尔·努涅斯·卡里翁博士或是阿尔维托·萨拉斯，就是因为胆敢参加那些选举而被逮捕的。前者在 1958 年渴望做哈瓦那市长，后者则想当总统。1 月初又有法令冻结巴蒂斯塔手下全体

^① 《革命报》，1959 年 1 月 7 日，第 7 版。

文官的银行存款，并且停止支付巴蒂斯塔时代任何未兑现的大数额支票。^① 这些法令都与摧毁过去和消灭贪污有关。巴蒂斯塔的银行存款在后继的人看来，是荒谬绝伦的；为了防止被认为是盗窃国家财富以谋利的人，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似乎是可取的。

但是，为什么想到在十八个月内将不举行选举呢？阿格拉蒙特和乌鲁蒂亚，帕索斯和米罗·卡多纳为什么接受这一迁延呢？乌鲁蒂亚和米罗·卡多纳当时都解释说，为了考虑到政权由不合法转为合法，不得不对1940年的宪法作些改动。古巴其余的自由主义人士为什么不加思索地就接受了这一迁延，还跟着《革命报》一起欢迎政党的消灭？因为象卡斯特罗本人一样，而且无疑地，还象群众一样，如果他们的见解可以有效地试探出来的话，他们也准备抛弃政治。就连前总统普里奥和1952年人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阿格拉蒙特似乎都准备（甚至是急切地）服从于一个象卡斯特罗这样的“全国导师和领袖”——在1月里就已经称作“最高领袖”了；他们也想要清洗古巴，而不想重新建立旧的制度。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成员都很快活；这个运动始终不是也决不会成为一个政党。

诚然，在胜利的初期，几乎只有卡斯特罗敢说，“持不同意见和表示反对的权利”是一种不可转让的权利。“我们不想把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变成一个单一的集权主义的政党，”1月6日，他对拉斯维利亚斯省的听众这样说。但是，在他的大多数声明中，他都试图以全拉丁美洲作为他

^① 其他的法令有中止三十天内不从司法部门里免职的保证，把巴罗素开除出食糖平准机构，取消国家发给新闻记者的各种津贴等。

的革命的背景。例如,1月22日,他对一些记者(内中有些是拉丁美洲的记者)说,“他心里〔原文如此〕有一个梦想 就是,有朝一日拉丁美洲将会完全联合成为一支力量,因为我们具有相同的人种、语言和感情。”^① 虽然如此,卡斯特罗却也是一个极端的,简直可以说是过了头的爱国主义者:“很难找到这么高尚、敏感和厚道的一个民族;你在这里看不到斗牛,因为人民会起来反对。”^② 当他说到“美洲”时,他指的也是南美洲。

首先,我们拥有我们国家和我们美洲的全部利益……我们正在保卫我们人民的利益,我们需要政治和经济的独立,并且〔渴望〕停止剥削,在人类自由的最广泛范围内建立社会独立的制度。这就是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哲学……〔到不再需要维持自由的〕那天,我们就将辞职……到大多数人反对我们的那天,我们就将辞职……。^③

在1月底,所有这些论点都贯穿在卡斯特罗的一系列讲话中。1月22日,在总统府前面举行了一次大会,拥护政府处理“战犯”的政策。民众倒是比1月8日欢迎卡斯特罗时还要多。横幅上写着:“古巴妇女要求处决杀人犯”;“伸张革命正义”;以及“引渡专制政权的狗腿子”。有些横幅是用英文写的,大概是照顾到匆匆赶到哈瓦那来的美国记者。其他的横幅重新提到了纽伦堡。卡

① 《革命报》,1959年1月23日,第14版。

② 同上,第15版。他没有提到斗鸡;这是人民无疑会起来使其保存下去的。有些人喜欢鸡,有些人喜欢牛。

③ 1月23日的讲话。

斯特罗站在为总统特别造起的讲台上，四周大多是他的较为显要的追随者。他的讲话基本上是指责美国过去很少有人批评过巴蒂斯塔当权时的暴行，现在却胆敢对审讯战犯横加指责。但是这也是一次成功的实力的考验。因此，他要求凡是赞同革命正义的人举起手来。当然所有的人都举了手。卡斯特罗接着说：“外交使团的各位先生，全美洲新闻界的各位先生，一百万有着各种思想、来自社会各个阶级的古巴人组成的陪审团，已经表决了。”^①

卡斯特罗能言善辩地利用了报纸上所透露的一种忧虑，说他也许会遭到暗算；但是，“人民的命运不可能取决于一个人……因为……在我后面有比我更为激进的人……〔因此〕暗杀掉我只会加强革命。”他接着提出他的弟弟，那个不可思议的、身体几乎象个小孩的劳尔，作为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第二把手，万一他死了，就接替他。他要求美国引渡逃往那里的战犯。他还引用了（也许是相当明白地）《圣经》上的话，来证明处决战犯是正当的：“用刀杀人的……”^② 他解释说，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不象美国那样，并没有杀害过无辜的人；大家都知道，美国为了救北美人的生命而在广岛和长崎的所作所为，^③ 古巴对美国并没有敌对的情绪，但是他相信美国有反对古巴的势力，

① 《历史演讲》，第 37 页。

② 《新约全书·启示录》第 13 章第 10 节：“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译者

③ 指美国于 1945 年 8 月 6 日在日本广岛和同年 8 月 9 日在日本长崎投下的两枚原子弹。——译者

“害怕革命的势力”。^①这篇讲话暗示出，卡斯特罗不是害怕美国干涉，就是已经在用这种想法来搅扰他自己和古巴，从而鼓动士气和团结，一种支持他和他的胜利的团结。他把对审讯战犯的批评说成是一场“有组织的批评运动”；至于谁该负责，他却说得含含糊糊，只是暗示说，这些批评是通过美联社或者合众国际社在进行的。他似乎还在形成一种完全独立的、也许在国际上守中立的（尽管这种意见还要加以充分探讨）古巴的概念，他显然还想到马蒂。在发表这篇讲话的同一天，他对新闻记者直言不讳地说，攻击处决战犯的“势力”，事实上是想摧毁革命。1月22日，有一个墨西哥人问他，如果美国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他将如何应付，而且已经在攻击古巴革命的“强大的美国势力”，会不会把七月二十六日运动诱进那个害人的冷战泥淖里去。卡斯特罗坚定地说：

我们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来避免世界问题把我们的理想变为那场斗争的一部电影剧本。的确，各种不同的垄断事业……都在力图从它们可以收买的政府中取得各种特权这个角度来安排事情；其中有些往往可以指望获得美国当局的支持……。

如果这种公司将来试图使革命完全瘫痪，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古巴人民将不得不根据情况所需来进行自卫。卡斯特罗认为不至于会发生这种情况。“其实我并不怕落进国际共产主义的轨道里去。我们在做些什么来

^① 《历史演讲》，第44页。

保卫革命呢？我们有没有寻求共产主义的支持呢？没有，我们是在寻求美洲各国人民舆论的支持。”^①

面对着这么多批评，古巴政府决定在哈瓦那大体育场公开举行第一次战犯大审讯。被告是赫苏斯·索萨·布兰科少校、格劳上校和莫雷洪上校；军事法庭的成员是：天主教徒律师和山区的检察长温贝托·索里·马林（农业部长），乌尼维索·桑切斯少校（“格拉玛号”人）和芳尔·奇瓦斯。^②体育场里不幸坐满了愤怒呐喊的群众，以及三百名古巴和外国记者。群众打断了证人的作证，高呼“土匪”、“杀人犯”、“凶手”。第一个受审的索萨·布兰科站在他本人称之为“一个罗马竞技场”之前，举止冷漠、愉快，而且相当尊严。在那种气氛里，仔细地审问证人是不可能的。无疑，象许多人证明的那样，索萨·布兰科于1957—1958年在奥连特省是犯下了许多杀人罪的。他在莱维萨焚烧了二百所民房，有些房屋里还挤满了人。1957年10月10日，他在埃尔—奥罗—德吉萨杀死了阿戈特·德塞斯佩德斯家的九个人。有个农民的寡妇发誓说，索萨·布兰科曾经当着她面开枪打死了她的丈夫。有个男人说，他在德奥库哈尔矿区看见索萨·布兰科开枪打死了十九个工人。他至少是犯下了一些（也许是大部分）这类罪行，这似乎是无庸置疑的，尽管事实上除传闻的证据外，并没有提出其他的证据来。有

① 《革命报》，1月23日，第15版。

②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中的第一个后来在两年内因为叛国，自己也被处决，而最后的一个则逃亡在国外。乌尼维索·桑切斯是一个不重要的陆军军官（1970年）。

些罪行发生在1958年2月马埃斯特腊山发出第一道“法律”之前，那道“法律”曾答应给予巴蒂斯塔军队中进行过杀戮的成员以公正的审判。但是，就连那道法律的地位又怎样呢？这些论点都由辩护律师阿里斯蒂德斯·达科斯塔上尉提了出来；他还说，在战争中确实发生过这种事情：这一方杀了对方的人。这些论点都被驳回了，索萨·布兰科被判处死刑。尽管这次审判原来是想向世界其余国家证明革命审判的公正，事实上却成了为它可能作出的最糟糕的广告。美国报纸同意被告的说法，认为审判是一场竞技表演。

1月22日，卡斯特罗动身到委内瑞拉去，参加那里为赶走独裁者佩雷斯·希门尼斯一周年而举行的庆祝大会，同时对那个“姊妹共和国”在古巴斗争中所给予的援助表示感谢。当选总统贝坦科尔特那时仍然是委内瑞拉左派和中间派的英雄。一大群人出来欢迎他，无可怀疑地证明他在整个大陆上都有追随者。卡斯特罗按照邱吉尔的方式做出一个胜利的手势来回答。

卡斯特罗在加拉加斯作了多次演讲。他再次否认古巴的革命是共产主义的。他向委内瑞拉国会保证：“我们古巴在两年之内也将有一个国会。”古巴和委内瑞拉之间的签证手续将予废除。一个委内瑞拉军事代表团将应邀去指导古巴的新军队。美洲国家组织里将充满民主人士，独裁者将被排除出去。^①拉丁美洲有可能成立一个共同市场，也许采用一种共同的护照；“美国将不得不适应

① 《历史演讲》，第46—49页。

于拉丁美洲的政治，而不是一直保卫着垄断资本的利益”。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当然将成为一个政党，因为古巴将不会永久废除政党，新政党将陆续成立起来，尽管旧政客们将不得不离去。他，卡斯特罗并不渴望当古巴总统。的确，他正想周游一次南美洲，部分是为了杜绝“那些热衷于维持他们在古巴的特权的垄断势力的诽谤，部分是为了在拉丁美洲各国播下团结的种子以保护拉丁美洲各国的共同利益”。卡斯特罗离开了加拉加斯，答应不久将派遣一个代表团到委内瑞拉，和当选总统贝坦科尔特商定一个共同一致的政策。到此为止，一切都很好。

事实上，卡斯特罗和贝坦科尔特总统举行了一次相当奇怪的会谈。他们单独在一个大院子里谈话，尽管远处有卫兵在四周保护着。卡斯特罗开门见山地说话。他对贝坦科尔特说，他在想“跟美国鬼子一决胜负”。如果有需要的话，贝坦科尔特能以一笔三亿美元的贷款并以石油来援助他吗？贝坦科尔特大吃一惊，作了一个令人气沮的答复：他本人感兴趣的是渐进而不是革命。

与此同时，坦率的格瓦拉（他仍然只是拉卡瓦尼亚要塞的司令员）暗示：他自己的政治纲领，将使任何一个资本家对他的根本动机有理由感到严重的不安。在1月27日的那篇讲话里，他解释说，起义军，“古巴人民的先锋队”，是“斗争的主要工具”；全国都应当变成一支游击大军。

在这些话说出后的好几个月里，一种抒情诗般的精神在古巴存在下来；而离开这个岛国的外国人，莫不被革命者的崇高品质、精力与魅力所迷惑，然而，从1959年年

初起，就有人确实感到不知将出现什么情况。对许多人说来，1959年1月这个月，在哈瓦那是一个充满了美好希望的独特的历史时刻，是一个新时代的黎明；伟大的计划已经开始了；然而，从大多数人一点也不欣赏的这一点来看，它也是旧世界的结束。

第二十三章

卡斯特罗在美国

1959年春季，在古巴竞争权力的各方似乎已经基本上只有三个集团：卡斯特罗和起义军；共产党；以及好心好意的自由主义人士。然而，这些竞争者彼此并不都是这样看法。这些竞争者迄今既还没有竞争，他们也不象表面上那样的团结。起义军的军官都是那么忠心吗？自由主义者已对他们的自由主义决定了关键性的论点吗？所谓忠于卡斯特罗，究竟是什么意思？在这一场事后看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夺取权力的斗争中，有些人从来不曾战斗过，不管他们是真正忠于哪一方面。

其原因多少在于卡斯特罗的个性。巴蒂斯塔逃亡后一个月，卡斯特罗已在古巴群众中建立了威信，这是过去拉丁美洲一些领袖所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即使庇隆在他威望最高时也没有受到这样明显和这样普遍的爱戴。在那些多年来毫无希望地梦想着稳定工资，梦想着子女能上学、能得到医疗的人看来，卡斯特罗就是一种比1933或1934年的格劳更光明的希望。他已经是群众的战士，他们都愿意放弃自己的意志，相信他不会辜负这种期望。卡斯特罗从委内瑞拉回来以后，常常在电视屏上出现（美国国务院已在开始埋怨那四十万套电视机的推销员）。结果他倒不大象戴高乐或者肯尼迪（另外两个善于利用电

视的人)，而更象一个终身担任听取忏悔的神甫或者驻在当地的革命巫医。他唤起了群众的希望，而这些群众在1月以前还是一些麻痹、失望、玩世不恭、迷迷糊糊的“穿破裤子的慈善家”，并且是反对政治的。群众觉得卡斯特罗那种人所共知的不守时间、变化无常、不相信常规和法律、缺乏先见之明以及喜欢说话，似乎最象他们自己。中产阶级则觉得他已经是个可疑人物。精神病学家注意到他常常在演讲时手腕上戴着两只手表。

电视和无线电当然是掌握在私人手里，包括两家强有力的全国范围的电视网在内：《世界报》社的第二号波道，梅斯特雷兄弟公司的CMQ电视台。可是，卡斯特罗要露面，向来没有什么困难，而且有几家小电台，例如哈瓦那电视公司第十二号波道、起义军电台、团结电台、和孟比电台，从一开始就是卡斯特罗的无条件的拥护者。

卡斯特罗本人心里一定经常想到格瓦拉（由于他在危地马拉的经历）和劳尔·卡斯特罗两人所散布的疑虑，觉得只有用一种极端的解决方法才能取得胜利：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便是革命失败。至于那些中产阶级的人，不管他们的动机好坏，他们的想象主要是模糊地希望对美国报复，对这些人来说，卡斯特罗光是由于他的惊人的胜利，就已经代表了挑战的精神。整个春季，群众大会上数以千计的人举着标语牌高呼“谢谢菲德尔！”，“谢谢”迄今已经取得的胜利和将要取得的更多的胜利。哈瓦那的对面就是拉丁美洲，它几乎还是第一次注意到古巴；在古巴以外的整个世界也是如此。从来没有一个古巴人象卡斯特罗这样出名。西班牙的牧羊者和约克郡的羊毛工人都

已经听到了“菲德尔”；作为一个国际新闻的敏锐的研究者，他知道他们已经知道了。

卡斯特罗现在所作的、并且已经成为他保持权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的这些演讲，从来都不是经过细心准备的。他当然要考虑一下他希望强调的一些论点，可是他认为：

如果你想使你的想法具有一定的形式，预先给它们划一个框框，那么，在你开始讲话的时候，你就失去了听众能够对演讲者施加的一种最美妙的影响，也就是，不能把他们自己的热情、力量、和灵感通过演讲者而传达出来。我的演讲往往就是同听众交谈。^①

在对巴蒂斯塔的党徒开动清算机器的同时，全国各地都传来监禁、审讯和执行死刑的消息，还发表了一些巴蒂斯塔政权的严刑拷问的血淋淋的报道，以及关于旧政权掠夺财富的证明文件。^② 农业收获也在进行，这是古巴成为世界最大食糖生产者以来的第一百三十次收获。总统已经下了命令，规定1959年的糖产量应为五百八十万吨，其中三十五万吨供应国内市场，二百二十万吨供应美国，五十万吨作为以后供应美国的储备，一百五十万吨供应世界市场，其余的供各种储备之用。

可是，已经出现了不一致的意见。在华盛顿，仍然

^① 洛克伍德书，第178页。

^② 很古怪，这个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权竟然会雇佣一个北美人在拉卡瓦尼亚充当死刑执行人的头头，此人名赫尔曼·马克斯，北美密尔沃基州人，曾犯刑事罪，以前在埃斯坎布拉伊参加格瓦拉部队。

在国务院负责加勒比海科的威兰，写了一份备忘录，认为“如果我们加强古巴的温和派，菲德尔就会看到他自己的政治寿命取决于温和派，而摆脱他同极端派的关系”。^①但是，不管美国是否知道所谓“极端派”是谁或者是怎么样一回事，他们目前都无能为力了。更重要的是，在古巴国内，古巴电气公司的职工六千人，为了争取提高工资20%，宣布了怠工，同时，在1957—1958年被公司解雇的职工六百人开始在总统府附近游行，要求复职。还有失业的铁路工人和哈瓦那附近的一家已关闭的造纸厂的工人举行绝食示威。三千名建筑工人离开莫亚湾。餐馆工人准备罢工，除非赌场重新开门。二十一家糖厂的收获由于工资要求而被推迟。革命引起了种种希望，应该怎样满足这些希望呢？卡斯特罗表示同情这些要求，但呼吁大家不要罢工。在对壳牌石油公司工人的一次讲话中，他说：“我们进行革命不是为了保卫高贵者的利益而是保卫卑贱者的利益。现在，正确的战略是避免重大的冲突，哪怕是必须作出一种牺牲，因为现在的牺牲会在将来得到更多的补偿。”^②可是，怎样实现这些目的，还不清楚。

也许更为尖锐的是，卡斯特罗和幽默报纸《闪电报》发生了一场争论，《闪电报》是古巴的《鸭鸣报》。《闪电报》开他的玩笑。卡斯特罗声称要取缔它。幽默的时代已成过去了吗？人们开始疑惑（当然，只是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是否一切已经解决了。在全世界的人看来，卡斯特罗也许似乎是一个掌握命运的人物。在他的亲密朋友看来，

① 《共产主义的威胁》，第649页。

② 《历史演讲》，第52页。

他似乎已经更“迷失在权力的迷宫里”。^①卡斯特罗曾对壳牌公司工人宣布，他为革命可以作任何牺牲，但决不“用暴力来进行革命”。人们暂时都相信他。

2月7日，内阁批准了所谓共和国的基本法，这是废除1940年宪法的一项重要措施。立法权被赋予内阁，只有内阁能更改基本法。这样，尽管自由主义者至少名义上还在执政，一项独裁的措施却已使权力永远保存在一个自我永远保有权力的内阁里。在民主主义者看来，难以相信这真正可以用乌鲁蒂亚总统的说法——“革命时期的要求”——来辩解。^②然而，乌鲁蒂亚一心只想到一件事：取缔赌博。乌鲁蒂亚建议补偿赌场职工的损失。卡斯特罗在电视中轻蔑地说“坐在有空气调节设备的办公室里，要夺掉赌场职工嘴里的面包是很容易的”。^③乌鲁蒂亚想辞职。有人劝他留下来。这是卡斯特罗同他自己建立起来的政府的第一次冲突。

第二次冲突不久也到来了。总理米罗·卡多纳博士这位著名律师从一开始就发现自己的地位是有名无实的。同乌鲁蒂亚总统一样，他已在1月里，为了恢复死刑和使法律处分可以追溯的问题辞过一次职。可是，由于他没有实权以及卡斯特罗没有真正的责任，加上他已是中年，同卡斯特罗等青年比起来，相形见绌，所以他现在坚决要辞职了，并推荐卡斯特罗继任总理。卡斯特罗偕同路易斯·奥尔兰多·罗德里格斯去见乌鲁蒂亚。罗德里格

① 卡苏索书，第202页。

② 在流亡中写作时就是这样说法(乌鲁蒂亚书，第35页)。

③ 《革命报》，2月1日。

斯是前革命党的青年领袖，现任内政部长（虽然不是卡斯特罗的亲信），他对乌鲁蒂亚说，卡斯特罗现在应该担任总理职务，因为这样“革命就可以获得团结”。卡斯特罗说，“他可以接受总理的职位，但是，既然他将对政府的政策负责，就需要有充分广泛的权力，使他能够有效地行动。”^①就是说，他不要乌鲁蒂亚主持内阁会议或者甚至不要他出席内阁会议。乌鲁蒂亚说他“很高兴让卡斯特罗当总理……享有他所需要的广泛的特权”，又说他本人想要“离开总统的职位，进最高法院”。乌鲁蒂亚向内阁提出辞职书，可是几位部长，以及卡斯特罗，请求他不要这样做。公共工程部长曼努埃尔·拉伊说：“博士，不要辞职，你是革命的最后希望。”^②乌鲁蒂亚又一次同意留任；此后他不出席内阁会议，只在名义上拥有对法令的否决权。

这是自由主义者所作出的一些重大让步。米罗后来写道：“我辞职了。古巴不提出抗议；它认可了，它赞成。”^③对乌鲁蒂亚说来，也是开始完结了。假如他是一个具有较大的干劲、决心和想象力的人，也可能很有成就。可惜，他不是政治家。他在法院工作太久了。他只关心应该在什么地方写上大写字母。他早晨起身太晚。他从来不坚持应该迅速公布选举的日期。

卡斯特罗就任总理时，故意强调自己的稳健态度；他

① 乌鲁蒂亚书，第38页。

② 这是乌鲁蒂亚的记述，卡斯特罗对李·洛克伍德的叙述中最初一部分也证实这一经过，除了当然没提到拉伊的这句话。

③ 《海洋日报》，1960年11月12日。

讲到他“没有个人野心，只忠于原则，对民主抱有不可动摇的和深切的信念”。他否认曾经想到要压低租金；并保证古巴的生活水平不久就会提高到超过美国或苏联。另一方面，他还在2月23日宣告“现在组织选举是不正确的。我们应该取得压倒的多数。把选举推迟到政党获得充分发展，各党的纲领都明确规定以后，是符合公众利益的。”^①这是一种意图的声明，还是欺骗呢？如果是欺骗，是不是也是自欺？这种说法大概卡斯特罗后来也会认为是根据不足的。这时候，卡斯特罗已经任命他的“比较急进的”兄弟劳尔当武装部队的总司令。这显然意味着军队更进一步向左，因为国防部长是马丁内斯·桑切斯，曾在马埃斯特腊山中当过劳尔·卡斯特的总军法官；“第二战线弗兰克·派斯”似乎控制着陆军。

2月16日，就是卡斯特罗就任总理的那天，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全国协调委员谈到目前“正在进行”的革命时，用了一些有点费解的字眼，把革命认为“不是一种行动，而是一种过程”，这过程的特征将是长长一系列具有社会意识的法则。这些被归纳为十六点，但卡斯特罗本人并未正式承认。然而，他确实常常用暖昧费解的方式反复地提到“过程”这个词；在他对内阁的第一次讲话中，他说必须“开始……革命”；^②同时，他已经开始向比利时购买轻式步枪和手榴弹等武器，表面上是害怕特鲁希略入侵。

共产党人和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成员之间发生了许多

① 《革命报》，1959年2月24日。

② 洛佩斯·弗雷斯克特书，第47页。

小纠纷。因此，公民抵抗运动的前息工者冲进共产党报纸《今日报》的报社，而主要由七月二十六日分子控制的警察却不加阻止。该报主编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说，“如果菲德尔认为现在起义已经获得胜利，我们共产党人将要进入修道院，他就错了。革命还没开始，如果他选择正确的道路，总有一天我们大家要会合在一起的。可是，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迟早总要转入地下。”^①

卡斯特罗的内阁会议（这种会议不久就变为每周一次，而不是先前那样差不多每天举行了），从一开始就是不平常的聚会。也许规定内阁应在3点钟开会。卡斯特罗却要拖延三个小时或者更多的时间以后才出现，来时也许由塞莉亚·桑切斯和格瓦拉陪着。这时候，部长们就要这位“领袖和导师”对他们讲一个特定的计划。卡斯特罗可能说他需要睡觉，因为他昨晚三点、四点或者五点才上床，于是会议可能再推延。

有时候也许只召开有两三个人参加的讨论会，长时间商谈某一位部长特别爱谈的问题：例如曼努埃尔·拉伊的关于他认为十分需要的二级公路的计划，这是喜欢大公路的卡斯特罗所反对的。拉伊自己在1月间已经主动地接收了一批在未来发展中可能需要的重型设备（蒸汽碾路机、压路机），他也许是最近几个星期中最活跃的一位部长了。他的第一步计划是完成所有已经开工的巴蒂斯塔留下的工程。卡斯特罗同意了。可是拉伊不喜欢那个东哈瓦那计划，认为这个计划在房屋方面的投资

^① 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方特提供的材料，该报主编说这番话的时候他也在场。

太大。在这种谈话中，拉伊，这位在1月以前同卡斯特罗只会见过两次的前任哈瓦那地下领导人，开始怀疑卡斯特罗了。卡斯特罗是在玩弄他们吗？另一方面，卡斯特罗的同事们却觉得他善于倾听别人讲话。无论是在两三个人还是在两三千人中间，他的魔力始终都很大。

在2月间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卡斯特罗走到几位部长面前说：“我接到美国报纸编辑^①的邀请，要我上美国去。我该去吗？”“当然去，”银行行长帕索斯回答道；他虽然严格说来不是部长，当时也在场。“可是假如艾森豪威尔请我上白宫去呢？”“你就该去，”帕索斯说。卡斯特罗显然是担心他自己会失掉作为革命领袖的威望，恐怕拉丁美洲一些崇拜他的人也许会认为他已经出卖给北美，象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许多其他被人想象为急进的领袖曾经搞过的那样；卡斯特罗要使古美关系良好这一微小的目的，再次成为拉美以往许多领袖历史上的弱点的牺牲品。

在此期间，来了一位新任美国驻哈瓦那大使：菲利普·邦斯尔。此人对西班牙语国家具有长期的经验，二十年代在电话公司任职时经历了动乱的岁月。他曾在数以百计的安达卢西亚的村庄里架设电话，那时候，西班牙的传统右派认为电话是一切麻烦的根源。近年来，他曾任美国驻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大使。他也曾短期当过驻哈瓦那的副领事。他是1898年战争中一位记者史蒂芬·邦斯尔的儿子，既有经验又具有一般说来是进步的和

① 美国报纸编辑协会。

乐观的民权党人思想。他未到任以前，在华盛顿时曾说过：“根据大量的尽管是矛盾的材料，卡斯特罗不是一个共产党人。”^①

古巴的上层阶级造成了使邦斯尔很为难的情况。卡斯特罗本人，同他左右的许多人一样，总要想起 1933 年萨姆纳·韦尔斯在古巴的情况，后来他谈起邦斯尔的到任，好象真是韦尔斯来了似的。他在 1961 年有一次对听众说：上层阶级的人

……无休无止地谈论邦斯尔到任的日子，三天前无线电和电视……就开始谈论邦斯尔要来了，好象是真正的一件大事。宣扬得那么厉害，以致所有的革命人士或者有自尊心的人（即使不是革命者）都开始觉得毛骨悚然……邦斯尔被看成一个总督了。^②

结果，卡斯特罗有一段时间避开了邦斯尔，不举行正式会见，没有疑问，他实际上还拿不定主意，要对美国采取什么政策。总之，他一方面避开美国大使，另一方面仍然接受邀请，将于 4 月间访问美国的报纸编辑。

到此时为止，标志着革命的持征的是人们的心情，而

① 邦斯尔：《古巴、卡斯特罗和美国》一文，载 1967 年 1 月《外交季刊》，第 266 页。菲利普·邦斯尔（生于 1903 年）先后在圣保罗、康科德和耶鲁大学读书。1926—1935 年在西班牙、智利、和古巴为国际电话公司工作。1938 年，驻哈瓦那副领事；1942—1944 年，国务院美洲国家司司长；1944—1947 年，美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一等秘书。

② 《革命文献》1961 年，第 46 期，第 24 页。卡斯特罗在其他地方提到邦斯尔也是这样说法。例如，在会见李·洛克伍德时：“他来时的气派象是一位总督……；反动报纸欢迎他好象来了救世主似的。”（第 141 页）

不是什么积极改善人民生活情况的行动。然而，3月间，政府采取了几项明显的进步措施：房租低于每月一百元者减低一半，因此城市中大多数人的购买力也许可以提高三分之一（房租超过每月一百元者减低30%或40%）。空地皮必须出售，或者卖给新成立的全国储蓄和房屋管理局或者卖给任何想要建造和购买房屋的人。全国储蓄和房屋管理局也接收了彩票管理机关的全部基金，以后不发行彩票，改发债券。这种债券，如果存放五年可以按110%取兑，如果提前取兑则利率较低。政府也接收了电话公司——诚然，名义上是暂时接收^①——并用“调解”为手段削减它的收费率，这是巴蒂斯塔和庇隆都用过的一种策略。几乎所有的劳工合同都在1959年1月到4月间重新谈判。将近二百种奢侈品今后需要有许可证和信用状才能进口。洛佩斯·弗雷斯克特已经采取措施，要坚决减少偷税；并已达成一项协议，1956年以前的偷漏可免于追究，但须补缴1956—1958年这一部分的税款。巴蒂斯塔本人、1952年以来所有参加他的内阁的部长、曾经参加内战的所有将领、1954—1958年一届所有的两院议员（反对党和政府党）以及曾经谋求这些职务的人、所有的市长和省长，这些人的财产都宣告没收，归于国家。实际上，这一命令并未充分执行。例如，尽管格劳·圣马丁曾在巴蒂斯塔的选举中同谋出力，还是允许

^① 电话公司工人联合会于2月间经历了一次“宫廷”革命，当时以维森特·鲁维拉为首的一班老领导人被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派推开。参阅詹姆斯·莫尼汉和肯尼思·吉尔摩合著：《大骗局》，第20—22页，鲁维拉提供的材料。

他在古巴住下去，不受干扰，也许因为他老了，也许因为他过去认识卡斯特罗。

3月1日，卡斯特罗在比那尔德里奥发动一项大规模的土地分配计划，亲自签署土地证，把土地交给农民，好象他是马查多或者甚至墨索里尼似的（虽然没有人注意到这种相似之处）。二万五千噶已经由以前的工农业开发银行收购；八千噶分配出去作为牧场，八千噶种植烟草。政府还宣布准备开发德萨帕塔沼泽地，这是岛上中南部一个低湿的和鳄鱼繁生的地区。

这些措施增加了货币储备，但很少促进生产。政府规定奢侈品进口需要许可证后，对外贸易下降。以往靠土地投机买卖维持生活的人，都准备离开这个国家。更重要的是，天主教界中开始广泛地对革命的性质发生疑虑。天主教青年联盟主席，现任财政部副部长，安德烈斯·巴尔德斯皮诺，在2月22日的《波希米亚》发表文章说，古巴所需要的激烈的改良，不用共产主义也能做到。有些年青的天主教徒，例如农业部的阿蒂梅和冈萨雷斯·科尔索，1959年3月间已经在阴谋反叛。

对巴蒂斯塔分子的审讯仍然在进行，3月3日发生了一个新事件，回想起来，这件事似乎是对当时政权的巩固的一种决定性的考验。先被指控为战犯的四十四名巴蒂斯塔的空军人员，在圣地亚哥被判无罪。被告的答辩指出，这些驾驶员并未杀害平民，相反地，其中有些人甚至把炸弹丢在无人居住的地点。他们自称曾对上级谎造过报告。对萨瓜德塔纳莫的轰炸已经查明并未发生。法院断定证据不足，不能证明这些驾驶员有罪，并且，不顾

检察官所发表的无线电谈话，宣判他们无罪。这在圣地亚哥引起一阵强烈的抗议风潮。这些驾驶员未被释放。接着，卡斯特罗在哈瓦那的电视里宣布判处无罪是错误的，要求重审。国防部长马丁内斯·桑切斯，同样积极地撤换了原任检察官桑切斯·塞哈斯中尉，任命了一个由可靠的革命者组成的新法庭。第一法庭的庭长费利克斯·培尼亚少校被发现死在哥伦比亚兵营他的汽车里：据推测是自杀，可是这件死亡案始终没弄清楚。他的职位由一个更可靠的革命者皮涅罗少校替代，此人原是劳尔·卡斯特罗的参谋，现任圣地亚哥驻军司令。在第二次审讯中全部空军人员都被判了罪，分别处以三十年、二十年或两年的监禁。检察官倾全力于辱骂被告，却没有提出新的证据。卡斯特罗宣称：“革命的审判不是根据法律的概念，而是根据道德的信念……既然这些空军人员属于前总统……巴蒂斯塔……的空军，他们就是罪人，必须加以惩处。”当然，问题不是在于这班人可能有罪，不是在于第一次的判决是错误的；也不是在于凡是在空军中为巴蒂斯塔服务过的人都真正是或多或少犯了罪的人；而是在于第一法庭的判决被以政治的和报复的原因推翻了。有几个曾经提出有利于被告的证据的证人也遭到监禁，被告的辩护律师都被解雇。

这种做法是令人遗憾的，可是它本身也许并不意味着当时的政权已经确定了要走永远独裁的道路。1944年法国发生类似的一些事件本身也没有毁掉第四共和国。政治气氛十分激昂。总之，接着就出现了危机。卫生部长埃伦娜·梅德罗斯，古巴最有原则的妇女之一，对卡斯

特罗说，她想辞职：“你不需要我在你的政府里了。我和你以及你的一些朋友不是同一代的人。我们在精神上彼此是相当对立的。我必须辞职。”卡斯特罗成功地挽留了她：“不，不，”他说，“我需要你。这列火车知道它该开向何处。你该下车的时间还在以后呢。”他滔滔不绝地又说了一句，列车是指革命。

但是这列车是否真正知道它该开向何处，仍然有疑问。甚至《革命报》也反对审讯再继续下去。卡斯特罗在3月中旬告诉来访的美国新闻界人士，选举将延迟两年，让反对派能有所发展。3月6日，他告诉全国银行家协会，他希望得到他们的合作，并且又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记者说，任何工业他都不想使它国有化。卡斯特罗召开了两次大型会议，参加者有内阁成员、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领导人和军官，目的是“制订一个统一的政策”；可是这些会议完全失败了，第一次的结局是大吵一场，争辩谁在反对巴蒂斯塔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比较大，是山区里的人呢还是城市里的人，第二次争论了任用私人以及官僚主义滋长的问题。3月4日，美国大使邦斯尔同古巴外交部长阿格拉蒙特以及卡斯特罗共进午餐，进行了一次“很愉快的谈话”。邦斯尔后来评论说，“我认为是有机会和他合作的。”可是，接着，钟摆似乎又一次摆回去了；3月13日，在一次纪念两年前牺牲于有名的攻打总统府中的死者的仪式上，卡斯特罗和以前革命指导委员会领导人福雷·乔蒙都发表了激烈的左倾的讲演，乔蒙比卡斯特罗更左，甚至暗示说在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左派中可以找到革命指导委员会的旧成员。革命指导委员

会决不再象1月间那样正式要求选举了。卡斯特罗说，假如他不是古巴的总理，他愿意带领一支远征队去打特鲁希略。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人也作为一个共同发起人参加这次群众大会，跟其他两个“革命的组织”（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和革命指导委员会）处于同等的地位。几天后，3月22日，哥斯达黎加前总统何塞·菲格雷斯——以往古巴在野党的一个进步的朋友——访问古巴时，卡斯特罗在讲话中又把这一倾向重复了一遍。在哈瓦那一次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上，菲格雷斯竟然对古巴人大讲其代议制民主政治，并说如果发生战争，古巴当然应该站在美国和西方的一边。戴维·萨尔瓦多（革命的工会领袖，前共产党员）急于要挤进革命领导的行列，把扩音器从菲格雷斯面前拉开，大声地说，在任何情况下，古巴绝不会在一场新战争中支持美国。几天之内，卡斯特罗就指责菲格雷斯是一个假朋友；他还说，那些大托辣斯，由于他们的自私自利，被他们杀害的古巴人比死于巴蒂斯塔暴政下的多十倍。他说，革命面临着一种保持既得利益的国际性阴谋。这时候，内阁在讨论肉类价格时，似乎出现了意义重大的谈话；以往在干旱季节求过于供时肉类常常提高价格。卡斯特罗反对涨价；商业部长塞佩罗·博尼亚说后果将是屠宰小公牛，并说，甚至连种马也可能被宰掉；卡斯特罗回答说，那没有关系，因为这种政策会给他留下使人民有得吃的好声名，而如果换了别人掌权，他们就一定要涨价。“如果我们继续执政，我们将进口新种马。”卡斯特罗的态度得到内阁同意，批评他的人则认为他是真正在担心选举，有些残存的革命党党员象巴罗纳

等人正在猛烈要求选举。

然而，卡斯特罗的指责和担心并不全是没有根据的。第一批从古巴出去的流亡者，巴蒂斯塔分子和右派分子，已经在阴谋策划。甚至阿蒂加斯上校（普里奥手下的彩票主管人）带着一份用武力推翻卡斯特罗的计划在华盛顿拜访威兰。威兰坚决地说，卡斯特罗不是共产主义者，根本不必想法推翻他。卡斯特罗过去的姻兄迪亚斯·巴拉特，原是巴蒂斯塔手下的青年领袖，开始在迈尔密组织一个命名为“白玫瑰”的反抗运动，要进袭古巴。古巴人从来不守秘密，卡斯特罗不久就得以指责“革命的敌人”在迈阿密购买军火，而美国当局显然也不制止他们。

突然卡斯特罗又改变了态度——也许由于格瓦拉或者劳尔·卡斯特罗提了意见，也许由于本人的信念，也许由于动摇不定。他又作了一次很沉着的讲话。3月25日，他第一次比较重要地谈到革命政府希望消除古巴现有的种族歧视，例如在职业方面和娱乐场所里的情况；这一讲话在古巴的保守分子中引起一些忧虑，但对外交政策并没有什么影响。^①这种惊慌也只限于一些西班牙白种人的旧家族，他们从中看到了过去奴隶起义的幽灵。差不多在这同时，经济部长雷希诺·博蒂告诉他过去的经济学老师帕索斯，他们两人同财政部长洛佩斯·弗雷斯克特一起，将于下月陪同卡斯特罗访问美国。帕索斯对博蒂说：“这意味着谈判吗？”博蒂回答说，“当然。”帕索斯

^① 参阅雷内·德佩斯特雷的评述，见《美洲之家》第6卷，34期，1966年1月。这是卡斯特罗第一次谈到种族问题，并且，正如苏亚雷斯指出的（他的书50页），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在《今日报》上全文发表卡斯特罗的讲话。

接着说，经济援助的金额问题应该讨论。博蒂并不是卡斯特罗的亲信，他说古巴应该要求价值五亿美元的援助。在此后的几个星期中，帕索斯拟出了关于教育、卫生、住屋等各方面的计划，要求把这笔钱用在这些计划上，不附带一定的条件。可是帕索斯、博蒂和卡斯特罗之间并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除了含糊地谈过关于古巴是否应该或者可能中立以及中立有什么意义这一个政治性问题以外，没有讨论过任何其他问题。这种含糊不清却与卡斯特罗对美国国务院2月间一次暗示的反应不谋而合，当时国务院暗示他们完全有意给予古巴经济援助：这一信息曾传达给胡斯托·卡里略（新任国家银行副行长）和何塞·安东尼奥·格拉，因为他们在2月访问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回国后，卡里略参加了一次经济顾问的会议，卡斯特罗也在座：卡斯特罗听了这个好消息，便要卡里略等待进一步的指示，而指示却始终没有下来。这使经济顾问们觉得卡斯特罗对于同美国举行认真谈判，根本不感兴趣。然而，卡斯特罗却在4月2日公开对古巴的电视听众说，他准备到美国去，也许从世界银行，也许从进出口银行，取得贷款，用来“保卫古巴和革命”。^①卡斯特罗然后命令向华盛顿递送一件备忘录，开列在经济问题上准备谈判的一些项目。同时，工农业开发银行宣布一项包括大约四十种新工业的计划：其中有一所紫铜管厂；一所塑料厂；一所灯泡厂。这些都将取得美国私营企业的合作。这样，政府做的工作就不是仅仅

① 《革命报》，1959年4月3日。

说好听的话和空口许愿了。可是，古巴的中产阶级仍然心里不舒服。相反地，《纽约时报》的鲁比·哈特·菲利普斯夫人在4月中旬报道说，他们因为削减房租以及强迫出售空地皮而感到十分难受。一点不能使他们相信这不是由于共产党的影响。比索的币值从1月份以来也跌了不少，世界市场上的糖价跌到1945年以来的最低点。然而，3月间制定的一些措施，连同1月以来的工资增高，确实意味着国民收入经历了认真的和看得出的重新分配，实际工资也许增加15%以上，靠租金生活的人和企业主的收入则相应地减少。这种显著的政治成就，使很大一部分人民同革命发生了巨大的利害关系，同时却造成输入减少以及资本家不愿投资或者提高价格的后果。

由于卡斯特罗预定4月15日到达华盛顿，美国驻加勒比海各国大使正在召开一次古怪的会议。它最清楚地显示出北方巨人还拿不定主意，不知如何对付它南面近邻的新现象。驻古巴的邦斯尔、驻墨西哥的罗伯特·希尔、和驻哥斯达黎加的惠廷·威劳尔三者之间发生冲突。威劳尔1954年就被任命为驻洪都拉斯大使，因为他具有“多年同共产主义斗争的经验”（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曾经是挫败危地马拉革命的骑士之一。据希尔的看法，这次大使会议结果成为“制订忍耐和克制的政策来应付卡斯特罗先生。我同邦斯尔大使争论过，因为我觉得，尽管他讲得很好……对共产主义者忍耐和克制将造成对美国的祸患。”希尔在会议上说，“对付卡斯特罗的时机就是现在……我们有对付这个问题的工具，如果我们要借

助于美洲国家组织……我相信所有关于共产主义的证据应该提交美洲国家组织，而美国则要求采取适当的行动……我没法使会议采纳我的意见……支持我的只有威劳尔大使一位……”。

邦斯尔先生的见解是（希尔继续说），卡斯特罗在当权；他得到强大的群众拥护；在西半球有不少人支持卡斯特罗和卡斯特罗主义，我们应该慢慢儿地对付他，尽管他时常侮辱美国和我们的总统……可是邦斯尔觉得最后卡斯特罗是会明白过来，回到拉丁美洲国家的大家庭的。他说古巴需要革命，然后古巴才会开始繁荣起来并对拉丁美洲大家庭作出它的贡献……邦斯尔大使也指出：当然，卡斯特罗有共产主义的伙伴。但是，他认为作出决定的是卡斯特罗。^①

邦斯尔私下确实告诉威劳尔大使，卡斯特罗“并不是一个很坏的家伙；当然他很怪僻，他……认为他也许很好对付，邦斯尔也能够对付他，假如别人不来干预的话……卡斯特罗是一个可怕的人物，不论在体格和精神上，但他决不是疯狂，他并不是靠吃药丸过日子的〔象有些报纸所说的那样〕，而且他不是一个共产党人。^②

正如在这种外交场合通常所出现的情况那样，公报上尽是吹毛求疵的讨论。希尔和威劳尔要坚决地陈述美国对卡斯特的种种批评。邦斯尔认为“公报中任何非

① 希尔的证词，见《共产主义的威胁》，第12卷，第803页。

② 威劳尔的证词，见《共产主义的威胁》，第871页。

难卡斯特罗的话都会给他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希尔说，你会使害怕卡斯特罗威胁的每个拉丁美洲国家泄气……我不能参加一种为卡斯特罗粉饰的公报。”邦斯尔说，“如果你不能合作，为什么不退出呢？”邦斯尔的意见终于通过了，可是威劳尔和希尔两人另向华盛顿提出报告，表示异议。同时，后来人们已经知道，在这些口头交锋以前两星期，3月26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得到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说“卡斯特罗政权越来越走向彻底的独裁”。^①

美国当时在政策方面基本上是举棋不定的。有些外交家，象有些军人一样，要求“行动”。可是采取哪种行动以及根据什么理由呢？既然卡斯特罗自己的意向似乎还有些踌躇不定，美国政府本身也就难于作出任何决定。难道他们不可以采取别的行动，以便确保，一旦卡斯特罗拿定他的主意时，他会顾到不损害向来被认为是美国的利益——加勒比海地区的战略均势以及在古巴的投资自由和商业交往？也许应该指出，一方面华盛顿对卡斯特罗有两种意见，另一方面古巴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也显然有两种看法：一种以党的总书记布拉斯·罗加为首，另一种以《今日报》主编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为首。自从1959年3月以来，罗德里格斯似乎禁不住他对卡斯特罗的崇拜，发表了许多文章来论证卡斯特罗具有正直和爱国心，还竭力证明共产党人已为起义事业作出

^① 艾森豪威尔：《从事和平》（伦敦，1966年），第523页。

一些贡献。^①

美国的这种分歧在4月间卡斯特罗访美时剧烈增长。这支远征队伍出发前，邦斯尔大使举行一次招待会，卡斯特罗参加了；邦斯尔的乐观主义和温良的性格从他的敌方的辱骂中也能看得清楚。一切都是微笑。格劳·圣马丁趁这次从他那种暧昧的退隐中出来露面的机会，要求选举。选举是权力的唯一来源。卡斯特罗不得不给予答复。他回答说，等到农业改革完成、人人都能读书写字、儿童都能免费入学以及人民都得到免费医疗的时候，就会实行选举。

卡斯特罗4月15日离开哈瓦那前往华盛顿，作为美国报纸编辑们私人邀请的客人。驻华盛顿的古巴大使，尊敬的埃内斯托·迪戈，曾经问卡斯特罗是否需要美国政府的官方邀请，卡斯特罗回答说，他不需要。然而，假如官方提供这种邀请的话，可能他也不会拒绝。难道事情已经到了官方邀请和私人邀请的差别能够决定国家的关系这种情况了吗？这样的事在远古时代曾经有过，可是今天毕竟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了。

卡斯特罗赴美之行的公众关系是纽约的伯纳德·雷林组织的。雷林在旅程计划中提出几项更改；卡斯特罗除了不同意其中一项要他的随从人员把头发剪短和另一项要那些同去的军人尽可能具有大学文化水平并能说英语以外，其余全部同意。在此期间，北美的一些机关

^① 安德烈斯·苏亚雷斯书(59页)提出要注意罗加在4月初任命了一个新的书记处(他本人、卢萨尔多、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不包括罗德里格斯在内。

和俱乐部向卡斯特罗发出无数的邀请书，要求把他们那些单位包括在旅程之内。非官方的北美人士真是在伸出手来拥抱一位多少是由他们塑造出来的英雄，因为他们自己也热烈地要求英雄主义。

大约有七十人随同卡斯特罗分乘两架飞机出发。劳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都未去。自从1月以来，差不多还是第一次在卡斯特罗的周围全是一些具有社会民主意识的人士；差不多也是第一次这种人都能接近他。然而，卡斯特罗并不为了这一次的旅行而迁就惯例；他晚了两小时才到达机场，“穿着一件起皱的旧制服”。^①在飞机上，卡斯特罗一直同巴卡迪的佩平·博什交谈以消磨时间，博什曾当过普里奥手下的财政部长。卡斯特罗在大谈其认为国家能在经济方面做多少工作，博什则在陈说私营企业的好处。帕索斯也在飞机上，他把他拟订的一些可能的发展和外援计划交给卡斯特罗。可是没有讨论这些问题。帕索斯并不坚持。他认为自己是个专家，不是一个政治家。

卡斯特罗在华盛顿机场受到副国务卿鲁博特姆的欢迎。他离开警卫人员，跑过去招呼一大堆欢呼的群众。他在美国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是不是来谋求外援的。卡斯特罗回答道：“不是，我们以自立而感到自豪，不打算向任何人要任何东西。”帕索斯觉得诧异，后来问博蒂这是什么意思。博蒂说，“对的，我们目前，在卡斯特罗访问期间，不打算要求援助，可是两星期后你

① 卡苏索书，第211页。

帕索斯将回来提出要求。”确实，在全部访问期间，始终保持这种说法：不讨论经济，不对美国让步。帕索斯和洛佩斯·弗雷斯克特在国务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讨论钱的问题。国务院问到古巴的经济情况。弗雷斯克特说，好极了。帕索斯同意吗？这个银行行长帕索斯回答说，我同意，只不过我们是比索多于美元。没有人提出要借钱，也没有人真正表示愿意借。没有疑问，假如有人提出要借的话，对方是会借的；假如一方表示愿意援助的话，对方也可能会接受的。进步的鲁博特姆在探询外援问题方面走得最远，他说美国对于古巴的一些计划很感兴趣。但是，双方都由于骄傲和猜疑而踌躇不前。^①

然而，美国给了卡斯特罗相当热烈的欢迎。到处有群众跟着他。他的话到处受到密切注意。他在华盛顿对报纸编辑、在纽约对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作了长篇的成功演讲，用英语开玩笑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从公众方面来说，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另一方面，却给保安警卫带来很大的麻烦。

他还同其他一些人会晤：他会见了《时代》杂志的亨利·卢斯，合众国际社的社长弗兰克·巴塞洛缪以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这些私人会见中，有时候卡斯特罗显得不象在较大的集会上那么自信。除了一次同代理国

^① 帕索斯提供的材料；参阅洛佩斯·弗雷斯克特书，第108页。一年后，参议员肯尼迪对于这种冷淡态度曾经公开这样说，如果当时美国“对这个年青的起义者，在其得意扬扬的时刻，特别是在他来到我国这个时间，给以比较热烈的欢迎，卡斯特罗说不定不会采取很激烈的做法。”（肯尼迪：《和平战略》，1960年）这种看法常常是其他一些人所坚持的。

务卿克里斯琴·赫脱共进午餐外，卡斯特罗和美国政府唯一的正式接触是会见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艾森豪威尔总统当时在卡罗来纳州打高尔夫球——一种策略上的或者也许可以说是缺乏策略的错误，因为艾森豪威尔尽可以同卡斯特罗见面而不会有失尊严。卡斯特罗也会同别人一样，发觉艾森豪威尔，作为私人比作为总统更容易亲近。

另一方面，据帕索斯说，卡斯特罗不想会见艾森豪威尔：见面可能只会使他尴尬，而艾森豪威尔却因为卡斯特罗竟然来了而“不胜气恼”，恨不得拒绝给他签证。

尼克松在他的办公室里会见卡斯特罗。虽然卡斯特罗事先曾表示反对，认为这样会见过分庄严，但他还是去了。两人单独会晤。尼克松立刻就不喜欢卡斯特罗，显然是因为这个古巴人对于副总统拿出来的关于卡斯特的拥护者当中有共产党人的档案材料不感兴趣。尼克松还说到古巴国内许多人被处死刑在美国造成了恶劣的印象。卡斯特罗后来说，“我自己只是……说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这些实际情况我相信是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相似的，并说明我们准备采取的一些措施是公道的，其中有些不免影响到北美的利益。”后来，尼克松写道：“我相信卡斯特罗或者是对待共产主义非常天真，或者是受着共产主义的训练，我们必须恰如其分地如此看待他和对付他。”^①他又立即向美国政府中他的同僚们建议，应该立即把一批古巴流亡分子的力量武装起来，推翻卡斯特

① 尼克松：《六次危机》（1962年版），第351—352页。

罗。这就是说，尼克松参加了那些已经把卡斯特罗当作敌人的共和党大使、以及一、两位其他人士的行列了（后者例如联邦调查局的埃德加·胡佛和艾森豪威尔的有经验的消灭麻烦问题的能手，威廉·波利）。因此，美国政府正在不知不觉地倒退到一种可以说是十九世纪的局面，再现了波尔克政府或者布坎南政府的立场，因而不能排除来自美国大陆的积极干预。

卡斯特罗的反应却不同。他同尼克松讨论后回到古巴大使馆，睡在埃内斯托·贝当古（经济顾问）和博蒂的隔壁房间里。他显然对于他同尼克松的会谈保持缄默，可是细心地没有谈到任何特殊问题，“我们必须做的事是停止执行死刑和制止渗透”^①——即指共产主义者的渗透。毫无疑问，这是卡斯特罗的民主姿态的高峰。他后来说，他在美国所遇到的北美人跟他在古巴所认识的那些农场主和商人不同。大约就在这时，卡斯特罗对洛佩斯·弗雷斯克特说，“瞧，鲁福，我正在让所有的共产党人都伸出头来，让我可以知道谁是共产党人。等我认得他们以后，就要搞掉他们。”^②洛佩斯·弗雷斯克特认为，卡斯特罗说得“那么坦率和老实”，不能不是真的。再奇怪的是，卡斯特罗甚至听从了别人的劝说去会见中央情报局的拉美共产主义问题首席专家，中欧人德鲁勒，两人单独谈了三

^① 埃内斯托·贝当古提供的材料。贝当古后来制造了“进步同盟”一词（施莱辛格书，第175页）。卡斯特罗后来说明，同尼克松会晤时是用英语交谈的，没有译员。他加了一句“我个人的印象是好的”，并说尼克松始终没提出一个不恰当的问题，“也没提出什么问题，可能会被认为是查问我们的政治”（《今日报》，1959年5月16日，第4版）。

^② 洛佩斯·弗雷斯克特书，第110页。

小时，事后德鲁勒告诉洛佩斯·弗雷斯克特，“卡斯特罗不仅不是一个共产党人，而且是个激烈的反共战士。”^①在美国时，卡斯特罗本人公开说明他不是共产党人；他还说劳尔·卡斯特罗或者他的妻子比尔马也都不是。古巴政府中假如有任何共产党人（他个人知道一个也没有），他们也没有势力。在冷战中，卡斯特罗的心意是赞成西方的。外国的投资不仅受到了尊重，而且得到鼓励。可是北美人士，不论官方或者私人，所时刻固执地不放心的共产主义这一个问题，却使卡斯特罗以及一些随行人员十分恼火：好象美国不关心古巴的实际情况，只关心它不是共产主义。同时，美国也显得——没有疑问这种印象是错误的——尽管一门心思地害怕，但并不十分理解共产主义是什么。4月26日的《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很有启发性和显然深知内情的文章；有些美国官员认为，在古巴不得不向美国请求援助以前，应该让它自己去经受他们的经济困难。另一些人则认为，等待太久有引起卡斯特罗政府垮台的危险，继任的不是一个新的右翼独裁，便是比它更坏的共产党。这种人要求美国主动地帮助古巴。但是，意见分歧，犹豫不决。

然而，甚至卡斯特罗在北美期间，他仍然受到其他方面的召唤。劳尔·卡斯特罗似乎打过电话给他，嘲弄地说古巴报纸在报道，他那个人人都知道是成功的访问，实际上意味着对美国屈服。^②这确实是古巴共产主义事业

^① 同上书，第110页。德鲁勒后来指导古巴流亡分子反卡斯特的活动，化名“本德”。

^② 洛佩斯·弗雷斯克特书，第112—113页。

的一个危机。4月15日，乌维尔特·马托斯这个稻米培育家发表一篇猛烈攻击共产主义的讲话；此人曾率领人马攻入圣地亚哥，现任卡马圭省军事长官。

卡斯特罗预定于访美后赴加拿大访问。他又接受了巴西和阿根廷的突然邀请。帕索斯认为他应该谢绝，因为古巴国内有很多事情要做。博蒂告诉帕索斯，最好还是去，因为否则劳动节卡斯特罗就会在国内，如果在那里，他就一定会发表激烈的讲话。他还说不久格瓦拉将被派到远处去，然后让他出去当大使，这是安抚拉丁美洲的极端主义分子常用的一种安慰奖。

加拿大之行和访美之行是同样的情况。可是在从加拿大去南美的途中，劳尔·卡斯特罗突然坐飞机去见他的哥哥，在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这个不适当的约定地方会面。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据说这位不留胡子的军队司令严词劝诫他的哥哥要保持自己的革命纯洁性。似乎同样可能的是，主要讨论关于劳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准备5月1日在国内演说的主题；到了这一天，他们讲了“团结”的需要。^①可是，后来，甚至在南行的旅程中，卡斯特罗似乎仍然保持着他在美国时表现的那种温和而坦率的面貌。卡斯特罗在飞机上曾对一位老朋友，何塞·伊格纳西奥·拉斯科（古巴少数基督教民主人士的领袖，天主教的桑托·托马斯·德比利亚努埃瓦大学

^① 3月22日卡斯特罗曾提出他打算在5月1日发表演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履行他的诺言。

教授，并曾任1957年全国解放运动的书记)，吐露真情，说他自己不是共产党人，因为“共产主义是一个阶级的独裁，我……一生都和独裁作斗争”；因为“共产主义意味着仇恨和阶级斗争，而我反对任何形式的仇恨”；并且因为共产主义“跟上帝和教会冲突，虽然我现在不象在中学里所学的那样去奉行宗教，却也不愿意跟教会争吵”。他答应拉斯科，回古巴以后他会“改变，会同商人谈话，会停止辱骂教廷使节”。^①他对另一个老朋友孔特·阿圭罗说“你不能信任共产党人”。^②

对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和蒙得维的亚的访问也很成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卡斯特罗在拉美二十一国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上讲了话。^③在那里他提出，美国在今后十年中应给予拉丁美洲价值三百亿美元的援助，作为公共资金。这一建议在美国被认为数目大得离奇而置之不理；虽然后来在肯尼迪时期，“进步同盟”在紧要关头也说到需要二百亿美元的援助。^④卡斯特罗的讲话好象是诚心诚意的：讲话中指出美国曾以这样的规模帮助过欧洲，这种援助最后实际上会对美国有益。当然，在

① 拉斯科对詹姆斯说的，见詹姆斯书，第131页。

② 孔特·阿圭罗：《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两面派》。

③ 美洲国家组织的这个委员会成立于1958年9月，它的任务是考虑如何实行巴西总统库比切克建议的“泛美行动”，努力提高拉美的经济增长率。

④ 哈维尔·帕索斯的文章（《新共和》周刊1963年1月12日）说，参加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的一位古巴代表，后来回忆说“卡斯特罗对于他个人拟订的“进步同盟”的三百亿美元计划十分热心。我的印象是他在考虑，作为这一计划的发起人而站在美国这一边的可能性……并作为一种纳赛尔式革命的领袖。”卡斯特罗也探望了他的一位侨居阿根廷的叔父，贡萨洛·卡斯特罗。

这一点上他是对的。可是，5月2日古巴和美国之间真正的经济接触只限于一项根据“第四点计划”拟订的美古协定，内容是在农业改革的发展中进行技术合作。

卡斯特罗在5月7日回到古巴。在机场受到邦斯尔大使的迎接，这位大使仍然主张调和。两人进行了一次友好的谈话。然而，这是邦斯尔在6月以前最后一次见到卡斯特罗，而且从那时到6月间发生了一些决定性的变化。

卡斯特罗不在国内期间，毕竟发生了一些政治性的更动。潜在的危险人物巴尔金上校被派出国，当大使馆的武官。劳尔·卡斯特罗任命了他的一位从蒙卡达和“格拉玛号”时期开始的老朋友、最近还在马坦萨斯任陆军司令的拉米罗·巴尔德斯，担任陆军情报主任的重要职位。这个终于使他成为古巴政治警察头目的位置，以前是由不那么听话的圣希内斯少校担任的。《革命报》上以及其他地方已经开始攻击右翼报纸《前进报》。有些以往的革命支持者，例如洛里埃少校辞职了。直言不讳的马托斯少校肯定同空军负责人迪亚斯·兰斯是有所接触的，后者害怕并批评陆军里的共产党势力。同时，糖价已跌到1944年以来的最低点。糖价下跌，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卡斯特罗轻率地空谈要尽可能多生产糖，以低于当时世界的价格出售。另一方面，1959年的收获已接近完成，已经知道产量比最近几年高。从北美开始吹来警报的号角：《时代》杂志在5月11日说：“同路人在古巴史书修订委员会工作”；在一次以“古巴正在赤化吗？”为题的电视节目中，古巴广播电台记者斯图尔特·诺里斯说，古巴正在变成

一个共产主义的桥头堡，变成极权主义的独裁政体。在美国的古巴人士，以受人尊敬的年老的迪戈大使为首，也演出了抗议的大合唱。

可是，事态仍然是含糊不清的：卡斯特罗曾明白地向马托斯少校承诺过，他不久就会罢免一些共产党人或者近似共产主义分子，诸如他的弟弟劳尔、格瓦拉、他的老朋友阿尔弗雷多·格瓦拉（已经是新的影片研究所的负责人）以及地理学家努涅斯·希门尼斯（切·格瓦拉在圣克拉腊时的老助手，曾帮助拟订农业改革法）等人。

在5月9日的一次讲话里，卡斯特罗继续重弹他访美时的民主老调：古巴革命，他说，是“完全民主主义的”，他明白地否认他同共产主义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们不仅给人民粮食，而且要给他们自由”。^①一直都还不错，可是大约就在这时，在5月11日，哈瓦那大学（从1956年12月起停办）终于重新开办了；新学期的第一件大事是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清洗学校里的反革命分子。这一消息令人不安。早在5月初，记者卡萨利斯会见农业部长索里·马林时，马林曾警告他，“菲德尔要包办一切了。他是任性的，我们也不知道他将走向何处。”^②

在这些矛盾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证据面前，我们可能得到的关于1959年5月古巴情况的唯一结论是，卡斯特罗仍然摇摆于几种策略之间。美国所表现的那种“不妥协”只能起很小的作用，不过固执地追问卡斯特罗是

① 《革命报》，1959年5月10日。

② 卡萨利斯的文章，《共和国》月刊（加拉加斯），第4—10页。

不是共产党人,使古巴人感到很大的刺激,因为这意味着古巴虽是独立了,它还没有选择共产主义的自由。

[英] 休·托马斯著

卡斯特罗 和古巴

上 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K837.51754

1

2=1

b7 89/17

卡斯特罗和古巴

上册

[英]休·托马斯著

斯禾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译 者 的 话

本书是《追求自由的古巴》一书的节译本。原书是一部古巴通史，着重写了古巴近二百年来的历史状况，篇幅较大。我们从中选译了第八卷第六十七章至第九卷第八十八章和第十一卷第九十八章至结论第一百一十六章，以《卡斯特罗和古巴》为书名单独出版。

作者休·托马斯，出生于1931年，是英国雷丁大学历史教授，曾写过《西班牙内战》、《苏伊士运河》等书。自1961年起，作者数度访问古巴，遍访有关人物，并根据广泛的已发表或未发表的材料，写成《追求自由的古巴》一书，于1971年由伦敦艾尔和斯波蒂斯伍德出版公司出版。

这个节译本共四十一章，综述了1952年到1970年古巴的历史状况。内容着重于卡斯特罗生平的活动，叙述了他的青少年时代生活以及后来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组织武装斗争，领导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建立临时政府的详细经过。对古巴革命政府成立后的政局及其采取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也作了具体的描述，其中并谈到了苏修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打入古巴，逐步取代美国在古巴的地位的。

本书为我们了解卡斯特罗其人及当代古巴的各种情

况，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参考材料。但必须指出，作者从资产阶级立场和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把马克思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相提并论，甚至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印边界问题，作者更歪曲事实，对我进行攻击。诸如此类的错误观点，字里行间经常有所流露，阅读时须加以严肃批判。

原书脚注很多，我们只采用一些较有参考价值的。书中还夹杂一些西班牙文，个别词汇一时无法查考，暂存疑。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承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大力协助，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特此志谢。

鉴于译者水平，一定存在不少错误和缺点，请读者批评指正。

1975年6月

卡斯特罗和古巴

〔英〕休·托马斯著

斯 禾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6.75 字数 530,000

1975年12月第1版 1975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71·66 定价: (共两册) 2.10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第 一 章	菲德尔·卡斯特罗：童年和青年时代.....	1
第 二 章	蒙卡达：理想.....	29
第 三 章	蒙卡达：战斗.....	45
第 四 章	小阳春.....	59
第 五 章	公民对话.....	86
第 六 章	卡斯特罗在墨西哥.....	104
第 七 章	“格拉玛号”和马埃斯特腊山.....	130
第 八 章	赫伯特·马修斯上山.....	150
第 九 章	攻打总统府.....	174
第 十 章	山区之战(1957年3—5月).....	188
第 十 一 章	美国参加争论.....	200
第 十 二 章	迈阿密和圣地亚哥.....	213
第 十 三 章	西恩富戈斯的海军兵变.....	229
第 十 四 章	禁运武器.....	248
第 十 五 章	4月9日的罢工.....	268
第 十 六 章	1958年5月巴蒂斯塔的“大进攻”.....	280
第 十 七 章	崩溃.....	292
第 十 八 章	巴蒂斯塔是怎样倒台的.....	314
第 十 九 章	胜利的源泉.....	336
第 二 十 章	1959年：卡斯特罗与南北美洲.....	353

第二十一章	抒情的幻想.....	379
第二十二章	最初的阴影.....	399
第二十三章	卡斯特罗在美国.....	419
第二十四章	农业改革：政治斗争和危机.....	450
第二十五章	自由主义者黯然失色.....	478
第二十六章	剑拔弩张.....	509
第二十七章	资本主义的古巴告终.....	534
第二十八章	美国准备打仗.....	574
第二十九章	社会主义的古巴：I.....	591
第三十章	社会主义的古巴：II.....	628
第三十一章	猪湾之役.....	651
第三十二章	几次危机之间.....	676
第三十三章	导弹危机：I.....	695
第三十四章	导弹危机：II.....	708
第三十五章	导弹危机：III.....	723
第三十六章	空想社会主义者.....	742
第三十七章	“一千万吨收成”及其含义.....	761
第三十八章	新人.....	773
第三十九章	监护人.....	785
第四十章	新朋友和老朋友.....	815
第四十一章	追求自由.....	829
1962年以来古巴大事记.....		847

第二十四章

农业改革：政治斗争和危机

旅行归来几天后，卡斯特罗带着一份农业改革法案，出席在他的科希马住宅里举行的内阁会议。阁员们自然要在公布以前先读一遍，可是卡斯特罗坚持草案必须原封不动地通过。他说，不然的话，内容就会泄漏出去，帮助了反对派。最后决定，由一个三人小组（组长是卡斯特罗的前高级副官、现任农业部长索里·马林）审查这个草案。索里·马林（尽管他的职位是农业部长，在这以前却同这草案毫无关系）把草案拿给著名的糖经济学家、国家银行总经理何塞·安东尼奥·格拉和国家银行行长费利佩·帕索斯两人看。小组提了一些修正意见，可是这些意见始终未为卡斯特罗所接受，因为在要紧时刻找不到索里·马林了。5月17日，农业改革法在马埃斯特腊山中一次正式仪式上公布了，内阁全体出席。

这个法案的目的不在于改进农业，而是在于改变土地所有权的结构。它主要是由格瓦拉的助手、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努涅斯·希门尼斯写的，还有其他一些人参加起草，例如《革命报》的经济编辑奥斯卡·皮诺·桑托斯；他向来同共产党人或者极左分子有关系，虽然1958年12月以前还在巴蒂斯塔的国家经济委员会里主管过公共关系。努涅斯·希门尼斯，虽然过去一直同左派有关系，在

内战晚期——说得准确一些，1958年12月24日——才决定离开拉斯维利亚斯大学参加格瓦拉部队的工作，结果他的胡子在胜利那天还没有留得很好。

农业改革法的第一条反映了1940年的宪法：禁止一千噘以上的产业。^①然而，这一最高限度并不适用于甘蔗或大米种植园，那里的产量比全国平均产量大一半以上；在这些地方，最高限额是三千三百三十三噘。^②外国公司所有的土地还可以超过这个限度，如果古巴政府认为是符合国家利益的话。新法案只直接影响国内属于普通一千噘最高限额的农场的10%左右（或者一万二千笔财产），^③比特例最高限额少得多。另一方面，法案影响到全部农场土地的40%左右。法案强调国家和集体事业的作用，超过人们预期的程度：所以卡斯特罗上一天担心内阁有意见。甚至共产党人早先也以为，即使仅仅作为一种策略，所有没收的土地都要被分掉；可是，到5月的时候，他们已经承认“革命的气势以及群众对革命的拥护……可能采取较为激烈的措施。”

超过这些限额的产业将被征用，规定以二十年的债券赔偿，年息4.5%。象共和时期的西班牙以及1919年后东欧国家的农业法那样，赔偿之数根据征税时的土地估值。征用的土地或者改成农业合作社，暂时由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管理，或者分配给个体所有，每户六十七噘——作为五口之家“维持生活的最低限度”。占据公地者、

① 30卡或者402.6公顷。

② 100卡或者1,342公顷。

③ 在全部十八万五千所农场中，超出一千噘的或许略多于一万二千所。

分成制交租的佃户和一般佃户，可以优先分得他们原来耕作的土地。如果原来耕作的土地少于六十七噠，所差之数，只要有土地可以动用应尽快地予以补足。以后如耕种不力，土地应交回国家。土地一经分配，只能卖给国家，或者须取得国家的同意方能出卖。这种土地不许分割。

农业改革法也着手使甘蔗小农脱离糖厂的束缚。在1960年收获以后，公司不得经营甘蔗种植园，除非公司的股份是由古巴人注册登记并为古巴人所有者；而且，任何人，如果他们是制糖厂的职员、厂主或者股东，就不能持有甘蔗种植园的股份。不用于糖业的土地也只能由其股份已经依法登记的一些公司所有。再则，将来，土地只能由古巴人购买。

这一法案同1958年11月由马埃斯特腊山第3项法律公布的那个法案大不相同。根据那个文件，土地应给予耕种的人。可是，现在再分配只构成整个计划的一小部分。卡斯特罗后来说明他“已经了解……如果你拿一所，例如，二千五百噠的甘蔗种植园，土地适宜于种甘蔗……把它分成二百份，每份十二噠半……这些新的所有人就会把甘蔗的生产减少一半……而生产一系列新的作物供他们自己消费。”^①他还说他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经验使人想到，如果大牛群被分掉，牛很快就会被它们的新主人吃掉，而不是留着吃牛奶。“这当然加强了 my 信念，认为大地主的土地不应该分掉，而是应该组织起来。”可

^① 洛克伍德书，第89页。

是，这次改革更接近于民主方式而比如说和战后的东欧的方式不同。古巴的私人产业现今不能超过一千亩，而波兰和保加利亚的最高限额是五十亩到一百二十亩；实际上许多东欧国家在二十年代的改革比1959年古巴的计划走得更远。合作社显得和苏联的经验大不相同。所拟的债券利率高于麦克阿瑟将军在日本的农业改革，而偿还期限则短于在福摩萨实行的改革。新法在某些方面也显然会产生两种相反的后果：例如，一个在比那尔德里奥的烟草佃农，由于土地再分配，会比一个在拉斯维利亚斯沼地的佃农生活好得多。这个改革的意图实际上是政治性的，而不全然是经济性的，因为它给了政府一种手段，可以用来任意剥夺敌人的财产或者毁灭敌人；而且这种改革或许从一开始就打算作为走向进一步征用的第一步。^①

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很快地成为新政府的主要力量，因为它的工作不仅是征收和再分配土地，而且组织国内的筑路、卫生、教育和房屋。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还设有一个贷款部门，它合并了旧的食糖、大米、和咖啡管理局。实际上，它自成一套，成为一种影子政府。在委员会的领导下，全国分为大小不等的二十八个地区，每一地区由一个起义军军官掌管，负责执行新法，在解释命令方面有很大的自由。卡斯特罗是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可

^① 参阅，例如，那肯定经过渲染的关于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国大会的纪述，这篇文章是当时曼萨尼洛区的第二负责人曼努埃尔·阿蒂梅写的，此人后来流亡国外，成为在猪湾的指挥（见所著《背叛》，迈阿密1960年，第53—63页）。

是管理日常工作的主任是法案本身的共同起草人努涅斯·希门尼斯博士。此人担任这一职位，说明以后两年中所以犯了一些判断上的错误的原因：根据迪蒙教授的意见（他一般是同情革命的古巴的），努涅斯·希门尼斯“比较适宜于组织会议或者骑着马，举着大旗，去占领联合果品公司的土地，而不适宜于合理地组织社会主义的农业部门。”^① 副主任奥斯卡·皮诺·桑托斯，也曾帮助起草法案，但毕竟是新闻记者出身的，没有行政工作经验。另一项古怪的任命是爱德华多·桑托斯·里奥斯，此人一度是共产党在奥连特省的领导人，又在巴蒂斯塔手下当过工农业开发银行的襄理。法律部的负责人是瓦尔多·梅迪纳，一个被巴蒂斯塔革职的法官。

合作社是新法案中最出人意外的部分。大多数人只预料到要分配，把土地分给没有土地的人，这是西班牙和西班牙美洲所有的农业工人的古老的——如果是枉空的——梦想。可是，事实上，这种合作社从一开始就从未表现出这个名词通常的含义；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任命企业的经理，有时候从工人中选拔。工人们的报酬一年到头都是大约每天二元五角，假定这是在合作社利润的基础上的一种预支，利润本身要到年终结算。任何超过此数的利润，在理论上说来，要到那时候才分配。（卡斯特罗后来说明，合作社的主意是到最后才决定的，即在前往马

^① 迪蒙：《古巴》，第47页。根据这个意见，再阅读一名前革命党警察席尔瓦在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的说法，就很有意思，他说努涅斯·希门尼斯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因为他很有才能”（《共产主义的威胁》，第534页）。

埃斯特腊山签署法案的途中在飞机上决定的。^①）

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从一开始也有一些农场由它直接管理——巴蒂斯塔的产业，还有他的拥护者或者那些逃亡、死掉、被监禁的人的产业。这些是国营农场的原型，国营农场后来成为革命的古巴国内农业组织的主要手段。

农业改革法公布时，立刻引起糖公司股票在纽约股票交易市场上的行市下跌。其他的古巴股票，例如公用事业的，尽管与糖没有关系，也下跌了。在古巴，糖厂厂主协会说这个法案会产生“严重的经济后果”，要求卡斯特罗延缓实施。他们说，如果大块地产被分散，就不可能对甘蔗收获前进行适当的准备工作，同时，如果“糖厂”失掉它们经营的蔗田，它们就不能贷款给佃农。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留存下来的古怪的收获制度，就有遭到根本破坏的危险。比那尔德里奥的烟草生产者也提出抗议，虽然他们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在古巴还有产业的里翁达家族的最后一个人，现任弗朗西斯科糖公司总经理的一个美籍古巴人，告诉他的股东们说，他已经就新法案问题向美国政府提出意见。拥有庞大工厂的贝尔蒂恩特斯糖公司认为它的业务可能不久就要只限于糖的工业方面。马纳蒂糖公司的乔治·布拉加也发出同样的信给他的股东。这就掀起了一股反对农业改革法的风潮，并且，由于古巴国内土地所有权的性质，这种风潮在纽约也同样地掀起来了。古巴的共产主义这个题目开始越来越

① 《革命报》，1961年12月22日。

越多在美国报纸上出现，^① 虽然大多数公司还完全弄不清楚有的一些什么规定对它们适用，以及什么时候施行。

这些评论家如果仔细地看一下，就会看出革命和共产主义的一场冲突似乎现在已经在古巴进行了。例如，5月8日，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报纸《革命报》已经斥责共产党总书记布拉斯·罗加想要分裂七月二十六日运动，该报说：“就是同巴蒂斯塔（在1938年）达成协议的这个布拉斯现在否认菲德尔的权力的合法性。”在实行农业改革法的前一天，《革命报》把共产党斥为异端分子。由于卡斯特罗差不多每天去《革命报》社，亲自检查准备在报上发表的东西，这些攻击显然是经过他同意才印出来的。在1959年中期《今日报》和《革命报》的争执中，或许卡斯特罗只是让《革命报》有它自己的说法，以便反驳美国记者指责这两家报纸刊着完全一样的标题。5月16日，《革命报》不管怎样批评了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成员和共产党的一项联合声明，说它是“不光明的政治契约”，它无视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全国指导委员会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两方面。5月21日，卡斯特罗在一次电视访问中说明他的目的是一种革命，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它用饥饿杀人”），也不同于共产主义（它压制“对人类非常宝贵的”那种自由）。古巴革命将和古巴音乐一样具有自己的本色，并且，以人道主义为特征，既不左也不右，而是“向前一

^① 罗伯特·希尔和莫里斯·蔡特林：《古巴：美国的悲剧》（修订版）第319页。在他们对1959—60年美国报纸的非常好的分析中说，《时代与新闻周报》在5月17日以前只登过一篇关于共产主义这个题目的文章。因此，人们可以假定此后公共关系官员将会很忙。

步”。在色彩上，它不是红的而是橄榄绿的，象起义军制服的橄榄绿那样。至于共产党人，他们在鼓动要求增加工资方面已证明他们自己是“反革命”了，共产党人和反革命分子之间确实有一些相同之处。圣路易斯的骚动不是共产党人应该负责的吗？那儿的农民以标枪为武器企图自发地去夺取土地。^① 5月22日，卡斯特罗又在电视中出现。他说，极端主义分子在古巴革命中是没有地位的。他还说——大概是对陪他去华盛顿的同伴们的暗示——不久，格瓦拉将作为他的代表出国访问非洲、亚洲和欧洲。共产党的执行委员会回答说，他们对于卡斯特罗的“不公道的和没有理由的攻击”感到震惊，^② 同时总书记布拉斯·罗加指责卡斯特罗“发动一次反共运动”，从而危害革命。^③ 可是他们之间还有更多的麻烦呢。

5月24日，非共产党人的工会领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劳工同盟（人道主义工人阵线），支持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反对共产主义。虽然准备的时期短，这个同盟在月底所有的主要工人选举中成功地挫败了共产党。制糖工人，以绝大多数（855对11）重选了前参议员孔拉多·贝克尔为他们的总书记，使共产党的乌西尼奥·罗哈斯落选以后，斥责《今日报》宣传不利于贝克尔的“没有根据的、诽谤的和反革命的”说法。贝克尔本人指出，“共产党人在1958年12月26日以前（就是，在巴蒂斯塔逃走的五天

① 《革命报》，1959年5月22日。圣路易斯是奥连特省的一个小城市，在圣地亚哥以北十五哩。1961年卡斯特罗不得不说，在这个问题上他得到的消息不确实（参阅1961年12月1日的演说）。

② 《今日报》，1959年5月23日。

③ 《西班牙美洲报导》，第20卷，第266页。

以前),从来没帮助过七月二十六日运动”^④。共产党报纸《今日报》受到制糖工人大会的谴责。

这样,5月底时,对古巴自由主义事业说来,一切形势似乎很好。农业改革法,经过分析,结果是同一些民主国家里其他许多类似的法律一样的温和。洛佩斯·弗雷斯克特在采用一种温和的捐税改革法。但是,可惜古巴的自由主义者自己不懂得怎样指导他们的事业。他们没有组织起来的政治党羽。他们面对着卡斯特罗作为演说家和领袖的巨大才能以及众望所归这一日益明显的事实,在政府里感到自己孤立了。在卫生部的埃伦娜·梅德罗斯对她的朋友、银行行长帕索斯说,他们两人都在浪费光阴,只是被利用,“什么也干不了”。帕索斯安慰她说,“情况已经在大大好转,”他最近约定卡斯特罗每星期到国家银行来。可是,当然,这种事情同建立一个全国性运动来支持自由主义事业的重要性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再则,即使自由主义人士,包括象财政部长鲁福·洛佩斯·弗雷斯克特这样的人在内(他后来放弃革命),其中很多人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受到卡斯特的催眠术似的迷惑。

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全国协调委员仍然是马塞洛·费尔南德斯,他自从1958年4月总罢工失败后接替福斯蒂诺·佩雷斯以来,一直担任这一中央职位。把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作为一个政党进行改组的任务,大概应该落在他身上,落在其他一些名义上还参加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领导的人(大多数是公民抵抗运动过去的领导人)

^④ 鲁比·哈特·菲利普斯的文章,《纽约时报》,1959年5月30日。

的身上。马塞洛·费尔南德斯，虽然五十年代中期在大学里被认为是“同路人”（他作为工程学校校长候选人时曾得到大学里共产党人的支持），在政治上虽说是一个温和派，却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之所以在1959年中不能为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制定一种宪法和纲领，就正是因为他未能从卡斯特罗那里得到明确的指示。他似乎“感到愤怒和忧虑，因为他从未见到过菲德尔，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①当然，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显然必须依赖卡斯特罗，可是，卡斯特罗始终不肯阐明它的目的。没有疑问，象费尔南德斯这样处于七月二十六日运动较低层的人，也可以主动地取到一些进展。可是他们都象其他许多人一样，是忠于卡斯特罗的。只要他说一句话，他们的工作，即使他们做了，也会作废的。这样，他们在全国各地原来可能有力量的组织就成了一种空架子。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似乎有过许许多多有趣的打算，比如关于保护古巴工业，不受美国大西洋海岸的威胁；矿产国有化；创造十万户新的农民业主，使这些人按照法国革命而不是俄国革命的传统，而成为一次虽然是真正的民族的、却是有限的革命的骨干力量。可是，正如大家真正知道的那样，这是一种没有菲德尔的菲德尔主义或者没有卡斯特罗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想法，总是虚幻的。既然马塞洛·费尔南德斯自从1959年1月起就担任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组织者，那么，没有疑问，他尽可以利用这一特殊职位，通过不活动或者笨拙无能而毁掉这个运动本身。但是，象

① 埃伦娜·梅德罗斯的评语。

在胜利前的岁月里那样，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中最反共的集团——福斯蒂诺·佩雷斯、卡洛斯·弗朗基、马塞洛·费尔南德斯——同时也是坚决反美的。他们厌恶老共产党员，是由于想到他们顽固地相信正统的共产主义路线，而不是因为这个路线激烈或者它的革命的本质。

共产党现在比1月间力量更强大了，国家机关各部门都有它的触须或同情者，特别是在新的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里，加上有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他们至少是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卡斯特罗的最亲密的顾问。《革命报》和《今日报》的争论，由于卡斯特罗对《革命报》的明确指示，已经停止。在一个没有政治组织和没有制度的国家中，使卡斯特罗转向共产党的吸引力一定是很大的，且莫说在民族主义和美国这两个问题上他还同共产党大体上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从共产党人在他们的报纸上有关中苏两方问题所发表的文章，采取非常谨慎的不偏不倚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们也有自己的内部问题；一点也不是因为在“本半球的长期革命”这方面，他们已经被格瓦拉包围了。^①

5月底，共产党又开了一次会，为他们对卡斯特罗和革命的政策制定了一种理论基础。布拉斯·罗加显然不仅必须同来自共产党员中支持卡斯特罗的革命最力的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因此在理论上说来是党内的右派）的批评进行争论，还须对付来自左派的批评。结果是搞了一个真正很温和的声明，承认小资产阶级和工

^① 见苏亚雷斯书，第55—57页。

人与农民一样在任何革命中有一席之地；同时声称既然革命的目的在于独立自主、土地归于农民、实行工业化以及“加强民主”，那么，如果卡斯特罗把他所领导的“运动”称为“人道主义的”，也没有什么关系。布拉斯·罗加还斥责“任何极左倾向，任何过分的措施”，因为这些都反映了古巴对进口物资的依赖以及对邻近美国这一地理事实的依赖。^①这种温和态度的用意不仅为了同卡斯特罗达成长期谅解创造条件，象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所希望的那样，而且甚至也是为了约束他和格瓦拉两人。

由于卡斯特罗摇摆不定，潜在的各种反对派力量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团结姿态集合起来了，也许正是这一情况促使他下了决心。古巴牧场主协会坚决地宣称，私人产业的最高限额定为三千三百三十三亩，不能使企业获利。协会主席凯尼安·米拉内斯指出，土地改革比1956年共产党宣布的计划更激烈——说也奇怪，这一指责竟然得到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对鲁比·哈特·菲利普斯的确认，虽然他说共产党自然也参加这次革命。1956年共产党的计划和卡斯特罗的计划虽然有一些相同之处，他认为，卡斯特罗在规定接管糖厂经营的蔗田上走得太快了。在此期间，土地所有人出钱使用私营无线电台攻击土地改革法，并举行大会；据发觉牧场主协会指定一笔五十万美元的基金，以贿赂报纸攻击土地改革。大主教佩雷斯·塞兰特斯——卡斯特罗在圣地亚哥的老朋友——

^① 1959年5月25至28日人民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的结论，《今日报》，1959年6月7日。结论确实有一项附言，说明古巴革命的特点是：在推翻巴蒂斯塔的斗争中，农民是主要因素，而不是工人阶级。

起初曾称赞农业改革法为“必要的和人道的”；可是他后来改变了腔调，隐蔽地说“古巴有某些集团疑心法案的起草人同共产党是“一丘之貉”。^①但是反对派没有也不可能重行纠合教会中人，因为教会现在也有分歧，如同在巴蒂斯塔时代那样：例如，大主教埃维略·迪亚斯最近曾说农业改革法基本上是公道的。

反对派也不能纠合任何好心的自由主义者，因为好心的自由主义人士仍然在政府里。因此反对派的代言人就是“托尼”·巴罗纳，1950—1952年普里奥的总理。另一方面，普里奥则公开支持农业改革法。巴罗纳对新法的批评是说政府不应该分配可耕地，国有土地应先分配。他又一次要求选举。

6月11日，美国政府就农业改革问题给古巴一件正式照会。这个文件表示了“关注”，虽然它承认古巴有合法权利可以征用外国财产，并承认土地改革是走向社会进步的一个步骤。美国当然要主张“迅速的、适当的和有效的赔偿”，虽然他们不坚持具体的数目或者估价方法。有些同情卡斯特罗的北美人士后来说，这个照会“对于形成古巴革命派的猜疑和激起他们的愤怒有重大关系”。^②这倒有点难以使人相信；从现实主义的观点来说，没有一个古巴人会指望通过一项没收属于联合果品公司、平格雷牧场、或者得克萨斯州金氏牧场的大面积产业的法令而不引起美国的反对。

焦点是什么时候给予赔偿——“迅速地”或者用期限

① 《西班牙美洲报导》，第12期，第320页。

② 希尔和蔡特林书，第96页。

二十年的债券——这是一个严重问题，而且在拉丁美洲各国，每次土地改革后，都会发生这种问题，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准备随即付出庞大数目作为赔偿。实际征用时那种满不在乎的和浪费的情况，使得问题更加复杂：例如，平格雷大牧场被改为合作社时，一头价值两万美元的种牛被军队宰掉，举行了一次野外大聚餐。征用工作差不多各地都是由一些比较缺乏经验的起义军军官执行的，他们往往只是把他们认为值得没收的东西接收过来。很少做出财物清单或者给予收据。因此，在实践上，土地改革法的细则不能令人满意，产生了实际发生的种种情况。

在美国的照会事实上还未发出以前，卡斯特罗已向美国提出一项公开的建议，要美国购买古巴糖的数量从每年三百万吨增加到八百万吨。没有疑问，象其他一些先进国家一样，美国本来是可以多买一些热带产物的，如果他们肯慷慨地着手的话；可是要立刻增加近两倍，实际上也不可能马上就办得到。在这以后不久，邦斯尔去见了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同意：

〔一大篇演说〕这不是为了达到他的明显目标的最好方法，而是在于强调古巴作为对美国市场的糖供应者说来，是具有丰富的、伸缩性的、由来已久的潜力的。他同意我的意见，如果他觉得需要再提出这一点的时候，他将同我交换意见，探讨用什么最好的方法去做，而不是作出许多空洞的宣传姿态，徒然显得他不清楚糖的情况……这些〔邦斯尔后来补充说〕真是我们关系中太平的日子。①

然而，在9月以前，邦斯尔没有再见到卡斯特罗。在此期间，政治局面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收到美国关于农业改革的照会的次日，内阁举行会议。卡斯特罗照例是很晚才到的。他立刻开门见山地说建议罢免几位比较温和的阁员，包括埃伦娜·梅德罗斯在内，她仍是勉强地“留在三月份这辆列车上”。^②卡斯特罗用了很长时间才说到本题，而且是在埃伦娜·梅德罗斯质问他的时候才真正完全说出。她的社会福利部长职位由副部长拉克尔·佩雷斯——一个没有政治经验的年轻妇女——继任。已经表现得无能的内政部长路易斯·奥尔兰多·罗德里格斯，由哈瓦那省省长何塞·纳兰霍继任；后者以前是学医的，虽然曾经同埃切瓦里亚一起在革命指导委员会工作过，也跟劳尔·卡斯特罗在奥连特打过仗。由于他们的老交情，卡斯特罗答应给罗德里格斯一个新的工作，让他再去搞《街道报》。曾经跟格瓦拉在拉斯维利亚斯当医生的塞拉芬·鲁伊斯·德萨拉特博士成为卫生部长。司法部的安赫尔·费尔南德斯由他的副手亚武尔继任；亚武尔是律师，以前在大学里曾经是马诺洛·卡斯特的朋友，有叙利亚血统，原是非德尔·卡斯特的老政敌，但现在是一个绝对的朋友。索里·马林，这个在农业改革法提交内阁以前未曾看到该法的农业部长，由佩德罗·米雷特替代，他以往在蒙卡达和在墨西哥曾经跟卡斯特罗

① 邦斯尔给阿瑟·施莱辛格的信，1962年11月。

② 参阅上文。对这次内阁会议的叙述是根据梅德罗斯博士的话；又参阅洛佩斯·弗雷斯克特书，第50—51页。

在一起。最后，那位靠得住的可是无能的外交部长阿格拉蒙特，由劳尔·罗亚博士接替，罗亚曾在大学里长期担任社会科学系主任，从本年1月起担任驻美洲国家组织大使。所有卸职的阁员都是被认为在某些细节上反对农业改革的。

罗亚是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的一个特殊的范例。在大学里，他是第一代的革命学生之一，学习法律，同梅利亚、马丁内斯·比伦纳、以及德拉托里恩特·布劳常在一起。1927年他跟着梅利亚加入共产党，可是后来退党了。然而，从他三十年代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还是接近共产主义的。后来他的一些左翼朋友死了，他就进入学术生活而脱离政治生活；他跟一个有叙利亚血统的富裕的商业家族——库里家族攀了婚，同共产党人疏远了，到五十年代的时候，似乎完全从事于文学，虽然偶尔还有一些怀念过去的文章，想到自己年轻时的英雄岁月。1955年，他在墨西哥出席“文化自由大会”时（他是参加大会的古巴代表），曾拒绝会见卡斯特罗，认为后者是个流氓。1956年，他曾抨击“莫斯科的仆从”用“苏联军队压制匈牙利人民爱国行动的野蛮方法”，以及在“马克思主义的罗马皇帝一天主教”下人人都要经过的“洗脑筋和有系统地统一思想感情”。1959年他曾依附革命，虽然那年夏季他重新发表他反对共产主义的著作，在序言里说古巴革命有“它自己的根源、纲领和路线。它不是从卢梭、乔治·华盛顿或者马克思衍生出来的”。^①

罗亚就是这样一位暧昧的部长。他依然是十分暧昧，

^① 罗亚：《准备》的序言。

不过还是在政府里当外交部长，这个政府的领袖和部长中有几个人比他年轻二十岁。^①

对反对派的疑惧使卡斯特罗变得更为急进。他需要这样做吗？他心里害怕，是由于幻想过度还是真实的敌人在准备刀枪和宣言呢？的确，他遭到了反对，不仅遭到古巴上层阶级和美国企业集团的反对，也遭到美国政府方面的反对。形势是危险的。许多人还记得危地马拉。反革命力量也许是弱的，可是在它背后，在古巴改革家们的提心吊胆的脑海里，隐现着美国的阴影，加上它那数以百计的非官方的机构和压力、它的威力、它对加勒比海地区中反抗行为的传统的反应。总之卡斯特罗想要戏弄一下美国。没有疑问，他甚至在实际上还没有引人注目之前，就期待着发生强烈的反应；而且似乎革命的领导人们，从格瓦拉到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都认为地主们和那些北美公司对农业改革的敌视是一项根本原因，使革命不得不走向更激烈的步骤。

6月13日，卡斯特罗猛烈地攻击农业改革法的批评者为叛徒，他说法案的条文一个逗点也不会改动，反对的人不过是念念不忘于他们的“既得利益”。他对坐在电视室里的一小群人，问他们是否要选举。他们连忙回答，“不要”。两天后，古巴正式拒绝了美国6月11日的照会。说“迅速的”赔偿是绝对办不到的；土地所有人必须接受利息4.5%的债券。然而，古巴的复文在许多方面说来

^① 他仍然是外交部长(1970年)。有一个熟悉罗亚生平的法科学生说，他在精神上是一个“移民”，是桑切斯·阿兰戈的或者他妻子艾达·库里的，以及最后是卡斯特的“移民”(卡里略的手稿)。

却是温和的，显然是由外交部起草的。复文中承认美国诚意地支持土地改革，而且在过去也帮助过古巴的经济发展；它指出，虽然1940年宪法确实规定对任何征用应给予现金赔偿，但是巴蒂斯塔已把国库搞空虚了，而且对美国还存在着逆差。以“强有力的理由”证明这种赔偿方式是正当的。这样温和的复文肯定要求一种温和的答复。然而，同时，似乎是不祥之兆，哈瓦那连续发生几次炸弹爆炸——三枚爆发在6月13日卡斯特罗讲话时间内。可能是老的暴力循环又要开始吗？当然政府害怕会是这样，立刻大量捕人，对象主要是以前巴蒂斯塔武装部队的成员。迅速修改了1940年的宪法，对“反革命分子”可以判处死刑；一个著名的右翼律师，恩里克·利亚卡·奥尔蒂斯，被起义军情报队的特工人员从他家里骗了出来，拘留了几天。

这件事使人想起古巴历届政府所发生的种种情况，很快就引起政府和司法部门的冲突。哈瓦那法院命令释放利亚卡。起义军情报队则奉令服从卡斯特罗的指示。于是卡斯特罗命令司法部对哈瓦那法院的法官提出控诉（这些法官是戈麦斯·卡尔沃、佩尼亚特和帕普龙）。最高法院出来干预了。大法官阿拉包（此人在1958年曾因杀害四个男孩一案对本图拉和劳伦特起诉）认为哈瓦那法院的法官并未超越他们的职权；他还说“革命和革命的政府都不能否认人身保障法”，因为人身保障一直就是革命的旗帜，“只有暴君和专制君主才抛弃人身保障法”。

利亚卡案件是对卡斯特罗的一种暗示，指出根据现行宪法他在法律上能对反对派做到什么程度，再进一步

他就得抛弃宪法了。而且，在他开始在古巴国内独裁地行动起来的时候——不管是出于本性、还是急躁或者判断错误（虽然在某些民主国家中也有人不经过审讯就被拘留一星期），在国际上，卡斯特罗仍然似乎是一个处于阵痛中的、受迫害的歹徒。他象一个被敌人包围的人那样在讲话，在难以形容的阴谋诡计中作斗争，好象在精神上仍然是带着一小批人在马埃斯特腊山里，对暴政孤军作战。从一种政府的立场来看，他仍然是一个起义者。其他的角色他都不感兴趣，或者不如说，他不能胜任；而且许多古巴人，长期怀着模糊不清的潜在的对美国的敌意，想到以往的伍德和萨姆纳·韦尔斯，以及对他们新领袖的尊敬，似乎也不会愿意他干其他的角色。从这时起，卡斯特罗就不再重复以前不时地会在演讲或私人谈话中流露出来的反共言词。此后，他专门批评那些反共的人了。不过，应该承认，卡斯特罗和他的同僚们对于美国和其他的新闻记者一直要盘问他们是不是共产党人（好象认为他们没有权利在美洲实行共产主义似的）就要恼火。但也应该承认，卡斯特罗、格瓦拉和他的弟弟现在一定已经作出一些重大决定了——而且也许没有其他的人参加；连古巴共产党本身的人也不一定参加。

这时候，洛佩斯·弗雷斯克特拿出他的内容广泛的租税改革法案给卡斯特罗签署；他大笑地签了名，说：“也许到实行这个法案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纳税人了。”

在此期间，假如不是同时发生了一次未成功的对外出击，利亚卡案件也许本来会受到较多的注意。来自拉美国家的许多流亡者现在都在哈瓦那。已经对巴拿马搞

过一次未遂的行动。聚集了一队志愿军准备进攻特鲁希略,使人想起1947年对多米尼加的进攻。卡斯特罗向来总是在演讲中攻击特鲁希略;现在他要真正去攻击了,虽然不是亲自出马。可能是因为临近出击,所以卡斯特罗在6月初才明显的决定了同共产党达成和解,因为他在5月间似乎还批评过他们。^①曾经有过一些要进攻附近的其他独裁政权的未能成功的计划——包括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在内——也许没有获得政府的支持。现在,带着卡斯特罗的祝福,大约有二百名多米尼加人,连同由一名起义军军官德利奥·戈麦斯·奥乔亚率领的十名古巴人(奥乔亚曾于1957年5月从圣地亚哥到过山区,1958年中期在哈瓦那当过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反共代表),分两批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北部海岸登陆。然而,大多数人在登陆时立刻就被打死。少数人,包括戈麦斯·奥乔亚在内,拼命进入内地,最后被俘虏了。其中大部分人被拷打和枪毙,虽然负责指挥的头头幸免。后来,一伙年轻的多米尼加人组织了一个政治运动来纪念死者:称为六月十四日运动,一伙豪爽的青年人,受过多米尼加共和国历届政府的粗暴待遇,然而坚持下来了。

入侵多米尼加,有意无意地要使人们在利亚卡事件中不过分注意革命政府一种有决定意义的转变。没有疑问,卡斯特罗曾特别想在军队根据农业改革法代表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接管卡马圭省的一百三十一所大牧场以

^① 这是安德烈斯·苏亚雷斯的说法(第66—67页),虽然不完全能使人信服,但是冒险进攻特鲁希略显然是同他们的“5月决定”冲突的。苏亚雷斯还认为对多米尼加进攻的失败促使卡斯特罗重新安排他的全部政治关系。

前，让几位自由主义的部长辞职。从技术上说，国家“干预”农场的经营管理，正如他们干预电话公司以及普里奥干预过西部铁路那样。可是，现在干预意味着永久由国家管理。涉及的总数在二十五万墩和三十余万墩之间。在被没收的大牧场中有北美的产业，例如得克萨斯州金氏大牧场和马纳蒂糖公司以及其他一些北美公司最近买进的二万六千墩，连同贝当古、阿格拉蒙特和其他著名的卡马圭家族所有的大片产业。按照规定，军队应留给每所牧场三千三百三十三墩，但这一条往往没能做到。

其结果是政府得以控制牛肉的供应。公开对抗革命的大牧场场主，准确地预言将发生过多的屠宰，然后牛肉缺乏。这是在革命中确实往往会出现的情况。^①

卡马圭的大牧场实际上是古巴反革命势力的中心，保守利益的大本营；他们那种可以预料的对农业改革的诽谤，使那些仍然归附现政权的自由主义中心的成员日益离心。与此同时，美国依然没有正式答复古巴6月15日的照会。可是，在私人方面，美国商人已在开始使用那个有名的西瓜的比喻：“革命愈切愈红”。^②6月22日，《时代》杂志对它的七百万读者说，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主任努涅斯·希门内斯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执行共产主义路线者”，将为它的读者报道由魔鬼指使的古巴农业改革的消息。可是这种解释还未获得古巴的教会的最后确认：各宗教组织的六十二名代表的会议，6月底在贝伦开会讨

^① 例如，1936年无政府主义者接管西班牙的时候。

^② 《华尔街日报》，1959年6月24日。

论这个问题。

在干预大牧场以后的一星期内，政府受到来自另一个并非意料不到的方面的攻击。空军的头头迪亚斯·兰斯早已越来越焦躁。他是一个被马查多监禁起来的陆军军官的儿子，还只有三十二岁，革命前他是为Q航空公司服务的商业空运驾驶员，他曾从佛罗里达空运军火到马埃斯特腊山区。他是一个好驾驶员，但才智有限。虽然他是那声名狼藉的第二法庭的成员之一，曾于3月间在圣地亚哥审讯过巴蒂斯塔的空军人员，但拒绝随同那次不成功的多米尼加共和国远征队飞往圣多明各。他曾一度阴谋反对古巴的共产主义势力。6月间，他曾在空军中的“学习班”上发过牢骚，学习班的教员是武装部队总司令劳尔·卡斯特罗派来的。“学习”内容有民族主义观点的古巴历史、对政府计划特别是对农业改革的解说、以及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理论水平很低。

6月中，迪亚斯·兰斯事实上患了斑疹伤寒。6月29日恢复工作时，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驳斥外面流传的他遭到拘禁的谣言，并且说“我反对各种类型的独裁，特鲁希略式、巴蒂斯塔式、共产主义式……特别是共产主义制度。”卡斯特罗立刻召见他，责备他没有取得他的同意就发表这样的声明，并吩咐他不要回到空军去。迪亚斯·兰斯回家，准备了一封辞职信，当天下午，带着家眷乘一只小船逃往迈阿密。在哈瓦那，蒙卡达和“格拉玛号”时期的黑白混血种老将胡安·阿尔梅达，暂时接替迪亚斯·兰斯的位置。

迪亚斯·兰斯接着就被卡斯特罗斥责为古巴革命的

本尼迪克特·阿诺德^①。甚至费利佩·帕索斯也指责他是投机，曾在内战中作为雇佣兵开过飞机。随后，在空军中进行了清洗。凡被认为是迪亚斯·兰斯的友好的军官都被革职，另找若干委内瑞拉人和哥斯达黎加人来替补。

接下来的最后一幕是对乌鲁蒂亚总统进行政治教育。乌鲁蒂亚已经和马托斯少校一起在群众中露过面，并于6月8日在卡马圭发表一次反共讲话而激怒了卡斯特罗。乌鲁蒂亚由于未能同几个自由主义的部长一起在6月12日辞职；他只得不声不响，直到月底才在一次电视节目中会见路易斯·孔特·阿圭罗。孔特·阿圭罗向他提出那个已经使人厌烦的问题，政府里是否有共产党人，请他发表意见。乌鲁蒂亚说：

在……部长会议里，我不知道有共产党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博士，你可以相信，不是共产党人，我也不是……共产主义者是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的，这我不相信……重要的是我们要防止革命，防止我们这个人道主义革命的失败。^②

乌鲁蒂亚不顾一切地企图用卡斯特罗自己的话来说明他的立场。共产党作出反应了。6月30日，多年来担任共产党领导成员的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驳斥乌鲁蒂亚说：总统已经放弃他的中立地位，不顾信义地侮辱了共

^① 本·阿诺德(1741—1801)，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将军，后来叛变，投降英国。——译者。

^② 乌鲁蒂亚书，第46页。这是在6月27日。

产党，从而“在困难时刻破坏革命阵营的团结”。^①

卡斯特罗这时也出来干涉了。他暗指着乌鲁蒂亚和迪亚斯·兰斯，作出这种有点隐晦的谴责：

我认为，如果我们为了要免得被人称为共产主义者，而必须反对他们和攻击他们，这不完全是光彩的……有自尊心的人们是不这样做的。我们……宣告每个人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写文章，从《海洋日报》到《今日报》。^②

报纸毕竟还是继续出版，不过现在没有一家得到政府津贴了；有些报社由于向来一直仰仗这种帮助，结果感到难以维持下去。

此后几天，比较平静地过去。然而，兆头不佳的是，格瓦拉从中东回来了。在其他地方，乌云继续增多；6月3日，在华盛顿中央情报局主持下的“情报社”提出一份报告，说卡斯特罗是“亲共的，他的顾问不是共产党员便是亲共分子”。^③与此同时，《前进报》指责乌鲁蒂亚购置一座豪华的别墅，《革命报》则发表一篇动人的故事，卡斯特罗借此表明他自己所有的钱连在萨帕塔沼泽地买一所小屋也不够。他简单明瞭地说，“我个人既没有也不想有任何东西。‘无私欲’是我到处穿着的外衣。”7月12日，《自由新闻报》暗示乌鲁蒂亚应该学习卡斯特罗的榜样。

① 《今日报》，1959年6月30日。

② 《革命报》，7月2日。

③ 雷蒙德·莱迪对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说的，见《共产主义的威胁》，第849页。

7月13日，孔特·阿圭罗又去会见乌鲁蒂亚（这位总统在此期间曾以诽谤罪对《前进报》发出传票）。关于乌鲁蒂亚同卡斯特罗发生争论的这些谣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总统回答说，“我同菲德尔·卡斯特罗绝对没有不一致的地方……他跟我一样赞成人道主义的民主。”可是后来他说：“我认为共产党人正在使古巴蒙受大害……古巴的共产党人想搞一个第二阵线来反对古巴革命……这一阵线包括所有附和俄国对抗自由世界的人。我认为这是犯罪的和有害的。”他回忆了共产党人在巴蒂斯塔时代曾批评“我们的起义政策”；他回忆了共产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古怪行为；他甚至大胆地批评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据的苏联社会。^①

乌鲁蒂亚就这样想在卡斯特罗和共产党之间制造分裂，并且他故意让人知道他将继续攻击共产党。第二天，逃亡的空军司令迪亚斯·兰斯竟然在华盛顿出席美国参议院的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在参议员伊斯特兰、多德、奥林、约翰斯顿、鲁斯卡、和基廷面前，作了一系列尽管是东拉西扯和不正确的、却是令人发指的关于古巴国内生活的陈述，使这些烦恼的立法者大为高兴——流言蜚语、谣言、私下推测、有些是真实的陈述、有些却是假的。

然而，迪亚斯·兰斯的成就是促使美国的舆论和官方意见进一步不信任古巴，并削弱古巴国内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如果卡斯特的反对者居然到美国去向一个以态度激烈著名的小组委员会作证，那么，甚至在温和派

^① 参阅乌鲁蒂亚书，第49—53页。

人士看来，这些人立刻就成为卖国贼。如果迪亚斯·兰斯这样做了，乌鲁蒂亚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难道所有的温和派人士都能够向参议院作证吗？再则，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怎么能够接受一个假定是友好邻邦的一个逃亡的空军司令来作证？这的确使人想到参议院并不把古巴看作一个外国。因此，可以这样推论，如果古巴是在进行一场持久的革命，参议院就将把这场革命看作是叛乱并建议采取相应的行动。

当然，参议院不是行政部门（正如卡斯特罗后来所承认的），行政部门不能为立法部门所做的事负责（艾森豪威尔和赫脱都指出这与他们无关）。可是，也许立法部门今天所想的，行政部门明天也会这么想。在不稳定的政治局势中，小事不能小看。“迪亚斯事件”正是产生了迪亚斯·兰斯所希望的相反的效果——防止政权进一步过激化。它却使卡斯特罗获得另一个机会，可以无所顾虑地向左迈进。

甚至乌鲁蒂亚也不得不谴责迪亚斯·兰斯，但是这样做也救不了他。^①7月17日，他一觉醒来，发现卡斯特罗已经辞职。他在国民宫里走下楼来，看到内阁等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办。乌鲁蒂亚想打电话给卡斯特罗，没打成。内阁开会了，卡斯特罗没有到，部长们各自散去，传说纷纷。制糖工人的领袖，古巴革命的两面派之一，孔拉多·贝克尔，这时公开要求乌鲁蒂亚辞职。当天晚上，卡斯特罗在电视中讲话。在一篇又长又惊人的演说

^① 他后来收回这种谴责。参阅所著书，第67页。16日本来预定他要在电视中再讲话，但电台通知他，预定的时间已给别人租去了。

中他毁掉了总统。这与其说是演说，不如说是执行死刑。乌鲁蒂亚“搞乱了”政府。乌鲁蒂亚任命的一些人极其使人不安。又提到乌鲁蒂亚的房子。还说到乌鲁蒂亚的四万美元的年俸，他的薪俸，和部长们的不同，一直没有减过；可是最重要的是对共产主义的讹诈。乌鲁蒂亚在捏造一种共产主义神话，以便挑起外国的侵略；他策划抛弃古巴，准备卷土重来，同几个北美洲人一起统治古巴。乌鲁蒂亚甚至应对在共和国的根本法上取消上帝这个词儿负责。卡斯特罗接着就说自己“无能为力”和“毫无办法”；“甚至现在我不能做任何工作，因为自从星期一以来，由于狂热的反共声明逼使我们处于目前这种国际地位而精疲力尽了。”法官的清洗，“原意是为了恢复司法机关中的平静，可是因为竞争以及跟一位也是他的朋友的法官有私人纠葛，乌鲁蒂亚曾决定处以死刑”。

卡斯特罗在讲话的时候，拥护他的电话信件开始传到电视台来，同时群众聚集在总统府周围，要求乌鲁蒂亚辞职。内阁中的部长们集合在一起，由国防部长马丁内斯·桑切斯把守着，不许他们离开。乌鲁蒂亚的侍从武官阿尼瓦尔·罗德里格斯建议作不顾一切的抵抗。但是，乌鲁蒂亚却不是这样想法。他辞职了，这是1月以来的第四次辞职。这一次，没有人阻止他。他离开了总统府。^①

可以得出什么教训呢？对乌鲁蒂亚的人格摧毁是残酷的。可是对于成千上万的古巴人来说，对那些拚命

^① 乌鲁蒂亚迁到一个朋友家里，在那里作为“在家拘留”，然后到委内瑞拉大使馆避难，后来好不容易才获准出国。

拥护革命的群众来说，一个对共产主义怀着强烈兴趣的人，倒似乎会同美国、同革命的敌人、同旧秩序的朋友站到一起去了。今后在古巴，表示反共的意见就会使发言者受到怀疑甚至最后被逮捕、审讯和长期监禁。到这时候，卡斯特罗，不管以前有过什么感想和意见，一定已经打定了主意，正如他四年后告诉赫伯特·马修斯的那样，古巴共产党“有一些人是真正革命的、忠心、诚实和有训练的。我需要他们。”^①

① 马修斯：《返回古巴》，第 11 页。

第二十五章

自由主义者黯然失色

现在古巴既没有总统，并且表面上也没有总理。可是卡斯特罗仍然能掌握舆论、武装部队和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而且在几小时内，就有一位新总统宣誓就职。卡斯特罗原来打算请1959年1月后的第一任总理米罗·卡多纳担任总统，但是，劳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两人都认为，这样一个人选只会在几个月内引起新的危机。^① 一个比较肯听话的人物是法律修订部的部长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他比乌鲁蒂亚能干，不过，也是属于资产阶级出身：他的祖先是西恩富戈斯第一流的家族之一，和赫赫有名的托马斯·特里有亲戚关系，特里娶了他父亲的太姑母。他一度是共产党员，并担任该党主席马里内略的秘书，^② 但是后来，又再度陷进了中产阶级的情调，成为一个业务兴旺的律师、西恩富戈斯自来水公司的法律顾问和西恩富戈斯游艇俱乐部主席。他谨慎小心地为西恩富戈斯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工作，虽然他的叔父佩德罗(ABC党的老成员和参议员)曾在巴蒂斯塔手下为工农业开发银行做过工作，现在还在狱中。

多尔蒂科斯的同事们认为他是“温和的”。坐在他隔

① 这是帕索斯根据当时的传闻的回忆。

② 1950年他作为共产党的候选人曾在西恩富戈斯参加竞选。

座的埃伦娜·梅德罗斯回忆说，在内阁会议上，每逢卡斯特罗开始攻击美国时，他就紧张得出汗。可是，多尔蒂科斯作为古巴革命政权一个名义上的领导人，却是再好也没有的了。他使这个政权在必要的时候能够稳定、继续和合于体统；他“对卡斯特罗的一切想法百依百顺”，为了找点什么事情做做而担任内阁的秘书。他很快就以遵守办公时间的一名内阁成员而闻名了，并且确实是习惯于有条理工作的唯一的人。^①

同时，卡斯特罗已经宣称他的政治前途将于7月26日在公民广场举行的纪念进攻蒙卡达营地六周年大会上提交“全体人民”决定。在会期前的日子里，农民涌进哈瓦那，有许多是由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组织的，自动要来的也不少。7月23日，古巴工人联合会组织了一次总罢工，要求卡斯特罗重掌政权。26日，大会在公民广场如期举行，这是一次农民的大集中，是一个群众性的假日。军队游行。哈瓦那的居民抢着招待乡下人住宿。那天，参加大会的乡下人和城里人都把开会当作一种联欢。多尔蒂科斯总统主持开会仪式，首先宣布：应无数人的要求，卡斯特罗将重任总理。群众热烈欢呼达几分钟之久，又唱歌、又跳舞、高呼革命口号。卡斯特罗然后讲话四小时。他从太阳高照时开始，一直讲到斜日西沉在他后面。这种盛况，那天是第一次。群众都着了迷。卡斯特罗象平常一样，讲得很清楚，不带讲稿，常常重复他的要点使其印象深刻，而绝不完全重复他的词句。不时为群众的跳

^① 洛佩斯·弗雷斯特书，第52页。多尔蒂科斯(1919年生。1941年法律系毕业)1970年仍然是古巴的总统。

舞和唱歌以及高呼“菲德尔万岁！”所打断。到处有人在卖饮料、帽子、夹心面包。这就是“直接民主”，是“最高领袖”和人民的直接联系。

卡斯特罗已经提出过，他的政府至少要在外交上保持不受美国的指挥。这种提法具有不可抵抗的力量。不要认为头脑简单的或者不识字的人觉得这种政策没有吸引力。它对头脑简单的和思想复杂的人、富人和穷人，都同样有吸引力，一贯有力量。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对爱国主义精神无动于衷。也不要认为对于一个需要外国市场和受外国资本支配的小国，爱国主义是可笑的。可笑的东西往往也具有吸引力。当然，格劳，甚至巴蒂斯塔也曾作过同卡斯特罗大致相同的诺言。然而，电视和无线电使千万人认为卡斯特罗比他的一切前任都更具有决心。

然而，到7月的时候，似乎还发生了更积极的变化。卡斯特罗早已宣布过一项估计需一亿三千四百万美元的公共工程计划，以便缓和失业，因为现在一般认为失业人数已达七十万，占全部人口的10%。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宣布它在第一年中将动用一亿美元。财政部长洛佩斯·弗雷斯克特宣布对一切薪金（不分大小）征取3%的所得税，作为公共工程计划的经费。政府命令炼油厂每加仑汽油提高价格5分，作为汽车修理厂工人每月最低工资八十五美元的经费（巴蒂斯塔曾答应过的，但未做到）。当然，还有农业改革本身的问题。8月间，有些土地开始被分配给少数没有土地的人家，预计有十万户将在最近四个月内每户分得六十七亩，来源全部是大庄园的未耕地。

可是这一切究竟算是什么呢？当然，如果是有益的，方法叫做社会主义或是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或是自由主义都没有什么多大关系；寻求获得全面说明的人通常多半是有毛病的制度的辩护士或者他们的死对头，而不是成功地实行这种制度的人。卡斯特罗曾抛出人道主义的概念，让它被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人接过去作为一种旗帜。然而，他大概曾经不太认真地考虑，并且也许仍然在考虑，要在国际上保持中立，保持一种革命的民族主义的“纳赛尔式”的立场，不过，它同美国的关系虽然疏远，却仍然不是同苏联站在一条线上。

再则，还有共产党这个问题，它有组织、有准备、有信心，并且在它背后有一个即使不是一直可以预料的、却是强有力的盟友苏联——这一点凡是同西班牙共产党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的。共产党已经在古巴国家中占有一点地位，他们都是卡斯特的追随者，虽然卡斯特罗还不是他们的领袖。更实在的是，到1959年7月的时候，卡斯特罗在多年没有一个明确的信仰之后，似乎在他弟弟和格瓦拉的影响下，越来越想对政治作出一种全面的解释，尤其是如果此中的好处是经常由亲密而严肃的朋友向他提出的话。还有那讨厌的使人担心的问题，除非他采取极端的措施，资产阶级就会败坏革命。虽然有些共产党领导人，象美国批评者说的那样，是呆笨的和没有想象力的，但也有一些是聪明的；中央委员会里有各种有才干的人。到了这时，卡斯特罗也许已经不能去掉共产党人，即使想要那样做的话。如果他不可能消灭他们，也许唯一的抉择是同他们联合。

现在谁还带着怀恋的心情回顾议会制政府呢？显然连前总统普里奥也不会这样。托尼·巴罗纳和格劳·圣马丁仍然是仅有的鼓吹民主制度的人，但是，这两个人都不大受人欢迎了。假如古巴的自由主义人士比较团结、比较果断、比较乐于合作的话，卡斯特罗一定会对他们加以考虑的。可是自由主义人士喜欢卡斯特罗的语言。对他们来说，他也是“领袖和导师”。他们一心忠于“这个革命”，革命毕竟就是卡斯特罗个人的了不起的成就。他们充其量只能说是代表专业的中产阶级——大约五万户，包括教师在内，其中有很多人，特别是一些乡村学校教师，很难说是资产阶级人物。他们决不能代表那其余的相当大量的古巴中产阶级——十万个企业业主、商人、银行家、企业的管理人员或者董事以及他们的家属，在这些入中有许多实际上连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分不清，他们把费利佩·帕索斯和布拉斯·罗加一视同仁。除了很少几个民权主义者以外（例如巴卡迪的首脑佩平·博什和糖大王洛沃），他们从一开始就不信任革命。卡斯特罗从来也不可能把他们算作一个进步的民主大运动的同盟者。无论如何，他已经在演讲中唤起了广大群众的政治想象力。

认为卡斯特罗在1959年7月间已经决定了是否或者怎样同共产党合作，这也许是过甚其词的。可是这不可能拖得太久了。^①在研究一切革命时，历史学家总是寻求转折点，寻求决定性的时刻。研究古巴的人不断地在自由主义改良的目的已经完全没有希望实现的时候，找寻精确的富有戏剧性的点。没有这样一个时刻可以如此

地刻划出来，因为卡斯特罗实际上究竟是怎样同共产党合作的，总是不清楚的。可是，同样明显的是，在1959年夏季某个时期，卡斯特罗曾决定他可以独裁和急进了，并且没法找过武器；在欧洲和美国都未能成功后，他就开始，至少从现在开始，考虑接近苏联。

同时，1959年7月26日在公民广场举行大会后，那些乡下人不愿意回家。其中有许多人从来没到过哈瓦那。商店、年轻姑娘、高大的建筑物、浮华的财富、颓废生活的各种装饰，对他们的诱惑太大了。无线电和电视劝他们在某些地点集合。最后在军队的帮助下，他们集合了。

1959年8月，开始采取守势，参议员富布赖特呼吁在美国对古巴的关系中要耐心和谅解。古巴共产党人心里显然十分不安，因为赫鲁晓夫对美国的访问已经宣布；古巴共产党的报纸《今日报》在那年夏季中多次要它的读者放心，赫鲁晓夫的访问会制止美国国内那种荒谬的反共思想，从而使古巴可以平安地开始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经济关系。《革命报》和《今日报》又一次发生争吵，《今日报》指责《革命报》雇佣一个穆哈尔分子安赫尔·奎尼亚担任劳工问题编辑；《革命报》予以回

① 值得注意的是，据一个公认为第二手的来源说，所谓卡斯特罗是通过法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和苏联接触这一说法，是在1959年7月第一次提出的。参阅詹姆斯书第237页，他根据据称是古巴驻墨西哥大使馆前武官曼努埃尔·比利亚法尼亚上尉的证词，说拉米罗·巴尔德斯在那个月到墨西哥来了两次。然而，巴尔德斯自有到墨西哥去的理由，因为他的妻子是西班牙-墨西哥人。一个比较可能的使者是共产党主席马里内略，他访问苏联、波兰和捷克后于7月28日回到古巴。1959年去中国访问的人包括比奥莱塔·卡萨尔斯(7月)、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10月)和乔蒙(11月)。

击，指责马里内略曾把自己的诗集送给巴蒂斯塔的内政部长圣地亚哥·雷伊，并发表了诗的“献辞”来证明其事。8月7日，人身保障法在古巴恢复了；巴蒂斯塔下台后此法曾停止使用。一些律师开始申请释放大约五百名作为反革命分子的犯人，其中有很多是被任意逮捕并且在狱中受到非常坏的待遇。

可是这还太早。8月中旬，在拉斯维利亚斯破获一件牧场主的阴谋。这多少是由卡马圭的反革命分子策划，并得到特鲁希略支持的（很可能中央情报局也卷入）。阴谋者去找威廉·摩根少校（美国出生，特立尼达的解放者）和埃洛伊·古铁雷斯·梅诺约少校。摩根自1月以来，就在特立尼达附近搞一个养蛙场。他们企图贿赂这两位少校帮助他们，这两个人假装赞成这些计划，虽然不能完全排除这两个人确实真正站在反革命的一边，后来又去告发同谋者。^①

摩根集合了五十个人在特立尼达机场，打给特鲁希略一个电报说，“城市已占，击退政府军队。速送武器。”为了维持幻想，当武器和人员到达时，摩根叫他手下的人高呼“打倒卡斯特罗。消灭农业改革”，同时古铁雷斯·梅诺约向特鲁希略要求一套相当于“恩主”自己穿的制服。（特鲁希略提出要一所属于《波希米亚》主编的乡村别墅，作为他帮忙的代价。）摩根和卡斯特罗望着那些阴谋者从一株芒果树下出来集合。于是把所有的入侵者都逮捕了，其他很多人——也许有两千之多——被扣留

^① 参阅保罗·贝瑟尔：《古巴和美国》，第77—87页，美国大使馆的情报员叙述在阴谋失败前同摩根的会见情况。

在古巴的其他地方。阴谋者似乎计划成立一个临时政府，以普里奥手下的前劳动部长(埃尔南德斯·特莱切)为总统，一个牧场主凯尼安·米拉内斯为副总统，另一个地主梅斯特雷·古铁雷斯为总理。所有这些人和其他很多人都被逮捕。^①

有这样一种阴谋，似乎是肯定的。它同特鲁希略有关系，也是同样清楚的。然而，从此以后，伴随着革命赐予穷人和无地的人以社会利益而来的，就有监禁、迟延的审讯、不时的死刑、越来越多的任意没收土地、和过分拥挤的监狱了。卡斯特罗的监狱，没有疑问，将开始比巴蒂斯塔的监狱有所改进。用刑通常是少了，可是漠不关心、过分拥挤和侮辱人格仍是屡见不鲜。监狱里的人数也已经超过巴蒂斯塔的统治时期。确实，有些在早期支持过卡斯特罗的人现在都已在狱中。革命，象古罗马农神一样，开始在吞噬它的孩子了。至于农业改革，连中等大小的庄园也开始被接收了；牛只、机器甚至个人用品都归于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它往往拿了东西不给收据，更不给赔偿；迁移到土地上来的农民暂时只得到一些可以在所谓人民商店流通的单据。

几天后，美洲国家组织的理事会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开会。罗亚博士作为古巴外交部长第一次参加这一个大会议，可是在最后一分钟，由于劳尔·卡斯特罗突然出现，而使他的声势黯然失色(应该说，他的声势是表现为

^① 摩根的美国国籍后来被取消了。一位最近的传记作者罗伯特·克拉斯鲁勒在其著作《特韦希略，一个加勒比海独裁者的传记》第349—351页中说摩根从特韦希略那里得到五十万美元。

尖锐的声音，而不是如雷轰鸣)。劳尔穿着制服，长头发结成一个髻，和理事会那些衣履整洁的绅士相形之下，显得奇形怪状。他的军用飞机未得到智利许可就到达圣地亚哥，一时被扣留在机场。他说他来这里是“让孩子们旅行一次”并护送罗亚博士回家。然而，唯一高兴见到他的，似乎就是智利的社会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以及一些热情的下层阶级智利群众。其他的拉丁美洲民主主义者，例如贝坦科尔特，是冷冰冰的；实际上，贝坦科尔特已经在私下对他一些朋友说，卡斯特罗是“拉丁美洲的一种恶势力”。^①

会议首先处理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问题；有人提议派遣一个美洲和平委员会到那里去。罗亚同意了；然而，劳尔·卡斯特罗恐怕造成前例，说革命政府决不允许美洲国家组织在古巴进行任何调查。他还说，古巴将在六个月以内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何时举行选举。在其他地方，美国政府对于怎样对待古巴还有分歧意见；例如，仍然留在国务院加勒比海科这个不容易干的职位上的威兰，坚决认为卡斯特罗不是共产党人，而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的空军武官格劳上校则把威兰本人叫做“不是傻瓜便是共产主义分子”；他们两人之间发生了没有意义的争论。^②

然而，美国政府这种迟疑不决的情况暂时并不至于

① 塔德·苏尔克和卡尔·迈耶：《入侵古巴灾难记》（纽约，1962年），第21页。

② 这场古怪争论的全部经过可参阅《共产主义的威胁》，第845、806、807、797—798页；以及威兰证词，第602页。这场争论发生在从墨西哥飞往马萨特兰的飞机上，当时他们为米尔顿·艾森豪威尔博士作“摘要”说明：米尔顿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兄弟，美国众议院议员，他是美国对拉丁美洲政策的一种进步势力。

影响经济关系。例如美国农业部在修订每年的食糖限额时，稍微增加了古巴的吨数，同对美国本土的生产者一样。这是因为糖价仍然很低——世界市场价格在7月间达到十八年来的最低点（2.55美分，而从经济上来说，古巴的甘蔗生产所需要的最低糖价一般认为是3.25美分）。

在古巴国内，一些小规模的甘蔗农场场主呈请政府接管一百六十一所糖厂中的大约四分之一，理由是他们拖欠着对佃农的债务。可是，糖价低当然也增加了糖厂主的困难：他们甚至连修理费用也无力负担。政府暂时只接管马卡瓜糖厂，此外有十一家因为他们过去属于巴蒂斯塔或他的朋友的，所以已经开工了。制糖工业在一片混乱中勉强前进，准备迎接将于1月间开始的革命后第二次收获。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的生产部主任皮诺·桑托斯，即使是毫无意义地也是安慰人心地说，古巴将采取“攻势的糖政策”。

9月间，政府总算开始了一种攻势的关税政策：对进口货物征税——食品最高为30%，打字机和办公室机器40%，低级汽车和一些家用物品60%，高级汽车80%。今后进口货物一般需要许可证，外汇将受到限制。气氛是严肃的。卡斯特罗攻击酒精中毒是“万恶之总和的恶习”，对酒类征收重税。可是同时，却矛盾地企图重新提倡旅游。旅游事业管理局的负责人卡洛斯·阿尔莫伊纳^①宣布一项突击计划，目的在于推动对旅馆业的投资，

^① 阿尔莫伊纳是一个西班牙出身的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五十年代中由于厌恶革命分子中的党同伐异而参加了美国军队。（他后来参加卡斯特的反对派，被捉住，判处死刑，经赦免改为监禁。）

新建一个喷气飞机场，并将于下月召开一次大型的旅游会议。当然，由于差不多所有的游客都是来自美国的，这自然意味着希望保持良好关系。

9月间，好象政府确实即将从根本上重新考虑盟友关系以前后退一步，让一些温和派——例如阿尔莫伊纳——来提出温和的计划。《革命报》副社长欧克利德斯·巴斯克斯·坎德拉又同共产党人进行一场新论战。^①从6月以来，作为总理的卡斯特罗，每星期四出席他的经济顾问和经济部长们的例会——虽然他到目前为止总是避免讨论古巴与美国的经济关系。^②甚至在9月5日邦斯尔还同卡斯特罗举行一次亲切的会见。（邦斯尔从7月起就在等待，这次会见是他硬要的，他说他将为了“不是例行述职”前往华盛顿。）这次会见的气氛是轻松的，邦斯尔离开时带着相当有希望的心情；卡斯特罗说，美国政府不应过分重视“在革命热情气氛中工作的年轻人那种过火的宣传”。^③然而，两国的关系，由于海军作战部部长伯克海军上将的影响，依然处于紧张状态；他向来是主张在加勒比海采取强硬行动的人，他宣称：已经在加勒比海发现苏联潜艇，整个地区都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这位海军上将这时确实已经认为卡斯特罗是个共产党人，理由是俄国人对于控制世界上的海洋航路很感兴趣，例如对于印度尼西亚、埃及、以及现在古巴：“各洲的狭窄地带

① 参阅《革命报》1959年9月10日，他在报上说，假如坎蒂略是在1958年中组织他的党派，共产党人是会支持他的。

② 菲利佩·帕索斯提供的材料。

③ 邦斯尔的文章，《外交季刊》，1967年1月。

都招致危险”。^①

在古巴本身，财政部长洛佩斯·弗雷斯克特长期地和乌维尔特·马托斯讨论共产主义与革命问题：马托斯不象伯克那样，认为卡斯特罗不是一个共产党人。财政部长和马托斯于是同意合作“来阻止共产主义，但是没有拟出具体的计划”。^②同一个月，卡斯特罗偕同他弟弟和西恩富戈斯来到圣克拉腊，罢免了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省领导人（华金·托雷斯）和省内军队以及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的头头（德梅特里奥·蒙特塞尼和苏亚雷斯·加约尔），大多数不是代以共产党人，而是代以无条件支持他们的人。^③马托斯是愿意反对共产主义的陆军领导人中最出名的和地位安排得最好的一个，在卡马圭省越来越孤立，实际上一点事也没有做；终于在月底有一个新的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负责人，豪尔赫·恩里克·门多萨，被派来加快该省农业改革的步伐。门多萨以前是法科大学学生和人民党，曾在马埃斯特腊山起义军电台当过新闻报告员（他最初被派在奥连特省的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工作）；他虽不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显然也不是一

① 伯克上将和作者的谈话，1962年12月26日。

② 詹姆斯书，第167页。

③ 这些人分别是，劳尔·卡斯特罗的一个老朋友“尼卡拉瓜”（卡洛斯·伊格莱西亚斯）、奥尔兰多·普埃尔塔斯和曼努埃尔·博尔赫斯（华金·托雷斯提供的材料）。这三个人都是劳尔·卡斯特罗在克里斯塔尔山时的部下。蒙特塞尼留在古巴，托雷斯流亡国外。苏亚雷斯·加约尔从来就不是一个对于自己参予其事的革命会感到满意的那种革命分子，他和格瓦拉一起去玻利维亚，1967年在那里被打死，他早先曾同马托斯有所接触。

个会对抗政府命令的人(正如事实将证明的那样)。^①

在初秋,卡斯特罗似乎还未能把他的党羽再团结起来。他说古巴将在四年内举行选举。提早举行,只会分散古巴人的注意力,不能集中于消灭失业这一主要任务。他又说,一旦舆论开始反对他,他就立刻辞职。然而,当时他认为全国人民百分之八十是拥护他的。没有疑问,他说得对。^②可是一点也不能使人看出他关于选举的说法是认真的。9月间,因为向美国谋求武器未能如愿,古巴要求英国供应十七架“猎人”喷气式战斗机。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先生犹豫不决。美国显然请它的盟国不要卖,于是经过几周的犹豫之后,英国同意不卖。^③一种同四年前发生在埃及的例子似乎就要在古巴形成了,也许这是对于现政权的历史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与此同时,格瓦拉从亚非之行回国了,带来了跟埃及和锡兰签订的似乎不很有利的条约。格瓦拉赞扬了他所访问的除了印度的大多数国家,他认为,印度的发展被“牛和宗教”阻碍了。他又说,南斯拉夫是一个进步最快的国家。这一评语,有些人认为意义重大。有一位记者,未免过早地称

① 门多萨后来在1967年成为政府报纸《格拉玛报》的编辑,并保持着这个位置(1970)。

② 6月下旬举行了最近一次民意测验。测验进行时内阁正在开会,当场把结果报告给卡斯特罗,数字表明从2月的91.85%降到78.31%。部长们似乎吓了一跳;卡斯特罗说“我们还很不错;最后将只有儿童拥护我们”(洛佩斯·弗雷斯特书,第56页)。

③ 参阅1959年12月2日上议院的讨论。古巴政府要求供应十七架“猎人”喷气战斗机替代那卖给巴蒂斯塔的十七架“海威”。英国政府拒绝这一要求,理由是“供应喷气飞机……会在仍然十分微妙的局势中增加一种新因素”。英国政府明白否认这一决定是在受到美国压力后作出的。

他为“铁托主义者”；可是从其他材料表明，在格瓦拉的旅行中，非共产主义国家给了他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甚至很钦佩日本的发展。古巴共产党又回到一种非常温和的路线。布拉斯·罗加在另一次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讲到“左倾”的危险，此时古巴革命比其他的革命更依赖国际形势，古巴本身则依赖进口。没有疑问，这是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以后国际心理的一种反映。^①

10月12日，美国答复古巴6月15日关于农业改革的照会：无论巴蒂斯塔政权做了什么错事，总不应该使一些毫无责任的美国投资者代受惩罚，同时那些错事也不能使古巴政府有正当理由可以不顾国际法和古巴的基本法律。日本的农业债券是用来偿还日本地主（古巴曾提到麦克阿瑟的农业改革中规定用债券赔偿）而不是付给原有土地的外国人的。美国因此准备坚持它的要求。

流亡分子在10月初也很忙碌，特别是从佛罗里达到古巴上空的飞行。10月11日，一架飞机在比那尔德里奥对一家糖厂投了三枚炸弹，这是许多这种事件中的第一次。古巴向美国提出抗议。是不是强硬路线在华盛顿占了上风，以致政府或者中央情报局现在准备以武器帮助流亡分子，象尼克松副总统曾经建议的那样呢？尽管关于政府同古巴流亡分子的关系这方面的消息后来从美国流传出来的很多，但没有证据说明美国政府在1960年

^① 《今日报》，1959年10月7—8日。赫鲁晓夫9月15日到达美国，有名的戴维营会议是在9月25日举行的，这也许是匈牙利事件和1960年U2危机之间和平共处时代的高峰。

3月中旬以前曾同意中央情报局支持古巴流亡分子。^①可是，如果政府并未同意，又怎样呢？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往往会自作主张，甚至违反美国政策的路线。如果政府里有人点了头，或者在睡梦中或者是悄悄地同意，对流亡分子作有限的支持，又怎样呢？可能中央情报局指望会出现一个它认为一定会来的决定。古巴政府在比那尔德里奥捉住的二十人中有两个是美国驾驶员；整批人都是从佛罗里达获得接济的，当然是非官方的，象美国政府说的那样，可是在迈阿密的中央情报局又是怎么能说是非官方的呢？这还不能说得太肯定。

10月15日，马丁内斯·桑切斯——劳尔·卡斯特罗的老军法官，曾任国防部长并以这个身份协助改组武装部队，他把重要的指挥权给予卡斯特罗的忠实拥护者——被调到一个同样敏感的职位，劳动部。劳尔·卡斯特罗现在参加内阁，任革命武装部长。同时，温和派的劳动部长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不见了。10月17日，驻华盛顿的古巴大使第一次公开明白地说，如果古巴向英美购买武器的要求不能办到，它可能转向其他方面——也许会转向苏联。也是10月15日，卡斯特罗同他的经济顾问和部长们开了最后一次的星期四的例会：在最近一次会议上顾问们把全部时间用来劝使卡斯特罗参加他一个月前同一些有势力的企业界人士约定的餐会。他

^① 洛佩斯·弗雷斯克特书(第136—137和168—169页)上说，佛罗里达的所谓“双棋盘公司”，1959年5月14日依法成立，在入侵猪湾中曾利用它雇用美国飞行员，早已是中央情报局的一种掩护，甚至与1959年6月的特鲁希略阴谋也有关系。参阅《迈阿密先驱报》，1963年3月5日。

为自己解释说：“对这些人，我无话可说”；此后的事态发展说明一切都已经决定了。

自从7月间关于乌鲁蒂亚的毁谤事件以来，现政权的第一次重大危机现在随着卡马圭省军事长官马托斯的辞职而发生了；他辞职的理由是革命正在受到共产党的渗透。在他后来受审讯时，他承认他曾谈过需要有一个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全国指挥部”。十四个军官跟他一起辞职。马托斯是因为任命了劳尔·卡斯特罗而决定辞职的。他于10月19日写信给卡斯特罗：

我不愿意成为对革命的障碍，并相信，在使自己顺应环境和辞职以避免造成损害之间作出抉择以前，离开是诚实的和“革命的”。我认为，在撤换杜克和其他的人以后，任何曾经坦率地对你讲过共产党问题的人都应该这样做……只有全国团结，我才能想象革命的胜利。然而，应该提醒你，伟大人物在他们开始不公正的时候就开始走下坡了。我组织西恩纳吉利亚远征队〔在山区里〕……只是为了保卫国家的权利。如果，到头来我被认为是有野心的或者有阴谋的，那将成为一个理由，即不仅说明我应该退出革命，而且还可以因此遗憾我没有象许多在斗争中牺牲的同志那样地死掉。我希望你谅解我的决定（经过长期考虑的决定）是无可挽回的。我还要请求你——我现在不是作为马托斯少校在讲话，只是作为你的一个山区同志，请你记住！作为一个曾抱着誓死的决心去执行你的命令的同志——我请求你尽快地同意我的要求，让我作为一个平民回家，不要使我的儿子们以后在大街上听说他们的父亲是个叛徒或者逃兵。祝愿你个人以及你在为祖国的革命事业中获得全面成功……我永远是你的同志，乌

维尔特·马托斯。^①

这种多少有点象是消极的挑战（同又一次来自佛罗里达的空袭巧合）激怒了卡斯特罗，他公开斥责马托斯。也许马托斯是希望迫使卡斯特罗对他的政治目的作出明确的声明。他显然相信卡斯特罗不知道劳尔·卡斯特罗所操纵的共产党阴谋，劳尔曾对财政部长说过，如有必要，准备杀害他的哥哥。^②总之，第二天，卡斯特罗命令该省武装部队占领卡马圭城。他也许害怕美国立即入侵。马托斯坐在自己家里，镇静地等待这场风暴。他写了另一个玄妙的文件，准备在他被逮捕后公诸全国：

我所冒的危险都无关紧要。我相信我能勇敢而沉着地面对一切意外事故……宁可死而不愿背弃那些能够促进真理、理性和正义事业的价值。你昨天说我同迪亚斯·兰斯、同天晓得是谁有勾结，想要在背后谋害革命，……好吧，菲德尔，我静待你的决定。你知道，我有勇气在监狱里度过二十年……我将不命令我的兵士……对任何人开一枪，即使对你可能派来的凶手也不开枪。我希望历史会给他们以应得的报偿，历史将宣判，正如你自己曾说过，历史也将宣判你，菲德尔一样……^③

① 全文见伊夫·吉尔贝：《古巴火药库，背信弃义的卡斯特罗》（巴黎，1961年），第127—128页。这封信10月底发表在《自由新闻报》上。

② 洛佩斯·弗雷斯克特书，第130页；洛佩斯·弗雷斯克特和马托斯曾在9月5日见面，马托斯在9月6日对安德烈斯·巴尔德斯皮诺又说了同样的话。9月29日他曾直接向卡斯特罗诉说共产主义的影响。（B·贝拉，《自由波希米亚》，1960年12月11日。）

③ 这一文件是秘密流传的，发表在吉尔贝书上，第128页。

马托斯的勇气是值得钦佩的，虽然他的消极作法很足以说明反对新路线的自由主义者的弱点。他们不能使自己背弃革命；因此，他们不能背弃卡斯特罗，因为卡斯特罗就是革命。

10月20日，卡斯特罗带着一群追随者来到卡马圭，亲自逮捕马托斯，作为一个“阻碍农业改革的叛徒”。那一天，许多人来到这个城市，好象来参加狂欢节似的。卡斯特罗一到机场，立刻就开始对着扩音器讲话，并向马托斯的总部前进。一大群人聚集在他后面。他们到达总部的大门口。马托斯和他的一些军官等在那儿，毫无疑问，很可以开枪打死他们。他没有这样做。他俯首就擒，未作斗争。他的一些军官也是如此，虽然其中有一个叫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的，后来灰心自杀了。

卡斯特罗和马托斯回到哈瓦那；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留下来接管马托斯的职务，并在广播中猛烈地指责他。第二天，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在卡马圭的执行机构全部辞职。省协调委员华金·阿格拉蒙特被捕。傍晚，表面上好象同卡马圭的事态没有关系，前空军司令迪亚斯·兰斯用一架两个发动机的B25轰炸机从佛罗里达飞到哈瓦那上空，丢下数以千计的由他署名的传单，宣称卡斯特罗是共产党人。一架古巴飞机奉令起飞，想把他打下来。有些炸弹被丢在地上。在一片混乱中，人们认为这些炸弹是从空中投下来的。这似乎不确实。一艘古巴军舰对飞机开炮。两人被打死，四十五人受伤，这一切没有疑问是古巴人自己的行动的结果。迪亚斯·兰斯的飞机是原来巴蒂斯塔在美国订购而始终没交给他的几架之中的一架；

后来由一个美国官员交给巴蒂斯塔手下的一个军官。美国后来承认那是一架军用飞机，虽然他们辩说炸弹可能是从这个飞机上投下来的。然而，这一点始终未能确定。古巴政府出版了一本题名《哈瓦那的珍珠港事件》的小册子，在标题页上印有一幅照片，意欲显示首都上空的一场空战；这实际上是一种复合照片，它描绘的是1947年在新泽西上空的美军C54型飞机。

卡斯特罗本人这时候在哈瓦那，正在旅行社经理会议上讲话。他立即到电视台去谴责美国至少是消极的同谋者。有一个醉汉，罗伯托·萨拉斯·埃尔南德斯，企图用一把小刀刺杀他，未能成功。卡斯特罗禁止一切到古巴来的夜间飞行，又一次停止人身保障法，并宣布一项建立工人志愿军的计划，这是后来著名的革命民兵的起源。那些旅行社经理仍然留在希尔顿旅馆，受到豪华的款待。然而，美国旅行社协会的会长说：“给旅游者提供豪华的旅馆、赌场、华丽的夜总会、各式各样的余兴，完全没用……除非〔他〕……觉得他是来到一个自己会受欢迎的地方”。^①实在难以相信当时就是这种情况，10月23日的《革命报》还出现了好象宣布世界大战那样的大字标题：“飞机来自美国”。

那一天，对残存在内阁里的自由主义人士说来，是苦痛的一天。国家银行行长费利佩·帕索斯，为了其他原因去见总统时说，如果马托斯是因为反对共产主义而被捕，他也应该这样；对于散发传单的空袭是不是过于小題

^① 《西班牙美洲报导》，第十二期，第545页。

大做呢？多尔蒂科斯回答说也许是这样，但是，他们必须想到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帕索斯说他只关心古巴，而不关心世界上其他的地方。他也不想辞职。多尔蒂科斯说他将内阁里提出这个问题。

多尔蒂科斯对内阁说，帕索斯企图拉他背叛卡斯特罗。所有的著名菲德尔分子于是要求对帕索斯采取严厉行动；劳尔·卡斯特罗赞成处以死刑。人们认为是帕索斯的朋友的两位经济学家博蒂和塞佩罗·博尼利亚，默不作声。最后，根据洛佩斯·弗雷斯克特的建议，决定把帕索斯找到内阁来。帕索斯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想到可以因病辞职，便去找医生给他注射了伤寒菌剂，以造成发烧的现象。内阁里也有人提议处马托斯以死刑。仍然留在内阁里的一些温和派头面人物——拉伊、洛佩斯·弗雷斯克特、福斯蒂诺·佩雷斯——反对这个主张。卡斯特罗对内阁坚持说，他是反共的，终于说服了听者相信是这样。至少他们不辞职了。卡斯特罗搂住拉伊的肩膀说，“请信任我”；^①不错，他们是信任他的。人人都要把卡斯特罗引为知己。他们相信他是一个公断人，因为他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这样，他对《革命报》的委员会说：“老切和劳尔在陆军里干的事〔即指偏袒共产党人〕迹近背叛”。^②这时卡斯特罗已经了解到各人的看法和友谊关系，因此他能利用他们的敏感。另一方面，内阁会议现在已经越来越不常开；实际上，从11月到1960年3月下旬似乎只开了两次。一切决定都是在别

① 拉伊提供的材料。

② 同上。

处作出的。

10月25日，卡斯特罗在总统府前面向由工会召集来的五十万人演讲：“他们有什么理由攻击古巴？我们犯了什么罪？古巴人民干了什么事，应该受到这种攻击？……我问人民，我们是不是没有建立了古巴历史上最忠诚正直的政府？……人民是不是同意处死战犯……废除挂名的闲差事？”……等等。这样反复的慷慨陈辞，是非常动人的。“温和派”发抖了。帕索斯仍然拿不定主意，想到哈利法克斯的说法“群众的愤怒嗡嗡声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声音之一”。可是关于他的命运的决定还未作出，又发生了一桩惊人事件。卡米洛·西恩富戈斯，这个在古巴除了卡斯特罗以外最受人喜爱的人，这个侠义的骑兵，陆军总司令，忠心人之中最忠心的，曾在卡马圭接替马托斯的人，在飞往哈瓦那的一次航行中在海面上空失踪了。全国停止工作，进行了一场无结果的搜寻，但是始终没有找到西恩富戈斯。人们立刻怀疑是暗杀。西恩富戈斯不是反共的吗？是不是劳尔·卡斯特罗个人出于一时嫉妒而杀害他呢？对这些推测，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卡斯特罗在他的弟弟把这个消息带到内阁会议来的时候，确实似乎十分慌乱，可是他毕竟是一个极好的演员，据陪同卡斯特罗乘飞机寻找西恩富戈斯的一位观察者后来回忆，事实上，卡斯特罗似乎并不因事态的发展而慌乱失常，根本也没有花费什么时间进行认真的搜索。西恩富戈斯曾坚决拥护逮捕马托斯，至少当众是这样。没有迹象可以使人认为他有过任何坚定的政治见解。^①实际上，相反地，西恩富戈斯似乎是那批山区老将领中的重要分子，这

些人没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和任何特别显著的社会根源，会无论经过什么思想变化和不测风云，作为一个大丈夫永远忠于卡斯特罗。

寻找西恩富戈斯的工作持续了几天。在第二天，传来不确实的消息说已经找到了。一时狂欢庆幸，宣布放假一天。可是，到了11月初，搜寻停止了。西恩富戈斯被假定为失踪了。他成为一位新的革命烈士。与此同时，据了解，马托斯不久将受审讯。又组成了革命法庭，并且明确表示，可以让帕索斯离开银行，到国外去负责一个大使馆。

美国政府一直有点不知所措地在观察这些发展。毫无疑问，他们要控制从佛罗里达到古巴的飞行，其困难是超过卡斯特罗所想到的；虽然比他们自己最初所说的确实容易得多，这一点到10月27日才弄清楚，他们规定凡是离开美国到任何其他国家去加剧内部纠纷者，作为犯罪行为，并且加派了一百名移民管理员到迈阿密。佛罗里达地方当局一般地同情那些流亡分子；不过迪亚斯·兰斯不久被逮捕了，迈阿密一位法官拒绝将他引渡。在哈瓦那，邦斯尔和大使馆仍然极端小心地行动，并就来

① 关于西恩富戈斯之死的猜测还在继续下去。认为是暗杀的那些人的主要理由是，西恩富戈斯的副官纳兰霍少校不久以后被杀害，他的凶手贝亚顿少校也在1960年被害。一个护士(后来被发现是疯子)1960年在迈阿密说她曾在—所哈瓦那医院里护理过西恩富戈斯。罗伯特·德卡德纳斯，在据说西恩富戈斯从那里起飞的基地任队长，他认为所谓飞行是一场阴谋，没有人看到西恩富戈斯在飞机里，并且其他的几个人不是自杀便是被压制住了[参阅《先锋报》(利马)，1960年8月16日]。没有疑问，这是历史将要说明的许多问题之一。虽然，从例如谁在1870年杀死普里姆将军这种糊涂公案来判断，这件事完全有可能只是一种新闻而已。

自佛罗里达的飞行同古巴外交部来往照会，邦斯尔会见了多尔蒂科斯，而不是卡斯特罗。10月27日，邦斯尔交给多尔蒂科斯一件照会，指责古巴蓄意“以敌视代替传统的友谊”。^①但这是一种空泛的指责。在华盛顿，没有人真正知道应该怎么办。在艾森豪威尔10月2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人提问，“什么东西在冲击卡斯特罗总理？”总统用完全真正不能肯定的语气答道：

我不想讨论这样一个人的可能的动机……我确实没有资格来研究这样难以理解的和困难的题目……你们知道，这个国家〔归根结底〕，根据我们的历史，应该是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似乎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古巴人和古巴政府，现在会这样的不痛快，而实际上他们的主要市场毕竟就正在这里……^②

到这时候，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怀疑是否要继续原定的食糖定额。可是在艾森豪威尔召开记者招待会以后的一星期，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卡贝尔将军在参议院作证时坚决地说中央情报局可以证明

卡斯特罗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古巴的共产主义者并不把他看作是一个共产党员或者甚至亲共分子……共产党是否愿意征收卡斯特罗入党，以及即使他们愿意，是否可能这样做，或者卡斯特罗如果入了党是否会接受共产党的纪律——

① 国务院备忘录，10月27日。

② 苏尔克和迈耶书，第39页。

这些都有疑问。^①

不过，这种令人安慰的消息并不是大家都知道的。11月13日，古巴在答复10月27日美国的照会时温和地说它愿意同美国和平相处，但要求美国不要把它本身和少数几个没有代表性的美国公民的财务利益混为一谈，并须停止反革命活动；古巴和美国之间的经济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土地改革的问题：“目前这场革命的历史现实”必须得到承认，作为报答，古巴也将承认它同美国的渊源这一历史现实。

这个照会似乎未曾得到答复。美国事实上已经作出决定，要不惜任何代价反对革命的古巴了吗？还没有。在古巴毕竟还有许多资产阶级价值的堡垒。说来也真稀奇，最突出的是劳工组织。

古巴工会的情况在1959年中没有什么变化；工会领导人一贯支持政府，可是，抵制了那些一般知道他们是共产党人的人。然而，工会却不象是要代表自由制度作出有力的挑战。许多领导人，因为过去和穆哈尔或者巴蒂斯塔合作过，声誉很低。有些差一点被作为巴蒂斯塔分子抓去审讯。另一些人则想通过新的热情表现，争取回到现在认为是体面的地位。古巴劳工的全部历史使得这种人会对任何进步政府对他们的要求作出明哲保身的、

^① 《共产主义的威胁》，第162—163页。查尔斯·卡贝尔将军（1903年生），美国战略空军的计划部长，1944年；地中海盟国部队的作战部长，1944—1945年；中央情报局副局长，1953年迄今。

利己的和非创造性的反应。如果他们在1952年曾把自己整个地交给了巴蒂斯塔,那么,在1959年,尽管他们表面上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他们却很容易地成为共产党的俘虏,也并不奇怪。

1959年11月18日,古巴工人联合会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三千名代表中只有大约二百六十名是正式共产党员。在第一次会议上,总书记萨尔瓦多在执行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的十三人中列进了三个共产党员。到处发生争斗。不得不请卡斯特罗来恢复秩序。没有疑问,这是精心安排出来的,虽然没有人能预料到工人联合会的反应会完全象卡斯特罗把它比作疯人院那样。共产党员们高呼“团结,团结”,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则骂对方“西瓜,西瓜!”,意思是说共产党人假装得象西瓜,外表是橄榄绿,象菲德尔部下的制服的颜色一样,而里面是红的。^①卡斯特罗解释,因为“团结的需要”才列进了共产党员。可是,后来工人联合会以压倒多数的票数反对那三个共产党员,虽然萨尔瓦多支持他们。卡斯特罗于是指示萨尔瓦多以“团结”的名义另拟一个名单。排除了知名的共产党员,也排除了出名的反共分子,例如雷诺尔·加西亚这个天主教青年组织的领导人,他自1月以来就担任古巴工人联合会的国际秘书。四十年代的老共产党人工会领袖拉萨罗·培尼亚,又出现在代表大会的走廊里,他和劳尔·卡斯特罗竭力污辱另一个秘书处成员奥克塔维奥·洛

^① 两年后(在1959和1961两年),劳动部长马丁内斯·桑切斯夸口说,“我们将继续是‘西瓜’,因为我们将继续是外绿里红”(《革命报》,1961年11月27日)。

伊特·卡夫拉雷，私下传阅一封旧信，在信里他请求巴蒂斯塔的警察释放他，理由是他在受刑后已经同他们适当地合作了。马诺洛·费尔南德斯这个演员工会的反共总书记，同样地受到毁谤；对方在耍弄更明显的手段，拿一张他同一群巴蒂斯塔的军官在一起的照片给人看。洛伊特（他留在执行委员会）担任的组织秘书职务就此为赫苏斯·索托所替代，索托的反共后来显出只是肤浅的；国际秘书冈萨雷斯由奥东·阿尔瓦雷斯·德拉坎帕替代，此人在思想意识方面被认为和冈萨雷斯相似。这两个人都似乎受了劳尔·卡斯特罗的迷惑。^①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机关报《革命报》，在这些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从一种小心的敌视共产党态度一变而为远更周到的赞同他们的活动，并赞成同他们搞“革命的团结”的原则。卡斯特罗本人似乎对他们也没有再作出带有敌意的评论。

然而，共产党人似乎暂时被排除在外。实际上，《纽约时报》发表代表大会的报道时用的标题是，“共产党人被古巴工会撵跑了”。结果，大会准备对共产党人的观点作一些让步，这反正是萨尔瓦多以民族主义的名义所提倡的一种态度。于是古巴工人联合会退出美国劳工同盟（美国劳联和产联都附属于它），并倡议创立一个新的“拉丁美洲工人革命同盟”。这一决议受到广泛欢迎，也是萨尔瓦多竭力主张的。虽然当时很少人体会到古巴工人联

^① 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当时有奥克塔维奥·洛伊特、孔拉多·贝克尔、何塞·佩隆（被认为全是反共分子）；还有索托、何塞·玛丽亚·德阿吉莱拉和阿尔瓦雷斯·德拉坎帕，被认为在思想上是中立的。阿吉莱拉是机会主义者，一向把自己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出现（安德烈斯·巴尔德斯比诺的文章，〈自由波希米亚〉月刊，1960年12月4日）。

合会此时已有被共产党重新掌握的可能，尽管该党从大多数讨论中撤回它的代表，以及新的执行委员会（包括“象奥克塔维奥·洛伊特·卡夫雷拉这些臭名远扬的穆哈尔分子”）受到拉萨罗·培尼亚的斥责。事实上，执行委员会排除了工人联合会里反共分子中比较激烈的人物，并引进了若干容易驾驭的官僚主义分子。

代表大会在11月25日结束时又有几个自由主义的部长被清除出内阁，真正的争点仍然是那个未得解决的乌维尔特·马托斯问题，尽管有关的部长福斯蒂诺·佩雷斯否认这一点。佩雷斯和曼努埃尔·拉伊两人在内阁会议上同卡斯特罗激烈地争辩，拉伊说他怀疑引起马托斯被捕的罪名的真实性。^①接着，曼努埃尔·拉伊在公共工程部的职位让给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的兄弟奥斯马尼（此人曾负责军事教育工作，肯定很接近共产党）。拉伊先到大学去教授建筑学，后来成为公开的反对派。福斯蒂诺·佩雷斯，原是卡斯特罗的最老的部下之一，所担任的敌产处理部部长一职也由前海军上校迪亚斯·阿斯塔拉因接替，此人曾因阴谋背叛被巴蒂斯塔革职，后来卡斯特罗委派他当轻巡洋舰舰长。他同劳尔·卡斯特的妻子比尔马·埃斯平的一个妹妹结婚，虽然人们不能猜测亲戚关系就是他升官的原因。这时候，卡斯特的长兄拉蒙——此时在管理家庭的产业——正在同现政权公开争论。他在11月25日写信给《自由新闻报》，谴责政府并

^① 洛佩斯·弗雷斯克特书，第150—151页，有一段叙述。根据拉伊的说法（《自由波希米亚》，1960年11月26日），劳尔·卡斯特罗当时说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已经完成了它对巴蒂斯塔斗争的任务，今后不需要它了。

为《自由新闻报》本身辩护，该报曾因“反革命观点”受到指责。

政府这回的第三次改组也确定了帕索斯离开国家银行，改任驻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大使这一有名无实的职位，其原任银行职务由格瓦拉接替，格瓦拉从国外归来后，就主持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的工业发展部。这一变动引起了金融恐慌和银行挤兑。然而，格瓦拉宣布他将继续执行帕索斯的政策，卡斯特罗讨好地对洛佩斯·弗雷斯克特保证说，格瓦拉会比帕索斯更保守。可是帕索斯辞职的后果对政府的影响，其严重性是超过卡斯特罗所能想象的。帕索斯一些最好的助手，例如何塞·安东尼奥·格拉和埃内斯托·贝当古（1959年以前是华盛顿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人）也离开了。（副行长胡斯托·卡里略，帕索斯的同时代人，早已去职。）这些负责人员中有几个留在那里对格瓦拉和他的助手们办理移交，可是他们的辞职——不是全部离开古巴——意味着革命中的自由主义派的隐没，他们是受到华盛顿尊重的真正的改革家。由于这些以及其他的原因，所以此时邦斯尔下结论说，“我们不能指望同卡斯特罗达成任何一种谅解了。”^①

失去那么许多专家顾问，立刻使政府感到十分焦虑。对卡斯特罗和他的朋友来说，这毕竟不是一个成功地管理现有的社会的问题，而是改变社会的问题。于是从拉丁美洲其他国家请来一些社会主义的或者进步的顾问，其中有许多智利人士，例如雅克·琼乔尔（基督教民主

① 写给施莱辛格的信，见前引。

党经济学家),被派到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担任联合国顾问;阿尔万·拉塔斯特(社会经济学家)则在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的工业部工作。可是这还不够,由于缺乏熟练的管理人员和计划人员,显然就是转向东方寻求援助的另一个原因。

为了这个目的而进行的接触一定是发生在11月中旬或下旬,因为苏联的副主席米高扬那时在墨西哥,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埃克托尔·罗德里格斯·隆帕特显然曾去拜访过。^①

在外表上,1959年11月下旬,古巴仍然有几个温和派的部长。例如,在1959年1月任命的那些部长中,博蒂仍然在经济部,阿特在教育部,洛佩斯·弗雷斯克特在财政部,奥尔图斯基在交通部,卡马乔在运输部,路易斯·布赫仍然是内阁的秘书,还有塞佩罗·博尼利亚在商业部。司法部由阿尔弗雷多·亚武尔担任,他不是革命派;再有其他几个部长,例如拉克尔·佩雷斯·德米雷特(社会福利部)或者塞拉芬·鲁伊斯·德萨拉特(卫生部),即使最多疑的人也不会认为他们是危险分子。但是,部长们是无足轻重的。例如,他们之中有几位,象阿特或者亚武尔,多尔蒂科斯或者劳尔·罗亚,尽管出身于中产阶级,一定会跟着卡斯特罗一直度过六十年代。除了卡斯特罗弟兄两人,还有其他一些显然比较革命的部长,例如格

^① 詹姆斯书,第249页。因为米高扬是在2月间到哈瓦那来签订一项商务条约的,显然同苏联的谈判一定在大约两个月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是最有参考价值的事:当时,《革命报》确实在11月3日和17日先后两次直截了当地建议邀请米高扬访问哈瓦那。

瓦拉、纳兰霍(新任内政部长)、马丁内斯·桑切斯、米雷特和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① 政治警察, 被人厌恨的G2, 现今在资产阶级圈子里象巴蒂斯塔的特别情报人员那样使人害怕, 它的头头是拉米罗·巴尔德斯, 过去蒙卡达和“格拉玛号”时期的人, 是格瓦拉的亲密朋友, 曾同他一起在拉斯维利亚斯。普通警察仍然由阿梅赫拉斯领导, 他是卡斯特罗的热诚崇拜者。在政府里那些有名无实的领导成员中, 只有洛佩斯·弗雷斯克特现在对于政府所采取的方向感到严重不安, 但他仍然象卡斯特罗一样是卡斯特罗主义者。其他的人都能非常心安理得地适应革命和它的后果, 例如在11月底甚至同意应该最终地和无限期地停止人身保障法; 全国范围内有许多人由于谋叛嫌疑被捕。

同时, 制订了一批针对外国企业的新法律。外国石油特许权所有人因此现在必须在他们的地产上钻探, 不能拥有准备在遥远的将来使用的地产。他们的盈利的60%应归于政府(就是说, 比在中东略多一些)。更多的牲畜被没收。金氏大牧场的大片产业被胜利地改成一个合作社。饲料除了通过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无法取得, 因此牲畜不得不卖掉。1959年11月的另一项法案授权国家可以接管一些有困难的或者为了要减少亏损而减少生产的企业公司; 这使政府能够实行许多的国有化, 特别是旅馆的国有化。属于贝思莱亨姆制钢公司和国际收割机公司的土地也被没收。这些没收大多数都在农业改革的

^① 所有这些人, 除了马丁内斯·桑切斯(他在1965年企图自杀以后辞职), 都是六十年代后期新的古巴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

规定范围以外，虽然第一批土地所有权凭证是由卡斯特罗于12月9日交给应得的小农。12月初，努涅斯·希门尼斯在欧洲试图谈判一项一亿美元的借款；他未能成功，也许是由于美国的压力。或许，假如他成功的话，古巴变化的步伐可能会慢下来。他在欧洲所访问的人物中有弗朗哥将军；在听说古巴革命遇到困难是因为美国要求对产业被征用的地主给予赔偿时，弗朗哥将军厉声对他说了几遍：“一分钱也不要给他们，分文不给”。^①12月10日，国务卿赫脱作了含糊其词的威胁，说美国“可能对古巴糖的限额采取行动，如果古巴不平静下来的话”。^②12月中旬，一位苏联官员，亚历山大·阿列克萨耶夫，作为塔斯社的代表来到哈瓦那。^③在五个月的完全反对反共以后，政府现在正转入一个新的阶段，为完全改变它的国内和国际阵线作好准备。

① 希门尼斯回到古巴后在《革命报》办公室里曾作这样的报道。

② 《华尔街日报》，1959年12月11日。

③ 《革命报》，1959年12月15日。阿列克萨耶夫（1913年生），1954—1958年任苏联驻阿根廷大使馆一等秘书，1960年任苏联外交部“拉丁美洲”司司长。1962年任苏联驻古巴大使。

第二十六章

剑拔弩张

乌维尔特·马托斯和他的军官同事为了“含糊的、反爱国主义和反革命的行为”受审，以及他们的辞职，据说曾在他们所指挥的部队中引起惊慌和骚动。审讯于12月11日开始。这个审讯后来对于人们评价革命政府是否公正有极大关系。

马托斯的审讯由一个特别法庭负责进行，庭长塞尔希奥·德尔巴列少校当时是古巴空军的总司令；德尔巴列原来是马埃斯特腊山区的一个医生，在西征中是西恩富戈斯手下的副指挥，后来成为陆军参谋长和内政部长，^① 又是新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创始成员。法庭的其他审判员是德米特里奥·埃斯卡洛纳（比那尔德里奥的武装部队司令）、吉列尔莫·加西亚（以在马埃特腊山参加卡斯特罗革命的“第一个农民”而著名）以及胡安·玛丽亚·普埃尔塔斯。检察官豪尔赫·塞尔格拉，曾参加过克里斯塔尔山上劳尔·卡斯特罗的部队，后来在奥连特的战犯法庭工作，现任陆军军法官，早先是学法律的。后来他先后担任马坦萨斯省的武装部队司令、古巴驻阿尔及利亚大使、以及最后在六十年代末期，担任无

^① 1970年他仍任此职。

线电和电视管理局局长。因此，可以想象，法律程序在这次审讯中是不起决定性作用的。劳尔·卡斯特罗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两人都在审讯时发表讲话，都说了许多关于马托斯在马埃斯特腊山活动的一些与本题无关的细节，总理本人和马托斯及其辩护律师洛里亚·贝尔托特博士发生了一系列不体面的冲突。不幸的是贝尔托特不仅在普里奥手下任过马德里的古巴大使馆随员，还写过一封信给巴蒂斯塔的秘书，询问是不是他可能在1952年保持他的职位——这是在审讯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项事实——（贝尔托特还曾在墨西哥报纸上写过一篇颂扬巴蒂斯塔令人作呕的文章）。这一切情况都不利于马托斯，使他不可能受到公平审讯。除了提出一些关于他在1959年初的谈话的报道，说他曾批评共产党人在革命中的影响，并没有提出任何对他不利的证据。劳尔·卡斯特罗的主要论点是，马托斯曾从前总统乌鲁蒂亚那里拿到十二万美元；可是马托斯在答复中声明，这笔钱是用于正常开支的，于是，这个假定的贪污罪名并未追究下去。马托斯大概确实在仲夏以后曾竭力放慢卡马圭省农业改革的进程（象塞萨尔·塞莱马指出的那样，塞莱马是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在该省的代表，接替被逮捕的华金·阿格拉蒙特）；没有疑问，他确实是一个反共分子，同革命政府领导方面其他一些意见相同的人有所接触。或许马托斯还曾企图在卡马圭任用一些非共产党人的官员，但这不是一种罪行。马托斯和另一个跟他一起受审的军官纳波莱昂·贝克尔恰巧都是共济会会员和曼萨尼略支部的成员。马托斯在审讯结束时，为自己作辩护发言，不得不从

早晨六点钟开始，一直说到八点钟；发言的原文并没有在革命报纸上发表。^①

结果马托斯被判处徒刑二十年，同他一起辞职的二十一名军官分别被判处七年、三年和二年不等（检察官曾要求死刑，谣传如果不是因为福斯蒂诺·佩雷斯提出抗辩，马托斯本来会被枪决。无论如何，人们可以肯定地说，由于总理和国防部长到庭作证，法庭不无受到影响）。^②

另有几个比较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例如拉斐尔·德尔皮诺，也大约同时受审。德尔皮诺尽管他以前和卡斯特罗一起在波哥大时有交情，也被判了三十年监禁，因为他企图帮助巴蒂斯塔分子非法出境。有一批北美人为了各式各样的罪名也被判刑或者无限期地关在监狱里，有些是真正颠覆性的，有些不是。有两个人因为在比那尔德里奥武装叛变被处死，许多人被监禁。十五名海员在圣地亚哥被捕，因为同一项企图杀害卡斯特罗的阴谋有关系。哈瓦那处于猜疑和山雨欲来的气氛中。旅游业务减少到1958年时的五分之一，五家大轮船公司取消客轮在哈瓦那湾停靠。12月17日，卡斯特罗预言明年他的追随者将不得不拿起武器保卫革命，因为一个巨大的反对革命的运动已在发动了；酒吧间的工作人员、私人住宅的

^① 参阅《革命报》，1959年12月14、15、16和17日。审讯的最初两天报道得很好，以后两天就不行了。卡斯特罗的发言曾印成小册子重行发表。

^② 马托斯仍在狱中（1970年），可是他的狱友中有几个于1960年从拉卡瓦尼亚监狱中逃走（曾轰动一时）。1967年，玻利维亚总统巴里恩托斯将军同意以法国革命者雷吉斯·德布雷交换马托斯——卡斯特罗未曾利用这一建议。

仆役，应向警察告发一切反对革命的言论；一切普通人都应成为革命的战士。这是走向建立民兵的一个步骤。

因此，1959年12月这个月标志着古巴革命的发展中一个危急的阶段，这时候政府明白地表示它的敌人不会得到公平的审讯。马托斯的审讯，在当时说来，当然根本动摇了七月二十六日运动。

然而，最后，猜疑的气氛并没有蔓延到大城市上层阶级集中的郊区以外，虽然拉蒙·奥法里尔和爱德华多·阿吉雷这两位神甫来到迈阿密引起了一些注意，他们说他们是因为古巴在走向共产主义而离开的。这两位神甫的上级，迪亚斯大主教，只是说他们未得他的同意，擅自离开。同时，每一个到古巴的人都证明卡斯特罗在大多数人民中的声望似乎毫未减低，由于北美的民主制度本身已经退化为一种声望比赛，这就使批评卡斯特罗的人没有什么可以争论了。对古巴的广大群众来说，卡斯特罗仍然不仅代表希望，而且也代表成就。土地合作社是令人兴奋的新事物。有些土地正在分配。房租、电话和电力收费标准的降低提高了购买力，但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却完全没有赶上工资。不利于美国货进口的关税以及旅行津贴的削减，打击的是富人，而不是穷人。农村失业方面没有多大的变化，可是人人都能享受的免费医疗和义务教育显然已是指日可待了，从而减少那些最负担不起的人的基本支出。司法效率很差，争争吵吵地在进行工作，可是不贪污——这至少是古巴历史上的第一次。对反革命分子或者反革命嫌疑犯的不公平待遇，在大多数人看来似乎或者是有道理的（在非常时期）或者是对以

往若干年代的有意或无意的过失的一种公平的报复。在劳尔·卡斯特罗 12 月初发表纪念马塞奥诞辰的演说以后，政府已经开始特别强调对黑人的公平待遇。这方面的强调后来发展到超过事实需要的程度，同时小心地注视着美国南方。可是作为一种号召团结的呼声，绝不会不受群众的拥护，甚至在马托斯事件以后，卡斯特罗仍然掌握住除了上层阶级的几乎全国人民。

1959 年 12 月中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废除了圣诞老人。三十年代中，圣诞老人是同圣诞树一起从美国输入的，大概是因为马查多时期有很多资产阶级的成员流亡在美国的缘故。这一项新教徒的雅兴被作为“帝国主义者的”而废除了。为了代替它，出现了一个有点人工化的“幸福老人”的形象，头戴草帽，长着胡子。然而，这个典型的古巴小农民人物并未能引起人们多少喜爱或尊敬。圣诞树也禁止进口。可是革命政府十分重视庆祝的需要，并重视表示感恩，当然首先是感谢卡斯特罗。减低传统的圣诞猪的售价。大量征集为补助穷人的钱，这同以前一样，唯一感到厌烦的人是上层阶级，他们在最近二十五年中越来越想模仿美国的标准。教会也不顶高兴，可是许多个别的天主教徒仍然支持政府。将近 1959 年底时，伊格纳西奥·比亚因神甫在他主编的《半月》杂志里仍然赞美革命，并且仍然随时批评那些反对革命的人——甚至批评象财政部长洛佩斯·弗雷斯克特这样的人物，因为他在私下里对革命表示怀疑。可是，11 月底，在哈瓦那召开的大规模的天主教教徒大会，实际上却成为一种反对共产主义的大会。人们听到了圣诗《仁爱》的合唱，用的调

子和革命者怒吼“枪毙”的呼声相同。

古巴和美国之间，以及古巴的国内政治和美国外交之间，每星期都发生新的动摇和新的不稳定。因此，12月29日，多尔蒂科斯总统号召同美国缔结新的商务协定，以便改善关系。这根橄榄枝使得邦斯尔大使于1960年1月6日回华盛顿去商量。他会回来吗？在他回国期内，这里制定了各种反美的措施。由于日益增长的外汇危机，不准美国人开设的糖厂向古巴银行借款，而奉令应该到华尔街去借。挣美元的古巴公民今后必须把美元兑成比索。外交部长罗亚最近曾说欢迎外国投资。可是这些措施是不是暗示罗亚的话可能要打折扣呢？卡斯特罗明明在1月4日公开宣称他希望同美国的关系在1960年中有所改善，同时古巴旅游事业管理局还在努力招揽美国游客；可是由于邀请乔·路易斯新年来作客，他们显然现在开始想到北美的黑人或穷人，而不是那老的一批生意人。1月8日，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又接管了另一批美国人的地产七万公顷以上，大概总共值六百万美元。邦斯尔1月10日回到哈瓦那，提出抗议，得到的答复仍然是那一套老话，即土地所有人将得到期限二十年、利息4.5%的债券作为代价。可是至今还没有人看到过这种逗弄人的证券。到底有没有这种证券呢？倒是确实给过一些赔偿的：例如12月19日，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曾接管六所美国剑麻种植园，付了50%的现金——一百三十万美元，答应其余部分用债券偿付。美国政府在1月11日正式答复古巴关于农业改革及其有关问题的最近一次（11月13日）照会时，仍然只是重复了它原来的立场：立即偿付现金。第二天，

赫尔希制糖厂的发言人说，有一架来历不明的飞机在哈瓦那东北面的七处甘蔗田投下了燃烧弹。这两件事，没有疑问，在动机方面彼此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在古巴，在对它们的解释中只能把两者联系起来。

1月中，政府又进行了两次运动。第一次是针对着工会里被认为是穆哈尔分子的人。在12月的代表大会以后，成立了一个清洗委员会，委员有萨尔瓦多（关于他的路线现在越来越有疑问）；索托这个态度不明的纺织工人的领袖，他似乎已经心甘情愿接受他的部长马丁内斯·桑切斯的命令，以便取得对工会的控制；阿吉莱拉这个同样态度不明的银行职工的头头，自从他1957年替代萨尔瓦多掌管七月二十六日劳工阵线以来一直是萨尔瓦多个人的政敌；以及双截肢的阿尔瓦雷斯·德拉坎帕。这些人毫不费力就否定了几个出色的工会领袖，例如建筑工人的领袖（拉斐尔·埃斯特拉达）、烟业工人的领袖（路易斯·莫雷诺）、和五金工人的领袖（马丁内斯·莱瓦）。他们的方法简单得近于粗暴；例如，路易斯·莫雷诺被叫到一个只有共产党员出席的会议上，被斥责为穆哈尔分子，宣布开除，选出一个新委员来代替他，他的继任者，福斯蒂诺·卡尔西内斯，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有些时候，民主主义人士在共产党员出席之后半小时才到会，发现一切决定已经作出。这种手法为东欧一些共产党所采用而同样获得成效，也是古巴共产党人对于在古巴建立极权主义政府的主要贡献。布拉斯·罗加在1965年指出，古巴革命的重大意义是共产党人并不处于中心地位而达到“社会主义”；这可能是说得对。但

是，他们在摧毁旧工会这方面的作用却是很有帮助的。

可是，并没有这样对待最有名的一个工会领袖。这就是糖业工人的总书记孔拉多·贝克尔。他或者是受到压力或者是因为看到大势所趋，便一脚跨进了共产主义集团。他是一个官僚，愿意在卡斯特罗手下工作，象在普里奥手下一样，虽然人们还会记得，他在1957年曾对巴蒂斯塔的破坏罢工进行过一场绝食斗争。其他的工会逐个地解决。这样，戏剧工作者工会把马诺洛·费尔南德斯作为反革命分子开除出去（他到一个外国大使馆去避难），代之以著名的共产党人女演员比奥莱塔·卡萨尔斯，她在山区里也当过起义军电台的新闻报告员。冶金工人联合会的领袖阿曼多·埃尔南德斯，也同样地被撤换了。全国各地都采用同样的处理方法。对共产党表示不满的一个人是（据她自己说）卡斯特罗的妹妹胡安娜，她最近还是一个坚决支持革命的人。据说卡斯特罗回答说，“瞧，胡安涅塔，^①我们必须利用这些人；我们必须是政治家。一个人必须有一只左手。”^②古巴工人联合会总书记戴维·萨尔瓦多，也向卡斯特罗表示不满，卡斯特罗回答说，假如不是因为同美国发生冲突，他最迟到2月份就会搞掉共产党人。这种话是故意泄漏给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和新闻界听的。萨尔瓦多本人似乎相信，“使美国承认古巴革命的唯一方法”是“国际讹诈”；他接受卡斯特罗的论点，认为存在着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危险，对古巴说来，是

① 胡安娜的爱称。——译者

② 见她那轰动一时的文章，1964年发表在《生活》周刊和《星期日电讯》（伦敦）。

必要的，借此可以“有一种杠杆”来对付美国。他也似乎仍然被卡斯特罗那种特别强烈的个性所唬住了，这同很多后来加入反对派的人一样。^①这时，新的劳工领袖们呼吁冻结物价和取消罢工的权利——这些呼吁，内阁认为应该立刻以相应的立法给予答复。

现在的困难是，对于卡斯特罗来说，任何反对这种做法的人，实际上都成了反革命分子。再则，唯一的抗拒手段是靠武器的力量。一小股一小股的人碰头，设法同已经在美国的朋友取得联系，或许企图非法逃往美国，最后被捉住：如果他们有过的用武器反对政府的某种行动，就可能被枪毙或者肯定要被监禁很多年。甚至那些在阴谋策划阶段就被破获的人也要遭到监禁——期限不定，象大多数政治犯那样，因为判处的刑期既不能保证期满释放，也不能保证被拘留到期满。这些原始叛变从来不是严重的威胁。可是在卡斯特罗看来，似乎无疑是严重的。他继续过着无秩序的生活，拒绝一切要使政府或者他的行动正规化或者制度化的建议，很少连续在同一所房子里睡觉，而是有时候在科希马，或者在贝达多地区塞莉亚·桑切斯的公寓或者在哈瓦那一希尔顿旅馆。可是，即使这样，他仍然不断地露面。

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非革命报纸的批评。在1959年一年中，《海洋日报》、《自由新闻报》、《前进报》和其他一些报纸都攻击革命或者为反对派提供篇幅。政府可以置之不理，因为这种反对意见是来自一些在1月1日以前

^① 罗德里格斯·克萨达：《戴维·萨尔瓦多》，第18页。这一定是后来和萨尔瓦多本人讨论后写的。

一直对革命冷淡的机关报，所以不予理睬。政府还可以依靠它自己的报纸《革命报》和共产党的报纸《今日报》。好多月来，没有什么争论足以动摇这些报纸或者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可是在卡马圭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报纸《前进报》支持了马托斯以后，却出现了一次危机。到了1960年1月，古巴的一些老牌报纸都一窝风地指责革命，带头的是《海洋日报》。同时古巴新闻工作者协会和印刷工人工会都准备讨好它们。^①1月11日，卡斯特罗命令，新闻电报应附有由印刷工人工会提出的“澄清”的声明；《自由新闻报》给这种声明起了一个浑名“小尾巴”。有关的一些报纸抨击“小尾巴”，但没法阻止。1月18日，《前进报》编辑豪尔赫·萨亚斯发下一篇社论，印刷工人拒绝排印。而且，“自由新闻委员会”要求政府接收《前进报》。从印刷工人工会来的一伙人闯进报社，由新共产党总书记达戈维托·庞塞率领，他是一个新上任的老共产党员。萨亚斯一定已经预料到这场冲突（他已经把家属送往美国），迅捷地跑到厄瓜多尔大使馆去避难。几天后，他乘飞机到了迈阿密，后来在那里创办一种流亡报纸《克里奥人战斗报》，在几个月里掀起了流亡分子对卡斯特罗政府的不发生作用的愤怒，里维罗家族的《海洋日报》和《自由新闻报》——仍然由那位三十年代的老革命者卡尔沃经营——以及其他一些较小的报纸，继续攻击政府，并发表对

^① 这些人是巴尔多梅罗·阿尔瓦雷斯·里奥斯、豪尔赫·比利亚尔和蒂尔索·马丁内斯，他们分别成为新闻工作者协会的会长、副会长和秘书；还有印刷工人工会的佩德罗·索雷特、达戈维托·庞塞和赫苏斯·普利多。

政府不利的消息。可是，由于政府控制了印刷工人和新闻工作者协会，这些自由报纸显然没有多少日子好混了；同时，政府正在着手处理剩下的一些无线电台和电视台。所以，全国第二位最重要的电视波道（波道十二号）的总经理何塞·佩雷斯，老是受到他的职员中“革命者”的阻碍，终于把他的办公室让给政府委派的一位“调解者”。

《前进报》垮台以后两天，卡斯特罗又一次在他所喜爱的电视屏上出现。他的话是人们熟悉的：

国际阴谋……蛮横的威胁……战犯……国际寡头政治……包围的状态……一切反革命分子曾经有过的唯一希望：借助外国势力，破坏本国革命……我们是一个独力作战的小国——一个被剥夺了储备力量的小国……有被取消食糖定额的危险，有被压扣一部分糖价的危险，因为他们已经开始用津贴的名义来补偿世界市场价格和美国价格的差额……当然，这是为了美国制糖事业的利益，他们不能按世界市场价格进行生产。

卡斯特罗接着猛烈攻击美国大使邦斯尔和西班牙大使胡安·巴勃罗·德洛亨迪奥（德贝利斯卡侯爵）两人，因为他们帮助古巴的反革命分子，特别是德洛亨迪奥，帮助了西班牙教士。后来透露，实际上，所有的宗教上层分子（除了基督教会友）曾在西班牙大使馆开会协商反对政府的行动。然而，德洛亨迪奥立刻驱车至电视台，象一个问心无愧的人那样闯进播音室，要求使用扩音器。使当时仍在那里的卡斯特罗大吃一惊。于是古巴的电视观众这一

次看到真正的争吵了。播音室的群众高呼“出去！”，镜头逐渐暗淡，可是无线电听众清清楚楚地听到大使的咒骂，“你们毁谤我。”卡斯特罗当时限他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哈瓦那，他照办了。^①第二天，群众在西班牙大使馆外面游行，《革命报》宣称：“那些信任邦斯尔的人多么卑鄙。真是不堪想象的大同盟——邦斯尔、洛亨迪奥、战犯、大地主、盗贼。”然而，邦斯尔已经回美国了。认为他不应该再回来的说法更加得势。从11月间埃内斯托·迪戈奉召回国进行无限期的商量以来，华盛顿就没有古巴大使了。

在此后的一些日子里，似乎至少美国和古巴的外交关系会断绝了。参议员斯太尔斯·布里奇斯，共和党的政策委员会主席，要求审查食糖定额。参议员约·姆·巴特勒说美国应重新研究古巴政策，“特别注意〔西奥多〕罗斯福的……‘大棒’。”同时，为了在哈瓦那有充分的相应措施，另一个反对派报纸《世界报》的业主阿马德奥·巴尔莱塔，被指责为巴蒂斯塔分子；或许这里面有一些真实性，因为巴尔莱塔出身是意大利人，过去的国际经历颇有疑问。他在古巴拥有四十三项企业，包括到最近为止的十二号波道在内。虽然他未曾攻击过巴蒂斯塔，但他迄今也对卡斯特罗批评不多，而且，如果他真是一个巴蒂斯塔分子，为什么政府等了整整一年后才告发他呢？总之，《世界报》当即由政府于1月22日接收了，不久又开始出版，以路易斯·戈麦斯·汪古埃梅尔特为主编，他是出身于库腊索岛的新闻记者，为巴尔莱塔工作了若干年，以前

^① 他在西班牙并未丢脸，因为他接着就被任命为驻瑞士大使，洛亨迪奥（1906生）自1952年起在哈瓦那担任大使职务。

没有显出十分急进的见解。

对于那些希望美国同古巴和解的人说来，还有一线希望。1月26日，艾森豪威尔就古巴问题作了一次有着相当善意的发言。他说，去年年底时，美国政府确实在“研究更改那个……〔要求〕美国每年按优待价格购买古巴糖产量一半的规定”。^①当时还有人秘密向他提意见，建议他开始其他的计划。尼克松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仍然想“在古巴国内建立一种反卡斯特罗的力量。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封锁那个岛国，理由是如果经济衰落……古巴人自己会起来推翻卡斯特罗”。可是，政府在最后决定走进这些冒险的坑道以前，他们作了再一次的努力，争取达成妥协。在艾森豪威尔发表善意谈话那天，美国驻古巴公使（邦斯尔大使仍未返任）访问阿根廷大使胡利奥·阿莫埃多，请他设法使美国和卡斯特罗之间进行谈判。所提出的一种协议的基础是：停止电视和报纸上的辱骂；邦斯尔回任后卡斯特罗应即接见，真诚地寻求解决分歧的途径；作为回报，美国将提供资金，支援卡斯特罗的农业改革以及解决其他经济的和社会的问题。^②

阿莫埃多大使于午夜在塞莉亚·桑切斯的寓所会见了卡斯特罗。起初卡斯特罗的态度是消极的，并谈到次

^① 艾森豪威尔书，第524—525页。卡斯特罗在糖业工人全国会议的发言中也曾暗示，如果美国减少购糖定额，古巴将实行糖业国有化（《革命报》，1959年12月16日）。

^② 关于此事和以下各点，可参阅阿莫埃多来函，《纽约时报》1964年4月13日；德雷帕的文章，《新领袖》杂志，1964年4月27日；阿莫埃多的文章，同上杂志，第8—12页。所谓“提供资金”意义不明确；大概是用来赔偿被没收土地的人。

日《革命报》上的一篇社论“绝对地和毫不留情地”拒绝艾森豪威尔1月26日的善意的谈话。这时恰巧正是古巴革命的关键时刻。一个苏联展览会已在哈瓦那开幕^①（这个展览会已在纽约和墨西哥开过了）。米高扬预定2月初访问古巴，尽管这件事一般还不为人所知，美国政府却已知道了。^②米高扬在前往古巴途中确实和杜勒斯一起进过餐，并对杜勒斯和罗伯特·墨菲说他希望成立一个贸易代表团。国务院的“克里姆林宫专家”们认为代表团将是一种外衣，掩护“在整个半球范围内秘密的和颠覆性的活动”。^③从长期来说，也许似乎宁可用特殊手段使古巴不至于同苏联结盟，冒着被指责为绥靖政策的风险，而不可在这大选的年头承担把岛国推进共产主义阵营的责任。没有疑问，艾森豪威尔也不敢对古巴采取强硬行动；且莫说他可能已经感觉到的道义上的缺点，万一这种行动出了毛病，那就不会增加共和党在11月选举中的机会，因为，象在1956年为了苏伊士运河危机那样，民主党选举人的成见又一次在外交的纯洁性上投下了阴影。

总之，卡斯特罗的态度软化了；他允许阿莫埃多说下去，并取消那篇恶狠狠的社论，命令《革命报》停止对美国的抨击（从而证明了他自己完全控制着报纸）。第二天，多尔蒂科斯总统宣称，古巴同美国的分歧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古巴和美国的传统友谊是破坏不了的，古巴人

① 这个展览会曾在12月5日宣布过。

② 赫脱说米高扬的访问是“在很久以前”就安排了的（《纽约时报》，2月1日）。

③ 罗伯特·墨菲：《军人中的外交家》（伦敦，1964年），第557—558页。（墨菲说日期是1958年，但这一定是错误的。）

民愿意同美国加强外交和经济关系。报纸停止攻击了。仍然在哈瓦那当副主教的埃维略·迪亚斯，选择1月28日马蒂诞辰那天重申支持革命——结果成为一位主教对现政权的最后一次表态。米高扬的访问还是在1月31日宣布了。

也许这是古巴和美国之间走向公开作战而可能避免的时机。艾森豪威尔并没有采取任何计划来支持反革命分子。而是作了一次短途旅行，“去亲自看看南美”。可是佛罗里达的流亡分子仍在进行燃烧弹袭击。多尔蒂科斯发表讲话的次日，燃烧弹落在普埃尔托帕德雷和北方的甘蔗田里。还有其他的空袭，有一次来了一架在摩洛哥登记的美制飞机，飞行员是一个由梅斯费雷尔雇用的人。后来米高扬到达哈瓦那了。

俄国对古巴和对拉丁美洲的态度还不清楚。甚至他们究竟有一种政策吗？他们大约在最近三十五年来对拉丁美洲各国的共产党虽然给过一些支援——却往往是很勉强的。苏联报刊不时地发出夸张的说法：“拉丁美洲是一座沸腾的火山。这个国家如此，那个国家也是如此，火山正在爆发，正在扫荡反动政权，打开了美国垄断资本套在它们经济上的绞索。”^①这样大叫大嚷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正在全神贯注于世界霸权和生存问题的苏联政府，还会关心新世界里一些共产党的夺取政权问题。很清楚，这种成就就会使美国为难，并可能妨碍美国和苏联之间任何暂时的协议——这些协议似乎是当时的一项重要外交目

① 《共产党人》月刊，1958年10月。

标。斯大林在1936—1939年曾对西班牙问题有过类似的想法：在西班牙有一个成功的新的共产主义国家将使苏联更难于同英法两国取得和解，而这在当时正是他的外交的主要倾向。总之，在1959—1960年冬季，一个共产主义的古巴并不是苏联所特别希望的目标。

那时候，俄国在拉丁美洲只有三个外交代表团——阿根廷、墨西哥和乌拉圭——虽然它在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和哥伦比亚也有领事或者商务代表。中国，北朝鲜和北越都没有代表。有些东欧国家派有商务代理人。塔斯社在三个设有苏联大使馆的国家里派驻了记者，捷克则在阿根廷设有代表。最近，在1959年12月，苏联和巴西签订一项贸易协定，购买价值两亿美元的咖啡——大概是他们在新世界里最大的一项义务。

米高扬曾到过墨西哥——这是一个俄国重要政治人物对拉丁美洲的第一次访问——可是他在古巴发现了一种不同的局面。他在机场上受到了卡斯特罗和古巴共产党领导人的欢迎，为苏联科学展览会举行开幕仪式并在马蒂的像前献了花圈——这是一种聪明的姿态，有点美中不足的是花圈被比利亚诺巴大学的一群天主教学生搬走了（校长博萨有点冷淡地否认他那天停课让学生去进行此项活动）。米高扬在古巴参观访问，赞扬农业改革。在哈瓦那大会堂为他举行了音乐会，他进场时，劳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带头和听众一起鼓掌；除了财政部长洛佩斯·弗雷斯克特和农业部长米雷特，大家都这样做了。^①最后，签订了一项经济协定；俄国于1960年向古巴购糖四十二万五千吨，以后四年中每年一百万吨。俄国

又对古巴贷款一亿美元，期限十二年，利息 2.5%——这个数目与努涅斯·希门内斯 12 月里在欧洲未能实现的借款计划相同。这笔钱将用于购买新机器和建造房屋。俄国将供应古巴原油和炼油以及其他许多产品，例如小麦、生铁、辗钢、铝、白报纸、硫磺、烧碱和肥料。还将提供技术援助，建立新工厂和疏治沼泽地。古巴将向俄国输出水果、果汁、纤维和兽皮。这个大吹大擂地签订了的协定，在许多方面是含糊的，特别是关于古巴将输入每种物品的数量、建立一些什么工厂以及要派来哪种技术专家多少人。人们不知道在这次会见中是否谈到了武器问题（似乎会谈到的）；或许卡斯特罗提出了这个问题，而米高扬要提给莫斯科考虑。

古-苏经济协作的时代就这样开始了。这时又作出其他一些决定——例如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对拉丁美洲其余地区的革命宣传，“自由拉丁美洲协会”。2月20日，在经济部下面设立一个中央计划委员会，可能也同米高扬来访有关。在宣传中，古巴开始被称为“美洲的自由地区”。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书记访问古巴，并宣布将创办一种新的中文日报，铅字来自北京，编辑部设在共产党报纸《今日报》社里。这些发展固然不能一概认为一定与米高扬来访有关，可是都标志着古巴在国际地位上的一种变化。人们承认，象埃及那样一些中立国家同俄国甚至有更密切的关系，但是古巴由于地理上的战略地位，即使

① 安德烈斯·苏亚雷斯对德雷珀提供的材料，苏亚雷斯当时在弗雷斯克特的包厢里。然而，米雷特留在古巴，于 1965 年成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

同俄国的关系不这样接近，它也很难保持中立。再则，在同俄国发生这种新关系以后，接着一定会同苏联集团的其他成员国发生大量交往；甚至在米高扬正在古巴的时候，就有一个东德代表团前来商订一项财务和商务协定。

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尽职地指出，俄国现在将按世界市场价格购买古巴糖，而美国是按特别价格购进比它多三倍的数量。重要的不是苏联协定的数量大小，而是，协定的格调和附件（以及它带来的政治协作的希望）。对俄国方面涉及的钱数实际上是巴西咖啡计划中的一半。而且，同苏联签订了商务协定，甚至军事协定，也不一定意味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连同由此而来的一切对内和对外的后果。俄国也许认为一个中立的卡斯特罗，比一个一面倒的卡斯特罗更好。如果一面倒的情况终于出现，那无论如何不能完全归咎于俄国——也许完全不能——也许主要地要归咎于卡斯特罗，而不是古巴共产党。在讨论米高扬访问的内阁会议上，阿曼多·阿特曾说，“我们不需要俄国的共产主义。假如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菲德尔反正也会发明共产主义的。”^①另一方面，商务协定是可取的，甚至是不可少的，因为，如果古巴不得不同美国完全破裂的话，共产主义国家能够提供另一个市场，足以承受美国以往通常购买的食糖数量。^②毕竟古巴过去曾卖过糖给俄国——1955和1958之间卖过一百万吨以上。那个市场

① 洛佩斯·弗雷斯特书，第162—163页。

② 1960年2月5日《华尔街日报》这样说：“欧洲的和美国的贷款来源都弃绝古巴，所以古巴人除了去找俄国，别无他途。”

和那里的机会，古巴人是熟悉的。1959年11月，俄国曾买过另外三十三万吨糖，可是在1959年年底，糖价低，古巴剩余的糖达到一百五十万吨；同时俄国却遭了干旱，损害了自己的糖萝卜收成。

那么，卡斯特罗答复阿根廷大使转达的美国提议时那样冷静，又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象大使本人所认为的，是“一种拖延的策略借以减少紧张……同时等待米高扬到来”？是留一个后退的余地，以防米高扬的访问失败吗？都不清楚。米高扬的访问使古巴国内的分歧更加尖锐。《海洋日报》说，“谢谢你。你的访问……把阵营划得界限分明。”2月29日，卡斯特罗照会美国，建议通过外交代表开始谈判，条件是，在谈判进行时，美国政府或者国会均不得采取任何可能妨害谈判或者给古巴、古巴人民或古巴经济造成损失的单方面措施。已经任命了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全权代表团，准备前往华盛顿。29日，美国说所提条件不能接受；美国“必须可以自由地行使主权，采取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步骤”。^①从历史上在谅解中可能有的从容沉着来看，这种反应似乎过于强硬；假定古巴是具有诚意的（虽然这种假定也许模糊），条件似乎还合理；另一方面，古巴可能无限期地拖延谈判，坚持要保证履行条件。但是，这不过是一个有待考验的问题，如果真正希望谈判的话。^②可能在艾森豪威尔出国访问南美

① 《纽约时报》，1960年3月1日。

② 在这个问题上曾否征询过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意见，还不清楚：他已于2月24日离开华盛顿前往巴西，到2月29日为止在阿根廷。他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这一点。

期间，华盛顿方面的情绪硬化，不愿意和解。艾森豪威尔本人正在接受一些关于拉美问题的实际教育，并且，由于他收到了智利学生会主席的一封信，斥责美国是富人和“现状”的朋友，艾森豪威尔正在开始认识到，象他自己说的，“大量流入拉丁美洲的公私资金并未能使群众受益……我回国后……决心开始……为拉丁美洲所有的人民……而计划。”^①也许结果是，美国在六个月内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变更关于糖的立法。有趣的是，卡斯特罗本人似乎在当时这种接待外宾中，心情轻松了——值得注意的是2月末和3月初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德·博瓦尔的访问。

不管美国答复了一些什么话以及这些话可能似乎多么强硬，总之好象到1960年2月底的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古巴的友谊。古巴政府在2月24日不准在哈瓦那中央公园举行反共的示威运动，老共产党主席马里内略则说：“谁在古巴举起反共的旗帜就是举起卖国贼的旗帜。”在本月早些时候，有一百零四个人，包括巴蒂斯塔手下前哈瓦那市长(路易斯·波索)的儿子，因为参加1959年特鲁希略阴谋被判处三年至三十年的监禁。晚报《国家报》的编辑，吉列尔莫·马丁内斯·马克斯，因拒绝在一篇反共文章下面加印“小尾巴”而辞职，报社接着就瓦解。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在2月又接管了十四所糖厂。全国性的民兵，由青年上尉阿塞维多带领，已经在组织起来，以代替陆军中一部分活动——陆军的忠诚已有

① 《从事和平》，第530页。

疑问。^①（阿塞维多，还不满二十一岁，是卡斯特罗兄弟现在越来越倚靠的那种人的典型。他曾跟着格瓦拉一起在拉斯维利亚斯打过仗，后来当过从中等学校招来的新兵的教官。）电话公司剩下的最后一个美国职员被开除了。属于外国来源的一切商业广告不准在电视和无线电上出现。一切外国制造的化学产品今后必须在古巴改包装后再行出售。教会也在加强它的敌对态度。急进的迪亚斯主教，作为哈瓦那大主教的副手的职务，在2月中旬由一位顽固的反共分子博萨·马斯维达尔主教所代替，后者于是成为多病的红衣主教的代言人，有时候也就是教会组织的代言人。比那尔德里奥的新任主教罗德里格斯·罗萨斯作了一次最后的拥护革命的声明，后来就保持缄默。然而，共产党人还远远不是目前这个革命的最有战斗性的一翼；在2月28日一次新的报告中，布拉斯·罗加否定“帝国主义”会真正进犯古巴。经济侵略是可能的，可是美国需要古巴的糖。诚然，这次报告曾提到“敌人的攻势与日俱增，革命正在前进”，但这些都是照例敷衍的说法。因此，很难看出共产党这时候已经能够看出卡斯特罗个人的思想。

3月3日，《革命报》宣称美国不愿按照古巴的所谓“经济侵略”的条件来进行谈判，第二天，美国同古巴和解的机会完全消失，或许是由于一桩偶然事件所致。一艘法国货轮，“库布尔号”，从比利时运来七十六吨战争物资（轻步枪和手榴弹），在哈瓦那港内爆炸了，其情况使人想

① 阿塞维多(1965年)成为新的古巴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首届委员。

起“缅因号”事件。古巴码头工人七十六名被炸死，二百名受伤。很多码头设备被毁。另一艘军火船被拖出危险区。卡斯特罗在一次最令人难忘的演说中，庄严、坚决、但照常控制着愤怒地，把这一次的“破坏行动”归咎于美国（虽然他承认没有证据），宣布志哀二十四小时，并最后向美国抛出斗争的挑战：“你们用战争或者饥饿都不会使我们屈服。”国务卿赫脱自然否认要美国承担责任的指责。可是此后古巴政府的报纸立刻重新爆发了对美国的攻击。

同发生“缅因号”事件一样，这次爆炸的真相始终未被发现。古巴的码头工人和船坞工人认为这是一次意外事故。是没有经验的兵士帮忙卸货吗？是码头工人抽烟吗？或者只是工作无能吗？（卡斯特罗本人说曾向码头工人搜查过火柴。）当然，美国政府以及（更甚的）在迈阿密的流亡分子具有一种防止武器到达古巴的动机，可是，同发生“缅因号”事件或者普里姆之死的问题一样，古巴的指责没有得到证明。一位比利时专家德萨尔明白地说，有破坏活动，但怎样破坏法，却不清楚。同时，让-保罗·萨特听了卡斯特罗关于“库布尔号”这篇演说，“发现一切革命都有那种看不见的一面，它们的遮蔽着的一面：痛苦地感到有外国威胁。我发现古巴的痛苦，因为我突然也分担了痛苦。”^①

^① 萨特：《萨特论古巴》（1961年），第145页。很清楚，萨特无疑是接受所谓爆炸是破坏活动引起的说法的；在1961年3月4日爆炸的周年纪念日，卡斯特罗也明白地责备美国“谋杀这些古巴工人和战士”（《革命文献》，1961年3月4日）。

美国政府甚至此时还没有决定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另一方面，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授权艾森豪威尔在必要时可以削减古巴食糖定额。15日，艾森豪威尔很轻松地说这一法案的用意不是对古巴的一种报复，而是作为“确保美国可以取得它所需要的糖的一种方法”。作为一种缓和佛罗里达局势的措施，已经在迈阿密成立了一个飞行情报中心，试图控制从佛罗里达、阿拉巴马或者乔治亚起飞的驾驶员。海关说经告密而缉获武器和捉住罪犯者，将奖赏告密人五千美元。这是对卡斯特罗的最后安抚呢，还是为了确保所有流亡分子的活动都在美国组织的有效控制下而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呢？然而，至少还有再一次安抚：在3月初的几天里，美国大使馆法律顾问兼几家美国大公司顾问的马里奥·拉索，去找内阁里最后一位自由主义人士财政部长鲁福·洛佩斯·弗雷斯克特。^①拉索说他相信他能代表美国政府向卡斯特罗提出可以提供新的军用飞机和技术援助（例如雷达），以防止来自佛罗里达的流亡分子飞机。美国也许还准备道歉，因为，由于有许多孤立的机场，无法制止这种袭击。这种表态也许意味着“结束争吵”和重新开始谈判。

洛佩斯·弗雷斯克特3月15日在埃及大使馆的招待会上把拉索的这番话告诉了卡斯特罗，认为这是美国的直接的提议。卡斯特罗觉得“稀奇”。他评论说“这种国际棋局多有意思”，并且说他将在四十八小时以内给予答复。可是，3月上半月显然对现政府说来真是一个关键时刻。例如3月1日，布拉斯·罗加宣称“帝国主义”

^① 马里奥·拉索(1895年生)，曾在宾夕法尼亚和康奈尔大学读书。

似乎不会来侵犯古巴了；但是，3月16日，共产党作出一项决议（据说是2月23日通过的）说，古巴人需要从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获得武器，不仅是需要援助。因此，看来卡斯特罗可能抓住“库布尔号”这个不幸事件作为向苏联要求武器的理由，而这一要求现在共产党本身虽说也许有点勉强却同意支持了。所以拉索的计划实在来得太晚了。可是，在作出任何决定以前，古巴政府已就1月22日卡斯特罗在谈话中提到邦斯尔和反革命活动有关系一节作了道歉。还让美国代办丹尼尔·布雷多克和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去商谈赔偿问题。邦斯尔大使回到哈瓦那了。可是，3月17日，多尔蒂科斯总统召见洛佩斯·弗雷斯克特，总统说卡斯特罗和他已经决定不接受美国15日的建议。“我们不信任美国；我们认为他们是要叫我们自相矛盾。我们一旦公开承认他们是公正的并且对我们是友好的，他们就什么也不给古巴了。”洛佩斯于是告诉多尔蒂科斯说，如果卡斯特罗认为不可能同美国和解，他自己就要辞职；当天他就辞职，后来离开古巴去美国。他是自由派部长中最后的一个，也是背弃古巴革命政府的最后一个部长，虽然有许多部长后来都被革职或迁调。

在华盛顿，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好也在这一天同意中央情报局的一项建议：要开始装备和训练古巴流亡分子。^①当然，这是尼克松副总统和象伯克海军上将这些人坚持了几乎一年的建议。中央情报局念念不忘它五年

^① 艾森豪威尔在辛辛那提的记者招待会，1961年6月12日（《纽约时报》1961年6月13日）。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回忆录《从事和平》第533页中证实这一点。

前在危地马拉的成功活动。政府虽然长期以来只“注意支持(古巴的)游击队”,^①现在却已下决心了。或许他们认为必要时还可以后退,虽然艾森豪威尔本人说明行动规模之所以比较小是因为“古巴人过着流亡生活,无法选出……一位我们可以承认为流亡政府头头的领袖”。^②美国现在还是对古巴拔出了剑,这是十五个月的摇摆不定以及至少十五年的暧昧心情的极点;同时,相应地,布拉斯·罗加离开古巴前往访问共产主义国家,没有疑问,他是为了要了解他的兄弟共产党的领导人对这些事态发展具有什么真正的看法的。

① 中央情报局计划部长理查德·比斯尔对作者说的,1963年1月14日。

② 《从事和平》,第533页。根据邦斯尔在1967年1月《外交季刊》上的文章(第272页),似乎他不知道这个决定。

第二十七章

资本主义的古巴告终

美国虽在3月17日已经拔出了剑，却还没有撤消食糖定额。这现在成为美古矛盾中的测量器。一些对于承受古巴食糖定额感到兴趣的其他国家的代理人正在华盛顿活动。另一些人则仍然希望美国能够以温和的手段防止或推迟发生在古巴的灾祸；在这些人中就有可怜的邦斯尔大使。可是食糖定额在古巴究竟被重视到什么程度呢？3月21日，国家银行行长格瓦拉，在电视中为“广播大学”举行开学仪式时，斥责食糖定额和优待价为“经济奴役”，所谓优待价是由美国给古巴糖每磅美元五分，或者高于世界市场价格二分。他说，这种优待价的效果是刺激糖生产以使古巴永久受到单一作物经济的束缚，同时使古巴每赚得一元却要化一元一角五分去买进口的美国货。^①

同时，格瓦拉还对他的听众讲了一点他自己的哲学：

^① 马里奥·拉索重述他当时同格瓦拉的一次谈话，在谈话中，格瓦拉说，“由于被单方面强加的定额所限制，美国市场上较高的糖价是一种虚构的东西”。他说，只要美国定额一取消，“而且越早取消越好”，古巴就是世界市场的主宰，能够控制糖价（《插进心脏的匕首》，第241页）。后来格瓦拉又在同胡利奥·洛沃的谈话中继续说：“卡斯特罗政权正在同美帝国主义作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两人都知道总有一方一定要死的。”

你要得到一点东西,就得从别人那里夺取过来……这点东西就是国家的主权。它必须从那个叫做垄断的人的手里夺取过来,虽然一般说来,垄断并没有国籍,可是它们至少有一个共同定义。曾在古巴国内在古巴的土地上赚得利润的一切垄断事业,都同美国有很密切的关系。换一句话说,我们的经济战争将是对着北方的那个大国。①

美国政府并非勉强地暗示说,如果定额确实是“奴役的”,古巴应该放弃它。可是另一些古巴人则认为任何撤消定额的计划实际上就是“一种新的普拉特修正案”。②已经回到哈瓦那的邦斯尔在3月21日试图了解古巴实际上想怎么办。这是困难的,因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古巴政府本身也不知道。格瓦拉大概想要逼得同美国摊牌,所以发表他的演说。可是这不一定适用于卡斯特罗——特别是此时他在国内的地位还不是十分强固的。③再则,美国也不真正想要砍掉定额(从而有可能被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指责为经济侵略),古巴或许要使美国由于粗暴行动而出现在侵略者的行列中。

现政权仍然在几家重要的古巴报纸上受到攻击。卡斯特罗的老朋友,人民党前任总书记路易斯·孔特·阿圭罗,在电视中猛烈抨击政府的专横行为,可是,3月25

① 《革命报》,1960年3月22日。

② 普拉特修正案——古巴从西班牙获得独立后,美国于1901年强加于古巴的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美国可以干涉和控制古巴的内政,并在古巴设立海军基地等不平等条款。——译者

③ 他在1960年6月间一次电视讲话中提起这个问题并谈到格瓦拉的议论,他说,“我们不需要作任何解释。”《革命文献》,1960年6月11日,第17页。

日，由于保安警察副头头皮涅罗少校带领一批武装群众动手阻挠，他未能在主要的 CMQ 电台上宣读一封致卡斯特的“公开信”。^① 3月27日和28日他受到全面的人身的攻击，先是劳尔·卡斯特罗在一次露天大会上（有人高呼“枪毙”），然后是非德尔·卡斯特罗在电视上，这是自由的新灾难。孔特·阿圭罗聪明地逃到阿根廷大使馆避难。这是用暴力妨碍言论自由的一个实例。3月28日，哈瓦那理发工人联合会主席劳尔·拉蒙·普罗恩萨，因为在墙上写反共口号被判处三年监禁。

这种种事件使政府决定接收 CMQ 电台——哈瓦那最重要的电视中心。这一接收是悄悄地进行的。大约有四百个古巴人的银行存款，以同巴蒂斯塔有勾结的罪名，突然被冻结了。限他们在十五天内证明自己无罪，否则存款没收。在这批人中有 CMQ 电台所有人阿维尔和戈亚尔·梅斯特雷兄弟。阿维尔·梅斯特雷3月30日（孔特·阿圭罗隐没后一天）带着一些发薪水的支票到银行去提款。可是办事员说银行职工工会不愿兑付这些支票。第二天，阿维尔·梅斯特雷在受人欢迎的节目“新闻报告之前”（卡斯特罗本人常常在这档节目中出现）正要开始以前走进电视室，随手把门锁上，宣称这个星期他自己将客串演出，发表长篇演说反对卡斯特罗。然后他立即逃亡国外。从此 CMQ 电台成为政府的电台。政府和董事们之间有过几次争吵，因为董事不肯对那些曾到山区

^① 皮涅罗，妻子为北美洲人，曾为劳尔·卡斯特的部下，后来成为奥连特省陆军负责人。他是卡斯特的最忠诚的拥护者之一，并曾于1959年秋季进入内政部。

去的职工补发薪水。唯一有效力的反对政府的呼声现在只能来自《海洋日报》和《自由新闻报》这两家老报纸以及教坛，因为另一个大电视网(波道十二号)现在由政府派员监管，再则所有的小无线电台都已在暴力或者威胁之下被合并为一家政府操纵的公司，取了一个富有讽刺意味的名称“自由电台独立阵线”，用了一位声音可憎的时事评论员帕尔多·利亚达。

这时候，所有的工会都准备下手。有名的清洗委员会仍然想排除所有在上次代表大会上投票反对共产党候选人的工会干部。但清洗委员会本身已在凋零涣散。工人联合会总书记萨尔瓦多被他的战斗性较强的同志索托指责为热情不足，特别是在建筑工人拒不去掉他们的领袖路易斯·佩内拉斯而接纳清洗委员会提出的那些人以后。于是索托和劳动部长将佩内拉斯撤职，当时萨尔瓦多正在国外，在法国向“库布雷号”惨案中遇难的法国海员的家属致送赔偿金。萨尔瓦多怒冲冲地去找卡斯特罗，他佯作不知，表示惊讶并当面斥责劳动部长。部长拒绝辞职。后来萨尔瓦多知道了这番表演是一场骗局，那个工会的共产党员头头早经获得批准。萨尔瓦多于是辞职，虽然暂时并未公布。再说，他从1959年年初起就常常热诚拥护政府，使他现在很难开始打算参加反对派——甚至难以想象自己会在那里受到欢迎。劳动部不管怎样正在使工会失去大部分存在的理由；该部单独和资方谈判，并有权解决劳资纠纷。4月中旬，一项新法令规定所有的雇主、雇员和独立劳动者均须登记。工人今后只能通过劳动部的办事处和登记表去找工作。劳动的控制和失业的

救济被认为不能不结合在一起。新组织的工会“请”它们的会员从工资中贷款 4% 供政府用于工业化计划，并仍保留原来的 1% 的会费，尽管事实上工会已不做工作了。

同时，古巴继续出现真正的叛乱活动，这至少说明政府对敌人采取了很严厉的措施。例如，人们相信，大约有二十人，包括他们的头头的家属在内潜伏在马埃斯特腊山区里，为首的是前起义军曼努埃尔·贝亚顿上尉。贝亚顿，才能很低，在 1959 年曾被调任适当的政府机关工作，爱喝酒，似乎是在一次私人争吵中杀害了克里斯托巴尔·纳兰霍少尉，纳兰霍曾奉命调查西恩富戈斯的失踪。贝亚顿从拉卡瓦尼亚监狱逃走，流为盗匪，袭击农场，劫取食物。另有一小股人在克里斯塔尔山里干着大致相同的勾当，头头是伊希尼奥·迪亚斯（绰号尼诺），原来是劳尔·卡斯特罗下面一个向来不安份的分子，虽然他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反对派，大概从关塔那摩（同那里还可以进行接触）那边得到中央情报局的帮助。

迪亚斯也是一个新团体“革命复兴运动”的成员，这个集团是由卡斯特罗从前的几个追随者组织的，内中有豪尔赫·索图斯，圣地亚哥的一个“生意兴隆的仓库老板的儿子”，他在 1956 年 11 月 30 日参加派斯在该地几乎成功的起义以后，曾于 1957 年 3 月间带领第一批主要的援军去接应卡斯特罗；塞尔希奥·桑赫尼斯，此人 1958 年和维克托·潘内克在马坦萨斯一带地方打散兵战以后，曾于 1959 年在哈瓦那短期当过军事情报的负责人；曼努埃尔·阿蒂梅，1958 年 11 月以前哈瓦那军事学院的教授，

在山区里打过一点仗以后，曾暂时担任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的地区负责人。这些人都放弃了革命，因为革命显然已同共产主义发生了亲密关系。阿蒂梅是一个有西班牙保守派背景的天主教徒。

阿蒂梅还将成为卡斯特罗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反对者。革命后，他和其他几个观点相同的人曾在农业部索里·马林手下工作。^①早在1959年3月，他就和农业指导员罗赫略·网萨雷斯·科尔索开始阴谋反对卡斯特罗，并显然在马托斯被捕前同他有了联系。到了1960年4月，革命复兴运动已是组织得最好的一个反卡斯特罗团体，在国内有很多党徒和一种地下报纸《复兴报》，并且在美国有极好的关系。在艾森豪威尔授权中央情报局支持流亡分子以后，革命复兴运动一度成为中央情报局的主要希望。阿蒂梅前往拉丁美洲游说，而圣希尼斯和网萨雷斯·科尔索留在哈瓦那，尼诺·迪亚斯留在克里斯塔尔山区。中央情报局（该局的反卡斯特罗活动的指挥者是弗兰克·德罗勒，中欧人，对古巴人用假名“弗兰克·本德”，他上一年会见卡斯特罗时非常热情）正忙于商谈设立一个中心来训练在危地马拉的古巴流亡分子（得到危地马拉总统伊迪戈拉斯的同意），^②地点在靠近太平洋海岸的

^① 1959年1月10日的时候，他在邮电部掌管邮汇和统计。

^② 根据戴维·怀斯和托马斯·罗斯：《看不见的政府》（伦敦，1965年），第23页，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的代表是R·肯纳德·戴维斯。中央情报局的计划部长（比斯尔），德罗勒的上司，在1963年对作者否认中央情报局曾向伊迪戈拉斯总统提出支持危地马拉对英属洪都拉斯的野心，作为酬报。可是伊迪戈拉斯于1961年12月和1962年10月先后两次说，“美国曾答应在关于英属洪都拉斯的争执中给他帮助，换取他允许美国利用危地马拉作为训练基地，准备入侵古巴”（参阅《纽约时报》，1962年10月14日）。

埃尔贝蒂亚咖啡大农场，农场主人罗伯托·阿莱霍，是危地马拉驻美大使的兄弟。同时，这一伙人开始组织一个政治阵线，它的中心人物是胡斯托·卡里略，何塞·伊格纳西奥·拉斯科（哈瓦那大学教授，古巴基督教民主党的一个领导人）和奥雷利亚诺·桑切斯·阿朗戈。这些人都还在哈瓦那，作为普通老百姓居住在那里。

然而，还有一些同美国没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反对革命的人。几个月来最公开活动的是一群天主教学生，为首的是阿尔维托·缪勒，马坦萨斯主教的侄儿。他的最后一次抗议行动是在孔特·阿圭罗事件中企图在CMQ电视台门口举行示威。4月间，他的单张小报《战壕》被当众焚毁，他的朋友被革命的学生群众袭击，他本人不得不离开大学，转入地下活动。此外还有曼努埃尔·拉伊正在组织的反对活动，此人在11月份以前是公共工程部长，现在在大学里教授建筑学。由于他从前当过反巴蒂斯塔的地下工作的头头，他现在又在重新干他所熟悉的的活动。到4月，他已经和其他一些批评政府的进步人士取得了联系，其中包括劳工领袖萨尔瓦多在内，此人对现状的不满正在迅速增涨。^①

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政府不久就发觉美国对流亡分子承担了义务。革命政府在迈阿密设有有效的情报组织，而且古巴人，不论右派左派都不善于保守秘密。也许是为了预防美国和流亡分子有什么公开行动，早在3月底，卡斯特罗就警告美国说“古巴不是另一个危地马拉”，同

① 拉伊提供的材料。

时又表示愿意派迪戈大使回华盛顿，“如果美国还愿意在比较友好的基础上讨论问题的话”——没有疑问，这是暗指洛佩斯·弗雷斯克特3月17日那个未有结果的提议。4月间，又有修改古巴对外政策的其他一些迹象：多尔蒂科斯总统提出可以援助贝坦科尔特总统镇压委内瑞拉的军事骚动——这一提议遭到拒绝。4月19日，卡斯特罗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台的电视中对北美的访员理查德·贝茨说：

〔美国〕政府的政策同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政策有些相似之处，都咒骂革命是共产党的阴谋。我作为总理一向是忠于革命的。古巴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和真正的革命，这是发生误解的主要原因，这种误解是由于有许多利害关系决不会同真正的和正义的革命取得一致的缘故。

4月22日，他指责美国想要搞一条反对他的国际阵线。第二天，危地马拉总统伊迪戈拉斯——他已经同意把埃尔贝蒂亚咖啡农场用于这种暧昧的勾当——温和地谴责格瓦拉资助反对危地马拉的革命。可是关于中央情报局的活动，人们很快就开始知道一些真相，因为古巴的“拉丁新闻”通讯社（由格瓦拉手下一个阿根廷人豪尔赫·马塞蒂经营）不久就宣布伊迪戈拉斯同他在尼加拉瓜的同行独裁者索摩查已订了一项反对古巴的密约，并且拟议中的入侵已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支持。罗亚指责伊迪戈拉斯和联合果品公司同谋，计划由海上入侵。接着于4月26日断绝外交关系——这是对除了多米尼加共和

国以外第一个断交的国家。《时代》周刊讥笑卡斯特罗对入侵的忧虑时用了“有神经病的”这个形容词；^①可是《时代》周刊本身却已在2月29日说过：“门罗^②的思想和干涉古巴的思想在华盛顿必定有人透露过”。

然而，古巴还有许多同情者，特别是在欧洲，因为在左派中，有许多知识分子在欧洲找不到合他们意的现行体制和乌托邦。同样地，北美的知识分子，由卡尔顿·比尔斯和沃尔多·弗兰克这些老资格的环球旅行家带头，创立了“对古巴光明正大委员会”。一则七栏的广告责备美国过分渲染了苏联和古巴的关系：“许多美洲共和国，包括美国在内，都同俄国做生意；〔在古巴〕共产党员只有一万六千人；应对古巴的改革家作‘公平裁判’。”争论激烈，遍及西半球。智利学生写信给艾森豪威尔并得到他的复信之后，又有一个智利人写信给多尔蒂科斯，并得到他的复信。巴勃罗·聂鲁达4月间写成一部关于古巴的《英雄业绩颂》。古巴一时成为在几个国家里激起民族主义情绪的触媒剂。格瓦拉的论游击战手册4月间出版，使整个南美不分远近的左派都着了迷。甚至西班牙的学生也在谈论学期结束后上山去。卡斯特罗在山区的成功，加上他的革命纲领的坚定，使得各处的学生热血沸腾，拆散了青年共产党员同老的党领导之间的联系，在大学里产生了一些自发的同盟，它们唯一的志同道合是向往于行动、斗争和炮火。这种狂热也不局限于知识分子。艾

① 《时代》周刊，1960年5月23日。

② 詹姆斯·门罗(1758—1831)，美国第五任总统。他在1823年提出门罗主义，鼓吹“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企图由美国独霸美洲。——译者

森豪威尔到里约热内卢时，欢迎的标语上写着“我们喜欢艾克，我们也喜欢菲德尔”。史蒂文森在拉丁美洲访问时也发生同样的情况。一个大胡子的英国电影制片人，甚至在波多黎各也受到热烈的欢呼，“菲德尔万岁！”

在美国，尽管有“对古巴光明正大”这一派和其他知识分子，公开的和隐蔽的仇视还在增长。一个棒球队决定不在哈瓦那比赛。因为通过了一项援外法案，附有规定不得援助古巴，除非认为有助于“本国的……或者本半球的利益”。于是，去年冬季通过阿根廷大使向卡斯特罗提出的有关和解的第三项建议，当然作罢。在哈瓦那，美国大使馆接二连三地抗议美国公民被捕（其中许多是古巴籍美国人），一个照会接着一个照会。而且，既然革命不是给加勒比海带来和平而是带来了一把剑，那就谈不上把美国直升飞机卖给古巴了。古巴继续抗议来自佛罗里达的空袭，有些是假的，有些是真的。可是有两件大事掩盖了局部的政治反应：即将举行的1960年美国大选以及同苏联在巴黎举行的最高级会议。

美苏最高级会议的命运是滑稽的。前马歇尔援助计划的经济学家、现任中央情报局作战部长理查德·比斯尔，现在掌管政府方面发动古巴叛乱分子反对卡斯特罗的计划，此人在几年前曾设计出那无与伦比的U-2摄影间谍飞机。苏联人击毁由加里·鲍尔斯驾驶的U-2飞机（鲍尔斯被俘），粉碎了美苏外交关系立即解冻的任何机会。从此以后，直到艾森豪威尔任期届满为止，苏联忙于批评美国，肆意谩骂，不亚于斯大林时代。若不是因

为同美国发生这场危机，苏联对于古巴的殷勤投靠也许还不会反应得如此之快，苏联的领导人一定会比较谨慎地考虑在加勒比海保护一个亲密盟友的后果。

总统选举也影响了美古关系，虽然这个问题不起“主要的”作用。参议员肯尼迪同平常一样小心地对待这个问题。副总统尼克松知道武装流亡分子的计划；老实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他的计划，因为自从1959年4月以来他就主张这样做。这使他很难说话。

5月1日，一大批工人的游行队伍集合在公民广场上，这些人照例都是免费乘车到哈瓦那来的。还有来自苏联、中国和东欧的官方代表。菲德尔·卡斯特罗又一次发表演讲。他抨击选举制度，肯定说“直接民主”（他自己认为当时在实行的那种民主）比“这些假民主”要纯洁一千倍，“这些假民主使用各种贪污和欺诈的手段出卖人民的意志”。安排了“做啥要选举？”这种广泛宣传的口号。引人注意的是，名义上仍然是古巴工人联合会总书记的戴维·萨尔瓦多没有在场。卡斯特罗还告诉群众关于来自危地马拉的“入侵阴谋”。在这次集会上，似乎第一次听到人们高唱“要古巴，不要美国佬”；不久它就成为一种不足道的可是有趣的小调的大合唱，整个夏季有人哼唱并在留声机上放送，确实放到唱片坏了为止。

两天后，华盛顿的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干了一件鲁莽的事，听取巴蒂斯塔的前参谋长塔维尼利亚将军和以前在山区中指挥对卡斯特罗作战的乌加尔德·卡里略上校两人的证词，卡里略根据脆弱地说，苏联正在萨帕塔沼泽地建筑一座发射导弹的基地。

尽管这位上校的话是虚妄的，但仅就听他作证这一事实就引起了古巴方面的怒火。罗亚博士斥责为“罪恶的干涉”。第二天，美国劳联-产联发表一项声明说，卡斯特罗正在把古巴变成苏联的前哨，可是，这并没有使任何一个古巴人高兴。糖业领导人孔拉多·贝克尔，现在急于要表现自己的坚定，对他的手下说，美国劳联-产联是受流氓指挥的，他们的见解全不可信。

5月7日，古巴终于同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革命指导委员会领导人福雷·乔蒙（他去年向左转到至少和卡斯特罗一样）被派到莫斯科去担任大使。布拉斯·罗加，在访问中国并受到毛泽东热情接见后，于5月间到莫斯科第一次和赫鲁晓夫见了面；他写了一封兴致勃勃的信回来说：“古巴不可能被美帝国主义者在经济上封锁了。我们的工厂不会因缺乏石油而瘫痪，如果美国垄断资本决定削减食糖定额和拒不供应我们日用品，我们的主妇也不会缺少面包”。^① 苏联第一任驻古巴大使是谢尔盖·库德里雅夫采夫，此人在西方国家圈子里曾因在四十年代末期负责有名的加拿大间谍集团而出过名；因为他享有外交地位，只被赶出加拿大，未予监禁。^②

这些举动只是正面地对付所谓美国将采取反对古巴的新措施的谣传。同时，继罗加之后又有其他的古巴人出国访问：陆军督察署长威廉·加尔维斯少校去北京，农业改革的负责人努涅斯·希门内斯去莫斯科。苏联似

^① 《今日报》，1960年5月24日。

^② 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库德里雅夫采夫（1915生），驻法公使，1959—1960年；驻古巴大使，1960—1962年。

乎还没有答应供给武器，也没有交到什么货，但可以假定，武器问题一定已经在计划之中，而且努涅斯·希门内斯大概同苏联讨论了食糖和石油这两项东西。（苏联石油4月19日开始到达古巴。）4月，古巴同波兰签订一项重要贸易协定，这又是很难完全加以谴责的——正如塔德·苏尔克4月2日在《纽约时报》上说的：“古巴缺乏美元……加上美国和大多数西欧的出口商不肯给予信贷，实际上使它别无他法。”

5月间出版自由告终。《海洋日报》曾勇敢而一贯恶毒地批评革命。5月11日，该报组织了一篇要求自由选举的文章，签名者有该报职工四百五十人中的三百人。可是其余的少数召来印刷工人工会（带头的是达戈维托·庞塞）和新闻工作者协会（带头的是蒂尔索·马丁内斯）两个组织的壮汉，他们一起打坏了即将付印的那件职工来信的制版。在《海洋日报》社工作的新闻工作者协会秘书佩德罗·埃尔南德斯·洛维奥去叫来警察，可是该地区的警长说他看不到秩序紊乱的迹象：“给我看一个死人，我就采取行动，”他说。^① 主编何塞·伊格纳西奥·里维罗提出抗议后，逃到秘鲁大使馆去。《海洋日报》社被关闭。第二天，《自由新闻报》——最后一家自由报纸，销数十二万份——斥责没收《海洋日报》是一种掠夺，是高压和暴力行为，是违反言论自由的罪行。同一天，5月12日，天主教学生象征性地把《海洋日报》埋在大学校园中一个土墩里。5月13和14两日，《自由新闻报》继续抨

^① 保罗·巴兰：《古巴革命观感》（纽约，1961年），第23页。

击政府。附在路易斯·阿吉拉尔·莱昂写的一篇大胆的文章后面的“小尾巴”，夸耀地说对于那些不喜欢“极权主义统一”的人，向来就有枪毙、监狱、流放或者耻辱。15日，《自由新闻报》社80%的职工签署一项声明，支持该报进行“这些最紧急的争论”。次日，签名的人被送到古巴工人联合会，主持会场的是戴维·萨尔瓦多，他的处境一定相当困难，因为他本人已经同拉伊这些革命的敌人有了接触。他们劝说职工们取消声明；作为报酬，于5月16日凌晨一时由卡斯特罗接见。又经过一些纷扰以后，副主编梅德拉诺和乌利塞斯·卡尔沃离开报社，到巴拿马大使馆去避难。16日，政府接收了《自由新闻报》，理由是它同《海洋日报》一样，在攻击“真理、公道和社会准则”。固然还剩下两家销数不多的独立报纸，但是，它们不敢作任何批评，还有两种无政府主义报纸（《自由报》、《饮食业团结报》）和一种托洛斯基派报纸（《无产者之声》）；而《波希米亚》周刊、《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和其他北美报纸暂时继续在报摊上出售。政府的观点继续发表于《今日报》、《革命报》以及新格调的《世界报》上，同时革命指导委员会仍然在名义上控制一种晚报《街道报》，各省也有几种政府的报纸。

出版自由在古巴的没落本来会比较难以解释（或者难以实现），假如不是因为所有这些报纸同工会领导人一样，不仅曾同巴蒂斯塔合作，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实际接受他的政府以及前任政府的经济帮助的话。对报纸的这种津贴已成为惯例（正如在墨西哥仍然如此），以致有些个别的报纸完全靠津贴维持。

大约在这个时候，在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中剩下的非共产党人的顽强而酷爱自由的成员，在有名无实的领导人马塞洛·费尔南德斯的带头下，似乎大家开了会并拟了一项致卡斯特罗的哀的美敦书，要求他公开重申他反对共产主义的态度。这张哀的美敦书并未送出，显然是因为《革命报》主编卡洛斯·弗朗基从中作了调停。可是卡斯特罗照例是会知道这些举动的，而且也许可能已经作出了反应，假如不是因为塔斯社记者 A·阿列克谢耶夫适逢其会的插手的话——此人实际是外交人员而不是新闻记者。阿列克谢耶夫表面上给卡斯特罗带来赫鲁晓夫的直接口信，告诉他：“苏联政府愿意对你表示，它不认为任何党派是它和你之间的居间人。赫鲁晓夫同志……认为你是革命的真正领袖。”^① 这暗示赫鲁晓夫是希望把卡斯特罗放在和纳赛尔或者第三世界任何领袖同样的地位，而不是一个哥穆尔卡或者卫星国领袖的地位。他在帮助卡斯特罗作为一种个人领袖发挥作用，而不必考虑古巴共产党——大概是在同布拉斯·罗加研究以后形成的一种见解。可是在卡斯特罗看来，这封信还有其他的涵义：他自己可以接管共产党，把它作为他的机关来利用。因此古巴和苏联的领导人自相矛盾地争论了好几个月，问题正是共产党人应否在古巴掌权。为了国际政治的原

^① 卡萨利斯，《共和国》周刊（卡拉卡斯），1966年2月4日和10日。卡萨利斯当时是著名记者，每日为《革命报》写文章，在这一阶段很接近格瓦拉和卡斯特罗。他所提供的材料也许似乎颇有疑问，可是结果还是证明它似乎相当可信的。在外交部工作的尼古拉斯·里维罗认为阿列克谢耶夫曾竭力劝卡斯特罗兄弟两人少说反美的大话。（《卡斯特罗的古巴》，第54页。）

因，苏联大概希望古巴成为一个友好而中立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卫星国；但是，为了国内的以及国际的政治原因，甚至于心理上的原因，卡斯特罗本人似乎情愿有一种关系比较明确的地位。古巴共产党则大概认为美国几乎一定会干涉古巴而不愿让他们取得权力。当时仍在经济部部长博蒂手下工作的哈维尔·帕索斯后来说，许多共产党人“私下承认”他们希望会出现这种情况，使古巴成为一种“西方的匈牙利”，在整个美洲发生反响。^①

出版自由的遭到破坏标志着教会开始了反对革命的运动。5月初，哈瓦那大教堂为纪念共产主义的受害者而举行弥撒时，被唱着国际歌的民兵所冲散。5月16日，圣地亚哥的大主教佩雷斯·塞兰特斯终于放弃中立，发布“教书”，谴责同苏联恢复外交关系：“不能再说敌人在门口了，因为实际上他已经进来了，好象就在他自己的领土上一样。”他又说：“真正的基督徒没有自由就不能生活……我们向来觉得宁可失去一切，甚至流血，而不可放弃自由。”因此，家家户户应该成为一个家庭教义研究班。可是，因为有资格尽这种责任的家长实在为数寥寥，所以他呼吁那些有资格的人要带头已是为时太晚了，或许晚了五十年，大主教也无能为力了。他说共产主义会产生物质主义。这种警告，在资本主义比其他任何地方更为“物质”的哈瓦那这样的城市里，引起了一阵空洞的笑声。然而，“教书”还是在奥连特和哈瓦那的教堂里宣读了，并且在剩下的两家独立的报纸《消息报》和《考验报》上不加

^① 哈维尔·帕索斯的文章，《剑桥舆论》，1963年2月25日。

评论地发表了。共产党人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在《今日报》上回答说，在古巴，没有人阻止任何人信奉宗教：革命分子中不是也有数以百计的天主教徒吗？卡斯特罗暂时不表示意见，因为当时大学里和他的老部下中正出现谋反的高潮，他不愿意闹出全面的冲突来。据《纽约时报》报道，大学生现在有一半对革命抱中立态度——这就是说，暗中抱着敌视态度。教会组织对卡斯特罗正如以前对巴蒂斯塔一样，小心翼翼；现在也许非其所愿，一旦私立学校开始关闭，一些独立的青年组织和其他一些组织开始被取缔了，天主教教会势将成为反对现政权的根据地。

大概政府是想到这一层的，所以他们于5月间把三年级学生八百人派到马埃斯特腊山区去帮助教农民读书。在此期间，仍然直言不讳的少数大学教授之一，前部长、革命党人桑切斯·阿朗戈（已经同流亡分子的政治组织“革命复兴运动”有接触）被公开指责，说他把自己的班级变成反革命的政治讲坛；他通过厄瓜多尔大使馆逃往迈阿密。

在迈阿密，这时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已经劝说了那些流亡分子的组织结成一个“联合阵线”。桑切斯·阿朗戈来到以后，这个名称古怪的团体终于成为一个实体，命名“民主革命阵线”。其中包括普里奥手下的革命党总理托尼·巴罗纳，他从一开始就批评卡斯特罗不举行选举；拉斯科；革命复兴运动的曼努埃尔·阿蒂梅；前工农业开发银行行长胡斯托·卡里略；以及奥雷利亚诺·桑切斯·阿朗戈。阿蒂梅是军事代表，负责同中央情报局联络，

同这些人也有联系的还有其他一些古巴军人，例如马丁·埃伦娜上校，1952年负责马坦萨斯的军官，因抗议巴蒂斯塔的“政变”而辞去军职。其他许多古巴人，包括前巴蒂斯塔军队的各种军官在内（其中许多人同巴尔金的1956年4月阴谋有关），^①都已经出发，赴危地拉马受秘密训练，有些人暂时在巴拿马的美国人办的反游击学校里。可是这方面的活动还在初期阶段。肯定有不到一百名古巴人在受训。此外，中央情报局也在古巴国内其他一些真正的叛乱分子中进行活动。

这些新的古巴勇士不完全知道他们是美国的兵，他们听到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们的活动是由“一个美国的私人企业集团”出钱，也有人说出钱的是“一个古巴百万富翁”。被这种不高明的装腔作势所骗的为数不多。可是这些人一经答应在美国间谍组织工作，他们就真正交出了自由。那些政客也是如此。好几个月以来，这些人虽然彼此争吵并同他们的施主争吵，实际上他们都成了北美人，在事情不顺利的时候靠美国帮助，把美国总统看作他们的头头。

移民继续不断流入美国，有企业家、农场主、阴谋家、携带家属的男人、没有父亲的家庭。这样轻易准许他们离开古巴和进入美国，正是削弱现政权的敌人的因素之一，使得来到迈阿密的几乎每一个人都似乎是什么新

^① 这些人包括曼努埃尔·布兰科、亚历杭德雷·德尔巴列、罗伯托、何塞和米格尔·佩雷斯·圣拉曼、米格尔·奥罗斯科、乌戈·苏埃罗、拉蒙·J·费雷尔、“奇基”·加西亚·马丁内斯、奥斯瓦尔多·彼德拉、以及阿方索·科尔西。

的政治组织的领袖，使用各种夸张的名称，而实际上所有的人都不过是某一个流亡者的直系亲属。卡斯特罗就这样既失去了人力，也去掉了许多潜在的危险的反对者。

在古巴，现在糖的收获又一次即将结束。总共生产了五百八十万吨。可是收获本身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这是自由企业制度下的最后一次收获，这种制度，尽管有它的浪费和不公道的一面，却造成了多年如此的古巴。收获一结束，差不多所有属于糖厂的甘蔗田（二百七十万墩）立刻就由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接管了。在这样经过分划的土地上成立了一千个合作社。这次庞大的接管土地中有二十七万五千墩属于古巴大西洋公司、古巴美洲公司、以及其他一些美国人所有的大公司。古巴提供期限二十年利息 4.5% 的债券作为赔偿，可是，例如对于联合果品公司，价值却很有疑问：公司自称它的土地价值三千二百万英镑，政府说六百万英镑。当然，同产业一起还有机器、店铺、许多建筑物和劳动力。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经营许多原有的老商店，也开了新商店，所以到仲夏的时候已经有二千所以上“人民商店”。糖厂本身还未受到处理，并且在理论上它们还可以指望 1961 年的收获，届时，作为私营企业的前哨，它们将向合作社种植者以及残存的小农购买甘蔗。很多糖厂不相信这种办法可能持久。他们这样怀疑是对的，因为古巴的整个私营企业制度现在已经受到威胁。

这种事态的发展开始于 5 月 23 日，这一天古巴三家大炼油厂——德士古、荷兰皇家和美孚——接到政府通

知,按照2月的协议不久将有大批苏联原油运到,今后将要求它们每天加工苏联原油六千磅。这三个炼油厂的生产能力是每天八万五千磅。这些公司在石油输入上已经被古巴拖欠了一千六百万美元。古巴的要求将损害到委内瑞拉的利益。三家公司犹豫不决。它们得到通知说,古巴每年原油消费量的五分之一将由苏联供给。这种油无论如何比委内瑞拉的油便宜。三家公司又犹豫了。

在此期间,哈瓦那来来去去的人很多。苏加诺前来访问,根据有人记述,他在古巴四处仔细地看了一下后,并非完全开玩笑地对卡斯特罗说,“你把这叫做不发达国家吗!”多尔蒂科斯去南美访问三星期,同时,古巴投资于强有力的短波无线电设备,以便对南美广播。有一位观察家把多尔蒂科斯的旅行看作是卡斯特罗“对南美输出他的革命”的运动的开始。^①努涅斯·希门尼斯在俄国接洽购买大约三十所工厂,并聘请管理这些工厂的技术人员,以便制造从钢材到铅笔各种东西。代价为八千万美元,半数用货物偿付。卡斯特罗嘲弄地说,假如不是因为美国的定额,古巴可能生产更多的糖——这是他第一次明显地同意3月间格瓦拉的强硬路线。6月初,他正式放弃争取美国游客的努力。国务院最近说,不久将停止对古巴的一切经济援助。可是所谓援助反正已经只有两项小计划——六名技术人员在农业试验站,以及另外几个在民用航空方面训练古巴人——每年用费不到二十万美元。在哈瓦那,人们对于印有“这是美国财产”字样的招贴

^① 塔德·苏尔克:《输出古巴革命》一文,见普兰克编:《古巴和美国,远距离观察》,第81页。

——这种招贴是美国大使馆搞出来，给当地的企业使用的——感到有点紧张，好象就要发生入侵似的。作为大使的邦斯尔处于越来越不愉快的地位，不得不首当其冲地受到原先要加在他的前任们身上的侮辱；他继续接二连三地递送照会，批评对他的国家的诽谤，但毫无效果。他不知道国内在武装流亡分子；假如他知道的话，他不可能还留在那里。在古巴本身，一伙来自圣克拉腊大学的学生上了山；他们的一些领袖被擒，普利尼奥·普列托（一个起义的陆军少校）、波菲里奥·拉米雷斯·鲁伊斯（拉斯比利亚斯的大学生联合会主席）和西内西奥·华尔希被枪毙，这是1969年1月^①以来第一次处决学生。^②戴维·萨尔瓦多，名义上仍然是工会的总书记，在6月间已转入地下活动，同前卡马圭七月二十六日运动负责人华金·阿格拉蒙特一起组织了“十一月三十日运动”——以弗兰克·派斯1956年在圣地亚哥起义的日子命名。这确实是一种周而复始的轮回。现政权把学生当作土匪，正如当年巴蒂斯塔把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人看作土匪一样。这些学生没有得到农民的多大帮助，他们的领导人实际上困守在小城市里，买粮食吃。更为严重的是，曼努埃尔·拉伊（公共前工程部长）积极从事于秘密政治活动。到仲夏的时候，他已经创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名为“人民革命运动”，它同“革命复兴运动”不同，开始时和美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1959年1月”。——译者

^② 普利尼奥·普列托1950年是哈瓦那一所夜校的教师，1952年曾参加桑切斯·阿兰戈的“三A”组织。1957年他参加革命指导委员会。1958年他从佛罗里达私运军火到古巴，有一次在墨西哥湾失事，在一只无遮蔽的小船上度过十天，没有东西吃。

国没有关系。拉伊企图把国内外原先拥护卡斯特罗而现在不同意他的人都集合起来。萨尔瓦多同他合作，这个运动得到一些人参加，可是它坚定地拒绝同中央情报局合作，该局在他们自己那些头头的把持下也认为拉伊太左，对他们不适宜。然而，拉伊的口号“没有菲德尔的菲德尔主义”，只能迎合老于世故的人，而且也只能迎合其中的少数人。对于广大群众说来，这句话似乎荒谬，正如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荒谬的。同时，入侵的谣言甚至传到了美国新闻界：例如，消息灵通的《华尔街日报》在7月初发表一篇文章说，“已经有政府官员在考虑怎样促进和小心地支持古巴内部的反对派，以加速卡斯特罗的垮台，如果……他的威望……会……降低。”^①

1960年中期，哈瓦那大学里的自由终于被破坏了。这个学术中心长期以来为一伙顽强而往往是年龄较大的学生所把持；他们不惜使用武器和绑架的手段，以达到最平凡的目的，例如法科学生为了争夺学生会主席或者大学生联合会为了争夺副书记的地位。因此图谋使大学自治权垮台的那些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也是对一种即使是不光彩的古巴的传统的崇拜。有关的一些人——罗兰多·库维拉，革命指导委员会里的一个少校；何塞·普恩特·布兰科，埃切瓦里亚的继任者之一；安赫尔·克维多；和奥马尔·费尔南德斯——在卡斯特罗的政府看来，就同格劳·圣马丁对莫诺洛·卡斯特罗的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看法一样：是一种“帮伙”，准备不择手段取得控

① 菲利普·盖林的文章，《华尔街日报》，1960年7月11日。

制权,而现在则意味着要由国家控制大学。这四个人恰巧都有军衔,奥尔马·费尔南德斯已经是海关行政官员,不久成为运输部长。对这些领袖中的某些人来说,所提出的政策意味着完全放弃他们过去民主主义的政治态度,象库维拉和普恩特的情况一样。另一些人,象里卡多·阿拉尔孔(甚至作为1958年大学里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协调员),是向来赞成同共产党人合作的。^①到了1959年,这些人都通过政治压力在大学生联合会里取得了自己的地位,但是,即使如此,库维拉在大学生联合会主席的选举中打败对方候选人佩德罗·路易斯·博伊特尔时也只有微弱的多数(那次选举中用了恐吓手段)。同样地,阿拉尔孔能继任法律系学生会主席,完全由于他的主要对手安帕罗·维多利亚被“提升”到驻荷兰大使馆秘书的缘故,

这座大学由于在土木工程系教授中经过精心准备的一项事件而终于被打乱了。水力学教授和另一位教师被一伙菲德尔主义派学生十分不公道地指责为违犯考试程序。教授委员会拒绝开除这两个人。可是学生接着就提名两个工程师来接替他们,其中一个为格瓦拉的妻弟。大学委员会支持教授委员会。1960年7月15日,学生(不过,没有疑问,只是全体学生中的少数)和一些教师召开一次大会反对大学委员会,并“指派”一个新的管理委员会来管理大学:教授四人和学生四人。这个委员会接着就解散大学委员会和教授委员会。

^① 福斯托·马索(对德雷珀说的),他又说阿拉尔孔被格瓦拉利用,作为在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内部的一个“矛头”。

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到大学来实现这些要求；象波特尔·比拉这些教授，看到事态如此发展，很快就设法离开这个国家。大学里有三分之二的教师因不承认新的管理委员会，都被解聘。法律系教授米罗·卡多纳博士（前总理，名义上仍然是大使）向多尔蒂科斯总统提出抗议，可是没有效果。大学校长克莱门特·因克兰，一个多年的机会主义者，几个月后就由胡安·马里内略所接替，此人曾任古巴共产党主席多年，是著名的左派诗人和文学家，不过似乎是一种装饰门面的人物。8月4日，政府批准管理委员会为决策机构，并同意成立一个学校改革委员会，掌管改革课程、行政手续以及学校的各项政策。

这所古老的大学失去自由的情况是可悲的。不过，以往那些自由也常常流于放纵，它的制度组织受政治关系和帮会战术的腐蚀极深，单纯的改革决不可能改变根本的不平衡。大学生联合会所受的政治束缚，和它一直为学生所把持的小组委员会，以及许多教师的腐败和无能，已经使大学的声名狼藉。象新闻界和工会一样，这座自由堡垒常常是失修的。说来令人痛心，这个大学经过激烈革命后象库维拉这些学生新领袖，坐着大汽车四处跑，过着舒服的生活，给他们曾在里面起过重要作用的艰苦革命也带来了耻辱。新的管理委员会开始在上世界上搜罗人才来替代那些被解聘的学者，同时还承认教育暂时将会受到损失。在此期间，其他一些政治自由的保障也日渐消失。例如，到了7月5日，一批左派律师，有的穿着民兵制服，进入哈瓦那律师协会会所，占领了它的办公

室。

6月中旬，三家石油公司终于答复说，它们不愿加工苏联原油，因为这样做会损害委内瑞拉的利益。古巴人的要求是根据1938年的一项法案，其中规定外国炼油厂须加工古巴的原油——公司将其解释为从古巴土地中采出的油。美国财政部长似乎曾力促这几家公司拒绝加工，尽管公司本身勉强同意。

古巴政府延迟了几天才答复。没有疑问，这种形势需要同莫斯科紧急磋商。劳尔·卡斯特罗前往布拉格，大概是讨论军火问题。哈瓦那一希尔顿旅馆和国民旅馆已被政府接管。尼科·贝亚顿和马埃斯特腊山区他一帮里的其他人被捉住枪毙。两名美国外交官作为反革命分子被驱逐出境。美国政策明确地改变了。“耐心和克制”已被公开放弃。中央情报局在古巴西南四百哩的天鹅岛上建造一座五十瓩无线电台，专用于加勒比海地区，首先攻击特鲁希略（教会已经反对这个“施主”，他那邪恶的政权将临末日了），然后攻击卡斯特罗。6月22日，国务卿赫脱在参议院请求通过一项法案，授权艾森豪威尔削减食糖定额。此项法案本月初提出后，一直搁在那里，未予处理。赫脱说，“这是一个适当的时候，美国应该设法多找一些供给的来源，减少国内消费者依赖古巴的食糖。”这个方针的改变是违反邦斯尔大使的意见的，他尽管在哈瓦那处境无比困难，仍然认为美国“应该把我们的克制政策再继续一个时期”。^①

^① 写给施莱辛格的信，第2页。

6月25日，卡斯特罗作出反应了。赫脱的行动证实了他所说的一切。这是宣布一场经济战。由于美国的政策，古巴必须准备吃苦若干月，甚至若干年。古巴即使缺乏必需品也不会饿死，没有疑问，还会发生武装进攻。然而，定额每削减一次，古巴政府将没收一所美国糖厂。

这些交锋立即带来的后果是，世界市场的糖价跌到每磅2.85美分，因为担心过多的古巴糖会以低价在市场上倾销。卡斯特罗连忙把食糖的售价定为每磅三美分，世界市场价格好不容易地才升高一厘，涨到2.95美分。6月28日，美国众议院农业委员会，在一次短促的、连一些要求不高的成员也认为不满意的讨论以后，一致同意一项关于食糖定额的法案，使艾森豪威尔得以减少1960年的定额或者全部取消。同一天，卡斯特罗签署一项命令，圣地亚哥的炼油厂必须提炼苏联原油，否则应予征用。6月29日，古巴石油官员带着两船苏联原油来到圣地亚哥的德士古公司。公司的美国负责人已经离去。他们早已知道会有这一着。6月30日，美孚和壳牌油公司在哈瓦那的炼油厂被接管。美国参议院又是简直没有经过讨论于7月3日通过了上述法案。

艾森豪威尔迟延了一个星期才在食糖法案上签字。国务院主张，不必削减定额本身，而应该取消优待价，让古巴今后和其他生产者完全处于同等的地位，没有补贴。驻古巴大使邦斯尔仍然希望小量削减，可是艾森豪威尔决定彻底干。7月6日，他把对古巴的定额减去七十万吨——这是1960年定额中剩下的未完成的一小部分，此外又砍掉了十五万六千吨，这是古巴本来可能运到美国

以抵补其他国家短交之数的。艾森豪威尔在签字时说，“这一行动等于对卡斯特罗实行经济制裁。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其他手段了——经济的、外交的、战略的。”^①

卡斯特罗指责美国经济侵略，并第一次宣布即将发武器给民兵：大概劳尔·卡斯特罗已经同捷克斯洛伐克达成协议。7月9日，古巴国内六百多家美资公司奉到命令，要他们提出负责的报告书，列出当时库存的原料、零件、文件档案等等。这显然是对美国财产实行完全国有化的先兆。也许不是马上接管，因为缺乏技术人员来经营管理，而不是为了任何别的原因，也许因为他们主要还要靠从北美输入原料。也可能是共产党试图使卡斯特罗缓和一些。同一天，赫鲁晓夫公开宣称，“炮兵”能保卫古巴，必要时可用火箭。^②苏联还准备承受美国拒绝的七十万吨糖。赫鲁晓夫又说，门罗主义已死了，“对于任何已死的东西只能把它埋掉，使它不会毒害空气。”格瓦拉心安理得地说，古巴现在得到“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强国”的保卫；核武器使帝国主义无可奈何。在越来越厉害的指责与反指责、挑衅与反击的高潮中，双方都看不出将来如何了结。阿根廷总统弗朗迪西，再一次试图调解，未能成功。这些事态的真正意义是如果古巴共产党过去认为可能会把美国刺激得采用1956年匈牙利那种军事干

① 艾森豪威尔书，第535页。1960年的全部定额是三百一十一万九千六百五十五吨，其中三分之二以上已经完成。

② “从一种象征的意义说来，如有必要，苏联军事力量是会以火箭武器支持古巴人民的”。卡斯特罗在医院病床上通过电视评论这一事态发展时说，火箭是真实的不是象征性的，还坚持地说，苏联的这种支持是“完全自发的”。参阅赫鲁晓夫1960年11月间对卡洛斯·弗兰基的谈话（见下文）。

涉,那么现在必须放弃这种想法了。俄国好象还提供一种保证;因此共产党没有其他办法,只有试作努力,使现在被许多任意采取的措施搞得非常混乱的古巴经济能恢复秩序和稳定。

古巴政府现在打算使它的农业多样化,以便在很短时期内——可能是采取迪蒙教授的意见——使古巴不必依赖糖业。但这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做到的。同时,以前运到美国的大量食糖必须出售。单是为了这个原因,古巴也想转向俄国。而且,这时,卡斯特罗似乎已经肯定地认为自由就是意味着选择共产主义的自由(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或者至少是有同苏联集团保持密切关系的自由;^①在政府作出这些决定时,一些老同志,诸如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全国协调员马塞洛·费尔南德斯和交通部长奥尔图斯基(他给了萨特非常深刻的印象)都离开了政府。新路线需要新人。^②

既经决定摆脱食糖定额,古巴的问题就是怎样从美国的废除定额中取得最大的利益了。因此最好这种废除是单方面的,象是一种侵略行为。艾森豪威尔和赫脱完全满足了这些需要。废除定额使国际上对卡斯特罗寄以很大的同情。在以后许多年中,消息不灵通的但是好心好意的自由主义人士为卡斯特的古巴共产主义化辩

^① 艾伯特和珀尔·沃尔斯台特尔认为,卡斯特罗对美国的动机可以用他对他父亲那种同样矛盾的关系来解释,这种说法虽说离题较远却似乎相当机敏。

^② 费尔南德斯和奥尔图斯基都仍然留在古巴,继续是卡斯特罗政府的出色的忠仆,虽然两人都同保安警察有过一些麻烦,奥尔图斯基甚至在监狱里度过一个时期。

解,认为这是对艾森豪威尔的食糖政策的答复。可是那种政策使卡斯特罗可以用一系列的反措施来回敬,尽管这些反措施当时也许不会发生(或者完全可能绝不会发生),并且无论如何一定会比较难以解说——甚至对古巴人。这些反措施使得所有的美国企业和大多数古巴人的私营大企业在几个月内都消失了,从而失去了今后对反对派给予任何支持的机会。因此,显然只是出自卡斯特罗自己的倡议,而且大概也不符合他的追随者和共产党人两方面的意愿和预料,以前只是遭受“干涉”的古巴电话公司、古巴电气公司、炼油厂、和所有的制糖厂,都于8月6日被正式征用了。

没有疑问,这些以及其他的一些征用进行得太快了,在经济上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功。俄国的生产在二十年代初期曾降低,部分由于轻率的国有化以及技术人员的离开;中国接受了这一教训,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中以较慢的步伐前进。中国革命七年后,三分之一的工业,三分之二的商业和大部分农业依然在私人手里。结果中国的生产在革命初期有所增长。古巴没有接受这种教训。甚至有些愿意同政府合作的企业也被接管。假如延迟到确实能够有效地承担新责任时再进行干涉,那一定比较明智的。

古巴共产党的成员当时曾明白地提出这些观点。布拉斯·罗加立刻解说“不属于帝国主义的私营企业……仍然是需要的”,还说,有些干涉“是可以避免的”。^① 埃斯

^① 布拉斯·罗加的报告(英文版),人民社会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61年),第105页。

卡兰特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主张革命应设法把民族资产阶级留“在革命阵营以内”。然而，当时卡斯特罗似乎没有同这些即使年龄较大却是通情达理的共产党人保持密切联系。

1960年仲夏，有许多重新阐明古巴事态的说法：失掉胳膊的工会工作者奥东·阿尔瓦雷斯·德拉坎帕在北京对他的听众说，“古巴革命和中国革命有许多相同之处；”工会本身，作为革命理论学习的一个机关，已经有了一种“革命的哲学”。^①现在古巴已在1960年中卖给共产主义国家二百五十万吨以上的糖，卖给美国的只是二百万吨略多一点。8月中，说话粗鲁的格瓦拉，在拉丁美洲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这次会议的使命是团结拉美青年反对美帝国主义）说：“如果有人问我，我们的革命是不是共产主义的，我要把它解释为马克思主义的。我们的革命已经用它自己的方法发现了马克思所指出的道路。”最近已经同中国签订一项商务与技术协定。中国歌舞团以及格鲁吉亚芭蕾舞团都作了正式访问。8月间，古巴共产党的重要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至少象是给予革命政府以全面的支持，虽然布拉斯·罗加花了不少时间斥责他所谓“左的”立场，认为这是一种比帝国主义还大的危险。可是他似乎已经完全转变到他的副手卡洛斯·拉菲尔·罗德里格斯博士所持的态度，因为他在对大会的报告中完全支持卡斯特罗，认为他是“最大团结”的领袖和保证

^① 古巴同中国(作为和苏联的对立面)的关系，在本书第四十章中另有探讨。阿尔瓦雷斯·德拉坎帕于1964年背离古巴。

人。《波希米亚》周刊的主编米格尔·安赫尔·克维多，过去是卡斯特罗的拥护者，6月间发表文章谴责匈牙利、斯大林主义和西伯利亚的集中营，现在却在寻找地方避难，停办他的月刊，他说：

骗局已经败露。这不是二万多古巴人为它牺牲的那种革命。为了进行一种纯粹的民族革命，不必使我国同胞降成可恨的苏联臣民。为了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不必建立一种把人贬低到象国家的地位一样的制度……这是一场被出卖了的革命。^①

跟着他一起流亡的有《公告》周刊的主编安东尼奥·奥尔特加。同时出走的还有几个官员，包括前总理米罗。

可是，如果古巴社会是沿着有节制的和社会主义的路线被改造的，卡斯特罗仍然是一个领袖。他是拉丁美洲一个熟悉的人物，但也是怪僻的人物，他仍然不能安定下来，好象在逃走中一样，仍然是一个起义者，仍然穿着丛林的绿制服。很多事都靠他。7月初他病了一个时期，患肠道感染，兼在一边肺里生肋膜炎的并发症。可是，到7月26日，他就很健康了，可以同也许不足一百万其他的人一起“重新把国家献给革命的目标”。他又在这时候把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寄宿学校献给马埃斯特腊山区农民子女，他们居住的地方太分散，不可能上一般走读的日校。比利时和捷克的步枪正在买来武装新的民兵，其人

^① 他1969年在加拉加斯自杀，在遗书上把他的死归咎于革命。

数，据他说，已有二十万。^①可是他的主要诺言是使古巴成为“一个榜样，把安第斯山脉变成本半球的马埃斯特腊山”。

这些雷鸣般的呼声每天在华盛顿受到注意。同样受到注意的是做进口生意的商人现在几乎完全消失；在农村地区自由企业差不多已经绝迹，因为“人民商店”售价低廉，又可以通融赊欠。上层阶级的所得税已经增加，现在有了严格得多的规章以防止偷漏。同时，美国银行拒绝兑换比索，黑市兑换每一比索只给美元六角。7月中旬，成立一个“加勒比海地区救济委员会”，帮助接受古巴难民进入美国（实际上也接受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难民，虽然他们的人数少得多）。

8月中旬，根据古巴和美国两国的提议，在哥斯达黎加的圣约瑟召开了美洲国家组织各国外交部长特别会议，克里斯琴·赫脱（他已继任杜勒斯的职位）企图说服会议谴责古巴危害本半球。许多南美的代表不敢同意，这倒不是出于他们的良心，而大半是由于他们知道卡斯特罗在他们自己国家的群众中很有威望。古巴代表由于必须将左轮枪存放在更衣室里而大为恼火。最后选出一个委员会在古巴和美国之间进行调解，但古巴代表团已经正式退出会议。在哈瓦那，卡斯特罗可以预料地斥责美洲国家组织为美国雇用的组织，并对艾森豪威尔总统最近提出的援助拉美的六亿美元计划^②表示蔑视。可是，艾森豪威尔的提议倒是一个不知怎样是好的总统所提出的

① 《革命报》，1960年7月27日。

② 其中一亿美元指定用于救济智利的地震灾害。

老老实实的计划，他说：“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无限地支持那些不肯进行土地和社会改革的政府。我们需要能找到病根的新政策。”^①然而，结果圣约瑟会议的发展使美国大失所望：通过一项决议谴责非美洲国家在美洲的一切干涉，并宣告极权主义国家同本大陆制度不相调和。可是，国务院原来希望的对卡斯特罗和古巴的谴责，却一点也没有提到。

古巴和美国的联系逐渐越来越少了。现在甚至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用美国借出的钱来购买古巴糖。企业界的谋士们正忙于计划安排国外的信用条件，以便限制古巴输入零件。一些公司预先设法把他们在古巴的损失作为亏损记帐，为捐税问题作好准备。美孚油公司试图使油船船主拒绝载运苏联油到古巴。参议院对给予古巴军事援助或者甚至经济援助的任何国家，削减其共同安全拨款。

1960年最初五个月中，古巴从美国的输入因此比1959年减少30%，并且显然下半年的贸易格局将完全改变。同时，国务院在小心地调开那些在美古关系比较缓和时期负责古巴工作的人员：鲁伯特姆因此于7月30日离开华盛顿，就任驻阿根廷大使；托马斯·曼，一个保守的得克萨斯人，继任管理美洲各国事务的助理国务卿。^②在危地马拉的训练继续进行，虽然规模尚小。以前拥护卡斯特罗的人同以前巴蒂斯塔的军官之间的仇恨郁积难

① 艾森豪威尔书，第537页。

② 托马斯·曼(1912生)，当过律师，1952年起曾任驻墨西哥代表团副团长。

消。在迈阿密也有争吵。被中央情报局选拔为军事指挥的曼努埃尔·阿蒂梅不孚众望。同时，在海的另一边有几百名拉美学生在所谓第一次拉丁美洲青年代表大会以后留在古巴，以便不仅学习农业技术而且也学习游击战和革命活动。美洲的各种队伍正在加强团结。

8月间，一封新的“教书”——这一次由红衣主教阿特亚加和所有其他的古巴主教签名——正式斥责古巴政府。主教迪亚斯对总统的秘书说，除非有防止暴动的保证，教会将要关闭；多尔蒂科斯“不顾种种挑衅”给予保证。卡斯特罗对教会的“有组织的挑衅”，反应比较严厉，他说，“凡是责备我们这种革命的人，就是背弃基督，并且将会再一次把基督钉上十字架。”在8月的第三周中，天主教青年联盟的成员六人和一个西班牙耶稣会会员曼努亚尔·德博亚教士，在一阵枪战后被擒，枪战中有两名警察被打死，教士受伤。德博亚被控搞地下反对派小组织。终于，天主教青年联盟的成员二千人在圣地亚哥的拉萨尔学院（卡斯特罗兄弟俩曾在该院读书）集会，热烈拥护“教书”，高呼“要古巴，不要共产主义”。

这样，卡斯特罗似乎再一次置身于麻烦之中。9月2日，在一次非常成功的演说中，他用他的新的“哈瓦那宣言”回答了美洲国家组织的“圣约瑟宣言”。古巴将接受苏联提供的火箭以击退美国侵略。古巴将承认共产党中国。他问道，“我们干了什么事以至于应该忍受圣约瑟宣言？”回答是，“我们的人民所做的不过是打破他们锁链。”他又对拉丁美洲的苦难的人们发出响亮的号召，要他们也摔掉他们的锁链。这一宣言据说得到了古巴人民

的全国大会批准——这就是说，得到广场上广大群众的批准。9月5日，经济部长博蒂代表古巴出席美洲国家组织的二十一人委员会，抨击艾森豪威尔的援助计划：至少需要三百亿美元，象卡斯特罗1959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说过的那样。古巴决不签署圣约瑟宣言，今后将同美国对拉丁美洲的一切援助计划脱离关系。最后，9月18日，卡斯特罗带着大批随行人员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

卡斯特罗这回的第二次访问美国同第一次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次没有欢呼。充其量是一片沉默，最坏的是有表示敌意的游行和不时发生吵闹，在一次吵闹中一个九岁的女孩子被打死。关于这一行古巴人该住在哪里曾发生过不足道的争执；代表团到达纽约东边的谢尔本旅馆以后，因为那里价钱太贵就匆匆离去，跑到哈莱姆区的特里萨旅馆。卡斯特罗大部分时间避不露面，只到联合国去了两次，其中一次是在苏联代表团那里作客。他在联合国的发言历时四个半小时（二十六分），是联合国里空前的最长的发言。他讲得很好，同平常一样地雄辩滔滔，富于表情，可是未能得到美国报界的重视，他们认为内容荒谬，尽是一片谎言。可是，因为这时正是赫鲁晓夫公开吵架和敲桌子的时候，苏联的朋友讲话不可能指望人们会好好地听——尽管应该按照赫鲁晓夫要在俄国夺权的意思来解释他的动机。卡斯特罗9月28日动身回古巴，乘的是一架匆促借来的苏联客机，因为当时他自己的飞机已被扣留（根据迈阿密法院因古巴债务发出了拘票）。他把代表团半数以上的人员留下。此行没有达到任何目

的。

卡斯特罗在纽约时，古巴已经开始对美国的总统选举发生影响。民主党参议员肯尼迪开始把这问题说成好象又是共和党的一次失败。他有一次同他的属员们谈起这个问题说，“好吧，可是假如我们掌了权，我们又会怎样挽救古巴呢？”接着他又说，“究竟是什么道理，他们从来不对我们说，他们是怎样挽救了中国的？”^①有了这种心理，他当然要时常利用这个问题。因此在9月23日（卡斯特罗还在纽约）肯尼迪说，在巴蒂斯塔政权的最后几年中他对待古巴的方法一定会大不相同，“可是现在我必须明确我们的意图……要实行门罗主义……不到古巴恢复民主政治，我们不会满足。流亡中的以及古巴山区的为自由而斗争的力量应该给予支持。”尼克松（他当然知道对流亡分子的训练已在进行）也不可能说得这样激烈：“我们必须认识到，对卡斯特的威胁没有很快的或者容易的解决方法；”可是，“给予机会和时间，古巴人民一定会找到他们自己恢复自由的道路。”

就在这个时刻，恰巧中央情报局寻求这种机会的努力正在碰到麻烦：他们现在发现他们所建立的那个政治阵线结果很糟，他们想另找一个唯一的领导人。理查德·比斯尔已经发觉古巴人是“难以改正的，完全不能形成一个有唯一的一个领袖的阵线”。中央情报局建立的一个领导人桑切斯·阿朗戈，显然是一个难与共事的人，辞职时却指责中央情报局从事于“无休无止的高压手

^① 施莱辛格书，第202页。

段和阻碍刁难”。^① 胡斯托·卡里略9月30日退出阵线，理由是“最奸险的势力支配一切”。^②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以前的巴蒂斯塔分子在内部得到支持。“托尼”·巴罗纳充当流亡分子的正式协调员，阿蒂梅仍然是军事负责人(虽然留在迈阿密)。

哈瓦那的美国大使馆成为一座越来越阴郁而冷落的建筑物，它劝告所有的美侨尽快离开古巴。卡斯特罗对于反对派给他的麻烦毫不介意。10月间大约有一千人聚集在埃斯卡布拉伊山区谋反，现在秘密支持他们的有卡斯特罗的老朋友北美人摩根少校以及其他一些在对巴蒂斯塔的战争中曾在这个地区作战的人。强大的民兵队伍在卡斯特罗亲自指挥下已经开进山麓，本地区的农民被有计划地撤退，防止他们对谋反者供给粮食。在哈瓦那以及其他城市，拉伊的人民革命运动也开始活跃起来。

埃斯卡布拉伊的战斗一时似乎形势不妙，持续的时期比预料的短。谋反者被断绝粮食，冒险出来打小仗，有几个头头(以前的学生或者起义军)被打死或者处决了。摩根和另一个少校(革命指导委员会的赫苏斯·卡雷拉斯)被擒(几个月后被处决)。有些俘虏被判处二十年或者三十年的监禁。对卡斯特罗的这场重要的挑战显然没有得到中央情报局多大帮助，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打游击战的人靠不住。

10月6日，肯尼迪在辛辛那提明确地指责艾森豪威尔在古巴造成“共产主义的第一个加勒比海基地”；政府

^① 备忘录，引自德雷珀书，第71页。

^② 卡里略写给米罗·卡多纳博士的信。

早就应该听史密斯和加德纳两位大使的话（他们在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的证词刚刚发表）。肯尼迪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任听卡斯特罗取得他为了胜利而需要的一切武器，一面又抨击政府对巴蒂斯塔的支持：“我们没有做任何工作以使古巴和拉丁美洲的人民相信我们要站在自由一边。”

也许是由于这些指责，艾森豪威尔于10月13日宣布，除了药品和一些食品以外，禁止一切美国对古巴的输出。商业部长马勒多嘴地说，“如果这下子把他们推到跟共产主义集团去做买卖，那就太糟了。归根到底，最近弄得很被动的是我们。”

古巴的反应很快。在10月14到15日这一周末中，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在努涅斯·希门尼斯上尉的率领下接收了在古巴的大规模私营企业三百八十二家，包括所有的银行（除了两家加拿大银行）、所有剩下的私营糖厂、十八家蒸馏厂、六十一家纺织厂、十六家米厂、十一家电影院和十三家大商店。接着又实行一项第二次“城市改革”法，规定一个人只能有一所住宅。租用产业的承租人成为国家的房客，若干年后就完全成为所有人，而原来的房东将得到赔偿，虽然每月决不会超过三百五十美元。^①10月25日，卡斯特罗又把一百六十六家美国企业收归国有。尼卡罗镍厂和伍尔沃斯公司；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和威斯汀豪斯通用电气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雷明顿·兰德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旅馆和保险公司。所有美

^① 建筑物的成本分若干年偿付给房东，按估定的价值，减去已经付过的房租。如有抵押关系，受押人债权的50%由新主人偿付，余数付给政府。

国国际资本的这些最足以夸耀的名称都被不声不响地而且差不多没有抗议地打倒了。10月29日，邦斯尔大使被召回“长期述职”。他从此没有回任，虽然美国大使馆仍存在哈瓦那直到1961年1月，当时卡斯特罗对古巴人说，在艾森豪威尔1月20日总统任满以前，美国将侵犯古巴；他下令总动员，并说明入侵的借口将是诬蔑古巴在它的领土上建造火箭发射台。他因此要求美国把大使馆工作人员减少到十八人。艾森豪威尔于是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10月15和25日两天，共产党都不太高兴，布拉斯·罗加和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在《今日报》上不作评论。毫无疑问，卡斯特罗没有同他们商量过。

还有一件事要叙述一下，因为它标志着古巴历史一个阶段的结束。1960年10月11日，国家银行行长切·格瓦拉召见糖大王胡利奥·洛沃，此人虽然对卡斯特罗失望已将近一年，仍然留在古巴。他悄悄地住在自己的种植园里，准备家属移居国外的计划。到此时为止，他的糖厂都在正常地生产，虽然他已经失去了土地。当格瓦拉召见他时，他以为格瓦拉要跟他商谈关于他建造加普里和里维拉两个旅馆时国家银行欠他一些钱的问题。可是，格瓦拉以其向来的率直态度对洛沃说，他和他的助手们已经非常仔细地审查过洛沃以往的帐目，没有发现任何不合规定的情况。因此洛沃一直被“留到最后”处理，可是现在轮到他了。格瓦拉说，“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不能容许你这个代表古巴的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的人物保持原状。”所以洛沃必须隐没或者同革命“结合”起来。洛沃指出，赫鲁晓夫肯定相信两种生产制度的和平共处以及

两者之间的和平竞赛。格瓦拉回答说，国与国之间可以那样，但在一个国家内则不可能如此。洛沃问他怎样能把自己同革命结合起来。格瓦拉在答复中提议洛沃应该担任革命政府领导下的古巴糖业的总经理，经营商业、农业和工业。格瓦拉又说，当然洛沃将失去他的产业，但政府可以让他享有他最喜爱的廷瓜罗厂的收益权。洛沃在过去一定会很喜欢这种职位可能给他的合理化和现代化的机会，他要求给他时间考虑。格瓦拉同意，洛沃约定在一星期内把他的答复告诉格瓦拉或者他的助手（因为格瓦拉不久就要动身去莫斯科）。洛沃回家，准备立刻逃走计划。他指示他的秘书从银行里把能提取的存款都提出来，埋在旧时哈瓦那他的办公室下面的秘密的旧走廊里。可是第二天他的房子就被查封看管起来。洛沃于10月13日动身往迈阿密，撇下了他的全部庞大的企业、他的豪华的宅邸、他的《希腊人》和其他极好的油画、以及他的一绺拿破仑的头发。

第二十八章

美国准备打仗

在1960年美国大选的最后几周中，有几天，古巴成为中心问题。10月18日，尼克松对迈阿密的听众说，古巴的新政权是一个不能容忍的肿瘤。他说，“忍耐不再是一种美德了。”他露骨地暗示，政府当时甚至在计划着几个步骤来消灭这种“经济的盗匪行为”。^① 10月20日，肯尼迪的幕僚发出一项关于加强古巴自由战士的挑战性的声明。尼克松感到恼火。他后来说，他本来了解在艾伦·杜勒斯一般汇报外交事务时肯尼迪已经知道了中央情报局的计划。可是他得到的消息显然不正确。尼克松假定肯尼迪在责备政府不做他实际上已知道他们在暗中所做的事。因此在他们两人的第四次电视竞选辩论中出现了关于古巴的有点古怪的讨论。尼克松因为要为他的秘密活动保密，指责肯尼迪“危险的不负责任”和危害美国在拉丁美洲所有的朋友。尼克松说，“我们怎么办？我们可以做象我们对危地马拉所做的事。那里有一个共产主义独裁者……危地马拉人民终于自己起来把他推翻了……”肯尼迪回答说，光是经济封锁力量太小，并且为时太晚。

^① 参阅尼克松：《六次危机》，第352—353页。

这种奇特的讨论引起了甚至更要奇特的结果。自由主义的社论称赞尼克松；右翼专栏作家，例如乔治·索科斯基则称赞肯尼迪讲话有西奥多·罗斯福的风格，比较接近于共和党的爱国的态度，不象艾森豪威尔政府那种模糊的国际主义的态度。这对肯尼迪后来的古巴政策会有影响。

然而，民主党方面也有各种不同意见，值得注意的是艾德莱·斯蒂文森的话，当时他正在北卡罗来纳州参加竞选。10月25日，他发表演说反对肯尼迪的立场，甚至抨击经济封锁，认为这样会使古巴进一步投靠苏联集团。他还打电话给肯尼迪，对肯尼迪的强硬路线表示关注。大概由于这些表示，肯尼迪暂时不谈古巴问题，明确地从他的最激烈的立场后退，这特别使《纽约时报》感到宽心。

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在古巴，大家相信入侵是不可避免的。卡斯特罗时刻谈到这个问题。可是没有人知道大概是什么样的入侵，尤其是什么规模。佛罗里达也同哈瓦那一样，几乎一无所知。迈阿密也许充满了古巴逃难者。路名和商店的招牌也许已经开始用西班牙语。可是只有很少的人有亲友真正在危地马拉受训，虽然自从卡斯特罗来了以后到1960年11月已经大约有六万人离开古巴，大多数搭乘定期班机，有些坐小船，其中差不多一半是没有证件的游览者——大概占古巴过去整个专门职业界的半数。

到现在还只有四、五百名古巴人在危地马拉受训练。可是秘密泄露了。10月30日，危地马拉报纸《时报》发表一篇由著名记者克莱门特·马罗金·罗哈斯写的第一

版社论,说明一场对古巴的入侵“正在积极进行中,不是由我们这个非常之穷和非常之乱的国家准备的,而是由美国在暗中准备的”。危地马拉外交部长否认这件事,但反对党要求调查。北美人读到危地马拉报纸的可能为数不多,但也有一些人读到,其中有著名的《西班牙美洲报导》月刊的主编罗纳德·希尔顿。他在11月份该刊上写了一篇社论,说明即使美国的舆论还不知道,卡斯特罗却已知道关于入侵的计划。

在危地马拉的训练的目的仍然按照埃斯坎布拉伊山区原有的活动方针组织一种游击运动。武器和一切供应将从外面空运进来支援游击队。艾森豪威尔在8月间已经指定拨款一千三百万美元用于此项计划。可是已经有人提出应放弃原议,改为实行入侵,由古巴人驾驶的美国飞机从空中掩护(象1954年在危地马拉那样)。这一重大的政策改变在11月初已经得到有关方面同意。因为支持现有的游击活动已经越来越困难;进出古巴的情报工作越来越复杂;尤其是古巴人很靠不住。这是“此项重要决策最大的一个原因”。显然这一决定未曾提交总统,他后来明确地说,他在任期间没有制定入侵的计划。^①实际上有过这样一个计划,可是因为正值大选,人们认为不值得告诉他。不管怎样,中央情报局的游击战教练离开了危地马拉,换来一些新教练,传授常规的进攻战术——有坦克、大炮和空军支持。只有大约六十名游击队

^① 艾森豪威尔在1962年说,“在我们有足够的兵力扩大活动以前,我们或多或少地想到游击式的行动……在我卸任以前,并没有拟定明确的战略或战术计划。”

员继续下去,在设在巴拿马的“反叛乱学校”里学习。准备在古巴作战的招募工作在比较得到支持的基础上在迈阿密开始。可是人们认为想象中的入侵仍然只需要最多一千人左右。^①

这是一个奇怪的决定。部分原因是,它假定进攻的力量只须登陆,就会有一支由心怀不满的人民组成的大军涌现在它的周围。1954年在危地马拉,中央情报局的飞机确实仅仅到达首都上空,阿本斯政权马上就冰消瓦解。中央情报局的思想深处肯定还念念不忘他们在危地马拉的成功,虽然他们也许应该从1956年英法在埃及的错误估计中吸取一些教训,并且应该了解古巴同危地马拉有三点明显的差异:第一,危地马拉的革命政权在人民中的威望始终没有达到卡斯特罗这样的程度;第二,卡斯特罗已经消灭了传统的军队,而阿本斯没有做到这一点;第三,古巴是个岛国,因此比危地马拉容易守卫。

比斯尔后来说,“入侵部队的特定目标是建立一个桥头堡……然后消灭卡斯特的空军〔就是说,从他们可能会夺得的一个小型机场起飞。可能建立一个政府,美国予以承认……我们不指望‘地下’起大作用〕。因此就难免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央情报局希望这个政府将从美国得到大量的和公开的援助。的确,对于这个只用八、九百人进攻古巴的计划,唯一的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这样会很快地使美国得到进行干涉的机会。

当然,还有其他的警报。11月间,刚在肯尼迪的大

^①, 招募的兵员每月薪饷最多可到四百美元,有妻室者另加一百七十五元,有子女者第一个五十元,其他的每人二十五元。

选胜利以后，危地马拉几乎发生叛乱，那里正是新叛乱者受着训练的地方。艾森豪威尔决定“如果危地马拉请求我们援助，我们就马上开进去”^①——显然这是1933年以来美国政府第一次明确决定要用自己的军队进行干涉。政府也怕古巴企图颠覆危地马拉或者尼加拉瓜政府，结果从海上和空中对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海岸进行了几个星期的巡逻。

1960年11月间，曼努埃尔·拉伊逃出古巴，撇下他的组织得很好的人民革命运动，并且由于从拉卡瓦尼亚监狱里大胆地救出几个和马托斯同时被判刑的军官而提高了它的斗志。拉伊在迈阿密的计划同他在古巴时一样：从古巴内部推翻卡斯特罗，并在政治上按照自由主义派在1959年的规划，继续做革命的改良工作。可是，中央情报局仍然不信任古巴的地下工作，比斯尔主要是因为古巴人的保密工作靠不住，“弗兰克·本德”则或许是因为他们怀有进步的愿望。毫无疑问，拉伊的错误是同美国发生任何关系。可是，麻烦的是，没有一个古巴谋反者肯承认这一点，就象十九世纪以来历次反抗政府的事件一样。实际上，甚至拉伊也开始觉得自己越来越指望中央情报局，虽然他还自命是迈阿密的流亡分子中的真正反对派。拉伊个人尽管勇敢和得人同情，也未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主要政治领袖。

11月17日^②，当选为总统的肯尼迪第一次听到艾伦·杜勒斯和比斯尔谈到关于入侵古巴的计划。肯尼迪

① 《从事和平》，第612页。

② 或者11月18日（参考施莱辛格书，第148, 210页）。

说他对“计划的规模和大胆感到惊讶”，^①也许是这样，因为它差不多完全反映了他曾要求过的东西，只是由于当时还在竞选中，也许没有十分认真对待它。11月29日，艾伦·杜勒斯对肯尼迪作了一次比较“详细的汇报”；^②这位当选总统注意地听，然后嘱咐杜勒斯推进此项工作。“反应是十分肯定的，”施莱辛格说，“所以杜勒斯把它作为一种加速进行的指示。”可是，同时，肯尼迪“从那时候起就有了重大的疑虑”。这样，肯尼迪，就象汉姆雷特那样，鼓励了他实际上不相信的东西，或许他已经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一方面是他在竞选中所鼓吹的政策，另一方面是他所认为的明智的做法——这是他任职期间时常使他不安的一种困境。12月6日，肯尼迪第一次同艾森豪威尔会晤，古巴问题虽然列入预定的议程，但似乎没有讨论入侵计划。肯尼迪直到就职的前一天1月19日为止未曾再见到艾森豪威尔，在这以前似乎也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在此期间，发生了不少事情。12月初，中央情报局的入侵计划被提交“负责特别行动的部际秘密委员会”，但显然没有得到正式批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些计划还一无所知。政府即将更动的这一事实也引起一定的混乱。尚需较长时期才能作出决定。

即将卸任的政府不愿意为他们不打算亲自去做的工作承担责任[比斯尔回忆]，即将上任的人则不愿意在他们看到文件

① 西奥多·索伦森：《肯尼迪》（伦敦，1965年），第295页。

② 施莱辛格书，第211页。

以前就作出决定。这不是可以随便决定的，因为古巴的局势越来越困难了。^①

12月10日，国务卿赫脱告诉驻哥斯达黎加大使威劳尔（他是1954年进攻危地马拉的策划者之一），“这个计划是否正确有很多疑问，时间应该怎样安排，还有怎样配合的各种问题。”威劳尔奉令进行调查研究。他和副国务卿托马斯·曼一起，相信这个计划……“不应该实行，除非实际上没有失败的可能”。^②同时，艾森豪威尔忙于各种政治问题的考虑；他要古巴流亡分子推出一个领袖，由美国承认为古巴的合法政府，要尽可能在肯尼迪就职以前将此事办妥。他又拨款一百万美元用于安置古巴难民（现在人数约为十万）。

这时，在危地马拉进行训练的消息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继《西班牙美洲报导》月刊之后，《民族》周刊、《洛杉矶新闻镜报》和《圣路易邮报》都先后讲到这个秘密营地。在迈阿密，所有的古巴人都知道招募中心在什么地方，特别是在圣诞节时，有一伙危地马拉的古巴人因进行招募工作来过以后。这些人跟“阵线”的那些政客搞得关系很坏，实际上“阵线”本身仍然在争吵。中央情报局仍然不愿意同拉伊集团来往。不让这个集团的几个人参加这支远征军，其中至少有一个10月间从拉卡瓦尼亚监狱里被救出来的马托斯部下的军官。招募工作抓在华金·圣希内斯的手里，此人是现在古巴狱中的革命复兴运动的

① 比斯尔对作者说的。

② 威劳尔对参议院说的，见《共产主义的威胁》，第873—875页。

头头的兄弟，何塞·米格尔·戈麦斯的秘书的侄儿；他似乎偏爱右派的应征者。他在招募中对于巴蒂斯塔分子也不很注意。结果所产生的敌对情况，到1月6日这些巴蒂斯塔分子开始被普遍知道的时候，就更加恶化了。那一天，《时代》周刊报道拉伊并没有拿到美国的经费，而巴罗纳领导的“阵线”则得到大量的接济——按月得十三万五千美元，必要时可得五十万。1月10日，《纽约时报》甚至发表了一幅危地马拉基地的地图。

艾森豪威尔决定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谣言促使卡斯特罗实行全面总动员，使他得以促进俄国人送来更多的武器。同时，危地马拉政府宣布那些营地是用于训练人员以备抵抗逼在眼前的古巴进攻。一群美国记者访问了阿莱霍斯咖啡种植园的基地。古巴飞行员由上级嘱咐他们怎样应付这次访问。在欧洲，这样一个关于政府的意图如果泄露出来，一定会引起很大的风波。在美国，要组织符合宪法的反对派是比较困难的。同样地，准备公开批评进攻卡斯特罗的人也很少。当然不能假定这些人中有肯尼迪在内。根据尼克松10月20日的电视谈话，甚至他也会被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战士。可是这时候，尼克松已有他自己的问题了。

在危地马拉的基地也有麻烦。有些从迈阿密新来的人被老的指挥官认为在搞阴谋。这些人辞职，从仍然是仅仅大约五百五十人中带了二百三十人和他们一起辞去。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头目对着这支小队伍大声疾呼地讲了一通，说服了大家（除掉四十个人）继续受训。把被认为难望改正的十二人拘禁在危地马拉北部的一个边远

地方。可是哗变正在酝酿之中。

肯尼迪就在这些情况下，于1月20日担任总统一职。两天后，艾伦·杜勒斯和兰尼兹尔将军（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代表新政府的成员——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和罗伯特·肯尼迪——审查入侵计划。这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本月早些时候“暗中怀疑”禁止美国参加是否得当之后，已经变为参与对古巴的计划了。然而，中央情报局的计划人员已经在看古巴南部的地图寻找登陆地点。1月26日，肯尼迪召开关于入侵问题的第一次会议：他“小心谨慎”。^①他让中央情报局继续它的准备工作，同时他自己则一心想着怎样详细阐明他在竞选演说中说过的开发拉丁美洲的一般计划——搞一个“进步同盟”。^②如果不是因为古巴问题，毫无疑问，这样的计划决不会得到任何支持。同时，古巴问题在二十五年来第一次重新掀起关于美国干涉的争论。2月初，在华盛顿开了一、两次会议，前政府负责此项计划的人员中至少有一位（威劳尔）被不客气地撤职了。可是没有做出任何其他更具体的事。阿蒂梅（从他在巴拿马的游击战训练中调出来的）、巴罗纳和安东尼奥·马塞奥访问了危地马拉，同那里的军官们发生各种争执，暂时平息纠纷回来。一次较大的招募运动开始了。在迈阿密的青年人跑到招基募地去，以免错过祖国历史上“一件大事”的机会。不是全都到危地马拉去。不是全都被录用。还要调查他们的政治活动和背景。有一些

① 施莱辛格书，第216页。

② 这个名词显然是由一位古巴自由主义派经济学家埃内斯托·贝当古和《华盛顿邮报》的卡尔·迈耶共同提出的。

人仍在学习游击战活动，因为还有关于牵制攻击的计划。有一组游击队员在路易斯安那州受训（有些人抱怨说他们要“正规战”）。

肯尼迪拿不定主意是否继续进行入侵。他的一位顾问施莱辛格主张不要这样干，理由很简单：这“会造成新政府的恶劣形象”。^①但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些头目竭力赞成干下去；艾伦·杜勒斯问，如果不把那些受训的古巴人送去打仗，对他们怎么办？难道没有一个“处理问题”吗？^②他们会郁郁不乐地回到迈阿密去抱怨，美国的威望就会减低；民主的事业也会受到损害。比斯尔同样地竭力鼓吹：队伍的士气很高，需要加以考验。肯尼迪同意“最简单的事也许是让那些古巴人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去：古巴”，对美国的风险最小。然而，不应该有美国的军事干涉。空中袭击风险太大。比斯尔提出的在特立尼达登陆的主张被肯尼迪否定了，认为太引人注目；中央情报局建议改为猪湾，参谋长们虽然同意，但还觉得特立尼达比较好。^③3月15日，肯尼迪指示中央情报局在假定实行入侵的基础上继续策划，但须使有关计划在预定开始执行以前的二十四小时内仍然可以取消。根据任何标准来看，这似乎是一种有点不顾一切的手段。现在似乎是肯尼迪被艾森豪威尔遗留下来的一些老资格的顾问

① 施莱辛格书，第218页。

② 杜勒斯似乎是3月11日第一次使用这个著名的词句（见施莱辛格书，第219页）。

③ 这是一种很有智谋的选择，因为它可以提供一个守卫得很好的滩头堡，在这里临时政府容易登陆。

说服了，准备干下去，虽然他个人是不赞成的。^①可是他自己去去年秋天提出的那些主张也使他心中不安。他怎么能抛弃他以前责备共和党不采取的一种政策呢？当然，对于同此项计划交织在一起的他的对苏联、对拉美和对欧洲的总政策有一些风险。可是肯尼迪似乎犯了古怪的错误，以为他这种同流亡分子的“私通”还可能瞒过他的“新娘”——美国舆论。

肯尼迪采取妥协办法，指示中央情报局把流亡组织弄得更自由主义一些。他们使曼努埃尔·拉伊的集团加入原有的“阵线”，借以实现这一点。3月18日，“阵线”从中央情报局提出的六人名单中选定米罗·卡多纳博士（卡斯特罗政权下的第一任总理，冬季从古巴来到迈阿密）当“古巴的临时总统”。流亡分子同美国的关系确实越来越象西班牙国王在主教选举问题上同罗马的关系一样了。3月22日，拉伊同他的老政敌巴罗纳签订协议，容许米罗成立一个“古巴革命委员会”，俟入侵成功后即为古巴的临时政府。这个政府将保留它在古巴的大多数成员。它应该尽量优先援助已经在古巴的战士。凡是在巴蒂斯塔手下担任过“负责职位的人，都不能参加新的古巴军队”。应于两星期内达成一项关于“处理大地主庄园的有效办法”的协议。

委员会只是原有的“阵线”加上拉伊。德罗勒-本德坚持阿蒂梅应该担任军事指挥。有名的流亡分子都出来支持这个委员会。根据比斯尔的说法，拉伊“急于要在3

^① “我开会后回家时总是认为只有两个人——我和总统——反对入侵的主张”，施莱辛格对作者说（1962年9月7日）。

月以后安定下来”。^① 施莱辛格回到华盛顿，准备了一份白皮书，证明卡斯特罗已经背叛革命。主题是，用肯尼迪的话来说，“我们不是反对古巴的革命，而是反对卡斯特罗把它转卖给共产党人。”^②

然而，现在以白宫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一方跟以中央情报局为另一方之间却存在着显著的不同看法。前者觉得后者是在指望入侵能得到古巴内部大规模起义的支持，后者想得较多的是“安齐奥^③的办法”。虽然中央情报局显然认为当时可以在古巴国内陆军中获得现役战士二千五百人，城市里获得两万人的拥护，而在这些人背后还有古巴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他们并没有特别努力于协调内部游击力量的行动。中央情报局的情报部门不知道计划中的入侵，该局未能支持他们自己在古巴活动的人员。^④ 原因依然是古巴人不真正靠得住。可是这种对古巴游击队缺乏信心的情况，显然没有告诉肯尼迪，他似乎尽量避免知道太多的细节，而且似乎越来越变得“总是更加怀疑”。施莱辛格把他的白皮书全文交给肯尼迪时，他问，“你认为这讨厌的入侵问题怎么样？”肯尼迪说，“愈少愈好。”^⑤

① 比斯尔告诉作者。

② 施莱辛格书，第 222 页。

③ 安齐奥，意大利中部一个小镇，1944 年 1 月，盟军在此登陆，迫使德军抽调兵力应战，盟军终于在同年五月攻入意大利首都罗马。——译者

④ 苏尔克和迈耶书，第 125 页，说古巴地下组织的“全国委员”大约在 4 月 12—15 日被偷偷地带出古巴（？经过关塔那摩），同米罗集团讨论后又送回来，带来两吨 C₄ 塑料炸药。

⑤ 施莱辛格书，第 233 页。

现在必须作出决定了：入侵计划是否继续下去？艾德莱·史蒂文森来到华盛顿。

看到新闻报道大表惊讶，明确地问〔肯尼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肯尼迪〕说我可以放心地说，无论在计划着什么，总不会有美国卷入的问题。我说这使我感到极大宽慰……我想当时我确实意识到肯尼迪思想上有很大程度的忧虑，不知他实际上在做的事是否正确。①

据史蒂文森说，稍后几天，“中央情报局的特蕾西·巴恩斯出来，在这里给我们讲关于〔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问题……他对我们保证说，这只是一个帮助流亡分子的问题，决不是美国作战。从事实发展来看，我想可以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老实的。”② 其他不如他忠实的人，或许会说得不这样客气。

史蒂文森所说的那些疑虑，参议员富布赖特在3月30日的一份备忘录里也讲到：让流亡分子推翻卡斯特罗，会受到广泛的谴责，认为是帝国主义的一个实例；如果事情不顺利，美国不可避免地会要使用自己的武装部队；他主张改取克制态度。他说：“卡斯特罗政权是肉里的一根刺……不是插在心窝里的一把匕首。”③ 3月31

① 史蒂文森对作者说的，1963年2月6日。

② 同上。我推测这是施莱辛格书（第245—246页）里所说的4月8日的会议，虽然史蒂文森对作者没有提到施莱辛格也出席。据施莱辛格说，史蒂文森后来说他不赞成这个计划，但要尽量理解它的道理。

③ 《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卡尔·迈耶编（1963年版），第194—205页。

日，助理国务卿切斯特·鲍尔斯，在一份给迪安·腊斯克的备忘录中，反对入侵计划。可是，也许运气不好，肯尼迪在棕榈滩度复活节，较多地受了流亡分子以及他的老朋友前大使厄尔·史密斯的影响。他回来时斗志增高。4月3日，施莱辛格的白皮书公布：“古巴目前的局势使西半球和各个美洲国家之间的体系面临严重的、紧急的挑衅……〔并〕给各个美洲国家的真正的和自主的革命带来明显的和眼前的危险。”4月4日，举行一次有决定性的会议。杜勒斯和比斯尔重复了他们那些人所共知的赞成采取行动的主张，并添上一些新的论据。要么就是现在打垮卡斯特罗，否则永远不干；如果美国迟延下去，卡斯特罗就会有苏联米格飞机和有训练的飞行员。^① 只须使远征队充分地“古巴化”，即使失败也没有多大关系。剩下未死的人可以很快地跑到埃斯坎布拉伊山里——但是显然没有人知道那些山距离滩头堡将近一百哩。杜勒斯曾说，他认为比1954年在危地马拉更容易成功。一个从危地马拉来的中央情报局信使报告说，那里的队伍士气很好。至于国务院，显然不信任这个计划的腊斯克，是不说有力量的话的。他的比较爽直的助理托马斯·曼说，他本来一开始就要反对这个计划，可是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就应该继续下去。麦克纳马拉赞成入侵；他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积极主张的影响。小伯利希望“把这

^① 这个观点，艾伦·杜勒斯在一次电视“记者招待会”中加以强调过。赖斯顿4月2日在《纽约时报》上说有一百到二百名古巴飞行员在捷克学习驾驶米格飞机，古巴空军增加这批力量之后，只有美国全面入侵才能赶走卡斯特罗。人们可以猜测这种说法来自中央情报局。

批人送进古巴，但不坚持产生什么大收获”，^① 不管这种说法是什么意思。只有富布赖特公开反对入侵。施莱辛格基本上也是反对的，但不敢讲话。几位参谋长、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都同意了，他“区区一个大学教授”怎样可以干涉呢？但事后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肯尼迪，并且后来在一份备忘录里也这样说了。肯尼迪还是决定继续干下去——显然假定这只是一种大渗透，而不是海陆并进的入侵。或许他也被他那些老顾问们唬住了——这是民主政治中政客和官僚的关系中常有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现象。

在此期间，古巴革命委员会正在准备返回哈瓦那，不过他们为了避开迈阿密的热狂而反动的态度而先到纽约。哈佛大学的两位学者约翰·普兰克博士和威廉·巴恩斯博士尽了他们的力量。施莱辛格试图说服古巴人，要他们了解美国不能以任何方式公然支持入侵。肯尼迪4月12日公开声明，美国决不介入一场古巴的冲突。中央情报局的头目是否认为如此呢，似乎不象；因为比斯尔还在竭力主张给予空中掩护，即使这样做也许会造成美国介入。后来，中央情报局不把他们的计划通知古巴革命委员会。米罗相信美国总有一天会介入。伯利叫米罗放心，美国将以武器支持入侵者，可是不能接济任何人力。米罗仍然将信将疑，虽然肯尼迪派人告诉他，如果他不同意美国不介入，就根本取消入侵。同时，一位美国海军上校在访问危地马拉以后，向肯尼迪提出一项特别报告说，谋反者意气扬扬，他也有同感。

^① 施莱辛格书，第228页。

危地马拉的气氛确实是充满一片信心。可是这至少一部分是由于军官们被说得相信美国将用各种方法支持他们,包括海空两方面的掩护。有几个中央情报局军官肯定了这一点。例如,一个美国上校明白地告诉巴罗纳,古巴人将得到充分的空中掩护;拉伊也获得同样的印象。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如果失败就逃往埃斯坎布拉伊山的计划。大家都假定中央情报局交给流亡分子使用的那十六架 B26 轰炸机足以消灭——他们所假定的——混乱而无能的古巴空军。在危地马拉的指挥官只有一个“大队”,可是他们显然误听人言,以为其他队伍会加入。他们以为他们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滩头堡,然后临时政府很快就会出面向美国和其他方面请求援助,如果需要的话。^①中央情报局的顾问们那么热中于入侵,以致他们鼓动古巴人即使华盛顿打消此议也要继续干。为了这样做,他们甚至将装模作样地把一些顾问拘禁起来,包括作战部头目“弗兰克”在内。^②在这种奇怪的情况下,“二五〇六大队”——以一个在训练中死于意外事故的队员的编号命名——的人被送到尼加拉瓜的波多卡贝萨斯。他们于4月14日由海路出发,尼加拉瓜的独裁者路易斯·索摩查亲临送行,他请他们把卡斯特罗的胡子给他带几根回来。同一百年前纳尔西索·洛佩斯的远征军一样,他们

① 毫无疑问,这是所以要选择吉隆和猪湾作为登陆地点的一个理由,因为有了空中优势,容易由少数人马防卫;在整个沼泽地带只有三条进路。

② 他的姓名显然是威廉·弗里曼。他的前任是威廉·麦夸林——据1961年4月间作证的一个流亡分子说(《吉隆滩,帝国主义的溃败》,文件资料集共四卷(1961年版),第四卷,《雇佣兵》,第333页)。

前去争取自由,可是在不伦不类的和暧昧的领导下,怒气冲冲的索摩查在码头上挥拳送别的形象,对他们说来,倒是一种适当的福神。

第二十九章

社会主义的古巴：I

恰巧象肯尼迪总统和那位自卑的“大学教授”施莱辛格这样热心的历史研究者一定知道的那样，卡斯特罗现在需要借以巩固他的政权的正是对付一场不成功的外来的进攻，它是受到美国的、即使是不彻底的支持的。法国和俄国的革命都是因为流亡分子的入侵而得到巩固。卡斯特罗，象法国大革命时的公安委员会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一样，担心入侵；卡斯特罗，象米罗·卡多纳（迈阿密的布伦瑞克大公）一样，简直不相信那位“胸无点墨的百万富翁”（他这样文雅地称呼肯尼迪）到了危急的时候，不会支援他的被保护者；但至少将有一种斗争，这场斗争一定会把古巴人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团结在政府的周围，抵抗那老朽的并且无疑是最后的敌人——北方的巨霸。在入侵的时候，古巴的革命政权正陷于全面的经济危机中，主要表现在工业和农业方面的一片混乱，卡斯特罗已经不得不同早先的夸口形成奇异的对照地承认“对于一个处于这样一场根本革命的开始阶段的国家说来，……如果认为生活标准能够立刻得到大大地提高，那是特别危险的”。^①

^① 《革命文献》，1961年3月11、26日。

可是卡斯特罗并不想为避免入侵的危险而作出任何让步。实际上，他在多次的演说中，有许多话使人看出他因为觉得事到临头、不得不干而感到如释重负：“巨大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爆发了，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激烈斗争爆发了……两种力量之间的决死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一次革命中，斗争是你死我活的。”而且“什么是革命？难道是什么和平的和宁静的过程吗？难道是玫瑰花铺成的道路吗？革命是一切历史事件中最复杂、最曲折的事件。”^①真正炮火的前景把卡斯特罗刺激得在1961年4月16日公开承认古巴是社会主义的：“这就是他们不能容许的——我们竟敢在这里……在他们的鼻子底下，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②一个月前，那位橄榄色皮肤的驻苏大使福雷·乔蒙在一次纪念他的老领袖埃切瓦雷亚（绝非共产主义者）逝世四周年的大会上，当着卡斯特罗的面，把革命领袖们都称为“我们共产党人”。在革命指导委员会成立的时候，乔蒙被大学里的共产党人习惯地称为流氓，他反过来则骂他们是“空头革命家”；同时他在埃斯坎布拉伊山时，却拒不同意格瓦拉所提出的他们应同托雷斯领导下的当地共产党人联合的建议。现在，毫无疑问的，由于投机，他竟然成为最热心的爱好共

^① 1961年1月4日的演说(《革命文献》，1961年第1期，第22和24页)。

^② 《吉隆滩：帝国主义的溃败》文件资料集，第1卷，第75页。这当然是一种经过深谋熟虑的说法：劳尔·卡斯特罗后来说(《革命报》，1961年7月24日)，这种说法意味着革命已经完成了它的民族解放的阶段，完成了它的反帝和反封建的农业阶段。

产党人的人了。^① 在这以前一个月，卡斯特罗在接见意大利共产党报纸《团结报》时，曾说古巴共产党是，

一直明确地宣称必须对社会关系的结构进行根本改革的唯一的政党。不错，开始的时候，共产党人不信任我和我们这些起义者。这种不信任是有道理的，是一种完全正确的立场……因为在山区里的时候，我们都还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成见和缺点，尽管也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后来我们走到一起了，我们彼此了解，开始合作。^②

甚至还在这以前的一个月，古巴工人联合会的宣传秘书阿吉莱拉（卡斯特罗所选中的在工会的工具，不过又是一个投机分子）就宣称：“现在可以无所畏惧、膝盖不抖、声音不颤、昂首挺胸地说，我们正在我们的国土上坚决地走向社会主义。”^③ 然而，卡斯特罗同他的共产党盟友的关系仍然十分暧昧，虽然七月二十六日的青年运动已经同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并了。卡斯特罗之所以作出一切主要的决定，^④ 大概是得到赫鲁晓夫对他个人的支持。人们根据后来的事实判断，不可避免地得出这种结论：卡

① 乔蒙在革命指导委员会里的一位老同志曼努埃尔·莱东怨恨地回忆说，1958年，乔蒙企图从哈瓦那的美国大使馆得到帮助；他说，乔蒙的反帝实在是“说得时髦动听”。

② 《团结报》，1961年2月1日。德雷珀指出，这种讲话标志着卡斯特罗在共产党人意识形态的纯洁面前开始了他自己的谦虚的时代。

③ 《革命报》，1960年11月7日。苏亚雷斯书，第115页，指出《今日报》未刊载这些话。

④ 指建立国营农场以代替合作社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参看迪蒙书，第57页。

斯特罗主要对利用共产党发生兴趣，简直就象巴蒂斯塔以前利用他们那样，是把它作为一种控制工人运动、管理他从私人手中夺得的全部经济事业的工具。

可是，12月间，卡斯特罗设立了一些灌输“革命知识”的学校，由他以前在大学里的共产党老朋友莱昂内尔·索托主持，“为一个统一的党训练干部”。^①索托是在现政权下获得重要职位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因此他一度很孤立。这些学校（各省共有十二所）开课九个月，学员来自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和共产党，也有一些来自革命指导委员会。他们用很简单的方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期于1961年4月间结束。全国性的学校设在内政部，在一所原来是耶稣会贝伦学院、现由该部接收的客厅里。这里下午三时开始上课，继续上到晚间十时半；布拉斯·罗加编写的《古巴社会主义的基础》是1961年通常使用的课本。“三点至五点，卡洛斯·罗德里格斯教授讲这本书。五点一刻，喝咖啡休息后，二十八人的大组分为四个研究小组。七点半，举行一般讨论；九点，罗德里格斯教授作最后发言”。

表面上，古巴现在似乎坚定地处于共产主义同盟的范围以内。1961年1月1日，哈瓦那举行一次游行，展出了苏联坦克和其他武器，不过还没有展出米格飞机。3月4日，卡斯特罗说，必要时，他可以拿出“大量的共产主

^① 《社会主义的古巴》杂志，1963年2月。从卡斯特罗1961年11月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显然知道这一活动的复杂性质，当时他解释“灌输不是一个好听的词儿……它使人认为是反复地把知识讲了无数遍，硬填进人们的头脑里”（《革命报》，1961年11月11日，第9版）。

义的武器来”保卫古巴；据美国估计，到了4月，已经有价值五千万美元的苏联武器运到了古巴。甚至在1960年年底以前，就已经有人知道利用在南美的一些古巴大使馆送钱给当地的共产党；1960年10月4日，驻利马的古巴大使路易斯·里卡多·阿隆索被发觉交了三万美元给各个秘鲁的共产党人。^① 据报道，在萨尔瓦多也发生了同样的事。秘鲁在12月里同古巴断绝关系。秘鲁和阿根廷的《拉丁新闻社》办事处都关闭。古巴11月中退出世界银行，并在设法收回它原有的股本。在此期间，中国的一位大使到达哈瓦那，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派来了代表。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大使馆已经成为孤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绿洲，在金盘子里吃剩的扁豆。在国际上，古巴已经更被看作为国际共产主义集团的一部分，甚至已不属于民族主义的中立世界。

古巴的领袖们认为自己正在对南美提供一种“催化剂”；在他们看来，安第斯山脉仍然是本大陆的马埃斯特腊山，一如卡斯特罗在1960年末说过的的那样。

但是，从古巴同共产主义世界一开始发生关系，卡斯特罗、布拉斯·罗加以及其他的人就不得不考虑这两个因素：一个是中苏争执的发展，一个是苏联不愿签订条约，明确地表示在古巴受到攻击时为它承担保卫的义务。古巴共产党试图在中苏争端中采取中立政策，因此该党自从世界工会联合会在北京开会和1960年6月间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问题变得尖锐的时候起，就不得不发表

^① 11月间，一些反共的古巴人冲进大使馆，发现了有关信件。阿隆索后来曾任驻英大使，1965年辞职，发表了一本反对革命的现实主义小说。

双方的每一个论点。这种中立态度很难保持下去，特别是因为在多年担任党总书记的布拉斯·罗加（正统派的代表）和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以及那些对卡斯特罗比较同情的青年党员之间，显然出现了分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一定不那么极端。相反地，虽然罗德里格斯本人在气质和习惯上是一个反斯大林主义者和头等的赫鲁晓夫主义者，但是，许多年轻的共产党员（象有些菲德尔主义者）却十分倾向于中国人。1960年中，有几个菲德尔主义者，象陆军总监威廉·加尔维斯访问了中国；代表古巴工人联合会的何塞·玛利亚·德拉阿吉莱拉和维森特·科尔德罗，在中苏第一次公开冲突期间正在北京。我们知道，德拉阿吉莱拉在1959年以前似乎是一个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基础的人物，可是古巴的工会工作者1960年7月间在北京却全面支持中国的立场。同月，中国同古巴签订一项商务和关税协定，9月间，古巴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重大事件，布拉斯·罗加和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都不大喜欢，尽管他们还有他们自己的分歧；因此在1960—1961年冬季，古中两国政府的关系比两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好得多。所以这个“国际棋局”，即使在铁幕的左边，也有其比较阴暗的时候。

然而，古巴共产党仍然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决定了它在1960年11月和12月中行动的总方针。人们可以回忆，布拉斯·罗加曾于4月间相当满意地访问了毛，可是，到了冬初，他和党内其他的人决定转向莫斯科，这一决定经过12月间莫斯科的共产党会议更成定局。这种转变差不多同格瓦拉在北京受到热情接待同时发生的（格

瓦拉早些时候在向布拉格进行了成功的商务远征之后，曾在莫斯科耽了几个星期，没有多大成就)。热情没有白费。在一次宴会上，格瓦拉说，“中国人民在落后的农村中斗争二十二年的伟大经验，已给美洲各国揭示了一条新的道路”。^① 周恩来在答词中热烈地谈到古巴的经验；11月底，古巴和中国达成一项协议，中国将于1961年购买食糖一百万吨并贷款六千万美元用于设备和技术援助。格瓦拉在离开中国时说：“一般说来，一点分歧也没有。”从此以后，中国只提到卡斯特罗，从来不提古巴共产党，^② 卡斯特罗有几年得到中国的支持，同时，通过共产党和苏联大使馆，也得到俄国的支持。

因为中国的赞许还不妨害俄国的赞许。12月中旬，一项新的、俄国—古巴协议也签订了。俄国1961年将购买食糖二百七十万吨，每磅四美分。古巴表示非常满意。俄国表示愿意保卫古巴“抵抗无端的侵略”，但不再提到导弹。假如不是因为中国，要使苏联在正式文件中做到这种程度，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此后经常有船从老汉萨同盟^③的共产主义商埠来到古巴，描写东欧风光的文章时常出现在古巴杂志上，例如现在的革命杂志《波希米亚》周刊、军队的杂志《绿橄榄树》、或者一些比较漂亮的报刊象《古巴》或《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之类。赫鲁晓夫

① 新华社，1960年11月18日，引自安德烈斯·苏亚雷斯书，第116页。

② 这是安德烈斯·苏亚雷斯的论点，见所著第117页。

③ 汉萨同盟：十三到十七世纪北欧各城市结成的政治商业同盟，以德意志北部城市为主，“汉萨”为中世纪德文，意为“会馆”或“公所”。——译者

又一次公开许诺在发生侵略时保卫古巴(可是他说他7月间提到的火箭是“象征性的”)。^①1月间,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青年一千人将在苏联研究农业合作事业。1961年春天,访问古巴的客人受到用花束的苏联式的欢迎。

古巴已经承认阿尔巴尼亚、匈牙利、蒙古和北越,来自这些国家的大使馆人员远涉重洋,热情洋溢地来到哈瓦那,他们出乎意料地发现这里的生活水平有点超出自己的希望。10月间,努涅斯·希门尼斯博士在阿尔及利亚对民族解放阵线以及对访问哈瓦那的塞古·杜尔保证了兄弟般的团结。

古巴保持了一些非共产主义的关系。虽然它已经退出世界银行,古巴自然还是国际糖业理事会的成员国,^②而且自然仍旧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古巴以食糖跟埃及交换大米。它还仍旧同加拿大保持商务往来,加拿大的保守党总理迪芬贝克直率地拒绝对古巴实行任何禁运。通过加拿大,古巴得到一些汽车零件、电气和工业设备的零件。加拿大的商人比美国的商人更容易抛弃意识形态的顾虑。加拿大不是美洲国家组织的成员,因此,被排除于美国希望通过它来行动的那个主要机构之外。作为报答,古巴对于(12月中被接管的)加拿大银行用现金而不用虚

① 卡洛斯·弗兰基(《革命报》的主编):“帝国主义者说,苏联政府关于万一古巴遭到武装侵略时可能使用火箭武器的说法完全是象征性的。你认为怎样?”赫鲁晓夫:“我希望这种说法真正是象征性的。”

② 12月中,国际糖业理事会的墨西哥会议推断,1961年可以供应世界市场的食糖将超过需要16%。早在11月,苏联实际上就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抛售古巴糖。

无的债券来赔偿。^① 在古巴仍然有非共产主义的“专家”。例如一些日本人正在那进不去的萨帕塔沼泽地里奋力生产大米,还有一家爱尔兰的公司已经签订了合同,在圣克拉腊建造一所黄麻工厂。

再则,1961年1月间,甚至似乎隐约出现有同美国恢复关系的可能。卡斯特罗和布拉斯·罗加都在讲话中暗示,肯尼迪总统在这方面也许比艾森豪威尔总统有所改进。1月21日,卡斯特罗说,“至于我们这方面,我们正在准备重新开始。”3月7日,他甚至提出“如果有一天美国又想向古巴买糖,那么,我们可以讨论……赔偿问题”。古巴人现在真想改善关系吗?完全可能。卡斯特罗至少已经洗除了他对美国的一些个人的和民族的愤恨。可是,就美国说来,要达成这种协议尚属渺茫,因为这种协议一定是双方兼顾的性质,从而终于导致美国承认古巴现政权,而且古巴革命的最讨厌的特征可能有所变更;另一方面,群集在迈阿密的争吵不休的流亡分子,以及古巴自己无可避免地要支持拉丁美洲似乎日益高涨的革命潮流,在这些情况下,即使美国准备忍受一个在他们隔邻的社会主义古巴的耻辱,如果出现达成协议的前景,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俄国对这一切情况是怎样看法还不清楚,也许甚至俄国人自己也不清楚。古巴的革命并不是苏联策划的。古巴的迅速发展大出俄国政府的意料之外。或许,象通过阿列克谢耶夫递交的赫鲁晓夫的信所说的那样,苏联仍然

^① 根据一项未经核实的资料,加拿大皇家银行竟能收回它的资本,不同于其他所有的银行。

愿意有一个中立的古巴，而不愿意古巴成为一个卫星国。可是古巴的事业已在俄国公众中引起了一定的热情。诗人和知识分子都认为古巴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斗争，这或许可以使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制度产生新的信心。现在必须援助、支持以及最终利用古巴。古巴代表一种赫鲁晓夫明确地赞成的事业，他一经承担义务，就不得不注意他同他的敌手的关系。因此苏联（和东欧集团）于1960年和1961年用很多船只装来援助物资，而且显然是不计成本的。很明显，古巴还可以作为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在南美的一个中心，同时作为一种宣传上的胜利，以之嘲弄美国（以及或许中国），以及也许还会产生某种军事上的好处。可是这方面的问题迄今似乎还没有人讨论过。

作为报答，俄国专家们给古巴人以勤快的印象，但是“他们的专门知识”往往似乎显得“平庸”。其中很多人“象哥萨克人那样地喝酒。”他们过着和外界隔离的生活，傍晚在海滩上打篮球，从来不谈政治，似乎是“一种阔气的、受监视的、勤快但是可怜的人”，远远不能很好地代表一种“充满了希望的将来”。古巴人觉得捷克专家较有人情味，可是他们人数较少。中国专家也很少，并且无法理解。

在这些国际友谊的同时，一些老的共产党领袖现在总是经常在公众中露面；他们虽然没有官方地位，却出席来宾迎送的场合以及对工人和其他团体发表演说。在工会的每次集会上都可以见到老劳工领袖拉萨罗·培尼亚，但是他除了被称为“创始人”而外，并没有明确的专职。在报纸上，共产党人只是被称为革命的领导人，这是

一种奉承的称号，然而没有其他人受到这样的宠遇。当然，这些人在卡斯特罗的亲信中通常不受欢迎。他们之中还没有人是内阁的成员；虽然他们在国家的一些部门中显然有些势力，他们对军队和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的控制却被夸大了。1961年1月以后，他们从来没有以一个政党身份对古巴的任何事件作过任何声明。

菲德尔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之间还潜伏着一种重大的敌对心理：因为该党在内战中方向不对，而且在内战中远非起着英勇的作用。甚至格瓦拉在对待共产党领导人上也带有几分蔑视。还潜伏着丑事：因为在革命指导委员会中，象乔蒙这些老领导人（尽管乔蒙自称为共产党员），仍然潜伏着1959年在温博尔特街出卖过四个学生那件不愉快的事。最近那个被认为叛徒的马科斯·阿曼多·罗德里格斯（青年共产党员）已在布拉格被捕并押回古巴；他在狱中被看管和讯问，但仍受到例如中央委员华金·奥尔多基和他的“女友”埃迪特·加西亚·布查卡（一度是他们的同志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的妻子）这些共产党人的保护。这时候，老的革命指导委员会成员已无法迫使共产党人采取任何行动来帮助他们追究这个敌人了，这种暗底里的牢骚预示着革命内部尚有种种麻烦。在此期间，从政府内部隐约地反对共产党人的唯一有力量的集团，似乎仍是纠合在卡洛斯·弗朗基和《革命报》周围的那些人，虽然弗朗基本人自1959年以来显然已经历了重大的思想变化。

然而，卡斯特罗和共产党人之间在意识形态上还没有共同之处。卡斯特罗的朋友中在这一方面走得最远的

是格瓦拉，他说古巴的革命者正在从政治的实践中发现马克思主义的规律：“我们这些实际的革命者发动我们的斗争，只是证实科学家马克思所预见的规律。”^①可是，格瓦拉在他同雷内·迪蒙的谈话中，还说过他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使工人们得到“一种责任的观念”，而不是财产的观念，而且格瓦拉已经批评苏联重新强调对努力工作者给以物质奖励了。他拒绝“古巴参加创造一个第二北美社会”。^②这样，格瓦拉甚至在革命还不满两年的时候，就已经重视人的可改造性，重视只有依靠对社会的忠诚。这自然使人想到，古巴准备从一开始就要着手克服一切社会主义国家以前所遇到的各种困难。菲德尔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这两派能够取得一致的地方是在反帝斗争方面，帝国主义被认为就是反革命；毕竟连拉伊和米罗·卡多纳这些所谓左翼的反革命分子现在也同中央情报局共命运了。对卡斯特罗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对共产党人来说，“古巴的民族斗争”现在主要只能根据对美国斗争这个词儿来理解。

在古巴人中，有一种类型，虽然无从捉摸，难以分析，却应该加以注意。这就是象路易斯·奥尔兰多·罗德里格斯（1959年曾任内政部长和《街道报》主编、格劳时代的体育总监和四十年代大学里的“帮会”领袖）、马塞洛·费尔南德斯（从前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全国协调委员）、何塞·佩隆和奥克塔维奥·洛伊特这些人，他们在1959年以前都被认为不仅是非共产主义者而且甚至是

① 《绿橄榄树》，1960年10月。

② 迪蒙书，第54页。

“激烈的反共分子”，他们现在留在古巴，没有同现政权决裂，并且确实继续在政府里起了一些小作用。所有这些情况各有不同之点；路易斯·奥尔兰多·罗德里格斯显然采取最便当的方法，向来也许有点浅薄，反共时髦的时候他反共，到亲共也有利的时候就亲共。^①其他一些人则是准备为任何人服务的官僚，特别是在工会运动方面。其他象马塞洛·费尔南德斯和福斯蒂诺·佩雷斯这些人，所处的地位也许最为有趣，这些严重的反共分子（尽管前者在大学时曾同共产主义有过眉来眼去），他们在1959或者1960年因为敌视旧古巴共产党而丢掉了工作。可是，他们仍留在古巴，不是由于受了卡斯特罗的迷惑，便是自以为权衡得失最好还是留下来，试图长期努力从内部来影响政府走向他们认为温和的路线，或者也许认为无论政府的实际措施被加上什么名称，它们总是正确的。还有其他象埃菲赫尼奥·阿梅赫拉斯或者胡安·阿尔梅达一些人，他们都知识有限，可是忠于卡斯特罗这个领袖，愿意在任何情况下跟他走到任何地方。有一些人还留在这里，则是因为他们的家属或朋友愿意留下来，或者因为他们本人非常熟悉和热爱这个岛国，不想仅仅为了政治原因就改换居住的地方。又有一些人，经过多年来从天主教转到正教会又转到加西亚·巴尔塞纳的或者转到奥雷利亚诺·桑切斯·阿朗戈的小行动团体以后，在卡斯特罗在古巴实行的这种共产主义中找到了一个意外安全的精神上的避风港；许多人已经那么经常地

^① 罗德里格斯于《街道报》1959—1960年复刊时在该报发表反共文章；报纸被封闭，他当上了驻委内瑞拉大使。

转换他们的政治立场,所以再转换一次(即使是从自由主义转到共产主义)也只是一种多余的变动,几乎和其他的种种变动同样是一种表面的作法。另一些人仍然相信卡斯特罗所选择的共产主义道路大概是脱离美国束缚的最后声明,即脱离那个发怒的自由主义的老子——近在咫尺的美国,代之以一个遥远的主子(不管他多么专制和胸襟狭隘),在很多古巴知识分子看来,这似乎是一种最有志气的行为;一旦卡斯特罗个人确立了他对古巴共产党的控制,他们现有的一切忧虑就可以获得解决了。

在军事组织方面,古巴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马托斯危机以后,政治领导的革命性和忠实性都有疑问的起义军已经日趋衰弱并经过改组。现在代之而起的是民兵,这支志愿军,共有男女十五万人左右,他们拥护革命,在日常工作之余,穿上制服拿起枪,每周值班大约八小时,守卫公共建筑物和其他的重要设施,防止反革命分子的袭击。这些业余军队1961年在古巴似乎到处都有,有时候显得莽撞和爱管闲事,常常在阳台里的摇椅上混时间,把装有子弹的步枪横搁在膝盖上:“我们古巴人是一个军队民族,”1961年7月间一个全副武装的十五岁的男孩子这样说:这说得对。即使在卡诺特的统治下,全国皆兵的幻想也不可能比这更强烈了。但是,在这些具有献身精神的枪手中,仍然有一种会使卡诺特或者托洛斯基感到烦恼的儿戏的以及装饰品的意味。或许这种民兵真正体现了回复到那种旧的民族主义的想法,认为建立正规军没有意义,因为任何人都能拿起一枝枪或者一把刀来保卫自己的权利了。民兵当然是由陆军组织的并由

陆军军官管理的，司令仍旧是那位年轻的罗赫略·阿塞维多上尉。各省民兵的头目往往也是军事情报工作(所谓G.2)的头目。

G.2现在是负责侦察反革命的主要组织，它的负责人仍然是卡斯特罗在“格拉玛号”和蒙卡达时期的老同事拉米罗·巴尔德斯。巴尔德斯(大概在俄国的指导下)组织了一支很得力的政治警察，虽然它还在初期阶段。说来有趣，他那些出色的助手都是一度被认为非共产主义的革命指导委员会的人。在1960—1961年的冬季中，一些在埃斯坎布拉伊山区被擒的反革命分子曾受到苦刑，把他们的头按在水里强逼招供，另有人被押上刑场用空弹射击。卡斯特罗根据他的一些老部下的反映制止了这种做法。但是，事实上，1960年以后古巴监狱里的情况，又同巴蒂斯塔或者马查多时代一样，非笔墨所能形容。

另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发展是民兵的一个民事部门，叫做“保卫革命委员会”，它把当地的公民组织起来，明白规定作为战斗性的情报员，以对付可能出现的反革命。委员会的指挥是一个不出名的何塞·马塔尔，一个在山区里没有亲自指挥经验的人，老警卫队里的一个青年共产党员。他们的活动扩大到调查那些忽然开始处理自己的家具的人。这会使人想到这些人已经决定抛弃古巴，而且由于禁止他们携带财物，所以他们想把这些东西交给亲友或者西方的外交人员保管，直到反革命成功或者永远保管下去。这种行为是非法的，因为惩罚外迁的一种办法是当事人除了随身一套衣服和少数小件物品(例

如一只戒指),应把所有的财物都献给国家。

这时,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已经吸收了咖啡、食糖和大米管理局以及工农业开发银行、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所有这些独立自主的旧经济机构。通过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国家确实控制了包括主要的制糖业在内的全国的主要资本设备。1961年的收获是第一次的人民的收获。当然,这次收获的是过去的苦难的日子播种的,糖厂还没有经过任何改组——虽然其中大多数已经改了新的名称,主要是以革命英雄或者国际革命传统的重要日期命名的。国际革命的纪念节日现在真是同教會的纪念日一样多。

收获是成功的,1961年4月初的数字表明总额将达到1959年以前任何一般好年成的产量。可是革命所表示的目标仍然是要使国家摆脱糖的束缚。摆脱这种束缚的工作已经开始了,以至于除非多种经营确实迅速成功,经济一定会退步,因为1960年不重新播种就意味着1963年糖的生产要减少。到了1961年春季,三万三千个农民已经成为土地的所有者,而这些土地都是他们以前作为占据公地者、分成交租制的佃户、或者一般佃户耕种的;这样“分配”了的土地大概不到一百万畝,其中将近一半在奥连特省。这解决了过去在这种租田方式下受苦的农民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涉及的土地数量不大;例如在奥连特被分配的也不过是农业土地的大约6%(根据1946年的估计)。单是胡利奥·洛沃一个人就拥有这么多的土地。但是,这些农民在过去所有的土地中只占

农业总面积的很小的百分比。对那些有关的农民来说，这还意味着一种革命，虽然不一定表现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上，但是却在他们对社会的看法以及他们同社会的关系上意味着革命。这就是说他们可以免于负债，免于过着非法的生活。农业合作社的数目有九百个左右，^①其中大约五百五十个种庄稼，少数只养牲畜，一百二十个既种庄稼又养牲畜。大多数是在五百亩和八百亩之间。它们的目的是要避免此项土地如果分散开了可能发生的经济损失。可是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从未颁发管理合作社的条例，它们的组织也不严密。另一方面，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也曾委派经理（常常是合作社社员），并要这些经理同委员会的地区负责人保持联系。合作社社员通常每天工作八小时，工资 2.50 美元，虽然还没有全国的标准。工资仍然采取预支的办法，最后的利润到年终结算，但这些利润 1959 和 1960 两年都没分配过。

1960 年年底时，这些合作社都快要垮了。这种制度似乎不公平：有些农场业务良好（例如森林合作社，因为木材的需求很大），有些很坏。不过，好坏决定于农场的财富多寡，而不是决定于劳动者的功过或者勤惰。对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可以随时增减的情况，这似乎显得多么公平，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却似乎不公道的。混乱情况也是难以置信的。帐目也没有管好。甚至一个同情的观察家也说：“一切为了自由。合作社中最有觉悟的农民要同无政府主义作斗争，可是个人的力量在群众

^① 1960 年 8 月间八百八十一一个。

中是不起作用的。最细小的问题往往也需要到哈瓦那去解决。”卡斯特罗也说到这种错误：“某些管理人员只有模糊的革命的概念……他们以为他们能给农民的东西越多，他们就越革命。”^①另一项缺点是一些很大的养猪和养鸡的农场，却让牲畜发生了传染病。卡斯特罗本人似乎特别憎恨马拉布（有刺的热带橡胶树，在南部象杂草一样生长），命令一大片一大片地清除掉，而不顾它在其他一些地方能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得更多。

1960年夏收以后，甘蔗合作社也成立了，到了1961年春天，已经有了六百所以上。社员十二万人，其中大多数以前是制糖厂里的全日农业工人。这些合作社的经营目的和其他的合作社一样（指望它们最后能在商业上自给自足），它们实际上同样属于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而且是较为正式地组织起来的。因此能够举行全体社员的大会，选举一个七人的理事会来协助经理（虽然他们通常并不急于要选举），经理本身由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委任。它们的财务是集中组织的，有地区总部、专门人员掌管的帐册、机器修理工场、等等。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通常设立一所人民商店，出售基本生活物品，价格较低，或许低于市价12%。由于废除了房租，这些工人（每天工资2.50美元，同其他合作社的工人一样）在许多方面比过去的生活好得多——只要有东西可买。可是有些时候，成立合作社显然不符合有关工人的愿望，他们更感兴趣的也许是得到较多的工资，而不是革命所需要的牺

^① 卡斯特的讲话，《革命报》，1961年11月11日，第6版。

牲。在1961年后期,卡斯特罗自己也抱怨说,马坦萨斯的小农民“厌恶合作社。他们不要听到人们提起合作社。他们一听到这个名称就害怕。”

然而,这些“假合作社”^①对于改善失业情况并没有多大的帮助,虽然在收获时还能雇用季节性的工人,并且将来也许会改为永久工,如果合作社能够多种经营的话。人们终于指望选举出经理来,全部利润可以拿出来分配(虽然在最初五年中,利润的五分之四应投资于学校、住房、筑路等等)。多种经营就是种植牧草、玉米、大米和其他作物,达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左右。牧草将用作新养牲畜的饲料。但是这些多种经营的土地(三十万噶)都是原来的甘蔗田,由于偶然不巧或者缺乏经验,很多良好的蔗田都被连根拔了(被卡斯特罗和其他一些人),而一些坏地则往往留作种甘蔗。使用这种上好的土地是以短期的措施为理由的,可以免去开垦新地的费用;但却给以后带来麻烦。而且一开始就没有作出重大努力,以争取从这些任意的行动中获得可能提供的有利的收益。没有采用新的科学栽培方法,没有在工业中合理安排农业生产。另一方面,这些措施自然可以使过去所有的大蔗农全部消灭,使将来有可能实现改进。

管理方面的错误多少是由于做管理工作的人更少了的缘故。1961年又有长时期的干旱。除草工作做得不好,排水往往不及时。在很多大面积蔗田上,多种经营的具体内容交给当地的经理决定,他则按照自己或者本区

① 迪蒙这样称呼它们,见所著书第44页。

上司的一时高兴行事。劳动力也不足，因为别处可以得到较高的工资，特别是在新的国营农场里，那里的住房可能较好。这些错误，再加上其他因素，使得甘蔗合作社的生产在1962年低于残存的私营种植园10%。^①1960和1961两年的种植普遍地被忽视了。古巴人一心想摆脱糖的束缚，从历史观点说来固然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从经济观点来说是不精明的）；但是，古巴革命政府实际上忽略了这是他们在极权主义的情况下好歹能靠它生活的唯一作物。因为，甘蔗可以由军队或者用机器来砍，而由工业无产阶级来碾轧，而且他们可以居住在乡村里；同时种甘蔗当然只需要最普通的农业知识。^②

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自从1959年1月以来一直管理着一些被没收的巴蒂斯塔分子的产业。农业改革后又添了一些。到了1960年5月，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管理的农场已达五百所以上，共计面积二百多万噠。这些是从牲畜大农场开始的，主要在卡马圭，后来扩充到大米种植园。卡斯特罗后来说：

我们在碰到大规模的牲畜大农场时，大面积的土地上只有少数几个人在管理数以千计的牲畜，问题发生了，怎么办呢？组

① 参阅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1962年7月18日对制糖工人的讲话。他说能生产四万至五万阿罗瓦（阿罗瓦，古巴重量单位，等于11,502公斤。——译者）甘蔗的土地已被翻掉，而一些只生产一半数量的土地却保留在那里。

② 因此，古巴的经验不足以指导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发展，当然也不能指导其他的拉美地区，尽管智利的共产主义者胡安·诺约拉说，“无数的拉丁美洲人认为古巴革命是我们的共同遗产，我也有同样的看法。”（迪蒙书，第18页）

织一个合作社……使极少数人……致富吗？我得出这个结论：需要为那些土地寻求一种优越的社会所有制的形式。^①

1960年收获后，不分散大米种植园的决定，对于政权的前途说来，确实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因此而成立的那些国营农场，偏巧在农业改革项下没有就这方面作出规定，而是到1960年后期，人们才开始认为这种农场是在当时无法避免的极权主义情况下经营古巴农业的最方便的方法。早在1960年8月，卡斯特罗就对迪蒙说，他想为除了糖业以外的一切农业生产建立一些大国营农场。^②次年1月，所有的非糖业合作社全部改为国营农场，这些农场以及牲畜大农场此后都换上了比较响亮的名称——人民农场。^③这不过是对实际存在的东西加以形式化，因为合作社在原来的形式下已经不可能正常地工作。到了1961年4月，已有国营农场二百六十六所，占用土地五百万亩以上，或者平均每所二万亩，包罗各种作物，遍布岛国各地——虽然奥连特和卡马圭两省共占总额的一半以上。许多农场被分成隔开的一片片的土地，有时候相距若干哩，这就重新造成旧制度中最需要改革

① 洛克伍德书，第90页。

② 迪蒙书，第56页。迪蒙从一开始就批评他们，他预料到他们后来所遇到的一些困难。他还认为卡斯特罗读苏联的书所受影响太大。书中把合作社说成一种“低级形式的所有制”；并且指出，卡斯特的决定具有个人性质：卡斯特罗独自作出决定。

③ 然而，以前由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直接经营的农场在不同的管理机构下维持原状。

的一些现象。这些农场由国家直接管理，象仍然存在的甘蔗合作社那样，没有任何地区的或者地方的总部。它们雇用将近十万工人，大多是季节工（七万人），每天工资 2.11 美元（住房、医药和教育都免费）。

这些农场显然和俄国的国营农场相似。可是古巴农业的实际情况促使当局不得不作出这种决定。合作社的工人不习惯于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合作社本身又从一开始就搞得很糟。似乎采用一种简单的国营制度更有助于实现多种经营以及经常向城市供应食粮。从社会学的观点来说，这有了一些成功。这些农场上的一些工人一度感到很高兴，认为他们自己是公务人员，为自己控制的国家服务；卡斯特罗说，这种制度意味着土地可以用于“效果最大的用途，绝对合理化，时时刻刻地在决定应该生产有利于国家的任何作物”。^①

可是这些国营农场成立了几个月以后，它们的范围之大就开始发生困难了。各个分散的一片片土地是另一个原因。正如迪蒙预料的那样，这些农场似乎是一些小联合体，而不是单独的一个单位。组织混乱，蠢事百出：比那尔德里奥有一位观察家，发觉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的省级负责人“依赖地区代表，这些代表又依赖合作社的管理人员。整个机构由下而上地运行……我怀疑任何一个地区代表未必会知道他自己应负什么责任。”^② 法国农业经济学家迪蒙 1960 年 5 月经过圣克拉腊时，访问了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的省级负责人路易斯·博尔赫斯（以

① 洛克伍德书，第 90 页。

② 弗劳姆：《美国大学实地考察人员工作报告》，第 4 卷，第 38 页。

前学牙医的)。“他在我们面前自己夸耀，每次他需要取得某种设备、工厂、商店……时只须签署一个文件。显然，他在进行这些征用工作时是没有什么预定计划的，只凭一时高兴，也不考虑是否真正有用，尤其是不考虑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能否经营管理。”^①在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的总部里“人们可能看到……不是一本正经的老派机关职员……而是留着胡子、穿着制服、带了武器的起义军。工作时间不是通常政府机关工作者的九点到五点，〔而是〕……游击队那种不正规的……夜晚的时间”。^②这是否有好处很有疑问。同时，没有人想到赔偿问题，凡是想要赔偿的人都因此只有去梦想或者阴谋改换政府。对于接管的财产，很少发给收据。甚至国营农场的许多工人私卖物品，没有人真正知道国家控制了或者应该控制多少土地。

农业工资自从1958年以来大概增涨了五分之一左右。合作社里的人民商店降低价格，增加了农村中的购买力。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宣称肉类消费量比1958年增加了三分之二；可是这是过多的屠宰造成的(由于城市需求增多，才大量屠宰)，从而很快就引起供应不足。1960年初夏，卡斯特罗作了几次讲话，他对一些组织良好的工会(例如建筑工会或者服务员工会)的工人说，革命主要不是为了他们而是为了那些不幸的人：工人也应该为革命作出牺牲。

因此，随着进展而出现了种种困难。

① 迪蒙书，第37页。

② 布尔斯坦：《古巴的经济改造》(1968年)，第48页。

巴黎大学教授勒内·迪蒙在1960年对革命的农业计划的发展作了最富于同情的批评，他在5月20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几种建设性的评论，劝告要深思熟虑、有秩序和有纪律。^①迪蒙指出，没有人坚决主张合作社应该记帐。农业改革法曾责成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拟订合作社的条例。可是在这方面甚至一点工作也没做。努涅斯·希门尼斯作为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领导人的缺点已经十分显明，但是仍然往他身上堆满了责任，而不是堆在农业部长佩德罗·米雷特身上（米雷特一心专管重新造林）。再则，迪蒙指出，在大农场上各耕作区间的通讯交通可以说是没有的。甘蔗合作社里在管理方面所发现的困难更多。经理往往只由一个农民担任，他对这些大规模的农业经营，只有很少的或者完全没有经验，有时候还是一个文盲，不懂新作物和科学训练，往往是因为政治上靠得住而被选中的。如果要使这种改革取得成功，经理应该是一个知识丰富的农民好手。1961年4月成立的那种国营农场还不能解决古巴的农业问题——虽然它还没有被证明是失败的。

国营农场的这些缺陷，在1961年春季人们确实还不了解或者承认。古巴农业政策的趋势实际上现在正越来越走向这样的大企业。现在发给个体农民的土地所有证很少——1961年2月至12月只发出新证二百份，共计土地六千亩。现在一般都已承认需要制订计划。卡斯特

^① 他的报告一部分发表在《1962年对第三世界的研究》中。勒内·迪蒙（1904年生）是巴黎全国农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主任。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非洲错误的起步》。

罗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承认他一直是“一个凭冲动而行事的大鼓动者”，可是已经被格瓦拉、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和博蒂引到“计划”这边来了。^①

到了1961年春，古巴的耕地由国家经营的大概略多于三分之一。在由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管理的面积中，现在只有27%是真正来自1959年5月最初的农业改革的；7%来自捐献；13%来自“自愿的”出售；还有50%来自1960年的斗争中，在7月和10月间发出的征用命令的，这是接收了大糖厂和大牧场的土地，是政治行动的结果。^②由于国家夺取这一大片经济结构而造成的错误是很多的，因为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局面。在种籽、肥料、灭虫剂、运输等各方面的计划都不周到。农业工人流入哈瓦那或者其他城市去当半就业的机关职员，以致造成劳动力的缺乏。一切细小事情继续要请示哈瓦那决定。拖拉机买得太多，比较朴实的农具太少。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度过了初期的戏剧性活动以后，已经不能同武装部队和谐地一起工作了。交通运输陷于混乱，因为零件没有了，因为新经理没有经验，又因为对于原料以及后来对主要供应品的运输准备都不足。事实上，从一个有许多大小农场，生产几种个别作物的制度，很快地改变为一个以有限的几个庞大的政府农场试图生产许多种作物的制度，是存在着极端困难的。个人自然在这些农场的成功中没有任何经济利益。对于在革命早期取得成就（例如

^① “我要那种‘随意’干起来的工程停止，我要那种所谓‘一时冲动’的工程停止，因为它们现在是同计划性相反的。以前，一切都是‘随意’，可是现在一切必须有计划。”（《革命文献》，1961年8月30日，第6页）

^② 迪蒙书，第60—61页。

减低房租和公用事业费)后,一般收入增加,而可能引起食品需求的增加,估计完全不足。对生产的估计也是完全错误的。合作社里显然不记帐,因而妨碍了有效的计划工作。古巴人反正没有健全的簿记的传统。在这一意义上,他们表现了自己过去是殖民地的人民,他们让别人领先和创新的日子太久了。所有的农场,无论大小,因为习惯于粗耕,感到很难充分利用灌溉和排水,即使建立了这些设施。

土地所有制方面这些广泛的变革,甚至也是在没有许多有训练和有经验的经理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过去古巴根本就没有各种人材。到现在为止,移居迈阿密的人几乎包括了全古巴的一切专门人材。虽然这种人有许多是敌视新秩序的,但是假如政府对许多事只是一件一件地着手的话,其中有更多的人是会留下来的。同美国决裂并不一定需要进行农业的多种经营。假如可能的话,在进行农业改革的时候避免那一场“国际棋局”,没有疑问是比较明智的。

即使不考虑这些问题,政府也疏忽了所有很多仍然独立的农场主。不错,土地少于一百六十亩的农场主(不管是不是革命的再分配的结果)从12月起就开始在计划、贷款、机器、产品的分配等方面被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的全国性合作组织——全国小农协会。^①到1961年

^① 这个组织有一个由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委任的总负责人(何塞·拉米雷斯,老共产党员和劳尔·卡斯特罗在山区时的通讯员)、一个人民商店网、地区机构的工作人员等等。土地多于规定亩数的农场主,只须具有可靠的“革命背景”,也可以参加。全国小农协会当然是一个政治性的团体。它有一千四百台拖拉机,或者还不到古巴拖拉机总数的10%。

5月，大约有八万五千个农场主（共有土地六百万噠左右，占全国耕地的四分之一）已经是全国小农协会的成员，而且是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和国家所能控制的了。然而，由于混乱、缺乏办法以及领导的举棋不定，使得这些农场主中有许多人投入现行反革命的队伍，结果，在1960—1961年冬季，政府的命令在古巴许多地方不能生效。

略多于40%的土地，差不多一千万噠，仍然在全国小农协会范围之外，掌握在私人的手里，这个数字大于任何其他的一类；^①现在这些全都是土地一百五十噠至一千五百噠的农场主，大概在一千噠以上的很少；就是说，他们不完全是大地主，虽然他们差不多都雇用几个人。也许有一万所以上这种农场，独立农场的总数是十七万五千所，比1946年多得多。

整个这一类私营农场主，政府不闻不问。银行国有化了，运输和分配被打乱了，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享有一切有利条件，这些私营农场主在取得供应和运销货物方面都感到困难。这些困难不可避免地使得许多人满腹牢骚，不愿意以任何方式同新社会合作，并引起粮食供应不足（特别是在城市里，那里住着60%以上的人口），以及黑市的产生。唯一的例外是种甘蔗的佃农，他们自然仍旧把甘蔗交给糖厂。糖厂现在是国营企业这一事实，对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继续以同样的方法得到代价——按阿罗瓦计价。可是其中有些人——也许一千人——甚至在1960年12月间还拒绝参加一次收获前的群

^① 虽然40%以上的土地已经被征用，包括分掉的土地在内。

众大会,虽然卡斯特罗的哥哥拉蒙竭力劝他们去参加(拉蒙此时似乎已经适合潮流,改变了他对于革命是否可取的看法)。政府似乎不象要接管这些农场主的财产,可是它的政策在1961年初已经使它走到这个地步,也许不得不用单一化的名义来实行这一着。这些农场主对这一点可以理解地是不放心的,这加重了他们的苦境。

在1961年4月中,如果这些农场主和参加了全国小农协会的农场主加在一起,古巴的农业土地就有65%以上在私人手里,包括甘蔗田的三分之二左右、牲畜头数的四分之三左右、以及烟草和咖啡的大部分,只有重要的作物大米完全掌握在国家手里。

农业改革的效果到1961年初还难以看出,因为可靠的统计资料没有发表,尽管出现了一些政府发表的令人鼓舞的数字,但是,是否有人确实知道真相却是疑问。仍然残存的很大一部分私营农业的生产量,完全不可能知道。黑市产品无法估计。然而,有一点实际情况是明显的,无论它是不是分配不善或者管理不善或者私营农场主不肯出售产物的结果,古巴从1961年11月起就粮食不足,到1961年春季以后就十分缺乏了。

另一方面,1961年主要作物糖的产量达到六百八十万吨,也即高于自从1953年打破纪录的收成以来任何一年的产量——事实上是有史以来的第二位;可是1960年中采取的措施意味着1962年和以后的收成大概会减少。^①古巴现在种的棉花显然比1959年以前多,尽管国

^① 而且在1961年政府第一次决定把已长的甘蔗全部砍掉,不象通常那样留下一些不收割,因此甘蔗的94%被砍掉。

家说有一千万亩地种棉花或许是夸张的。在其他作物中，大米在1961年停滞不前，可是，根据可以了解到的情况，除了咖啡以外，1961年各种主要作物的生产数字都高于1958年。连大米也是1961年比1958年高。要对这些数字作出判断是有困难的；可是，即使它们是正确的，也只是表明分配一定比通常所承认的情况还更糟。牲畜的状况有些和糖相似：在1961年第一季度中，拉斯维利亚斯宰了四万头，而1959年同时期中只宰一万八千头，就是说，增加了几乎40%，哈瓦那的需求在1960年比1958年增长五分之三。其他各省也有同样的增长。这意味着牛肉储备大大地减少，结果从1962年以后就会感到困难严重。这些对食品储备的侵蚀本来是可能预防的，因为事先是可以料到的。

用于生产甘蔗、咖啡和烟草的土地仍然同以前大致差不多，而大片大片的新土地——根据1961年8月间的报告，在四十四万亩以上——从荒地或丛林开垦出来，种上多种经营的作物，特别是大米，以及棉花和马铃薯。这种增加意味着就业增加，不过毫无疑问不象劳动部所说的那么多。所有这些作物，使用肥料大量增多，对农业机械的投资也有适当的增加。^① 在1959和1962年，许多土地所有人（包括一些后来土地被征用的在内）试图扩充

^① 参考达德利·西尔斯编：《古巴，经济和社会革命》（1964年），第118页。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说，到了1961年5月在农业机械上已经用了八千一百万美元，其中三千五百万美元是用于社会主义农村的。可是这些机械送到了吗？根据国家银行1958年的备忘录，1953-1958年间在农业机械上的只用了一千七百万美元。当然，这些东西的实际价值已经完全改变了。很多老机器已落伍。

或者精耕他们的田地，希望因此或许能推迟改革或者（如果卡斯特罗会改变主意或是被推翻的话）避免改革。直到1960年7月，征用毕竟是比较少了。咖啡和烟草种植者取得所有权的人增多——大多是过去的一般佃户或者分成承租制的佃户——有助于提高这些部门中的情绪。同时，革命所激发的热情促使农场经理们试图达到不可能实现的高指标，甚至使得私营农场中的工人（至少在1959和1960年）坚持要他们的雇主定出高指标来，免得受到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的地方组织的头头的指责。古巴也许可以它是进行了农业改革又同时增加生产的唯一的国家而自豪，可是，正如迪蒙所指出的，即使生产增加是确实的，这种比较也只能拿去同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日本和以色列都有过更加值得注意的增产。

生产和土地所有权当然不是最重要的。除此以外农业改革还意味着各种情况的改善。农村失业已经差不多结束。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的住房部门到1960年年底已经建成了五十所新的小医院、六十所新学校、以及马埃斯特腊山区里著名的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初级寄宿学校，还有大约一千所新住房和公寓。^①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还造了许多其他的新房子，例如商店、医院、俱乐部、仓库、图书馆——不过，当然没有造教堂。到1961年4月，已经建造的人民商店有二千所左右。毫无疑问，在这些

^① 在1959—1961年这一段时期中，每年建造新房子一万九千所，1958年以前是一万所（迪蒙书，第74页，脚注2）。其中大多数在乡村里。卡斯特罗1961年在多次讲话中说明住房在革命的支出中不能占优先的地位（例如，在第一次生产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8月30日，《革命文献》，第6页）。

投资中,有些从经济观点来说是轻率的;一部分新房子的质量实在太高,不适宜大量生产。再则,1960年10月的城市改革不仅结束了私人租赁,实际上还停止了一切私营建筑。卡斯特罗在1962年说,革命政府将来每年最多只能建造新房子一万至一万二千所,虽然需要的是四十万所。有些道路也不必要地筑得太宽。

国家的工业改革最初是由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的一个部门掌管的——所谓工业,就是从巴蒂斯塔的党羽手里没收过来的企业。这个部门在格瓦拉旅行归来以后,未担任银行总经理以前,曾由他主持了几个星期。到了1960年7月,大规模的国有化给了这个工业部门价值八亿美元的六十家公司,包括二十家糖公司、电话和电气公司(分别值八千万和三亿美元)和三家石油公司。10月间,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又接收三百家工厂,包括剩余的制糖厂和所有的银行。到1960年晚期,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控制了全国工业结构的一半以上;到1961年2月,将近四分之三。2月中,工业工作从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中分出来,单独成立了一个工业部,由格瓦拉任部长,有一些副部长分管各个不同部门。

格瓦拉的新帝国雇用人员十五万,其中在糖业有六万人(在糖厂里或者经营糖的业务)。这个工业部实行高度的集中制。所有的企业组织都要把它们的销售收入送缴到部,它们业务上需用的款项则由部拨发,虽然暂时由各个企业负责自己的预算和指标。各个企业都不保管钱。可以从财政部取得贷款,于接到通知后三个月归还。格瓦拉开始把各种工业按用途重新分类,不管它们的成

绩或者效率。这种中央集权的幻想，格瓦拉认为由于古巴范围小，可以通过电话或航空通讯贯彻执行——“一种完善的钟表制造术的机构”。^①可惜，这种完善的机构，同完善的社会主义的人一样，还没有被发现。格瓦拉，象国王菲迪南德七世一样，结果发现连保持他那些钟准时地互相报时也不可能。同在农业方面一样，官僚主义抬头了。

这个部的活动繁多，仅仅在本部的行政管理中引起的问题就不计其数。人人对于古巴在长期作为美国的经济附庸之后想要独力组织的困难，估计太低。不管格瓦拉和他的一些助手可能有多么美好的经济上的想象，他们却没有商业管理的经验。格瓦拉当时是三十二岁。他的一些助手，象智利人阿尔万·拉塔斯特（计划主任）或者安赫尔·古铁雷斯·帕斯，比较年龄大一些，可是他们也没有指导工业的经验。该部部长助理奥尔兰多·博雷戈所以能出名，其实只是因为他曾同格瓦拉一起在1959年判决镇压共产党活动局头头卡斯塔尼奥上尉的法庭工作过。格瓦拉因为很难找到管理这些企业的人才而发过牢骚说：“我们不得不冥思苦想，能在哪里找到五百个工厂经理，而且没有一天不是为了不称职而需要开除其中的一个。”^②

实在不能不佩服格瓦拉和他的同事们承担这种难以完成的任务所表现的能力、果断和大胆，之所以难以完成，是因为他们自然不仅要管理现有的工业，或者只是提

① 格瓦拉：《革命文集》（巴黎版），1963年10月。

② 格瓦拉的文章，《革命文献》，1961年1月6日。

高它们的生产能力——在史无前例的情况下存在着的困难——而且要为古巴进一步工业化规定方针，为那些希望它们将来能从糖业方面接过维持古巴的国际生计的重担的工业规定方针。因此，得为开采奥连特省的矿藏制订详尽的计划，使古巴在钢铁方面得以自给自足，使能建立可以制造大渔船的造船厂，制造各种机器，包括砍甘蔗机，建立新的炼油厂，搞新的电力设施，扩充化学产品，用甘蔗渣造纸、用甘蔗蜡制造荷尔蒙、用丁烷制造橡胶。确实，格瓦拉的许多打算都是要充分利用制糖工业的许多大量的副产品。既然古巴拥有这样大的镍的蕴藏量，它不该登上世界生产者第二位的宝座吗？还有专门技术教育的计划——统计和车床学习班，工业管理和会计学习班。可能还需建立新的工厂，还得学会新的炼油方法。如果乡村里的生活会提高，难道不能说服住在那里的人去购买城里制造的东西吗？

这一切全是梦想吗？在1961年似乎不完全是梦想。古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在12月中提出。可是，在管理现有工业中正遇着最严重的问题，更谈不到扩展；机器所需的零件，象十九世纪的新奴隶一样，已经从海外运来——从迈阿密。古巴国内以前没有存货。再则，许多现有的工业向来依靠从美元地区进口一切原料才能运转。有些工厂，例如赫奇斯的人造丝厂，不得不暂时关闭。加拿大是一个可能提供供应的来源，可是即使能在那里买到，也需要外汇。然而，到了1961年春季，格瓦拉那个部并不是集中力量于修理购自美国的机器，而是用更多的力量从苏联或者东欧购买新货，并且还向他们买代用品的原

料；因此，在1961年5月，格瓦拉就通知古巴政府，已经同东方集团签订了关于建立一百多所工厂的合约，其中有炼钢厂、炼油厂和汽车制造厂各一所。将由东德协助建立四所新面粉厂。来自东方的一百多名技术专家已到古巴，此外还有智利人和其他的拉丁美洲人士。然而，要使这个国家能配上一套全新的工艺，困难仍是很多。

当然，要按照所想象的规模来进行扩展，也有困难。古巴仍然缺乏本国自有的动力来源。这意味着永远需要输入石油，而且，除非“东方的友好国家”改变它们通常的商业方法，这对收支平衡也是一种不断的挑战。食物和其他的必需品将无限期地需要进口。所有古巴以前在美国购买的必需品（且不说奢侈品）不得不从别处去找。12月间，苏联曾宣布它将于1961年按每磅四美分的价格购买食糖四百万吨，可是这会继续下去吗？中心的问题是，为了摆脱单独靠糖的经济状态，古巴必须工业化。可是，要工业化，需要外汇，而挣外汇的最容易的方法，现在和过去都是靠卖糖。古巴也许可以通过大量售出市场产品争取外汇；如果古巴会象以色列那样出售鳄梨，会是空想吗？可是这种扩展的显明对象正是现在关闭着的北美市场。

劳工方面也有困难。古巴的工人似乎往往认为革命使他们有权利少做一些工作，或者至少可以按他们自己的速度少做一些。

在工业方面，同在农业方面一样，这个新国家忽视剩下的私营部分，而且迄仍不设法把制鞋工人、木工、小烟草厂、汽车行这几支大军纳入国家系统中，他们共计大

概超过五万个独立经营的企业。政府对这些企业的业主说，国家并无接收的计划，可是许多人仍不放心：他们知道政府说话不算数。

古巴经济迅速的改造是在没有斗争的情况下实现的，这在革命史上是无与伦比的。国家获得一系列运转情况良好的企业组织。不存在战后建设问题，象1945年以后的欧洲那样。也许和平过渡实际上已妨碍了社会主义的成功，因为旧方式和人员只须改造，而不须摧毁。

组织和计划问题，加上城市和乡村的协调问题，使得1961年初组成了地区计划委员会——协调、执行、和监察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标志着从前一些乐观主义的大学生所支配的“为了自由”的革命的消灭。这些委员会是在劳尔·卡斯特罗的授意下组成的，是一种值得称赞的做法，企图摆脱权力过分集中的情况。如果它们把较大的权力放在当地机关人员手里的话，或许他们要比远在哈瓦那的官僚更能了解情况。这些委员会说明老共产党人（他们开始被人这样称呼）期望对新社会作出贡献的程度。因此在奥连特的协调、执行、和监察委员会里（1961年3月间成立，劳尔·卡斯特罗任主席），该省旧共产党组织的总书记拉迪斯劳·冈萨雷斯·卡瓦哈尔担任了新委员会的总书记；这种把一个旧的非官方机关和一个新的官方机构视同一体做法，将在全国一再出现。在这些共产党人中，只有那些在格瓦拉在拉斯维利亚斯活动期间恰巧在那里的人——例如拉斯维利亚斯省协调、执行、和监察委员会的总书记阿纳尔多·米利安——曾在反对巴蒂斯塔的斗争中出过不少力。

古巴的劳工(被老共产党员控制的工人联合会)在经济的发展中只起一种作用:服从命令。1960年初,在国营电力公司工作的路易斯·西蒙曾向部长马丁内斯·桑切斯建议订立一项新的劳工宪章;桑切斯回答说“国家硬性规定,不立契约。”此后,劳动力的国有化便迅速发展。1960年9月,劳动部想出一种“危害生产罪”,以对付经常缺勤的人——既然罢工是不能想象的,不上班就是表示抗议的唯一方法。1961年中,缺勤成为革命的一个主要问题。1960年11月,订了一项法令,使得劳动部可以在劳工纠纷威胁生产的任何公司中进行“干涉”。1961年3月,一些新法令规定了工人应向劳动部登记才能取得工作许可证,并授权劳动部可以用命令解决一切劳工纠纷。某种程度的履行自由权利在较低的水平上仍然存在:工人可以选举他们自己的顾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时候享有一定范围的局部势力。可是,从此以后没有争执,只有无言的敌意,特别是对拉萨罗·培尼亚,这个古巴工人联合会(右派)的创始人,现在又当上总书记。失业也没有消灭,如果说在乡村已有所减少(也许平均的工作年已经从一百六十日增加到二百或二百四十日),^①那么,在城市中却依旧存在,那里大概有二十万失业者,不包括由于没有旅游者和没有北美货物可卖而半失业的人(这种人已经增多)。由于武装游行、各种会议和“运动”而损失的时间很多。

事实是,经济崩溃由于入侵的挑战而得以避免。

^① 1960—1961年工业、运输和建筑方面的失业比1958年大概高得多,农业方面的失业较低。

关于 1959—1961 年古巴统计工作的一点说明：

在这一时期内，古巴国家很快地接管了全国很多生产资料和服务事业。然而，大多数古巴统计学家已经流亡国外。因此，在革命的最初几年，统计的编制非常不完全，尽管在计划经济中，统计的正确性几乎是最重要的。再则，一班能力既不足又想夸张讨好的官员犯了很多错误。（到 1963 年为止）广大私营农业部门的生产统计确实到现在仍然很难估计。最后，从 1960 年起，政府本身总是把统计数字作为对反革命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又一项武器。因此，即使以最大的热情，也只能把 1959 和 1960 年间所公布的生产数字看作是“指示性的”（借用贝特尔海姆教授的文雅的说法）。1961 年以后，关于古巴的生产数字又发生了其他问题，其中有些将在本书以后各章中予以讨论。这整个问题已经由卡尔梅洛·梅萨—拉戈在他的小册子《社会主义古巴的统计的采用价值及其可靠性》中作了精辟的探讨。这本小册子是匹兹堡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的《特别研究报告，第 1 号》（1970 年 1 月）。

第三十章

社会主义的古巴：II

1960年被称为“农业改革年”，正如1959年是“解放年”一样。1961年将是“教育”年。这并不是说要扩展一般教育，而是要搞一个扫除文盲的运动。人们认为古巴有将近一百万文盲，占农村人口的半数。马蒂曾说过：“有教育就有自由。”这个运动，在布拉斯·罗加于8月间共产党的大会上提出的一系列必须要做的事情中占了很低的地位（从严格的经济上的轻重缓急的观点来说，毫无疑问这样做是对的）；它暂时是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最后一个举动。卡斯特罗曾在联合国保证在一年内消灭文盲。成千成万的古巴人，在其他方面对革命的信心也许有些动摇，但是他们都在1961年春季准备投入一场将于4月开始的伟大运动。首先，要对文盲进行调查登记；到1961年2月已经登记了四十一万二千人，到4月五十四万六千人。^① 在城市中，识字的志愿人员教那些不识字的人。在穷乡僻壤地区，扫盲教师是专职工作。还有谁比中等学校的儿童适合于这种任务呢（当然，其中有许多是中级学生）？他们毕竟还可以从在比较穷苦的乡区住几个月的经验中学到一些东西。因此所有的中等学校将于4月15

① 到8月间运动积极进行时，已经查出九十八万五千人。

日以后停课。志愿人员——当然使人做一个志愿人员的压力很大——登记作为“扫盲队员”，他们在巴拉德罗海滨受训后，便到国内的偏远地区去，随身带着一套制服、一只吊床、一条毯子、一只石蜡油灯、一面旗、一幅他们的“保护人”孔拉多·贝尼特斯的肖像（贝尼特斯是在埃斯卡布拉伊山区被反革命杀害的一个民兵）和两本手册：《战胜困难》和《识字课本》。

这两种手册的性质简直可以说是没有方针的：《识字课本》中的练习“甲”是这样开始的：“我们将要阅读《美洲国家组织》。”插图有快乐的工人跟他们的产品和孩子在一起。《战胜困难》里收有一些有用的词儿和短语，例如“朋友和敌人”、“革命打胜了所有的仗”、和“国际团结”，还有对教师的详细说明。在《战胜困难》书后的语汇里以字母B开始的十来个词儿或短语，其中我们看到有经济封锁：“帝国主义强使我们处于被包围状态〔这〕……我们靠了那些跟我们做买卖的国家，已经战胜了它。”如果人们要学会快读，没有疑问，那么抱有强烈的偏见，总比采取阴郁的中立态度好。另一方面，在扫盲运动中，偶然获得的知识，大多偏重于辞藻，而不一定有多大意义。

教育部长阿曼多·阿特当时驻在哥伦比亚兵营（以前巴蒂斯塔的军事总部），他出身于一个天主教的但是坚决革命的家庭——他父亲最近出任最高法院院长；他也在着手改革教育。副部长杜尔塞·玛丽亚·埃斯卡洛纳（共产党员），在普里奥和巴蒂斯塔时代曾当过师范学校校长；她是一个聪明、能干并通达人情的数学家，一度对杜威的学说有兴趣。到了1961年，教育革命的成就已经

颇为可观。1959年以前,六岁至十四岁的儿童有40%以上不读书,可是到了1961年,大概除了20%以外全都进了学校。然而,在十一岁和十四岁之间的最后两级中仍有很多退学的。初等教育之所以能够取得这种成就,是由于人们响应志愿报名的号召,使农村地区的教师增多了(五千人左右)。可是登记入学的人数越来越多,部分是由于人口增长,在1960—1961年平均每一教师要教学生三十七名,而在1956年是三十五名。大多数新教师是在马埃斯特腊山的圣洛伦索匆促训练出来的。从前那种只有一间教室而几个班级在一起学习的小学校自然继续存在。山区里的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城市学校还只能容纳少数小学生。此外,还组成了一种儿童的革命运动(社会主义童子军),对象是七岁至十三岁的儿童,称为“起义少先队员联盟”,^①根据同样性质的苏联青年运动组织的,由“山区中最年青的志愿军”霍埃尔·伊格莱西亚斯上尉领导;这是使热心人士有点可以思考的新东西。^②大部分兵营已经改为学校,可是很多学童似乎都可以说是兵士。

中等学校也有一些改革。因此旧的五年制学士课程被废除了,代之以一些特别为了增加大学学生人数的课程。大学的入学标准彻底降低。大多数中等学校留在城市里,不居住在那里的儿童住进宿舍,许多新的寄宿学校和专科学校设立在被国有化的庄园上或者在豪华的住宅里。入学人数明显地增加三分之一。

① 1960年5月10日组织。1960年10月并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② 伊格莱西亚斯1959年1月间任哈瓦那市警察第十派出所所长,当时还不到二十岁;1965年成为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首届委员,

1961年春，所有的私立学校都还没有进行国有化，不过其中许多由于无法维持已经关闭。有些学校，象卡斯特罗的母校“耶稣会贝伦学院”已被接管。外国学校，象有名的哈瓦那拉斯顿学院也停办了。那些仍然存在的私立学校，面临着为了扫盲运动而必须于4月15日关闭的前景，都心灰意懒。它们正确地认识到没有重开的可能。3月间发生了骚动，反对关闭学校的计划，特别是在圣地亚哥和关塔那摩；可是到了4月15日，所有的私立学校，除了几家托儿所，都准备接受无可避免的命运。

另一方面，大学还没有正式进行改革。可是它们正在变化中。许多教师流亡国外或者已被解职。各部门的头头全是靠得住的革命者。有许多部门，已经招聘了外国教师。实际上，到1961年春季，大学都倾向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各科系还未进行改编以使高等教育配合经济的需要（例如废除文科课程），但是这个问题已经有所传闻。学生受到前所未有的严格的纪律约束。出席听讲实际是强迫的，那些不愿意参加民兵的人处境困难。一千七百名大学生已由工业部于1960年派往苏联集团各国去学习。训练教师的学院已经分别在埃斯卡布拉伊山科兰特斯丘陵前巴蒂斯塔的结核病研究中心旧址和马埃斯特腊山的米纳斯德尔弗里奥成立。还有其他一些教育计划，从语文课程到农民的缝纫学校、出租汽车司机学校、制鞋工人训练班、或者娼妓改造学习班。

所有这些计划的缺点是师资缺乏。执教的人很多不过是学生或者在其他方面不合格的。

没有疑问，革命增加了教育的数量；教学的质量则同

样没有疑问地降低了。可是，能有受教育的机会或许比教育者的学识问题更为重要。然而，即使在这方面也有过很多浪费。助学金学生所做的工作不能全达到国家期望的标准。有些人工作得不够。1961年仍然是律师和艺术家太多而技术专家太少，正如以后几年中还会出现同样情况那样。有意降低大学的一般标准，以适合新入学者的要求。

政府经营剧院、电影院、电视中心和音乐活动，派遣哈瓦那国家乐团到全国各地演出。可是报纸现在枯燥无味。《革命报》和《今日报》所不同的仅仅是后者（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主编）对事态的报道比较确实可靠并且经济方面的消息较多，而前者（仍然由卡洛斯·弗朗基主编）由于该报干部对目前形势暗怀不满，较多地登载卡斯特罗在山区时代的作为。生动活泼、形形色色的文艺副刊《革命报星期一副刊》，已经引起了正统派共产党人的仇视。《波希米亚》周刊，在一些新编辑的主持下，在杂志中起着同样的作用；另一方面，陆军杂志《绿橄榄树》的销数仅略少于《波希米亚》，仍然是一份非常教条式的共产主义的杂志。

古巴电影管理局（由卡斯特罗在大学里的同学、老共产党员阿尔弗雷多·格瓦拉领导）经营电影院，摄制新的古巴影片，并管理外国影片的进口。自从1960年秋季美国封锁和外汇缺乏以来，很少有新的美国或欧洲影片放映（虽然有一些没有特殊正统思想的旧影片）。来自东方“友好国家”的新影片也出现了，例如《苏联一周》和《台尔曼的生与死》。^①两个青年制片者奥尔兰多·希门尼斯和

萨瓦·卡夫雷拉试图专门拍摄一部非现实主义的影片《下午》，一部以1961年1月间一个下午为题材的印象主义的片子，后来引起了艺术的任务整个问题，使得7月间卡斯特罗同一些著名知识分子进行了一场有名的讨论，以及8月召开了文化会议。最后的结果是设立一个由官方指导的“作家协会”。

革命政府还改组了原有的全国文化协会，最后交给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埃迪特·加西亚·布查多领导，此人是当时华金·奥尔多基的“女友”。这个机构雄心勃勃地要管绘画、雕塑、演奏会、音乐、舞蹈和戏剧等很多项目。这些活动被着重“革命意识”的主张所支配。这不一定意味着降低标准，因为最好的戏院“艺术剧场”（文森特·雷维尔塔斯和他妹妹经营的）早在1959年以前就已经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这家戏院在1960和1961两年业务兴旺，第一次在古巴上演布雷希特和其他欧洲剧作家的剧本，获得很大成功。

出版社现在都由政府经营，虽然以往就没有任何财力雄厚的出版事业。没有疑问，所不同的是在1959年，人们可以自费出版一种攻击政府的书，而在1961年就不能了。由阿莱霍·卡彭铁尔领导的国家出版社已在着手大事扩充，主要出版卡斯特罗的讲话、列宁、马克思的著作、以及布拉斯·罗加的《古巴社会主义的基础》，可是，也有比较容易消化的东西，象詹克斯的《我们的古巴殖民

① 台尔曼(1886—1944)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33年被捕，1944年被害于魏玛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译者

地》，拉米罗·格拉的《糖和人口》、托尔斯泰的作品、《唐·吉珂德》和伏尔泰的作品。文化协会大量出版加西亚·洛尔卡和西里洛·比利亚维德的作品。图书馆未曾进行清理和整顿。奥韦尔的作品在国家图书馆里仍然可以找到，不过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批新版的《日瓦戈医生》显然在1961年初被作为反革命作品予以没收过。外国报纸和刊物这时已经不再发售，批评政府或者制度的书刊通常不在书店里陈列出来。这大都取决于是由谁作出决定的。例如，国家图书馆馆长玛丽亚·特雷莎·弗雷里·德安德拉德，前人民党员，三十年代古巴革命青年党的成员（五十年代她为了逃避迫害曾在墨西哥大使馆避难），就是一个聪明而通达人情的妇女。

电视和无线电继续作为宣传政府计划的永久的手段。即使在没有什么事要庆祝的时候，每天一点钟也可以在无线电中听到一篇卡斯特罗的讲话。这两种工具响起简单的乐调，象是在讽刺美国制度的革命打油诗：“这里是进步电台——幸福之音。”麦迪逊大街的技术（那些技术工人本身有的曾在纽约工作过或者至少为纽约的公司服务过）在为革命、扫盲运动以及对封锁的斗争服务。大街上，革命歌曲仍然几乎不断地从留声机里怒吼出来，特别是《七·二六颂歌》仍旧按海滨的音律在高唱。然而，最有名的革命歌喉之一，帕尔多·利亚达（自由电台独立阵线的负责人，绰号“憎恨家”），3月底流亡到墨西哥，用他以前尖声怪气地叫喊“帝国主义”的同样的声音叫嚷着“背叛”。

这个政府是否实际上可以叫做共产主义的，它的成

绩保证了这一点，哪怕没有卡斯特罗那种使人不得不信服的雄辩和大多数古巴人的广泛支持。这个政权的好战的和要求服从的一面，一直是立足于打仗上，因此感到不安的人非常之少。政府总是要干涉私人生活，号召志愿参加民兵，后来又号召参加扫盲运动（一群愉快的队伍走向“团结”），这一切虽然对资产阶级说来是受不了的，却至少可以排除许多古巴人过去生活中难以相信的沉闷无聊。虽然巴蒂斯塔和革命党也利用过宣传工具，古巴人却从未经受过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人民曾遭受到的那种强有力的大量的全国性宣传。再则，大多数人相信，政府即使是不容异己，却至少是第一次没有贪污。没有疑问，人们总要把这种事当作只能同墨索里尼使得意大利火车准时的成绩相比，而不予重视。可是，断绝贪污的官吏、贪污的司法人员、贪污的政客、贪污的工会工作者和贪污的企业家，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却是一种真正的、不寻常的、也许难以理解的但是了不起的对比。腌臢的娼妓界、警察包庇的敲诈和雇有诱媒的赌场也几乎完全消灭了，只有娼妓对于山姆大叔的绝迹才感到十分遗憾。赌博仍然继续，并且有时候规模大得离奇。反对革命的人，有许多已经预订了去美国的飞机或船票，知道自己的钱不能带出国境，每夜走进那些设在哈瓦那一希尔顿旅馆（自由哈瓦那）、里维埃拉旅馆、国民旅馆或者加普里旅馆里的仍然光辉夺目的新赌场，有时候在轮盘的每个方格上都押上筹码；背后，在赌场管钱人的脑后，都挂着一条宣告“节约就是干革命”的大标语。在出纳员的上方，挂着另一条写着“卢蒙巴永远活在一切自由人民的心里”的标

语！

这种赌博在清教徒式的革命中是不伦不类的，其所以容许它存在，是由于当局不愿解散赌场的工作人员，从而增加失业。可是它也有助于使一些可能的反革命分子不干其他的坏事。哈瓦那的这些大旅馆，都是两三年前才建造的，里边的空气调节已开始不稳定，服务和饮食的质量下降，似乎象是过去文明的一些灿烂的遗迹夹杂在一种面目还不清楚的不和谐的新文明当中。“自由哈瓦那”形成最显著的对照，因为它有维尔弗雷多·拉姆的油画、舞厅、游泳池和轻悠的音乐，还有几个赌场，它已经成为主要的国际会议中心，有专供来自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来自西半球的同情的共产主义者以及来自欧洲的同路人住宿的旅舍。休息室里的书摊出售最近出版的革命书刊以及马克思和马蒂的著作。在1961年中，通过它的旋转门来了一个接着一个的代表团、各种时代的和各个国家的革命领袖、从卢德维希·雷恩到利斯特将军、来自巴西的弗朗西斯科·胡利奥以及来自阿根廷的庇隆主义者左翼库克，且不说新闻记者、漫画家、间谍、男女民兵、黑人、白人、黑白混血种人，身穿橄榄绿的制服、拖着步枪、嘴里衔着雪茄，仿佛随时可以作杀人的一击，也可以痛饮一阵棕榈酒。

大多数古巴人当然并不光顾“自由哈瓦那”，虽然这里和其他的豪华场所时刻将整个一层楼面让给乡下人办缝纫或者家庭卫生学习班。任何人如果想到那里去都没有困难。屋顶酒吧现在第一次对黑人开放。所有的观察家一致认为，这种社会自由的意识就是大多数人拥护政府，

或者简直为它心醉神迷，甚至象受了它的催眠术一样的另一个原因。大多数古巴人感到至少已经没有他们的主人和往日的主子阶级的种种偏见。社会自由和民族自由是连在一起的。卡斯特罗的演讲所激起的古巴民族主义以及两年来的种种事态，使人们对于摆脱美国枷锁深觉称心满意，在非共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中都是如此。政府时常告诉人民，他们第一次能够真正地说“这是我自己的、我的祖国”，以致不管他们是否需要通过宣传以使自己这样看法，他们也都相信这种说法了。另一方面，城市里原来那些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也许没有这种想法，因为革命来了以后他们的生活标准下降了。^①

很多事情都要靠卡斯特罗。他的缺点是明显的：说话累赘，不关心人的生活，仇视外国人，利己主义，大权独揽。可是，他也有这么一些优点：精力旺盛，敢作敢为，极端重视了解当前形势，要亲自察看进行改革的实际情况。谁也不象法农在《世界上该死的家伙》^②一书中象指责新国家的许多领袖那样地指责卡斯特罗幽处深宫，从不巡视国家。相反地，他似乎从不安居首都，经常乘直升飞机或者吉普车或者奥尔兹莫比亚牌汽车在旅行，经常

^① 格瓦拉曾说：“任何人都知道，例如我们在石油业中或者在电话和电力公司里的朋友，都没有因为革命而在经济上直接得到利益。”（《革命报》，1961年11月29日。）关于1960—1961年冬季访问古巴的旅行家们的不同看法，可参阅沃伦·米勒：《失去的种植园》，伦敦，1961年（在纽约出版时书名改为《离家九十哩》），这是一个北美人的同情的日记；另参阅尼古拉斯·沃拉斯顿：《红色伦巴舞》，伦敦，1962年，第13—91页和第209—231页。

^② 弗朗茨·法农：《世界上该死的家伙》（巴黎，1961年）。

在看某项新计划,经常在讲话,鼓舞,威胁,驳斥。从不无可无不可。头脑简单的和老于世故的人都同样仍然信任他是他们的带路人。他怎么能不报以自己的许多优点,使他们眼花缭乱呢?卡斯特罗已经使他的同胞相信他是一位政治天才,而且全世界也都承认是这样。他具有了不起的才能。他是一个极好的演说家。他是一个危险的敌人。古巴人和拉丁美洲人对于另一种性质的不公道的政府,久已懂得尊重暴力,因而不能不崇拜一位左派的有力人物。

当然,民族主义不是存在在真空中,向来都是来源于同另一个民族过分接近的经验,即使是仇视外国人的经验也不能完全丢掉。听到识字运动用广告商想出的叮铃叮铃的铃声来推进,就可以体会到北美的习惯已经在全国的思想上根深蒂固。古巴现在怀着这种特殊怨恨追击北美,就是在追击它本身的一部分,正如1960—1961年冬季继续发生的反革命活动非常清楚地表明的那样。

共产主义,象罗马天主教的信条一样,之所以能在当地具有力量,正由于它能够顺应民族的特性。正如东德在乌布利希的领导下具有普鲁士人的骄矜严肃,同样地,古巴在卡斯特的领导下保持着轻松愉快甚至不求甚解的作风,这有助于使革命容易被人接受。歌声和乐声依旧象以前一样地遍及全国,虽然现在也许可以听到一大车一大车的女学生在唱着:

我们是社会主义者,
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
明天,我们将是

伟大的共产主义者。①

甚至在群众大会上那些服从命令的群众机械地喊出来的话，也往往是一种孩子气的调子：

乒——乓——蓬
毛——泽——东。

卡斯特罗的一次长篇讲话也许会不时地被欢呼、叫喊、鼓掌和跳舞所打断，这样使群众和卡斯特罗都可以有休息的机会，虽然也会有一种比较吓人的喊声，叫喊“枪毙、枪毙、枪毙”帝国主义分子和教士，而且连这个也会变成一阵凶恶的伦巴舞（《牧师，枪毙》）。（格瓦拉曾夸口说，古巴的革命是用帕昌加^②的革命；可是它也用伦巴舞表现死刑。）这些现象一部分是精心安排的，可是确实是比较自发的。有些来访者觉得马克思和卡斯特罗的巨幅肖像缺乏魅力，放在一起的还有各种标语，有的画着强壮而严肃的工人，手里端着铲子，有的写着鼓吹团结、爱国和努力工作的刺耳的口号，有的是卡斯特罗勉励古巴人成为斯巴达人的号召，特别是到处出现的枪炮；在这些客人看来，古巴在1961年仍然保持着它的一些特殊魅力，虽然大多数外国人对于它的种种矛盾和对于它的成就同样感到刺激。

① 我也许把这首小歌的时间提前了一些；我是在1961年7月间第一次听到的。另一种歌词是：

我们是社会主义者，
已向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宣称：
我们是骏马，
将以闪电般的速度前进！

卡斯特罗在革命的和反革命的神话式故事中都作为“马”而出现。

② 帕昌加(PACHANGA)，意义不明，待查。——译者

一项需要忧虑的大问题是法律。直到 1960—1961 年冬，最高法院仍然大致是巴蒂斯塔垮台以来那样的情况。法官们惊愕地看到任意逮捕、长期监禁以及一切反对政府的人受到政治审讯越来越多，可是这不是普通司法的事；革命法庭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正如先由马查多设立后来被巴蒂斯塔用来速审政治犯的那些“紧急法庭”的情况一样。这些法官中仍然有许多人不同情革命。1960 年 11 月 17 日，最高法院院长埃米略·梅嫩德斯和他的同事莫雷尔·罗梅罗法官突然逃到阿根廷大使馆。法院同事们称他们为叛徒，虽然其中有九个人不同意这样叫法。在一星期内，这九个人自己也流亡了。梅嫩德斯的继任者是恩里克·阿特法官（教育部长的父亲），他是一个人人认为是善良的民主人士和天主教徒。可是，12 月中，又对法庭进行了清洗，现在只剩下十五个成员了。政府发言人说，旧最高法院中坚信不革命哲学的成员太多了。在几件涉及被没收财产估价问题的诉讼中，法院甚至作出有利于原告的裁决。卡斯特罗说，古巴不需要有这么多法官，因为已经不需要打官司。今后，正如这一声明可能暗示的那样，革命是一切司法程序中的一个因素。在大多数刑事案件中，问题不在于不审问就判决是否有罪，而在于如果确定有罪，被告以往对革命的贡献将对判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再则，在判决以前，应先对被告的品格和经历作出说明。这种法律的政治化，在不断发展的激烈的革命形势中，毫无疑问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旧的法律制度，其混乱复杂，连伍德和克劳德两位将军也承认不能理解，如今终于突然折断了，有如一株老朽的树，在它倒在

地上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树上那些古老的鸦巢。

1960—1961年,古巴还有战争。整个冬季,一直出现中央情报局和流亡分子的小规模渗透、侵袭的谣传、紧急状态、阴谋和暴力行为。民兵常常不得不脱产,因而增加经济上的困难。流亡分子的消息说,到1960年10月的时候,已经有一千三百三十人被政府枪决,到3月更多。埃斯坎布拉伊山中反革命同政府之间的斗争持续了整个冬季,可是政府由于慢慢地削弱了那些游击队的力量而逐渐取得胜利,这些所谓游击队缺乏粮食和各种供应,不能从空中得到美国有效的支持。很多人被打死,卡斯特罗这方面的死者之中有他的私人医生路易斯·法哈多。战斗继续到春天,虽然发生的接触越来越少。格瓦拉认为,1961年初,埃斯坎布拉伊山中武装力量还有二百人。从迈阿密来进攻古巴海岸的几次远征队都是一到达就立刻被打垮了。最严重的失败是以前的上尉豪尔赫·索图斯逃走了,他是革命复兴运动的人,以前卡斯特罗在山区时第一个增援部队的领导;他在1960年12月间从松树岛逃出,由于在监狱里抓到一具电话,冒充哈瓦那的一位长官的命令而释放他自己。^①同月中,有人曾在意大利大使馆外面企图行刺卡斯特罗,并且不时有民兵被神秘地谋杀,有一个被吊在树上,附着一张条子:“把这家伙放下来,我们还要用这棵树吊其他的人。”

1960年冬季,革命复兴运动的罗赫略·冈萨雷斯,

① 然而,后来他在迈阿密从事一次秘密旅行时因意外事故丧命。

科尔索在哈瓦那指挥了一次搞破坏和恐怖主义的强大运动；埋下了很多炸弹，信箱被炸毁，自来水总管被破坏，甘蔗和烟草种植园被纵了火。神秘的标语叫卡斯特罗相信自己命在旦夕。拉伊的人民革命运动也宣称这些行为有的是他们干的，虽然拉伊本人已秘密离开古巴前往迈阿密（人民革命运动此后在国内由安东尼奥·比西亚纳指挥，他是一个会计员）。一位新伙伴，前任工人联合会总书记戴维·萨尔瓦多（十一月三十日运动的创始人）和毕金·阿格拉蒙特一起在他们企图乘游艇驶出哈瓦那附近的海马尼塔斯河时被捉住；萨尔瓦多被送进拉卡瓦尼亚监狱。^① 12月6日，“慈悲圣母”教堂里爆炸了一枚炸弹，附有字条“赫鲁晓夫万岁—打倒神甫”——大概是一种欺诈手段。后来有十六人被送进监狱，刑期最长的十三年。天主教青年联盟的十七名大学生因为在哈瓦那大学放置炸弹被捕。农场的机械设备遭到破坏。哈瓦那一圣地亚哥快车在圣克拉腊附近出轨。以克洛多米罗·米兰达和贝尼托·坎帕为首的匪帮（这两个人都是以前反对巴蒂斯塔的战士）在比那尔德里奥和马坦萨斯到处劫掠。偶尔有劫持飞机和用炸弹袭击群众的事件；3月间，在前美孚炼油厂和赫尔希制糖厂，放起大火，4月间，埃尔埃坎托公司的哈瓦那大商店被破坏。

革命复兴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的目的是刺激政府采取两年前巴蒂斯塔所用的镇压手段。在这一点上，他们未

^① 他身边有一万三千美元，起初被指控为私藏外汇并企图非法出境。参阅罗德里格斯·克萨达：《戴维·萨尔瓦多》，第19—20页。他直到1962年8月才受审讯，被判处三十年监禁。

能得逞。结果是更使全国人民分成两个越来越相互仇视的集团——少数反对政府，多数仍然拥护。在那些一开始就支持政府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良知上发生了可怕的危机：他们不应该参加地下吗？他们应该重新过怠工捣乱和阴谋策划的生活吗？为了考验他们和告诫他们，继续不断地举行了执行死刑的示众游行，包括3月间北美人摩根少校和他的老伙伴卡雷拉斯少校的死刑，他们在1958年曾企图使格瓦拉不能到达埃斯坎布拉伊山区。1961年3月18日，最有名的地下领袖中有许多人被出卖、逮捕以及后来被枪毙（其中有冈萨雷斯·科尔索）。这些人中还有索里·马林和拉斐尔·迪亚斯·安斯科姆，他们曾企图把古巴国内所有反卡斯特罗的力量联合起来。

政府内部仍然明显地发生争执，虽然唯一的公开抗议起源于巴蒂斯塔留下的那根老刺——电力工人工会。它的头头阿毛里·弗拉希纳尔斯在多次清洗中未受冲击。12月9日，若干古巴电力公司职工聚集在普拉多他们的总部，列队前往总统府，高呼“要古巴，不要俄国”。弗拉希纳尔斯最后被准许进去见多尔蒂科斯。他提出了他的申诉。可是四天以后他躲起来了，后来立刻被卡斯特罗指控为组织暴力行动。于是，电力工人工会把弗拉希纳尔斯可耻地开除出去。比这些反抗行为似乎更奇怪的是屈服行为：象孔拉多·贝克尔这样一个老革命党、反共的工会领袖、甚至巴蒂斯塔手下的参议员和穆哈尔的合作者，怎么竟会让他留任最重要的糖业工人工会的总书记，或者他自己竟然肯这样做呢？这种反常的现象只能

用古巴工会系统中由来已久的漠然无动于中的机会主义来解释：贝克尔从1959年以前糖业工人工会的会计爬到后来的总书记。

教会仍然是一个受到特殊待遇的反对中心，因为卡斯特罗和共产党决定避免同它正面冲突。1960年8月，共产党总书记布拉斯·罗加曾说，虽然教会的势力是以现有的阶级分野为基础的，也有许多天主教徒工人了解社会变革的好处。可是，10月间，主教博萨·马斯维达尔攻击政府“超过公正的帮助和警惕的范围”并企图取得“绝对的控制”，使个人成为只是国家机器的一个零件。布拉斯·罗加在《今日报》上把主教的文章拿来同天鹅岛的“帝国主义的”宣传相比。一位赞成革命的神甫赫尔曼·伦塞抨击教会统治集团。11月间，主教佩雷斯·塞兰特斯发出第三次致教区人民书，赞扬美国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还说需要有一种意识形态来战胜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真正的斗争是罗马和莫斯科，而不是华盛顿和莫斯科。新的统一青年运动企图用唱革命歌曲的方法来阻止圣地亚哥大教堂里宣读教书。12月4日，教会统治集团颁发一件最后的联合教书，责成卡斯特罗抛弃共产主义，还说“天主将照耀你”。卡斯特罗答复说，政府不必回答教士，同时明确表示他认为“反共就是反革命”，并说“反天主教、反基督教或者凡是任何使古巴人分裂的行为都是反革命”。^①可是从此不再有人提出抗议了。教堂仍旧开放，即使难得客满，而且卡斯特罗偶尔发表讲话批评而

① 《革命报》，1960年12月17日。

不是攻击教会。教会杂志《半月》(仅存的独立刊物)停办。(一些较小的独立报刊,例如《消息报》和《考验报》,虽然没有受到象《海洋日报》和《自由新闻报》所受的政治冲击;但是,它们由于失去广告以及没有任何政府津贴,已经不得不停刊了。)

1960年4月,正在艾森豪威尔第一次给中央情报局的冒险事业祝福以后,一次相当公平的民意测验——直到现在为止的最后一次——发现古巴城市居民大多相信他们自己的生活比过去好,并且其中四分之三认为再过五年还要更好。住在城市里的人,差不多有一半狂热地拥护政府,认为卡斯特罗具有“与耶稣基督相同的思想”,并渴望“吻一下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大胡子”。(在这些人中,一半或者没有受过教育或者只进过初等学校,同时将近一半是二十来岁的人。)其中五分之三的人,在被问到自己的心愿时说,他们最期望较高的生活标准;三分之一希望大家都有工作;三分之一只是希望“革命成功”而已。有四分之一的人希望全国团结,不再有仇恨。明白表示要有一种用选举方法来衡量的民主政府的人寥寥无几,比要求一个公正的政府的人要少得多。害怕共产主义的为数不多。在被问到“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你对将来的希望是什么,如果你能幸福的话,你的生活应该是怎样?”这些问题时,约有一半以上的人^①回答说,他们希望本人或者家庭健康良好或者更好;在被问到他们最怕的是什么时,恰好一半以下的人^②说最怕不健

① 52%,

② 49%.

康。公众所担心的几乎都集中于害怕回到过去的种种情况——苛政、警察犯罪或者压迫、暴力、混乱。这些反应来自城市居民，他们到现在已占人口的 60% 以上；毫无疑问，革命政府在乡村甚至还更得人心。

然而，政府的最坏的一面要算是它的监狱了。这时，古巴也许已经有政治犯一万人。有的已经经过一点审讯，有些还没有。狱警对犯人的待遇、食物、卫生设备都很差。现有的囚犯比巴蒂斯塔时期多得多，情况也非常差。有些被关在拉卡瓦尼亚或者普林西佩这些要塞里，所有的监狱都有人满之患。在这个问题上革命政府竟然乞灵于传统的古巴独裁主义的倒退作法。关于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狱中生活的许多记述，毫无疑问是故意耸人听闻的，其他一些作家也是不得不大肆渲染的。可是，材料表明，在对待敌人的问题上，新政府简直不比巴蒂斯塔的政府有所改善。G.2（陆军情报部门）的讯问室表面上也许比巴蒂斯塔的军事情报局刑房好一点，可是完全是同样的坏。

古巴的中层阶级或者上层阶级，即使假定他们本人没被关进监狱，也不阴谋造反，或者同那些在狱中或阴谋造反的人没有什么密切关系，这时也不可否认地感到失望，处于不幸的境地里了。在那些有所损失的人中，现在大多已经失去原有的信心了，认为过去那个社会无论它有多少腐败，总是由他们自己管理的，是在他们这一边的。人们熟悉的一切旧时古巴行为的习惯正在逐渐消亡。当然，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习惯在古巴比在别处显得较为淡薄。然而，即使在巴蒂斯塔的统

治下，向来也有一种固定的事物的秩序，上俱乐部和旅馆呀、鸡尾酒会和宴会呀、投机买卖和各种典礼呀、到美国去旅行呀；现在这一切虽然还不是不可能，却困难了。大多数中产阶级都在盘算这个问题：是否要离开古巴，到美国去，放弃住宅、财富、一切所有的东西（也许是永远地），或者留在这里，加入反革命的政治活动或者至少考虑参加这种政治活动。他们长期习惯于承认统治权力，因为掌权者或者就是他们自己或者是他们的朋友，如今代表这种权力的是一个革命集团，其中都是一伙荒唐任性、感情冲动、乱七八糟、喜欢玩枪的年轻大兵，这就无法予以承认了。

对多数人来说，对差不多全部农村居民以及大部分城市居民来说，事实恰恰相反。他们第一次知道权力是在他们这一边，公理不可能再由他们的地主或者雇主用钱去买了；他们已经知道，虽然失业情况也许还会继续存在，他们的生活也许在不同情况下仍然会艰苦，但是曾经欺负他们并且自命是他们的恩人的那个阶级已受到严重的打击。卡斯特罗的旅游管理局已经接管了旅馆、俱乐部，而且最重要的是接管了海滩，使一般公众都可以使用。巴拉德罗国际旅馆现在每天收费十五美元而不是五十元了，哈瓦那市的比尔特摩尔游艇俱乐部的美妙的沙滩和清澈的碧水对大家开放，只收费美元五角。沿着好多哩的海岸已经设立了公共浴场。这一切都是花了很大费用并在卡斯特罗所限定的时间内办到的。革命已经为妇女、为黑人或黑白混血种人少数民族增加了机会。古巴妇女的组织在协调群众对政府的支持方面，甚至群众活

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61年的扫盲运动大约有一半是由妇女或者姑娘们搞的，1962年的棉花是妇女收摘的）。

在中产阶级中，对革命的态度主要随着不同年龄而有所不同：年轻的大多赞成，年老的大多反对。现在，著名的自由主义人士大多已经离开政府，有的甚至离开了国家。可是这些善良的人在思想上或者行动上都不愿意同心怀不满的靠利息过活的人合作。说来也怪，在古巴历史上可以说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即教会成了各阶级间正在消逝的旧古巴和正在奋斗中诞生的新古巴之间的唯一的真正接触点，教会虽然还是有点犹豫不决，但是教会统治集团和大多数教士及重要的俗众现在都反对政府了。可是，两年前的反巴蒂斯塔的战斗还不能看出什么阶级意义，现在却是一场全面高涨的阶级斗争，而且双方在这场斗争中都表现得互不相容。

政府仍然用雄辩术来进行统治。卡斯特罗的演讲以及听众之多即使对欧洲说来也许不是什么新奇，但对美洲说来却是一种新事物。萨特写道，“这种教师式的滔滔雄辩，有时候有点沉闷，有时候生动活泼，使这个法国听者不知不觉地觉得好象在听佩居伊^①讲话。”^②其他一些人则想到墨索里尼。然而，卡斯特罗自己后来说：

我们的群众和法西斯的群盲有重大的区别……我们的群众

① 夏尔·皮埃尔·佩居伊(1873—1914)，法国作家，思想上深受法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格森的影响。——译者

② 萨特：《萨特论古巴》，第34页。

不是狂热的。说得更恰当一点，他们是在劝导、分析、说理的基础上形成了坚定的信念的。法西斯党徒却把一些似乎满足的群众聚在一起。〔可是〕他们对群众的组织和动员都是用典型的军事手段来做的。他们决没有自发性，而且更没有我们的公众集会所表现的那种热情和规模……我们提供了各种便利，所以，可以把他们送来开会，可是绝对没有一个人是非要他来不可的。①

在他讲这段话的时候——1964年——肯定已经有某种人（例如中等学校的学生）却确实非去不可了。但在1960—1961年，那种热情却显然是真实的。

到了1961年4月的时候，美国尽管在情报方面花了很多钱，却不甚了解古巴国内的种种矛盾和种种显著不同的情况。古巴这个国家现在只有三分之一多点的农业和大约一半的工业掌握在国家手里，而政治权力却集中于一个人和他的追随者的手里。卡斯特罗的新盟友共产党人以及他们在大西洋彼岸的强大的朋友具有肯定的但是不明确的影响。这就是肯尼迪的美国所面临的挑战。美国这个国家，同古巴一样，也为前十年的错误所烦恼；可是它的稳固的政治结构却完全不同。通常，人们悬殊越大，相打越少。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社会却似乎不能共处。一方确实已经准备入侵另一方，另一方也在尽其所能地损害它的对手在美洲其他地方的利益。他们似乎即将为了最简单的原因而相打：他们是仇敌。因此回想起来真奇怪，不仅美国在关塔那摩湾的基地每天

① 洛克伍德书，第179页。

继续从该市雇用两千名古巴人，而且，每天（即使在 1961 年 4 月）有两架飞机满载流亡者从哈瓦那飞往迈阿密。就必须负担出国的空运费用而论，人数是很多的。到了 1961 年 3 月，或许已经有十万人离开古巴，大多是到美国去，但也有人到西班牙、墨西哥和南美的其他地方去，实际上还可以从哈瓦那打电话到迈阿密，也可以从迈阿密打到哈瓦那，电话往来很多，有的暗通谍报，大多数是亲友问候；美国与古巴之间的国际斗争以及在它背后的美苏斗争，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只是古巴的内战从而带来了通常的党派之争所引起的悲剧和麻烦。

第三十一章

猪湾之役

“〔1961年4月〕15日早晨，”卡斯特罗后来回忆说，“我们没有睡觉，因为奥连特省传来了一些消息。因为一切迹象都说明，随时随刻都会发生入侵。我们就守候着。”他认为，入侵将发生在奥连特。已经派了十二个营和炮队去加强沿海的防御，虽然最可能的登陆地点——那些可以通往山区的地方——早已尽可能保卫好。卡斯特罗总是假定入侵会以袭击他的空军开始，于是，他不象纳赛尔在1956或1967年那样，已经分散了他的为数很少的飞机，把它们加以伪装，并在它们四周布置了炮队。因为当时古巴的空军力量很小——十五架B-26轰炸机、三架T-33型和六架“海神”式；苏联许诺的米格飞机还未到达。这些飞机都一架一架地分散开，同时，把一些已经不能使用的飞机停在一起，以诱骗袭击者。卡斯特罗然后到军事总部去，命令全面警戒。

上午六时，两架有古巴标帜的B-26轰炸机飞到总部上空，丢下炸弹。另外六架B-26轰炸三处古巴飞机场（圣地亚哥、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和巴腊科阿）。这些B-26型当然是经过中央情报局油漆伪装的美国飞机。它们由流亡飞行员奉比利法尼亚上尉之命从尼加拉瓜飞来，比利法尼亚上尉一年前还是驻墨西哥的武官，代表

他现在在轰炸的这些机场所属的政府。这时候，从尼加拉瓜出发的入侵舰队已经在海上航行了十二小时，只消再走四十小时就可以到达古巴。在奥连特登陆的谣传是美国海军精心设计的声东击西的策略，此外，他们还打算让一批古巴流亡分子一百六十八人，在尼诺·迪亚斯上尉率领下，在关塔那摩附近登陆，不过未能做到。^①

在哈瓦那和其他一些城市的轰炸引起了公众很大的恐慌。除了三十年代一些小乱以外，古巴同美国自己一样，以前从未受到这种现代化战争的光顾。在经年累月的谣言之后，恐慌是很自然的。可是所造成的军事损失很轻。哈瓦那本来就没有军用飞机。军用飞机中没有一架受到多少损伤，虽然地面上有些诱骗物被炸掉了。在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一架战斗机被炸毁；在圣地亚哥，被炸毁了两架。另有几架飞机受到损伤。另一架战斗机升空避开。叛乱者的飞机在他们的目标上空盘旋几次，扔下炸弹后又用机枪扫射，然后在高射炮火力太强时才罢休。进攻的飞机一架也没有被击落。地面上七人死亡，四十四人受伤，其中有妇女二人。

卡斯特罗立刻打击地下组织。警察在阿梅赫拉斯的率领下在4月15日一天搜捕了一切略有可疑的敌视政府的人物，有罪的或者无辜的、怠工者和教士、男人和女人。说来滑稽，阿梅赫拉斯虽然是个坚决的反共分子，却

^① 所以选用B-26型是因为它们虽然是老式、速度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残余物资，但许多国家都有这种飞机。中央情报局以为这样可以不使人们认为它们是美国飞机（索伦森书，第301页）。尼加拉瓜和古巴之间的飞行时间意味着这种飞机每次飞行只能在古巴上空最多一小时。

是卡斯特罗的忠实的追随者。布兰基塔戏院、拉卡瓦尼亚要塞的围壕、普林西佩要塞以及马坦萨斯的棒球场都关满了被拘留的人。这种不成功的空袭给了卡斯特罗一个时机，可以粉碎反对派地下组织可能帮助入侵的一切机会。这一点对中央情报局说来是无关重要的，该局早就看不起地下力量的重要性，他们甚至还不屑同该局自己出钱雇用的间谍保持有效的联系。^①那一天，电台广播了许多激励人心的话。格瓦拉讽刺地宣称：“给我们教训最多的老师向来就是帝国主义。每当我们精神松懈或者想要休息的时候，帝国主义就象今天这样地指示我们，在革命中，人是决不能休息的。”^②

与此同时，在迈阿密，一架由马里奥·苏尼加上尉驾驶的B-26飞机直接从尼加拉瓜飞来着陆；为了作出战斗的假象，他在飞机上故意弄出一些弹眼来。他捏造事实说，由于他当时是卡斯特罗的空军人员，他决心反叛，轰炸了几个古巴机场后，就飞到安全的地方。这时有一架参加过轰炸的B-26机，事先未经安排飞到基韦斯特，后因引擎发生故障，飞向迈阿密，而不回尼加拉瓜；这架飞机的到来使他的故事显得混乱起来。由于苏尼加不肯说出他的真姓名，更使整个故事大为减色；假如他所说的是真实的，古巴政府大概会很快地查出这个叛徒的身份。可是

^① 比斯尔对我说：“我们的活动并没有因为空袭后哈瓦那有很多人被捕而受到妨碍……我们本来就不指望地下组织起什么大作用。”（1963年1月，一次会见中的谈话。）不过，可以参考莱曼·柯克帕特里克的相反的意见，《中央情报局的真相》，第197页，他说这些拘捕是“对……活动的第一次灾难性的打击”。

^② 《吉隆滩》，第1卷，第19页。

他给拍了照片。他那个在迈阿密的妻子认出了他，当然要同他取得联系，因为自从他好几个月以前去危地马拉以后，她已经好久没见到他了。有些老练的新闻记者也注意到，古巴的 B-26 型，机首是树脂玻璃的，而迈阿密的两架飞机，机首却是不透明的。此外，使人觉得希奇的是米罗·卡多纳博士和古巴革命委员会竟然能在纽约报纸上兴奋地发表谈话，好象他们完全知道当时的情况似的。米罗先请记者们细看“这些夜里没有睡觉的革命者的眼睛”，然后说，“委员会曾同这些勇敢的飞行员保持联系并鼓励他们。”天呀，可怜的米罗处于反动地位竟然还要自称是革命者。古巴政府终于宣布在哈瓦那上空使用的机关枪弹药是美国制造的。

古巴政府在国际方面也很活跃。哈瓦那的外交使团被召到外交部，给他们看一些显示这次袭击来源于外国的证据。外交部长罗亚成功地在联合国提出了侵略问题，艾德莱·史蒂文森重复了肯尼迪的保证，说美国决不会参加反古巴的行动，并且说那些来到迈阿密的飞行员一定是古巴人，他们的飞机也是古巴的；他拿出一张这些飞机的照片，飞机上有古巴的星号。危地马拉的代表撒谎地否认曾经在他的国家里训练过古巴人。史蒂文森的二把手哈伦·克利夫兰曾得到中央情报局保证，说来到迈阿密的飞行员确实都是古巴空军的叛离者。显然，国务卿腊斯克恰巧把迈阿密的这两个人同真正的叛离者罗伯特和吉列尔莫·贝达格尔（前一天到达佛罗里达的空军军官）两人混淆了。然而，实际上，事情已经清楚，“假造的故事”在联合国里或者在美国舆论面前都是站不住脚

的。史蒂文森后来发现他被瞒得去欺骗全世界时非常生气。奇怪的是他并未辞职。

同时，在进攻的船上，军官对部队扼要地讲述了形势。中央情报局的教练对这些军官说，轰炸任务胜利完成，卡斯特罗的空军实际上已经被摧毁了。^①那天晚上，在奥连特海上由尼诺·迪亚斯率领的诱骗性舰队又未能登陆，尽管有一个中央情报局的人在船上指挥。^②这些入侵者一路驶来，忘却了他们现在要在同早先打算大不相同的情况下登陆。

中央情报局原来认为 B-26 飞机再进行两次空中打击就可以完全结束第一次所做的工作，而同登陆相配合（在 4 月 17 日黎明）。这些飞机应飞往该局希望当时已经占领了的海滩。^③可是，肯尼迪取消了这两次空中袭击。中央情报局的负责人比斯尔和卡贝尔将军因此“深感不安”，虽然还不至于闹得一定要亲自去见总统。^④他们只是把命令传达给他们在危地马拉的下属。同时，肯尼迪早先（4 月 16 日，星期日中午）已同意远征队继续开到海滩。

① 圣罗曼对约翰逊说的，见海恩斯·约翰逊：《猪湾；2506 大队一些头目的故事》，第 94 页。

② 安东尼奥·坎皮尼亚的证词。

③ 卡贝尔将军和比斯尔对马里奥·拉索说的（《插进心脏的匕首》，第 256 页），证实原来计划了三次空中袭击，而不是施莱辛格所说的两次。

④ 他们部分地由于误信第一次袭击已经摧毁了比实际更多的飞机。肯尼迪后来认为这样的取消是一种“错误，但不是决定性的错误”（施莱辛格书，第 266 页）。这里他大概说错了。参阅拉索书，第 273 页以下，和莱曼·柯克帕特里克书，第 198 页（他说，中央情报局的代表认为计划的改变是“犯罪性的疏忽”）。

在哈瓦那，卡斯特罗在为前一天在空袭中牺牲的七人举行的葬礼上，对大批群众发表演说。他回溯“库布尔号”事件，他再次把那回的破坏归咎于美国。他提到以美国为基地的飞机对甘蔗田的空袭；又提到珍珠港，以及美国受到多么大的耻辱。他讽刺地朗读合众社的电讯，其中报道了美国对这事件的陈词滥调。他讥笑肯尼迪和史蒂文森。“滚出去”、“杀人犯”、“胆小鬼”、“誓死保卫祖国”、“枪毙”的叫喊声和一些轻快的小调不时地打断了演讲。

前进，前进，
让那些不喜欢它的人
吃一剂烈药！

菲德尔和赫鲁晓夫
我们拥护你们俩！

第一首是在卡斯特罗第一次提到古巴革命是社会主义的时候唱起来的。

工人和农民同志们，
这是一场贫苦人的、由贫苦人进行的、为了贫苦人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昨天的袭击是雇佣军侵略的前奏。各个部队应该开往所属营地……让我们高唱国歌，高唱爱国歌曲，高呼“投入战斗”，以“为祖国而死虽死犹生”，“带着锁链而生就是生活在屈辱和欺凌中”的信念，向民兵营房前进，组成战斗

营，准备好迎击敌人！

卡斯特罗就用这些话，来准备战斗。

傍晚，入侵舰队带着由美国海军从韦克斯的空军基地派来的登陆艇在西恩富戈斯以南三十哩集合。

与此同时，革命委员会（卡斯特罗称为“蛆虫委员会”的那个影子组织）在纽约开会。委员会的成员已经是这个部或者那个部的部长（例如交通和电讯、教育和建设），中央情报局叫他们准备回古巴，于是由本德—德罗勒率领他们飞到迈阿密，在那里吃晚饭并发给制服。他们等在那里。他们的主子什么也不对他们讲。他们实际上就是囚犯吗？他们上床睡觉，完全不知道他们名义上所指挥的远征将在他们睡觉时开始；理由是为了“安全”，这是任何一个同盟的主要伙伴用来欺骗同伙的一种老借口（而且往往也不无道理）。肯尼迪是不知道这种拘留情况的。

入侵部队现在准备登陆了。它的政治领导人是天主教徒、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的前督察员曼努埃尔·阿蒂梅；军事指挥是何塞·佩雷斯·圣罗曼。他和所有的六个大队长——每一大队只有二百人——都是1959年以前的陆军军官，^①此外还有副指挥（埃尔内多·奥利瓦），参谋长（拉蒙·弗雷尔）、和空军司令（曼努埃尔·比利亚

① 亚历杭德罗·德尔巴列
乌戈·苏埃罗
巴伦廷·巴卡辽
罗伯托·佩雷斯·圣罗曼
里卡多·蒙特罗·杜克
弗朗西斯科·蒙铁尔

第一伞兵大队
第二步兵大队
第三装甲大队
第四重炮大队
第五步兵大队
第六步兵大队

法尼亚),这些军官中有许多人还年轻,同内战没有什么关系。其中有几个,包括佩雷斯·圣罗曼和他的弟弟在内,曾经同“纯贞派”有过含糊的关系(“纯贞派”是一伙起义军官,以巴尔金为首,曾于1956年企图推翻巴蒂斯塔,巴尔金于1957年后期实际上被关了一个时期)。圣罗曼同阿蒂梅、奥利瓦、巴雷拉·卡诺萨以及比利亚法尼亚一样,1959年曾在卡斯特罗手下工作过,^①第五大队的队长蒙特罗·杜克曾率领一个营在马埃斯特腊山里打过卡斯特罗,并因此于1959年1月间逃亡国外。

远征队主要是由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人构成的,虽然也有大约一百名工人阶级的古巴人。平均年龄三十左右,虽然有一个人是六十一岁。大约有五十名黑人和略多一些的黑白混血种人,包括副指挥奥利瓦在内。大约有二百五十人是大学生出身,一百三十五人在不同的时候当过兵。队里大多数是天主教徒,其中三位神甫,全是西班牙人,一位在内战中佛朗哥的军队里当过军官。入侵者的肩章是盾形,当中有一个天主教的十字符。队里的政治观点多种多样,从极右到中间。它显然不包括任何象曼努埃尔·拉伊这样的左翼人物,或者他的组织(革命复兴运动)的成员。有一两个人(例如《海洋日报》编辑人员家属中的弗利佩·里维罗)认为他们自己是第三立场的民族主义者——纳赛尔主义者。有一、两个人(例如何塞·曼努埃尔·古铁雷斯)几乎是出于偶然而呆在那里

^① 后面这两个人曾分别任古巴驻墨西哥大使馆海军和空军军官直到1960年初。(从尼加拉瓜出动的)飞行员之中有法利亚斯上校,他负责卡马圭空军基地时曾对卡米洛·西恩富戈斯之死进行过调查。

的,因为他们的朋友也参加了,还有一些人则是因为他们想要工作。米罗·卡多纳、巴罗纳、劳尔·加西亚·梅诺卡尔、“米略”·奥乔亚、阿隆索·普霍尔^① 这些人的儿子都在里面;还有巴蒂斯塔的议会议长坎迪多·莫拉(当时古巴对外贸易部长的叔父),他一度是马斯费雷尔的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员,又是1957年3月17日企图行刺案的已死的头头的哥哥;还有巴蒂斯塔的驻日本大使(加西亚·蒙特斯);从远征队和他们本人的立场来说都是愚蠢的行为的是,还有几个巴蒂斯塔时代出名的杀人者,包括拉蒙·卡尔维诺(名义上是属于海军方面的),他在一度成为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成员以后曾亲手杀害了二十个人;何塞·佛朗哥·米拉;拉斐尔·索莱尔·普伊格,他亲手杀过多米尼加流亡者“皮皮”·埃尔南德斯和共产党员码头工人领袖阿拉塞利奥·伊格莱西亚斯;加上豪尔赫·金·尤恩,他是一个普通刑事犯,于1960年逃出古巴时杀死一个民兵。如果入侵成功的话,这一伙人已被派定了一项邪恶的任务:对付政治上的反对派。^② 卡斯特罗的会计人员后来计算出,远征队中的一千五百人,当初在古巴拥有一百万亩土地、一万所房屋、七十家工厂、五处矿山、两家银行、和十家糖厂。事实上,入侵的队伍是那些反对卡斯特罗的人的一个具有显著代表性的横截面。

① 普里奥的副总统。

② 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在华盛顿似乎不知道其中有这些人,这实际上是明确地违反他的命令的。也有其他几个过去历史可疑的人,例如罗森多·巴尔德斯,他曾在一个臭名远扬的警察所当过“自警团员”,和马里奥·弗雷里,他是巴亚莫的一个名声成问题的地主。

这些人的训练情况差别很大。有些只训练了一个星期，有些根本没有受过训练。另一些人已经在危地马拉的丛林里踩了将近一年。大多数人所受的训练也不过是两个半月。由尼诺·迪亚斯率领，准备在奥连特登陆的大约一百六十人中，半数只受过一星期的训练（这一批人预定作牵制攻击并着手进行游击战）。

在一个教士（伊斯迈尔·德卢戈神甫）的行李中，后来发现一件宣言，内容说：

我们以上帝、公道和民主的名义前来……我们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新生而来的……进攻部队里有数以千计〔原文如此〕的古巴人是纯粹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古巴的天主教徒们：我们的军事力量是无坚不摧的和战无不胜的，我们的精神力量还要大，我们相信上帝，相信他的保护和他的帮助。古巴的天主教徒们：我代表解放军的战士拥抱你们。不久你们就要同家庭、朋友和亲戚……重新团聚。要有信心，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因为上帝同我们在一起，慈悲圣母不能抛弃她的孩子。天主教徒们！自由、民主和天主教的古巴万岁。我主基督万岁！

在这些以及其他一些说法的鼓舞下，入侵部队在离岸二千码的地方抛下了锚，佩雷斯·圣罗曼的“布莱加号”和“卡里布号”停在吉隆滩海面上，奥利瓦的“豪斯顿号”停在萨帕塔沼地对面（“豪斯顿”这个名字用在古巴流亡兵舰上虽是不祥却很合适），一起的还有“巴巴拉号”运输舰。由蛙人标定登陆地点，首先上岸的是北美人

(这也适当)。在吉隆滩，有一个化名“格雷”的中央情报局的军官；在长滩（在猪湾口），有一个名叫“里普”的特务。这些蛙人对登陆乱搞一气，并开始同一辆巡逻的吉普车交起火来，同时两处海滩上已经开始猛烈交火，而真正的队伍却没有多少人登陆。由于完全不知道海面有珊瑚礁，使得登陆更加复杂，这些礁石撞毁或者延迟了几只登陆艇。“布莱加号”开始用七十五毫米大炮在黑暗中乱轰。指定给奥利瓦的登陆艇的领航员掉下了海里。登陆艇的引擎发生了故障。因此登陆的行动耽搁了六小时左右。黎明时，供应品、军火储备和整个第五大队还在船上。有一批人，即由巴伦廷·巴卡辽率领的所谓第三大队，在吉隆滩登陆后赶往吉隆小型机场。他们到了那里后就开始清理机场，准备飞机降落。佩雷斯·圣罗曼和奥利瓦两位指挥，也分别到达吉隆滩和长滩。

卡斯特罗在凌晨三点十五分从吉隆滩和长滩两处民兵组织发出的微波电讯中听到入侵的消息，电讯于四点钟左右停止。这时，一营起义军，在公共工程部长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卡米略的弟弟）的率领下驻在长滩北面内陆二十哩的澳大利亚糖厂；有一小队一小队的武装木炭工人分布在这很湿的地区里面和周围，以吉隆滩北面的罗曼诺小岛为基地，在长滩和它隔壁的布埃纳文图拉的西南面。这个地区一直没有被认为是一个可能入侵的地点，因为它距离山区很远，而且交通困难。在硬土的林区背后，沿海岸延伸十公里，是一片无法通行的沼地，革命前，只是两条窄轨铁路的交叉点，一条是从猪湾到澳大利亚糖厂的糖业路线，另一条是从海岸线上的吉隆到

科瓦东加糖厂。这个地区，革命确实为那些以前作为佃农的三四千个烧炭者带来了变化。已经修了三条横贯沼地的大路，正分别在吉隆滩、长滩、和特索罗湖建造旅客中心。这个地区的生活标准在最近两年中一定已经有了急剧的提高。再则，这个地区实际上现在已成为伟大的扫盲运动的示范地区，有二百名成年教师在那里工作。另一方面，有三百名来自沼地的儿童正在哈瓦那学习各种手艺——制陶器、制革、和木工。

要在古巴找到一个不容易在当地人民中鼓动造反的地区，确实是很困难的。可是话得说回来，这种事情毕竟不是中央情报局的目的。然而，一旦入侵者有了立足之地却是不容易把他们赶出去的，因为只有从三条陆路才进得去，根本无法越过沼地。有了桥头堡以后，就可以迅速建立起一个临时政府来。不过，沼地民兵的配备很好，特别是配备有关系重大的微波无线电。也是卡斯特罗运气好，肯尼迪在最后一分钟决定放弃第二次的空中袭击。

卡斯特罗的第一着棋是使他的空军处于警戒状态，并命令在澳大利亚糖厂的西恩富戈斯的一营人南进抗敌。马坦萨斯省的民兵也奉令向南移动。卡斯特罗自己飞到澳大利亚糖厂。一位能干的前正规军官何塞·费尔南德斯（“加列戈”）奉命担任全面作战指挥。他在以后几天中，表现得可说是卡斯特罗的将领中最冷静的一个，虽然后来在英雄的神话中很少提到他。他作为一位指挥似乎肯定比弗拉维奥·布拉沃“少校”称职得多，后者是卡斯特罗在大学里同学（青年共产党员），被任为民兵的指挥。

黎明时分，两架古巴的“海神”式飞机、两架 T-33 喷气式教练机(美国制订计划者完全忘记这事了)和一架古巴的 B-26 型开始袭击登陆艇和在猪湾的军舰。B-26 型被击落，但是对敌人登陆的最后阶段所造成的混乱和损失很大。当入侵的伞兵开始到达吉隆滩时，他们那些慌乱的同伙在他们降落时对他们开火。还在“豪斯顿号”上的第五大队(入侵队伍中经验最少和训练最差的)于是拒绝登陆。从尼加拉瓜飞来一架入侵的 B-26 型机——费掉三个半小时的飞行时间——为入侵部队提供掩护，却未能制止混乱。“豪斯顿号”和“巴巴拉号”两舰这时都受到两架 T-33 喷气式飞机和一架“海神”式的攻击。“豪斯顿号”被一架喷气式飞机发射的火箭击中，开始下沉，满载着军火和油料。第五大队跳到海里，大约有三十人淹死，其余的狼狈地聚集在海滩上找他们的指挥。与此同时，上午九点三十分，在吉隆滩前面，载着大部分军火、汽油、食物和药品以及通讯器材的“里奥·埃斯孔迪多号”也中了一架“海神”式所发来的火箭。该舰在大爆炸中立刻炸毁。^①其余的船只退出危险的作战区域，舰长们答应入侵部队司令佩雷斯·圣斯曼，当晚他们一定回来起卸其余的军需品。可是他们留给部队当天应用的东西很少。伞兵已经在沼泽地里丢掉了大部分配备。坦克虽然已经成功地在吉隆滩登陆，却还没有开始跟佩雷斯·圣罗曼和奥利瓦分别指挥的两股入侵者取得联系。

^① 美国关于远征军失败原因的调查委员会(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罗伯特·肯尼迪、海军上将伯克、艾伦·杜勒斯)特别重视这件事(索伦森书，第 297 页)。

上午十点钟，在猪湾上游的奥利瓦的部队同来自澳大利亚糖厂的民兵队伍在长滩发生战斗，伞兵的力量不足，无法迫使他们远退。东面，在吉隆滩，入侵部队的伞兵已经在横越沼地的两条路上设置了路障，同时，圣罗曼保护通往西恩富戈斯的沿海大路。在这个范围以内，入侵者已经占得两个村庄（圣布拉斯和吉隆），那里有许多人同入侵者共命运，以食物和水帮助他们，有五个人参加为战士。同时，马坦萨斯的民兵，在一支来自民兵领导人训练学校经过很好训练和配备良好的队伍的配合下，正从科瓦东加糖厂南进走向伞兵所设的路障；另有从西恩富戈斯开来的一营步兵也顺着沿海大路向西移动。大约一百五十名民兵已被俘虏，其中若干人——据远征队说，五十人——加入了入侵者的队伍。

在美国国内，古巴革命委员会出乎意外地在黎明时听到由纽约的一家公共关系公司（卢·琼斯）玩弄辞藻地用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入侵的消息，这家公司，正如阿瑟·施莱辛格讽刺地对我们说的，有一次曾被温德尔·威尔基利用过。他们感到忿怒。在华盛顿，迪安·腊斯克在记者招待会上避免直接谈到古巴问题，因为联合国正在就此问题举行辩论。在那里，罗亚在苏联的支持下正在安全理事会谴责美国暗中帮助侵略。史蒂文森十分苦恼地尽力应付。

卡斯特罗这时以最彻底和最坚决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打击一切反对派。在4月15日和4月17日傍晚的空袭之间，或许已有十万人被捕，包括所有的主教（圣地亚哥的佩雷斯·塞兰特斯是在家拘留的），许多新闻记者和

绝大多数真正的地下分子，包括中央情报局二千五百名间谍中的大多数以及他们的有嫌疑的反革命同情者二万人。许多北美的新闻记者被关进了非常拥挤的监狱里。一些被监禁的反革命领袖人物，例如索里·马林^①（马埃斯特腊山里的总军法官和1959年的农业部长）、欧费米奥·费尔南德斯（普里奥的警察头子和前吉特拉斯革命行动的司令）、阿图罗·埃尔南德斯·特拉埃切（普里奥的劳动部长和1959年“特鲁希略阴谋”的头头）、和冈萨雷斯·科尔索（革命复兴运动的怠工者），都被枪毙。在这些日子里，所有在古巴发生任何内部事变的可能性全被无可挽回地消灭，也许永远地消灭了；可是，中央情报局并不重视这种事态发展。他们仍然坚称只有入侵才能导致反革命。甚至最近几个月中由中央情报局派到古巴去作为渗透者的一批人，也被丢在那里不给指示。有些人听到天鹅岛无线电台发出了莫名其妙的信息：“注意虹彩”或者“鱼很快就要浮起”或者“鱼是红的”；可是谁也不知道这些意味深长的词句指的是什么。有一个人也许过分乐观地报告说，他部下的“人时刻彼此保持联系，随时准备行动，可是，令人难以相信地，他们始终没收到美国方面发来约定的信号”。^②傍晚以前，卢·琼斯机构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该会的委员事实上仍然被扣留在迈阿密）发出一项呼吁书，号召“搞一个协调一致的怠工和叛乱的高潮”；这时，在古巴国内几乎已经没有一个反对政府的人还能自由地响应这种鼓舞人心的号召或者其他更为隐

① 他显然曾两次企图杀害卡斯特罗，第一次获得赦免。

② 拉索：《插进心脏的匕首》，第26页。

蔽的号召了。

然而，在海滩上，奥利瓦的部队暂时还顶得住他们眼前的敌人。沿着通往澳大利亚糖厂的大路开来的马坦萨斯民兵领导人的队伍，在入侵者的第一次陆空配合的进攻下，损失严重。这时候，古巴部队毫无空军的支持，所有可以出动的飞机都忙于攻击入侵者的舰艇。可是几分钟以内，流亡分子的飞机就被一架 T-33 型和一架“海神”式击落了。T-33 喷气式教练机比入侵者的 B-26 型快得多，显然成为战斗中的主力。然而，在两面战线上，入侵部队都支持下来了。他们此时需要他们的供应船。但是，这些船只因为受到古巴 T-33 型飞机那么穷追猛击已经离开很远，不愿回来。“卡里布号”已经向南逃了二百一十八哩，“阿特兰蒂科号”逃了一百一十一哩；旗舰“布莱加号”和“巴巴拉号”也逃走了。“布莱加号”的古巴船员不肯回去，除非美国海军介入；而美国海军自然不肯介入，虽然船上的美国军官想要回去，而且，没有疑问，假如不是因为有电报通讯以及其他的现代设备，他们一定已经回去了：“假如当时有电报的话，纳尔逊^①决不会打胜仗”，一位英国海军上将这样说。

入侵部队就这样被它的供应船遗弃了，因此，在 4 月 17 到 18 日的夜晚，不是他们获得补充力量的时候，而是古巴政府部队对其重新发动进攻的机会；后者在能干的何塞·费尔南德斯少校指挥下，首先在圣布拉斯一线上用装甲和坦克一起配合出击。攻势被德尔巴列带领的入

^① 纳尔逊(1758—1805)英国海军大将。——译者

侵伞兵用火箭炮和迫击炮的火力压住了。但是，在坦克后面来了四营步兵，配备有榴弹炮和更多的坦克。他们也被压住了。对西面的长滩阵地也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第一次使用 122 毫米的榴弹炮。大炮的火力惊人。炮击停止时，奥利瓦用入侵部队的坦克进攻，顿时遭到卡斯特罗的坦克反攻，未获进展。卡斯特罗的部队已经深入沼地，开始包围拉莫纳角，同时用坦克经由直接路线狠狠地尽力进逼。卡斯特罗的攻击用了大约二千人——民兵一千六百人、正规军三百人、警察二百人、坦克二十辆。双方都发现自己的武器具有惊人的威力，双方都认为自己象英雄一般战斗。可是到天亮时，政府军的苏联坦克继续进逼，入侵的第二大队大为慌乱，虽然后来奥利瓦又把他们集合起来，奥利瓦表现出是一个称职而勇敢的指挥。

因为 4 月 15 日的空袭已经证明完全失败，（星期日取消的）第二次袭击又恢复执行了。来自尼加拉瓜的 B-26 型应于黎明时再袭击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据说这里的机场是给“豪斯顿号”和其他 B-26 飞机以致命打击的 T-33 飞机的基地；可是大雾阻碍了这次的袭击。飞行员们只得郁郁地飞回尼加拉瓜。一小时左右以后，上午八点四十五分，入侵部队负责长滩部分的指挥奥利瓦在同其他指挥官开会时提议，由于对方强大的进攻力量集中在他这一翼，整个的入侵部队应该沿着西恩富戈斯大路到埃斯坎布拉伊山重新组合。这本来是美国准备的另一手计划，可是佩雷斯·圣罗曼以前不知道，所以他表示反对，认为太远，而且他觉得美国最后一定会帮助入侵部

队摆脱困难。他这个幻想，由于同中央情报局的“格雷”通了一次无线电话，而更有信心。“格雷”向他保证“我们决不会抛弃你们”，主动提出，如认为必要可以撤退队伍，并说“喷气式机就来了”。这个幻想便变成大家都以为美国事实上很快就要介入了。整个下午入侵部队都在等待，有一次，来了两架美国的“马刀”喷气式飞机，在战地上空飞翔，大家都高兴了一阵，可是显然它们毫无举动。^①

与此同时，卡斯特罗的部队由于摸不清对方进攻的人数，一时举棋不定，不敢进行决定性的、一举而使对方失却战斗力的打击。只是到了下午六点钟左右，大炮才开始再次轰击，这一次以吉隆滩和圣布拉斯为目标，接着又从陆上开始进攻。

大约就在这时，美国的B-54飞机在吉隆滩上空投下供应品，可是，只是增加了一次挫折，因为风把这些东西都吹进了大海或者丛林。然而，很大一部分被找回来了，一半是由于吉隆滩的市镇居民的帮助。同时，“布莱加号”、“巴巴拉号”和“阿特兰蒂科号”这几艘军舰在猪湾以南大约五十哩，不知道怎样解决它们自己的问题：美国政府准备怎么办？没有充分的空中掩护，船员能回岸吗？中央情报局显然未向华盛顿请示就取消了再回去卸货的命令。

在华盛顿，已经开始了互相责备。早晨，肯尼迪收到

^① 这一点不清楚。卡斯特罗说美国喷气式飞机在高空袭击他的一队人并造成很大损失，有一个入侵者告诉约翰逊说，他看到袭击的迹象。喷气式飞机可能来自航空母舰“埃塞克斯号”。可是他们并未奉令进行这次飞行。中央情报局的“格雷”告诉圣罗曼说，飞机到那里是专为防备古巴飞机的（参阅约翰逊书，第148页）。“格雷”也对圣罗曼说，头上有很多其他的飞机。

了赫鲁晓夫一封信，答应给古巴人以“一切必要的援助”。中午，肯尼迪私下懊悔他留着艾伦·杜勒斯当中央情报局的头头。肯尼迪和他的顾问都没有听信卢·琼斯那份乐观的公报——“农民、工人和民兵都参加了自由阵线”——也不相信迈阿密报纸上（甚至一家英国报纸上）那些热烈的消息，说什么圣地亚哥已经陷落，中央公路已在科隆被切断了。下午，他和他的顾问以他们所能鼓起的最大热情答复赫鲁晓夫前一天的抗议：“人类历史上的伟大革命……是那些决心要获得自由的人们的革命。”

当天晚上，情况已经清楚，入侵部队已受到配备有大炮和坦克的两万军队所包围，一大股一大股的人已经越过沼地进入靠近海岸的艰苦的森林地。肯尼迪去参加舞会了。可是他无法参加到底。深夜，比斯尔和伯克海军上将竭力主张利用停泊在古巴海面的航空母舰“埃塞克斯号”进行空中打击，消灭 T-33 型，从而使那些在尼加拉瓜的疲乏的 B-26 型驾驶员可以抽身去对付卡斯特罗的坦克。这两个人都想扩大冲突，挽救入侵部队。^①

这是入侵处于危急关头的时刻。假如肯尼迪同意从“埃塞克斯号”放出飞机，前途也许会变得不同了。可是他只准许“埃塞克斯号”母舰上没有标帜的六架喷气式飞机于次日黎明在猪湾上空飞翔，掩护来自尼加拉瓜的 B-26 型进行袭击，并帮助掩护“布莱加号”和“巴巴拉号”

^① 作者问比斯尔，“到底你是赞成美国提供空中掩护吗？”比斯尔说：“是，我赞成。竭力赞成。当我看到否则将是不可收拾的时候，我竭力主张美国空军干涉。”休·托马斯问：“这会导致美国（全面）介入吗？”比斯尔说：“会”。（1963年1月14日在华盛顿的讨论。）

两舰起卸供应品。这些飞机不得寻求空中或者地面目标，这是一种非常含糊的指示，由于同尼加拉瓜把时间搞乱了，更落得毫无结果。一些 B-26 型（其中两架由美国飞行员驾驶）早到了一小时，在海军的掩护到达以前，大多已被击落。有些在尼加拉瓜的古巴飞行员不肯再为他们认为是蛮干的任务出击。四名美国飞行员丧命。在这种情况下，“埃塞克斯号”的喷气式飞机根本始终没有出动，甚至军舰也始终未靠近海滩设法起卸它们的供应品。

在迈阿密，忿怒的流亡革命委员会终于在早晨见到了施莱辛格和伯利，这是这些委员终于能够把他们的怒火和沮丧都向之倾泻的两个肯尼迪政府的成员。他们已经听到前方不幸的消息，（他们说）他们要到海滩去，或者至少去尼加拉瓜，他们要求空中打击和补充力量。天呀，等到施莱辛格和伯利能够退席去商量的时候，来自海滩的消息已经太坏，连撤退也无法考虑了。

从黎明开始，卡斯特罗的部队就在加紧包围那些被围困的入侵者。伞兵和第三大队一道组织了一次反攻，由于第三大队畏缩不前，反而变成退却。上午十点钟，卡斯特罗的部队拿下圣布拉斯，十一点，坦克和民兵推进到吉隆滩的防御工事。吉隆滩和长滩两处入侵者此时都在后退，彼此被切断了联系。佩雷斯·圣罗曼只能靠一辆吉普车上的通讯员来同各大队指挥联系，虽然他还拼命通过无线电同“布莱加号”上中央情报局的“格雷”保持接触。可是眼前仍然没有援助到来。入侵部队暂时处于优势火力地位，可是，过了一会儿，光是人数的压力便开始成了问题。卡斯特罗的步兵不断挺进，入侵部队的迫击炮终于

用完了所有的弹药。下午已经过去一半的时候，肯尼迪才准许美国海军开近海滩，同其他一些入侵船只一起设法撤退剩下的人。他们自然是太晚了。圣罗曼用无线电说，古巴的坦克已在下午四点三十分到了吉隆滩，并宣称他们准备退入沼地。4月19日四点至五点间，入侵部队破坏了自己的重武器，尽可能以最好的方式分散，有些人^①乘小船出海，希望美国海军来救援，多数人逃入沼地。然而，美国海军并未救起那些幸存者，而是终于掉头他去，这或者是大炮使得它们踌躇不前，或者是由于知道了入侵部队已经溃散了。这些军舰的悄然离去，使得人们大为忿怒：一个入侵兵士说，“跟在这条船后面的是两百年的臭名。”

卢·琼斯公司在纽约设法保全面子，它宣称：“最近在古巴的登陆始终（虽然不正确地）被称为入侵。实际上，那是为那些在古巴战斗多时的爱国人士输送给养和支援。”它又宣传说，入侵者大多已经成功地到达埃斯坎布拉伊山区。

这时，肯尼迪已经接见了古巴革命委员会，并哄得他们同意他那个不抢救入侵部队的决定，不管中央情报局曾对他们或者那些实际参加战斗的人说过些什么。如果美国采取不利于古巴的行动，苏联不会采取不利于柏林的行动吗？^②

因此，肯尼迪在这当口不肯投入主要的美国军事力量是明智的。毫无疑问，一位比较软弱或者比较卤莽的总

① 内中有伞兵指挥德尔巴列和总指挥的兄弟罗伯特。

② 这一顾虑在肯尼迪总统任期内始终使他不安。

统一一定是会这样做的。^① 无论真相如何,或者中央情报局之鼓励入侵者指望美国充分援助在宪法上的根据如何,美国政府这种举动本身就很拙劣,竟然派遣一小撮人去搞一次计划不周的远征,在力量悬殊的不利条件下作战。当然,入侵者是在自欺欺人,而且语言和翻译的困难使得通讯容易弄错;也许他们自己把别人心里本来是含蓄的或者只是一种鼓励的意思当作是明确的东西。中央情报局也许以为入侵部队如果认为美国会把他们救出灾难,就会打得更好,即使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表明中央情报局对心理学的知识很有限了。似乎还可以这样肯定,假如入侵者的一些领导人知道美国政策的真实情况——在曾经说明的范围内——他们一定会订出一种可以适用于不同地点的不同作战计划。可是,当肯尼迪在4月10日说美国军队决不卷入他们的进攻时,他们认为这只是说给外国人听的。北美社会似乎给广告和不正确的新闻报道搞伤了,以致即使比较诚实的政治家也没有人相信他们。

美国政府本身也显得意见分歧、消息不灵和粗枝大叶。肯尼迪同艾登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一样,似乎接受了他的顾问们的看法,认为他的主要对手是“一个歇斯底里患者”因此是无能的。肯尼迪本该取消这个计划,听听富布赖特和施莱辛格的话,他们是总统顾问中仅有的两个反对这个计划的人;^② 他让这个计划继续下去,却心不

^① 尼克松在1964年12月的《读者文摘》上说,他当时在古巴问题上向肯尼迪所提的意见是“找一个适当的合法理由……继续干”。

^② 除了切斯特·鲍尔斯,他没有密切参加这些讨论。施莱辛格单独反对过,他的理由是这种计划行不通,而不是因为它是错误的。

在焉,说明他这个人在掌握命运上,还不如哈姆雷特这个无法控制廷臣的王子。同时,席卷拉美的抗议怒潮,帮助了卡斯特罗的事业,其效果超过所有他自己的宣传运动以及秘密花钱和散发小册子加在一起的力量。

卡斯特罗的部队俘获一股一股的幸存入侵者。最后共有俘虏一千一百八十人(登陆者一千二百九十七人),包括大部分领导人物在内,他们的幻想破灭了,惊慌失措,并认为自己受了欺骗。至少有一个人(他有入侵部队的队旗)到了哈瓦那并得到一个大使馆的庇护。入侵部队在战斗中损失八十人,在登陆中损失或许三十到四十。九人在前往哈瓦那途中死在过于拥挤的卡车上;除了这些人以外,所有的俘虏都受到很好的待遇;卡斯特罗宣布他的损失是八十七人,可是,他在4月19日的讲话中暗示损失大大超过这个数字:根据一个佚名的古巴医生所估计的入侵者的记录,古巴革命政府的损失为一千二百五十人,另有四百人因伤致死,另有两千人负伤。实际上很难相信古巴革命政府损失的人数会比他们宣布的多得多。俘虏未被枪毙,而是等卡斯特罗、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和其他的人公开讯问后拘留,准备在电视中审讯,他们在监狱里境况很苦,最后在一年半以后把他们拿来交换医药用品:① 奥利瓦、阿蒂梅、佩雷斯·圣罗曼、

① 卡斯特罗原来提出要用他们交换五百台大拖拉机,经过在美国进行了一些奇怪的谈判后,终于失败,这些谈判并没有使哪一方有光采;参考海恩斯·约翰逊书,第229页脚注。入侵部队的记录者指责说由于美国的国内政治关系,以致入侵部队不是在1961年6月交换共计二千八百万美元的信用、拖拉机和现款,而是在1962年12月交换六千二百万美元。

每人缴赎金五十万美元释放；其他一些人缴二万五千元，五万元和十万元不等。入侵部队的一半以上，包括圣罗曼和奥利瓦在内，后来参加美国军队。中央情报局在5月初估计入侵的费用为四千五百万美元，这笔钱他们不必向任何上级部门请求拨款或者说明用途。

对卡斯特罗来说，挫败入侵是一大胜利。胜利后举行了庆祝，并在电视上将俘虏示众，在五一劳动节，喜气洋洋地宣布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将来不再举行选举了。他说，革命就是直接表达人民的意志；在古巴，并没有每四年举行一次选举，而是每天都在进行选举。他还说，革命并没有给每个公民一张选票，它给了每个公民一杆枪，1940年的宪法太老，已经过时了。^①卡斯特罗特别谴责西班牙教士，只有那些不是“反革命”的教士才准许留在古巴。所有的私立学校都收归国有。古巴的监狱仍然人满。

肯尼迪痛定思痛，不怪别人只怪自己，他承认自己错了，并且大胆地说：“那种自满、放纵、软弱的社会，即将同历史的垃圾一起被扫荡。只有刚强、勤劳、坚定、勇敢、有眼光的人，这些决定我们的斗争的真正性质的人，才能继续生存下去。”^②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时能够说出这种话来的唯一另一个政治家正是肯尼迪对他感到这样特别仇恨的那一位——卡斯特罗。肯尼迪迅速地着手批准美

^① 《革命文献》，1961年5月1日，第19—20页。苏联比较谨慎，官方在5月1日仍然称古巴为社会主义集团的同情者，而不作为集团的成员。卡斯特的所谓“社会主义”毫无疑问指的是苏联对这个名词的意义——一种走向完善的（但尚未完成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

国空间研究所要使人类“在六十年代届满以前”登上月球的计划；假如美国在古巴取得胜利，也许可能人类还不会在 1969 年获得这一成就。

② 《纽约时报》，1961 年 4 月 21 日。

第三十二章

几次危机之间

挫败入侵后，古巴被推向共产主义同盟正式成员的地位。那些在4月以前对于要不要参加地下组织还犹豫不决的古巴人，现在都自然而然地选择支持卡斯特罗，而不附和那些以佛罗里达为基地的右翼入侵者。卡斯特罗本人仍旧是一切大事的指挥者，仍旧是精力充沛和不知疲倦的演说家，显然仍旧是一切政治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的发言人。1961年全国范围的主要活动，即扫盲运动，是一项共产党人并不重视的计划，这一计划非常清楚地带着革命最初阶段的标志——履行卡斯特罗1960年对联合国所作的诺言。可是，在卡斯特罗下面，他早先那些老部下都已离开了引人注意的地位；代替他们的是一些共产党的头面人物，是一些自三十年代以来在古巴政治中人们熟悉的名字、中年的或者甚至年纪大的人，这些领导人得到自己的名位，讲教条，说道理，发号施令。这一辈人都让位给另一辈领导人。共产党、革命指导委员会、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统一青年运动和少年先锋队，开始偶尔被称为“统一革命组织”；然后这一名词就在报纸上以缩写的大写字母出现——ORI；后来，到了7月，不经过通告就开始把那些老共产党领导人（并且只有他们）一直称为“统一革命组织的领导人”。于是以“统一运动”这个概念

开展了许多活动；听到1961年7月26日有宇宙飞行员尤里·加加林少校出席的纪念蒙卡达八周年的“国民大会”上所迸发出来的那种热烈呼声，人们确实会以为那真是一个心情迫切的民族所渴望的宝贵的东西。卡斯特罗以他惯有的本领把群众说得群情激昂以后，巧妙地问道：“拥护一切革命者都联合在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里的，请举手！”“听到这么一说，在场的每一个人包括卡斯特罗博士在内都一面举起手来，一面高呼‘统一’”。^①

可是并没有一个统一党出现。在7月26日的演说里，卡斯特罗只是说，各革命政党的统一将从基层开始。11月6日，他说“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是“一个精选的群众性小党”，群众虽然可以拥护革命，却不能自称为革命者。^②残存的菲德尔主义者和老共产党员之间有问题吗？如果有的话，报纸上一点也没有什么记载。在马查多未垮台以前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开始工作的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现在已在开始致力于组织“统一革命组织”，作为这种统一党的模型。几乎在每个城市里都设立了统一革命组织的办事处，实际上，它只是原有的共产党的党部。^③它的省级组织的书记完全是那些已经成为“协调、执行和监察委员会”的秘书的人，^④其中有些人已经多年当过共产党的书记。布拉斯·罗加说将来统一党总书记

① 1961年7月27日《革命报》。作者当时在场。

② 《革命报》，1961年11月11日，第9页。

③ 埃斯卡兰特在10月间说统一革命组织在全国一百二十六个城市的一百个城市中设有机构（《波希米亚》周刊，1961年10月6日）。

④ 这些机构的设立依照以前所说的方针办理，到7月底所有的省会里已经全有了。

的人选不可能有比卡斯特罗更好的人。谁能相信这句话？卡斯特罗的才干不是当书记的。他会维持多久呢？多尔蒂科斯总统到贝尔格莱德去参加中立国家会议，又去苏联和中国，可是似乎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布拉斯·罗加去莫斯科参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也没弄清楚古巴共产党能跟上形势到什么程度。

12月初，这些问题中有些似乎已有了答案。卡斯特罗被夹在他的殷勤的新盟友当中，必须生存下去才能胜利。12月2日，他在一次电视讲话中对有点出于意外的全国人民说，他多年来已经至少是马列主义的学徒，甚至在大学里就是，他和他的同志们在五十年代中有意识地乔装了他们的急进观点以便取得政权，由于逐步地获得了更多的经验，他已经成为一个更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将毕生如此。然而，共产党人或者甚至俄国人是不是真正喜欢卡斯特罗的社会主义的概念，还不清楚。卡斯特罗大概不是在说真话，而且最有可能的倒是他还未取得共产主义集团的正式成员的身份，他是在企图敲打前门以便进去，同时也在要求承认自己在古巴和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就古巴来说，政府将来将是“集体领导”的。

三个月过去了。经济情况变得更坏了。1961年农业方面的良好数字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是因为有一些不能再出现的有利因素的缘故。普通家用物品的缺乏引起很多不满。房屋供应不足。似乎到处有很多浪费，特别是在到处都有的军队里。8月间的全国生产会议揭露出“无数管理不善的实例”。美国市场从4月以来已经完全不接

受古巴货物；6月，所有的美国货也不再运到古巴——包括猪油和牛油，古巴人这两项基本食品。公共运输（很多人靠它得到工作）减少。生产和分配的混乱使得那些有汽车的人驱车若干哩到乡下去觅购食物。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的食品购销部，受权专管食品分配，可是它缺少卡车和运货车辆来做好这项工作。迪蒙教授认为1961—1962年全国的果品和蔬菜只收购集中了一半。^①小农场主的产物应该总是卖给食品购销部的，可是这个机构往往不能组织收购。首先他们不区别质量——因此，不出人们所料，质量没有什么改进。价格也是终年保持一律。一切决定仍然依赖哈瓦那。即使按照官方的数字，农业生产1962年也下降。新种的甘蔗落后于计划17%——甘蔗合作社里落后到30%。大米产量1962年将从三十万吨减到二十万吨，每公顷产量从十七公担减到十四公担。玉米的产量也降低。国营农场的产量比残存的私营农场的产量降得更快。“门迪托村〔比那尔德里奥〕的保守的小农民，没有灌溉也没有拖拉机，种的是受了浸蚀的山上的瘠壤，每公顷还收获将近七吨的芋头。国营农场，在比较肥沃的土壤上，有拖拉机又有灌溉，只收得上述数字的三分之二（二到四吨）。”^②国家收购了属于小农场主的大多数猪；很多死掉，主要由于太拥挤。“社会主义的鸡”成绩也不好。各国营农场的产量由于管理能力的不同

① 甚至在1961年，作者记得曾在马坦萨斯看到鳄梨落在树下无人收摘。

② 迪蒙书，第70页。参阅第627页上的意见。芋头是不值线的食品作物。

同出现了很大的悬殊。

工业被改组为大约五十个统一的企业，可是格瓦拉并没有对将来的发展作出全面指示。原料和设备由格瓦拉购买，往往不大考虑准备如何使用。然而，他非常直率地承认“薪俸不能提高；现在我们就是要干。”^① 1961—1962年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集团的援助共达五亿七千万美元，或者每人四十元；比较起来，美国对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援助，只达到每人二元左右。这种每人四十美元的情况，正如迪蒙指出的，相当于非洲许多国家每人的平均总收入。然而，1961年后期唯一的光明点是扫盲运动的胜利结束；即使在这一点上，也似乎肯定是浪费了许多钱来搞一种对经济没有直接帮助的计划，而且据说有些已经学会阅读的人并不见得真正日久不忘。官方统计宣称文盲的比率已经降低到人口的3.9%，到最后只有二十五万人不能读书写字。

国内还没有显露公开分歧的迹象，虽然卡斯特罗的一篇讲话透露出他知道发生了无数的不必要的逮捕，有的人不经过审讯就被拘留几个星期，后来回到家里发现自己的财物已被偷掉。他又说他在一次演说中谆谆嘱咐全国进攻“游民无产阶级”以后，马坦萨斯的一个警察局长就下令逮捕“游民无产阶级”，结果在一个城市里就有二百个同性恋爱者被捕。1962年2月间，卡斯特罗长时期不露面，使人们想到他害病或者甚至死了。他在12月2日曾对他的听众说，他在学生时代已经把

^① “在我们前面还有若干年的工作，”他继续说（《革命报》，1961年11月29日，第3版）。

《资本论》读到三百七十页。他正在读完这本书吗？他还活着的唯一迹象是发表了两次对外政策的声明，其中一次，他似乎明确地表示在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和平共处的问题上与俄国的政策不同。^①一月底，卡斯特罗对美洲国家组织停止古巴会员资格的决议（在埃斯特角召开的会议上通过的^②）作出反应，发表了一篇非常激烈和非常革命的演说，后来被称为“第二个哈瓦那宣言”，在演说中他呼吁拉丁美洲的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必须了解的第一件事和最重要的事是，用空虚的和随便说说的幻想来分散人民的注意力，说什么他们可以用合法手段来战胜那将用血和火来保卫的垄断事业和寡头政治的权力，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正确的”。因此拉丁美洲应该采取古巴式的游击战术。这篇演说也许并未经过仔细考虑，可是它确实在全世界得到共鸣。它被中国赞扬为一种永久造反的号召，并被拉丁美洲所有的革命政党的战斗派用作一种宣言。可是，它在俄国却不受欢迎，虽然俄国政府也曾夸奖这篇演说是表示古巴有意“以和平

^① 参阅对俄国报纸编辑们的谈话，见1962年1月30日《革命报》。参考《真理报》的报道（1962年1月29日《革命报》转载）以及安德烈斯·苏亚雷斯的评论，见所著书第144页。另一次声明是《革命的三年》一文，载1962年1月《社会主义古巴》。他对苏联编辑们说：“拉丁美洲被剥削的群众是不可能同美国佬的垄断事业和平共处的……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被剥削群众和垄断事业之间的国际阶级斗争就会存在一天。”

^② 美国再次企图谴责古巴的共产主义，但是，会议只通过一项决议，说古巴已经自动把自己置于美洲内部系统以外。没有明确规定任何不利于古巴的措施，也没有实行任何制裁，同时拉丁美洲几个最大的国家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和智利在投票表决时弃权，一同弃权者还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

共处的原则作为它对一切国家的关系的基础”。^①

关于在古巴组织一个新的统一党的争论在1月间已酝酿成熟，但毫无举动。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对于这个党的前途时常教条式地夸夸其谈。几次愚蠢地征用农民的土地，显然是真正反革命阴谋的结果，特别是在马坦萨斯的南部和拉斯维利亚斯的东南部。努涅斯·希门尼斯被解除了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行政负责人的职务，卡斯特罗也放弃了这个机构的主席的名义，这个重要名义连同努涅斯的职务都交给了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老共产党员中最能适应变化的人，卡斯特罗的最老的朋友，长期以来在党内批评布拉斯·罗加）。这是共产党人在卡斯特罗的政府中取得的第一个重要的正式职位。可是，在农业中，同那些仍然控制着一半以上土地的独立农场主所闹的纠纷，根据罗德里格斯的说法，只是由于“革命的威信”（或者他应该说，革命的权力）以及一些小农场主继续“相信”卡斯特罗，才得免于发生不幸。这种威信由于冬季的事态发展得到加强，而不是削弱，因而卡斯特罗能够决定他同共产党的老卫士的争执应该公开出来。格瓦拉在3月份的《社会主义古巴》杂志中愤怒地说，今后苏联和东欧的原料必须用赚得的外汇支付，不能用苏联的赠与或者贷款支付；这一消息，在卡斯特罗现在对共产主义的半公开的斗争中，或许有所帮助。可以想象得到的是，尽管卡斯特罗为讨好小土地所有者而进行干涉，所有的小土地所有者并不是都顺从革命的；很多人

^① 《革命报》，1962年2月19日。

“消极自保”，促成1962年的生产下降。此外，格瓦拉并不喜爱那种似乎正在由埃斯卡兰特建立起来的专事惩戒的党。在他看来，它已经逐渐变成一种“行政管理的党，不起先锋作用，是一种追求舒服生活的新统治阶层，用几个美貌的秘书，坐名牌汽车，住空气调节的房子”。^①

3月9日，第一个正式的“统一革命组织指导委员会”宣告成立，这显然正如埃斯卡兰特所说的是将来的“统一党”的原型，是一种在老共产党人和菲德尔主义者间搞均衡的折衷性组织，除了卡斯特罗和他的弟弟，还有十三个菲德尔主义者和十个老共产党员。同时，还有乔蒙（革命指导委员会的唯一代表）和多尔蒂科斯总统。至少有四个菲德尔主义者^②同1959年以前的老共产党员之间的关系显然还是不清楚的。再则，名单上还有其他一些蒙卡达分子或者“格拉玛号”分子，^③或者是马埃斯特腊山的老战士，^④其中包括三个曾在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地下工作中起过一些作用的人。^⑤在共产党员中，有八个在1945年以前就已经出了名，^⑥一个代表在大学里同卡斯特罗在一起的共产党人小组，^⑦一个到最近为止

① 格瓦拉对开罗记者的谈话，1965年4月发表。

② 劳尔·卡斯特罗、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猪湾事件以后迅速上升的人物）、奥古斯托·马丁内斯·桑切斯和格瓦拉。

③ 阿尔梅达、拉米罗·巴尔德斯、艾德·桑塔马利亚和拉瓦拉。

④ 加西亚，“参加卡斯特罗部队的第一个农民”；空军负责人，塞尔希奥·德尔巴列；和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

⑤ 阿特·埃米略·阿拉贡内斯和多尔蒂科斯。

⑥ 罗加、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埃斯卡兰特兄弟、拉萨罗·培尼亚、塞维罗·阿吉雷、奥尔多基和曼努埃尔·卢萨多（已经正式参加内阁的仅有的“老共产党员”）。

⑦ 弗拉维奥·布拉沃。

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① 在非德尔主义者中，只有一人是黑白混血种人(阿尔梅达)，虽然此外还有三个^②不是黑白混血种人便是黑人。

行将到来的还有一个更大的危机：这些提名实际上只是表示了相互的权力地位。“全国指导委员会”很少再听到有人提起了。3月12日，卡斯特罗宣布将于3月19日正式开始食品定量配给：古巴人现在每月可以有两磅脂肪、六磅大米和一斤半豆类。在哈瓦那和其他一些城市，肉、鱼、蛋品和乳品也限额供应。成人每月有三磅肉、一斤鱼、四分之一磅牛油、一斤鸡肉和五个蛋。儿童每天有一公升牛奶。芋头和其他蔬菜也限额供应。定量配给证只发给那些握有付清房租的证据的人。3月13日，卡斯特罗在大学里发表讲话纪念(1957年)试图杀掉巴蒂斯塔的五周年。何塞·安东尼奥·埃切瓦里亚(学生会主席，被误伤身死)的遗言由一个姓拉维洛的人朗诵。然后卡斯特罗讲话：“我们，”他说，他现在总是爱用复数，大概不是为了气派堂皇，而是为了表示兄弟般的亲切：

我们，在他朗诵的时候，看着一本书里记载的这篇遗言……我们注意到他跳掉了第四节……出于好奇心，我们开始读他所跳掉的东西，看到原来是这样的话……“我们相信我们的纯洁目标将引来上帝的恩惠，容许我们在祖国建立公正的统治。”这很有意思，“我想：‘妙极了！’他是故意略掉这三行吗？”他朗诵完毕时，我问他。他说：“在门口时，他们给了我指

① 拉蒙·卡尔西内斯。

② 拉萨罗·培尼亚、拉蒙·卡尔西内斯和塞维罗·阿吉雷。

示。我说了我准备念些什么，他们要我跳掉那三行。”这可能吗，同志们？难道我们这样胆怯，思想这样顽固，以致必须略掉三行，何塞·安东尼奥·埃切瓦里亚的遗言，只因为……他相信上帝吗？这叫做什么相信真理？……悲剧是，奉命跳掉那三行的这位同志是个诗人，在他自己一小本诗集里（我这里有一本）有一首以《向不可知的上帝祷告》为题的诗。^①

卡斯特罗在结束他的讲话时神秘地提到宗派主义的危险——这是好几个月来他经常不离口的一个名词——并引用了列宁论左派共产主义的小册子：《幼稚病》^②，这是正统的共产主义者在谴责左派热狂的梦想家时常常引用的一种课本。他又说“青年起义军”不久将改称“青年共产主义者”——这件事在4月间实现时，未曾大肆宣扬。

3月16日，当时一定同卡斯特罗特别亲近的格瓦拉，对革命的工会领导作了极其挖苦的抨击，他最后说，革命的成就“只局限于建立几所消费品小工厂，和使一些工厂开始置于独裁政权之下。他问为什么在革命政府下皮鞋穿了一天就丢了后跟，为什么革命的可口可乐的味道这样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会发生这种事情吗？不。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性质吗？不是，那是谎话。发生这种事，是由于我们自己的缺点，我们缺乏革命的警惕性，以及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3月17日，卡斯特罗在孔拉多·贝尼特斯学校对“革命的女教师”说，全国各地统一革命组织

^① 《革命文献》，1962年第13期。

^② 即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译者

的书记把专制手段强加给国家，“几乎同巴蒂斯塔和其走卒没有什么区别”。

又是过了十天。卡斯特罗显然已经仔细估计过他还可以在残存的古巴老天主教徒和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分子中激发起多大的好感；他们肯定已了解到他同老共产党之间仍然存在着隔阂。3月22日，统一革命组织全国指导委员会任命了一个“书记处”，这个机构显然将负责进行关于建立拟议中的“统一党”的一切工作。它包括布拉斯·罗加，但不包括埃斯卡兰特，其他的成员都是菲德尔主义者。罗加继任党报《今日报》的主编。3月24日，一位老共产党员曼努埃尔·卢萨多被吸收参加内阁，任（国内）商业部长；乔蒙这位仅存的革命指导委员会领导人被从莫斯科召回，任交通部长。3月25日，新任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负责人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说，苏联和东欧顾问们曾批评古巴的经济管理，同时劳尔·卡斯特罗被任命为副总理。最后，3月27日，卡斯特罗在一次重要的电视讲话中猛烈地批评统一革命组织的全国组织委员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他前一天已被派往布拉格，他原来在统一革命组织的职务由总统多尔蒂科斯继任。

“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卡斯特罗对他的听众和观众说，“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人：

我们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诚实的共产党人……可是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犯了错误。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犯了严重错误。事实是共产党人也犯了

错误！他们毕竟都是人。这是共产党人第一次犯错误吗？不是，共产党人犯过许多错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错误很多。很多人用错了马克思主义。人毕竟还是人，正如每个可能犯错误的人一样，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犯了错误。

接着就提出一些明确的罪名：组织了一个党，这个党实际上将成为一个由他自己领导的工具；形成一种“特权的窝巢、利益的窝巢、各式各样营私施惠的窝巢”。与此同时，在古巴政府内部，一位部长如果不先取得统一革命组织的同意就不可能调动任何人的职位。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如果一只猫要生四只小猫，也得去和统一革命组织的书记处商量”。“排斥异己的、贪得无厌的、一刻不停的”宗派主义，已经在全国每个角落里滋生了。

卡斯特罗又说到其他恶劣行为的例子。有一位菲德尔·庞帕，奥连特省一组农场中的统一革命组织的书记。当这个组织的中央级领导人的名单公布时，庞帕“怀着一个纳粹党支部长的心理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理”，对几个菲德尔主义者作了侮辱性的批评（其中有吉列尔莫·加西亚，第一个参加革命的著名农民；艾德·桑塔马利亚；塞尔希奥·德尔巴尔；和埃米略·阿拉贡内斯）。卡斯特罗继续说，实际上菲德尔·庞帕怎么能知道这些人是何等样人以及他们在内战中有多少贡献呢？那时候他自己还正躲在床底下呢。

卡斯特罗最后问：“我们应该对老共产党人抱什么态度呢？应该尊重和承认他们的功绩，承认他们过去的战斗

性。我的警卫队里有许多老共产党人，我不准备撤换他们，因为我信任他们。另一方面，他们应该对我们抱什么态度呢？应该谦虚。”^①

卡斯特罗发表这篇坦率的讲话，不是谨慎小心地只对着一批经过挑选的追随者（象赫鲁晓夫发表攻击斯大林的演说那样），而是在全国人民面前，在电视屏上，毫无疑问，占古巴五十万只电视屏的80%。

几天后，卡斯特罗又到马坦萨斯去讲话，这一次是对该城的统一革命组织的省委员会讲话。他的讲话的题目被宣传为“补充和详细阐明”他3月26日的议论。^②他说谣言和猜疑使他不得不把整个埃斯卡兰特事件公开出来。他重复对埃斯卡兰特的各项指责，而且措辞更加严厉：埃斯卡兰特建立了一座个人神龛，只是为了满足他的权力私欲。他创立了一种确实是政府的模仿体；并且“一切事情也不仅仅是阿尼瓦尔的过错——我们必须辨别哪种是阿尼瓦尔的过错，哪种是我们自己的过错，以及哪些是五百个为所欲为的阿尼瓦尔的过错。总之，其结果是要使党脱离群众。”他又说：“群众看到所有这些问题：僭越权力，任意逮捕，一意孤行，奢侈无度，整个蔑视人民的政策！”

卡斯特罗接着转到将来应该指导革命的一些准则。工厂或者农场、机关或者任何地方的革命核心，今后必须

① 《革命文献》，1962年，第10期。

② 这次讲话的全文未发表，但删节本最后出现在销数不多的月刊《社会主义古巴》的5月份一期和5月10日的《世界报》上。（这是自从1959年以来卡斯特罗的重要讲话第一次不是第二天就发表在主要的古巴报纸上。不发表全文的原因是攻击个人的地方太多。）

由一些有品德有功绩的人组成，而不是仅仅因为他们都是共产主义老战士。同时，不应该再出现横行霸道、官僚政治、无政府主义，不应该再有酗酒的情况：“圣歌、歌曲，我们可以唱，可是不应该有醉汉跳的康茄舞。”

在这两次讲话中，卡斯特罗企图向古巴人说清楚，古巴革命的主宰者是他而不是老共产党人。可是他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不惜麻烦地把自己同共产党人区别开来。他继续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是他仍然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马列主义者。埃斯卡兰特将成为恐怖行为的替罪羊，正如将作为经济困难的替罪羊一样。以卡斯特罗为首的革命仍旧是容易发生变化的。这部分地是因为来自流亡分子的威胁、战争的谣言、爆炸和登陆、逮捕间谍和叛徒。但是，即使如此，那个难以捉摸的革命统一党尚需经过一个长时期才能出现。1962年夏季中，各个企业的工人从他们的成员中推选“模范工人”，最后再从这些人中推选党员。这种通常很民主的程序具有无限期地延迟新党成立的效果。各部和其他机关中老共产党员同1959年的人之间的关系很坏。卡斯特罗——而不是老共产党员——现在作了一切重要的理论性发言。1961年的理论家布拉斯·罗加在1962年中不在公众面前露面了，他的三十多年的主要组织者埃斯卡兰特已被遣送国外。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只管农业改革，不象他以前那样就一般政策作广泛的报告；后来在1968年，他竟然会向新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报告说，据他的看法，埃斯卡兰特在1962年“多半是失常的，而不是有恶意的”（这是指六十年代中期埃斯卡兰特第二次企图在古

巴得到权力的时候)。保持着全国性头等重要地位的只有其他两个老共产党员，即交通部的曼努埃尔·卢萨多和革命教育学校的莱昂内尔·索托(卡斯特罗的老朋友)。许多由于埃斯卡兰特的支持而得到好差事的人都被撤换，虽然塞萨尔·埃斯卡兰特(阿尼瓦尔的兄弟)仍旧担任统一革命组织的理论家和思想指导，这个组织本身仍然只是作为“新党”的骨架而存在着。

苏联认可(毫无疑问是不热心地)埃斯卡兰特之被驱除，而且，可能还恐怕古巴会落到中国手里去，它的5月1日的贺电，其刊载的地位仅次于社会主义集团，而放在南斯拉夫之上；古巴的地位显然被提升了。5月中旬，古巴和苏联签订一项商务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两国的商业来往将增加到七亿五千万美元，此时苏联显然同意在1962年购买古巴糖二百万至三百万吨。苏联大使库德里雅夫采夫匆匆地离开古巴，没有人到机场送行；卡斯特罗后来说是要他走的，可是他显然是古苏关系中一个较早阶段的代言人。^①卡斯特罗本人在《革命报》的办公室里对几个人说，“这个库德里雅夫采夫比邦斯尔更使我厌烦”。^②他的继任者是阿列克谢耶夫，此人自1959年以来一直在古巴来来去去，其间曾一度任苏联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古巴报纸登载了很多马埃斯特腊山时代的故事(就是共产党人还未公开支持卡斯特罗以前的时

① 利萨·霍华德，《战争/和平报导》月刊，1963年9月。乔蒙5月5日离开莫斯科。他的继任者卡洛斯·奥利瓦雷斯过了许多时才到任。因此双方的大使馆暂时都没有大使。

② 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方特提供的材料，他当时是《革命报星期一副刊》的主编。

代),还刊了一些以往受贬责的(例如福斯蒂诺·佩雷斯,为马托斯事件而辞职)、现在又被比较好意地提到了的领导人。布拉斯·罗加在《今日报》上毫不含糊地把卡斯特罗说成是“我们国家的最优秀和最有能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农业方面,在2月危机中被错误征用的一些农场由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的新管理处发还原主。好象卡斯特罗又一次用完了另一股部下的力量,正在找寻更新的一股,其中或许包括过去被风浪打走的人才。

农业和工业的多种经营在此期间进展很慢,虽然有许多进一步的集体化——面包厂、衣着和床上用品厂、蒸馏厂——显然没有经过任何特别的立法手续。1960和1961两年中对糖业疏忽的后果现在变得明显了。1962年糖的收获显然落后于所有最近几年,原因是在多种经营运动中卤莽地砍掉了甘蔗。格瓦拉作为工业部长仍然负责糖的制造工作,他说:“我们必须干脆承认这是一次很坏的收获。”他承认有怠工、工作不好、懒惰和人手不够这些现象。然而,他不承认“义务劳动者虽然不取报酬,却由于来往的运输费用或者收割的错误,开支往往超过工人的正规工资。”^①全国各地的交通由于零件缺乏在日呈崩溃。食品供应越来越不正常。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的食品购销部工作混乱,农民不知道他们的产物是否会被收购。商店空空的。中产阶级的古巴人以及现在许多工人阶级的人也挤满了泛美航空公司开往迈阿密的飞机;熟练的专门人才就这样越来越多地离开了古巴。人

① 迪蒙书,第81页。

人都在抱怨：苏联和东欧的专家都抱怨古巴既浪费又效率低，一个波兰记者发牢骚说他希望能回到资产阶级比利时的海滩去；古巴官员则抱怨俄国人态度生硬，工艺拙劣，抱怨俄国专家不肯离开他们的有空气调节设备的办公室。古巴和俄国的关系很坏。有一些迹象显示卡斯特罗想利用苏中关系坐收渔人之利，中国对于埃斯卡兰特的罢黜也表示了赞许，他们自己也同俄国一样跟古巴签订一项新的商务协定。此外波兰外交部长腊帕茨基5月间访问古巴后，费了很大周折才得在联合公报里提到“共处”这个名词，同时，劳尔·卡斯特罗在北朝鲜国庆节发表了长篇讲话——这种节日向例在华沙或者布达佩斯是冷淡地度过的。古巴还小心地避免公开谴责阿尔巴尼亚——中国在欧洲的唯一盟友。6月3日，赫鲁晓夫在欢送大约一千名古巴受训人员的仪式上回答了这些含蓄的批评并责备古巴。赫鲁晓夫把古巴的经济形势同苏联内战后的经济形势相比。他说，列宁当时采用了新经济政策，对苏联国内的资本家让步，以便最终加强社会主义。这种措施在古巴也许是必要的（《今日报》一度也说了大致相同的话，但没有效果）。仅仅武器和英雄行为不能解决粮食不足。赫鲁晓夫许诺送“武器和其他东西”到古巴，可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意味着高度的觉悟、智慧和工作。

在这番训话后，和解开始了。卡斯特罗带着他的旧背包和步枪，首先到马埃斯特腊山作一次新的旅行，对古巴共产党人说，他已经“再次举起起义的旗帜”——对谁，他没有说明。然而，6月底，卡斯特罗以不同寻常的谦恭

态度，在另一次仪式上用下面的话给一些苏联专家送行：

我们知道我们的缺点，我们知道有一些没有经验的行政管理
人员，他们有的缺乏政治知识，有的缺乏好客的观念。我们知
道如果〔一个俄国〕专家所到的一个国营农场是由有经验
的好客的同志管理的……他一定会受到很好的款待。可是我
们知道不免有一些地方的负责人是冷淡或者漠不关心地接
待他们的……或者没有好好地利用专家的知识……〔有些
人〕认为优待专家的方法是陪他们出去玩乐，甚至给他们找
漂亮的姑娘。

他讲话结束时，突然发出一阵新的热情，欢呼“由永远光
荣的苏联共产党领导的、由古巴的伟大的和亲爱的朋友
尼基塔·赫鲁晓夫领导的苏维埃人民”。布拉斯·罗加则
在蒙特比德奥发表演说，承认错误，因为他没能更早地看
出游击战是对巴蒂斯塔进行斗争的正确的手段。显然发生
了某种其他情况，以致值得甚至有必要同俄国改善关系
了。当然这是部分地由于人们知道古巴现在没有俄国的
经济援助就不行。中国也许是一个英雄的榜样，可是仍然
只有俄国能够给古巴提供砍甘蔗的机器、贷款、技术援助、
以及（最重要的）糖市场：中国人也许能够吃掉这些糖但
付不起这笔价款。糖的收获显然不会超过五百万吨。这
表示要回到五十年代中期那个控制的低收获数字，因此古
巴甚至连约定售给苏联的四百七十五万吨也交不出货。
与此同时，每周有将近三千名古巴人出国流亡，大多数到
美国，但也有许多人到西班牙或者南美的其

他国家。到夏季中期的时候，已经有二十万以上的流亡者从1959年初起陆续离开了这个岛国，几乎是人口的3%——这已经是历史上最大的国外移民之一。再则，他们来自除了农村的社会各方面，这些人中有很多是以前同情过卡斯特罗政权的人。革命后古巴经济的混乱大概在1962年中期达到顶点。尽管有这些经济的和社会的困难，古巴和苏联两国政府显然似乎已经作出头等重要的军事决定。

第三十三章

导弹危机：I

在猪湾丢脸以后的若干月里，肯尼迪总统的政府除了古巴，还有很多其他问题需加处理：刚果；钢铁大王们；进步同盟；老挝和越南；黑人；柏林以及赫鲁晓夫在维也纳等等问题。肯尼迪外出旅行了一趟。但古巴仍然是一项重要的——虽然不是最重要的——值得关心的事。古巴在1月间曾被美洲国家组织停止会员的资格。从个人方面说来，肯尼迪感到对那些仍然被关在狱中的入侵部队（2506队）成员负有责任。那些人之所以被关押是由于他个人在一年前的决定或者犹豫不决的缘故——对于一个以前只知道权力的乐趣的人说来，这是第一次清楚地领略到它的苦味。^① 在舆论方面，他的共和党对手不容他忘记古巴。一次新的选举运动（1962年11月的中期立法选举）近在眼前。肯尼迪听任古巴仍然属于共产主义，一定会受到非难，正如他自己在1960年曾非难共和党人一样。再说，还存在着古巴流亡分子，还存在着古巴革命委员会，还存在着该委员会的主席，前总理米罗·卡多纳。

^① 猪湾的俘虏直到1962年3月才审讯（除了五名因为他们在对巴蒂斯塔斗争中的活动被作为战犯处决，以及其他几个人因为与猪湾战役无关的政治罪另案判处）。在审讯时，只有乌利塞斯·卡尔沃（塞尔希奥的儿子）和阿隆索·普霍尔（普里奥的副总统的儿子）两人谴责美国。

古巴的影子总统和美国的真正总统已经会见过几次，1962年4月10日，米罗在一次会见后认为，肯尼迪急想重新组织一支流亡军队：“我离开白宫时，深信古巴的解放不久即将实现，以古巴人作为战斗的先锋。”可是肯尼迪仅仅表示了希望说，古巴总有一天获得自由，并且他知道他所说的话很快就会传到迈阿密，所以未作任何保证。米罗在猪湾事件以前一星期曾误解伯利的话；他又再次给搞糊涂了。可是不管怎样，流亡分子在猪湾失败后一度消沉的热情在1962年春季又开始增高了。美国报纸发表关于推翻卡斯特罗需要多少军队的文章：需要六个师。据米罗说，肯尼迪还对他提到这个数字。

这些谣言毫无疑问传到了卡斯特罗那里。在迈阿密的古巴人一嗅到胜利就会比平常更不小心了。在3月间对猪湾俘虏进行审讯期中，由理查德·古德温通过巴西总统古拉特传话给卡斯特罗，如果入侵者被枪毙，就会激起美国的舆论，使入侵成为不可避免之事。4月下旬，美国在加勒比海举行大规模海军演习，接着由流亡集团——特别是“A66”^①——进行袭击。这种迈阿密的谣传以及普遍仇视和紧张的气氛一定使得卡斯特罗担心入侵。

同时，在古巴国内，随着经济的衰弛，不满情绪也明显地增长了。6月16日，卡德纳斯市发生示威游行。家庭妇女敲锅打罐地走上街头。严厉的省军区司令豪尔赫·塞尔格拉少校派出坦克威吓她们。多尔蒂科斯到场

^① 参考《世界报》，5月11日。

发表讲话,把供应不足归咎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以及“我们的错误”,并谴责家庭妇女的抗议行动是“一种可耻的和反革命的挑衅行为”。在这以后,圣克拉腊和哈瓦那附近的埃尔卡诺也发生示威游行,在那里,一场混乱,有一个青年民兵被警察打死,另一个受伤。政府的反应好象是害怕可能再遇到危机。埃尔卡诺的商店被没收,居民失去他们所有的汽车、电话和卡车,不得不失业和屈服。当地的民兵在这次考验中表现得特别不称职,受到了清洗和改组。

这些事件,加上经济紊乱,使得卡斯特罗比以前更担心可能的入侵的影响,这种影响他开始认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难以支撑。民兵忠诚可靠吗?如果碰到海军陆战队,民兵会怎样抵抗?①确实,随着美国选举运动的继续下去,美国就会更加需要“解决”古巴问题,必要时会用武力吗?到底怎么样呢,如果米罗真的得到肯尼迪的保证,象他米罗自己相信的那样——以及象卡斯特罗这时候毫无疑问已经知道的那样?还有其他入侵的迹象,有些是假的,例如腊斯克和拉丁美洲各国大使的例行会见。②

因此,7月1日,在埃尔卡诺事件后才几天,劳尔·卡斯特罗就动身去莫斯科要求苏联答应给予古巴更多的保护。劳尔·卡斯特罗和赫鲁晓夫及其他人等讨论结果,苏联同意向古巴增派军事人员并提供现代配备、一批

① 四十岁以上的那些人实际上只是一种后备;四十岁以下的被用来警卫公共建筑物等等。

② 参阅《国际政治》,第1期,第181—182页;以及何克塞书,散见各处。可能卡斯特罗也知道有第二次计划“演习”的准备在10月下旬举行,演习中假设海军要推翻加勒比海一个岛上的一位名叫奥尔萨克的暴君。

用于防御的短程地对空(萨姆)导弹(类似苏联曾给过印度尼西亚和伊拉克的那种)、还有一些能对美国和美洲其他目标载送核和热核弹头的中远程导弹。

然而,似乎没有疑问,苏联送导弹到古巴去的决定一定是在这以前就已作出的,可能是在4月里,总之,是在赫鲁晓夫6月2日对那些回国的古巴人训话以前。如果这个决定是在4月间作出的(例如可能在4月22至25日的苏联党主席团会议上),可能在6月中旬以前还没通知古巴,而在赫鲁晓夫于4月28日和5月5日分别同古巴公共工程部长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和古巴驻苏大使的谈话中也许有过初步的讨论。或许苏共主席团候补委员兼乌兹别克共产党总书记拉希多夫率领“研究水利问题”代表团访问古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拉希多夫回国后在莫斯科逗留了非常长的时间才回到乌兹别克斯坦。^①没有疑问,在他们作出决定的初期阶段,在4月或者5月中,苏联人是不把这个打算说出来的。

然而,决定送导弹到古巴去的原因是不完全清楚的。古巴担心入侵,希望得到对付美国的特别防御手段。表面上导弹可以提供这种手段。古巴也希望苏联会同它自己的命运发生“高度的连带关系”。可是这种特别的安全保证,或许只须把华沙条约的保证扩大到适用于古巴,

^① 米歇尔·塔图:《克里姆林宫的权力》,第335页。安德烈斯·苏亚雷斯书,第160页,也指出,拉希多夫的访问意义重大。夏里夫·拉希多维奇·拉希多夫(1917年生),在当上乌兹别克共和国主席团主席以前曾任乌兹别克作家联合会主席。他曾率领苏联代表团参加1957年关于亚非团结的开罗会议,并且后来在1966年1月间在哈瓦那举行的著名的“三洲会议”上是苏联的代表。

或者由赫鲁晓夫比较明确地和正式地承诺苏联在它的盟友受到侵略时宣战,就可以做到。但对苏联来说,安置大约六十枚导弹,有的射程一千哩,少数射程一千五百哩到二千哩,事实上就会使苏联打击美国的能力增加一倍。这样苏联拥有的打击敌人的手段仍然仅仅是美国拥有的可以打击苏联的手段(轰炸机和导弹)的一半。可是这些安置在古巴的武器(因为它们来自南面)可以逃却美国的预发警报系统,从而打乱了报复的计划。因此设置导弹很自然是一些苏联军事头目所竭力主张的一着棋——虽然可能不是全体都这样主张。所以1962年春天掌管战略火箭的莫斯卡连柯元帅可能不赞成把这种宝贵的武器运到这样暴露的地位去,因为他在4月间被调职了。可是,不管合法或者不合法,不管正确或者错误,导弹的设置显然会带来同所得的战略利益不相称的政治后果。当然,赫鲁晓夫是不希望使用这些武器的。可是他知道,这些武器如果成功地安置起来,可能是对肯尼迪施加外交压力的一种手段,或者,象美国和大多数评论家所想象的那样,在柏林问题上,或者,可以作为一种保证,防止美国对古巴的入侵。赫鲁晓夫本人当时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地位,就柏林问题来说,是容易受人攻击的;因此他想取得一种可以增高威望的胜利。

假如古巴事先同意或者要求进攻性的导弹,苏联在法律上当然有权利送去。但这是一种法律范围以外的事。美国将怎样反应还不清楚。然而,古巴的合法权利不能决定这种反应。这一点赫鲁晓夫一定是清楚的,他当然理解到美国知道苏联以前从未在一个盟国的领土上设置过导

弹，也知道苏联的外交传统向来是不肯过分拉长它的交通线的。因此赫鲁晓夫一定预料到美国会对于这一着新棋感到意外。

在共产党那方面，卷入这场戏剧性事件的那些人曾有各种不同而彼此矛盾的说法。例如，赫鲁晓夫在1967年一次电视谈话中说，“当我们得悉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在距离美国海岸不远的地方出现的时候，我们懂得如果我们不给它帮助，它是不会维持长久的……因此我和我的同事们商量后，决定派遣一些火箭部队到古巴去。”^①这真正是长话短说。因为就在1962年，赫鲁晓夫曾告诉肯尼迪（在他10月7日的信中）和最高苏维埃两方面：“我们是应古巴政府的请求而把武器运到那里去的……包括……二十枚苏联的中远程导弹……这些将掌握在苏联军事人员的手里……我们的目的只是保卫古巴。”可是那些在国外建立基地的人总是说他们是应有关政府的请求而这样做的。俄国在古巴设置导弹，从战略上来说是对它有利的，但赫鲁晓夫和克里姆林宫必须真正能够控制局势，卡斯特罗不能硬干，以及当地的苏联专家在任何情况下（即使美国入侵古巴）都能同本国取得联系。如果美国入侵古巴，就古巴来说，这些导弹就会失效；苏联将不得不同美国进行战争。可是从整个问题来看，苏联所能得到的主要利益，是战争将使全球的力量均势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非常之大，以致仅仅为了这个原因，也似乎使这一计划值得一试。归根到底，苏联似乎总

^① 根据原文逐字报导，载《星期日泰晤士报》（伦敦），1967年7月16日。

是宁愿古巴中立,而不愿其成为一个卫星国家;可是如果它已经成为卫星,并有了一切必然的风险,那么,一种补偿的办法就是使它成为一个在战略上处于有利地位的卫星。

因为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一直在设法保持核武器和载运系统的优势,使足以摧毁苏联在所有已知的或者可疑的基地的核打击力量^①,并可能留下足够的力量以摧毁苏联所有的大城市,如果那里还剩下任何完好的核打击力量——例如在潜水艇方面。即使在受到苏联一次突然袭击以后,美国仍希望可以集中的毁灭力量不少于或者仍超过苏联最初所能使用的力量。美国的第二次打击应该象苏联的第一次打击同样强大。麦克纳马拉在密执安大学的一次演说中说,这种显然是浪费的政策使他可以避免五十年代杜勒斯和尼克松所提倡的对苏联城市大规模报复的理论。当然,麦克纳马拉的这种被称为“反击对方武力”的政策在理论上可以用于报复敌方对城市的核袭击,可是也更可能被用来作为由大规模常规袭击所引起的第一次打击。这种政策需要大量贮有核武器。因此美国在1962年11月大概拥有二百枚至二百二十枚洲际弹道导弹,而苏联大概只有五十至七十五枚。到1964年计划完成时,美国将拥有一千枚。

苏联过去推行一种不大事夸张的政策。1962年,苏联所有的核载运武器大概比美国少五倍。它拥有约三百五十枚至七百枚短程导弹,可是这些导弹不能从苏联到达

① U2 飞机拍摄的照片已经使苏联所有的导弹基地大致明显。

美国，只能到达欧洲。^① 苏联只有二百架洲际轰炸机，而美国却有六百架。他们大约各有一千架中程轰炸机。美国大约有一百三十枚至一百五十枚导弹装置在“北极星”潜水艇上。因此，1962年初，苏联的决策者可能处于急不暇择的地位，特别是如果美国入侵古巴就会迫使他们履行赫鲁晓夫的保证，以保卫那个(对他们来说)遥远的岛国。核力量的世界均势毕竟最近已被打乱了。如果有任何办法可以防止入侵并因此使古巴中立化，而又能使它继续存在，这种机会就必须抓住。

当然，古巴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说来，是一个引人注意的广告。但从军事上说，古巴一定是一个使苏联为难的问题。在古巴希望得到保护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给予古巴全面保证，防备美国入侵，同时把古巴的一切军事决定权保留在苏联指挥部手里。虽然华沙条约的担保可以在形式上给予古巴以安全保障，但如果真正发生战争那就不行了，因为不能用常规的手段来保卫它。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在古巴设置导弹是一种比较保守的做法(与北美人士的看法不同)。自1961年以来就没有平

^① 这是1963年华盛顿方面所同意的看法：参阅马克·弗兰克尔的文章(《纽约时报》1963年12月13日)，文章引用一项兰德的资料分析，其中批评所谓导弹放到古巴去是为了保卫那个岛国的说法；又见阿诺德·L·霍雷列克的《古巴导弹危机》一文(《世界政治》月刊，1963年4月)。不能同意他的看法，即认为单是中程导弹就可以达到苏-古的目的，因为，虽然它们可能打击美国南部城市，而真正的“威慑力量”即使首都容易遭到射击；且不说美国在蒙大拿州和北达科他州的导弹基地也超出建立在古巴的T.1、T.2或者T.4的射程。沃尔斯台特似乎错了(所著《控制古巴的危险》一文，见《阿德尔菲菲研究报告》(1965年)，第12页)，他认为二千二百哩能从古巴达到全部美国，例如，半个蒙大拿州就会在射程以外。

衡,只有令人不安的不平衡。赫鲁晓夫本人在他10月26日的“密”函里明白地向肯尼迪解释,把导弹送到古巴去是因为猪湾事件,那时候古巴受到了袭击。^①

卡斯特罗后来就古巴设置导弹作了几次说明。他对古巴人(1963年1月里)说,是俄国人要这样做的,并对《世界报》的克劳德·朱利安说:“我们自己曾想到向苏联要导弹的可能性。可是我们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莫斯科就提出这个建议。他们对我们说,我们接受这些导弹就会加强社会主义阵营。”^②对一位来自美国广播公司的同情的记者,卡斯特罗在1963年3月说,这一决定涉及“两国政府同时的行动”。卡斯特罗在1963年10月对赫伯特·马修斯说,古巴向俄国要求导弹;他和他的朋友们在1962年初“就几乎肯定地认为美国正在准备对古巴的军事入侵”。由于赫鲁晓夫的女婿、《消息报》主编阿列克塞·阿朱别伊会见肯尼迪以后作了这方面的报道,他们更加相信;阿朱别伊的判断同米罗的结论一样,都是错误的。^③卡斯特罗又说俄国人认为美国会进攻他,还说“安置核武器是他的主意,不是俄国人的”。^④

① 根据伊利·艾贝尔的说法,见所著《十月的导弹》(1967年),第180页。参阅下文第731页,注①。关于本节,参阅巴兹尔·利德尔·哈特爵士的文章,见《快捷》画刊(德国),1962年11月11日,他指出赫鲁晓夫的“破坏核均势的最好机会是把许多中远程导弹放在古巴,只有从这里这种中远程武器才能达到美国的主要目标。”然而,他最后说,核均势方面的不利的变化是“基本遏制了苏联的冷战活动”,因为它阻碍(他们)把威胁推进到边缘。

② 《世界报》,1963年3月22日,会见是在1月。

③ 国务院否定他这种判断。这个问题,施莱辛格和索伦森两人都置之不理。

④ 赫伯特·马修斯:《返回古巴》,第16页。

可是，不久后，卡斯特罗又改变他的方针。他对另一个法国人，《快报》记者让·丹尼尔（1963年11月）说：“现在，我要告诉你一点没有人知道的东西。我以前从来没谈过〔1〕，可是……全世界有权利知道导弹的真正的经过情况。”卡斯特罗说，在危机前六个月，就是在米罗和肯尼迪会见的时候，古巴得到消息说，中央情报局正在准备一次新的入侵。卡斯特罗和他的顾问们摸不透肯尼迪个人的想法。后来阿朱别伊访问肯尼迪，并且，如同卡斯特罗对马修斯说的那样，他得到的印象是，总统认为世界各种力量的均势已由于共产党人夺得了古巴而被打乱了：“肯尼迪提醒俄国人说，美国并没有干预过匈牙利。”虽然阿朱别伊当时显然没有想到美国即将进攻，他和赫鲁晓夫在听到卡斯特罗早些时候的消息时认为那是可能的。（根据皮埃尔·塞林杰的说法，肯尼迪这一次曾提到匈牙利，但不是象卡斯特罗说的“那种含义”。）卡斯特罗说，俄国在这以后“就不愿意安置常规武器”，因为美国也许仍然要冒险入侵，然后俄国将不得不回击，而世界大战就将是不可避免了。因此，6月间，劳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到俄国去讨论安置导弹的问题……”让·丹尼尔又说，卡斯特罗曾对他说：

我们要求俄国人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对美国说清楚，对我们的进攻就是对苏联的进攻。我们先作了广泛的讨论后才谈到安置导弹的建议，这一建议最初使我们感到意外并非常踌躇。我们最后同意了苏联的建议，因为，一方面，俄国人使我们相信美国不会害怕常规武器，再则我们不可能不分担苏联

为了救我们而冒的风险。①

可是奇怪得很，这也还不是卡斯特罗的最后一次说明。1964年1月7日，卡斯特罗对马修斯说，丹尼尔的“新闻式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提出导弹计划的是古巴人。他对马修斯“至少四次”反复讲这一点。②卡斯特罗对另一个新闻记者表示他个人想要导弹，以便使美国一旦入侵古巴就会面对着热核战争的可能性。1964年10月间，《纽约时报》的另一个代表赛勒斯·苏兹贝克向他提出这方面的问题时，卡斯特罗回答得不适当：“俄国和古巴都有关系，”他重复地说。又一次，在1965年7月，卡斯特罗说“我们在作出决定的时候，认为需要有具体措施使美国的侵略计划失效，于是我们向苏联提出这种需要”。③最后，在1967年，卡斯特罗又对赫伯特·马修斯说：“我们感到自己受美国的威胁。我们同俄国人商量，他们一提出导弹，我们马上说‘好极了’”。④

在这些不同的说法中，对让·丹尼尔所说的是最全面但也是最使人困惑的。如果一些小误差可以不问，就算是由于丹尼尔的或者卡斯特罗的记忆力不好（劳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不是一起去莫斯科，也不是6月里去的），但在时间上似乎也有重大的矛盾。阿朱别伊在华盛顿和肯尼迪的讨论是在1962年1月30日，而他应该是

① 《新共和》，1963年12月21日。

② 赫伯特·马修斯：《返回古巴》，第16页。

③ 对李·洛克伍德说的，见所著书第200页。

④ 赫伯特·马修斯：《卡斯特罗传》，第196页。

在关于中央情报局有新的入侵活动的报告以后一些时候去的。然而据说这些报告是在安置导弹以前的六个月就得到的,就是说在1962年4月间——这个可能的日期得到的,而当时正是米罗·卡多纳离开白宫前往迈尔密,“确信”古巴不久将得到解放的时候。

然而,卡斯特罗的这些说法不应该掩盖下述两个要点:第一,不管古巴人和俄国人可能多么老实地相信美国正在计划入侵古巴,他们都错了。肯尼迪,同西奥多·罗斯福在1906年一样,不希望对古巴实行军事占领。第二,在导弹问题上不管是否卡斯特罗采取主动——就“主动”这个词的直接意义来说,这是极其难以相信的事——他一定高兴得到导弹并且大概是一直想望这种东西的,至少从1960年赫鲁晓夫第一次提到这个问题以来他就一直在想望,当时这位苏联领导人第一次宣称“在象征性的意义上”他的炮兵能用火箭支持古巴。可以回忆,当时格瓦拉立即对这些话作了十分强硬的、古巴人的解释,他甚至说:结果古巴迫于环境,成为“世界和平的主宰者”。^①卡斯特罗作为一个从年纪极小时就对武器有特别深刻印象的人,或许从1960年起就在策划怎样弄到导弹,并抓住明显的美国威胁(不管他判断这种威胁的真实性如何)作为一种借口来取得他所要的东西。

肯尼迪的不积极行动曾造成猪湾的失败,毫无疑问使得赫鲁晓夫(已经在维也纳会见过肯尼迪)认为他现在不会行动。也许有些俄国人以为在本半球炫耀共产主义

^① 格瓦拉的文章,《今日报》,1960年7月12日。

的武力，会使拉丁美洲不仅相信有可能对美国公开挑战，而且相信俄国的政策显然比中国的政策占优势。

关于俄国在加勒比海搞这场有名的赌博的起源，就说到这里为止。实际上，这方面的计划首先为保护古巴提供一种强有力的防御圈——二十四组地对空导弹（半径二十五哩）、一百架米格战斗机、核防御导弹和船对船导弹。伊柳辛 28 型轰炸机，还要装置弹道导弹，另有四个战斗群的特种地面部队，配备着战略核武器。弹道导弹预定设置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三个中程导弹大队）、瓜纳哈伊（两个中远程导弹大队）、雷梅迪奥（两个中远程导弹大队）和萨瓜拉格兰德（三个中程导弹大队）。这一切需要很多的特种车辆和人员。把这批物资装到古巴去需要一百多艘船：前所未见的一支阔气的舰队将跨越大西洋准备在加勒比海中进行一次武装对抗。

第三十四章

导弹危机：II

现在所出现的危机真是一场戏剧性的事件，在它的过程中，北半球的人口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接近于灭亡。古巴——危机的主因——终于拖着它的争取自由的雄心和忧虑，二百年来第一次激起了一场世界性的冲突，同时带来了大动乱的危险。然而，在危机过程中，古巴岛国本身从人们的视界中消失了：主角变成是美国和俄国。古巴只是焦躁地在一边注视事态的发展。

1962年7月26日，卡斯特罗在每年纪念他的运动创始的庆祝会上对聚集在圣地亚哥的数以千计的人说，古巴现在所怕的只是美国的直接入侵。在他讲话的时候，俄国的武器和人员大批地开始到达小港马里埃尔和其他口岸。这时，关于未来导弹基地的查勘工作肯定正在进行中。8月间，古巴采取了几项措施，进一步不对农业采取浪漫主义的作法而仿效苏联的方法；采用一种“劳动簿”，人人必须有一本劳动簿才能获得工作；禁止增加工资；甘蔗合作社改为国营农场，到会的一千三百八十个合作社中据说除了三个以外全部投票赞成。合作社社员曾抱怨他们的工资只有国营农场工人的一半，而且一直没有计划要把合作社改为真正的或者自给自足的事业单位。^①合作社本身显然未能作出任何努力，试图在古巴仿效以

色列的或者甚至北美那种自力更生的、成功的合作组织。许多工人离开农业到城市去。甘蔗合作社 1962 年的生产比 1961 年减少。政府似乎集中精力于国营农场。当然，这种合理化的措施并没有解决农业的问题。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说，“消极因素仍然超过积极因素。”

同一天，8 月 23 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康告诉肯尼迪总统，根据流亡分子的报告和空中摄影，他认为苏联正在准备在古巴安置“进攻性导弹”。^②或许法国情报员蒂劳·德·沃若利即莱昂·于里的惊险小说《黄玉》中的主人公给他带来了亲眼看到的情报。没有人相信麦康，虽然他似乎早在 8 月 10 日就提出过这种意见。总之，那是他的一种预感，而不是判断。

8 月 24 日，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坚决声明：“我不赞成这时入侵古巴。”这句话，一方面不能满足美国那些要求“行动”的人，另一方面也不能使古巴的人放心。同一天，国务院情报司司长罗杰·希尔斯曼告诉华盛顿记者团一项“不许记录”的消息，根据美方观察，最近到达古巴的武器可能包括地对空导弹（萨姆）。^③8 月 29 日，一架 U2 飞机在比那尔德里奥上空发现有萨姆导弹阵地的

① 根据迪蒙：《古巴》，第 52 页，这三个是在最近两年获得利润的仅有的合作社。

② 埃利·艾贝尔：《十月的导弹》，第 18 页。罗杰·希尔斯曼：《推动一个国家》（纽约，1964 年），第 172 页，证实这一点。也许如艾贝尔所说（第 40 页），肯尼迪因为中央情报局在前次猪湾大失败中的表现，仍然对该局不信任。无论如何，在华盛顿，人们一般还是不相信俄国会采取这种步骤，麦康也不坚持他的意见。

③ 希尔斯曼书，第 107 页。这些是击落加里·鲍尔斯的 U2 飞机的武器。

迹象。麦康正确地估计到这意味着将要安置进攻性导弹，因为萨姆的唯一用途将是保护进攻性导弹；可是他正在法国度蜜月。^①两天后，可能由于中央情报局泄漏了消息，参议员基廷宣称，俄国的全部配备是为了使苏联能建立导弹基地而“精心策划的”。

同时，9月2日，格瓦拉在莫斯科讨论结束时、在俄国发表的公报中宣称：古巴要求更多的军事援助，俄国将予以提供，因为有来自美国的威胁。俄国还将为古巴新建一所炼钢厂和一处一千三百万美元的捕鱼港。两天后，肯尼迪公开宣布美国已看到古巴的萨姆导弹。他还说，如果“进攻性的地对地导弹”被引进了古巴，美国将不得不行动起来。他就这样明白地把萨姆导弹和中程导弹区别开来，这两种导弹实际上都已经在古巴准备好了；这两种或者已经运到或者已在途中。因此，在肯尼迪把他的威信寄托于保持某一种局面时，俄国和古巴却已在致力于造成另一种局面。^②

9月7日，肯尼迪正式请求并获得国会同意动员预备役十五万人。这一请求显然是针对古巴局势的。卡斯特罗的反应是很典型的：古巴将采取什么步骤来保卫它的主权，不需要华盛顿的指示。劳尔·卡斯特罗说，进攻古巴将标志帝国主义的死亡。同时，瓜纳哈伊中远程导

^① 索伦森书，第670页。麦康于9月7日、10日和13日三次打电报给中央情报局提出他的意见，但这些电报未曾送给肯尼迪看。

^② 罗伯特·肯尼迪：《十三天》（《星期日泰晤士报》1968年10月27日），暗示这一声明是根据他的意见作出的，他的意见本身是那天同苏联大使多勃雷宁谈话后提出的。

弹基地上的建设工程当时毫无疑问已经开始了。恰巧也在9月7日，赫鲁晓夫同罗伯特·弗罗斯特作了一次有名的谈话，暗示西方民主国家太老了，已经不能打仗——这是俄国新的强硬路线的明显表示。塔斯社9月11日的一项声明几乎是歇斯底里地抨击美国，并且说：“人们现在不能指望进攻古巴而侵略者可以不受惩罚，”但是，这一文件又使人迷惑地说“为了击退侵略”并不需要把核武器……“搬到任何其他国家，例如搬到古巴去。”^①然而，在以后的几天里，赫鲁晓夫私人写了一封信向肯尼迪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把地对地导弹送到古巴去——一次直截了当的假话。卡斯特罗两年前所说的“国际棋局”就这样在9月初走得很远了。应该再说清楚，在1962年这个夏秋时候的特征正是俄国国内进一步采取激烈的自由化和非斯大林化措施的时候；这也正是赫鲁晓夫要布哈林的未亡人放心，说她的丈夫是无罪的时候，也是叶甫图申科的《斯大林的继承人》和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的时候：赫鲁晓夫事实上正在各条战线上野心勃勃地推进。

9月8日和15日，分别有两条俄国大货轮“奥姆斯克号”和“波尔塔瓦号”到达哈瓦那，这原是专运木材的船，舱口大，浮水高，顶层甲板上放着运货车，下面是一批中程弹道导弹。显然是在9月9日和20日夜晩由俄国

^① 《真理报》，1962年9月12日。这个声明措辞混乱，使人想到是赫鲁晓夫的手笔。参阅塔图书，第240页。古巴人把这个声明看作是俄国将于古巴被侵时保卫古巴的一种明确保证。所以《革命报》后来用大字标题宣称“如果古巴被侵，美国请尝火箭。”

人卸货后,由护航队护送出去的。^①

事已至此,无可挽回。

然而,9月13日,肯尼迪又声明,如果古巴“为苏联积聚一种进攻性的军事力量”,美国将做“任何必须做的事”。这种很不明确的说法是为了卡斯特罗和赫鲁晓夫,也同样是为了美国国内的舆论,或许大部分是为了参议员基廷而发的,基廷代表共和党的利益在美国到处发表激烈的演说,硬说进攻性导弹已经在古巴安置了,并谴责任何以“柏林交换古巴”的企图。可是过去已有过许多关于古巴导弹的谣传,甚至在1959年苏联还根本没有供应古巴任何武器的时候就有过谣传,美国政府关于古巴导弹的档案就有五吋厚。美国政府非常坚定地认为,把这种战争物资送到古巴去既是愚蠢也不符合所有对苏联行为的期望,因此来自流亡分子、在古巴的间谍和其他人等的暗示都未受到重视。

到9月18日至21日的时候,开始接到秘密报告,说是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地区有诡秘的活动,这是大约在比那尔德里奥和哈瓦那中间的一片森林密布、山峦起伏、景色秀丽的地带。但这些都不可靠的报告,而且,虽然圣克里斯托瓦尔和雷梅迪奥两处导弹基地上的工程几乎肯定已经在9月15至20日间开始,9月17日的U2飞行并未看到。^②9月19日美国情报委员会正式得出结论,说俄国不会把进攻性导弹送到古巴去。即使如此,

^① 希尔斯曼书,第184页。参阅罗伯特·沃尔斯泰特:《古巴和珍珠港:先知与后觉》,《外交季刊》,1965年7月。

两天后，中央情报局收到古巴境内一个间谍的报告说，六十呎的导弹（比萨姆大一倍）已在古巴国内。可是这一消息连中央情报局也不完全相信，根据希尔斯曼的说法这是由于“纯粹怀疑主义”的缘故。“狼来了”喊的次数太多，喊的人也太多。第四个古巴中远程导弹基地上的工程似乎在9月25日到9月30日这几天中已经在萨瓜拉格兰德开始，同时，在9月28日，流亡的古巴大学生指导委员会传阅一份油印的信，其中说有十五处导弹基地在建造中。

在此期间，古巴的武器增多已经在美国报刊上激起罕有的对外国人仇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9月份第一期里明确地说，古巴正在取得“射程远达四百哩的苏联火箭”。俄国军队的来到古巴，似乎是自从拿破仑三世的倒霉的墨西哥远征队以来，第一次有一个非美洲大国在美洲取得立足之地。结果古巴成为美国国会选举运动的中心问题，共和党的政治家们责备总统无所作为。《时代》周刊在9月21日一期的封面上刊登一幅门罗总统的肖像，并叙述他的主义的内容，忘记了不论它具有什么意义都不适用于古巴，而仍然认为对于俄国在古巴的行动美国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在9月17日的一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里，一位退休的将军说了打垮古巴政

② 根据索伦森书，第672页，9月5日以后因天气恶劣飞行暂停。这是不对的：参阅希尔斯曼书，第171页，麦克纳马拉的话（罗伯特·沃尔斯泰特的文章，《外交季刊》1965年7月），以及施莱辛格：《一千天》，第684页。据麦克纳马拉说，5日在古巴西部的飞行是消极的。一度曾显得相当小心，因为美国9月9日在中国损失了一架U2。天气正常时，U2飞机能在一次飞行中遍及整个古巴，但通常用两次飞行。

权的方法：海上封锁和陆上入侵。他证实需要用六个师。

当然还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不过不是来自政治上的关键部门。国防部宣称，美国军队中雇用的古巴人可以用来对付古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接着发表了另一篇使人激动的文章，标题为《正在对古巴进行封锁吗？》。它还说：“封锁的决定，如果作出的话，势将在苏联于古巴充分地加强实力以后。”一星期后，亨利·卢斯夫人在《生活》周刊上写了一篇长文，指出肯尼迪在1960年选举中对古巴的强硬态度和他目前的“冷静”态度截然不同。她的文章充满了即使是时髦的也是可怕的预言：“在拉丁美洲，时间有限了，冷战仍然在那儿失利。”她要求行动：“对古巴进行干涉或者不进行干涉的决定，现在所牵涉的不仅是美国的威望而且是美国继续生存的问题。”^①在10月的第一个星期中，理查德·罗维尔在《纽约人》周刊上发表一篇其兆不祥的文章，讲到华盛顿的“一个主战党”，他说这个党的活动不下于1898年操纵战争的那个集团。

这一切意味着在选举时期对政府施加了压力。即使如此，没有迹象表明肯尼迪将要对压力屈服，象麦金莱在六十年前所做的那样。10月5日和7日U2飞机在古巴东部作了侦察飞行，没有发现什么。10月10日，参议员基廷说，他有来自流亡分子的“百分之百可靠的”证据，有六处中远程导弹基地正在施工。两天前，似乎古巴的多尔蒂科斯总统也几乎承认了事实真相，当时，他在联合国说

① 《生活》周刊，1962年10月5日，第56页。

美国入侵的威胁已经使古巴取得一些军备,这些东西“它本不想要、并且希望不至于必须使用它”。^① 10月10日,肯尼迪再次批准对古巴西部进行U2飞行。这一次由美国空军(不是中央情报局)于10月14日(星期日)执行,但由于飓风的干扰而延迟了一两天。照片显出,9月5日以来U2飞机所未飞过的一个地区,在圣克里斯托瓦尔有一些供机动的一千哩中程弹道导弹大队使用的基地正在建造。根据其他的挖掘工程看来,似乎还在准备二千哩半径中远程导弹使用的坚固的永久基地。^② 因此,正如肯尼迪后来不得不承认的那样,中央情报局的麦康“始终是对的”。^③

在10月16日到10月21日间,美国政府证实了此项情报。为了研究苏联和古巴采取这种行动的原因费了很多时间。人们所提出的理论中,主要是认为赫鲁晓夫在11月间美国选举以后,将会亲自在联合国透露导弹的存在并提出以撤退导弹来交换柏林。^④ 另一些说法则

① 《革命报》,1962年10月9日。多尔蒂科斯在纽约会见葛罗米柯,当然他们可能对于将要把他们两国卷入的那个重大问题交换过意见。

② 参阅1962年11月6日《纽约时报》上的时间表,表中说9月28日拍摄的照片上看到有伊柳辛飞机。这些轰炸机航程九百哩,时速五百哩。可是照片直到10月9日才鉴定完毕。情报于10日提供给有关方面。

③ 阿瑟·克罗克:《在战线上六十年回忆录》(纽约,1968年),第380页。根据克罗克的说法,人们记得,麦康早在8月5日就猜测有进攻性导弹放在古巴。

④ 这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汤普森的看法(艾贝尔书,第48页;参考索伦森书,第677页,关于“理论4”)。赫鲁晓夫早些时候曾说他将延迟到美国选举以后再提出柏林问题。这也是塔图在《克里姆林宫里的权力》中的说法。

认为赫鲁晓夫也许想拿在古巴的导弹交换美国在土耳其和意大利的导弹，^①或者他希望证明美国已经太弱，不敢冒核战争的风险，因而俄国可以进一步渗入南美，甚至促使欧洲盟国跟俄国和解。还有一些人推测，苏联为了证明中国的看法不对，希望美国入侵古巴——从而使西方分裂，使赫鲁晓夫能趁机在柏林有所行动。有些人确实认为导弹只是为了保卫古巴，同时这种新部署可以使俄国的“第一次打击”能力增加一倍——即使不真正深远地改变战略均势，也似乎仍然有这样的后果。再有一些人认为，苏联的行动无论出于什么真正的原因，赫鲁晓夫一定是在进行赌博，以为美国总统在选举如此接近的时刻，决不可能就坚定的行动方针作出决定。

肯尼迪最后得出十分牵强的解释，认为可以把赫鲁晓夫的行为解释为他想在全世界面前证明美国怯弱，认为保卫古巴和增加导弹实力是俄国这种新行动的“可能的但是不适当的”原因。^②10月14日所得到的情报由更多的U2飞行证实了：在此后六天中进行了二十次（不是原计划的两次）。发现了三处不完全的中远程导弹固定基地和六处真正机动的中程导弹发射场。这些地方全部由俄国人而不是古巴人守卫和掌握。美国估计有三十到三

^① 实际上这两处的导弹反正已经到了美国应该撤除的期限，下文可以看到。

^② 然而，10月21日，肯尼迪在同施莱辛格谈话中，认为俄国的行动是因为它想把俄国和中国拉在一起，或者至少借支持古巴而加强俄国在国际革命运动中的声望；因为它想形成在柏林谈判中比较强有力的地位；以及想干脆“给美国一个打击”（施莱辛格书，第693页）。

十五枚导弹，虽然显然是有四十二枚。^①

怎么办？完全不采取行动是绝对不行的，那会证实“戴高乐和其他一些人所担心的，美国靠不住，甚至一离开我们的海岸它就不能对付任何威胁”，同时在拉丁美洲“不干涉会带来一种卡斯特罗—共产主义的潮流”，甚至在不干涉内政是一种“宗教信仰”的国家里也是如此。但是麦克纳马拉“指出……我们已经长期生活在苏联导弹的射程以内，我们原来期望赫鲁晓夫会生活在附近有我们的导弹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冷静地对待这次导弹事件，就可以使他无法夸张导弹的重要性”。肯尼迪否定了这种政策，因为考虑到国际政治影响——显然不是因为考虑到战略的后果。他认为“苏联这着棋走得这么迅捷、这么秘密并且用了如此周密的欺骗手段……以致在微妙的现状中引起一种挑战性的变化”。他也考虑到苏联领土上或者潜艇上的导弹同在西半球的导弹不同，特别是因为它们对拉丁美洲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影响。他认为，这种步骤如果予以容忍，接下去显然还会有进一步的步骤。他在9月间提出采取行动的保证已经清楚地认为这种步骤是不能容忍的。“他不愿意听任联合国进行辩论，听任赫鲁晓夫蒙混过关，而导弹却已经可以运用了。”^② 他“知道他

① 我们始终不知道有多少导弹运进了古巴。苏联人说四十二枚。我们数到有四十二枚运出去。我们看到运进来的不到四十二枚。”（柯尔帕特里克 1962 年 11 月 11 日在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讲话。）可是俄国大概原来打算送来四十八枚中程导弹和六十枚中远程导弹。后一种似乎全部没有运到。

② 索伦森书，第 683 页。狄龙告诉艾贝尔，肯尼迪的最初反应“是人们干脆就不能接受苏联导弹放在古巴针对美国这一事实。”（艾贝尔书，第 48 页。）

不得行动”，正如被人打了一巴掌那样：这不仅是威胁而是一种挑战，^① 纵然在古巴问题上他在美国的政党关系中是处于脆弱的地位，他也认为必须作出反应。

这样，肯尼迪在否定“不行动”的办法中，也否定了他一些顾问所提出的任何只是采取外交行动的主张。^② 他之所以作出这种决定，多半是因为国内的而不是国际的政治关系（也许赫鲁晓夫的决定也是如此）。然而，回想起来，令人觉得奇怪的是，肯尼迪并没有先把他的证据秘密地向俄国人提出。总统决定作出强硬的反应，并且不利用现有的各种调解方法和现有的盟国关系，这部分地是因为恐怕例如一经告知了英国或者法国政府，就较有可能泄密。^③ 如果告诉了欧洲的盟国，那么，那些认为自己由于条约关系有权利在有关美洲大事上进行密切商量的南美国家也必须让它们知道。可是除了保密问题，欧洲盟友还可能不重视这个危机：“大多数欧洲人完全不关心古巴问题，而认为我们对它太担心了。他们长期习惯于生活在苏联导弹的隔壁。他们会……因为我们附近有十来个敌对的导弹，就支持我们冒一场世界大战的危险吗（因为这种情况似乎在一开始就有这种危险）？”^④ 再说，英国人

^① 这是罗伯特·肯尼迪的记录中的看法（《星期日泰晤士报》，1968年10月27日）。肯尼迪后来认为假如他完全不行动，他“一定会受弹劾”。并参阅罗纳德·斯蒂尔：《结局》一文，载《纽约时报书刊评论》，1969年3月13日。

^② 艾贝尔书，第53页。波伦、史蒂文森和邦迪似乎认为采取外交行动最好。

^③ 这一点是邦迪在谈话中对作者说的（1963年1月）。

和法国人也许会讽刺地指出，关于怎样冷静地应付民族主义，过去美国已向他们提过不少意见了。

美国政府就这样地走进了危机，不信任它的盟国，而愿意实行一种即使是胜利，也会使他们一起毁灭的政策。^⑤ 因为，虽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没有受到应有的通知或者谘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意大利和土耳其的基地已作了充分准备。肯尼迪不想让哈罗德·麦克米伦或者戴高乐将军起抑制作用，象在1956年苏伊士危机中艾森豪威尔将军所起的作用那样。同联合国商量的想法，在肯尼迪看来实在讨厌，正如1956年艾登认为讨厌一样；因为，一个智利人好久以前就指出，就美洲的其他国家来说，美国“只把国际公法看作是一根萝卜”。^⑥ 毫无疑问，可以让美洲国家组织参与其事，后来确实也这样做了，可是美洲国家组织只是被告知，而不是被谘询，正如对联合国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样。^⑦

④ 索伦森书，第681页。尼采心里也有这种看法：“我们可以预料英国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些盟国一般都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古巴出现了导弹〔假如确是放在那里〕……美国就会受不了”（艾贝尔书，第33页）。亨利·帕奇特：《冲突经过情况》，第16页，直率地说不和盟国商量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怀疑他们未必会一道采取美国所选择的这种行动”。这是美国同苏联摊牌，必须由美国总统自行决定。

⑤ 英国大使奥姆斯拜·戈尔于10月21日中午被告知这个危机，先于其他盟国。

⑥ 曼努埃尔·福斯特·雷卡瓦伦；承雷蒙德·卡尔先生允许引用这句话，作者谨此志谢。

⑦ 美国国会也同内阁一样不知道这种情况，到10月22日才正式告知内阁。肯尼迪用行政命令，总统布告和“国有权力”行事……“他在早些时候曾拒绝重新召开国会的一切建议”（索伦森书，第701—702页）。他甚至似乎感到恼火，认为国会领袖们（那天下午五时他会见他们）竟然和他争长论短。

这种不同盟国商量的情况当时简直没有人评论过，因为各盟国都觉得最好是不要显得他们被人忽视了，然而，这种疏忽后来却在欧洲受到批评，并且说来奇怪，美国的主要政治评论家李普曼还为之辩护：“用核力量来平衡苏联的核力量，这个指挥权是不能分享的——只能由一个人来掌舵。”^①

到了10月17日，肯尼迪和他的政府，对于是否从空中立即袭击古巴导弹基地或者是否大致按照三星期以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提出的办法封锁古巴这个比较简单的抉择，有着不同的意见。迪安·艾奇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赞成前一种政策；但最后被否定了，因为人们认为那样会扩大冲突，杀伤数以千计的古巴人和俄国人，是一种类似珍珠港的突然袭击行动，从而污损了“美国在历史上的名声”，使“我们在历史的法庭上受到控诉”。^②

^① 在巴黎对英美协会的讲话，引自《新共和》月刊，1962年11月22日。法国的主要政治评论家雷蒙德·阿伦回答说，“我们一定要搞盲目信任吗？李普曼要求欧洲人交出汽车的方向盘时，他实在是要求他们多少要放弃权利……美国核垄断加上不和盟国商量把欧洲国家压低到……保护国的地位。”戴高乐在1963年1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批评了肯尼迪。

^② 罗伯特·肯尼迪的话（索伦森书，第684—685页；参考施莱辛格：《一千天》，第689页）；他告诉他哥哥，“我现在知道东条在策划‘珍珠港’时的心情了。”关于这一切，参阅索伦森书，和罗伯特·肯尼迪在《十三天》中所说的话，封锁的决定是在10月18日作出的，可是关于其他可能办法的讨论在继续进行，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仍然比较喜欢空中打击或者入侵。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入侵要比在1961年困难得多。古巴现在大概有二十二处防空导弹基地，另有两处正在建造弹道导弹基地；地对地“飞航式”导弹，可以比得上美国的马斯和斗牛士；一百架米格战斗机；二十架伊柳辛28轻轰炸机；和一些科马级的带有导弹的苏联巡逻水雷艇（《华盛顿邮报》，1962年10月26日，第18版）。同时，战略空军总司令告诉肯尼迪，一次大规模的突然空中袭击也不一定能消灭所有的进攻性导弹。

因此最后决定设置海军封锁，不让再有导弹或者轰炸机等进攻性武器运来。这种办法的优点是它开始把危机降到最低级——为将来留有很多采取其他办法的余地，而且它本身也不会冒任何人死亡的危险。肯尼迪在作出这一决定时大概是因为有情报说俄国根本不准备打核战争而使他的地位得到了加强，或许间谍宾科夫斯基（恰巧10月22日在莫斯科被捕）提供的关于苏联没有准备的情报在这里起了作用。

当这一计划的细节正在由肯尼迪的顾问们拟订的时候，肯尼迪本人在华盛顿得到了俄国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向他保证说，俄国决不会把进攻性武器给予古巴。^①这一保证使肯尼迪既诧异又愤怒，大概因此他的第一次关于导弹的公开讲话才措辞激烈而带有讽刺。赫鲁晓夫曾于10月16日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保证，说他的一切意图都是具有和平性质的。可是葛罗米柯也许认为美国已经发觉导弹到了古巴，并已经在推测苏联的反应。仍然很奇怪的是，肯尼迪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拿美国在古巴的发现来责备葛罗米柯：罗伯特·肯尼迪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的政策还没有完全决定的缘故。

逼在眼前的危机一直被掩盖得很好，虽然英国大使

^① 他们的谈话大部分是关于柏林问题的。肯尼迪后来很夸奖葛罗米柯这种显明的欺骗手段，可是，虽然（同在华盛顿的俄国大使不同）必须假定葛罗米柯知道古巴有导弹存在，毫无疑问他认为自己有权利把它们叫做“防御性”的，正如腊斯克说到在土耳其的美国“木星”时也用这个有用的形容词。国际外交既是具有如此曲折的和不能令人满意的性质，葛罗米柯的话看来似乎不是特别可恨的。

馆到 10 月 17 日才风闻到这件事。^① 报上已提到军队和飞机向佛罗里达方面的调动。虽然《纽约时报》应肯尼迪的要求没有发表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长期准备的在韦克斯的海军演习，使莫斯科和哈瓦那两处都担心起来。即使如此，肯尼迪关于他的决定的声明还是被推迟到 10 月 22 日，让他的顾问们有充分时间去通知欧洲和南美的盟国，且不说国会。国会方面的一点批评是空中打击或者入侵古巴较为适当：甚至往常爱好和平的富布赖特也支持这种意见，理由是封锁会使俄国的船只同美国的武装力量发生对抗，因而更容易有发生战争的危险。

^① 斯特朗将军(联合情报处主任)在这一天注意到五角大楼有不平常的活动迹象(艾贝尔书,第 60 页)。

第三十五章

导弹危机：III

肯尼迪 10 月 22 日的讲话指出七点：进攻性导弹基地正在古巴建造，这是一个“同美国有特殊的历史关系”的地区。这些基地改变了国际的均势。这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它实际上构成曾在三十年代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种“侵略行为”，这种行为当时本该由英国加以制止的。射程较远的中远程导弹将威胁利马和哈得逊湾之间的一切。美国当然反对核战争，但是它在核战争面前决不退缩，如果需要的话。因此将实行一种“隔离”——这个词不象“封锁”那样具有战斗性——以防止进一步的输入进攻性物资。最后，肯尼迪要求赫鲁晓夫撤退已运到古巴的轰炸机和导弹，并放弃建立发射场。

肯尼迪的讲话避免以所谓古巴被强加的那种虚构的假定把卡斯特罗同俄国连系起来；没有暗示古巴将受到侵犯或者卡斯特罗会被推翻。

这种“隔离”的法律根据，从形式上来说，主要不是根据联合国宪章而是根据美洲国家组织的宪章，它规定成员国有权利采取“集体措施以保卫美洲的安全”。10 月 23 日，美国征得美洲国家组织的同意，并得到十九票通过，乌拉圭只是由于该国驻华盛顿大使未曾接到指示而弃权。所有其他的大使都被迪安·腊斯克向他们提出请

求时的那种严肃态度吓住了。美国还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拆除进攻基地和撤走导弹和喷气式轰炸机，并成立一个联合国视察团前往古巴，保证此项决议的执行。

隔离本身包括驱逐舰十六艘、巡洋舰三艘、反潜艇航空母舰一艘和运输舰六艘，从佛罗里达到波多黎各布成一个弧形，奉令检查、阻止、并于必要时损坏（而不击沉）那些驶往古巴的、可能载运核弹头、空对地或地对空导弹、轰炸机、或者架设那些物资的任何装备的俄国船只。由于包括地对空武器在内，肯尼迪把隔离的范围扩大到最危险的一种防御武器。肯尼迪还指示他的驻几内亚和驻塞内加尔大使（俄国飞机在飞往古巴的途中须在这两个国家停降）请两国政府不给俄国着陆的权利，以免从空中运送弹头；两国政府都同意了——连塞古·杜尔（卡斯特罗的朋友）也同意，理由是他反对在外国领土上设立基地。

全世界于是怀着相当不安的心情等待俄国的反应。美国国内虽然不完全一致，一般还是赞成的。《纽约时报》显得相当冷淡，说肯尼迪“只能如此”。《纽约邮报》批评政府不同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商量。《纽约时报》接连几天发表批评的来信。在伦敦，麦克米伦告诉肯尼迪，欧洲习惯于在“核大炮”下生活，可能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大惊小怪；他的看法是“赫鲁晓夫将试图“以古巴交换柏林”。阿登纳起初似乎“有点激动”。英国的盖茨克尔怀疑这种隔离的合法性，敦促麦克米伦飞往华盛顿。加拿大的迪芬贝克犹豫不定。英国政府，同其他一些盟国一样，

还是给予支持，虽然（一般人们没有注意到）这是英国第一次正式同意别人的海上封锁。火炬确实已经传过去了。正如肯尼迪的一些顾问预料的那样，英国的报纸是最爱吹毛求疵的。例如《泰晤士报》怀疑古巴未必真正有导弹，《卫报》认为赫鲁晓夫在让美国体会“美国基地靠近苏联边境的意义”，《每日邮报》甚至把封锁叫做“战争行为”，认为肯尼迪是受到了“群众情绪”的影响。《每日电闻》也在挑剔。伯特兰·罗素向全世界大众宣告：“一星期内你们都要死掉，好让美国狂人高兴，”并且打电报给肯尼迪：“你的行动是不顾死活的。是对生存的威胁。”他也向赫鲁晓夫呼吁要慎重。^①

东方也传来坏消息，那里再次暴发印中边界争执。10月23日，中国（大概俄国已把它的古巴行动通知了中国）取消关于入侵印度北部的一切限制，批准它的部队尽可能推进：它在利用一个机会——自然不是协同进攻，苏联给了它一个星期的全力支持。^②

在古巴国内，到了10月23日，已有两枚中程导弹可以随时运用。古巴大约有两万俄国部队，分成四个大队，每队五千人左右——两个大队在哈瓦那附近，一个在古巴中部，一个在东部。他们拥有现代化俄国地面作战

^① 罗素勋爵著：《没有武装的胜利》（1963年），第29页。10月23日美国有六百万股以上的股票售出（《华盛顿邮报》，1962年10月24日）。“商品期货”价格上涨的幅度达到朝鲜战争以来的最高纪录——很奇怪，包括糖价在内，糖在10月23日超过每磅每天最多只准上涨半分的限制。10月24日赫鲁晓夫给罗素的答复引起一阵买风。

^② 中国为了这次进攻后来被苏斯洛夫在1964年2月14日于苏联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责备，1964年4月发表。

的装备，包括象美国的“诚实约翰”那样的火箭发射装置。^① 这些事实古巴还没有公开承认，虽然在肯尼迪的讲话中已经听到，其内容大部分在《革命报》上发表了。一般推测不仅古巴将被侵入，而且会受到核打击。当然这是不合理的，不过很明显，在一场全面战争中，哈瓦那很可能会被常规的或者其他的手段所毁灭。然而，卡斯特罗一定知道他的最可能的危险是美国由海上入侵或者由空中轰炸导弹基地。总之，他在10月23日号召总动员。红色标语画着一个手持机枪的人，号召人民武装起来。劳尔·卡斯特罗南下到圣地亚哥负责指挥，我们看到他10月25日同这些老同志在一起：卡利斯托·加西亚、阿曼多·阿科斯塔、福斯蒂诺·佩雷斯、路易斯·马斯·马丁和阿维略·科尔蒂纳（奥连特省协调、执行和监察委员会书记），他们站在一幅“准备战胜”的标语下面。根据一个观察家的看法：“好象一种长期忍住的紧张心情一下子放松下来了，全国同声说‘毕竟到来了’。长期等待入侵、神经战、偷袭、空降间谍、封锁：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了。”^② 纪律性、不害怕和献身精神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卡斯特罗本人10月23日对古巴人作了简短的讲话（一小时二十分钟），谴责肯尼迪的“海盗行为”，并且说任

① 根据沃尔斯泰特的文章（《外交季刊》，1965年7月），这些都没有被美国的U2飞机所发现，后来在低空摄影时才发现。

② 阿道弗·吉利：《古巴革命内幕》（费利克斯·古铁雷斯的译本，1964年），第48页。吉利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后来反对卡斯特罗。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记者中也有人说了完全相似的话。例如：“一种免于挫折的宽慰心情在总统对古巴的行动（原文如此）之后传遍了中西部的草原。”（《纽约时报》纽约版，1962年10月25日，第22版。）

何想要视察古巴的人,来的时候就得准备打仗。“我们拒绝一切视察:古巴不是刚果……我们的武器不是进攻性的。”卡斯特罗把肯尼迪比作海盗亨利·摩根爵士,和德雷克显然不同,他“还有无可怀疑的长处”。美国这条吃饱的鲨鱼真的认为古巴是一条小沙丁吗?^①可是这盘“国际棋局”现在终于不是卡斯特罗所能掌握了。他不知道将发生什么情况。显然赫鲁晓夫并没有跟他商量过,而是,象戴高乐一样,仅仅被通知一下而已。再则,对卡斯特罗来说,他的同盟关系决不再会同以前一样了。然而,对普通古巴人说来,危机的最重要的部分是泛美航空公司无限期地停止开往迈阿密的班机:这种两周一次的客运曾送走了也许二十五万难民到美国,后来直到1965年才恢复,其时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

俄国对肯尼迪的要求的反应,同肯尼迪自己的决定一样,也是在不明白对方真正意图的情况下作出的。俄国似乎认为隔离的用意是防止中远程导弹运来。可是喷气式伊柳辛轰炸机已经到了古巴一个时期。美国只是要设法避免“进攻性”武器到达古巴,还是实际上也希望搞垮卡斯特罗呢?当然,莫斯科报纸的反应是激烈的:“美国的统治阶级终于卸下它的假面具……很少有任何国家干过这样一种粗暴的和背信弃义的侵略。”俄国官方第一次的反应象卡斯特罗的反应一样,是在10月23日发表声明,说他们在古巴的一切武器都是防御性的,隔离是一种海盗行为。在联合国里,俄国大使佐林大概还没

^① 10月24日《革命报》上的原文。他不真正承认导弹的存在。

有接到本国政府的指示，愚笨地指责美国捏造证据。相反地，在联合国的俄国新闻官员对他的美国同僚说，纽约可能第二天就会被炸毁。在华盛顿的苏联大使多勃雷宁似乎和佐林一样，也未奉到指示并且失却了联系。赫鲁晓夫接着写信给肯尼迪，重复公开的说法，并很快就得到回信，肯尼迪以私人名义重申美国的公开立场。

根据空中侦察，华盛顿知道有二十二只俄国货船，其中五只是大舱门（因此适用于载运导弹），当时正驶向哈瓦那。10月23日傍晚，美国报纸宣告：“今晚可能摊牌。”这是一种夸张，因为隔离要到次日（10月24日，星期三）上午才开始；该日上午十时据报有俄国潜艇跟在货船后面，象多年来惯于追逐这条航线上的贩奴船的大鲨鱼那样。于是10月24日《华盛顿每日新闻》的标题是“海上冲突已近”。对大多数人来说，包括肯尼迪和他的政府在内，这是一个严峻的时刻。

整个上午，俄国的船只不是改变航向就是停在海面上不动。《华盛顿晚星报》过早地宣布，“有些赤色船只掉头回去了”。消息传到正在开早会的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那里。五角大楼认为这些船只可能打算在海上某一地点集合，后面跟有潜艇，准备强行通过。同时，赫鲁晓夫在答复伯兰特·罗素的信中公开宣布建议重新举行最高级会议，并保证他的政府决不卤莽从事，将“尽我们的力量防止战争”。赫鲁晓夫利用隐居在北威尔士的年迈的罗素作为居间人，是当时最奇妙的局面。它产生了在当时多少被人忽略了、而现在看来似乎就是苏联后退的第一步。比较常规的中间人吴丹提议：俄国停止输送武器，美国则

推迟实行隔离。可是肯尼迪置之不理，他说，已经在古巴的导弹必须撤走，然后才能暂停隔离。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在给吴丹的答复中表示，即使是在封锁的情况下，也愿意接受谈判——进一步表示退却的迹象。下午，赫鲁晓夫接见一位美国企业家，威斯汀豪斯国际公司的威廉·诺克斯。谈话是含糊的。赫鲁晓夫似乎厌倦了：他说导弹是防御性的；肯尼迪是在冒一场世界大战的危险；如果美国船只企图阻止俄国舰只的话，俄国潜艇就会立即击沉美国舰只。美国政府里有些人从诺克斯对这次谈话的报告中看出俄国希望谈判，以及需要给赫鲁晓夫留一条脱身之路。至少他现在已经承认（虽然是私下说的）在古巴有导弹。与此同时，在五角大楼，麦克纳马拉同海军参谋长安德森海军上将正在为关于拦截俄国船只究竟会引起什么具体后果而争吵：这位海军上将，希莱海军上将的勇敢的继任者说，他不需要指导，因为海军“向来知道怎样执行封锁”。

10月25日，一艘俄国油船（“布加勒斯特号”）和一艘东德客轮（“人民之友号”）被准许不加检查通过隔离线，理由是它们不可能载运导弹或者其他类似的设备。到那时为止，已经有十二艘在驶往古巴途中的俄国船被勒令停下了。

封锁或者隔离因此似乎已经发生作用。现在留下来的是美国所提的撤除现有导弹和轰炸机的要求了。中程导弹现在被认为几天之内就可以使用了，中远程导弹在一个月之内也可以使用。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讨论了是否可以扩大封锁范围，把石油也包括在内，以及是否可以再

作低空飞行、或直接找卡斯特罗交涉、或者再象危机以前那样搞空中打击或者入侵。美国报纸开始公布“核定微粒掩蔽所”名单。与此同时，出现了俄国人关心避免战争的更多迹象。葛罗米柯在柏林发表演说时不提古巴问题。俄国一些外交官到处劝说中间人出来设法促使盟国政府进行调停。艾德莱·史蒂文森在联合国里尽量宣扬俄国代表显然已经消息不灵和缺乏本国政府的指示，佐林则仍然否认古巴有什么俄国导弹，这一种说法史蒂文森觉得只消举行一次出名的照片展览，就一下子可以对它嘲弄一番，从而报复了他在1961年受到的不体面的遭遇。吴丹虽然前一天被肯尼迪置之不理，又向双方呼吁避免在加勒比海中进行“对峙”。

10月26日，星期五，俄国或者古巴的态度都没有什么改变，肯尼迪则下令准备一项“入侵后……在古巴实行文官政治的突击计划”。导弹发射场上的工程似乎确实在继续赶快进行。海上检查在一艘俄国租用开往古巴的巴拿马船“曼努埃尔号”上首次实施。检查队准许它继续航行。可是那天上午《真理报》的标题特别温和，中午，俄国人通过华盛顿苏联大使馆的亚历山德尔·福明（毫无疑问是情报人员）同一个与有关方面有适当联系的电视记者、美国广播公司的约翰·斯卡利这种奇怪的居间人，第一次提出主张和解的积极建议：美国能否保证不侵犯古巴，以换取俄国在联合国监督下撤退导弹？斯卡利征询了希尔斯曼和腊斯克的意见，后来向福明报告说，美国在这个意见中看出了“真正的可能性”。接着，来了一封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信，提出了大致相同的建议，措辞虽

然慌乱但显有诚意，同时佐林在驻纽约的古巴代表团的支持下向吴丹提出同样的建议。^① 这封信感情激动，显然是赫鲁晓夫自己的笔调，充满了对战争恐怖的回忆。赫鲁晓夫说，俄国因为猪湾事件才把导弹送到古巴；这些都是防御性武器；只须美国保证不侵犯古巴，就可以消除导弹的需要。

肯尼迪还没有来得及答复这封信，10月27日（星期六）克里姆林宫又来一封信，改变了这笔买卖的重点，它捡起（伦敦）《泰晤士报》所提出的、并经沃尔特·李普曼^② 在10月25日《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响应的意见，要美国从土耳其撤除导弹基地。^③ 赫鲁晓夫还向肯尼迪保证，已在古巴的导弹是完全由俄国人控制的。^④ 这封信使美国感到不知所措（虽然在信里俄国公开承认古巴有导

① 索伦森书，第712页；施莱辛格：《一千天》，第706—707页。施莱辛格的意思比索伦森更认为俄国提出的交换条件相当明白和干脆。不象赫鲁晓夫其他一些信，这封重要的信在莫斯科未发表。有人认为这暗示赫鲁晓夫是瞒着主席团写的。艾贝尔引用了其中的一段（第181页），可是这封信未在其他地方发表过。

② 李普曼曾在文章里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大炮开始放的时候就停止外交活动。在两次战争中，结果我们都取得伟大胜利，可是我们不善于讲和。今天我们国内有一种心理很容易使我们再犯同样的错误。”例如，肯尼迪在会见葛罗米柯应该给他一个保全面子的机会的时候就停止了外交。李普曼也表示土耳其可以同古巴相比，两者交换一下，可能是“为自动的和无法控制的事态发展的危害找一条出路”。（《华盛顿邮报》，1962年10月25日。）

③ 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曾于10月23日同时说到古巴和土耳其。俄国人可能认为李普曼是在代表肯尼迪讲话的。

④ 俄国人也许有对这些导弹的电子闸门，甚至可能是在俄国控制的，就象美国从当年7月起对它的国外导弹遥控一样。（罗伯特和艾伯特·沃尔斯泰特书，第8页，提示驻有两万俄国军队的真正原因是保卫导弹，不让古巴人接触，而不是防备美国海军陆战队。）

弹)，而其中所提的建议却是肯尼迪所不能接受的。^①赫鲁晓夫仍然控制局势吗？这两封信很象 1914 年 7 月危机中柏林给维也纳的、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两封不同的电报。当时康拉德·赫岑道夫将军曾问“谁在统治柏林？”；确实，这时在俄国领导人间，对于采取什么方针一定发生了严重的分歧。^②

第二封信来了以后，就有消息说一架 U2 飞机在古巴上空被萨姆导弹击落，另一架 U2 偶然迷失方向飞到远东的俄国上空，可能如赫鲁晓夫后来所说，冒着被误认为核轰炸机的危险。“俄国人会把这看作最后的侦察，为核袭击作准备吗？……这是可怕的不祥时刻。”卡斯特罗一直在说击落 U2 飞机应该由他负责，这使人想到在古巴的导弹不是全部由莫斯科集中控制的。虽然肯尼迪未曾下令（象已经准备的那样）对于 U2 在古巴上空被击落作出任何反应，但在全世界所有的美国核部队和常规部队此时都已经奉令准备随时行动，一支庞大的入侵部队也聚集在佛罗里达：“那个星期六，我们这个小组都坐在内阁会议桌周围，不断地开会，觉得核战争在那天比在核时代的任何时候都更加逼近。”^③也许苏联想要战争。参谋长联席会议又一次建议空中打击，继以入侵：这都是发生在星期一的事。

① 虽然美国已经制订了从土耳其撤除导弹基地的计划，这些导弹基地已经过时，这一点赫鲁晓夫一定知道。

② 塔图书，第 270 页，提示赫鲁晓夫那天在主席团里被多数否决了，他对当时所采取的任何行动没有责任，可是后来（在 1962 年 12 月 12 日）他对最高苏维埃发表讲话，不说实际发生的事而是说本来应该怎样做的。

③ 索伦森书，第 706 页。

根据他弟弟的高明而有点柔弱的建议，肯尼迪总统决定，他的最有希望的行动方针是现在应该不管赫鲁晓夫最近的一封信，而答复他前一封信，同意直接接受以保证不侵犯古巴来交换撤退导弹。^①然而，撤退导弹必须在联合国的监视之下。似乎没有任何人认为这是重大的让步，因为没有人真正想要侵犯古巴。罗伯特·肯尼迪亲自把这封信的副本（他和索伦森起草的）送交驻华盛顿的俄国大使，并且说除非美国“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得到保证”，总统将于10月30日采取“军事行动”。^②大概在那天就会接着入侵古巴。罗伯特·肯尼迪后来说，“如果俄国人准备为古巴打核战争，他们就准备打核战争，就是这样。”然而，俄国大使对罗伯特·肯尼迪说，他个人认为赫鲁晓夫过于热中推行他目前的政策，恐怕不能同意肯尼迪的信。与此同时，在迈阿密和其他地方的古巴流亡分子都认为古巴解放的时刻已近在眼前。不用说，肯尼迪两弟兄在新计划方面并未征询过他们的意见。

一方面华盛顿在睡觉——“星期六夜晚是形势最险恶的时候”——另一方面苏联却必须作出反应。赫鲁晓

^① 罗伯特·肯尼迪的文章，《泰晤士报》，1968年10月31日。希尔斯曼书，第223页，把这说成是模仿巴塞特厦场面的“特罗洛普手法”（按特罗洛普是英国小说家，其主要作品有总称为巴塞特厦纪事的六部长篇小说。——译者）在那个故事里，这个姑娘把紧紧握手当作求婚的表示。并参阅索伦森书，第714页，和施莱辛格：《一千天》，第709页；亨利·帕奇特：《互相碰撞》，第67—68页，认为“第一封”信是后写的，可是是因为是个人出面的而且或许是赫鲁晓夫自己的手笔，所以先到了。索伦森否定这种说法（所著书第712页，脚注）；施莱辛格似乎同意这个看法。

^② 罗伯特·肯尼迪的文章，《泰晤士报》，1968年10月31日，有比较长的叙述。他并且说他认为在土耳其的导弹反正不久就要撤除，即使不被迫采取行动。施莱辛格书，第709页；索伦森书，第715页。

夫后来告诉最高苏维埃，他已经“接到情报，入侵将在最近两三天内实行……有必要立刻行动。”尽管大概有科兹洛夫和勃列日涅夫的反，在10月27—28日的夜里，赫鲁晓夫肯定他的“第一封信”包含有他准备信守的一种真正的计划。他立刻下令停止导弹基地上的工程，立即拆卸，运回俄国。清晨，华盛顿讨论这一消息。肯尼迪豪爽地欢迎赫鲁晓夫的“政治家风度的决定”，并尽量阻止人们提起“投降”或者“丢脸”这类字眼；因为保证不侵犯古巴自然是一种回报，即使就俄国来说是一种微薄的回报。赫鲁晓夫没有同卡斯特罗商量，卡斯特罗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和格瓦拉谈话；他当时破口大骂，狠踢墙壁，狂怒之下竟打碎了一面镜子。

1962年10月，这个著名的古巴危机就此结束了，在危机过程中，全世界深深地受到威胁。可是，象大多数戏剧一样，这件事也有一种有口难言的结局。赫鲁晓夫、肯尼迪和全世界都感到轻松，可是许多北美人和差不多所有的古巴流亡分子却认为肯尼迪应该走得更远一些，古巴政府和很多古巴人则至少对俄国非常愤怒。“他们出卖了我们，正如〔他们〕在西班牙〔所干的〕一样”，就是一种典型的反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大学的一次有名的“内部”讲话中，指责赫鲁晓夫没有“种”，会议结束时学生高唱一支新歌曲，

尼基塔，尼基塔，
你给了人家的东西
你不该又收回啊。

卡斯特罗一想到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进行秘密交易就觉

得恶心。在公众面前，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把这次事件同慕尼黑相比，卡斯特罗本人则讲到同俄国发生“误会”以后的“某种不愉快”。卡斯特罗自己的关于结束危机的条件比较详细：内容不仅包括结束封锁，而且要终止各种骚扰、流亡分子的袭击、过多的飞行，以及美国退出关塔那摩等等。这些条件未能为美国所接受。这样，卡斯特罗在形式上避免了订立任何束缚他的契约。俄国人明白地拆除导弹基地，把导弹和喷气式轰炸机都送回俄国，同时又在表示异议，因为这些轰炸机现在应该算是古巴的财产。然而，古巴政府不允许联合国的任何视察。中国支持古巴：他们说，赫鲁晓夫先是搞“冒险主义”，接着又搞“投降主义”。可是，正如福斯蒂诺·佩雷斯在12月间出使北京时发现的那样，中国在贷款方面仍旧不能提供多少帮助。

既然导弹撤退时没有经过联合国的检查，美国政府（虽然取消隔离）结果并未公开保证决不侵犯古巴。他们仍可以用U2飞机来核查俄国人是否确实完成了自己所说要做的一切。可是，尽管美国有合法的自由可以侵犯古巴，他们并未这样做；这似乎在进一步同俄国换文中他们已向俄国保证美国没有这种意图。然而，肯尼迪觉得还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在12月30日向猪湾回来的退役军人会议保证，总有一天会用武力恢复一个自由的古巴。

因此很多人认为肯尼迪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连那些在那个考验时期中怀疑他是否明智的人们后来也转而向他祝贺，即使仅仅为了他所表现的克制精神，能够适可而止，没有趁机使赫鲁晓夫丢脸或者推翻卡斯特罗，也值

得祝贺。此后几年，俄国的对外政策比较谨慎而不冒险了。诚然，赫鲁晓夫也自认为取得了胜利，于12月12日对最高苏维埃说，古巴的社会主义由于他的手腕而得以保全下来。然而，这种说法显然是说给这个第一书记在国内的敌人听的，而且很清楚，在俄国的国内政策方面，古巴危机就是一个转折点。赫鲁晓夫在1963年初不得面临着严重的困难，这些困难是造成他1964年10月间下台的一部分原因。赫鲁晓夫为了在古巴得到一点好处，而在国际上受到很大的损失。他在国内也损失很大，而且从那时起，俄国的“自由”事业和非斯大林化事业都走了下坡。这是肯尼迪的严厉态度的一项意料不到的和不受欢迎的后果。

肯尼迪在这场危机中的动机仍然不很清楚，尽管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发表得很多：是不是他也许更关心俄国实力的明显增加和它的政治影响，或者更关心对他的政府个人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明显挑战，而不关心真正的军事因素呢？他关心的是他在9月4日和9月13日先后阐明的进攻性和防御性两种导弹的界线。当然，假如不是因为选举运动和共和党的压力，他也许不会作出那些声明。声明一经发表以后，如果界线被越过了，他显然就必须行动，以便避免再次在古巴问题上丢脸。麻烦的是，到声明发表的时候，俄国已经作出了越过界线的决定。肯尼迪知道在古巴设置导弹会有助于俄国，虽然他不同于麦克纳马拉，似乎不是从这些导弹会使俄国的打击力量增加一倍这一点来精确地估量它们的重大意义；假如他是这样做的话，他准能看到在他统治下的美国的导弹政策

所具有的挑衅性。确实,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已经达到比俄国领先得多的地步,却恰恰对于这种反应没有什么准备。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危机中所说的话,有很多主要是为了宣传的:总统提到利马和墨西哥这两个城市正在变为在核袭击的射程以内这一说法,就必须用这种眼光来判断,因为它们过去是、现在当然更是在俄国远程导弹的射程以内。肯尼迪要赫鲁晓夫“放弃这种支配世界的做法”也说得较为含糊;他是真正对赫鲁晓夫讲话还是对他自己的舆论说话呢?所以,种种疑团依然存在。

肯尼迪在危机中令人钦佩地关心到细节,直到最基层的行政活动,以便确保所使用的力量不超过他的原意,一切不至于失去控制。对政策是可能有争论的,诚然,欧洲人也许不免认为麦克纳马拉的不行动政策或者史蒂文森的外交手法比较明智。一个不如肯尼迪这样有自尊心的政治家也许会首先把问题秘密地向俄国或者古巴提出,留着公开挑战作为最后的手段。可是,肯尼迪对国家资源的控制和熟悉,以及他随机应变地处理自己所冒的“惊人的危险”(用《新政治家》杂志的话来说)的巧妙高明和老于世故的手法,人们只能将它同1956年安东尼·艾登爵士处理苏伊士事件的那种兴奋狂热的作风相比。

肯尼迪在危机中行动很有克制,后来还相当豪放而直率地使用这种克制所赋予他的力量;例如,他在拿骚不客气地对麦克米伦说,英国不能靠美国花钱而得到它自己的导弹。不久以后,欧洲被训诫了;加拿大受到了侮辱;西方同盟从此不再是以前那样了。为了保全他在古

巴问题上的立场，所以肯尼迪开始拆除美国同欧洲的联系——这种拆除联系的政策，在他的继任者手里可能还会走得更远。另一方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意味着俄国承认美国的核霸权）是肯尼迪在危机期和危机过后的克制政策的肯定的结果。

肯尼迪之所以采取行动，是由于他充分了解到，不管他会收到什么有利的情报估计，结果总是发生核战争。他后来说，俄国会有“不惜一战”的可能性，他认为“大概在三分之一和一半之间”。麦克纳马拉，这个并不是感伤主义的政治家，有一个时候不知道“他命中注定还能再看到多少次日落”。肯尼迪的其他一些顾问提出撤退首都的计划。在肯尼迪于10月22日发表讲话以前，所有的美国导弹工作人员全部奉令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八百架B-47型轰炸机都准备好了，炸弹舱关闭，和五百架同样装了炸弹的B-52型和七十架B-58型一起部署分散。九十架B-52型携带着二十五到五十兆吨氢弹在大西洋上空待命，同时一百枚阿特拉斯、五十枚大力神和十二枚民兵洲际弹道导弹在发射台上准备好了。国外陆上基地、航空母舰和潜艇上所有的导弹和轰炸机也全部准备好。俄国可以动用的虽然相似的但比较小的这种力量也准备好了。约翰·赖斯顿10月23日在《纽约时报》上有根据地说，政府将用一切必要手段迫使撤除导弹基地，如果这引起苏联报复（例如对柏林的反封锁），“美国准备冒大战的危险，以保卫它现在的立场”。^① 美国政府的成员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谈论苟全性命的机会，开一些神经过敏的玩笑；罗伯特·肯尼迪讲到可能是“人类的末日”。古巴的

反应显然没有什么不同：格瓦拉在忙着写一篇文章（六年后在他死后发表的）明显地讨论即将到来的核战争问题：“我们所主张的是，我们必须沿着解放的道路前进，即使牺牲数以百万计的原子遭难者也在所不计”；他想象古巴人民“勇敢地走向意味着最后赎罪的大量牺牲”。^②

古巴导弹危机，或者如古巴人一直所称的加勒比海危机，结束了北美和古巴之间整整二百年的向来的亲密关系。最初，从英国远征队的时代直到拿破仑战争终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商人在哈瓦那做买卖。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有远见的北美人认为到最后古巴会跟着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加入联邦。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1962年之间，美国政府由于各种政治的、战略的和经济的原因，把古巴政府的情况看作根本上是美国政府的事务。可是，1962年，肯尼迪总统虽然对古巴的新盟友俄国取得宣传上的胜利，却默认了古巴民族主义的共产主义政权这一既成事实，这个政权的基础和动力是对美国以及美国在古巴两百年历史中的作用怀着刻骨仇恨。美国这种默认是由于它在古巴的经济上甚至

① 《纽约时报》，1962年10月23日，第1版。一切主要军种都进入“二级战备状态”，这是仅次于“一级战备状态”（战争）的最后步骤的代号。参考《新闻周报》，1963年10月28日。

② 《绿橄榄树》，1968年10月6日。卡斯特罗似乎显然愿意冒可能引起核战争的危险，这给格瓦拉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也说明了他1965年写给卡斯特罗的信里的一段话，否则这些话有点费解：“在你身边，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那些光辉的而又忧郁的日子里，我感到属于我们的人民而自豪。在那些日子里，一个政治家往往不如你那样行动高明，才华焕发，我也为毫不犹豫地跟着你走而感到自豪……”

战略上的利害关系比以前减轻了吗？古巴糖业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停滞情况越来越只是古巴的事情吗？核武器已使得美国以往对加勒比海和巴拿马运河的门口（以及实际上巴拿马运河本身）的重视变为过时了吗？总之，1962年的危机，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危机，确实主要地是一个威信、宣传、和政治问题，而不是一种对经济的和战略的利益的考验。

1962年，古巴有一个新成立的但仍然有点不稳固的极权政府，它控制国内全部重工业和三分之二的农业。经济非常混乱，北美和西欧所了解的那种公民自由是不存在的。大多数相信自由美德的古巴人不是被关在狱中便是流亡国外。可是，古巴政府在广大群众中却深得人心，因为他们佩服政府已经做了的事，因为他们指望所说的未来美景可能实现，因为他们被卡斯特罗迷住了。肯尼迪总统和他周围的人，在一种极端自信和无比成功的社会里教养成长起来的这些人，自然会觉得卡斯特罗那种独断独行、效率不高、往往残酷无情、总是花言巧语的政权绝对受不了。可是，卡斯特罗已经在古巴创造了一种制度，它经过精心策划，同美国所代表的或者至少他认为美国代表的一切恰恰相反。如果有什么人应该对“古巴发生的情况”负责的话，华盛顿和纽约跟哈瓦那或者圣地亚哥都同样有过错。几年后，一位北美的历史家心安理得地说，“即使我们在古巴的所作所为毫无缺点，也许还是白费力气，因为古巴人愚蠢”。可是，北美人在古巴长期以来的愚蠢行为确实使得这种评论荒唐可笑；且不说最近历史上所出现的许多问题，在巴蒂斯塔第二次当政时期，假

如罗斯福于1933年承认格劳·圣马丁，显然会给他的继任者省却无数麻烦。普拉特修正案的愚蠢在它未成为法律以前，参议员福勒克就已经说得清清楚楚。1921年不同古巴政府商量就派遣克劳德将军到哈瓦那去，这甚至在英国对德里的老朽统治者的帝国关系史上也是少有的—种行为。假如伦纳德·伍德将军不把他对整个拉丁族的藐视流露出来，假如他和克劳德将军两人都肯学一点西班牙语，情况一定也会好一些。确实，仍然很难使人不相信的是，如果美国准备对古巴施行象他们在1902年和1933年间所行的那种政治控制，那就不如干脆把整个岛国都接管了。

假如1962年的危机象实际上可能的那样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些问题也许已经由那些幸而还活着的历史家在分析了。有些人，毫无疑问，会完全不顾古巴在1962年这一戏剧性事件中所处的地位。另一些人也许把这次危机看作盎格鲁—撒克逊族和拉丁族之间的最后摊牌，而以古巴作为一场具有毁灭性的最大国际冲突的适当的发火点。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我们确实可以这样说，古巴长期以来是富裕大国的政策和他们的吃糖人民的牺牲品，竟然有一天可说是起来报仇雪恨，而且可能拖着这些大国同归于尽。然而，到头来，古巴在1962年还是被美苏欺骗了：肯尼迪并没有从卡斯特罗手里解放这个岛国，赫鲁晓夫却拿走了导弹。小国往往能挑起世界危机，大国总是出来收场。

第三十六章

空想社会主义者

格瓦拉对古巴革命的目的作了非常清楚的说明：“我们正在寻求一种新制度，使政府和整个社会完全一体化，既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特殊需要，又能尽量避免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庸俗事物（例如国会的两院）……我们一直深为这样一种担心所束缚，即生怕任何形式化会使我们忽略最终的和最重要的革命要求：使人摆脱异化。”^①

这种意向在五十年代后期以至六十年代初期都没有作为革命的目的而被明确地提到过，但是，一切革命政府的种种政策，象一些比较正统的政府的种种政策一样，如果有所变更，是谁都不会感到惊奇的。这些急进计划何以终于会左右革命，其原因上文已经讨论过了。这些都是即使不是完全新颖的、也是野心勃勃的计划，而且因为要判断象古巴革命所造成的这样一种社会动乱，十年的工夫也还为期太短，即使这些计划还没有完成，也似乎是不足为奇的。不消说这些计划也不是正确的。格瓦拉的蔑视资

^① 格瓦拉：《古巴的社会主义和人》（哈瓦那，1965年再版）。这篇文章经常被翻印和翻译。（按“异化”，一译“疏远化”，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曾批判地用过这个术语，并赋以新的内容来表达他的关于劳动的异化的概念。可参阅马克思：《经济学一哲学手稿》。格瓦拉在这里牵强附会地用了这个术语。——译者）

产阶级民主似乎是有成见的；他用“社会主义”这个词儿是指一种被揭示出来的真理，然而那种教条的形式之多，却同通往那种教条的道路不相上下，这一点到现在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了。“异化”这个词儿也是含意不清的，特别是很多被认为被异化的人都是农业工人而不是城市工人。虽然如此，现在可以正当地问一下，在1962年导弹危机以来的这些年中，这些堂皇的计划究竟实现到何等程度，在最近的将来，又可能完成到怎样程度。也许这些计划至今所完成的程度不仅将说明它们作为一个纲领的有效性，还可以说明它们的明智和合理。

自1962年以来，古巴的卫生、教育和全国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方式都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并且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新官僚制度和政治运动，以说服、哄骗并有时强迫人民来执行指望可以促进和资助社会变革的那些政策。因为至今还肯定不可能使政府和社会完全一体化，尽管的确没有一项工作不是为了社会的，尽管用宣传说服很多人相信自己过着英雄史诗般的生活，相信自己即使在物质上并不总是比过去好，却至少在品德方面要比过去好得多。

古巴人现在或许人人可以吃饱，但也仅仅可以吃饱而已。严格的配给制度意味着以谷类、糖和脂肪来供给大多数人民食物中的三分之二热量。1964年，一位捷克经济学家塞鲁基认为，古巴人所得的“脂肪、油、大米、豆类、糖和牛肉的数量同我们在世界大战最后几年中所得到的不相上下”——而1964年是比后五年较好的一个时期。为购买暂时配给不到的物品（例如——在1969年

初——面包)和在饭店外面的一字长蛇阵,表明大多数人想吃比他们所吃到的更多的东西。食物的分配是反复无常的。但死于营养不良的却寥寥无几,在乡村,特别是在奥连特省,极穷苦的农民一定比革命前吃得好些,也正规些;而且几乎每一个人每日三餐都比在古巴持续了那么久的骇人的萧条年月中的饮食要好。^①

有权利到真正能买到东西的特殊商店去的必须具备两种资格:第一,高级官吏、外国专家(更不必说外国观光者)和一切有权有势、生活都能过得比普通人好的人。在旧有的大旅馆里,对黑人也许没有什么歧视了,但是除开有权有势者外,谁也不能进去,例如,拉托雷这家在哈瓦那总是有美味佳肴的餐馆。在革命政府的领导人中大多似乎是相当严肃和简朴的人,但是,很多官员抗拒不住权力的欲望和享乐的生活。还应该想到的是,在二十世纪,实则在十九世纪,古巴就不是一个饥馑的国家了(自1900年以来也不是一个天灾肆虐的国家)。由于这个原因,正如由于其他很多原因一样,古巴在过去与其说是象不发达世界或第三世界的一个典型部分,不如说是更象一个富国的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行省,一个西弗吉尼亚州。

物品的短缺对于除了最高级官员以外的其他人的生活质量都有影响。一天工作过后,还要花很多时间去排队购买食品和其他必需品。担任民兵或者为国家作出的

^① 配给似乎是(1969/1970年):肉,哈瓦那每星期四分之三磅,外地半磅;鱼,每星期四分之一磅;奶油,每月二两;蛋,每星期三只;咖啡,每星期一两半;面包,每天四两;大米,每月三磅;糖,每月六磅;油,每月十二两;鸡,只凭医疗证明书供应老幼,其他诸如衣着(裤子每年两条,衬衫一件)和牙膏(每户每月一管)等物品也实行配合。

其他自愿义务工作,也要占去时间。应该说,天生快快乐乐的古巴人似乎非常高兴地接受这一切,虽则他们也一切加以批评。

造成实行严格分配制的原因是,第一,1960年前从美国进口大量食品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第二,革命初期的农业生产下降了;^①第三,全国生产用于“储存或投资”占了极高的百分比——大约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三十五。大多数传统的古巴产品,例如水果、蔬菜和牛肉都运往东欧和俄国,以偿付古巴对那些国家的债务。为使古巴人改变他们的传统饮食而作了种种努力——例如,多吃一点鱼——却一直未能取得很大成就。所以当食品在1960年11月开始短缺时,凡是不健忘的古巴人就不免要讥讽地想起卡斯特罗的许诺:“记住我现在对你们所讲的话!到12月,食品可再度供应如常,并从此不再会买不到东西。”^②有五十四种香味的冰淇淋餐馆的供应网仍抵补不了正餐的绝迹。此外,象药物和文具小商品等其他消费品也是缺乏的。

可予以抵补的是,失业数字无疑已经下降,尽管很多一度为家务缠身的妇女在经济中得到了新的使用。这部分是因为在人口中有很大的一个百分比移居国外;部分是因为在革命初期人口流入城市,特别是流入政府、党组

^① 最近的数字不是确凿无疑的,但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截至1965年的统计数字表明,自1958年以来农业生产每人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一(《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月报》,1965年4月,第17—20页)。自1965年以来,农业生产已经有了增长,但不是为消费者的利益。

^② 《革命文献》,第28期,1960年11月9日。

织和部队；^①部分是因为进入大中小学的儿童数目有了增加。成为旧古巴之特征的成群结队、终日游荡、无所事事的儿童，除了在哈瓦那的一些地区，可以说已经跟着“淡季”一起绝迹了。很多过去的砍蔗工都以这一种或那一种资格被吸收进中央各部或国营农场的“革命工作”中去。这些农场一直是太缺乏实效，不能在经济上把他们的工人组织起来。甚至还有缺少熟练工人的情况，特别是在制糖工业方面。但是，据观察，甚至在制糖厂也有大量就业不足的情况。如果目前的机械化计划成功的话，这种情况还会有所增加。封闭了自酒吧间至水果贩许许多多小本经营的1968年的“革命攻势”，似乎也一定会导致许多失业，特别是在哈瓦那以及在很多残存的小工厂、雇用两、三个人的作坊和商店老板以及工人中，虽则其中有一些是由于移民出境的关系。

革命政府已经在很多方面改进了古巴的卫生工作。一般教学医院、专科医院和专科研究所都由新一代的具有“高度智力和才干的”古巴医生维持得很好。卫生和卫生设备方面，到处都有了显著的增进。医药的应用已经在全国各地得到了更公平的推广。预防性医药大受重

^① 难以确知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究竟在作些什么。戈登堡（在1960年7月离开古巴）认为“很多工厂所雇用的工人都超过实际的需要；文官大为膨胀；有很多方法可以取得一笔国家奖学金进入某一学校；虽然民兵服役是无报酬的，但有时也往往可以靠其为生；最后botellas制（意义不明，待考，——译者）重又出现”（戈登堡书，第260页）。《波希米亚》周刊（1962年3月2日）评论说，“古巴有一个补充储备部门。这里有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除从国家领一笔干薪之外，无所事事……他们坐在家，等到月底就可以领取他们的支票。很多人愿意用他们的时间作一点事情，另一些人则满脑子的坏思想。”

视,农村地区设立了很多诊疗所。因肺病、疟疾和伤寒而致死的已经大为减少,并且如同其他地方一样,脊髓灰白质炎似乎已经靠了群众性注射而根除了。可钦佩的一个成就是由贝尔纳维·奥尔达斯博士富有想象力地领导的马索拉精神病院,这个病院过去是一个令人望而生厌的场所,现在却变成了一个静穆的所在——它已经份有应得地变成每个获得批准的外国观光者的一个参观场所。^①另一方面,现在医生虽然比过去略多一些,但也许在训练上较差一些。^②有一些最好的古巴医生已经移居国外。医药和其他设备往往缺乏或供应失常,因为大部分医药设备是来自俄国或东欧的。以意识形态为掩护的偏见也许有时妨碍了最好的医疗。圣地亚哥有一位医生拒绝用北美的设备来医治古巴病人,虽则他别无其他设备。护士和牙医依然短缺。肠胃炎、梅毒和肝炎最近似乎有所增加。婴儿死亡率仍然很高,似乎最最少还得保持千分之四十,虽则同拉丁美洲其余各地相比仍然是低的,但比加勒比海的大多数地方还是高些,而且几乎为美国和西欧婴儿死亡率的一倍。

古巴没有人口政策,也不必为人口操心。它的增长率约为2.7%,比它的大多数邻国都低,并且正如卡斯特罗

① 在1969年访问精神病院时,我不禁诧异地看到那些照料得很好的病人有很多是1959年以来政治事件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

② 古巴现在大约有八千名医生,而1958年是七千二百名。其中大约有二千五百名在1959和1965年之间离开了古巴,他们仍然在按照每月四人的比例继续离国他去。参看威利斯·巴特勒:《古巴的革命医学》,《壁垒》杂志,1969年5月。把人口的增长计算在内,平均每一个人的医生数,或许和1958年不相上下。

本人所表示的，古巴如果经济组织完善，可以赡养三倍于它目前的人口。另一方面，古巴的粮食生产自1959年以来就未曾同人口的增长齐头并进，而且每年的人口增长率有增无已。所以古巴目前的人口密度大约是每平方公里七十人，可能在不到三十年内会增长一倍。这就会使古巴这个较小的加勒比海群岛的人口同过剩相去不远了。无可否认，在大多数古巴的大医院中都有节制生育科，并且所有妇女在第一胎之后即免费给予一种内子宫套（如果她们是在医院生产的话，现在大多在医院生产），但是，尽管有引人注目的这项服务的广告，却似乎不大为人所利用，这或许是因为男子反对，认为这会给不贞行为大开方便之门的缘故。所以在这些重要方面，社会主义的古巴还不如，比如说，资本主义的日本那么“革命”，日本已经使它出生率在1947至1957年这十年间减少了一半。

自从革命以来，古巴的教育已经历了一次新生，虽则一些限制是必要的。在数目上，变革似乎是有莫大裨益的。在1959年以前，小学适龄儿童有一半没有入学。今天他们都受到了一些教育，所以小学有学生一百五十万人，而不是1958年的七十二万人了。小学教师有五万，1958年前尚不到一万七千人。作为国家奖学金学生而进入中学的百分比比以前大得多——占适龄的四十万人中的大约十八万；自1967年以来，在一位老共产党员克莱门蒂纳·塞拉的管理下，几乎所有四十五天以上的婴儿都进入幼儿园。1964—1965年，据教育部报告，在成年教育方面注册的有八十四万八千人。

但是，很多儿童是违背他们的意愿被迫离家去上中等寄宿学校的，一切教学都是在政府为青年提出的口号——学习，工作，步枪——的庇护下进行的。六岁以上的儿童必须在周末和假日参加一些农业方面的“生产劳动”，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一部分。从学校名称到学习文法时所举的例句都特别注意于革命英雄人物，尤其是对于格瓦拉这位无所畏惧、无懈可击的革命模范。宗教自然不起任何作用了。书籍、教师和课室依然严重缺乏，因此，正如教育部长何塞·利亚努萨在1968年所说的，这些缺点也许在1980年前尚无法克服。最后，革命古巴的教育内容，尽管有一种现代化的外貌，似乎还是旧式的：学习方法是死记硬背定理和例证；而近年来的着重身体健康（特别是在古巴全国旅游和体育事业的前主持人利亚努萨的指导下），不免使人感到奇怪地想到英国的公立学校。“协作精神”在古巴如同在英国的维塞斯一样，很好地纠正了令人怀疑的“唯智力论”和研究精神。正如一位对革命抱善意的北美人所说的，“图片、标语和给国营农场所起的名称……一切都教导年青古巴人要想到他们的生活是同革命的各方面密切相联系的：这是一种透过镜子的御用教育。”

这些限制甚至更其强烈地施用于高等教育方面。初看上去，成就一直是惊人的。在1969年有技专学生三万人，正式生四万人，而在1958年则分别为六千二百五十和二万五千，虽则大学名额的增加比较有限，但是在一个农业国家中以牺牲法律和史学生来增加技术教育，却显然是有益的。在这方面也已经有了一些辉煌的成就，

例如里卡多·波罗在原有的乡村俱乐部高尔夫球场所设立的那个虽还不很完善却是颇为出色的美术学院。^①另一方面,所有大学生都必须学习一年的辩证唯物主义课;每年在兵营里住十五天;在假期中,则同小学生一样,参加“生产劳动”;并每星期在民兵队服役若干小时。所用的教科书大多是直接从俄文本翻译过来的。有一些科系的教学工作大多是由毕业班学生担任的。大学自治已告结束,虽则名义上大学生参加自己求学机构的经营管理,但这些机构在一切重要方面都是同经济方面的需要,而不是同大学生的意愿联系在一起的。古巴共产党,如同在社会的其他部门一样,也在这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例如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1967年所以主张同性恋者必须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以及在1965年所以要求清洗一切有缺乏革命热情嫌疑的学生,肯定不是由于自发的憎恶,而是由于国内政治的原因。^②

古巴大学的远景是不大令人鼓舞的。卡斯特罗在1966年看到大学生的“革命意识”不如中等农学家之后,痛斥了“理论之墙和抽象主义”,两年之后,在1968年12月,他展望未来,认为迟早总要把古巴的大学一律取消,因为到了那时只有少数例外的活动才需要高深的学识。普通教育在最近几年总是包括技术教育在内,并且大多数人将作为有训练的专家进入农业或工业部门:“将来实

① 波罗后来流亡巴黎。

② 参看麦克拉奇的一篇记述,《重游古巴》,1967年,《麦克拉奇报》,圣克拉门托,加利福尼亚。麦克拉奇听一个学生说,只有忠于革命的人才可以接受大学教育,而不问其实际学力。

实际上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农业区、每一个医院、每一所学校都是一个大学”，并且，不妨补充说，看到那些儿童都列成军事队形穿着不同的制服（中学生——奖学金学生，穿灰衬衫和绿裤，受家政或技术训练的女生，则穿着粉红衬衫和蓝裤）前去进餐，每一所学校无异是一个联队。

大学里一直存在着许多小麻烦：有些学生厌恶不民主的大学生联合会的组织、厌恶强迫民兵服役、厌恶男女之间偶尔发生的不平等待遇、厌恶四十五天的农业劳动以及取缔紧身裤和花衬衫等等。表示积极不同意的可能性自然是没的，利亚努萨曾经对学生说，“我们这里不能有一个捷克斯洛伐克。”

需要青年劳动和热情的革命政权也给他们以利益和报酬。十五岁以下的人口比例一定已经接近世界百分之四十五的这个平均数。去古巴的一个又一个访问者都对古巴青年在那样小的年龄就具有的献身精神、活力和责任感表示惊奇。松树岛在1966年改名为青年岛，并成为农业试验的中心，由年龄十二至二十七岁的、为数日益增多的古巴青年加以经营，既不必发薪给，也没有什么开支。^①这个新的一代将准备在将来把火炬代代相传下去吗？或者，当前这一代的青年领袖会不会象俄国和东欧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分子那样，随着时日的推移而变

^① 有关情况可参看詹姆斯·希金斯：《古巴的新人》，《民族》杂志，1968年2月12日。青年岛现在有人口大约五万，而不是1953年的八千。它是一种志愿劳动者的长期夏令营，免费供应一切生活必需品。

成为对新变革抱怀疑态度的呆板的机关工作者，因而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抽象主义者”，或“人道主义者”的新浪潮所批评或憎恶的“保守主义的”靶子呢？

从1968年底出现一股流氓阿飞风及对它的取缔，从1968—1969年犯罪高潮中，青年犯罪率占了很高的百分比，以及一些青年显然希望离开古巴而除非以身试法否则就无法如愿以偿等等情况看来，^①的确更有可能出现后一种结果。除非到了社会和政府确实是合为一体的时候，否则，将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以怀疑态度来看待卡斯特罗的那句家长式的格言“劳动是青年最好的老师”，并开始怀疑“参加农业劳动不但会加深青年的革命意识而且有助于使他们认识到人的新价值”这一理论。教训是“具有正反两方面意义的”。走了萨瓦纳罗拉，又来了梅迪西斯；而结果，很多人，也许大多数人通常又回到原有的看法，认为个人的舒适和享乐比世界上所有的信条都更有价值，而怀疑论比热情也更富有出息。

革命政府的对待保健和教育工作的多少看到这个政权的真正特征：我们看到具有献身精神的人们以腐败的设备在进行劳动，儿童合着成年人的号角声显然是在愉快地前进，以千篇一律的游行示威表示爱国行为。但是再明确的莫过于，比如说，古巴派驻联合国教育、科学及

^① 目前十四至二十八岁——也就是可能服兵役的年龄——的青年人不得申请移居境外的出国签证。近年来最著名的漏网逃亡者是二十二岁的阿曼多·索科拉斯·拉米雷斯，他在1969年6月成功地躲藏在飞行于哈瓦那和马德里之间的一架喷气式飞机的轮座里偷渡出国；最年轻的是十三岁的拉斐尔·桑切斯·雷内尔，他泅水逃到关塔那摩的美国基地。

文化组织代表团的发言的调子了。在考虑到在革命政权之下妇女和黑人的地位时，也出现了这种暧昧的情况。

“真正的妇女斗争，”一个古巴姑娘在她二十多岁的时候这样告诉那位敏锐的北美观察家伊丽莎白·萨瑟兰说，“是旨在摒弃所有那些童年教训、所有那些青年时期的家庭压迫、甚至摒弃那种影响她的成年的主要社会思潮……即把女性的、妇女的理想理解为把一生贡献于物色和保持一个配偶，而且一般是以作为他的附属品为代价的。”^① 这个战役虽然还没有成为过去，但是自从革命以来，妇女的地位的确有了不少变化。第一，家庭已经有了很大的变革。根据习俗举行的结婚是自由的（依照俄国方式在结婚宫举行，例如在哈瓦那则在西班牙俱乐部原来的建筑物中举行），并且度蜜月的夫妇在海滨或乡间那些通常的漂亮旅馆中可以获得减价和优先待遇。^② 鼓励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就进幼儿园，以使妇女可以自由参加“生产劳动”。结果是，在六十年代后期，很多咖啡种植者，特别是在哈瓦那省，都是由妇女进行的，而且甘蔗采集中心也是由妇女领导的，而在1959年以前，妇女则只不过是例外的情况下参加农业而已（例如，在比那尔德里奥的甘蔗田里）。^③ 在1967年下半年，劳动部长豪尔赫·里斯克特（曾经在克里斯塔尔山劳尔·卡斯特罗的部队

① 伊丽莎白·萨瑟兰书：《最年青的革命，关于古巴的个人报告》（纽约，1969年），第90页。

② 对于那些彼此情愿同居的人似乎实际上也是强制性的。

③ 1968年3月29日的《波希米亚》上把一个妇女管理的甘蔗采集中心称为妇女对革命活动的〔一个〕贡献”。

中担任教官的一个老共产党员)解释说,将来“妇女的主要任务将是取代工厂中那些(志愿)前往砍甘蔗的工人”。在卡斯特罗消灭小企业时,古巴妇女联合会有一道命令要求妇女:“在家庭、在学校、在邻里、在劳动、在娱乐中心、在买东西的一字长蛇阵中或在公共汽车上,都处处要保持一种战士的斗志昂扬的态度。”^①这表示一般认为有很多活动是妇女可以大有作为的。诚然,妇女在保卫革命委员会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女青年在大学生中所占比例已经增加,女青年在哈瓦那已经接受了交通警察的职务,而缝纫学校和农村女青年的手工艺课在效果上无疑是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

另一方面,吸收一百万妇女参加经济活动的这个目标,可能到1970年也不会达到。妇女的新独立地位并不总是合男子之意的,不管他们在其他方面是如何急进,在从衣着至肥皂等普通用品的配给和短缺中,妇女显然是首当其冲的。她们现在往往是既劳动又操持家务。甚至在1962年,妇女都显然比男子更敌视革命。自从1959年以来那些流亡的人中,妇女大约占一半以上。妇女在政治中实际上并不是很突出的。^②而且究竟她们在现代古巴公共生活中所居的地位是否真的比过去更幸福,却是殊

① 《格拉玛报》,每周版,1968年3月20日。

② 1965年,在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所属各委员会和政治局)一百名中央委员之中,只有妇女五人,而且其中有四人之所以重要一定是由于同男性革命领袖亲近的原故——塞莉亚·桑切斯自马埃斯特腊山时代以来就是卡斯特的秘书,埃伦娜·希尔是多尔蒂科斯的秘书,比尔马·埃斯平(妇女联合会主席)是劳尔·卡斯特的妻子,而艾德·桑塔马利亚是党的组织部长阿曼多·阿特的妻子。另一个妇女,克莱门蒂娜·塞拉,一位老共产党员,是幼儿园总监。

可怀疑的。对男子气概的崇拜也许已经差不多随着卖淫（而性的习惯也多少有了不同）的绝迹而消失，但是，过去在古巴的大多数家庭中，妇女事实上是一家之主。在家室以外，男子带着机关枪乘坐奥尔斯摩比尔牌或别克牌小轿车四处闯，成为歹徒，高谈自由和命运，出入酒吧间、妓院和赌场，但也许只有剧院和在现实生活中才是妇女拥有支配一切的地方。现在现实和空想的鸿沟弥合了，但女性的真正权力却可能减少了，如果说在个人关系上古巴人仍然似乎是保守的话。所以，结婚和离婚虽然都大为增加，但在1967年《起义青年报》上的一篇综述中却表明甚至在哈瓦那人中有一半认为童贞仍是结婚的先决条件。

黑人的情况，也同妇女的情况一样。如果单就物质条件考虑，乍一看来，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今天在古巴一定比革命以前生活得好些。颁给占据公地者以地契、增加了有吸引力的农村住屋、扫盲运动、乡间教育、清洁卫生和保健方面的增进（特别是在奥连特省），一定特别加惠于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1962年，在古巴进行了最后一次相当不受其他影响的民意调查，北美社会学家莫里斯·蔡特林发现有百分之八十的黑人完全赞成革命，而白人赞成的只有百分之六十七。也许有很多黑人仍然把卡斯特罗看作是非洲古巴宗教仪式中一种民族的守护神，是一个被邪除恶的有力人物（很多人对巴蒂斯塔和马查多也有这种看法）。但是有些黑人现在却由于具有更大的自觉而大吃苦头，而且作为继续表示不同的忠诚的符号的非洲古巴的宗教节日，因为不容易找到公鸡和其他必需品，已经不那么频繁举行了。但是宗教节日依然存在下

来，白人也象过去一样地参加，毫无疑问对神的崇拜和古巴黑人社会的秘密结社将比卡斯特罗的寿命更长，正如它们已比其他一些古巴总统的寿命更长一样。“只要大鼓存在一天，‘阿瓦夸’^①就会在古巴存在一天”。此外，旧有的种族偏见和习惯，黑人的卑屈态度和白人的傲慢态度，似乎还要继续存在下去。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马蒂这两位革命先知，都不是象二十世纪下半叶所领悟的那样来理解种族，他们两人的著作似乎都不足以解决显然成为古巴人以及其他“非洲—美洲人”之特性的那种焦虑：他们是要支持同化还是支持整体化呢？是要支持西班牙化还是支持非洲的主张呢？古老的神话（例如，关于黑人的性的优越性的神话）会不会随着碧眼金发的白晰女郎而绝迹呢？^②

一个古巴黑人共产党员卡洛斯·莫雷于1965年在《今日非洲》那家巴黎的毛主义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他在论文中把所有这些问题都带进了争论的领域，他论证说，古巴革命不过是白人民族资产阶级的胜利，偏见继续存在，古巴黑人人口的规模连同黑人对古巴历史

^① 阿瓦夸(ABAKUA)，不详，待查。——译者

^② 参看·萨瑟兰书，第62—78页，非常出色的一章。1963年一个名叫汉·卡鲁的古亚南人问一个来自奥连特省的黑人说，“黑人在革命的古巴是怎么个样子”，得到的答复是：“我们仍然是黑人，是一个少数民族，革命并没有发明一种可以把我们洗白的肥皂……他们在名义上把我们解放了，可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仍然有很多隔离……我们同美国黑人不一样，可是我们也不想同古巴白人一样……古巴白人是上帝所创造的人类中最讨厌的一种，他们是英勇的……他们全不把白人世界放在眼里，你会称赞他们，钦佩他们，但你不会喜欢他们……我不愿意（我的女儿）同一个呆头呆脑、假装圣人、长满络腮胡子的白种白痴搞在一起”（托波尔斯基的《编年史》，第11卷，第17—20页，1963年）。

所作出的贡献,在统计上依然是假的,而且古巴黑人在古巴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并不比他们在1958年以前所起的多——如果不是更少的话。诚然,照1965年所组成的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看来,似乎只有十分之一有黑人血统,而且这个政权显然力图容忍黑人的感情,以使其同北美的作法形成对照(可以记得,卡斯特罗在他当权前的任何演讲和有关意图的声明中,从来没有提到过黑人问题)。古巴黑人自从1959年以来在卡斯特罗手中所得到的利益,肯定不如胡安·高尔维托·戈麦斯或马丁·莫鲁亚·德尔加多这些黑白混血种政论家在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最后十年中所得到的那么大。

卡斯特罗公开支持美国黑人权力运动(特别自从1967年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访问哈瓦那以来)可能将在古巴本身引起麻烦。所以,在1953年(原文如此——译者)保卫卡斯特罗的政策而反对古巴正统的共产党的黑人共产党员瓦尔特里奥·卡沃内尔,已经在改造营中度过了一段时期。理由是他的民俗学研究带有种族主义的色彩。有些流亡的北美黑人战士,从罗伯特·威廉斯至黑豹党员都碰到过他们认为是种族偏见的^①事情,有些反革命游

^① 卡洛斯·莫雷是威廉斯的翻译。威廉斯在古巴流亡了几年之后(他在那里经营一个叫作自由迪克西电台的无线电广播电台),去到中国,并在那里在他的单张报纸《十字军战士》上谴责古巴革命说:“黑人再次成了种族偏见和歧视的一个可怜的牺牲者……非洲古巴人开始感觉到一点微妙的而且是很快的重新出现的种族主义”(《十字军战士》,第8卷,第43号,1967年3月)。后来,他说,古巴的反间谍警察为中央情报局所渗透(同上,1967年5月)。1966年8月,威廉斯写了一封长信给卡斯特罗,抱怨他所受的待遇。1969年中期黑豹党员,包括埃尔德里奇·克利弗在内,在哈瓦那遭到了麻烦,以至逮捕。(《国际先驱论坛报》,1969年6月26日。)

击队首领，如“卡拉·林达”和“马切特罗”等都是黑人。

自然，古巴仍然是加勒比海的岛屿中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一个，虽然因为语言的缘故，革命对于英、美、荷的岛屿简直没有发生什么影响，而且对于波多黎各的影响也是有限的（除开因大约一万五千名古巴流亡者到达那里而或许产生了反作用）。卡斯特罗所承认的是古巴在文化方面同西班牙和西美的联系，而不是古巴在经济方面同加勒比海的联系，而且在很多方面说来，古巴革命基本上是属于文化方面的。但是，归根结底，除非它们彼此采取共同行动，很难看出安的列斯群岛中的任何岛屿，如何能取得政治自由，在这方面，古巴黑人和非洲的传统，在同西班牙美洲革命传统那种无穷无尽的花言巧语相形之下，肯定是最富有弹性的。

象古巴所发生的那样彻底的社会革命，常常使人民摆脱了许多顽固的习俗，不管社会改革者原来的目的是多么不以此为重。不过就性的问题而言，古巴却一贯是最自由的地方之一，而革命却具有一种最强烈的清教徒的因素。所以其结果如何就不清楚了。

因此，象 1959 年以前一样，以适度的代价解决性的问题的旅馆或下等妓院继续存在，尽管在革命初期的自由年月中曾试图加以取缔。^① 由于革命的结果，古巴显

① 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中，第一任内务部长的公共秩序司司长、前路德教派牧师塞萨尔·布兰科常常去哈瓦那的一些旅馆，并且在周围装上电灯和扩音器。然后他在扩音器上宣传说，“现在再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来放弃这类罪恶的丑把戏”。但是，这段清教徒主义的时期没有持续下去，利亚努萨在任旅游局局长时将旅馆国有化了。1960年10月，布兰科离开古巴前往美国。

然有一种影响个人和家庭行为所有各方面的探讨性的实验——附有一项限制：实验者必须是异性恋爱的。同性恋者却不那么受到照顾；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在古巴搞同性恋的人会比世界其他地区略少，实则在取缔之下，人数反而有增无已。1965年，展开了一次反对这种少数人行为的全国性运动，同性恋被宣布是同革命态度不相容的。例如在古巴艺术和电影业委员会中有几个著名的同性恋者丢了他们的工作，在大学中，他们被迫公开承认他们的“罪恶”后，被逐出讲堂，并在某些场合下送往农村劳动。不过这种无聊的运动后来废止了——据说是根据卡斯特罗的创议，虽则这整个事情如果没有得到他的鼓励是不可能开始的——1968年还有一位英国作家发现一个男孩子，据说他是一个搞同性恋者，他说宁愿生下来就死掉，因为在古巴“同性恋者是被看成比畜牲都不如的”。

这个政权还有其他一些恐惧。因此在革命初期对于追求舒适生活者给予各式各样打击之后，卡斯特罗在1968年9月28日纪念保卫革命委员会成立八周年的一篇讲话中，痛斥沉迷于“奢侈方式”生活的古巴青年。他说，留长头发，穿花衣服是道德堕落的表现，终将导致政治和经济的破坏行动。一个星期后，一位著名的评论员，吉多·加西亚·因克兰不但斥责外国式样的服装和长发，而且斥责那些弹吉他、吸大麻和“合着癫癲性音乐疯狂跳舞”的人们。这种人在小酒吧间里“荡来荡去，听着帝国主义的自动留声机”，但是（在很多小酒吧间已经关闭之后）现在又自行组成了象“垮掉了的一代”或“长发仔”

这些名称的“痴人乐团”，各有特殊的入团仪式和忠诚宣誓。这些已经导致了亵渎国旗和格瓦拉像这类“令人难以相信的行为”。接着便是大规模地剪长头发，并让那些穿超短裙的女学生都穿上据说她们“很爱穿的学校制服”，前往乡间强迫劳动营。在十年前被认为是由大胡子们“解放了的”一个国家中，这个运动确是奇怪的。

第三十七章

“一千万吨收成”及其含义

随着 1959 年夺取政权而来的政治革命必然带来下述三个问题：第一，立即提高生活水平；第二，迅速工业化；以及第三，扭转长久以来起了如此巨大的、并如很多人所认为的、具有如此破坏作用的着重于糖业的倾向。但是，这些问题竟一个也没有解决。格瓦拉在 1960 年谈到了古巴将来要在钢铁方面自给自足，但是到了 1965 年，工业化已经无限期地推迟了。1960 年，卡斯特罗在说生活标准的改善将比其他任何历经了一场革命的国家来得更快，但是，两年以后，城市的生活标准竟然崩溃了，而到了六十年代末，大多数古巴人正在过着一种非常简朴的生活。最后，在 1960 至 1962 年间，糖业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已是名誉扫地了，如果说自 1963 年以来糖业还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比 1959 年以前起了更大的作用。^①“决定性努力的一年”，即 1969—1970 年，^② 其实是特别

^① 正是在 1963 年 8 月 10 日，在哈瓦那的哈瓦那自由旅馆，卡斯特罗对水利资源研究所宣称，“我们将要首先发展蔗田，然后发展牛群。这些将是 1970 年前经济的两根柱石。”

^② 自从 1959 年以来，每年都由政府起一个名字，以提示全国的目标。所以，1959 年是解放年，1960 年是土地改革年，1961 年是教育年，1962 年是计划年，1963 年是组织年，1964 年是经济年，1965 年是农业年，1966 年是不发达世界团结年，1967 年是英雄越南年，1968 年是英勇的游击队年。象古巴的很多事情一样，年份的命名是卡斯特罗加以系统化的，而不是他发明的：所以 1953 年这一年被巴蒂斯塔称为“使徒百年纪念年”（即马蒂诞生年）。

把糖扳到了生产一千万吨的排档上，这一目标，因为依靠一种早已决不稀少的商品而又大量生产的固有的不明智作法，似乎曾经愚蠢到了荒谬的程度。为了把制糖工业的能力扩大到生产一千万吨糖，就必须另行投资十亿美元，这是超过1965年制糖工业全部资产的一个数字。但是，由于严格的管制经济，很多专家都已移居国外，所以把所有精力集中于这种经过多次试验的作物显然比投入其他企业更容易成功，至少作为一个全力集中的问题来看是这样。在这方面，革命基本上是倒退的，很多古巴人一定会不期而然地问道，如果完成一种不那么彻底的社会变革，从而更容易完成经济的多种经营是否会更为有益。

尽管自1964年以来对食糖加以特别的和全面的重视，可是，收获经常低于五十年代所达到的数字，从甘蔗中所产的糖也较少。^① 这些失败，虽则部分是由于气候不好，但是，管理不善、甘蔗从田间送厂的延误，^② 初期对工业的忽视，加上破坏，机器的短缺以至劳动力的短缺等等也都不无关系。由于各式各样原因（退职也是其中之一），五十年代的专业砍蔗工已几近绝迹，而志愿工人，虽则精力旺盛，却往往不那么令人满意。1969年的收成被

① 从甘蔗中所产的糖在1969年平均为10.85%，而1958年为12.62%。1969年，卡斯特罗把12.05%的产量说成是非常例外的（1969年12月20日谈话，发表于《格拉玛报》，每周版，1969年12月28日）。

② 如果在蔗田和制糖厂之间经过长期耽延，甘蔗就会按照很容易计算的百分比，损失掉所含的蔗糖。砍下来七天后运到制糖厂的甘蔗，会比立刻运到制糖厂所含糖量损失百分之二十五。在1969—1970年的收成的第一阶段中，似乎经常发生这种情况。

卡斯特罗称之为“国家的苦痛”，总数只有四百五十万吨。但是1970年的收成要达到一千万吨的这个目标已经公布了很久，而且在宣传上又对这个目标如此强调（“你要为一千万吨作些什么贡献？”），以致几乎看上去仿佛政府能否站得住脚，就将取决于这个目标所完成的程度了。

然而，在1970年5月中旬，卡斯特罗痛苦地承认这个目标终于不能达到了，而九百万吨将是可能的最高额。但是，即使这个数字也表明真正的成就比初看上去的少，因为有很多糖都是榨自1969年留下来，或者1971年过早收割的甘蔗。不幸可以想象得到的是，这些数字都是伪造的，而且假使俄国帮同欺骗（例如，声称它曾经从古巴购买了七百万吨糖），那么就无法核对这项声明的真伪了。^① 何况，纵使完成了一千万吨，按人口计算，古巴每人所生产的糖仍然比1925年少，而这种伟大的波将金式收成^②的长期代价却是不容易估量的。

这是一个奇怪的计划：1970年的收成将于1969年7月26日（以甘蔗的小收成为开始）开始以及1969年的圣诞节前夕因忙于蔗田方面的活动而改于1970年7月庆祝，这两项消息对古巴政治生活说来，乃是最显著的超现实

① 诚然，统计数字的捏造比看上去稍稍困难一点，特别是个别制糖厂的成绩都分别予以公布，并于榨糖期间由报纸据实逐一公布。但自1964年以来，关于糖的统计数字，古巴已采取一种保密政策，以“防……革命的敌人”。

② 波将金式的收成，系套用“波将金式的村庄”的一个比喻，一般用作粉饰太平的象征。据传俄国女王叶卡特林娜二世于1787年出巡南俄时，叶卡德林诺斯拉夫总督波将金弄虚作假，建造许多布景式的村庄、拱门、花园等，以显示当地繁荣兴旺的景象。——译者

实主义的贡献之一。在这期间，来自北越的一个代表团（且不谈苏联的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和古巴内阁的全体成员都在蔗田中劳动，同时政府的宣传把这次收割说成仿佛是一次军事挑衅：“每一个工人应该象面临一次敌人进攻那样行动，应该觉得象是手持步枪守在战壕里的战士那样。”^①

1964年1月同俄国签订的一项贸易协定和1968年的国际食糖协定（自1969年1月1日起五年有效）在短期内保证了古巴的市场：俄国人同意按六美分一磅的价格承购数量逐年增加至1970年的七百万吨食糖，虽则事实上古巴多次不能履行其在易货方面的义务。^②国际食糖协定给予古巴的配额是二百一十五万吨。但是即使撇开它同俄国这样亲密的商业友谊的政治后果不谈，在一个能够生产数量日益增加的食糖的世界中，依存于食糖的长远后果却是不能令人鼓舞的，特别是在古巴制糖工业似乎还甚至不如五十年代那样有效和有竞争力的时候——更不谈前一世纪它是作为专门试验的先驱的那个时候。（1966年巴西甚至超过了古巴而成为甘蔗最大的生产国。）

但是，最近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情况，那就是糖蔗收获开始机械化。初期的困难很多，这是无可否认的。所

^① 卡斯特罗在收割重要阶段开始的讲话，1969年10月27日（《格拉玛报》每周版，1969年11月2日）。

^② 俄国同意在1965年购买二百一十万吨糖，1966年三百万吨，1967年四百万吨，1968—1969年五百万吨。中国谴责俄国迫使古巴在它的经济方面继续侧重食糖（见《人民日报》，1966年2月22日）。

以,尽管 1965 年在捷克和俄国专家的帮助下,从俄国运来零件,制造了一百部砍蔗机和剥皮机,以及大约五千部为砍蔗时起吊甘蔗用的起重机,在 1969—1970 年的甘蔗收获中大部分仍是用手砍和用手装运的。因为俄国的解放者牌机器常常损坏,一天只能操作八小时,而且要在没有露水时操作,在雨天和崎岖不平的地上就不能使用。但是,卡斯特罗在 1968 年却说,机械化将于 1975 年完成,届时革命政府将“取得它的最人道的成就之一,把适合于牲畜的劳动条件永远变成真正合乎人道的劳动条件”——这就是说,完成机械化。在随后几年中,为砍甘蔗使用了几部古巴制造的新式联合甘蔗收割机,在 1969—1970 年收获时,显然将有这些亨德森式机二百部以上可供使用(因机器的英籍美国人发明者、在革命前曾任联合果品公司普雷斯頓制糖厂总经理的罗伯特·亨德森而命名的——这对革命来说,是一个奇妙的、但无疑是一个真正的英雄)。^①

自 1962 年以来,农业、工业和劳动的结构已经完全经过改造,所以在导弹危机中受到威胁的那个依然是半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了。

1963 年 10 月,第二次土地改革把拥有一百六十七噶(五卡)以上的所有私有地全部国有化了。前次土地改革未加过问的这些大所有主据说很多人都让他们的土地荒芜,大概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只要能够按照土地改革

^① 亨德森式机是装配在(显然是在圣克拉腊装配的)从俄国进口的压路机顶端的一些砍蔗机。他们需要搞一个甘蔗采集中心,以便在那里把叶子剥掉后再把甘蔗送往制糖厂。1971 年订了大约三百台这类机器的计划。

全国委员会所订的低价出售，就没有必要生产任何东西了。但是农业的私人部分，一般说来，在完成它的生产任务方面，都比国营农场或合作社更为有效，所以，第二次土地改革法与其说是一项经济措施不如说是一项政治措施。在这些中等规模的农场主中，有许多是反对现政权的，并且都在1963年中期上了山，特别是跑到埃斯坎布拉伊山区、马坦萨斯和拉斯维利亚斯省北部的那些山上去参加各处的零星叛乱。

国营领域从而增加了一万一千个农场，结果，国营领域占有了古巴农业的三分之二强。^①虽然国家干涉的实际措施往往执行得冷酷无情，却没有发生广泛的斗争，似乎也没有听到有人死亡。所有被剥夺了的农场主，只要不是现政权的现行反对者，都按下述比率得到了补偿：没收每卡土地每月发给五美元，但总数不得超过二百五十美元，以十年为期。此外，还有一些九百亩以下的私人农场，大多是一家一户经营的田地。

但是甚至在这次土改之后，古巴仍然有十五万至二十万小农场主，约为革命前全国农场主的百分之八十。^②尽管人心惶惶，但在七十年代初，这些农场主依然存在。这些农场的大约四分之一，或四万个，是如此之小，以致它们只能为本农场的农户生产，而没有剩余可供销售。

① 第二次土地改革没收了五至十卡的农场六千零六十二个(共计六十万零八千公顷)，十至二十卡的农场三千一百零五个(共计六十一万公顷)，二十至三十卡的农场一千四百五十六个(共计五十万零八千公顷)以及三十卡以上的农场五百九十二个(共计三十七万七千公顷)。

② 根据1946年的农业调查——没有任何更新的材料——不到一百五十亩的较小农场占了古巴农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在根据未完成的第一次土地改革的条款领到所分土地的地契的三万五千户之中,包括有很多这种农场主。^① 这些农场主中,有些依然是比较富裕的。但是,所有私人农场主只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所以他们都是由国家领导的私人农场主协会的会员,只准他们种植某几种作物,而且只能把他们的产品卖给国家的食品购销部。这些农场主如果想出售他们的农场的话,也只能出售给国家,而政府显然认为久而久之,所有这些私人农场必将通过出售而落到国家手中。所以,他们自然相当忧虑,特别是在那些很可能会列入下一档一百至一百五十亩的农场主中。

小农场主对于革命政府的农业纲领还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生产了古巴水果的大部分(百分之七十),几乎全部的咖啡和烟草(百分之九十),拥有差不多半数的牲畜,并依然生产百分之二十五的甘蔗。(烟草是由大约四万个私人农场主生产的,虽则雪茄烟和卷烟的制造是受政府控制的。)如果意识形态方面的先入之见想使国家进一步干涉那些原已受到很多打击、却依然十分富有生产力的经济部门的话,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自1964年以来,农业一直是政府注意的中心,自然也得到切实的利益。全国总生产的百分之二十五是在农业方面的。^② 从俄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进口了大量拖拉机,搞了很多灌溉工程,兴建了一些肥料厂——其中

^① 根据政府在1959年答应发给十万份地契的条件,只分发了三万五千份。

^② 在1967年有三万五千台拖拉机,而1960年是九千二百台(1968年1月2日卡斯特罗的讲话)。

一个是英国西蒙—卡弗斯公司在西恩富戈斯附近建造的，价值一千四百万镑^①。为了改进牲畜质量，由英国农学家阿伯丁大学的托马斯·普雷斯頓博士领导了几个试验性的养牛项目（包括一个牲畜科学研究所），更加注意到牧草问题以及更大量地使用杀菌剂和杀虫剂。卡斯特罗本人也不断关心农业问题。大部分蔗田的国有化，虽则带来了世所周知的不利之点，却至少已经对种植和收割有可能进行全国规模的合理安排。革命政府在农业方面所进行的巨额投资，确实可以保证古巴到1975—1980年成为世界上最现代化和最繁荣的农业国之一，假使在政治方面作出明智的决定的话。特别是，古巴稻米和牛群，尤其菜牛，似乎是大有希望的。牲畜的数字现在显然已超过1959年，尽管在1959—1960年有过大量的屠宰。^②据说耕地已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③除了大麦和油脂，所有基本食物，古巴都能供应了，并且最后，国产棉布和其他纤维大概也能供应国内的被服工业。但是情况也有黑暗的一面。所以，尽管自1965年以来致力于分权，无

① 斯托克波特的西蒙—卡弗斯公司以前曾经在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建造过化学或肥料厂（参看伊恩·鲍尔的文章，《每日电讯报》，1967年2月3日）。

② 根据一项（古巴的）估计，牛为数约七百万头，大大超过1959年五百八十万的数字。目标是到了1975年要把牛的数目提高到一千二百万，而且每年约屠宰四百万头，每日产奶三千万公升（古特曼，《古巴的农业社会化》，第79页）。但是，值得怀疑的是能否达到这些指标以及卡斯特罗预测到1970年将有余粮是否正确。当可记得，自1929年以来，俄国的农业计划一项也没有完成。

③ 根据卡斯特罗1968年1月2日的讲话，1958年古巴的耕地是二百三十万公顷。在1967年，这个数字已提高百分之五十六，达到了三百七十万公顷。

效率的情况依然严重,协调、执行和监察委员会这个设计机构的设计权和职能虽则大大削弱了的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继续使地方上的经理人员不能自由行动,以致象钉子这类小商品也非向哈瓦那定购不可,虽则 1965 年以前所发生的那种情况已不复存在。卡斯特罗本人的着迷于农业和他在国内不受挑衅的地位,并非纯粹是农业行政管理人员之福。自从 1965 年以来,已经有一些特殊农场指定要由卡斯特罗亲自照顾,这些农场在设备方面一直享有绝对的优先权,不过往往是以其他农场为牺牲的。这类农场自 1968 年以来已经大大增多,以致勒内·迪蒙在 1969 年的一次长期访问之后,把古巴乡村说成是“现在分成了一批专门从事单一作物的特大企业”。这是一反 1965 年以前的情况的,在 1965 年以前,每一个人民农场都是多种经营的,种植二十五至三十五种作物。

农业工人方面也不断发生种种麻烦。所以在 1966 年不得不发动一次全国规模的运动,反对工人在国营农场上为自己保持小块土地;“甚至连国营农场之间的小径”都给私下播种了,国家的灌溉也被用到秘密的自留地和私人耕地上,而在工人住宅周围养家畜之风已经以惊人的速度开始。过去的奴隶就正是以这种方式在奴隶屯集出卖所周围开辟自己的小块奴隶自耕地。看来在阻止农业工人自助方面,到头来似乎象二十世纪的独裁国家一样,并不比十九世纪的私人资本家更为成功。究竟有多少农业时间和劳力被这样地“浪费”了,倒是无法预言的。

最后,农业生产,特别是如果想使它具有国际竞争力量的话,结果是越来越成为一种巨大的联合经济体系,而

在这个体系中，效率之取决于工业、科学和商业正不亚于取决于农场主。大多数具有竞争力量的农业国，例如丹麦或英国（自 1945 年以来），都有一大批“相辅而行的农业工人”来服务。所以，全神贯注于农业发展而不注意其所涉及的各种关系并不是真正行得通的，古巴的继续依赖俄国和东欧工业以取得它的农业企业的工具，前途是否美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工业过去为他们自己的农业服务就不是很成功的。

还有黑市的问题。早在 1963 年，据说黑市的价格为官方数字的三倍至十倍之间。政府有很长一段时期对于大批城里人在周末驱车出城，直接从农民那里购买食品的情况，视若无睹，不过，随着 1967 年初汽油实行配给，一切货币缺乏购买力，加上一切货物在店铺中真正绝迹，这类活动事实上已多少告了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以货易货的制度，例如，以帽子换小鸡，或以咖啡换一桶啤酒，虽则据报在 1969 年有人为了请客花六百美元买了一头猪。

十分清楚的是，农业将在看得见的将来，甚至永远支配着古巴的生活。卡斯特罗似乎要依靠可能出现的世界粮食缺乏来为古巴的农业增产永远取得一个市场。另一方面，卡斯特罗的政治，朝令夕改，而其他一些古巴领导人似乎仍然更加按照惯例地希望农业终于会“创造出口，以便让我们开始工业化”。^①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社会影响是相当重大的，因为古巴政府当时显然希望扭转那种成为世界各地之特征的劳动力流入城市的习惯，同时保持、甚至扩大农村人口——企图否定进步和工业化是

同义语这个因袭的真知灼见。这个不切实际的计划看来未必能获成功。

由于革命政府对全国生活的各方面,各部门,特别是对农业进行干预而产生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已经成为政府最艰巨的工作之一。这一点至少早在1963年已开始受到重视。卡斯特罗在随后十二个月的演讲中对他所创造的那部机器的钝齿充满了轻蔑之词:“我生长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大地主的领地,过去只有一、两个帐房;现在它成了一个国营农场,却要十二个办事人员”;^②“如果我们过去为资本家工作,我们一无成就,可是,现在我们是为另一种人工作,这种人并不是资本家,但是他消费很多,而什么也不生产”;^③“资本家把钱浪费在奢侈享乐方面,可是没有把钱浪费在生产中心,而是把他们的业务管理得井井有条。但是,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是不是要制止这种资本家的浪费不让其继续挥霍掉人民的劳动果实呢?如果过去那些资本家以这种方法把钱浪费掉,而我们社会主义者却以另一种方法把钱浪费掉,人民是得不到一点好处的。……一个吝啬的富人和一个大手大脚的革命者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前者使一些人穷而使自己富,而革

① 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克斯博士在1969年1月同作者的一次会见中说,“我们希望目前古巴出口的食糖百分之八十会降至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而咖啡、牛肉和矿石则占百分之七十:特别是咖啡,过去那种可笑的出口,将来应占古巴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卡斯特罗在1969年11月4日的一次讲话中也作了同样的预言,但在早一次的讲话(1969年10月27日)中,却指望甘蔗的生产到1980年再加一倍。(《格拉玛报》,1969年11月2日。)

② 菲德尔·卡斯特罗,《革命文献》,1964年9月,第23期,第9—20页。

③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马坦萨斯的讲话,《革命报》,1964年11月15日。

命者却使人人穷而不使任何人富”；^①“一个处于重要地位的挥金如土的人，等于一万个反革命所造成的损害。”^②

1966年，“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成为古巴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政府往往坚决认为官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可恶的残余而绝不是社会主义固有的过错。但是，卡斯特罗1966年12月在古巴妇女联合会的一次讲话中却抱怨，甚至“反官僚主义斗争委员会”也已经“官僚主义化”了，并且承认它们还将持续“若干年”。与此同时，银行和办公室的很多工作者都被“合理化”或解职了，并且在1967年初的一次讲话中，卡斯特罗后悔没有在1959年把首都从哈瓦那迁到圭马罗那个小城镇去。

^① 菲德尔·卡斯特罗，《革命文献》，1964年10月，第28期，第33页。

^②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马坦萨斯的讲话，《革命报》，1964年11月15日。

第三十八章

新 人

自从1962年以来，工业也经历了一次结构上的变革，因为在1968年3月，在所谓“革命攻势”期间，政府消灭了私营企业的最后残迹，毫无补偿地封闭了五万个小企业，从街头的水果小贩，到斗鸡场、当铺、音乐学校、洗衣店和汽车库。这个运动显然应该大大地归功于中国文化革命的榜样，并且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着手的。此后，除了渔民和农场主，在古巴，仅有的私营行业就是少数几个开业医生了。很多著名的酒吧间和餐馆都关了门，有些从此关门大吉，有些在当地保卫革命委员会的倡议下又零零落落地开业。事实上这些小商人已在一个朦胧的社会里生活了七年，这个社会与其说是一个经济企业，不如说是一个安全活塞，因为国家是唯一的大主顾（例如，对于机器和衣着的制造业来说）和唯一的原料供应者。早在1962年，很多商店、餐馆和食品杂货店都在没有特别命令的情况下被接管了，同年12月，大部分使用雇工的企业都国有化了。这次革命攻势被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称为“革命深入的合于逻辑的结果”，革命直到当时为止“仍然在城市中留下了大量小商人和投机者这类小资产阶级。这……对于我们想要创造的那种社会主义的人说来是一种持久的威胁。实际上，它成为反

对派的一个中心……〔给予〕不劳而获者阶级的残余以特殊利益……使这些人从而取得了社会所生产的最好的东西。”卡斯特罗在博卡德哈鲁科的一所学校开学时所作的讲话中说，私营企业基本上是不道德的，而任何一种物质刺激都有损于新人的品质。卡斯特罗把他所消灭的酒吧间老板、红肠面包摊贩和夜总会的所有人都称为“身体健全的懒汉，他们摆了一个摊头，每天挣五十美元，而目睹一辆辆满载妇女前往哈瓦那的格林贝尔特去劳动的卡车从身旁开过去”（95.1%的红肠面包摊贩，他确实极其准确地向国人保证说，是反革命或“小小的吃闲饭者”）。

在随后几个月中，卡斯特罗开始比较详尽地阐发了自由“新人”的概念，所谓自由“新人”，正如格瓦拉所希望的那样，就是不再为社会所异化的人，不再因沾染了赢利动机而有失清白，而是象阿朗^①笔下的农民一样，具有农村意识而不是腐朽的城市意识，同时又是从摇篮至坟墓为社会而生活的人。（卡斯特罗似乎首先在1967年5月全国小农协会上已经详尽地谈到这一点；他描述了将来“我们要废除那个肮脏的媒介物，货币”，然后人们将是由于习惯而劳动，而且一切东西都将很丰富，免费配给物品。）但是，甚至在1956年，他就说，“从最初阶段就必须使〔人〕抛弃物质享乐的一切自私自利的感情，例如抛弃私有财产的意识”，^②不过他一直避免参加关于劳动的物

① 疑系指法国哲学家阿朗（原名埃米尔·奥古斯特·夏尔提埃，1868—1951）。——译者

② 洛克伍德书，第126页。

质刺激的争论的任何一方，有时似乎赞成精神报酬，象格瓦拉一样，有时又赞成物质刺激，象比较因袭传统的老共产党员一样。其实，卡斯特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意见同他后来的观点矛盾之剧，并不亚于其对其他任何问题的变化；例如，在1965年夏，即在格瓦拉从古巴政治舞台上消失的那一年，人们听到他在一次砍蔗工大会上说，“我们不能选择唯心主义的方法，以为所有的人都会受义务的支配，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是这样的……如果希望只要告诉那些以砍甘蔗为生的广大工人群众说，这是他们的义务，不管挣多挣少，他们就会作出最大的努力，那是荒谬的。那会是唯心主义的。”^①

总之，在六十年代后期，古巴采取了早已为东欧所抛弃的一种工业态度。取消了加班费，也取消了“社会主义竞赛”。社会主义竞赛这种计划，就象在苏联一样，工人多劳动可以领到额外工资，不能完成指标则受到处罚。（在1962和1967年间，这个计划曾以各种形式加以使用；其废除无疑使大家如释重负，因为一些获得头奖的工人显得使人十分为难，即喜欢物质利益——一个电冰箱或一辆机器脚踏车——而不喜欢去俄国休假。）^② 斯达汉诺夫式的全国劳动英雄也取消了，因为发觉这种做法造

^① 菲德尔·卡斯特罗讲话，《世界报》，1965年7月25日。

^② 1962年4月举行了第一次“社会主义竞赛节”，并且在该年晚些时候有四十五幢奖品房屋分配给了第一批优胜者——还顺便把十四幢分给战士。1965年，发了奖品一千五百个电冰箱和一百部机器脚踏车，五百人可以去俄国和东欧旅行，二千人在巴拉德罗海滩渡假，但是去俄国旅行的只有八十人。1966年，在奖品中有一百辆私人小轿车。同时，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革命方针委员会”书记塞萨尔·埃斯卡兰特曾经抱怨说，“实际参加竞赛的工人寥寥无几……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参加竞赛大会，兄弟般的竞赛还不为群众所理解”（《今日报》，1964年10月18日）。

成了嫉妒而不是羡慕。(这里也有可疑之处：1964年的全国劳动英雄拉斐尔·奎瓦斯真的在四小时之内砌了二千一百九十块砖吗？1963年的全国劳动英雄雷纳尔多·卡斯特罗真的每天平均砍一千二百八十阿罗瓦的甘蔗吗(这个数字倒的确是1959年以前的砍蔗工每日平均数的一百五十阿罗瓦所不能比拟的)？

卡斯特罗自1968年以来试图开始“共产主义和更共产主义”，以代替这类丢脸的方法。他反复地说，他希望最后完全废除货币，并且确实到了1969年，已经有几种东西，诸如运动、电影和本埠电话，都通行了一种“共产主义的方式”，也就是说，免费了。政府的报纸《格拉玛报》上有一篇文章把这个问题谈得很清楚：“因为我们贫穷，所以我们学会问一问，‘你得到了多少？你值多少？’现在我们知道，在古巴，货币已是多余的了，那个‘钱’字的意义不大了。新一代人并不相信有关货币的一切旧神话。”而且，志愿劳动和志愿加班加点已经越来越成为政府对劳动问题的典型解决办法，虽则这在经济上说来，很难对价值或成本作出正确的估计。卡斯特罗就这样试图从上而下地把古巴建成一个所谓巨大的集体农场，而同时又在追求1969—1970年蔗糖特大收成的指标。

毫无疑问，这种新政策在某些方面是设法把(实则已成功地)非作不可的事情当作应该做的事情，为经济上的困难寻求一个哲学上的理由。如果没有东西可买，货币形式的物质刺激毕竟也是毫无意义的。另一方面，这种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完成共产主义阶段的企图，是要使古巴有别于东欧和俄国那种比较惬意的政体(这些地方

对于被卡斯特罗嘲笑为“满橱窗的哲学”的反应至少是温和的)，这个企图同卡斯特罗本人性格中，也是古巴社会性质中那种清教徒式的、无政府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倾向是一致的。古巴社会在过去对于货币已经了解得非常之多，而且比已经存在的那些过去大体是农业的共产主义国家了解得更多。

精神刺激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1969年9月，制糖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三分之一，主要是为了防止有经验的工人从这项工业中外流。^①工人有计划的缺工现象依然很多——古巴工人唯一的有效抗议和偶尔的怠工——而当时的总书记米格尔·马丁在1967年称之为一种“不守纪律、不负责任和一知不解的不争气情况”（工人态度的特征）是否真正有了很大改变，^②以及尽管有青年岛这种试验（一个无货币的社会比在那里取得了更大的进展），这些政策是否真正把古巴工人带到，譬如说，比杜布切克或者铁托那种较宽容的政策更加接近于理想的共产主义，都是不无可疑的。马克思所规定的共产主义究竟能够在“既不要自由主义又不要软绵绵”的气氛中取得胜利

① 1969年6月6日劳动部长赫尔豪·里斯克特的讲话。他补充说，一个工人，甚至一个“有完全革命世界观的”工人，关心家庭收支，是“合乎逻辑的”。

② 《波希米亚》杂志（1969年9月12日）发表了一篇卡马圭一个铁路工场劳动纠纷的调查报告。报告表明，在1969年4月，在一千六百人中曾经响应无偿砍甘蔗号召的，只有五人，每一个工人的志愿加班加点还不足半小时，而由于工人有计划的缺工所受的损失达四千六百一十一个工作日。

吗？^① 国家的消失不也是一种必然吗？^② 而且尽管有很多古巴人经过了四个世纪的贪污腐化之后，从货币经济的黑暗面中所意识到的这种可以理解的激变，是否已剧烈到使得全体古巴人作出了与其余人类截然不同的反应呢？简直不能相信，或者甚至不能认为利奥·休伯曼和保罗·斯威齐所称的古巴的“非机动车化”是很受欢迎的。^③ 社会必须把好人和坏人同样考虑在内。如果一个完人原来不过是一种悲剧式的幻想，那又将如何呢？要不是卡斯特罗具有以其最引人入胜的解释来表达这些概念的独特的技巧，的确很难相信这些概念会持续久长的。

自 1964 年以来，古巴的越来越侧重糖业，意味着这里几乎没有任何新的工业化。另一方面，倒是认真地集中精力于各式各样的现存企业，特别是镍，在这方面，位于世界上镍蕴藏量最大者之一的奥连特省北海岸的莫亚和尼卡罗两处的两个美国旧厂，一直是突飞猛进，生产大大超过了五十年代。^④ 镍现在已经超过烟草，仅次于蔗糖而成为古巴的第二最有价值的出口品。

巴蒂斯塔政权在五十年代是由于军队同具有高度组

① 卡斯特罗讲话，1968 年 9 月 28 日。

② 在 1969 年 1 月 13 日的一次会见中，我提醒罗德里格斯博士说，马克思曾经认为，在国家消失以前（当时在古巴几乎没有这种可能性），不可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他大声回答说：“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性质写得很少。”

③ 斯威齐和休伯曼：《古巴的社会主义》，第 95 页。凡是看到过仍然开着车去寻找这些珍贵财物的那些古巴人的，都会对此表示怀疑。

④ 1967 年镍的产量达到了三千五百万吨，而在 1958 年是一千八百万吨。

织的、强有力的工会结成联盟才支撑下来的。后来这两者都腐化了，而且工会还是妨碍生产效率的，阻碍工农业——特别是制糖工业——的现代化。

由于革命政府把工会基本上变成为国家的一个部门，已经把贪污腐化、把过去妨碍变革(变革是这个制度的特征)的事物都一并摧毁掉。所以一批没有收益的糖厂都被废弃了，并且，正如上文所述，沿着五十年代洛博徒劳地提倡的那个路线开始了机械化和蔗糖收成的合理设计(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是由革命政府的糖业总局局长，即过去洛博的总经理托马斯·马丁内斯予以实现的)。甘蔗作物在港口上的大量处理，随着码头工人旧工会的结束也已经成为可能的了。毫无疑问，把这些活动看成是革命的利益，有些人是有所迟疑的，但事实却是如此，尽管它们事实上给某些颇有基础的工人阶级社会带来了麻烦以至于不幸。

但是，关于革命政权下的古巴工人和工业实况，别无任何非常富有想象力的事物。没有什么工人管理。例如，一个糖厂是由国家指派的一个行政人员经营管理的，象过去一样以化学家和专家为顾问——往往就是在1959年以前担任这种工作的那些人，他们为了各式各样的理由(有些出自理想主义的，有些出自私人的原因)而继续留在古巴。甘蔗是由原来为洛博或戈麦斯·梅纳干过活儿的那些人砍割和运送的——加上志愿的工人大军，这批大军的的活动也许在意图上与其说是经济性质的，不如说是教育性质或政治性质的。除了进行有计划的缺工、怠工或流亡，别无任何抗议的机会，除了甚至在最肮脏的墙

壁上出现有要求发挥爱国主义精神的标语，工厂生活并不比原来所想象的有多大的变革，并且迟至1969年，劳动部长里斯克特还在说，工人在收割期和收割后的收入上，仍然有“显著的差别”。^①

1966年，工会减到了十四个，并实行了1961年以来闻所未闻的自由选举，现在工会主要是组织方法的问题了。1963年9月，旧铁路土方工人似乎曾对现政权进行了一次挑衅，但是遭到了猛烈的镇压。^②1968年6月间，工人联合会的总书记米格尔·马丁（已经继拉萨罗·培尼亚这位创立人担任了这个职务）在卡马圭的一次地区性大会上作了世所共知的解释：因为“工人阶级掌了权”，所以政府所规定的一般集体利益就是“一切判断的标准”。这时在工会领袖中可以看到一些新面孔，但其中没有一个是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物，而且他们的选举方式确实是排除了“先进工人”或“模范工人”以外的任何人。自1969年8月起，每一个古巴工人都有一个“检查卡”和一本“劳动记事簿”，一切缺工和其他缺点都记录在簿子上。

自六十年代初以来，古巴的经济规划一直没有有什么大变动。中央计划委员会，这个俄国国家计划委员会

① 1969年6月6日的讲话。他补充说，在淡季，有些工人仍然到制糖工业以外的地方去找职业，一旦找到，就不会回去了。

② 根据流亡者方面的消息，在1963年9月11日装备工会（铁路土方工人联合会的组成部分）的大会上通过了决议，要求因修理装备（常常发生）而停工时发给全工资，在机器损坏期间重新派给普通劳动时照发重装备工的正规计时工资，并在报纸上公布一项列举工会要求的宣言。革命古巴工人中央工会总书记拉萨罗·培尼亚试图在大会上讲话，但是他的声音被“我们吃不饱！我们要自由！我们要工作！”的呼喊声淹没了。这次抗议的领导人后来受到惩罚。（保罗·贝瑟尔：《共产主义古巴的恐怖和抵抗》，第41页。）

的古巴翻版,尽管有些改革,却象地方委员会那样,成立于1961年的协调、执行和监察委员会大体上相当于俄国的地区经济委员会。在工业方面,凡生产相同品种的工厂都归属于一个单一的联合企业或公司,而在农业方面,国营农场则按地区分隶于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之下。国内贸易由国内贸易部管理,对外贸易则由对外贸易部管理。方法自然象经济计划一样,同俄国的办法极其相似;古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缩短为四年计划,以便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同时结束。在古巴,中央计划委员会拟订全国计划,然后征询各部、各联合企业、最后各农场和工厂的意见,在农场和工厂召开生产会议,并且在理论上,工人可以建议修改。计划然后循由原路层层上报到中央计划委员会,交由各部长批准,之后再以具体工厂具体指标的形式通过生产渠道下达原单位。征询意见的过程只是一种幻影;对于工人来说,一位对革命相当同情的记者写道,这整个过程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抽象概念”;他们“毫无讨论计划的兴趣”。1968年11月间,革命古巴工人中央工会的新总书记埃克托尔·拉莫斯·拉图尔^①吹嘘有一百万工人在一个“劳动大众的国会中”讨论一部新的社会安全法,但是结果是否提出过一项修正案,他却没有任何消息。

古巴革命政府,象所有社会主义政府一样,在建立标准方面也一再发生困难。例如,在若干年前,据说“模范制度”的建立已经把地方工会工作中的缺点暴露出来,地方

^① 1968年11月他继米格尔·马丁任总书记。

工会在面临任何改变旧工作习惯、资本主义残余的改组计划时，都不理解生产和障碍的重要性。在古巴，工资是按照技术支付的，结果在四个职业部门的八个不同等级之间仍然存在有相当大的差距，^① 虽则关于这个问题的消息一直是保密的。最低的工资是每月八十五美元，最高的工资是四百五十美元。养老金每月六十美元。这些章程是以俄国所实施的办法为借鉴的，但是工资最高的专家和工资最低的产业工人之间比率比俄国还要高，^② 同时古巴的主要专家，象共产主义世界其他各处一样，享有一切便利，诸如免费小轿车、特殊饮食和旅行。

为那些认为在现行劳动组织的制度下对他们所提的要求有所过分的人，设有“劳动裁判所”。这种裁判所处理诸如未能完成预定计划、有计划的缺工、损害国家机器和玩忽职务之类的问题，并加以各式各样的惩罚，包括减工资、调工作地点、解雇以及押送强迫劳动营等在内；在1962年押往古巴西部瓜纳阿卡比贝斯劳动营的三十二种理由之中，有造成“生产停顿和妨碍产量标准的玩忽职务等”。

除了1963年建筑工人进行抗议这种个别事件，还找不到工人对革命政权抱敌对态度的公开材料。在1962年，有很多工人对社会学家蔡特林说，他们认为他们比1959年以前对政府有更多的影响力，同时大多数工人认为没有举行任何选举的必要。显而易见，大多数工人认为国有化意味着他们现在是自己劳动，而不是为老板劳

① 农业工人、机关干部、产业工人、专家和行政官员。

② 1968年的比率，在古巴是1比11，而俄国是1比6.8。

动。^① 熟练工人似乎比非熟练工人更能支持革命。另一方面，从来没有做过认真的调查。谁也不了解，例如，埃斯卡兰特和老共产党人在1968年获得了多大程度的支持。

无法准确地说出自革命以来古巴经济的低生产力在多少程度上是由于工资菲薄，又在多少程度上是由于管理不善、缺乏零件、专家离职、美国封锁和社会服务开支过度等等的结果。但是，显而易见，除了在象特别是制糖业这些比较重要的经济部门不能提高生产以外，物质刺激加上精神刺激也一直未能提高产品的质量。在革命初期，胶不会干，火柴断头，牙膏在两三个月后就变成硬块。关于“质量”问题开过了多次会议，但在1969年，多尔蒂科斯总统仍然把这个问题说成是“惊人的”。1969年作过一次草率的调查（因为重要的货物在商店中几乎全部没有，以致调查有困难），表明这种情况确乎没有多大改变，每一工作日的生产能力虽然比1963—1964年大些，但大概仍比革命以前低。

因为缺乏统计数字以及现有统计数字不可靠，自然难以谈论1960至1970年间古巴的总生产数字。但是1959和1961年之间全国总生产似乎可能有所提高，在1961和1963年之间至多不过是停滞不前，因为自1963年以来每年平均至少下降达0.5%。根据政府的统计数字，政府不能保证公民平均每日工作四个小时以上，而生

^① 蔡特林：《革命的政治》，第38, 260页。在第一个问题上的数字是170：8，有七个人认为他们同1959年以前一样的有影响力，有七个人没有意见；蔡特林这种采样法是有问题的。

产的下降却不是很大,这也许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第三十九章

监 护 人

如果说古巴社会迄今仍远不是格瓦拉以及目前卡斯特罗所妄想的那种乌托邦社会，那么，为了建立乌托邦而创立的政治机器已经精心构筑起来了。诚然，卡斯特罗本人依然被奇妙地称为“最高领袖”、总理、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武装部队总司令、土地改革委员会主席。显而易见，他作出了一切决定，对他所实施的、认为正确的政策不断加以强调和解释，并且不断地利用电视、报纸和无线电，以及在大大小小的群众场合亲自出头露面来支持政府和为之辩护，同时支持他的追随者的热情，这一切都比在巩固革命力量的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1962年以来的主要政治变化就是一些原来的共产党领袖销声匿迹了，原来这些共产党领袖因为他们在政治组织和世界共产主义舞台上的多年经验，在1960和1961年间对于奠定古巴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卡斯特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仍然存在的成员都在当权，虽则他们已正式自称为共产党员。按照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和老共产党的条件同它们合并的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的统一革命组织，在1963年间没有任何仪式就消失了，继之而成立的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也没有举行任何成立典礼就出现了。这个运动随即被

俄国共产党承认为“兄弟党”，但是，在1965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却让位给一个新的“古巴共产党”了。

古巴共产党，仍然象共产主义国家的情况一样，由一个中央委员会管理，在中央委员会上面设有一个政治局和一个书记处。中央委员会共有一百人，其中虽有少数被开除和死亡，直至六十年代末，大体没有变动。^①在这一百人中，有六十八人是正式的军人，虽则其中有些人在马埃斯特腊山或其他各地所起的真正军事方面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②（新共产党各省的委员会也是自始就充满了军人。）在一百人中有二十一人显然是1959年以前旧古巴共产党的党员，从多年为党服务、已渐衰老的人（诸如法维奥·格罗瓦特、布拉斯·罗加和胡安·马里内略）到比较年轻的、是卡斯特罗在大学中的同时代人（诸如弗拉维奥·布拉沃和莱昂内尔·索托）等。^③然而，在政治局或书记处却没有一个老共产党员。^④书记处在卡斯特罗两兄弟和自从反对巴蒂斯塔的斗争最初时起就是他们的追随者的支配之下。^⑤革命政府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负责人是前天主教徒、前教育部长，野心胜于才智的那位阿曼

① 埃菲赫尼奥·阿梅赫拉斯、阿曼多·阿科斯塔、拉蒙·卡尔西内斯和何塞·马塔尔分别在1966、1967、1968和1969年被开除。1965年中央委员会的三个成员于1967年在玻利维亚和格瓦拉一起被杀害——这三个人是胡安·比塔略·阿库尼亚少校、安东尼奥·桑切斯·迪亚斯和埃利塞奥·雷耶斯上尉。

② 所以在大学中同卡斯特罗同辈的一位老共产党员弗拉维奥·布拉沃少校就没有听说打过多少仗；而马尔塞洛·费尔南多斯同志和阿曼多·阿特同志所打的仗也许同福斯蒂诺·佩雷斯少校不相上下。中央委员会的军人在形式上包括有五十八名少校，九名上尉和一名中尉，少校仍然是古巴最高的军阶。

多·阿特。这意味着这个政府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负责人是牢牢地处于卡斯特罗两兄弟的控制之下的。虽然中央委员会及其各机构只有十个人曾经参加过攻打蒙卡达兵

③ 这同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二十四人全国委员会那种具有旧共产党的代表性大不相同。在那个委员会里，有旧共产党员十一人，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十二人，革命指导委员会一人。旧党员在1965年是布拉斯·罗加，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阿曼多·阿科斯塔，塞维罗·阿基雷，弗拉维奥·布拉沃，拉蒙·卡尔西内斯，霍埃尔·多梅内奇，法维奥·格罗瓦特，塞昆迪诺·格拉，曼努埃尔·卢萨尔多，伊西多罗·马尔米尔加，胡安·马里内略，米格尔·马丁，何塞·马塔尔·弗兰耶，阿纳尔多·米利安，拉萨罗·培尼亚，何塞·拉米雷斯，乌西尼奥·罗哈斯，克莱门蒂纳·塞拉和莱昂内尔·索托。布拉斯·罗加是古巴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席，但是关于宪法起草计划却毫无所闻，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虽然不再是土地改革委员会的主席(他自1962至1964年担任的一个职位)却一直留在中央委员会的经济委员会，并且因为常常作为政府在古巴国内外的发言人，所以在政策制订上比其他任何老共产党员都发挥更大影响——其影响可能有时比卡斯特罗以外的任何人都更大(他似乎同卡斯特罗的关系极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蒂斯塔内阁的一个前阁员来说，这是一个异常的经历。

④ 或许值得补充一句的是，在1960年最后一次独立的代表大会上选出的共产党主席团中，除去三个人之外全部都是1965年中央委员会或其分支机构的委员(那三个人是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现已贬黜的华金·奥尔多基和现已身故的塞萨尔·埃斯卡兰特)。在1960年选出的全国委员会的六个成员中有两个在1965年也获有一席之地(阿纳尔多·米利安和费利佩·托雷斯，而不是拉迪斯劳和何塞·路易斯·冈萨雷斯·卡瓦哈尔，莱昂尼德斯·卡尔德里奥和西尔维奥·金塔纳)，此外，还有一个1960年的青年领袖——后来成为新党报《格拉玛报》首席编辑的伊西多罗·马尔梅尔加。

⑤ 所以在构成政治局和秘书处的八个成员中，有四个是既参加过攻打蒙卡达也曾在“格拉玛号”上(卡斯特罗两兄弟、拉米罗·巴尔德斯和胡安·阿尔梅达)。阿曼多·阿特从早期起就是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一个杰出的组织者，吉列尔莫·加西亚是在山区“投靠卡斯特罗的第一个农民”(人们会怀疑他在1965年以这样高的政治身份出现是否尊崇过当，尽管他负有军事责任)。陆军参谋长、后来的内政部长塞尔希奥·德巴列在1957年继格拉拉任首席医生。第八个成员是共和国的总统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他在反巴蒂斯塔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营或在“格拉玛号”上，^①只有四个人似乎是前革命指导委员会的成员，^②但多数是军人，所以整个委员会的大多数都是在马埃斯特腊山起过这样或那样的作用的。

革命政府一直设法不问所有这些差异，往往依靠甚至更加新进的人员：也许那些参加教师训练的1958年的前店员、办事员和工厂工人在几个月内就被发现是“有才干的，生气勃勃的和革命的”人物，于是在1961年就成为制糖厂的领导人——这是在旧社会中缺乏机会的一个生动的见证。这些现行制度的机会主义者以下述的一些人为代表：在1969年分别负责国家报刊《格拉玛报》和宣传群众的豪尔赫·恩里克·门多萨上尉和豪尔赫·塞尔格拉少校；反间谍活动的头头皮涅罗少校、民兵第一司令阿塞维多少校和统一青年运动的第一司令员伊格莱西亚斯少校。同样饶有兴味的是，象1959年的陆军情报局局长雷内·德洛斯圣托斯这些人竟然一直依附于现政府，并且被曼努埃尔·阿尔蒂梅称作“非共产党员，但无可指责”的人物，可是他一直留在古巴，成为1965年新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创始委员。

在这些人中，大多往往是勇敢的、精力充沛和有献身

① 卡斯特罗两兄弟，阿尔梅达，拉米罗·巴尔德斯，卡利斯托·加西亚和赫苏斯·蒙塔内都是既参加攻打蒙卡达也曾在“格拉玛号”上的。此外，佩德罗·米雷特和艾德·桑塔马利亚参加了前者，但未曾参加后者，而埃菲赫尼奥·阿梅赫拉斯和福斯蒂诺·佩雷斯则曾在“格拉玛号”上，而未曾参加过攻打蒙卡达。

② 乔蒙，何塞·阿夫兰特斯，胡利奥·加西亚·奥利维拉和何塞·纳兰霍。

精神的人，他们在六十年代末仍然不过三十多岁，所以如果没有发生一次反革命，是可以指望能再当权许多年的。撇开老共产党员不谈，1965年中央委员会的平均年龄不过三十六岁。另一方面，在下面较低各级上，革命政府得到了古巴左翼政治上其他几个时代的重要残存者很多帮助；这些残存者一方面是来自四十年代后期的政治帮会时代，^①另一方面是来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大学中老一代的左翼人物。诚然，在过去的这些大学生中，有很多人甚至到1944年还决不是急进的，正如在格劳·圣马丁博士的政府中所表明的那样。但是其他一些人，诸如在他们青年时代曾经附和过左翼大学生运动的那些人，至少名义上一直是急进的，并且可以指望他们支持六十年代的革命行动，然而，这种革命行动虽是他们久已提倡，却也许从来没有想过（或者也许结果并不希望）革命行动会真正发生。

总之，卡斯特罗一直能出色地把一群各不相同的英雄好汉使用于革命的民族主义上，其中不但有改良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而且还有“总是作为每一次革命或反革命的先驱的社会流浪者”。在六十年代后期作为官僚主义者而工作的很多人，历经在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种种不同的政治活动，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智的或感情的安息所。卡斯特罗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出色地利用

^① 例如1948年在孔菲特斯岛同卡斯特罗一起的那些人中，卡洛斯·弗朗基长期担任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机关报《革命报》的编辑（而后来知道是一直在给卡斯特罗写“回忆录”）；爱德华多·科罗纳和恩里克·罗德里格斯·洛埃切斯一直任大使；费利西亚诺·马德内任最高法院代理法官。

了古巴炽热的形势，并在几“代”理想主义的、失意的和想从事暴力活动的人们中开创一个单一的运动。（一旦革命政府稳掌政权，这种情况也许有它的掣肘之处，因为勇敢的青年人并非总能成为优良的管理人员；所以1963年卡斯特罗抱怨说，可以作外交官的候选人有三千名，而可以作农学家的只有一百人）。但是，一位自由主义的历史家一定会以一种宽慰的心情注意到，在象达戈维托·庞塞或蒂尔索·马丁内斯这些要对破坏自由报刊负责的人，在象罗兰多·库维拉或奥马尔·费尔南德斯这些要对瓦解大学负责的人，或在象何塞·玛丽亚·阿吉莱拉或奥塔维奥·洛伊特这些要对把工会变为政府的一个部门负责的人中，没有一个在他们出了不少力所建立起来的这个政权下，作出过特别优良的成绩来。

在1969年，古巴共产党约有党员七万人，这个数量在共产主义国家中按人口比例来说是最小的。^①选择党员的手续是颇为别出心裁的：在统一革命组织的一次清洗（并将参加过1958年选举的那些老共产党员开除）之后，统一革命组织的中央委员会指派了几个选拔新党员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对所有工作单位加以分析，并布置选拔某些“模范工人”为党员的事宜，然后让这些模范工人出席工人全体大会。在1962和1965年间，为原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设计的这个方法，此后似乎也一直为共产党所实行。大多数党员参加了1961年成立的革命教育学校之一，以确保这些革命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① 在1951年，据说当时的共产党有党员五万人。

原理（虽则这些学校在1968年关闭了）。古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尽管卡斯特罗声称将在1966、1967等年召开，却都被无限期地延搁了。在中央各部选拔党员方面也有过度的耽延。

在组织国民和鼓励公众方面，其重要性同党不相上下的是作为左右手的“保卫革命委员会”。因为每一个街道有一个，又是人人都可参加的，所以，在名义上有三百多万会员（在包括儿童在内的古巴大约八百万总人口中）按等级组织了起来（中央委员会设于哈瓦那），就不足为奇了，这不仅便于保持警惕和私查暗访，也便于把教育、医务或其他运动在全国实施，并举办正规“革命教育”学习班。保卫革命委员会告发有嫌疑的反革命分子，登记申请离国者的财产，组织自庆祝节日至下乡劳动的志愿人员等一切事宜，并为公共利益而对一切私生活进行干涉——以确保“生活的公开”，如同何塞·伊格莱西亚斯在他对奥连特省马亚里城的生活作抱同情态度的研究中所说的那样。^① 委员会成立的周年纪念日，1960年9月28日，是重要的革命节日之一，在革命广场举行跳舞、诗歌朗诵、选美女和有卡斯特罗出席演讲的群众集会等活动。既然保卫革命委员会是按地区组织起来的，所以它是很多不在工厂或农庄劳动的人的“革命活动”中心，因此

^① 何塞·伊格莱西亚斯：《在革命的掌握中》，第274—307页。现在已经停刊的理论杂志《社会主义古巴》把保卫革命委员会称作“集体的革命保安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每一个人都知道每一个人是谁，各个人在各个街区里作什么，他同暴政有什么关系……他会见了谁……”引自蔡特林书，第100页。

在它们的会员中，妇女占了很高的百分比，在1969年9月间发动了社会革新阵线，作为它们的运动之一，其明显的目的是“肃清一切有害于社会制度的行为”。这些委员会是新古巴社会的真正核心，它们在过去是那样奇妙的一个个人奋斗和个人受苦的混合物的国家中建立了一种宣传、参与国事、服从和劳动的新文化。但是参与国事的确切措施是微乎其微的，至于例如城市设计或经济政策的一切重要问题都是在政府结构的最上层而不是在基层决定的。

党、保卫革命委员会、当然还有武装部队共同管理国家。此外，古巴还有二百九十四个市参议会多少有点出人意料地残存下来，但是它们的权力微小，而且这些机构的候选人必须履行党的条件，同时由党指派议长。为了力图活跃地方生活并避免出现最荒唐的官僚主义，在1967—1968年，“地方政府代表”是由群众大会大张旗鼓地选举出来的，但是在取得胜利的那些人中，“可靠的革命者”再次占支配地位，而且在很多方面，他们的盘查隐私的主要活动同保卫革命委员会的活动是相互重叠的。

武装部队，总数二十万人，^①强制服役期限（自1964年3月1日起）两年半至三年，经费二亿五千九百万元——为拉丁美洲最最大的军事事业。古巴人有坦克三百辆、战斗机一百六十五架、地对空导弹装置二十四台。大

^① 各个兵种共计：陆军十七万五千人；海军七千人；空军一万二千人。后备军共计八万五千人。兵役可以延长到三年以上，为了农业任务的需要，甚至可以更长。

多数正规战士，包括军官在内，都是1959年以来招募的，因为他们之中有很多人从前是流氓无产阶级中的失业者、擦鞋工或轿车冲洗工，所以他们的一切都是得自于革命。除了1967年某些未被指名的高级军官被认为是易于受到“中国宣传”的影响这个不寻常的时机外，他们的忠诚似乎一直是绝对的。在最高级的司令官中，有很多人在1958年都曾经在克里斯塔尔山中在劳尔·卡斯特罗手下服务过，而劳尔·卡斯特罗则始终担任国防部长（虽则他因为去俄国曾一度离职几个月）。应该补充一句，武装部队在各方面都是现政权的柱石，因为他们把很多时间用于农业工作上，而政府只要付出七美元的军饷，而不必按国家工资发给工薪。在1969—1970年，武装部队“为了糖作物的收割被象在发生战争情况那样地动员起来”，投入的部队约八万人，估计担当了整个收割工作百分之十八。^①

革命古巴的司法是政府体系中的一部分，如同其他共产党国家一样。这就是说，对于一般轻重罪行，法律的执行是适当的，比较敏捷的，也没有贪污受贿的现象，虽然往往不免出现蛮横或专断的情况。处理政治犯案件没有什么法律条文。自1959年以来，人身保护法就一直不存在，可以（而且事实上也确是）把人拘留讯问达几个星期之久，或无限期地拘留下去而不开庭审判。对于这些弊端是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进行控诉以至设法引起注意的。

^① 卡斯特罗，1969年11月4日的讲话（《格拉玛报》，1969年11月16日）。

在诸如 1959 年马托斯、1964 年马科斯·阿曼多·罗德里格斯和 1968 年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及其友人的这些重大的政治审判中，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其他一些革命领导人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卡斯特罗既是证人和法官，又是起诉人。^① 检察官圣蒂亚哥·库瓦博士在 1961—1962 年开庭时所作的演讲，以批判“关于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及政治上中立这些由来已久的论题”而定下了调子。政治审判一直都是以有违常规的程序为特征的；这种情况开始于 1959 年 3 月间审判巴蒂斯塔分子阴谋案和同年 6 月间“特鲁希略同谋者”案的审判期间（审判时是如此的喧嚣，以致根本听不见辩护）。在对罗德里格斯的审判中，只是以被告的口供来证明有罪；而在埃斯卡兰特案件中，被告只是因亲俄的政治态度而被判有罪，这虽则对卡斯特罗是有所不便的，而在一年左右以前事实上却是政府的政策。关于对反革命活动和间谍行为的那些被告的其他审判，也同样是不公平的。有些审判无可避免地会发生于频临战争的情况下。但是，这种事实或被告的往往有罪都不能作为这类审判出现肆行侮辱的借口。在早期，辩护律师和证人本人都遭到了逮捕。后来，辩护律师一直是由政府指派，而辩护证人则不提供证词。

在较低级和非政治性审判中，为判定被告有罪或无罪，似乎作出了相当认真的努力，但是在下判决时，倚重

^① 劳尔·卡斯特罗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关于埃斯卡兰特案件的讲话，事实上是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上发表的，而这些讲话实际上都是等于判决。

倚轻似乎要看案犯的“革命品质”而定。在一些小案件中，显然没有什么准则，特别是在人民法庭中，所谓人民法庭，即在晚间为处理口角、无关重要的劳工纠纷和公共秩序问题而召开的简易法庭。为供在1968年年底为数达三百六十六个这类简易法庭之用，法官只受为期十天的司法训练；他们只要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受过小学六年级的教育就可以了。这就是英国治安法官在古巴革命政府的翻版。这些法官——三人一起出庭——有权判处五百美元的罚款、六个月的监禁、软禁在家里或扣留于“改造农场”。¹比较严重的犯罪则象过去一样由法院处理。在1968—1969年，有一次犯罪高潮，显然是1968年3月间“革命攻势”的结果：在1969年春季，进行了很多示范性的判决。马埃斯特腊山的前医官和1958年时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的副司令、曾任内政部长的塞尔蒂奥·德尔巴列解释说，对财产的犯罪近来已有增多（在1958年以来大大降低以后），对各式各样的犯罪使用死刑将是可取的，对于屡教不悛的罪犯应予“无情地肃清”。（在1962年对抢劫行为罪偶然判处死刑。）^①他对于哈瓦那半数以上的谋杀案竟然是各宗教（特别是非洲—古巴教）团体的成员干出来的这一点，特别感到惊骇。但是整个说来，自革命前起，犯罪率已经减少一半，虽则仍然是英国犯罪率的

^① 1969年5月5日公安部副部长佩德罗·普波·佩雷斯中尉在全国电视网第六波道上的讲话。死刑也曾经用于强奸幼女和犯试图破坏收成的罪犯。

四倍。^①实际上已没有酗酒行为，卖淫也很少。

在革命政权下被杀和被监禁的人数无法作出适当估计：卡斯特罗本人在1965年承认有政治犯二万人，^②一个悲观主义者很会怀疑数字更接近于流亡者所提出的四万之数，如果把强制劳动或“改造”营中那些人计算在内的话。被革命政权执行枪决的总数到1961年初或许已达二千，到1970年恐怕已达五千。^③但是谁能摸得准这方面的数字呢？而且坐过牢的人对于在审讯期间或在拉卡瓦尼亚、普林西佩或（直到1965年）松树岛上的古巴政治监狱中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情况所作的记述真是不胜枚举。诚然，大多数残忍行为要回溯到1960—1961年，当时天天都有入侵的可能，但是，任何一个贤明的政府，甚至在任何挑衅之下，也不会对它的反对者作出如此恶毒的行为来。其他一些极权国家的历史表明，如果没有安全措施，也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是，事实上，内政部那些恶

① 1960年，犯罪案十九万八千一百零七件；1968年，九万六千六百九十三件；1960年，谋杀案二百三十件；在1967年八十八件——或每十万居民1.14件。这仍然是英国谋杀率的四倍和英国犯罪率的四倍。

② 同李·洛克伍德的谈话，洛克伍德书，第205页。当时卡斯特罗说，这些罪犯“至少有一半”是置于某种形式的改造计划中。

③ 1963年古巴的流亡者报纸《古巴消息》以令人不相信的准确性估计说，经由革命法庭命令执行死刑的已有二千八百七十五人，未经审讯而执行死刑的四千二百四十五人，与卡斯特罗部队作战而死的二千九百六十二人，失踪的六百十三人（《古巴消息》，1963年6月1日）。后来一位有机会接触到公墓统计数字的西班牙驻哈瓦那的外交官所作的估计是，在监狱中被杀或死亡的二万二千人；企图逃跑而溺毙的二千人；目前在集中营的古巴人二万四千，在监狱中七千，服刑于农场的七千二百，由保安警察拘留的一万七千二百三十一人（！）。（海梅·卡尔德维利亚，西班牙驻哈瓦那情报官，据《每日电讯报》，1969年4月28日的报道。）

毒的工作人员，却生活得象功成名就的斗牛士一样，身着丝绸，宅第堂皇，表明他们并不比本图拉上校或皮拉尔·加西亚有任何改进，而在监狱中，那张长长的政治犯名单是以乌维特·马托斯，戴维·萨尔瓦多，阿尔维托·缪勒，佩德罗·路易斯·博伊特尔，古斯塔沃·阿尔科斯和卡洛斯·阿尔莫伊纳所有这些早期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成员为首的，而关于这些人的情况则一点也不清楚。

几年来，革命政权最可恶的创举也许就是通称为军管生产辅助单位的改造营了。这些改造营是为了收容大量的公务员、同性恋爱者、过去的资产阶级分子或潜在的而不是公开的政府反对者而建立起来的。很多被怀疑在哈瓦那过温柔乡生活的官吏都被送到改造营，保卫革命委员会也把不热情的革命者送到那里去。他们在监狱的条件下往往干了很多个月的农活。这些改造营终于停办了，但似乎又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下去。

但是，对于少数除外的所有囚犯都有一个“改造”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凡是愿意接受“改造”的人可以从再教育的一个阶段逐步进入另一个阶段，直到他们有条件释放时为止，于是由那个名称就是不祥之兆的社会弊病预防部把他们分配到一个适当的工作中心。但是，对于国家的危险敌人是不给以这种机会的，并且有很多随遇而安的犯人不肯利用这种机会。

古巴政府从来不肯回答例如国际大赦或其他国际机构所提出的有关政治犯情况的询问。外国新闻记者或外界人士几乎没有看到过政治审判，虽然在六十年代后期，卡斯特罗承认了经济政策的很多错误，但是，他在对待他

的反对者上的错误，却一个也没有承认过。所以这个政权，象东欧的一些政权一样，对于它的制度的血腥性质，无数的毫无理由的搜查家宅，盗窃有嫌疑者的财产，在秘密警察大楼的长期盘问以及对犯人及其访问者的无情的侮辱（“滚开，穿孝服去，因为你是寡妇了，”威廉·加尔维斯少校对松树岛的一个访问者这样简单地说），是有愧于心的。1968年，卡斯特罗拒绝了玻利维亚总统巴里恩托斯以乌维特·马托斯交换雷吉斯·德布雷的建议，并以“一百名反革命交换格瓦拉的尸骨”作为反建议：但是格瓦拉的尸骨已经化成灰了。

另一方面，关押一般罪犯的普通监狱的条件，自1959年以来的确已经有了改进，在再教育方面也作出了认真的努力。

政府所使用的管理工具当然包括新闻检查制度在内，也包括正面利用电视、无线电广播、电影和报纸，电视是以一种真正的革命方法来加以利用的，这也许成为未来暴政的阴森森的预兆，这不仅使卡斯特罗可以在革命政权初期摧毁他的敌人，还可以在新制度困难重重和政策变更的时期继续支持这个新制度。对于反巴蒂斯塔的革命斗争年月非常重视，而且一直留在这个岛上的普通古巴人这时对于往日一定有一种十分古怪的想法，不管他对革命抱着什么态度。街道和城市的名称不曾变更，也不曾给活人立过雕像；但这不是石头或大理石的时代，而是电影的时代，所以到处有卡斯特的照片同马蒂、马克思和列宁并列在一起，虽则格瓦拉已经超凡入圣，但他那倔强而激励人心的形象现在甚至更加常见了。医院和糖

厂的名称、学校和工厂的名称常常用以纪念不久前的一些已故的英雄，诸如阿维尔·桑塔马里亚（在蒙卡达阵亡）、孔拉多·贝尼特斯（1961年初在神秘的情况下被杀害的一位有学问的青年教师）或卡米洛·西恩富戈斯。三十年代的更老一辈的英雄，诸如吉特拉斯或马丁内斯·比列纳，也在纪念之列。马蒂的无数警句，有好的，有坏的，都用巨型字体写在揭示牌上，证明他所必然会抨击的一种政治制度的这一点或那一点。革命政府的整套宣传计划，的确是付诸实践的索雷尔的神话的一个好例子——“渺不可及的目标、紧张的精神状态和天启的成功希望的三合一体”^①——再加上吹捧成为史诗般的对过去的遭遇战的纪念以及象巴蒂斯塔逃亡周年纪念、攻打蒙卡达兵营周年纪念和保卫革命委员会成立周年纪念这类国定假日的例行群众集会。古巴政府的宣传的一贯目的就是要以民族主义的精神取代听天由命的精神，以便使牺牲成为可以忍受的；同时歪曲前不久的真实历史。一个青年建筑师描写了在蔗田里一天的艰苦劳动之后，看到两、三百码以外一部砍蔗机在几分钟内就完成了同样的工作；“就在这时，”他说，“我体会到不发达的意义。尽管哈瓦那是现代化的，但我们是多么近似非洲。”要对古巴的苦境写出一篇更加不正确的描述，简直是想都想不出来了。

因此，报纸是令人生厌的。“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格拉玛报》，与其说是一种报纸，不如说是一

^① 乔治斯·索雷尔：《对暴力的责难》（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50年），第20—21页，希尔斯的导言。

种鼓动性的传单，全文刊登卡斯特罗的讲话，很少新闻，偶尔有几段激励人心的零星历史。它的编辑，一度同马托斯发生冲突的马卡圭省土改负责人豪尔赫·恩里克·门多萨这个黑白混血种人，是以他在1967年所提出的下述莫明其妙的说法而最为著名的，他说以色列军队在六天战争中是由纳粹指挥的。除了《格拉玛报》的晚刊、《起义青年报》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全国性的日报。电视和广播管理局局长豪尔赫·塞尔格拉少校也莫明其妙地同马托斯案牵连起来了，因为当时他以起义军军法官的身份担任过首席检察官。他一度担任马坦萨斯军事长官，在1962年卡德纳斯的面包骚动中因调派坦克车去对付家庭主妇而失去了这个职位。胆敢拿革命开玩笑的最后一个专栏作家塞贡多·卡萨利斯，在1964年3月间受到卡斯特罗的粗暴攻击，他的专栏“希基特里利亚”就此猝然结束。同古巴的报纸相比，西班牙的报纸也许可以说是光芒闪耀的。象在1900年美国军事占领期间刊登于《讨论》杂志的那种描绘在两个盗贼之间备受折磨的可怜的古巴的任何漫画，都无疑会给这位艺术家赢得绝不只是伍德将军所任性赏给的二十四小时的监禁。

卡斯特罗坦率地为新闻检查制度辩护说：“第一个悲叹无法给个人以保证的就是革命政府……革命政府解释说，如果给以这种保证，就会有利于试图破坏革命、并把革命淹没于人民血泊之中的强大敌人。”^①在“希基特里利亚”事件中，卡斯特罗解释说：“那些写‘真实’的先生

^① 在革命方针工作负责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革命报》，1961年11月11日。

‘决不会受到什么损害’，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以为真实是一种抽象的实体。真实是为高尚事业服务的一种具体的实体。”（不妨补充说，不真实也常常是如此。）就是这位新闻记者卡萨利斯，早些时候突然接到一道命令，不准在他的专栏中攻击当时正在同古巴开始发生商务关系的西班牙政府。

在革命政府下的艺术历史自然一直是不稳定的，并且在无数个人的事例中是悲惨的。所以成为1959年的一种特征并由《革命报星期一增刊》特别表达出来的民族自信心初度闪耀出光芒，接着就在1961—1962年期间，特别是在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忙于成立统一革命组织的那几个月中日趋幻灭了。《革命报星期一增刊》被禁止，象著名的《下午》（没有任何革命内容）这类影片受到了攻击，自我表现的主要方法都被为政府忠实服务的人们所控制。因此，阿尔弗雷多·格瓦拉这位老共产党员（虽则比较年轻）接管了那个大有希望的电影机构（古巴艺术和电影业委员会）的领导权；尼古拉斯·纪廉是位可敬的诗人，但在政治上却是共产党的一个工具，担任了作家协会的主席。甚至在导弹危机以前，具有独立见解的人物不是开始离开古巴，就是保持沉默，或者在古巴驻外大使馆中以文化参赞作为职业；另一些人却同政府和好了，达成了协议，或听任自己受检查，或自行检查；还有一些爬上了文化界显要地位的，开始把通过对他们同时代人的作品的鉴定看作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一些著名的作品还继续在写出来，就产品（小说、戏剧、电影和诗歌）的数量而言，革命政权的成就是十分显著的，但古巴最杰出的艺

术家仍然是革命前就已有成就的那些，例如小说家阿莱霍·卡彭铁尔（现任古巴驻法文化公使）和何塞·莱萨马·利马或画家雷内·波托卡雷罗和维尔弗雷多·兰（自从四十年代后期就侨居巴黎），或目前在流亡中的那些，例如塞维罗·萨杜伊或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方特（一度是《革命报星期一增刊》的负责人）。可以与这种情况相对照的是：政府为奖励艺术曾经花费了很多钱，并且可以公平地说，已经把诗歌、芭蕾舞、音乐、巡回图书馆和剧院带到了古巴的乡村。上一世纪关于古巴的一些历史作品，特别是曼努埃尔·莫雷诺·弗拉希纳尔斯和胡安·佩雷斯·德拉里瓦的作品都是具有高水平的。^①两个主要的文艺杂志《联盟》和《美洲之家》也都很不错。但是，新的民间音乐似已绝灭，在“倒霉的往日”那种久已成为从孔加、伦巴、曼波和阿瓦内拉到喳喳的新音乐和新舞蹈的来源的古巴，一直没有任何新的歌曲可供舞蹈或输出了。

尽管布拉斯·罗加和其他老共产党员显然力图强逼古巴人接受他们的墨西哥朋友象戴维·阿尔法罗·西克罗斯这类人的现实主义的标准，可是就绘画而论，对自由的限制一直解释得相当灵活。例如，卡斯特罗在1963年说，当“俄国在哈瓦那的追随者”（大概是指埃斯卡兰特）要求他禁止抽象派的画，如同赫鲁晓夫在俄国所做的那样的时候，他回答说：“我们的敌人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

^① 莫雷诺·弗拉希纳尔斯是以他对十九世纪的制糖厂埃尔因赫尼奥厂的卓越研究而知名的。佩雷斯·德拉里瓦是渊博的《国家图书馆评论》的编辑。

义,而不是抽象派的画。”^①1965年,格瓦拉在《社会主义和人》一文中,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之外地说成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绘画的尸骸”。但是,卡斯特罗在1961年“对知识分子的讲话”中却有下述的警句:“参加革命,什么都有,反对革命,什么也没有”,虽则在作家和艺术家协会成立时,其原则声明中含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认为绝对必要的是,所有作家和艺术家,不分个人在美学上的差异,都必须参加保卫和巩固革命的伟大工作。我们应该利用严格的自我批评,清洗我们的表现方法,以便更好地适合于斗争的需要。”^②

“我们的主要想法是给支持革命的人以充分的自由,而不给反对革命的人以丝毫的自由,”多尔蒂科斯总统在1964年多少有点尖刻地说。1965年,卡斯特罗说到他对艺术的看法跟他对真理的看法有很多共同之处:“艺术本身不是目的。人才是目的。要使人更幸福,更美好。”在1966年,何塞·莱萨马·利马公然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乐园》,它不但与革命毫不相干,而且在它的著名的第十一章中,大谈其同性恋爱的实践。但是后来发现它之所以能够通过检查,只是因为它太长,太难读,它没有出第二版,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刊物,《大胡子的鳄鱼》的编辑赫苏斯·迪亚斯立刻在一篇题为“走向战斗文化”的文章中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意见。1967年,哈瓦那举行了一次大型的现代画展:没有展出任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画,但卡斯特罗本人展出的作品却是不祥之兆:一架高射炮,一

① 同克劳德·米利恩的谈话,《世界报》,1963年3月23日。

② 《今日报》,1961年8月23日,引自戈登堡书,第254页。

只公牛和七只母牛。

但是,不出所料,在文学方面,出现了^①对现政权的考验。1966年,智利的大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因为在同秘鲁总统贝朗德会见后建议应该结束“在文化方面的冷战”,而遭到古巴政府许多最忠实的作家在一封签名的信上毫不客气的批评。在1967年的一次大会上,古巴作家一致接受了卡斯特罗的下述建议:不再尊重版权,不付版税,甚至对外国人也如此。一位叫作海梅·苏雷特斯基的作家说,“不付版税可以使作者感到他自己是一个人”(虽则作家们都在国外赚到了他们所不能触及的版税)。最后,在1968年的一个著名案件中,青年诗人埃维尔托·帕迪利亚从一个国际评判委员会中得到了作家协会的诗歌年奖,但始终不许他从古巴作家协会领奖,理由是他有一首诗,《在火线外》写得不够负责。事实上,他早些时候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刊物《大胡子的鳄鱼》上对古巴文化界那种窒息的气氛的批评,已经招致了《古巴》杂志的编辑兼杰出的奉命唯谨的小说家利桑德罗·奥特罗的抨击。在1969年,以《美洲之家》社长的身份而成为文学的机关工作者的蒙卡达老战士艾德·桑塔马利亚对评判该社年奖的评判员解释说,任何一个艺术家都不可能是非政治的,因为艺术本身就含有一种政治立场,^①同

^① 《波希米亚》周刊,1969年1月24日。所以,不出所料,小说奖颁给了雷纳托·普拉多·奥罗佩萨所著关于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蛹之歌》,而论文奖则颁给了秘鲁游击队员埃克托尔·贝哈尔。这是1968年艾德·桑塔马利亚在同样场合下的讲话的一个变化,当时她说,书的封面套纸并不比评论家的裤子更有理由要包含政治内容。

时，在1969年晚些时候，帕迪利亚事件显然又重演于巴勃罗·阿曼多·费尔南德斯的那段公案中。巴勃罗·阿曼多·费尔南德斯也获得了年奖，但是他在电视上对古巴文化界作了一些批评之后，年奖被撤消了。（但是，在这桩公案中，卡斯特罗出面干涉，坚持发还奖金。）

类似事件的最令人不快的一面也许就是武装部队通过他们的机关刊物《绿橄榄树》在树立文化标准方面加强了作用：首先攻击帕迪利亚及其他一些作家，说“他们的无骨气同他们的色情文学和反革命主义是完全相称”的，就是《绿橄榄树》。

这类事件起因于现在根深蒂固的文艺官僚制度（象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一样），正同起因于国家政治发展的官僚制度不相上下。所以，古巴的主要出版社是由古巴全国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领导的。所有作家都必须是该会的会员。依附于这个机构，一如依附于古巴文化传播中心《美洲之家》或塞萨尔·埃斯卡兰特所创立的“革命方针委员会”（或新闻检查委员会）的那些官僚那样，无疑地是一直在利用他们的权利，以不那么因袭惯例的人们为牺牲，来促进他们自己不总是出人头地的事业。就目前而言，无可否认，这些事情也许还没有超出毁谤的限度，也还没有达到暴行的地步。就数目来说，书籍的出版已大为增加，1969年出版了一千五百万册——大部分是教科书，大约有百分之七十是免费分发的。

自从1962年以来，只有过少数几次政治危机。劳动部长，即在1959—1960年主持消灭自由工会事宜的奥尔金律师奥古斯托·马丁内斯·桑切斯，当他在1964年部

分因为处置失当，部分显然因为他想戏弄所有各政治集团而被解职时，试图自杀未遂。十八个月之后，在1966年初，曾经以大学生联合会主席的身份在1960年摧毁大学方面作了同样刀斧手工作的罗兰多·库维拉，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纵容下，参加对卡斯特罗未遂的谋杀而被判处监禁二十五年。^①所以，他在监狱里与同他一起堕落的民主学生领袖佩德罗·路易斯·博伊特尔凑在一起了。同时，在1959年任卡斯特罗的第一任警察总监和一度任武装部副部长的埃菲赫尼奥·阿梅赫拉斯因“道德上的犯罪”被监禁并开除出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是对腐化分子进行了一次全国性清洗。长时期是奥连特省共产党头子的阿曼多·阿科斯塔因忽视“从较少的甘蔗中榨取较多的糖”的口号而在1967年被虚张声势地免了职（根据一个提供消息的人的说法，是因为庆祝他女儿十五岁生日举行了一次特别奢华的宴会）。但最严重的危机是在布拉斯·罗加和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之后又有两个最著名的老共产党员身败名裂：这两个人就是华金·奥尔多基和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

当发现奥尔多基——1927年加入共产党——和他的女伴，埃迪特·加西亚·布查卡在1957—1958年流亡墨西哥时以及后来在哈瓦那时曾经保护过马科斯·阿曼多·罗德里格斯那个青年共产党员，而那个青年供认曾于1957年出卖了在温博尔特街被本图拉和巴蒂斯塔

^① 在革命期间不曾为自己作出很好成绩的库维拉，在任古巴驻马德里大使馆参赞时，流亡者领袖曼努埃尔·阿尔蒂梅显然曾代表美国中央情报局同他联系过。这个阴谋被古巴一个精干的密探在迈阿密流亡者的圈子里发觉了。库维拉只是在卡斯特罗“亲自呼吁从宽处理”之后才幸免一死。

的警察杀害的四个学生时，他们失去了各自的工作（分别任武装部副部长和文化委员会副主席）。罗德里格斯经过两次审讯，确定动摇了革命政府的团结后，被枪决了，^①而奥尔多基和埃迪特·加西亚·布查卡则被判处无限期管制。

埃斯卡兰特事件的第二阶段甚至比马科斯·阿曼多·罗德里格斯案更使政府震惊。曾经是统一革命组织的主要组织者、并曾于1962年公开丢丑的老共产党领袖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在1964年从布拉格回到古巴。他得到了一个多斯埃尔马诺斯农场场长的名誉职位。但是，他远没有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而利用象他自己一样未能在卡斯特罗主义的党中安身立命的那些老共产党的“老斗士”的不满情绪，又着手企图恢复他已失去的地位。在这些人中，有两个是1965年组成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何塞·马塔尔和拉蒙·卡尔西内斯，何塞·马塔尔是重要的保卫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后任古巴驻布达佩斯大使；拉蒙·卡尔西内斯是拉斯维利亚斯的糖业工人领袖，他在1960年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之后，于1961年1月至1962年3月担任统一革命组织外交委员会的成员时，实际上是外交部长；后来，他经营土地改革委员会的果品出口部门。他们在多斯埃

^① 参看《利沃里奥》（智利）第1号和休·托马斯：《哈瓦那的谋杀案》，《新政治家》，1964年5月29日。关于这个离奇案件的半虚构的说法，参看卡洛斯·曼努埃尔·佩列塞尔：《死后的收益》（巴塞罗那，1969年），佩列塞尔是曾在古巴住过一些时候的一个危地马拉的前共产党员。始终没有澄清的主要之点是，事实上罗德里格斯是否如他所说的曾经向埃迪特·加西亚·布查卡招认过他的出卖行为；而且罗德里格斯1961年是在布拉格，当时一个巴西外交官怎么能向他通风报信说即将逮捕他。

尔马诺斯和其他一些地方举行了一连串的聚餐。据说在葬礼上还曾作过离经背道的讲话。埃斯卡兰特和这一“小撮”（照他们的敌人对他和他的朋友们的称呼）似乎不赞成在拉丁美洲搞武装斗争，并认为在委内瑞拉搞的游击战是一种“冒险”。他们扬言“谁也不理解菲德尔：他是个疯子”，并且说格瓦拉是一个托派（又说他的离去是该受欢迎的）。这一小撮后来被谴责为曾经批评农业方面的志愿劳动，想重新采取物质刺激，并意在言外地说革命领导层都是小资产阶级，代表一种“左倾冒险主义”，又说改变领导层就可以改进同俄国的关系。^①埃斯卡兰特被指控在古巴共产党的一些部门中建立起个人党羽的小集团，搜集经济文件，交给俄国官员；特别是因为他在共产党内混了一生，所以对于俄国保安官员说来，是一个合适的人选。^②不必说，这些活动是隐瞒不了的，在1967年中期，古巴公众开始在讲话中听到了“一小撮”的情况（在漫画中被描绘为细菌），最后，埃斯卡兰特和他的三十六个追随者受到了审判。很多离奇的活动都被揭发出来了，例如：1961—1962年担任统一革命组织保安局局长费利克斯·弗莱塔斯回想起他有一次为苏联专家开汽车那件丢脸的事情；埃斯卡兰特曾经接触过俄国、东德和捷克的官员，因为他认为这些人有接近俄国领导人的机会，可以在苏联为他造有利于自己的地位的舆论——在这

^① 这一小撮在开除公共汽车司机的问题上也采取强硬路线，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导致公共汽车方面的更多冲突”。（劳尔·卡斯特的讲话，《格拉玛报》，1968年2月11日。）

^② 劳尔·卡斯特罗在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讲话中解释说，“外国顾问、新闻记者和外国大使馆的秘书参与这一小撮的活动的为数不多”。

些人中有卫生部的捷克顾问弗兰蒂塞克·克里格尔博士，^① 和一个老共产党员埃米利奥·克萨达，后者在审讯中公开承认“我们是希望使用一定程度的政治压力以获得变革”。^②

结果是埃斯卡兰特和他的朋友都被判以不同期限的监禁，卡尔西内斯和马塔尔丢了他们在中央委员会的席位。

最后，在这个政权的重要政治危机中，格瓦拉似乎在同卡斯特罗发生过一次争吵后，于1965年辞去了工业部长的职务，^③ 到刚果同金沙萨的起义军一起战斗，两年以后，象十九世纪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皮萨卡内一样，被他所希望解放的农民出卖，死于玻利维亚，终年三十九岁；同他一起遇害的有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几位委员。^④

① 克里格尔曾在西班牙战争中作战并于1968年作为捷克共产党中央主席团的一个成员，是杜布切克政权中最著名的自由派之一。他于1968年8月21日和杜布切克一同被捕，从此声名扫地。

② 《格拉马报》(周刊)，1968年2月11日，载有讲话。

③ 这显然是里卡多·罗约所著传记中的说法(《切·格瓦拉》，法文版，第168页)。1965年3月14日格瓦拉从一次广泛的世界旅行中回来，于3月16日写信给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母亲说，他将要用一个月的时间去砍甘蔗，然后用五年的时间去指导一个国有化的工业。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格瓦拉于1965年7月底离开古巴前往刚果。因为古中关系的日益恶化，所以卡斯特罗命令他离开刚果，于1966年3月，格瓦拉重又回到古巴。1966年9月，他动身去玻利维亚。

④ 参看本章开头部分。除了这些人(胡安·比塔略·阿库尼亚，安东尼奥·桑切斯·迪亚斯和埃利塞奥·雷耶斯)之外，还有其他十个古巴人在玻利维亚遇害(里卡多·古斯塔沃·马钦少校，奥兰多·潘托哈，伊斯拉埃尔·雷耶斯，赫苏斯·苏亚雷斯·加约尔，曼努埃尔·埃尔南德斯，奥克塔维奥·德拉孔塞普西翁，何塞·玛丽亚·马丁内斯，雷内·马丁内斯，费尔南德斯·豪特斯·德奥卡和卡洛斯·科埃略)；有三个古巴人经由智利逃出了玻利维亚(丹尼尔·阿拉尔孔，阿里·比列加斯和莱昂纳多·塔马约)。这些人中，有六个曾经在1958年和格瓦拉同路去圣克拉腊，并且除了两个人以外，都是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成员。

格瓦拉被俘后被玻利维亚军队枪决。

格瓦拉是一个勇敢、诚实又有果断的人，但也是一个固执、褊狭和独断独行的人。在他临终之前，他似乎已经相信为暴力而暴力的好处：“如果有两三个或很多个越南，以他们的牺牲和壮烈的行动贡献于全世界……迫使帝国主义不得不在……世界各民族日益加强的仇恨下分崩离析，那我们将可以多么快地看到一个光明的未来呵。”^① 在格瓦拉看来，仇恨，的确是一种值得赞美的情绪，它能够把人变成为“一种有效的、猛烈的、有选择力的和冷酷无情的屠杀机器”。^② 在他临终的前几年中，格瓦拉公然认为“机关枪的断音的歌声以及战争和胜利的新战斗呼号”为最悦耳的音乐。^③ 他在导弹危机时撰写而到了死后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甚至说“我们必须沿着解放的道路前进，即使以千百万人牺牲于原子弹之下也在所不惜”。^④

格瓦拉在古巴也表现出了另一种教条主义来：关于国营企业应否有一定程度的自治问题，他在同那位继他之后出任国家银行行长的马塞洛·费尔南德斯的争吵

① 1967年6月格瓦拉寄给《三大洲》杂志的通讯，发表于《格拉玛报》，1967年4月17日。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绿橄榄树》，1968年10月6日。如果不是一个生长于一个大洲尽管有宫廷政变和帮会活动、却在上一个世纪中比其他任何大洲所遭受的战争和暴力的影响都要轻的人，肯定就不可能有象格瓦拉这样对于战争神圣的那种如醉如痴的思想（对也患有气喘病的西奥多·罗斯福的回忆）。布拉斯·罗加碰巧也是“不怕原子武器”的（参看安东尼·西尔韦斯特：《古巴给拉丁美洲的教训》，《每日电讯报》，1965年6月11日）。

中，他失败了。格瓦拉采取了最严格的中央集权路线。他在1960—1961年认为古巴能够迅速工业化的那些空中楼阁的预言，终成泡影。正如南斯拉夫《战斗报》所说的，竖立在那儿的“象是在怀念雄心与现实的矛盾”的那很多半完工或空空如也的工厂都是他遗留下来的纪念物。^①他不是一个人仁慈的人。有一个古巴律师在为一个人被控曾与过去的政府有关系的妇女进行辩护时想到格瓦拉曾在1959年这样说：“我不懂你怎么敢对这个人这么热心……我一定要枪毙她……如果任何人为过去的政府说句好话，我就大可以把他枪毙。”^②他似乎也最直截了当地认为，欧洲工人阶级所得到的的高工资必然是由“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千百万被剥削的农民和工人”支付的。^③他是教条主义的：在1961年，他对“我们必须达到百分之百的国家所有制”的旧式观点深信不疑，因为甚至小私产也是非生产性的并且妨碍整个国家的。然而他是坦白的，大体说来，他既不自欺也不欺人。他同苏联以及他认为日益资产阶级化的东欧共产党争吵，是不大顾及自己的前途而表达出来的。他认为当时在古巴和东欧都使用的物质刺激和那种甚至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依然成为特征的价值法则都是不道德的。他对卡斯特罗一直具有的不论好坏的强烈的影响，在他死后还是有增无已，因为卡斯特罗此后采纳了他的很多观点。正如马蒂

① 参看格瓦拉在1961年第一次全国生产会议上的讲话，第110—112页。关于对格瓦拉的经济学的隐蔽的攻击，另参看多尔蒂科斯的讲话，载《社会主义古巴》，1966年3月，第26—42页。

② 《古巴和法治》（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日内瓦，1962年），第158页。

③ 对马克·施莱菲的批评，《每月评论》月刊（1964年4月），第652页。

或者阿拉伯的劳伦斯一样，失败已经使得传说光辉闪烁，而不是暗淡迷蒙。^①

自从1962年以来，古巴一直不时发生反抗活动。“自由主义者”的最后一掷，是曼努埃尔·拉伊所作的诺言，声称要在1964年5月20日用一支解放军在古巴登陆。他虽然从波多黎各出发，在巴哈马群岛而不是在奥连特省登陆，但是，他的命运就此告终了。他同其他大多数反卡斯特罗的古巴著名政治家已经成为北美生活的组成部分。1963—1964年，曼努埃尔·阿蒂梅显然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钱在哥斯达黎加组织了一支新的流亡者军队，但没有进行过侵袭。另一方面，几次行刺未遂的企图据说都是北美授意的，特别是1966年3月罗兰多·库维拉的那一次，也许这是遗少们在古巴政治上的最后一掷。在奥连特省和其他山区，小规模游击遭遇战大都以一种未被歌颂的战争方式在进行着；谣言很多，但自1962年以来也许至少有四千名“游击队员”毙命。^②在劳尔·卡斯特罗在克里斯塔尔山的一个老伙伴梅嫩德斯·托马塞维奇少校的主持下已经专门成立了一个“剿‘匪’组织”。1968年，发生一次破坏高潮，包括在船上、在工厂和农场中放火，结果有若干人被枪决或监禁。关于这种秘

① 格瓦拉的传记已开始问世。作为一个朋友抱同情态度和善意所写的作品说来，见里卡多·罗伯：《切·格瓦拉，一个朋友的生和死》（巴黎，1969年）；作为一部抱有敌意的作品说来，见奥拉西奥·罗德里格斯：《切·格瓦拉，神话和现实》（巴黎，1969年）。

② 劳尔·卡斯特罗（1967年7月22日）说，此后被击毙的有“土匪”三千五百九十一人，古巴兵士死亡五百人。他说单单用于消灭“武装土匪”的款项就在五亿到八亿美元之间。1965年，菲德尔·卡斯特罗说，被击毙的有土匪二千零五人，古巴兵士死亡二百九十五人。（1965年7月26日的讲话。）

密战争，简直没有什么记载——也许永远也不会有什么记载，但是，在古巴却发表了这样一段故事，说是有一个叫作巴尔多梅罗的、七十五岁的崇拜太阳神的海地人偕同一批伏都教徒上山去了。教徒被捕获了，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巴尔多梅罗。马埃斯特腊山区谣传说他有隐身法，或者变成了一条蛇、一块石头、或一棵树；有一次，的确有一个农民被一条蛇吓了一跳，别人听到他喊道，“快，快，弄死它，它可能是巴尔多梅罗”。巴尔多梅罗的传说继续流传着。

政府和教会的关系在1960—1961年的危机后缓和下来了。教堂依然开放，教皇的使节塞萨雷·萨奇（后来也是哈瓦那主教）也和古巴驻梵蒂冈的外交使团一起留了下来。警察一度把凡是去教堂的人都列了名单，但这种做法已经停止了。另一方面，宗教在学校中已不起任何作用，农村的新居民区也没有教堂。神甫和牧师都必须服兵役。任何传教的天主教徒都不能成为共产党员。在1965年，复活节重新命名为“吉隆滩周”，并专门用于群众性志愿体力劳动（后来已渐渐扩大为“吉隆滩月”）。1966年，教堂附近的街道在做礼拜时都变成了运动场，儿童的喧嚣声淹没了做弥撒声。似乎常常还不肯发给修理教堂的许可证，结果建筑物便可因危险而加以封闭。1969年初，在部队的杂志《绿橄榄树》上载有攻击宗教的文章。这个杂志批评了宗教含有“逆来顺受的精神”，批评它对超自然现象的“盲目信仰”和它那通过祷告追求真理的做法；因为“宗教分裂了人民的力量”并且帮着推迟新人的

出现,而新人自然应该是既不迷信又无野心的。1963年卡斯特罗把耶和華证人派^① 谴责为反革命的教派,在1969年,他们的和平主义论调,他们的拒绝对国旗宣誓,拒绝在星期日劳动和拒绝“适当注意武器”都遭到了谴责。出席西部浸礼会代表大会的三分之二牧师也在1965年4月间被捕,经审讯后被判犯间谍罪。但是,新教派因为很多北美牧师迁移出境而遭到相当大的损失,而且似乎在政治上都尽量退居于中立地位。^②

最近,古巴的圣职人员在1969年春季写给教友的一封信公开信中呼吁美国停止经济封锁,因而古巴政府称赞了南美一些具有社会意识的天主教徒和神甫——如果他们都象卡米洛·托雷斯运动那样具“有战斗性”的话,卡米洛·托雷斯运动认为“在拉丁美洲,武装斗争是基督教的良心上的责任”,而“游击队的热爱暴力基本上是对真理的一种崇高的热爱”。^③ 1968年,卡斯特罗指出有一批革命的神甫出席了哈瓦那的文化代表大会,并且拿拉丁美洲正统的共产党员来同他们作比较:“当我们看到某些教士变成了革命者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听任自己看到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变成基督教徒呢?”^④

① 查尔斯·拉塞尔(1852—1916年)建立的一个基督教教派,一称国际读经会或拉塞尔教派。——译者

② 参看奥尔顿·罗伯逊:《新教徒在古巴的政治作用》,载《教会研究丛书临时报告》,纽约,第18卷,第2和第3号(1967年2月和3月)。

③ 《终点》,智利圣地亚哥,1969年2月25日。卡米洛·托雷斯是哥伦比亚一个急进的神甫,在1966年为哥伦比亚军队所杀害。

④ 1968年卡斯特罗在代表大会闭幕时的讲话。

第四十章

新朋友和老朋友

自从1962年以来，古巴革命政府的对内政策究竟听任它的主要的商业和军事盟国俄国的意愿支配到怎样程度，自然至今还是不清楚的。但是，显而易见，一方面尽管两国关系密切，可是因为卡斯特罗本人的气质以及古巴的地理位置，他至少在口头上往往是一个不坚定的盟友；而另一方面，在很多对俄国具有真正重要意义的问题上，他却不得不亦步亦趋地遵照俄国的意见行事。所以，卡斯特罗就同例如意大利的共产党不一样，支持了1968年俄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且多半是由于俄国的影响，使古巴把其主要经济注意力从迅速工业化这种固执的计划回过头来继续着重于蔗糖的生产。根据1964年1月俄古食糖协定，古巴的确同意从当时起至1970年按每磅六美分的固定价格（高出当时世界市场价格不少）以糖作物收成日益增加的比例出售给俄国。所以，俄国是古巴继续实行单一作物的倡导者——尽管赫鲁晓夫大谈社会主义世界内部的“国际分工”，可是俄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甜菜却在继续增加生产，而且俄国还把大量的古巴糖在世界市场上转手抛售。

撇开看上去是无偿的军事援助不谈，不论在往来帐或资本帐上，古巴一定都欠了俄国和东欧共产党国家数

百万美元的债务。例如在1965—1969年，苏联的非军事援助似乎已经达到每年三亿美元，而在1967—1970年也许还不止此数。^① 在古巴从俄国输入的进口货中，除了机器，石油无疑是最大的项目，每年从俄国开到的油船在一百五十艘以上。^② 古巴的全部小麦来自俄国，古巴从俄国及其卫星国进口了拖拉机四万台左右，联合收割机二千台，且不谈为维修北美旧机器而进口的大量零件。古巴对俄国的出口货在1961年和1968年分别约值二亿八千一百万和三亿七千二百万卢布；古巴的进口货也有了相应的上升。^③ 俄国为古巴重新装备了制糖厂，建造了发电站、医院、工厂、灌溉装置和道路。有很多俄国专家

^① 在1968年，三亿二千七百万美元的约略等值是一个估计数字。关于1965年的情况，参看怀尔斯：《共产主义国际经济》，牛津，巴兹尔·布莱克韦尔出版社，1969年，第403页。怀尔斯所作估计如下：

食糖补贴	95(百万)卢布
对古巴的出口，离岸价格	338
从古巴的进口，离岸价格	277
差额	61
为古巴提供的运输劳务	34
工资和专家顾问减去古巴分担之数	3
	808(百万)卢布

即大约三亿零八百万美元

^② 1968年有一百六十七艘油船进入哈瓦那船坞，或每五十四小时一艘(1968年1月2日卡斯特罗的讲话)。

^③ 萨空的文章，《苏联》，1968年7月。根据自1960年至1968年俄国驻古巴商务参赞的萨空的说法，数字是(按百万卢布计)：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总计	6.7	160	539	541	508	591	646	689	842	914
俄国对古巴的出口										
	—	67	258	330	360	331	338	432	507	542
俄国从古巴的进口										
	6.7	93	281	211	148	260	308	257	335	372

在古巴工作，有很多古巴学生现在还在俄国接受广泛的技术教育。卡斯特罗在1969年说，俄国的援助一直是“难以估量的和起决定作用的”。但是据美国政府揣测，古巴欠俄国的资本债务约达十五亿美元。^①另一方面，数字在这里并无多大意义：卡斯特罗自己在1967年就说他的对外贸易“实际上是以易货为基础的，以一种除了合同持有国、可说是一文不值的所谓汇兑货币进行的”。^②俄国在同古巴的食糖交易中恐怕很赚了一笔钱，如果说俄国在本国内从甜菜中生产食糖成本显然很高的话，^③俄国每天付给古巴一百万以上的美元，这同它在国外的其他花费相比，显然不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所以，俄国在古巴政治所起作用之大，几乎和美国在过去所起的作用不相上下。俄国是古巴主要产品的主要市场；它供应古巴以武器（当然还提供情报和侦察技术），如果没有这些武器，这个政府就未必能够维持下去；它拿走了古巴甚至象果品和蔬菜这类次要产品的大部分；它是古巴的小麦和石油的唯一供应者。1967年，俄国大使馆一个官员鲁道夫·希利亚普尼可夫，在提到俄国对古巴经济的控制时，明白地告诉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说，“我们只须说一句，修理工作已在巴库停了三个星期就够

① 美国商业部，《古巴农业综览》，1969年，第15页。在1969年初，据哈瓦那外交界的可靠材料，所开列的这项数字还要高得多。

② 卡斯特的讲话，1967年8月10日（于拉丁美洲团结组织大会闭幕式上）。

③ 参看古特曼书，第215页中的讨论，据说，俄国的成本一定为古巴成本的三倍左右。

了”。^① 卡斯特罗公开承认，他深知“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事事仰赖外国的苦痛，以及这情况怎样成了一种武器，并至少会产生一种使用这种武器的诱惑力”。^② 在过去，美国至少是付给可以兑换的货币，而不是付给未必合意或未必有效用的货物的。因此，毫无疑问，汽油实行定量配给就是企图摆脱俄国经济控制的（虽则仅是实行于1968年1月间）原因之一，1968年3月间，同罗马尼亚缔结购买石油钻探设备的三千万美元信贷合约也是出自这个原因。近来古巴千方百计节约燃料，甚至生产食糖“也不用一滴汽油”。但是目前，社会主义的古巴，如果没有俄国作为市场，作为主要燃料的供应者，那么就同资本主义的古巴没有美国一样地寸步难行。所以，古巴敢于经常背离俄国的政策如此之远，的确是值得注意的。甚至卡斯特罗对俄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所给的支持也未必会象原先所想象那样的勉强，因为，他当时的讲话说得很清楚，不管他对于大国对小国使用武力会多么深以为憾，他对于杜布切克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那种容忍成性，也是非常厌恶的。

但是，俄国同古巴争执的主要所在却是在这个问题上，即武装斗争政策是不是完成拉丁美洲革命的唯一途径。

在古巴保证支持本大陆的“解放运动”的第二次哈瓦那宣言以后的八年中，卡斯特罗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一直

^① 劳尔·卡斯特罗在中央委员会的讲话，《格拉玛报》，1968年2月。

^② 卡斯特的讲话，1968年3月13日。

变化无常。这些变化之所以发生，一则因为外部世界的一些难以预料的大事，诸如赫鲁晓夫的下台、越南战争以及美国国内对越南战争的反应等等，一则因为格瓦拉前往玻利维亚的远征、俄中争端、以及南美各共产党内部的纠纷（特别是委内瑞拉共产党）。所以，尽管在1962年导弹危机之后，卡斯特罗对俄国加倍感到恼火，古俄关系却依然非常良好达两年之久——主要是因为卡斯特罗同赫鲁晓夫的亲密友谊（在1963和1964年两次访问俄国之后，卡斯特罗甚至也许对赫鲁晓夫有了一种忠诚之情），此外也许还因为当时古巴共产党本身远还谈不上团结，不愿再参与任何其他的纠纷。直到1965年下半年，卡斯特罗至少才似乎准备接受俄国和拉丁美洲各共产党正统派领袖所坚持的那个观点，即关于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究竟应该是和平的，还是必须通过一次“武装斗争”的这个问题，应由“在进行斗争的各民族自己”解决^①，卡斯特罗在他的讲话中或者甚至在报纸报道中也尽量避免任何涉及俄中纠纷的言论，而且古巴报刊上几乎照登了中俄两方陆续出现的有关文章。这种谨慎的态度在1964年11月拉丁美洲各共产党在哈瓦那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中得到了普遍的赞许。^②

但是，这种谨慎态度在古巴决不是很得人心的，格瓦

① 见1964年5月卡斯特罗第一次访问莫斯科结束时的公报。

② 参看布鲁斯·杰克逊：《卡斯特罗、克里姆林宫和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巴尔的摩，1969年），第28—31页。这次会议对俄国来说是一个彻底的成功。对这次会议寄以很大希望的中国人，后来非常愤怒——也许这是第一次使卡斯特罗看到了中俄对抗的程度。

拉（在1965年3月他失踪以前）和劳尔·卡斯特罗在他们各自的声明中多少表明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同卡斯特罗有不同的看法。卡斯特罗开始发觉自己已被中国人称作修正主义者了，同时拉丁美洲其他各地的急进革命者虽是仍然把古巴看成为革命的首都，并且逐渐理解到，南美洲的非特权阶级虽然只是因为卡斯特罗历经劫难而幸存下来才把他看作为一个救世主，却已开始怀疑卡斯特的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了。1965年仍然是俄古关系的一个愉快时期。在格瓦拉已经离国之后的那个夏季中，卡斯特罗严厉地批评了他后来所采取的精神刺激的做法，同时完成了以原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前身是统一革命组织）改组为拥有一个以军人为主的中央委员会的古巴共产党的过程。

卡斯特的谨慎态度在1966年1月于哈瓦那举行的三大洲会议上就告结束，当时，那个先前由埃及人和俄国人拼凑起来的亚非团结组织，改成了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而且大出俄国人的意料之外的是，这个组织已经被卡斯特罗夺去了。当时，卡斯特罗信口许下了愿，说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革命运动都能指望得到古巴的无条件的帮助。之后，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在哈瓦那设立了总部，那个大家熟悉的、但以前在国际活动方面并不很知名的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担任了新的总书记。来自拉丁美洲其他各地的一批数目可观的急进游击队领导人的出席，使这次会议发生了一连串的紧张事件，这些人自然使俄国原先希望将控制会场的一些正统派共产党代表变得相当无足轻重。卡斯特罗确实利用这次会议大肆攻击

中国。^①但是这并没有给眼看到三大洲会议毫无保留地赞成武装斗争的意見的俄国人在外交上的失败以任何的补偿。卡斯特罗之所以改变论调，一则是想重新取得对全世界那些具有战斗性的革命者的领导权，一则是因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联盟在智利1964年大选中失败后对“和平道路”的日益怀疑，一则是越南战争激化的结果，因为古巴同北越有密切的关系，而这是符合于两个在同美国作斗争的孤立的小国的情况的。^②

自此以后，古巴同其余共产主义世界的关系就再也摆脱不掉争论了。卡斯特罗和正统派共产党人互相进行激烈攻击，卡斯特罗特别抨击委内瑞拉共产党，指责他们出卖了道格拉斯·布拉沃所领导的委内瑞拉自由战士。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分裂了，再没有召开过新会议，而在前一次会议上，拉美代表已自行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拉美团结组织——这个组织于1967年8月在哈瓦那举行会议，以“协调和推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格瓦拉（虽然缺席却当选为大会主席）于玻利维亚重新露面的影响下，大会一致响应他那个在西半球建立“很多个越南”的呼吁。卡斯特罗利用这个机会，对那些资产阶级共产党的“假革命者”发动了一场特别猛烈的攻击，不只是攻击委内瑞拉，例如南斯拉夫这时已几乎被古巴人惯常地称作“机会主义者和叛徒”了。

1967年10月格瓦拉遇害，尽管他的计划因而失败，

① 1966年3月13日卡斯特的讲话。

② 古巴也是同越南民族解放阵线有外交关系的唯一国家，“大使”是劳尔·巴尔德斯·比沃，此人在革命前是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总书记。

但是，拉丁美洲的游击队活动却在世界报纸上大加宣扬。因此，卡斯特罗自认为已经十分强大，而只派了一个很不重要的代表、卫生部长马查多·本图拉（正是他听到了勃列日涅夫亲自对“脱离生活实际的假革命理论”的攻击——借此把人民同卡斯特罗分别开来）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俄国革命五十周年庆祝典礼。在许许多多共产党杂志上，在文学周刊上以及在《真理报》上，论战继续不已。一些正统派共产党员一方面开始攻击格瓦拉是一个“巴枯宁分子”，另一方面攻击他拒绝接受玻利维亚共产党的领导。格瓦拉的玻利维亚日记的发表，虽然激起了对他的命运的兴趣，却没有提高他的声誉，这本书的俄文版还对他的战术写了一篇长长的批判文字。但是，卡斯特罗在古巴版的序言中，却谴责玻利维亚共产党的领导出卖了格瓦拉，正如他谴责委内瑞拉共产党出卖了道格拉斯·布拉沃一样。

在这期间，大批南美人和非洲人在古巴接受游击训练。古巴以曾经帮助刚果（布）共和国镇压了1966年的叛乱，以曾向约旦的法塔赫提过意见，以曾于1964年帮助推翻桑给巴尔的国王而声名大著。古巴继续用克奇瓦语、^①艾马拉语、^②瓜拉尼语^③等语言以及西班牙语进行很多小时的广播、宣传和鼓励颠覆活动。“武装斗争”虽然受到古巴人和南美各国政府大加夸张，却依然是南美生

① 在古印卡帝国中占主导地位的一个印第安部族的语言。——译者

② 大部分居住在玻利维亚和秘鲁的一个印第安部族的语言。——译者

③ 居住在巴拉圭河和大西洋之间的一个地区的印第安部族的语言。
——译者

活中一个无法捉摸的部分，而南美各国却想由此而能更好地获得美国供应新武器。在古巴的报刊上，南美大陆似乎仍然是“一条辽阔战线”，革命者肆行暴力，“把政府军打得望风而逃”、眼看就将凯旋进入加拉加斯的米拉弗洛雷斯宫，或者象墨西哥的萨帕塔的一部一样进入桑博恩餐馆。

1969年，卡斯特罗的斗争精神多少有点衰退了。卡斯特罗由于需要集中全力于收获著名的一千万吨甘蔗上，在他的讲话中很少提到“武装斗争”了。^①1970年初，委内瑞拉的游击队领导人布拉沃同卡斯特罗公开决裂，指责他是苏联的工具。原来的种种争执都压抑着，无论革命或进步联盟的原则都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关于武装斗争是否可取的讨论，已经歪曲了古巴的历史。格瓦拉在他最后的一些著作中所极力主张的战斗（并且得到了雷吉斯·德布雷的支持）多少有点容易被看作是一种过激份子的战斗——既不同资产阶级妥协，也不同美国自由主义集团妥协。但是，卡斯特罗本人在山区中的斗争却是不同的；他是作为一个被迫拿起武器的政治领袖而进行战斗的，而且总是愿意向任何人作出让

^① 1968年，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在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篇讲话，清楚表明中苏争端将不是辩论的主题；曼努埃尔·布拉沃·查普曼确实因为试图把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的供应部门变成这个问题的政治辩论中心而受到攻击（《格拉玛报》，1968年2月11日）。1969年，一个曾在情报组织工作过的脱党分子奥兰多·卡斯特罗·伊达尔戈声称，在1968年5月，卡斯特罗同俄国签订了一个秘密协定，要古巴在拉丁美洲执行亲苏路线，以换取继续给予经济援助（《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69年7月16日）。这显然并不排除继续在古巴为不发达世界其他各地训练游击队，例如训练厄立特里亚的解放军。

步和表示友好。如同以往古巴的历次内战一样，自由主义的北美人都尽了最大的力量来帮助古巴的起义军。六十年代后期的南美起义军，为了力求在比较纯洁的旗帜下进行斗争，甚至不同当地共产党作任何妥协，才得以保持他们的理想的完整性（虽则甚至这一点也不是肯定的，因为险恶的环境既需要英雄主义又需要犬儒主义）；但是，他们都不会象卡斯特罗那样进行战斗，卡斯特罗对于生命，大概比格瓦拉一旦实现他的“两三个或更多的越南”更要顾惜得多。卡斯特罗显然注意到了这类似是而非的议论，1961年，他解释说，“当然，如果当我们只有寥寥几个人站在图尔基诺峰顶的时候，就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我们可能永远也下不到平原上来”；^①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有一次也一本正经地说，“谁会想到马修斯登在《纽约时报》的文章是支持一支共产党游击队的呢？”^②

在“武装斗争”这个问题上，古巴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是处于一个例外的地位的；1868—1878年和1895—1898年的古巴独立战争，比之十九世纪初期旧西班牙帝国其他部分的独立战争，在生命和社会后果方面，都远更具有破坏性。诚然，古巴的几次战争都以彻底摧毁旧古巴的寡头政治而为北美人控制古巴社会开辟了道路——这个结局很可能就是七十年代拉丁美洲任何一

① 1961年12月20日的讲话。

② 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古巴革命与过渡时期》，第2卷，第41页。

个幅圆辽阔的国家的长期武装斗争的后果——一种肯定可能发生的事态。另一方面，1956—1958年的古巴革命战争肯定比例如墨西哥革命或1948年以来成为哥伦比亚之特征的长期暴力行动更为温和。

古巴革命，一种对美国的加里波第式^①挑衅，也是企图解决古巴本身问题的一种尝试，实际上也许对北美而不是对南美具有更大的威胁性，因为它开始抨击北美的贪得无厌和生活标准，而北美的生活方式，由于进步的交通条件已在五十年代迅速传入古巴。所以，古巴革命既是北美革命的一部分也是南美革命的一部分，这是随着流亡者不断地拥入佛罗里达州而越来越明显的一个事实，再次成为该州于十八世纪末一度在行政上所出现的情况：海外的哈瓦那的辖区；而古巴本身，由于一次古怪的反常的历史重演，现在再次象1762年以前那样同讲西班牙语的南美各国隔绝了，而俄国则扮演了一度由西班牙扮演的那种母后的角色。

自从导弹危机以来，美国政策一直没有多大变化。美国总统所发表的最后一篇威胁古巴的声明，是1962年12月29日肯尼迪在迈阿密的奥伦治欢宴上发表的那一篇，那一天他欢迎从猪湾归来的被俘人员，并许愿说，总有一天他要将他答应妥为保管的那面队旗在自由的哈瓦那归还给那个团队。但是，后来肯尼迪所谋求的却不是战争而是忍让，要不是1963年11月他被刺身死，倒是有可能

^① 加里波第（1807—1882年），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译者

和解的。^①

约翰逊总统对古巴是采取保守政策的。约翰逊政府由于精神贯注在亚洲，只是把注意力集中于维持经济封锁和在西半球孤立古巴，并且大体上是成功的。关塔那摩的基地依然保存着。古巴人在海外的冒险活动，例如格瓦拉企图在玻利维亚搞游击战已告失败，^②但是古巴国内却比较安定。在这期间，凡在古巴有金钱损失的人，都在等待解决，^③并且经过因担心革命而在拉丁美洲的私人投资大幅度下降的几年后，又慢慢开始增长了。^④1969年，又出现了美国有可能同古巴和解的议论。卡斯特罗对一位北美的银行家说，美国新政府似乎比上一届政府有礼貌，也较为谨慎。但是，看起来，在卡斯特罗现在这个理智发展的阶段，他那么频繁地讲什么“我们同美国没有任何接触，我们也不想进行任何接触”——虽则实行禁运——也不见得会有什么真正谅解的可能性。^⑤禁运毕竟有它的政治上的效用，但是对于卡斯特罗来说，恐怕

① 参看琼·丹尼尔的文章，《新共和》杂志，1963年12月14日；威廉·阿特伍德：《红军与黑军》（伦敦，哈钦森，1967年），第144页。

② 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在追踪格瓦拉（表面上却不表露出来），又说格瓦拉一重新出现于玻利维亚，华盛顿就立刻加以分析，并且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并不希望格瓦拉遇害云云，关于这项有趣的议论，参看安德鲁·圣乔治：《美国是怎样搞到切的情况的》，《真实》杂志，1969年4月。

③ 处理外国要求赔偿委员会所定的美国对古巴的赔偿要求为二十七亿美元，其中四亿美元是个别私人的赔偿要求，其余之数则是九百四十八家公司的赔偿要求（《纽约时报》，1967年5月24日）。

④ 在拉丁美洲的私人投资，据估计在1957年是十亿美元，在1961年降至二亿美元（《纽约先驱论坛报》，1962年6月10日，第7版）。拉丁美洲人和美国公民在拉丁美洲的投资的陡然下降，其大部分资金转往其他地方（例如转往欧洲），这是古巴革命的一个重要后果。

⑤ 同卡罗尔的会见，《新政治家》杂志，1967年9月22日，

是害少而利多的。

在导弹危机之后，美国停止了哈瓦那至迈阿密的泛美飞行，于是，从古巴前往西方世界的唯一飞行，有三年都是经由墨西哥或者马德里的。所以离开古巴的流亡者数目很小。但是，在1965年12月以后，建立了一个航空公司，每月凭以搭乘美国政府特许的班机离开古巴的“蛆虫”^①达三、四千人之数。这个又仁慈又明智的安全活门，自1965年以来已经把二十万古巴人运送到佛罗里达州；但是在瑞士大使馆登记的希望离开古巴的候机者，据说还有二十万人以上，不过凡十五岁至二十七岁的男子以及“在三、两年内即将届龄”的人一概禁止离境（很多技术人员也不能离境）。在1959至1962年有三十万人左右离开古巴，已经离开或希望离开古巴的人已占人口的十分之一。这种飞往国外的可能性无可否认是比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期间斯大林所实行的政策更好的一个代替办法，在那段期间，俄国人口的一个相似的比例是在集中营里的。但是拿斯大林来比较并不是什么最好的标准，而且候机名单本身就是一个造成极端懊恼的原因，因为一张离国的申请书就会给一个未遂的流亡者带来困难和侮辱，包括丧失职业和财产。凡申请离开古巴的人就把自己交由政府任意处置了，即使一切进行顺利，申请人在那一长串的名单中占到一个地位，照例在得到离国的许可、飞机票（要用外国货币支付）和进入美国或西班牙的签证以

① 蛆虫是革命政府为那些反对政府的人所起的名称。

前，他们一般也要以最低的工资在农场上劳动两年以至两年以上。他们住在特别建造的泥地营房里，这种营房确实和上一世纪的奴隶棚非常相似。结果，很多人还是企图非法地离开古巴，或乘小船，或者通过关塔那摩，但常常是事败身亡，也许被鲨鱼吞噬，或者被捕和被击毙。^①

^① 对现在国外的古巴流亡者数目的估计，彼此差距很大。连同在流亡中出生的儿童，总数现在可能是八十万左右。

第四十一章

追求自由

六十年代的古巴就这样为它的虽说少数却数量很大的公民，特别是为其中很多人上演了一出悲剧，这些人不是由于自己有任何过错，而是因为社会历史累积，过去似乎不太看重戏剧。有那么许多家庭已经分崩离析，有许多个人不幸是由于政治原因而造成的，撇开那些领导人不谈，还有许多在哈瓦那的医生和教育家以及流亡在美国的民主主义者都认为他们为最理想的事物出过力，然而却彼此轻视，彼此仇恨，最令人痛心的也许是“个人那种非言语所能表达的内心矛盾，这种人深信自己对‘被出卖了的革命’的分析是正确的，然而却经常留意于煽动……那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不受他重视的另一个‘敌对阵营’”。^①此外，还有这样一种政治运动的悲剧，它以利用各种人的丰富感情为开始，而现在已经变得至少是不容异己了；还有无数的古巴人远离自己所热爱的故土而死于流亡中的悲剧。

所以，古巴的革命给人上了一堂政治课。那些仰慕革命政权取得社会进步的人，应该考虑到狱吏的残暴行为，

^① 卡洛斯·路易斯：《一个流亡的古巴革命者的手记》；另参看古巴前驻伦敦大使路易斯·里卡多·阿隆索的小说：《自由国土》（伦敦，彼得·欧文出版社，1966年）。

考虑到一种难以预料但无所不在的暴政的专横性质，考虑到一个缺乏效率的官僚政治国家那种千篇一律的情况以及一个备受攻击的社会的那种忧郁情况，在那里，不存在（按照塞贡多·卡萨利斯的说法，“可悲的屈从色彩”）离心倾向和私人试验，至于私人企业，就更不在话下了。那些厌恶暴政的人必须想到很多领导人显然是廉正的，必须想到以前所不曾得到（但本来是可以作到的）的最低工资、普及教育和医药，必须想到农村贫困已大为减轻。热爱革命的人往往会象哥伦布一样，一看到古巴草木之美和人民的魅力就目眩神迷（一如他们常从古巴和各国人民友好协会的黑色小轿车^①的窗口极目所及的情况一样），或许还必须想到保健和教育只不过是美好生活的辅助物，而在古巴正如在共产主义世界其他各地一样，往往认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目的本身却似乎被遗忘了。甚至马克思的政治抱负的目的也不外是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在那个社会中，人不是被看作一个不可思议的历史过程的客体或部分，在那个社会中，最少的少数人甚至在微不足道的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穿着制服的大众想必是要开拔到一个可以解散的地点。对于一个历史家说来，美好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个社会中，真理不被滥用，对于历史，甚至对于近代历史的研究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这个社会完全跟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他的第一次著名演讲《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中所描述的一

^① 古巴和各国人民友好协会是一个招待外宾并确保他们看到古巴的精华的官方机构。古巴和各国人民友好协会的预算是非常宽裕的。似乎总能供应可靠的外宾以雪茄烟、台克利酒和盛饌。

样，当时他还说，这个社会已经在1952年被巴蒂斯塔摧毁了：“从前，有一个共和国，它有它的宪法、法律、自由权；有总统、国会、法院；人人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和写作的完全自由……当时存在着受到尊重和尊敬的公众舆论。”这是卡斯特罗对卡洛斯·普里奥时代的古巴有点过奖的描述；它和卡斯特罗本人统治下的生活毫无关系。

当然，卡斯特罗和他的政府也许对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来说可能是得人心的，不过，因为自1960年以来既没有过选举，甚至也没有举行过民意测验，所以这一点是无法准确知道的，而且，在一个极权主义的制度中，也不可能象鲍里斯·戈登堡所说的，对“自发的热情和被迫的或机会主义的服从”加以区别。但是，即使能够在统计数字上，证明古巴人仍然热爱卡斯特罗的确实比恨他的多，那也只是一个因素而已。假使那些独裁政府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地通过对大众宣传的工具来控制讨论的话，那么要说某某政权是得人心的，也越来越不令人感兴趣了。从来就是这样吗？克劳德将军在1927年对凯洛格国务卿说“大多数古巴人赞成马查多连任”时，他无疑是对的。即使在比较自由的社会中，民意测验也是反复无常的。1860年，马克西姆·迪康在那不勒斯听到人民在街上情绪激昂地高呼“意大利万岁”后，问他们旁边的人，意大利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在整个六十年代一直高呼“美国佬，记住吉隆滩！”或“团结在非德尔周围”，“我们必胜”，“枪决”，“滚出去”，“团结”，“非德尔，坚定，狠狠打击美国佬”，“我们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万岁！噓，噓，噓”，“决不后退一步”，“无产阶级国际万岁”，“誓死保卫祖国”

或革命古巴的其他无数口号的那些群众，他们是谁呢？他们有多少人呢？其中有些人是不是就是在1950年埃索标准石油公司所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表明大多数古巴人宁愿为一个美国公司工作而不愿为古巴政府工作^①（这是同六十年代初热烈欢呼卡斯特罗激烈指责“胸无点墨的百万富翁”肯尼迪的成千上万人的态度难以调和的一种思想）的那些男女呢？无疑是这样的。

卡斯特罗的吸引力和演讲使他自从1959年以来得以充分按照他自己的计划来领导古巴社会。他成功地说服了很多人相信：商店货物的缺少是一种美德的表现，甚至象存在在东欧的那种市场经济乃是一种弊病，城市是万恶的，农村是高贵的等等。^②他的演讲说服了很多人甚至接受取消圣诞节的意见，并且欢迎1969—1970年的收成将持续十八个月；同样，过去也有利口善辩的奴隶主能够解释为什么只应每十天才有一个星期日的道理，而且仍然受到爱戴。卡斯特罗的鼓励暴力，喋喋不休地大谈冲突这个题目，以及他以来福枪作为象征的作法，吸引了全国并且可能煽动起在私生活中受到压抑的潜在的男子汉大丈夫精神。^③强有力的、不容异己的政府往往要比随随便便的、兼容并包的政府更得人心，正如战争并不普遍为人所痛恨一样。

^① 参看1950年9月纽约国际舆论研究所：《为埃索标准石油公司而在古巴举行的舆论调查》（古巴）。“大约每三个人中有一个人的第一选择是一个美国公司，而表示愿意为古巴政府工作的寥寥无几。”

^② 或许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在很多问题上一样，马蒂下述这句格言起了作用：“城市歪曲了判断，乡村下达了命令并加以改良。”

而且,卡斯特罗曾经作了许多颇得人心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对少数人是不公正的,或者甚至这些事情至少是有点儿故意为了博得人心的。革命的古巴一直有一种来自社会革命和国际冒险的令人兴奋的经验那种崭新的民族精神。卡斯特罗本人的那种无疑会带来好运的、显然伟大的、确乎劳而忘倦和不可轻侮的人格,本身就是很多古巴人可引以为荣的一种非凡的品质。革命政府的教育和卫生改革,在一个过去对这两者的羡慕超过了对正式的民主制的羡慕的国家里,是非常得人心的;在大杂院或茅屋周围闲荡的成群结队的儿童,过去自然是作父母的一个经常的耻辱,也是一种焦虑。最后,旧主子阶级的瓦解、贪污腐化和帮会活动的告终,社会歧视和对北美的卑躬屈膝的态度的根除,的确使很多古巴人大为愉快;同时,革命政府最初的和具有国际意义的最著名的成就——把私人海滨对群众开放——象征了纯政治自由的最坚定朋友所不能不考虑的近十年的成就的一个方面。

所以,这些成就是不是得不偿失,可能是一个主观看法的问题。取决于财富或阶级正不亚于取决于人的性情,

③ 卡斯特的魅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让-保罗·萨特还会从别的什么人那里得到这样一句话:“如果有人向我要月亮,那准是因为有人需要月亮”?此后,萨特在1960年说,卡斯特罗已成为他的“少数朋友”之一了。值得注意的是,卡斯特罗多么乐于使用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不能想象的那种激烈言语,却迷住了不少外宾。最奇妙的评论是出自克莱夫·詹金斯的:他在1961年访问古巴时,问一个民兵说:“你们要选举吗?”他看着我,摇了摇头,说“我们已经有了这些东西。”在这个时刻,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答复。(民兵的话是响应卡斯特罗1961年5月1日的讲话的。)诺曼·刘易斯为《古巴和菲德尔》(民主管理协会,伦敦,1961年)写的序言。

在古巴象在其他地方一样，也有这样一些人认为“如果一个比较公正的经济制度只有靠禁止人们以智力从事自由探讨才能达到，……那么，代价〔未免〕太高了”。^① 事实是清楚的：古巴没有任何宪法，虽则据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在拟订一部宪法，却看不出这样一部宪法会使情况发生什么变化，正如1935年的苏维埃宪法会在俄国发生什么变化一样。所以，卡斯特罗的政府依然还是1959年以来的老样子——伊利·哈勒维给专政所下的定义是一个好例子——“一群受到共同信仰所激动的武装人员夺取了政权，于是宣告他们就是国家”。^② 在某些古巴人看来，实则无异是四十年代后期一种具有政治理想的帮会集团——既是最理想主义的也是最冷酷无情的——终于夺得了公共建筑物，现在还垄断了大卡车和机关枪。

而且，毫无疑问，这种政府制度，既是暴虐的，也往往是无效率的。醉心于经济发展的政府，自然会毫不顾及地方利益。一个新飞机场的场址还非进行一番调查不可，那是多么令人生厌呵？但归根到底，在决定政策以前，先加以讨论自然是有益的。在古巴，根据塞贡多·卡萨利斯的说法，凡是不好的消息，照例往往不送给卡斯特罗，因为他会把送消息的人同这项消息联系起来。卡斯特罗的性格是复杂的，肯定他自己也不完全了解。大家所清楚了解的是，他是不能受得住建设性的批评的。“唯唯诺诺的人”显然不胜其多。如果古巴有一个自由的新闻出版制

① 伯特兰·罗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艾伦—昂温出版社，伦敦，1920年），第8页。

② 伊利·哈勒维：《暴政的时代》（艾伦·莱恩，企鹅出版社，伦敦，1920年），第8页。

度,也许就可以制止1960—1963年对制糖工业的疏忽情况,制止很多浪费的工业计划,制止六十年代后期仍然争吵不休的咖啡运动,或者制止对哈瓦那这个美丽的城市(不管卡斯特罗喜欢不喜欢,它是古巴可引以为自豪的事物之一)以及甚至制止对1969—1970年的一千万吨收成的可悲的疏忽情况。时至今日,还得指出自由是一种方便又是一种原则吗?在一种霸道的制度下,自由也总是有被进一步歪曲的可能,如同发生于四十年代初期在战争压力下的德国,或三十年代在土地改革压力下的俄国那样;而议会民主制,尽管有其种种缺点,却具有作为无需暴力就可以解决国内争端的良好途径的价值。

所以,古巴革命政府是别国必须作为一个教训、不是作为一个范例而牢记于心的一种试验。以大多数标准来衡量,古巴的生活标准一直是高于所谓不发达世界的大多数国家的。古巴过去的社会苦难,应该归因于成为北美以及南美之特征的那种薄于公而厚于私的极端的形式。在1959年以前,古巴的确需要,而且比大多数国家更需要改革。改革应该做到支持和欢迎那种无可争议的仁慈的变革;怀疑那些未必具有价值的事物;废除那些不公正的或错误的事物;批判暴虐的方法,即使这些方法已经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同时并不因为在其他环境或其他国家中,手段可以和目的相配合而感到失望。归根到底,有些人之所以向往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们首先把它看作是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即在这种社会制度中,不但优先考虑到公共利益,而且每一个人都会受到人类理应受到的尊重。

1963年，卡斯特罗对于北美人竟企图把卡斯特罗主义和共产主义加以区分，表示诧异。^①不过，乍一看来，革命的古巴显然大多受惠于在俄国或东欧实行的那种共产主义。党、劳动和设计的组织反映出实施于基础牢固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正统共产主义思想；特别表现于党在军队和警察内部的作用。

古巴的制度所具有的明显特征，使它与“友好的社会主义各国”（照哈瓦那方面的通称）有所不同。这包括诸如保卫革命委员会和民兵这样一些机构（如果这也许不是一个太显眼的字眼的话）在内。尽管国家在古巴所造成的庞大官僚制度往往表现出无能，但是官吏们在执行职务时，似乎比其他共产党国家多少更能尊重个人。国家仍然可以指望很多人，特别是儿童和青年表现出热情来。这或许也是一种主观的判断，因为很多坐过古巴的监牢的人准会有不同的看法。

民族的气质和古巴的气候，加上古巴最近的历史经验，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个制度的性质。例如，一方面卡斯特罗没有任何有力的官僚传统来帮助他，象东欧共产党国家和俄国那样；另一方面，古巴的共产主义制度也不是建筑在一个遭受过长期流血战争的灾难的民族上面，象在为共产主义理论所掌握的其他每一个国家那样。使卡斯特罗取得政权的古巴内战，规模并不太大，巴蒂斯塔的独裁，虽然卑鄙残暴——而且那种残暴行为

^①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分》，《今日报》，1963年2月24日。“在许许多多滴水中，”格瓦拉曾经说，古巴共产党只是“一滴水，然而这一滴水是可以辨别的”。

是特别易于宣传的——却不能和四十年代初纳粹在欧洲和俄国西部所搞的新秩序的暴虐相提并论。

在一个象古巴那样的气候的国家，冬季既不需要燃料又不需要冬衣，任何一种独裁都显然是比较容易忍受的，所以它本身就具有一种多少比较仁慈的性质。这就可以对俄国的共产主义的一些弊端用这是俄国式的这种解释来作辩解了，而对古巴的共产主义所具有的一些吸引力（因为对很多人说来确实具有吸引力）则可以用这是古巴式的这种解释来作辩解。

古巴的革命政权也跟其他一些共产主义的制度不同，因为卡斯特罗自称能够自己决定方向并适时地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卡斯特罗的气质，他所凭以取得政权的方法——是象毛和铁托一样，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不是托庇于红军——加上古巴的地理位置，使他具有一个独立的地位。卡斯特罗曾经利用这一点来论证说，可以同时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列宁和马克思准会认为这种观点是离经叛道的、浅薄的、幼稚的或巴枯宁主义的），他还说“战争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学校”。卡斯特罗支持一切“有党派或无党派的革命者”，支持任何拉丁美洲国家的任何革命进程——甚至支持鼓吹革命就是军事领袖集团干的那些人，因为他们认为“在大多数国家中，〔正统的〕共产主义运动太狭窄，太教条主义，而不包括一切……革命力量在内”。^①卡斯特罗从来不承认战争是

^① 这些话是卡斯特罗对卡罗尔（《新政治家》，1967年9月22日）于1969年8月29日谈及“假革命的”委内瑞拉共产党时说的，又曾于1969年7月14日（在帕德雷港谈及秘鲁的军政府时）和在1967年对卡罗尔说过。

一种罪恶。在1970年，如同在1959年一样，似乎再度使人觉得，他在学生时代参加的第一个政治团体的名称即革命起义同盟，在很多方面说来，就是他的政治态度的最好的标记。

或许这就是说，这个在做共产党员以前就是一个革命者的卡斯特罗，在气质上宁愿干青年的、英雄的活动，而不愿意干老年的活动，不愿意学习（马克思或其他任何人的著作），^①不愿意小心谨慎，所以必然要批评拉丁美洲老一代的共产党领袖——布拉斯·罗加、埃斯卡兰特或奥尔多基这些老一辈的人。另一方面，或许这跟那个认为可以同时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观点一样，是一种暂时的、而不是扎扎实实地研究出来的哲学观点。古巴一度曾经风行物质刺激，现在（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的时候）又风行精神刺激了；但是这会一直风行下去吗？“新人”可以一变而抱有旧情绪。卡斯特罗对武装斗争的看法在1962和1966年之间已经不那么夸大其词了（实则自1969年以来就一直稍为不那么夸大其词了）。最合理不过的假定是，卡斯特罗总是比较喜欢“最有能力、最干练、最胆大的”人，正如他对李·洛克伍德这位美国人所说的那样，但是，这个熟练的革命者所用的词句听起来

^① 卡斯特罗一定是读这位导师的著作既不多，而在他的语汇中又很少引用马克思主义词句的第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袖。1969年11月4日在鼓励武装部队在1969—1970年的糖作物大收成中尽其最大努力的一篇演讲中，他宣布他和他的追随者应该是“马克思思想的精华和列宁思想的精华”的旗手——这种提法自然是可作任何解释的。

却同一个熟练的资本家所用的词句没有什么两样。卡斯特罗和铁路建筑者珀西瓦尔·法夸尔多半是会有相同的意见的。

一到紧要关头，卡斯特罗那种比任何一个具有坚定组织原则的人都更会发生情绪变化的情况似乎就是他的最大特征；因此，正如他后来一些敌人所说的那样，从他以显得十分诚恳的态度说“不论我还是运动，都不是共产主义的”（1959年1月13日），或“我所不准备作出的唯一牺牲……就是用武力去推进革命”（1959年2月6日），到他1961年的那句名言：“我有生之年将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1961年12月2日），其间的时间间隔之短，是十分惊人的。所以，古巴革命的特征就是在一个世所熟知的有组织的共产主义制度的上面，把卡斯特罗作为“最高领袖”抬了上去，而个人权力则通过经常的和巧妙安排的亲自出头露面，而终于表现在其接二连三的伟大的讲话中。自1959年以来，古巴的一切重要决定都是由卡斯特罗作出的，有时还得注意到那种甚至存在于一个封闭社会的有影响的集团（例如军队或老共产党员），有时则不注意。“革命”，那种人和神向往于乌托邦的不可抗拒的运动，被公开奉为非洲神那样，尽管这个神的要求往往是反复无常和不可思议的，却被卡斯特罗解释为圣所的看守者，是从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至马蒂以来其他一些立志在古巴承担这个角色的一個可敬的继承者。（格劳·圣马丁自然是一个伪先知，但是可不可以说也算是一个先知呢？）卡斯特罗的出尔反尔可以从他那奇特的自白中看出来：“资本主义掘了两个坟墓——一个给

它自己，一个给继资本主义而来的那个社会”。^①

把卡斯特罗给古巴共产主义加上的特殊色彩同法西斯主义比较一下，倒是颇有诱惑力的；卡斯特罗，象奇瓦斯，而且也象莫斯利或者希特勒一样，显然认为政治力量在于“广大群众对一个激动人心的演讲所引起的反应”。^②在古巴人口中有大部分人，包括有理性的和高尚的人士在内，都情愿以自己的个性屈从于卡斯特罗，正如人们过去对法西斯领袖所做的那样。在政府的宣传中，一直不断推崇暴力原则，号召作出尚武的反应；还有崇拜领袖，在教育制度方面强调身体健康，以及不断抹黑资产阶级民主制。格瓦拉在给古巴社会主义运动下定义的那本《社会主义与人》的内容本身，就既有法西斯主义的，又有表现主义的观点，“具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要把似乎已被社会原子化了的和异化了的‘完整的人’夺回来”^③，所谓“完整的人”，照格瓦拉的说法，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常用语”中找不到自己的一种人。格瓦拉认为典型的“新人”，即一种英雄，一种有行动、有意志和有个性的人准会得到象布拉西腊希或德厄里这些法国的法西斯主义者或者阜姆共和国那个大肆蛊惑人心的时代的邓南遮^④所景

① 在卡马圭省的讲话，《今日报》，1962年5月15日。

② 斯基德尔斯基谈到莫斯利的话，载伍尔夫编：《欧洲的法西斯主义》（1968年版），第236页。

③ 乔治·莫斯：《法西斯主义的起源》，载《现代史料季刊》，第1号，1966年。

④ 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反动作家，先后在陆、海、空军服过役，拥护并鼓吹法西斯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极力主张意大利参战，他则参加空军作战，1919年，他带领一批意大利士兵，占领了阜姆（今南斯拉夫一个海港），并因此被墨索里尼封为“亲王”。——译者

仰，邓南遮本人至少在一个评论家看来，似乎一直是卡斯特罗在智力上的前驱。^①卡斯特罗的说教和同一切物质目的决裂的愿望反映出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新生；他把自己表现得象墨索里尼那样的一个亲切的慈父。事实上，如果完全从反面来看，或者如果忘记甚至纳粹革命也“能满足人们对于那种同无阶级社会混为一谈的行动主义的深切需要”的话，当然无法理解三十年代法西斯革命（对卡斯特罗的革命的理解也差不多如此）。法西斯主义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种异端，有几个法西斯主义的领袖一度还是左翼分子。那么，卡斯特罗一到时候（或更可能在某一个时候）从极左变到极右，就不是不可以想象的了。那种神灵赐以特殊能力的领袖，不论左的和右的，毕竟都生活在人为的背景之下。正如乔治·凯南所说的，“他为自己创造了〔背景〕；自己也盲目的相信它，而且，一般说来，他多少还能成功地使别人看来觉得它是真的。而他所扮演的角色，尽管布景是人造的，却仍然显得十分英勇，很为动人。”^②这一至理名言，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如对自然也是拉丁美洲的考迪罗主义传统的后裔的卡斯特罗这样恰当。

但是，古巴革命那种完全背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特征，实际上是渊源于古巴历史本身的。历届革命政府既受过去的印象所推动，又受未来的幻影所推动。因为古巴一些政治家热爱“革命”这个词儿至少已有一代之久

① 参看理查德·洛温撒尔：《无理性和革命》，载《邂逅》杂志，1969年11月。

② 乔治·凯南：《列宁和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和西方》。

了。^① 古巴资本主义的流弊，创造了它自己所想象的革命。古巴人也同样热爱“自由”这个词儿；奴隶追求摆脱奴隶主的自由，商人追求摆脱西班牙法律的自由，浪漫主义者追求摆脱西班牙军队的自由，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追求摆脱糖的束缚的自由。现在卡斯特罗认为他已经通过建立美洲的第一块自由国土而得偿宿愿，虽则数十万名古巴人已经把自由解释为流亡。

卡斯特罗常常把革命称作一个“过程”，以第一次古巴独立战争为开始，政府的宣传也一贯作这样的描述。所以，1968年是作为“百年斗争”的极峰来庆祝的。小说家利桑德罗·奥特罗在他所主编的彩色插图宣传杂志《古巴》上写道，“1868年的革命继续于1895年，深入于1933年，再生于1953年，即使不是完成于也是胜利于1959年”（古巴的历史也可以写作为拉卡瓦尼亚囚犯的历史，或迈阿密流亡者的历史，在迈阿密，何塞·马蒂的雕像立于博利瓦尔之侧，在迈阿密，马塞奥的孙子在1961年成为一个推翻卡斯特罗的委员会的成员）。虽然自从1959年以来，历史一直受到歪曲，卡斯特罗的革命却是集三代“革命活动”、激烈言论、奢望解救和一再修饰自由这个概念的大成的。“当消息传到我的扎营地时……它激起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热狂……我们认为自己一定获得了自由，”1898年起义军一位上校奥雷斯特斯·费拉拉这样写道。

^① 这甚至对于流亡者来说也是适当的：例如，卡斯特罗的妹妹胡安尼塔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攻击她的哥哥时，也还谈到有必要进行一次“真正的革命”，创造一“全新的古巴……一个与过去和现在都无关系的古巴”（在迈阿密的谈话，1969年10月21日，在WFAB广播电台）。

所说的消息就是美国干涉的消息，当时美国似乎要提供自由，正如1960年苏联似乎要提供自由一样。

但是，着迷于自由却产生了它自己的束缚，而且，就任何实际的意义上说，甚至卡斯特罗是否肯定就是一个自由人呢？他虽把自己的个性强加于古巴，但是，他却象古巴所有的统治者一样，完全受食糖市场的支配，正如他受他所不能制止的古巴经济的二十年相对停滞的支配一样。古巴人一直梦想有一个英雄气概的革命领袖，他也多少是这种梦想的产物，正如他是一个国家心声的表达者一样，而这个国家的“真正品质”包括有通称为“欢乐”的情调——例如，善于反应韵律——以及残酷行为在内。这个国家虽则从来没有过称职的文官，却经常有嗜杀成性的警察。过去习俗的长长的阴影，笼罩着大多数急剧的改革，不是把它们抹煞了，就是给它们加上十分不同的色彩，在1959年，就对待美国而言，卡斯特罗所处的地位完全同1898年西美战争开始时西班牙首相萨加斯塔所处的地位一样。但是，卡斯特罗却可以要求俄国人卖给他军火（和购买他的糖），而萨加斯塔则不能以此要求于比如说英国或德国。这就是说，冷战“使卡斯特罗获得了过去古巴的统治者所没有的种种抉择”。^①因此，那些“自由主义者”即在1959年卡斯特罗和共产党的唯一代替者，如果他们有机会的话，实际上可能会重复他们的祖辈在1898年的所作所为（自然会以一套爱国主义的花言巧语作为饰词），使古巴转而同美国结成前所未有的亲密同

^① 鲁伊斯：《古巴，一场革命的发展过程》，第5页。

盟,使古巴得以受益于美国的援助和技术,使得古巴在物质上比在卡斯特罗统治下所能达到的还要过得更好,虽则在文化上会处于屈从的地位。反之,卡斯特罗却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残酷的、然而独创一格和博得人心的专制制度,同时靠了这种制度而作出了许多惊人的社会改革,这种制度,不管给它加上什么标签,却是对自由社会的一个严重挑衅。如果取消了这个制度的极权主义的一面,如果自由讨论和自由批评得到鼓励的话,这甚至会是一个更加严重的挑衅。不过,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这个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狂热和教条主义的,而狂热者是难得有恻隐之心的。

自从英国人在1762年攻占哈瓦那以来这两个世纪中,古巴的人口增加了五十倍,从十五万人增长到七百万人以上。如同美国的情况一样,这种增长是由于移民入境,而不是由于自然的生长。人口方面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意味着这个岛国,包括景物以至气候在内——因为大森林的砍伐——已经起了变化。但是“真正古巴的”局面却反复重演:美国总统在选举人的压力下——波尔克、麦金莱、肯尼迪——采取了强硬措施;流亡者聚集在迈阿密(特别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但从来没有象六十年代那样多);革命的“匪徒”在山区举起了自由的旗帜并作为盗贼而被枪决;但是正如卡斯特罗应该引为警惕的那样,政治叛乱总是发生在经济繁荣的时期——在1868年、1895年和1956年。下一次的叛乱多半会发生在革命政府完成了它的经济目标,而人民有时间思考他们的目的以后,而不是在以前。

自从十八世纪后期古巴开始以无节制的规模为世界市场生产食糖以来，古巴的历史就一直象一个儿童眼里所看到的世界史一样：西里西亚的一件发明、非洲的一次灾害、英国或法国的一场战争或一段繁荣时期——这些为古巴所不能控制的、表面上毫无关联的事件，一直决定着古巴人的生活，他们尽管天真无邪，却是这些事件之间的唯一连系。这个岛从来就不是与世隔绝的。一切重大事件，从拿破仑战争直至苏伊士运河危机都支配了古巴；而卡斯特罗的革命的历史就是以逃避地理上的和经济环境的束缚为目的的一件自觉的大事的历史。但是，作为甚至加诸最大强国和最伟大人物的一种限制的历史铁律，自然也加之于古巴和卡斯特罗。古巴象当年塔列兰^①在维也纳会议上想代表小国取得发言权那样，在1959年一跃而起，想成为一个范例。但是，天呀，“可怜的古巴总是满怀希望，却总是失望！”古巴的未来依然取决于它所不能控制的环境。格劳·圣马丁博士对萨姆纳·韦尔斯说，“如果没有外国管理，甚至没有对外商务交流，古巴还是可以存在下去”；埃迪·奇瓦斯希望古巴“摆脱华尔街的经济帝国主义和莫斯科、罗马和柏林的政治帝国主义的束缚”。但是，在1970年唯一取代美国作为古巴食糖生产的市场的就是俄国，正如在1960年俄国是美国的唯一取代者一样。由于经济多样化比过去更加难以达到，古巴全岛已变成一个单一的糖作物种植园，古巴是

^① 塔列兰(1754—1838)，法国外交家。1814年任外交部长，出席维也纳会议时，利用同盟国间的矛盾，改善法国地位，并提出反动的“正统主义”原则。——译者

没有希望逃脱它的主顾和投资者的权谋术数的。远渡重洋从其他国家取得奴隶的十八世纪的问题，已经因获取石油的问题而又丝毫不爽地重新出现了；以自夸在巴库方面稍一延宕就能扼杀古巴经济的俄国大使馆官员什利亚普尼可夫正是二十世纪南海公司的一个代理商。甚或古巴人尽管具有自己的一切天赋，也逃不出歌德这句格言：“没有纪律的人要争取得到纯粹的自由是徒劳的。因为天主首先是在定限中出现的，只有律法才能给我们以自由。”

1962年以来古巴大事记

- 1963年 4—5月 卡斯特罗第一次访问俄国
又重新侧重糖作物
- 10月 第二次土地改革
- 11月 实行强制兵役
- 1964年 1月 卡斯特罗第二次访问俄国
签订俄古食糖协定
签订莱兰公共汽车合同
- 3月 马科斯·阿曼多·罗德里格斯的审判
- 11月 拉美共产党举行哈瓦那会议
- 12月 马丁内斯·桑切斯自杀未遂
- 12—3月(1965年) 格瓦拉周游亚非各国
- 1965年 3月 卡斯特罗攻击中苏争端
格瓦拉失踪
在大学中反对同性爱的运动
- 4月 圣多明各发生内战
- 6月 卡斯特罗发表强调农业的讲话
- 10月 组成了古巴共产党和中央委员会
葛罗米柯访问古巴
重新开始向美国移民,先用小船,后用飞机
- 1966年 1月 三大洲会议

- 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成立
- 2月 卡斯特罗同中国的吵闹
- 3月 库维拉案
委内瑞拉共产党和游击队之间的争
吵
- 1967年 1月 德布雷的《革命的革命》出版
6月 柯西金访问哈瓦那
8月 拉丁美洲团结组织哈瓦那会议
支持武装斗争
10月 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遇害
- 1968年 2月 埃斯卡兰特及其“一小撮”的审判
3月 革命攻势封闭了五万个小企业
10月 帕迪利亚案
- 1969年 7月 一千万吨收成开始